

# REVIEW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NITED NATIONS

ECLAC

## 前言

ALICIA BÁRCEN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 序言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后危机时代反思

ALICIA BÁRCENA

改善拉丁美洲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OSVALDO ROSALES

全球对华制成品出口的决定因素 (1990~2006年)

ROBERTO ÁLVAREZ E.、EUGENIO FIGUEROA B.

MARÍA PÍA FIGUEROA Z.和MACARENA PALMA E.

大宗商品价格和拉丁美洲出口收益的“中国效应”

RHYS JENKINS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其对加勒比海盆地国家的影响

EDUARDO GITLI和RANDALL ARCE

天使还是恶魔——中国的贸易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JORGE BLÁZQUEZ-LIDOY, JAVIER RODRÍGUEZ和JAVIER SANTISO

为何拉丁美洲的经济不安全感如此普遍

DANI RODRIK

新兴经济体出口多样化和经济增长

MANUEL AGOSIN

发展之宏观经济学：从“金融家主义”到“生产主义”

RICARDO FRENCH-DAVIS

全球金融危机对拉丁美洲地区的影响

JOSÉ ANTONIO OCAMPO

全球经济危机、环境—资源匮乏及财富集中

RAMÓN LÓPEZ

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

GUSTAV RANIS和FRANCES STEWART

1990~2005年拉丁美洲的贫困与就业

SIMONE CECCHINI和ANDRAS UTHOFF

拉丁美洲：将环境因素纳入到生产效率和技术变革的测量中

DANIEL SOTELSEK和LEOPOLDO LABORDA

《拉美经委会评论》之编辑历程

ANDRÉ HOFMAN和MIGUEL TORRES

# 《拉美经委会评论》中文版特辑

2012年11月

# CEPAL REVIEW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licia Bárcena

执行秘书

Antonio Prado

副执行秘书

Oswaldo Sunkel

编委会主席

André Hofman

编辑

Miguel Torres

技术主编



UNITED NATIONS

ECLAC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giz**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IZ) GmbH



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拉美经委会评论》中文版特辑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主编.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80234-857-8

I. 拉… II. 拉… III. 经济发展—拉丁美洲—文集 IV. F173.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2 ) 第242500号

*CEPAL Review Speci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by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ECLAC

© United Nations 2012

This wor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ECLAC.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arranged by th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 GIZ. In case of any discrepancies, the original language will govern.

书 名: 《拉美经委会评论》中文版特辑

著作责任者: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4-857-8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0.00 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535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84604601 84604602

网 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viola\\_lu@yeah.net](mailto:viola_lu@yeah.net)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  |     |
|--|-----|
| 前言   | I   |
| Alicia Bárcen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     |
| 序言   | III |
|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制约因素: 后危机时代反思   | 1   |
| Alicia Bárcena   |     |
| 改善拉丁美洲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  | 21  |
| Oswaldo Rosales  |     |
| 全球对华制成品出口的决定因素 (1990~2006年)  | 41  |
| Roberto Álvarez E.、Eugenio Figueroa B.、María Pía Figueroa Z.和Macarena Palma E. |     |
| 大宗商品价格和拉丁美洲出口收益的“中国效应”   | 55  |
| Rhys Jenkins   |     |
|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其对加勒比海盆地国家的影响   | 69  |
| Eduardo Gitli和Randall Arce   |     |
| 天使还是恶魔——中国的贸易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 85  |
| Jorge Blázquez-Lidoy、Javier Rodríguez和Javier Santiso                           |     |
| 为何拉丁美洲的经济不安全感如此普遍  | 109 |
| Dani Rodrik  |     |
| 新兴经济体出口多样化和经济增长  | 131 |
| Manuel R. Agosin   |     |
| 发展之宏观经济学: 从“金融家主义”到“生产主义”  | 147 |
| Ricardo Ffrench-Davis  |     |
| 全球金融危机对拉丁美洲地区的影响   | 163 |
| José Antonio Ocampo  |     |
| 全球经济危机、环境—资源匮乏及财富集中  | 185 |
| Ramón López  |     |
| 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   | 205 |
| Gustav Ranis和Frances Stewart   |     |
| 1990~2005年拉丁美洲的贫困与就业   | 221 |
| Simone Cecchini 和Andras Uthoff   |     |
| 拉丁美洲: 将环境因素纳入到生产效率和技術变革的测量中  | 235 |
| Daniel Sotelsek 和 Leopoldo Laborda   |     |
| 《拉美经委会评论》之编辑历程   | 255 |
| André Hofman和Miguel Torres   |     |
| 《拉美经委会评论》征稿启事  | 273 |





## 前 言

### 诚邀中国学者投稿《拉美经委会评论》

本中文版《拉美经委会评论》(CEPAL Review)特辑反映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之间愈加重要的双边关系。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共同出版本特辑,对促进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学术交流以及政策制定做出重要贡献,对此我备感高兴。

仅仅30年间,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且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短短数年内,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在贸易战略和国际定位政策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2005~2010年,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之间的贸易总额增速是其对外贸易总额增速的两倍。中国对粮食、能源、金属及矿产品的强劲需求惠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多个国家。

《拉美经委会评论》于1976年创刊,创刊人为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过去36年来,刊物致力于宣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和学术界关于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思想和新观点。《拉美经委会评论》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其他西班牙语和英语地区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最近,刊物英文版凭借其富有洞察力的原创文章被汤姆森路透集团(Thomson Reuters)出版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收录。

值此本特辑出版之际,诚邀中国学者投稿《拉美经委会评论》。

多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加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例如,本机构曾参加五届中国—拉美企业家峰会、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拉智库交流论坛以及拉丁美洲太平洋盆地计划和太平洋联盟举办的部长级会议。去年,我们首次出版中文文件。2012年5月,我们与拉丁美洲开发银行(CAF)以及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LAIA)共同成立了亚太—拉美关系观察站(Latin America-Asia-Pacific Relations Observatory)。

近来,中国高层领导多次出访拉丁美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彰显中拉关系的重要性。今年6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圣地亚哥总部发表演讲,提出成立中拉合作论坛,以政治互信为基础,深化中拉战略合作。

此外,温总理还提出力争未来五年内双方贸易额突破4000亿美元(在目前基础上翻一番)。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希望更多地进口制成品和高附加值商品,实现双方贸易关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本中文版特辑包含2000~2011年间在《拉美经委会评论》上发表的15篇文章。遴选基于三个

标准。第一，分析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第二，向中国读者呈现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文章。第三，向中国学术界和决策层总体介绍发表于《拉美经委会评论》的主要文章，体现我们编辑思路的变化情况。

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通过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经济改革综合项目”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德国联邦

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的合作项目“促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增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社会凝聚力”为本特辑付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同时感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为本书在中国所做的推广和宣传工作。希望这本《拉美经委会评论》中文版特辑有助于加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艾丽西亚·巴尔塞纳（Alicia Bárcen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 序 言

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同属新兴经济体，在新近的金融危机后常常被并列提及，但是这两个经济地理区域在空间上十分遥远，从北京到里约热内卢，最快的航班也要27个小时。也许是因为地理上的阻隔，两个地区的经济关系和相互影响直到最近几年才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而在普通的公众之中，对两个地区经贸关系的认识更是远远落后于实际的经贸发展。这种认识上的隔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迫切需要根据新的现实予以更新的。

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低迷之后，拉丁美洲经济在最近十年强势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兴增长极。中国更是通过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最重要的贡献者。需要注意的是，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并非互相孤立的，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所带来的巨大需求，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贸易盈余大幅度增长、财政状况和就业持续改善的重要原因。拉丁美洲国家提供的原材料和市场，也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助力。充分认识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在经

济上的相互依存性及其影响，对于促进双方的互惠合作以及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意义深远。

中国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合作领域并非仅限于经贸方面，还可以涵盖更广泛的人类发展议题，如减贫、收入分配、社会福利、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等。尽管两个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巴西、智利等，通过创新公共政策来改善人力资本投资、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完善社会福利体系，相关的经验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

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资助的《拉美经委会评论》中文版特辑，就中国和拉丁美洲地区经济的双向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评估和分析，也讨论了双方在深化经贸合作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此外，本书有多篇文章深入讨论了反贫困和人类发展相关的政策议题。这些工作为增进中拉双方的了解和促进更广泛的合作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参考资料。GIZ在这个时候把这些研究介绍到中国，是非常必要而及时的。我也很乐意向国内的读者推荐这本书。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 关键词

金融危机  
经济发展  
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  
宏观经济  
投资  
生产力  
收入分配  
社会政策  
拉丁美洲  
加勒比地区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发展过程中的 结构性制约因素： 后危机时代反思

*Alicia Bárcena*

## 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未来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虽然该地区宏观经济面已出现好转，并为应对当前危机打下更好的基础，但此次危机仍暴露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发展的新旧结构性制约因素，集中反映在社会、经济、财政及环境领域长期存在的巨大差距。消除这些差距是惠及子孙后代的千秋伟业，也是实现兼顾平等、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长期发展之先决条件。这意味着政府除了经济目的以外，还有诸多动力在发展战略中再次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公共政策应在未来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本文将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

Alicia Bárcen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执行秘书

⇒ [alicia.barcena@cepal.org](mailto:alicia.barcena@cepal.org)

## 一、引言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针对当前危机的性质及其影响提出三点假设。

第一，当前危机并非仅是金融体系监管不力的表现，亦不能完全归结于野心和贪婪引发的道德危机。在此次危机中，特殊的“发展模式”正在归于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新一轮经济、社会及环境辩论的开始。

第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政府应在其发展战略引导领域扮演新角色。对政府近期表现进行批判性回顾之后发现，目前亟需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及其运行机制，以期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市场、制度及公众三者间的平衡互动。

根据前两点假设可自然引出第三点假设，即需要重新回归制定“长期发展战略”的思想。这需要更强的公共政策措施制定和实施能力，做到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兼顾。

纵观过去十年的发展历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十年来，该地区宏观经济面取得重大进步，财政状况由此改善，并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和外债水平，从而提高了该地区各国应对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能力。与此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不断遭遇金融冲击，导致商业周期极易波动，增长模式不尽如人意。固有的问题依然存在，如生产力动力不足、经济异质性及技术创新和传播能力有待提高等，并演化成为影响该地区的某些结构性制约因素。因此，当前危机不但突显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反周期调控能力的重要性，而且还提醒我们需要在扩大社会政策覆盖面并完善社会政策设计的同时优先考虑生产政策。这即要求政府重新考虑恢复制定

长远政策的战略规划，为财政政策提供更大选择余地，并设计出合适的工具，以应对影响该地区发展模式的结构性挑战。

本文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政策及行动进行了反思。如果没有新型的政策干预和管理，就不可能在实现经济增长、兼顾平等和可持续性的不同发展目标进程中取得进展。同时，本文赞成在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角色时引入新一轮辩论和政治中心的概念，以此实现发展要求与公民权利和民主制度的扩大协调一致。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回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宏观经济表现，讨论其与长期困扰该地区的外部依赖及结构性问题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针对该地区宏观经济运行引致的社会趋势进行讨论，对上述内容作补充性论述。第四部分，着重分析危机的传播机制及其对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做出的响应。第五部分，对后危机情景假设做出分析，并讨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传统思想所反映的新旧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在长期存在的严重分化中，主要集中在社会领域（贫困、社会排斥及收入分配不公）、生产领域（投资、生产率及创新）、财政领域（财政支出与税收的水平和效率）以及环境领域（低碳生产和能源效率）。本文指出，进行低碳生产和提高能源效率，不仅是确保未来世代增长和福祉的前提，而且是正在逐步形成的国际“新常态”日趋强烈的要求。日前正在逐步形成的全球“新常态”以限制商品碳含量为主要特点，该限制因素将对后危机时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际贸易及其国际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

---

□ 本文作者对Mario Cimoli、Filipa Correia和Daniel Titelmann提供的帮助以及Osvaldo Kacef、Joseluis Samaniego和Luis Yáñez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 二、宏观经济表现的程序化事实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该地区呈现出缓慢和波动增长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为明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发达国家之间一直存在巨大差距。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6%降至20世纪80年代（即“失去的十年”）的2%和20世纪90年代的3%左右。“失去的十年”以低增长率和低投资率为主要特征，部分归因于为偿还20世纪70年代所欠债务而付出的巨大努力。沉重的债务加上极度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导致通货膨胀水平居高不下，并在一些国家演变为恶性通货膨胀，最终造成经济严重失衡，贫困与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在经济政策方面，由于将降低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造成对短期担忧因素高度关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2）。此外，到了20世纪80年代，该地区不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急速下滑，而且社会状况恶化，并且远远落后于日新月异的技术前沿。于是9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滑入低谷，不仅在生产率提升方面毫无进展，而且在传播技术创新成果或扩大产能方面均无建树。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方面出现利好迹象：布雷迪计划（1989年）积极推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重返国际金融市场，并为90年代成功实施更大胆的稳定计划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稳定计划着眼于采取包括贸易自由化在内的经济自由化措施。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0世纪90年代在宏观经济领域取得的重大进步不应被忽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地区经济体从整体上成功规避了新一轮过度通货膨胀风险及财务控制领域的严重损失。以上都是宏观经济政策管理的积极面，但一些副作用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短期外资流入领域尤其如此。

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但经济增长并未强劲上扬。此外，该地区在整体上亦未能保持稳定：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系列外部危机频现，并呈扩散之势，其中以1994年12月爆发

的墨西哥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初爆发的巴西危机以及2000~2001年阿根廷危机最为典型。一系列危机造成经济增长大幅下滑，波动性扩大。这段停滞期（从经济增长角度而言）之后出现连续5年的急速经济扩张期（2003~2008年），归因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全球经济的有力推动。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遵循顺周期性政策，此类政策对增长周期的上升与下滑具有放大效应（Ffrench-Davis, 2005）。由于政策被动追踪资本供给的多寡，从而在过度借贷及货币升值后，面临急剧收缩及大幅贬值（Stiglitz等，2006）。由于需要努力适应相对价格、需求和产出水平的频繁波动，上述所有因素对经济增长、稳定及技术能力和生产力的发展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由于过分强调平衡预算和运用控制通胀控制工具（特别是利率）却未同时考虑汇率（和竞争力）的影响，拉丁美洲经济体的进口额激增，投入产出矩阵密度降低。这些生产结构方面的不足，意味着出口对经济领域的其他方面难以产生溢出效应。此外，有利的外部环境趋于终结时抵御能力有所减弱，亦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Ocampo, 2005）。

从2002年到本次危机爆发之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相当。2003~2007年经济繁荣时期，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连续5年保持在3%以上。此外，该地区经常账户余额和财政盈余增加，国际储备空前增长（参见图1）。同时，失业率大幅下降（从11%降至7.4%），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从44%降至34%）。强劲的经济增长与理想的外部均衡状况，共同构成了该地区近年来前所未有的利好格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能够取得如此卓越成果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世界经济的增长。2003~2008年间，

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3.6%（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0）。世界经济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总额增长138%），并稳步提升了该地区的贸易条件，增幅达25%。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期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1%）是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Rosales, 2009）。同时，亚洲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新角色具有不可忽视的双重性。亚洲国家在某些制造领域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构成了强大的竞争性挑战，但同时也推动国际市场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宗商品出口需求的增长。这种双重效应意味着，亚洲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各国的国际专业化程度。一方面，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大宗商品出口国极大地受益于亚洲市场需求以及贸易条件的逐步改善。

在集中了大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南美洲，同期贸易条件上升33%。另一方面，墨西哥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国以及自然资源较为匮乏的国家（诸如中美洲和加勒比众多经济体）长期以来却饱受中国竞争之苦，目前所受约束更大。此外，巴西等中低端技术商品出口国的处境则介于两者之间。但是有迹象表明，随着中国出口逐渐向技术密集型商品倾斜，此类国家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b和2009f）。

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是，2002~2008年间，通过对有利的外部冲击进行审慎管理以及制定积极的宏观政策，该地区国家不仅改善了财政状况，积累了足以应对意外事件的外部资产，还将失业率和通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并且巩固了国内金融体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8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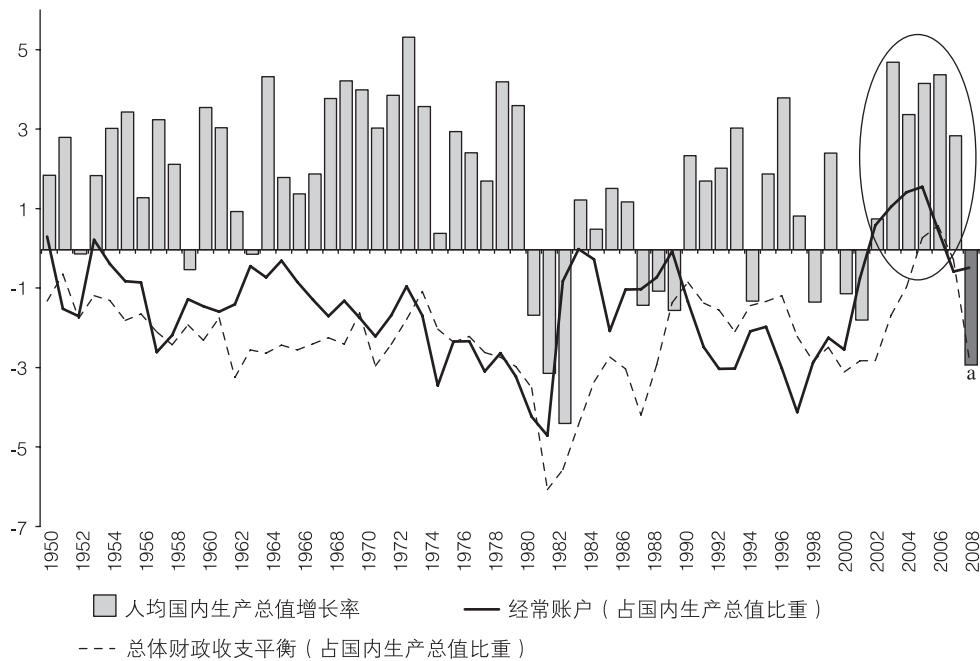


图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经常账户及总体财政收支平衡  
(年增长率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注：<sup>a</sup> 2009年预测结果。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官方数据。

### 三、社会趋势和变化

增长和稳定周期在社会学领域有与之相对应的要素，其影响在长期存在严重不平等现象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尤为重要。如图2所示，根据历年来该地区贫困率得到的抛物线与该地区经济增长阶段基本重合。从图中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该地区贫困率呈上升趋势，此后一路走低，从1990年的48%降至2008年的33%。

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间，受经济增长不足和财政紧缩的影响，社会支出低迷不振，贫困率持续攀升。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经济增长升温、就业率回弹以及社会政策的完善，贫困率上升走势开始逆转并逐渐呈下降趋势。近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扭转了“失去的十年”以来一边倒的低迷被动局面。自2002年以来，得益于经济的稳步增长以及社会政策的大规模实施，贫困率降至过去30年来的最低水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d）。

2008年，连续6年的贫困率和不平等稳步下降的状况戛然而止。但必须说明的是，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地区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其发展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相比1980年，2008年该地区新增4400万贫困人口，其中包括900万赤贫（极度贫困）人口。截

至2008年年底，拉丁美洲仍有1.8亿贫困人口，其数量之巨令我们深感亟需尽快完善旨在解决该部分人口问题的相关政策。

通过对整整6年的贫困率（包括可获得数据国家的2008年水平）进行评估后发现，该地区在消除贫困方面实现积极成果。如图3所示，该地区所有国家的贫困率首次低于2002年前后的水平。贫困率年度降幅最大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秘鲁、尼加拉瓜、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洪都拉斯及巴西。贫困率年度降幅较小的国家则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巴拉圭及乌拉圭。

除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乌拉圭之外，其他国家的赤贫率普遍下降。虽然赤贫率下降幅度通常比贫困率低个百分点，但如果比较其绝对变化量，情况则完全相反：尽管与前一年相比食品价格上涨，但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却普遍改善，特别是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人群。

就不平等问题而言，2002~2008年间，多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大幅降低，特别是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18%）、阿根廷（-10%）、秘鲁（-9%）、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尼加拉瓜、巴拿马及巴拉圭（均为-8%）。同期仅有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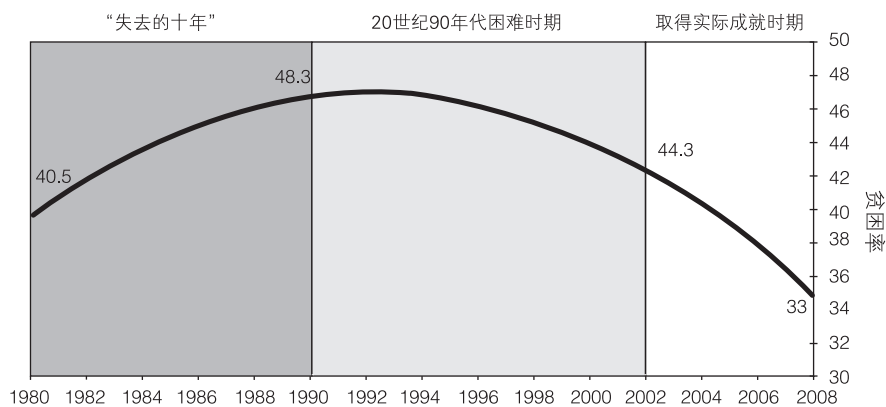


图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980~2008年贫困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官方数据。

地马拉三个国家的收入集中度提高。应当指出的是，哥伦比亚的数据始于2005年，危地马拉的数据始于2006年，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数据没有完全覆盖2002~2008年（参见图4）。

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以及日益增长的家庭平均收入，为降低不平等指数做出了显著贡献，具体表现为基尼系数从0.55降至0.52。这一不平等指数降幅并不算小（虽然不平等指数距可接受水平仍相去甚远），而且巴西、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秘鲁及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等国家的不平等指数降幅极为明显。但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基尼系数在十年时间内的合理变化范围应维持在5%~10%之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6年时间内基尼系数的平均降幅为3%，某些国家更是超过5%。在这个不平等一向是棘手难题的地区，这些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d）。

总而言之，2008年第三季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结束了一轮经济扩张周期（2002~2008年）。在此期间，该地区的贫困和赤贫状况得以持续明显改善（贫困率从44%降至34%，赤贫率从19.4%降至12.9%），就业率稳步提高（从52%升至55%），并且许多国家的平等程度明显上升（基尼系数从0.55降至0.52）。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差异，但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取得了进步。考虑到此段经济发展期之前，拉丁美洲的经济状况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极难逆转，在此情况下取得该进步特别值得强调。

尽管趋势向好，但过去6年中取得的成就并未改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仍是世界最不平等地区的事实。虽然该地区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其改善程度无法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媲美，而且该地区贫困人口和赤贫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居高不下。上述事实意味着，各国政府在未来数年内不可降低对仍严重困扰拉丁美洲发展之社会问题的警戒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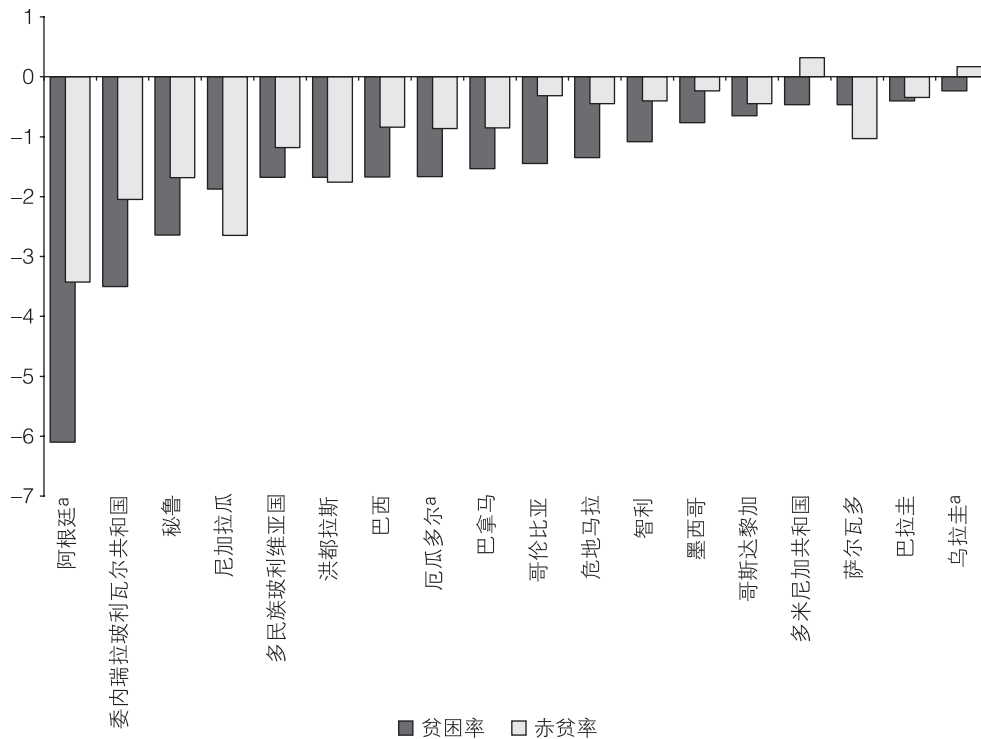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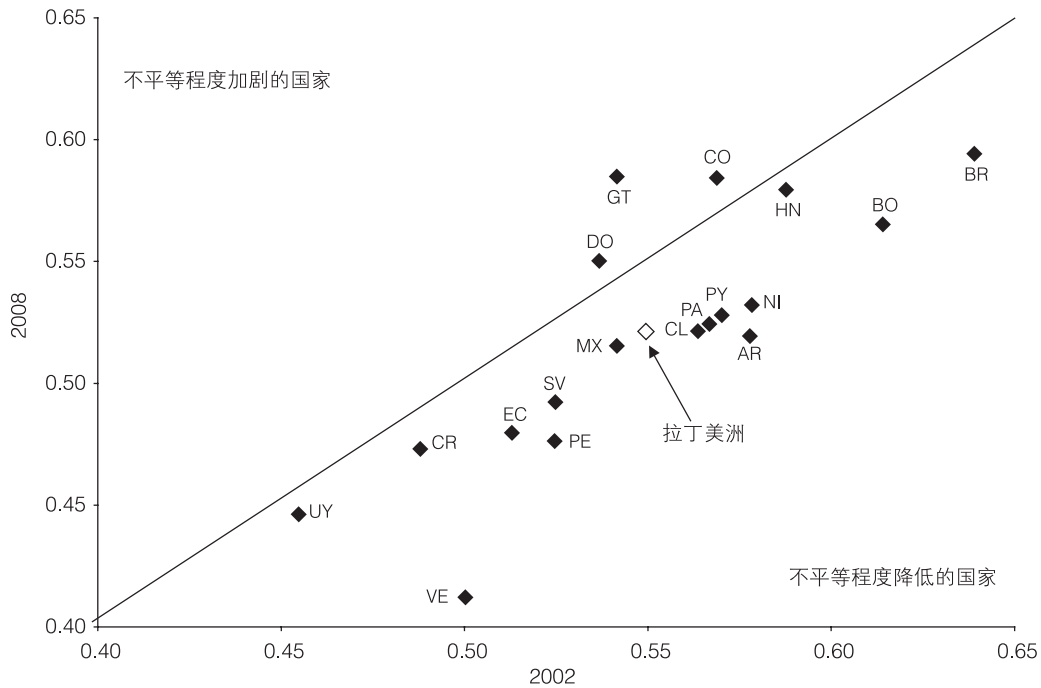


图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002~2008年贫困率和赤贫率年度变化情况  
(百分比)

注：<sup>a</sup> 城市地区。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相关国家家庭调查特殊列表。



BR: 巴西。BO: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HN: 洪都拉斯。NI: 尼加拉瓜。CO: 哥伦比亚。PY: 巴拉圭。AR: 阿根廷。PA: 巴拿马。GT: 危地马拉。CL: 智利。MX: 墨西哥。DO: 多米尼加共和国。SV: 萨尔瓦多。PE: 秘鲁。EC: 厄瓜多尔。CR: 哥斯达黎加。UY: 乌拉圭。VE: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图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8个国家）：2002~2008年前后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相关国家的家庭调查特殊列表。

## 四、当前危机的传导与响应机制

尽管从宏观经济面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应对当前经济危机打下了更好的基础：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具备起缓冲作用的国际储备，财务状况改善，失业率和通胀率维持在较低水平，金融体系较为健全，然而，本次大规模经济危机仍对该地区各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2009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降幅创下自1982~1983年外债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1.8%）。事实上，除2002年小幅回落以外，这是自1983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如图5所示，相比以往危机，本次危机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降幅更大，从4.8%降

至-1.8%，这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近7个百分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降幅为4个百分点，而在墨西哥“龙舌兰酒”危机中则为1.6个百分点（Pineda、Pérez-Caldentey及Titelman，2009）。

金融危机的影响往往与外部环境的急剧恶化联系在一起。在当前危机中，虽然外部融资已大幅缩减，但贸易仍是危机传导的重要途径。

如果不考虑外国直接投资（FDI），该地区6个主要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及秘鲁）的资金净流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8年第三

季度的1%降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1.5%。地区国际收支金融账户（含错误与遗漏）从2008年的644.13亿美元降至2009年的530亿美元左右。外部融资制约因素导致国内借贷收缩，国内借贷增长率从2008年1月的18%降至2009年9月的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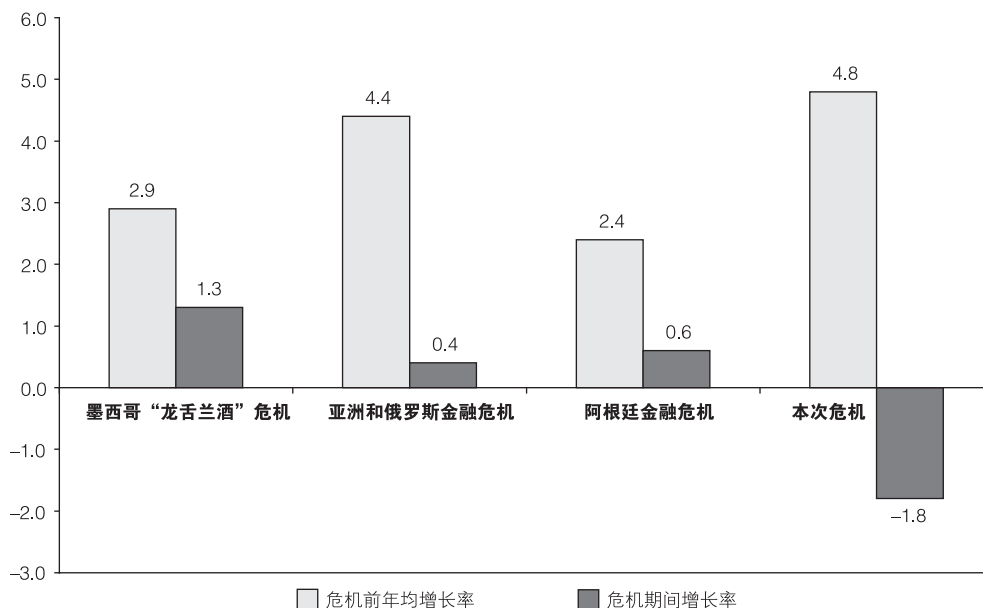
资金流量有所削减，但贸易渠道的地位愈加重要。在危机冲击下，贸易流量骤降，据估算，2009年出口额与进口额分别降低24%和25%（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b；2009g）。此外，外国直接投资额、汇款及大宗商品价格均出现下降（参见图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h；Orozco，2009）。

本次危机的重点在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不能忘记经济危机对就业/失业和贫困问题造成的最严重影响。危机给就业带来巨大冲击（参见图7和图8）：以城镇失业率为例，该数字从2007年第一季度的8.9%降至同年第四季度的7.2%，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失业率反弹至8.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某些国家在失业率不断上升同时就业质量亦呈恶化趋势。同时，新增贫困人口数量预计将升至900万。如图8所示，危机的社会成本实际大于900万新增赤贫人口的预估数值，因为如果一直保持前期的发展态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可能将再增500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a；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f）。

应当强调的是，从宏观经济规模的角度而言（如本文此前所述），由于保持经常账户和财政盈余（详见图1），该地区具有抗击本次危机的能力，而其社会地位亦达到近40年来的最高水平。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拉丁美洲经济体之外。此外，该地区采取了反周期财政与货币政策，因此缓解了危机对经济增长、经济活动、就业及贫困的影响（Kacef和Jiménez，2009）。

考虑到该地区经济体中低水平货币化比率对货币政



危机前年均增长率包括以下各次危机：

- 墨西哥龙舌兰风暴：1990～1993年
- 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1996～1997年
- 阿根廷金融危机：2000～2001年
- 本次危机：2003～2007年

图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次危机前和危机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危机前和危机期间的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官方数据。



策构成的制约因素以及诸多国家存在的财政和制度困难（项目缺乏，构建行业支出单位，公共支出的分配、开支及评价制度复杂），财政政策成为中短期内提振经济活动的重要措施。尽管受到上述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的公共支出仍实现增长，并在房地产等领域（归因于对就业和国内需求产生的溢出效应）实施了有针对性的行业政策，为中小企业（SME）提供援助（因为其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重要性），给予农业等经济行业有力支持，着重落实包括就业政策在内的社会计划（参见图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e；Sojo，2009）。

2009年下半年，该地区经济开始出现趋稳回暖迹象。工业生产与出口开始复苏。与此同时，不断上升的整体活动水平与国际贸易量引发了强劲的大宗商品价格需求，推动价格上涨，并改善了贸易条件。此外，股票市场回暖至危机前水平，该地区重获国

际信贷。

预计2010年经济增长率为4.1%。此外，考虑到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国内市场较大且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较高，南美经济增长率预计将高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a）。该预测还有赖于中国在多个国家贸易及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而经济更为开放的国家预计增长将放缓，因为这些国家的贸易伙伴多元化程度较低且更偏向制造业（如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加勒比国家的情况基本类似，一些加勒比国家陷入财政与汇率困境。总体而言，本次增长的关键要素是私人消费的回暖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部分程度上是受益于财政刺激方案，将于2010年完全显现效果。还需强调的是，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和矿物）已回升至2006年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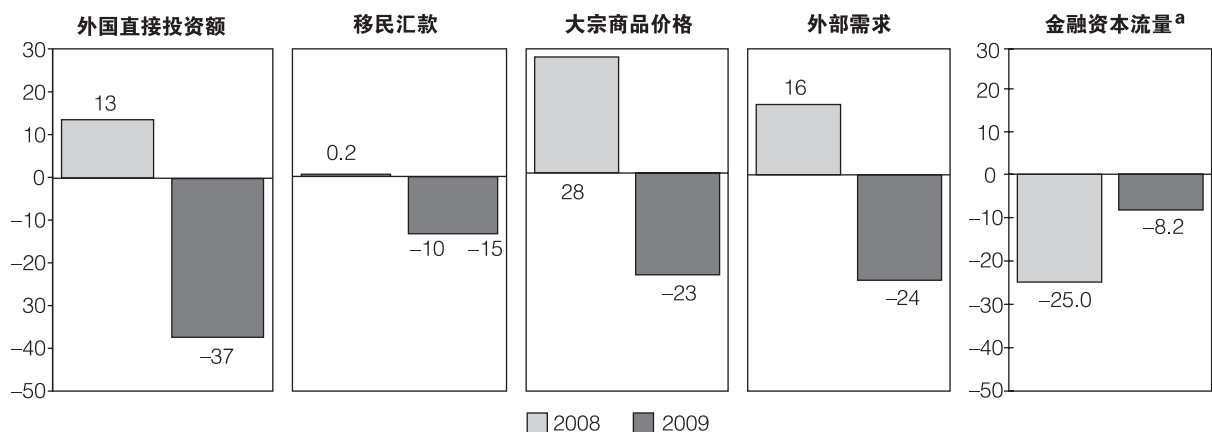


图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危机传导渠道  
(年度变化百分比)

注：2009年数据为估算值。

<sup>a</sup> 金融账户加错误与遗漏账户减去外商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官方数据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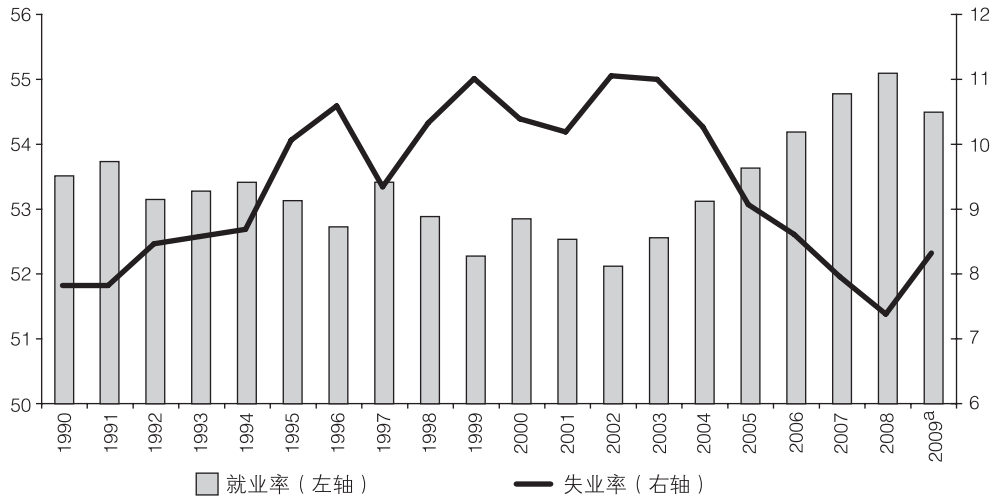


图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990~2009年城镇就业与失业率  
(百分比)

注：<sup>a</sup> 估算值。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官方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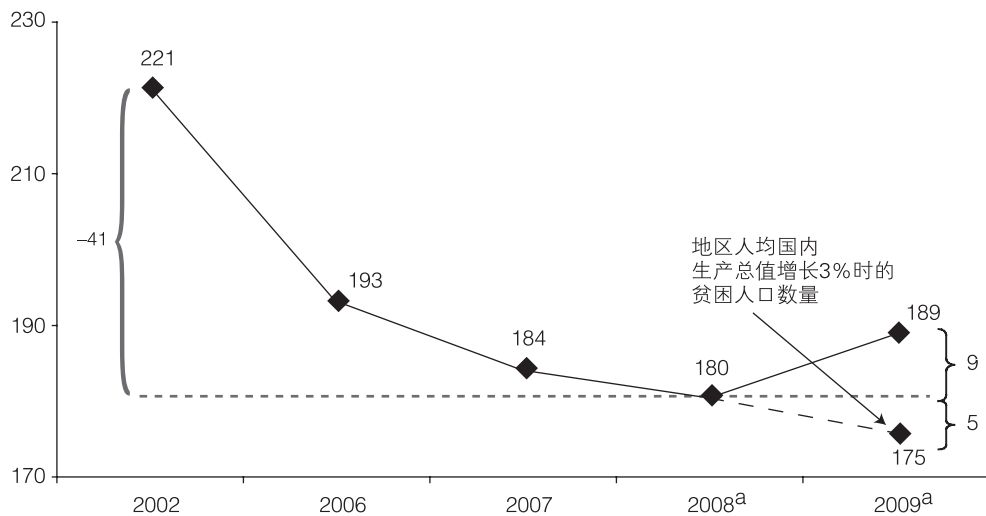


图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贫困趋势及对本次危机影响的估算  
(百万人口)

注：<sup>a</sup> 估算值。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官方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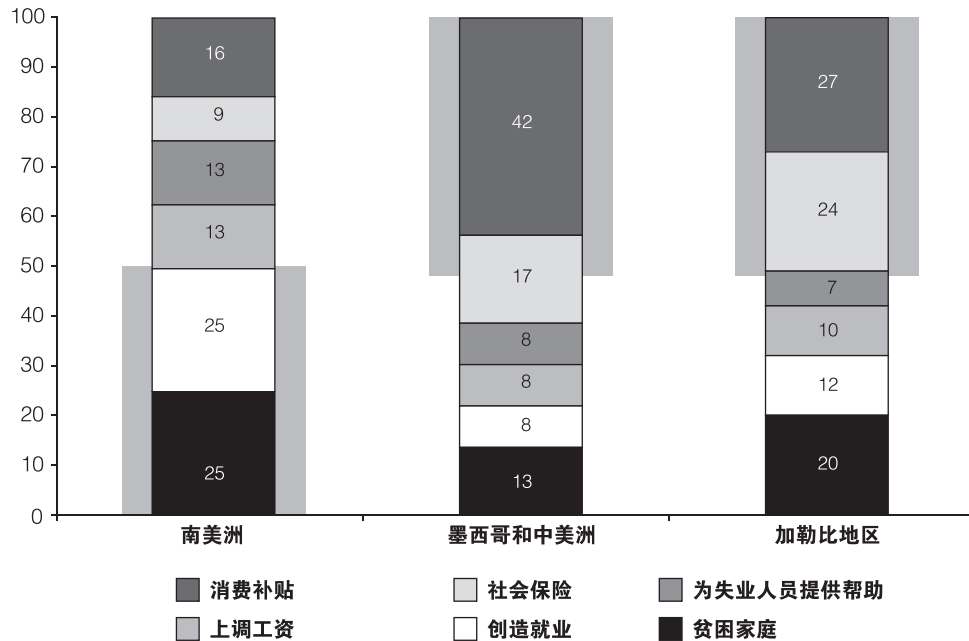


图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自危机爆发以来公布的社会计划之构成情况  
(百分比)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官方数据。

## 五、后危机时代情景假设与结构性制约因素

然而，人们逐渐认识到本次经济危机产生的后遗症将改变经济增长态势以及经济、金融及贸易关系结构，使其朝近期提出的全球经济“新常态”方向发展。这种新常态包括以下特征：全球经济增长放慢，新兴经济体作用提升，贸易增速减缓，贸易保护主义愈加盛行，外部信用评级降低（至少全球金融架构有待重新设计，为获得外部资本更为稳定的条件）以及向低碳经济转型。这些因素对于外部市场的准入条件以及培育生产和技术能力均有显著影响。

近期的经济危机重新定义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应对经济增长与平等难题的方式。虽然后危机时代世界形态尚不明朗，但是受发达国家总需求缩减的影响，世界经济很可能呈低速增长态势。事实上，受经济危机影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潜在增长率预计中期将下降约1个百分点（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2009）。在此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将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受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少的影响，新兴经济体面向发达国家市场的产品出售范围将减小，竞争也将更为激烈。同时还会激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至少是该地区较大的经济体）采取增长战略，重点关注国内市场。

刺激经济增长要求全球总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实现这一点并非易事。若要使全球经济增长率在中期恢复至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必须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总需求的重新平衡。然而，国际社会尚未就如何实现总需求平衡达成普遍共识或明确意见。举例来说，发达国家在全球消费中所占份额极大。以2004~2007年为例，仅美国一国即占34%的市场份额，经合组织国家共计84%。新兴经济体（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虽然具有扩大内需的空间，但会受到能力制约。

除此之外，还需在国内经济中实现公共和私有行业总需求的重新平衡。财政刺激措施不可能无限期持续，因为会导致公共债务的激增，因此需要用私人需求取代某些公共需求。

此外，“新常态”不仅牵涉到经济增速放缓，还将严重影响金融领域扩张。这意味着全球以及流向发展中地区的资金流量减少。受信贷紧缩的影响，跨境资金流动在经历了1990~2007年间的上升期（从1万亿美元升至10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亦相应从5%升至21%）后，于2008年骤降至3.1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麦肯锡，2009）。私有行业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在2007~2008年间亦从1.25万亿美元骤降一半，至6500亿美元，2009年预期为3500亿美元，2010年预期为6700亿美元（国际金融协会，2009）。

这一趋势还会因受国内偏好、金融保护主义愈加盛行以及当前金融监管制度变化的影响而进一步恶化。因此，预期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将放缓，跨境资金流动（金融保护主义）亦可能会维持在更低水平。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将导致监管和调控更加严格，以此弥补危机爆发前的诸多漏洞。金融监管将更加深入，涵盖不同的市

场工具和参与者。这一趋势将会导致模式转变，从而形成透明度更高、风险和杠杆更低的银行体系。

最后，新常态还将推动贸易模式的改变。全球贸易增长预计将放缓。预计2009年世界贸易量将下降约10个百分点，到2010年则会回升1个百分点（世界贸易组织，200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上述下降趋势预计将出现在发达国家，继而造成中国贸易萎缩。

上述推测基于以下预期：发达国家进口需求长期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盛行，信贷和支付体系复苏缓慢，以及全球生产链断裂。

### 1. 投资与生产力差距

在认识到宏观经济政策以短期调控为主的同时，有必要了解生产结构或其投资、生产力动态等基本面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Ocampo, 2005）。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投资的意愿以及随之对生产力产生的促进作用将受到投机资金流动的影响，当资金流断裂时，当地爆发危机的风险将上升。从长期来看，产量增长波动和净资本流入量不稳定导致无法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和累计资本恶化。资金流动的不稳定性（归咎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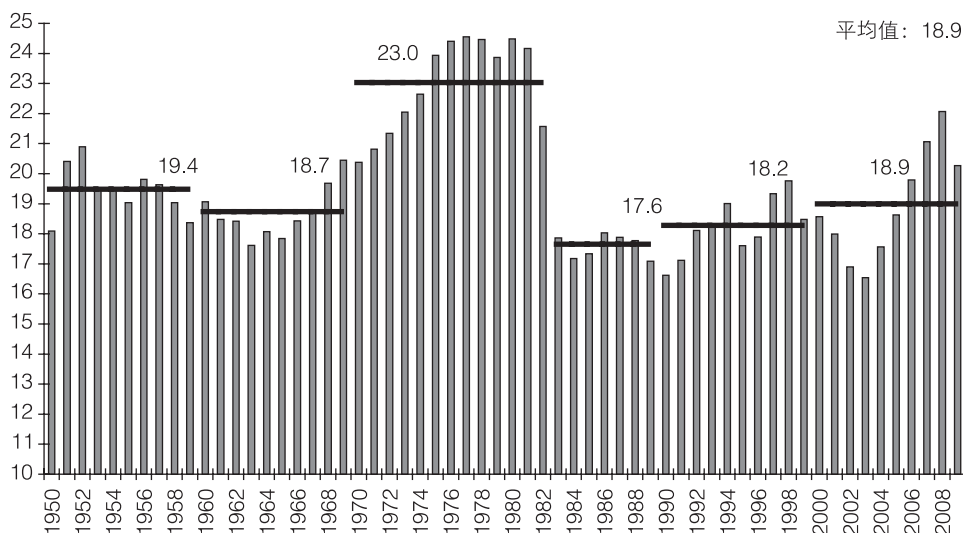


图1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投资率，1950~2008年

（基于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官方数据。

经济增长的波动)和国内储蓄增长停滞,对促进投资和扩大产能等活动构成了严重制约。

随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经济体走出衰退,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再次低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为实现快速复苏带来契机。然而,如果该地区的投资规模与产能不随之提高,生产边界的拓展空间以及潜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将受限。在此背景下,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投资缺口在本地区发展模式仍起到决定性作用(参见图10)。

当前,各界对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和生产边界的因素各执一词。尽管各方意见不一,但正在就一点逐渐达成共识,即若要促进增长,必须具备创新能力,并且迅速将国际技术领域的最佳实践应用于本国的生产结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在成立初期即提出该观点(Prebisch, 1949),其近期的文件也对此着重强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2007)。委员会认为,技术学习与生产结构,以及教育、科学及技术活动等制度框架密切相关。

目前普遍认可的观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在生产结构中的比重越大,其学习先进技术的速度将提升,创新步伐将加快,国内外对该国商品的需求也将扩大。需求扩大的原因有二。首先,各国对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强劲;其次,技术能力对国家立足日新月异的国际市场至关重要。国家若缺失技术能力,其出口势头必将受挫,增长速度将放缓,由此将陷入发展与紧缩循环往复的周期之中,受外部危机和大宗商品牛市或外源融资可得性的摆布,这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并不少见。

实证文献表明,生产结构与普及应用技术革新的成果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2007)。后危机时期,由于初始产量极低,各国必将迈上经济复苏之路。但能否实现强劲持久的经济增长(表现为投资和潜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尚待考验。尽管近来本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整体而言,经济与行业发展并未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这点从贸易差额便可见一斑。若将本地区各国生产力水平与美国直接比较,则可得相似结论。本地区生产力与发达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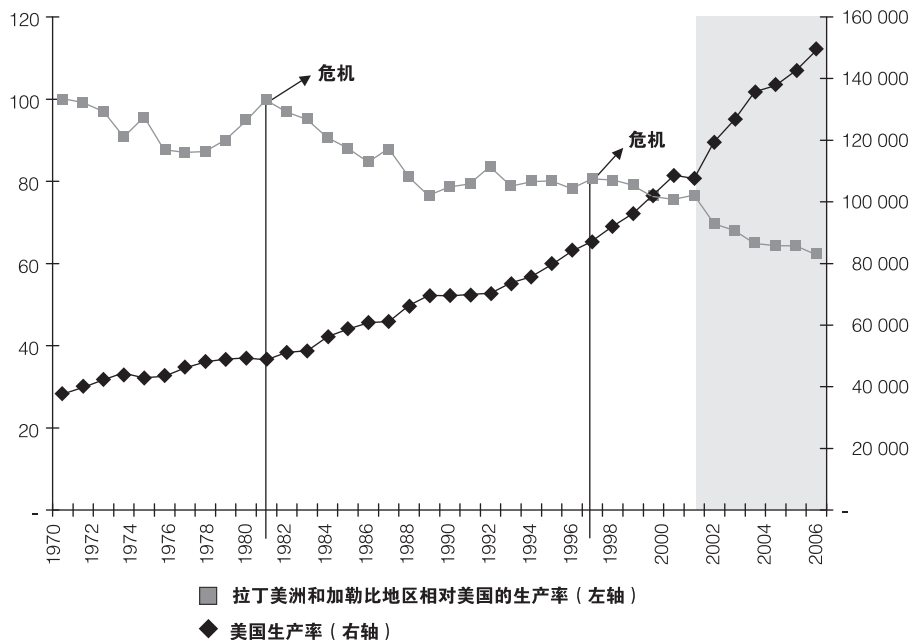


图1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相对美国的生产率以及美国经济的生产率，1970~2006年  
(百分比与指数值)

注: 工业领域生产率。

资料来源: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基于官方数据。

差距巨大，未来几年将面临众多挑战。

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工业领域的相对劳动生产力指数，在本文考虑的时期内，本地区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未见缩小（参见图11）。20世纪80年代，生产力差距扩大，90年代趋于缓和。然而，自90年代中期起，相对劳动生产力指数再次下降（意味着生产力差距拉大）。需要指出的是，从2000~2006年，该下降态势尤为明显。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2003~2007年，本地区各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2%，为过去36年来（80年代“失去的十年”除外）的最差表现。其二，美国的生产率连续20年保持3%左右的增长率，并于90年代中期达到5%。

必须强调的是，短期与长期阶段的相互影响以及不同经济政策，会对生产率变化趋势产生一定影响。一旦经济遭受冲击（价格或实际汇率），整个调整期的生产率将下降（Cimoli和Porcile，2008）。

换言之，每次经济冲击均会产生结构性影响，随后对生产过程的变革与调整代价是高昂的，而且恢复冲击前的竞争力也需要时间。企业能否稳立国际市场的关键在于其对冲击的响应速度和变革方向。有鉴于此，经济生产率将不可避免走弱，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生产率上升疲软并不意味着经济反弹时期延长。

适应期的长短由多种因素而定，其中包括企业资产特征、企业与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企业管理战略以及人力资本的总体特征等。换言之，企业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适应期的时长和方向。调整成功的企业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以及产品组合的多元化水平，而调整失败的企业则被淘汰出局。

就劳动生产率而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图11显示了不同危机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生产率造成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时期，相对生产率大幅下降，90年代初略有复苏，90年代中期后再次下降（“龙舌兰酒”危机）。其底层因素是货币升值、贸易自由化、外债增多以及前文提及的新一轮货币贬值的交替出现。

Fajnzylber指出，缩小生产率差距是保持国际竞争力、实现平等的必经之路（1990）。然而，当前出现一个新的经济转型变量——环境可持续性。该变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下文将就此展开探讨。

## 2. 可持续的结构改革和环境

建立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仅靠保持宏观经济均衡远远不够。自倡导在保持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实现生产转型以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一直强调结构改革对于缩小本地区与多数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趋同）不可或缺。目前，清晰的迹象表明，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增长模式与环境保护并不兼容。环境破坏带来的代价越来越明显，一系列的气候问题给人类、实物和自然资本带来破坏性后果。从环境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找到新的增长渠道以努力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并将生产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

在不加剧环境问题的前提下缩小生产率差距，可称之为一种可持续趋同。事实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单位产值能耗低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本地区生产率较低，能源消耗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不可持续趋同），就技术或能源而言，其结构改革方向出现偏差。此类增长模式往往大量使用自然资源，在技术变革进展较慢的成熟行业尤为如此。此外，大量使用自然资源将增加能源消耗量。根据前文数据可看出，相对能源前沿，本地区单位产值能耗增长较快，但生产率的增长却并不匹配。图12描绘了本地区的现状，线条呈“剪刀状”打开，显示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美国不断拉大的生产率和能源差距。

加勒比海地区仍属化石燃料排放增长最高的地区，尤其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牙买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但部分国家如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在植树造林方面取得显著进步。

预计拉丁美洲将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由于海水温度不断上升，未来30~50年内珊瑚白化率将达75%（Samaniego，2009）；海水热膨胀造成土壤流失或侵蚀；洪灾和飓风等极端自然灾害的强度不断上升。由于本地区经济多元化程度有限且严重依赖第一产业和旅游业，未来可能遭遇严重经济动荡。

在新的国际背景下，气候变化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带来巨大挑战，提高能源效率、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刻不容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预计，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措施缓和气候变化，本世纪末本地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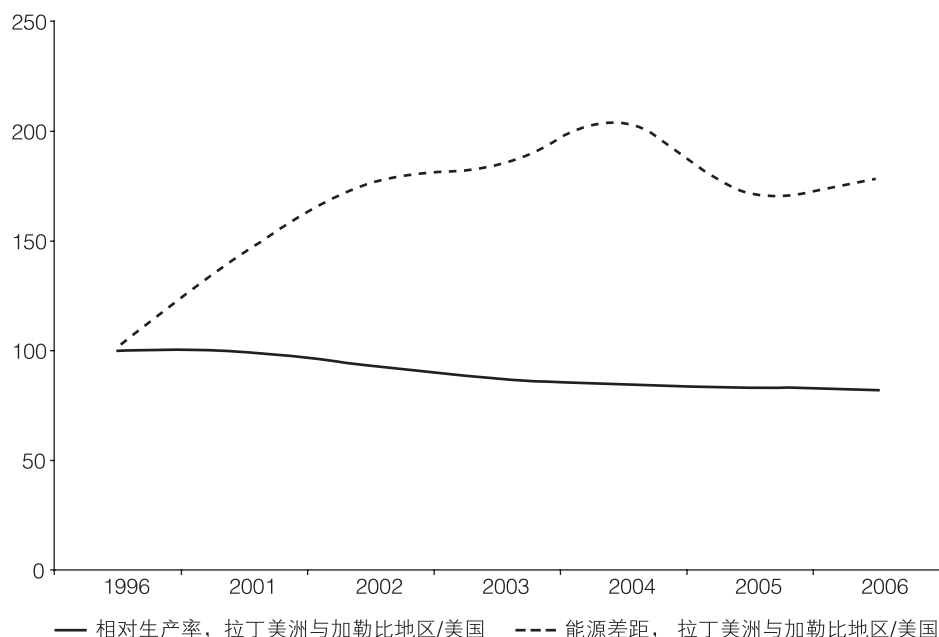


图1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四国）：能源差距和相对生产率<sup>a, b</sup>, 1996~2006年  
(指数值)

注：<sup>a</sup> 四国分别为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及墨西哥。

<sup>b</sup> 能源差距表示为本地区各国与美国的能源强度指数之比。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行业绩效分析计划（PADI）和以下国家的行业调查数据：智利国家统计局（INE），哥伦比亚国家统计局（DANE），墨西哥国家统计、地理及信息局（INEGI），巴西国家地理及统计局（IBGE）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BEA）。

农业和生物多样性将遭遇极大损失，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压力，极端天气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c）。除非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局面，否则未来几十年内，该地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已成科学定论，目前亟需改变生产与消费模式，尤其是能源问题。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几乎无果而终（而且不具法律约束力），与会各国同意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但未制定2020年和2050年的排放目标。此外，大会还同意向贫困国家提供资源，阻止森林砍伐。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迫切性再次提上日程。还有两种方式有待国际社会尝试。其一，在多边谈判框架下，基于共同价值商讨发展路径，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制定时间表以及相应工作与标准。其二，在遵守竞争规律以及不区分各国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实施单边行动。

建立气候与经济“新常态”的措施包括实施根据出口至发达国家商品的碳含量制定的单边贸易法规。这一措施很可能会将减排压力转嫁给发展中国家。除此之外，发达国家还通过有条件获得信贷等经济渠道转移减排压力。目前，发达国家正在考虑从2020年起对碳密集型商品征收反补贴关税。发展中国家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在面对更有实力的竞争者时避免丧失出口市场。

总而言之，可持续性问题以及世界各国正在探索制定的新法规已成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领域新的制约因素。但如果以此为新契机，以开发高效交通运输方式、落实新的减排生产方法为目标开展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工作，完善生产和工艺流程，未来将呈现良好的发展前景。各国应以低污染技术为基础，推出投资激励措施（目前措施数量有限），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当前创新能力普遍较弱），以此促进投资，提升创新能力。有鉴于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必须快速获得并应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沿技术。



### 3. 分配与平等差距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平等现象较为严重。如前文所述，若就业率和生产率均保持低水平，改善不平等现状、降低贫困率可谓毫无希望。仅靠经济增长无法确保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但若同时执行基于民众权益的连贯社会政策（Hopenhayn, 2001），则经济增长将对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生产率提高还可（在一定条件下）带动产量、收入以及就业率同步上升，有助于减少生产体系内的异质性和缩小生产率的差距（Infante和Sunkel, 2009）。

社会指标反映出的良好发展态势不仅归功于经济增长，同时还得益于制度完善以及旨在消除贫困、促进包容性发展以及减少不平等现象的公共政策。从过去20多年的人均水平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社会支出均稳步增长。同期，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对减少贫困起到了帮助作用，不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贫困率和赤贫率的变化由两部分组成：平均收入增长（也称“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方式变化（也称“分配效应”）。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增长效应”是1990~2008年间贫困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其贡献率约为85%，“不平等效应”的贡献率为15%。收入分配改善对减少贫困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2002~2008年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d）。

1990~2008年，劳动收入的提高对减少贫困的贡献率最高。人均劳动收入增长主要归功于本地区各国（乌拉圭除外）人口依赖率（通常称“人口红利”）的下降，以及经济活动率的上升。同样地，各国劳动力人均收入存在显著差异。贫困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城市地区）以及巴拿马（城市地区）等国（按百分比变化水平计）的国内贫困家庭劳动力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也最大。哥伦比亚例外，因为哥伦比亚的劳动力人均收入增幅较大，但部分由于失业率上升，该国贫困率下降速度缓慢。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劳动力人均收入趋于下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一个令人堪忧的贫困状况变化趋势是不同年龄、性别及种族人口的贫困脆弱性差异极大。儿童的贫困风险最高。15岁以下儿童的贫困率是其他人群的1.7倍。1990~2008年，本地区多数国家的

儿童与成人贫困率之比上升，其中巴西、巴拿马及乌拉圭的上升幅度最大。

尽管各国已实施多项积极政策，但危机仍扭转了此前5年内形成的失业率和贫困率双降的大好形势。公共社会支出和产业政策支出对于巩固既有成果以及减少不平等现象至关重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的危机对其公共支出构成严重压力。填补不断扩大的财政缺口的政策选择（下文将详细叙述）包括增加税收和收紧公共支出。各国采纳第二种政策恢复财政账户平衡，但却给社会支出领域带来众多负面影响，社会福利不断减少。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拉丁美洲各国公共社会支出呈现增长趋势，展现了各国将公共资源用于社会政策的决心，提供了更有力的资金保障、更稳定的制度及合法性，尽管各国发展的水平严重限制了这些措施的效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6）。此次面对新旧社会经济风险时，各国政府的税收能力将直接影响其能否汇集足够的公共资源用于社保体系。事实上，本地区民众税务负担较轻，税负是影响财政预算规模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政府仍努力增加财政预算总额（财政纪律相较以往更加严苛），重点增加了用于履行其社会职能的预算。政府方面虽已采取多项措施，但本地区社会支出缺口尚在，而且目前的支出水平远不能满足改善福祉、减少不平等现象的需求。社会支出呈顺周期性特征，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其总量必将缩水。以上分析显示出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预算制约与限制因素，这些国家在经济紧缩时期采取反周期措施的能力最弱。

### 4. 财政缺口与公共政策融资

未来，政策制定过程中应重点考虑财政缺口，因为该因素同时影响短期（如通货膨胀和经济活动水平）与长期（为社会和生产政策融资的能力）的重要经济变量。实施公共政策要求融资机制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开展学习与创新活动以及实现平等的目标并行不悖。

2002~2008年，完善的财政政策管理工作（Martner, 2007）以及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宏观经济环



境改善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与管理水平，降低了公共与外部账户的脆弱性，从而减小了债务规模，增加了外汇储备。2006年和2007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首次出现财政盈余（参见图1）。

随着2008年末金融危机不断演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不但需要稳定经济局势、巩固增长、减少不平等现象，同时还需制定反周期政策，采取多种手段保护最脆弱群体免受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以及经济活动水平降低，政府财政收入不断紧缩，难以满足增加财政开支的需求，而此前几年获得的政策较大回旋余地将大幅缩水（2008年和2009年的财政赤字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和-2.8%）。

然而，财政缺口不仅出现在困难时期，其实际上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的结构性问题，与不平等现象密切相关。

少数人掌握社会大量财富，而多数家庭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碎片化社会面临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扮演的角色。本地区税收水平较低、税率递减制度以及公共支出分配失当这三大特征，限制了政府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应当发挥的作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的税收水平较低（各国存有较大差异）。税收平均约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18%，相较本地区发展程度而言属偏低水平，尤其是相较于公共政策所隐含的融资需求。这意味着公共领域的可利用资源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多数人口对商品与服务的需求。在中美洲某些国家，税收甚至仅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10%左右，由于社会贫困水平极高，需求缺口巨大，情况更为严峻。

此外，本地区实行累退税制，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直接税收占总税收的比例不到1/3，大部分税收来自消费税以及其他具有明显累退效应的非直接税收方式。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远甚于初次分配。因此，有必要增加直接税收比重，使其与非直接税收达到平衡状态。若希望通过改革税收体系将资源重新分配给最贫困人口，必须重新制定收入税与财产税制度。财产税应占总税收更大比重，且以累进方式征收。与此同时，必须加大对偷税漏税的打击力度。偷税漏税是造成不平等现象的主要根源，会侵蚀税收体系并削弱其征税能力。因此，不但需要提高税收水平，还要尽可能改进当前偏向累退方式的税收体系。

同时，财政支出的规模与质量均需接受评估，以确定其是否合理。面对当前危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提高或保持当前社会的支出水平，同时也必须评估其是否具有再分配潜力以及能否为最脆弱人群提供基本保障。

总之，公共支出的规模与质量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纳税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加剧了拉丁美洲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该问题亟待解决。有鉴于此，该地区必须出台一套全新的财政契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98），规定政策的优先主次，并为其具体实施提供必要融资，同时通过实施民主制度增加公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

## 六、总结与反思

2008年危机及其近期呈现的复苏迹象，不仅在短期内缓解危机效应方面，而且在主要增长模式的长期脆弱性方面，都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上了重要一课。长期以来，不平等现象、生产力以及投资差距和财政缺口一直导致本地区难以在兼顾平等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如今，加上日益严重的环境与气候问题，发展形势更加不容乐观。新旧问题相互叠加，清晰反映出本地区各国政府一直以来采取的应对政策在促进发展方面尚不够充分。

此外，后危机情景假设与以往有所不同。本地区2009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率可能已恢复至危机前水平，预计2010年经济增长率将升至4.1%，但其将面对截然不同的大环境。在2010年，被称为全球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因素将日益凸现，包括：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新兴经济体扮演全新角色；贸易流量增速减慢；金融保护主义愈演愈烈；重新构建全球金融架构；发展低碳经济。新形势下，过去的应对政策（过度保护主义与欠考虑的自由化）已然不合时宜，制定新对策迫在眉睫。

本文认为，结构主义能够对我们理解危机和后危机形势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强调政策制定的重要性，用以改革生产结构并普及应用技术进步成果，使其成为促进公平和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就气候领域面临的挑战而言，以上建议更显重要。应对气候领域的挑战必须改革生产与消费方式以及能源生产与利用方式，这些方式正在使碳足迹成为影响各国竞争力的主要变量。制定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和减排政策必须进行长期规划。此外，环境经济学的新常态将包括碳排放限额与鼓励措施、旨在促进减排的惩罚或税收措施、可交易排放许可证以及基于出口商品碳含量的贸易法规（“碳足迹”）。

仅靠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无法完成结构转型的复杂任务。此外，市场将产生新的社会政治压力与矛盾，仅靠经济手段无法解决。因此，人们期待政治要素在构建未来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意味着，第一，要在“长远”框架内思考，通过民权与公民权的方式实现平等，最终完成建设福利社会的目标。必须从长远角度解决当前危机带来的短期问题。为此，必须进行能力建设，制定并实施长期可行的公共政策。构建未来不但需要集思广益，引导并制定长远战略愿景，而且归根结底达成奠定可靠发展道路的全面的政治与社会契约，并且使各国实现民主治理。政府应通过民主制度建立关键的长远战略愿景。以上举措是发展理念的内在要素。

第二，由于政治具有集权特性，各方迫切需要思考政府应取舍哪些职能以帮助实现公民对发展的期许。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市场能够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提供公共服务。如今，人们逐渐意识到现实并非如此。政府主导并发起政治行动，必须对其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以此确保为公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创建并重塑公

共、民间、团体及社区制度，以此在政府、市场及公民三者之间形成新的平衡。为此，应继续完善公共部门行政管理的组织和评估体系，确保其可靠性与透明度。让全体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改变过去由政府或国家一言堂的局面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发展，全面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义务以及参与决定国家政策的优先主次。

第三，当前的重点是制定一套稳健的“财政契约”，推动税收体系朝向累进结构发展，同时确保政策性融资切实可行。就当前公共支出与融资的水平、构成及方向而言，若要实现提出的各项目标并给予政策更大发挥空间，必须达成一系列显性或隐性的政治契约。

综上所述，上述各点均为达到设计“新的国家架构”的目的，让国家在普遍福利领域再次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在拉丁美洲各国的发展战略中起到领导作用，以此摆脱政府“附属于”市场的模式。建议在对政府以往表现进行批判性评估的基础上重新定义其角色，为政府提供足够的行政工具，以此确保其在市场与公民权利的均衡之间找到恰当位置——不仅要考虑当下，还需顾及后世子孙，他们未来面临的环境平衡形势将愈加严峻。

总之，各国情况不一，不能生搬硬套同一模式。各国均需权衡适合本国的平衡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为国家需要扮演更重要、更明确的角色，以此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推行合理的财政改革，倡导创新，推动必要的经济趋同，并且在能够带来明显再分配效应的财政契约方面达成共识。只有在福利国家而非附属国家的框架下，才有可能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领域的新情况和新规律的背景下重设发展目标。

#### 参考文献

Cimoli, Mario and Gabriel Porcile (2008), “Volatility and Crisis in Catching-up Economies: Industrial Path-Through under the Stickiness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the ‘Red Queen Effect’”, document presented at the Mount Holyoke College Development Economics Conference (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 November 2008).

DESA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2010),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1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cember.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9a),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9* (LC/G.2424-P),

-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9.II.G.149.
- \_\_\_\_\_(2009b), *El comercio internacional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n 2009: crisis y recuperación* (LC/L.3184-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2009c),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ummary 2009* (LC/G.2425), Santiago, Chile, November.
- \_\_\_\_\_(2009d),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09* (LC/G.2423-P), Santiago, Chile, November.
- \_\_\_\_\_(2009e), *The Reactions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Americas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An Overview of Policy Measures up to 30 September 2009* (LC/L.3025/Rev.5), Santiago, Chile, October.
- \_\_\_\_\_(2009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World Economy 2008-2009. Crisis and Opportunitie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LC/G.2413-P), Santiago, Chile, Augus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9.II.G.62.
- \_\_\_\_\_(2009g),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8-2009* (LC/G.2410-P), Santiago, Chile, Jul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9.II.G.2.
- \_\_\_\_\_(2009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8* (LC/G.2406-P), Santiago, Chile, Ma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9.II.G.24.
- \_\_\_\_\_(2008a),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20 Years Later: Old Problems, New Opportunities* (LC/G.2367(SES.32/3)), Santiago, Chile, May.
- \_\_\_\_\_(2008b),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7-2008* (LC/G.2386-P), Santiago, Chile, August.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8.II.G.2.
- \_\_\_\_\_(2007), *Progreso técnico y cambio estructural en América Latina* (LC/W.136), Santiago, Chile, October.
- \_\_\_\_\_(2006), *Shaping the Future of Social Protection: Access, Financing and Solidarity* (LC/G.2294(SES.31/3)), Santiago, Chile, March.
- \_\_\_\_\_(2002),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LC/G.2157(SES.29/3)), Santiago, Chile, May.
- \_\_\_\_\_(1998), *The Fiscal Covenant: Strengths, Weaknesses, Challenges* (LC/G.1997/Rev.1-P), Santiago, Chile, Ma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8.II.G.5.
- Fajnzylber, Fernando (1990),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from the 'black box' to the 'empty box'", *Cuadernos de la CEPAL series, No. 60* (LC/G.1534/Rev.1-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89.II.G.5.
- Ffrench-Davis, Ricardo (2005), *Reforming Latin America's Economies: After Market Fundament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openhayn, Martín (2001), "Old and new forms of citizenship", *CEPAL Review*, No. 73 (LC/G.2130-P), Santiago, Chile, April.
- II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9),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 Washington, D.C., October.
-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9),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9*, Washington, D.C., October.
- Infante B., Ricardo and Osvaldo Sunkel (2009), "Chile: towards an inclusive development", *CEPAL Review*, No. 97 (LC/G.2400-P), Santiago, Chile, April.
- Kacef, Osvaldo and Juan Pablo Jiménez (eds.) (2009),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imes of Crisis: Options and Perspectives* (LC/W.275), Santiago, Chile, August.
- Martner, Ricardo (2007), "La política fiscal en tiempos de bonanza", *Gestión pública series*, No. 66 (LC/L.2736-P), Santiago, Chil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Planning (ILPES), Ma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S.07.II.G.74.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09), *Global Capital Markets: Entering a New Era*, McKinsey&Company, New York, September.
- Ocampo, José António (ed.) (2005), *Beyond Reforms: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 Washington, D.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World Bank.
-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 *OECD Economic Outlook*, No. 86, Paris, November.
- Orozco, Manuel (2009), *Understanding the Continuing Effe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Remittances to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August.
- Pineda, Ramón, Esteban Pérez-Caldentey and Daniel Titelman (2009),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old wine in new goatskins or is this time different for Latin America?",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March, unpublished.
- Prebisch, Raúl (1950),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E/CN.12/8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Rosales, Osvaldo (2009),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de environment", *CEPAL Review*, No. 97 (LC/G.2400-P), Santiago, Chile, October.
- Samaniego, Joseluis (coord.) (2009), *Cambio climático y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una reseña* (LC/W.232), Santiago, Chile, November.
- Sojo, Ana (ed.) (2009), "Hacia la universalidad, con solidaridad y eficiencia: el financiamiento de la protección social en países pobres y desiguales", *Seminarios y conferencias series*, No. 55 (LC/L.3034-P),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Ma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S.09.II.G.39.
- Stiglitz, Joseph and others (2006), *Stability with Growth: Macroeconomics, 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9), *World Trade Report 2009*, Geneva, July.



## 关键词

经济整合  
国际经济关系  
国际贸易  
出口  
进口  
交易统计  
对外直接投资  
贸易政策  
中国  
拉丁美洲  
加勒比地区

# 改善拉丁美洲 与中国的 经济和贸易关系

*Oswaldo Rosales*

## 本

文回顾了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状况，分析中国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带来的机遇和构成的威胁，重点聚焦在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领域。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不但得以保持高速增长，也让该地区的国际贸易和全球工业生产参与度不断上升。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在过去十年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额持续走高，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另一方面，中国在制成品方面日益增强的竞争力对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生产企业构成了直接（在地区市场）和间接（在第三方市场）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利用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关系，拉丁美洲国家应努力加入围绕中国建立的价值链，同时寻找吸引外资的配套战略。拉丁美洲国家可利用此时机共同确定与亚洲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重点，以及建立互利战略同盟。

Oswaldo Rosales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国际贸易和一体化处处长  
⇒ [osvaldo.rosales@cepal.org](mailto:osvaldo.rosales@cepal.org)



## 一、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已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一员。中国在经济增长、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表现活跃，并且在国际融资来源等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迅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建立了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使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贸易、投资、减贫和国际化进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快速缩小。

由于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有必要重新评估中心—外围的关系。过去30年间，外围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证明：达到中心经济体的收入水平是可能的。外围国家已形成自身技术优势，现已成为多个行业重要的制成品、服务及技术出口国。同时，此类国家是主要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和世界存款供应国。外围经济体可分为两类：出口附加值极低的原材料的传统经济体；以知识为发展基础、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的创新型经济体。尽管中心—外围格局不断变化，传统经济体可能继续经历外围内部的边际关系（Rosales, 2009）。南南贸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同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日益密切。在此背景下，以上问题更加重要。

中国正在加强与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对原材料和自然资源（其中部分由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体供应）的旺盛需求，反映了中国强劲的增长势头。在过去十年间，中国与以上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迅速增长，现已跻身于这两大洲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的快速增长同时还惠及满足其原材料和自然资源需求的经济体。南美洲，尤其是出口矿产品的国家，从这一增长格局中受益匪浅。

中国坚实的生产、技术及金融基础以及与亚太地区愈加紧密的联系，令其在全球危机中脱颖而出。一方面，近来这场全球性危机波及范围广，对工业化经济体影响严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具有弹性，并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保持关系。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当前全球复苏呈现出两种速度。主要影响美国和欧洲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融合

步伐。预计到2016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超过美国。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以中国为首的亚太地区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同时，相比众多工业化经济体，拉丁美洲正在以更快的步伐走出危机的阴霾。2010年，拉丁美洲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2011年增长4%以上。2003~2008年，拉丁美洲地区经济迅速增长。同时，该地区不断完善自身经济政策。得益于此，尽管近期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严重，拉丁美洲未遭遇金融和汇率危机。反之，由于多数国家长期致力于发展宏观经济——财政和经常项目盈余、外汇储备持有量增加以及灵活的汇率制度，因此该地区得以依靠反周期财政和货币计划应对危机，从而降低了危机的影响。

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拉丁美洲国家也未能缩小其与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以及各国内部先进行业与落后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拉丁美洲地区各行业之间生产力水平的显著差距——远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以及亚洲国家的内部差距——是导致该地区存在严重不平等现象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差距明显，拉丁美洲地区的就业严重不足，大量中小企业（SME）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达到国际质量标准，工人工作技能低下。若要实现平等，拉丁美洲必须保持高速包容性增长。相比过去，现在可行性更高而且刻不容缓。拉丁美洲地区在面对危机及其后果的过程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劲实力，而且技术变革的强度有助于该地区加快赶超步伐。此外，该地区应利用目前有利的经济周期加大基础设施、教育和创新领域的投资力度，同时给予中小企业有力的支持。

中国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已形成全球新的增长地区。这不仅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主要变量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还反映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南南贸易与投资加强了相互联系。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面对这一新格局，通过调整自身政策和策略，利用南南经济联系与合作领域不断增长的潜力。深化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经贸关系或是该进程的一项重要目标。

全球经济危机加强了中国以及整个亚洲作为拉丁美洲主要出口增长来源地的地位。亚太地区已取代欧盟成为拉美地区第二大的出口市场。2009年，中国是巴西和智利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国，也是秘鲁、哥斯达黎加以及古巴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国，及阿根廷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国。在2015年左右，中国将取代欧盟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二大进出口贸易伙伴。毋庸置疑，以上趋势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发展。相比与美国或欧洲的经济关系，在未来几十年内，与亚洲的经济关系将对拉丁美洲经济增长前景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是拉丁美洲地区主要的进口来源地。拉丁美洲出口至亚洲尤其是到中国的产

品，种类极少，以自然资源为主，并且出口仅销往该地区少数几个国家。此外，在过去两年间，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投资虽显著上升，但投资规模总体较小，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对亚洲国家的投资几乎为零。

与中国愈加紧密的贸易联系以及方兴未艾的投资关系创造了中短期收益。然而，中期看来存在重大挑战。例如，可能出现出口产品“返祖”趋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0b），这将导致出口多元化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融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全球价值链的过程愈加复杂。若出现以上不利局面，该地区将更难实行旨在促进平等的生产转型策略。

## 二、世界经济中的中国： 在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的作用持续上升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是过去十年间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参见图1）。在2001~2008年间，中国的产值增长约占全球增长的1/4，2009年升至2/3以上。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约占全球增长的1/3（参见图2）。

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的中心正从大西洋移至太平洋。在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近的一份报告（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1年4月）中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17年超过美国——比高盛预测<sup>1</sup>的时间早10年。若要实现该目标，中国和美国必须在未来7年内分别保持9%和2.5%的增长率。在过去十年间，中美两国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5%和1.7%。

中国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两个显著挑战。第一，控制通货膨胀——鉴于资本流入量飙升以及食品和房产价格不断走高，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任务艰巨，这一点最为重

要。第二，挖掘并推广新的增长来源，因为发达经济体在2015年之前无法恢复其危机前的增长速度。中国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以及该国内外新的投资流，可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全球的经济增长将取决于各国与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商业和投资关系的能力。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之一和第五大服务出口国，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之一。中国也是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以及钢铁和船舶生产的第一大国。此外，中国还在国际金融领域扮演核心角色：该国是世界主要外汇储备国，其2010年的外汇储备量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30%。同时，中国还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国。2010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科研成果出版数量排名第二的国家。换言之，中国在世界经济的生产、投资、贸易和金融等多个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在创新和技术进步领域中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更重要，现已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参见图3）。例如，在2000年时，中国是美国第十大出口市场，是欧盟第二十二大出口市场。截至2008年，中国已跃升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欧盟

1 高盛于2001年提出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概念。该公司更新的预测结果（2007年）显示：2027年（而非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高出美国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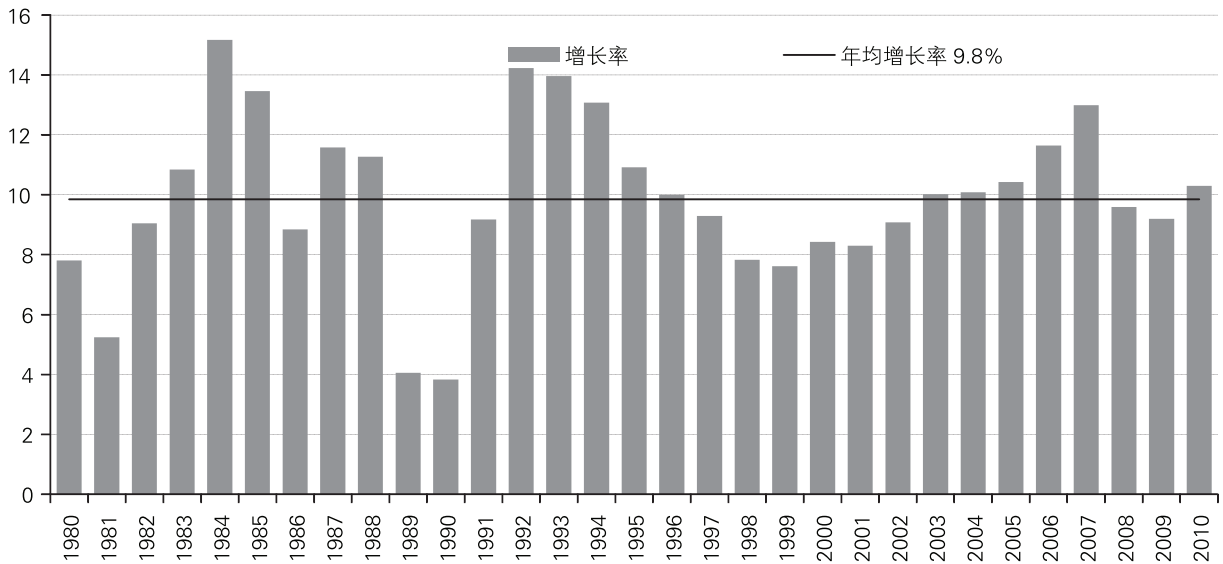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1979~2010年  
(百分比)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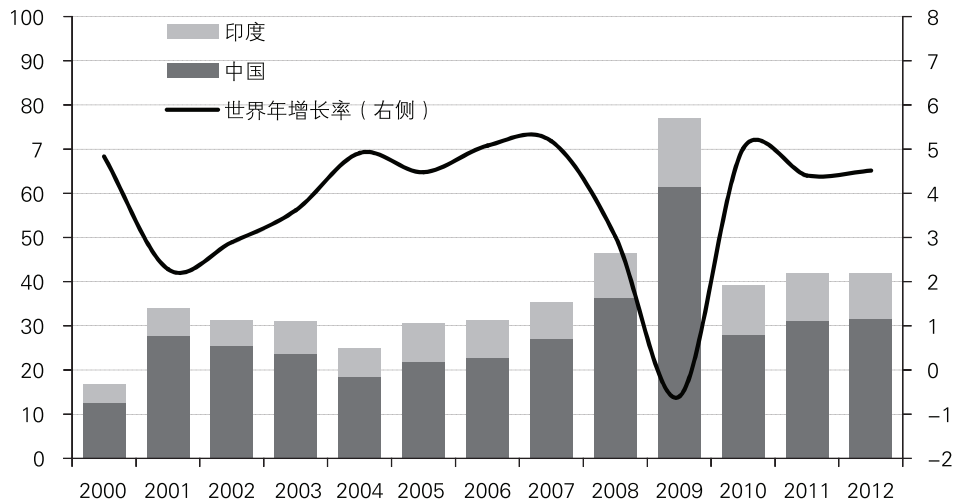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和印度：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2年  
(百分比)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1年4月。

的第十五大出口市场。中国与非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也呈现出类似的上升走势。然而，中国与拉丁美洲经济体之间贸易额的变化更为显著。目前，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

后危机时期，中国主导了全球贸易复苏。在2010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居全球首位，出口额增长了23.1%——是全球14.5%之增长速度的近两倍（参见图4）。美国和欧盟的出口额分别增长了15.4%和11.4%。

中国是若干农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此类产品的需求量较大。中国的棉花和水稻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30%，玉米、豆粉及豆油产量均占全球总产量的20%以上。印度的水稻和棉花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份额和中国类似。此外，中国还是玉米、棉花及油料产品的消费大国。尽管中国是大豆、豆粉及豆油生产大国，但其对这三类产品的进口额分别占全球进口总额的53%、28%及23%。在2000~2007年间，

中国的豆油消费量和大豆需求量增长分别占全球增长的1/2和1/3。同一时期，印度的大米消费量和小麦消费量增长分别占全球增长的1/2和1/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8）。1990年，中国部分初级商品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份额不到5%。目前，该国的铝、铜、锡、大豆及锌消费量位居全球首位，蔗糖和石油消费量的居全球第二（参见图5）。

在以往的危机期间，主要由七国集团（G7）负责管理国际金融体系。然而，在当前的危机期间，由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团体（二十国集团，即G20）也参与决策的过程。二十国集团代表一个新世界，尽管仍处于发展阶段，但由于旧的制度框架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例如，对国家金融体系进行监管修正，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实质性改革，以及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诸多挑战，并且关乎竞争策略、创新和贸易谈判，因此二十国集团将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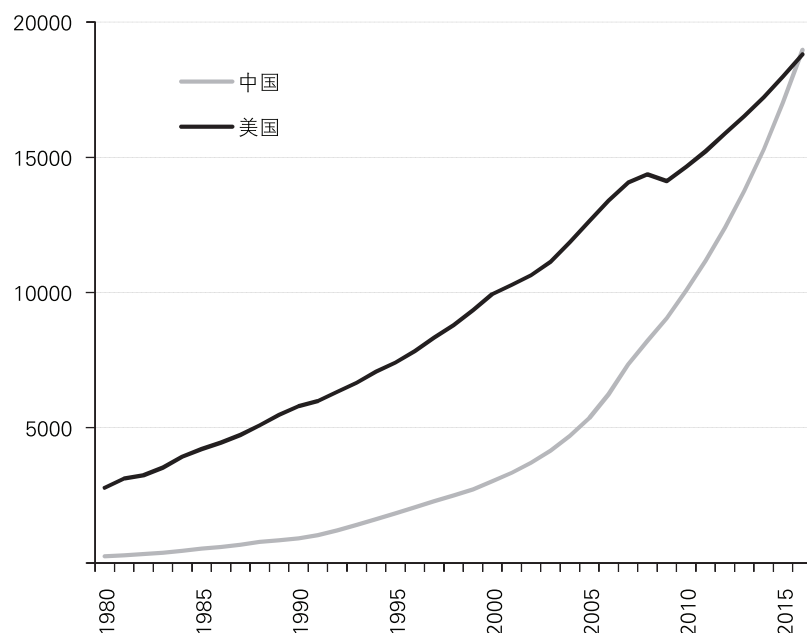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状况，1980~2016年  
(购买力平价，10亿美元)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1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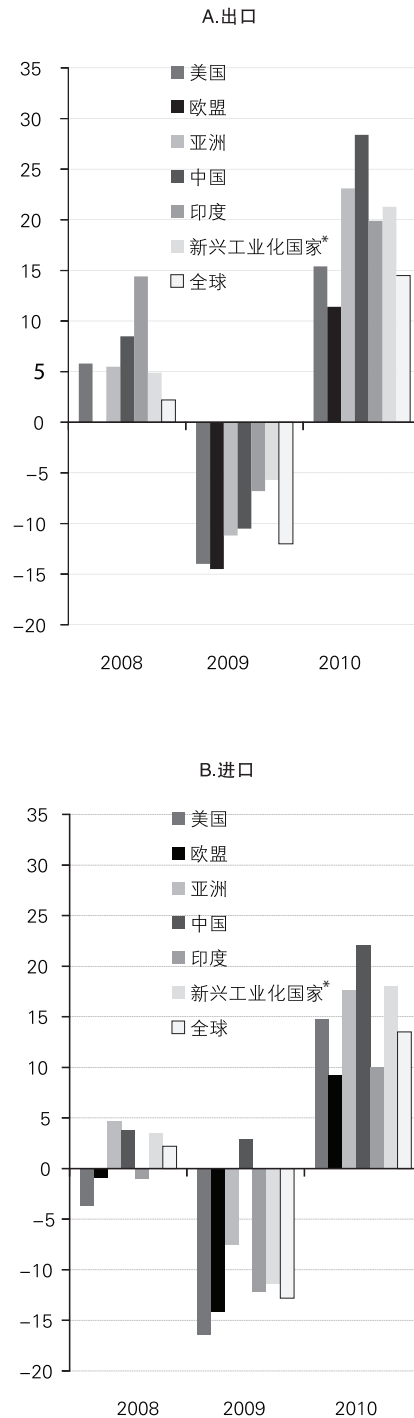


图4 部分地区和国家：商品贸易额增长情况，2007~2010年  
(百分比)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2010年回顾及2011年展望》（出版物/628）数据，2011年4月。

\*对应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

拥有大量经常项目盈余的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必须在更加平衡的经济复苏过程中共同采取措施使其货币逐步升值，并且刺激国内市场和个人消费。作为全球负债最多的经济体，美国必须将美元贬值纳入经济调整策略，同时减少支出，增加储蓄。然而，在美国改善其经常项目的状况期间，其他领域的经常项目必将受到负面影响。增长率接近10%、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3%，这些情况不具备可持续性。因此，旨在逐步调整中国宏观经济数字的每项举措以及国内消费作用的日益提升，将降低未来几年内世界经济出现不利消息的可能性。

历史证据表明，随着一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其国家货币实力也会迅速增强。此外，该过程完全契合中国着力发展卫生、住房及养老事业，减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不平等现象和完善社会保障网的发展方针。

中国已成为亚洲贸易领域最具活力的国家，时常被冠以“亚洲工厂”之名。这个所谓的工厂是由跨国公司组成的一个复杂的地区产业链网络，中国在相关产品的来源地和目的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全球层面，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是产业内贸易领域（即产业标准

分类范围内发生的双向商品交换）部分最重要的中心地区。形成上述产业链的原因，包括零部件贸易单边自由化、丰富的低成本人工劳动力、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及有利的投资环境。亚洲内部的贸易额增长与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提升互为因果，表现为产业内贸易额持续走高。从该角度而言，亚洲的内部贸易在该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削弱了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联系，尽管目前美国和欧盟仍是亚洲制成品的市场。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面向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出口平台中心。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相互交错。因此，即便美国和欧盟需求增长平平，亚洲仍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东盟国家希望在2015年前建立单一市场，消除商品、服务及投资资金流动的壁垒，并且实现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迄今为止，东盟已与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签署了经济协定（自2010年1月起生效），与韩国签署了投资协定，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样自2010年1月起生效）<sup>2</sup>。亚洲以外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组织，例如美国和欧盟，也希望与东盟及其成员国建立更加紧密

2 与东盟和中国签署的协定相比，东盟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的协定主要要求实现双边贸易自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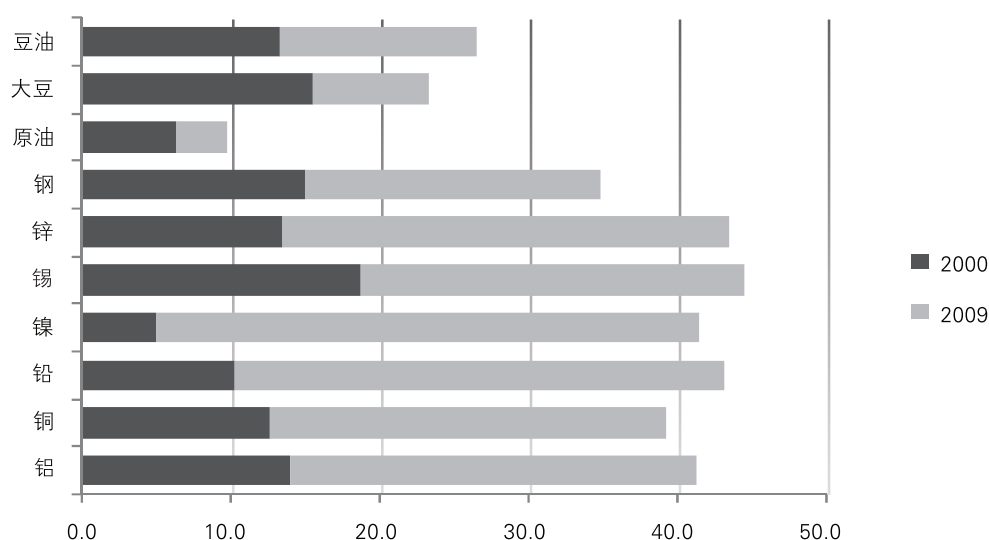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部分农产品、金属及石油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份额，2000年与2009年  
（占全球消费总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服务处，官方估测数据；世界金属统计局，《世界金属统计公报》，数栏内容；美国能源信息署，《独立统计与分析》；经济学人信息部，《世界初级商品预测：工业原材料》（World Commodity Forecasts: Industrial Raw Materials），2010年1月；以及经济学人信息部，《世界初级商品预测：食品、饲料及饮料》（World Commodity Forecasts: Food, Feedstuffs and Beverages），2010年11月。

的关系。

反之，纺织品和鞋类等低技术含量产品所占份额出现下降，中等技术含量行业的相对权重保持稳定。生产

高技术含量产品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此类产品的所有方面均已达到专业化水平。事实上，中国产品的劳动密集度仍很高，例如仍在大量从事高技术含量产品组装工作。

### 三、中国与拉丁美洲双边贸易的主要特征

#### 1. 中国作为拉丁美洲地区贸易伙伴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拉丁美洲地区的首要贸易伙伴。在20世纪90年代末，拉丁美洲地区对美国出口额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近60%。然而，该份额随后逐步下降，到2004年时仅为40%。与之类似，拉丁美洲地区对欧盟出口额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的20%多降至2009年的13%。在过去20年间，日本在拉丁美洲贸易伙伴中的地位也日益降低。与以上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拉丁美洲地区对中

国出口额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份额不到1%，但该份额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不断增长，达到8%。

中国业已在较短时期内成为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参见表1）。该现象意味着这一时期拉丁美洲地区国际贸易结构的重大转变。在分析的17个国家中，中国作为其中14个国家之出口目的国的地位均有上升，并且是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秘鲁以及乌拉圭的五大出口目的国之一。与之类似，对于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中国作为进口来源国的排名均有所上升。分析的17个国家中，中国是其中16

表1 拉丁美洲：中国作为贸易伙伴之贸易额排名，2000年和2009年  
(排名)

|                   | 出口   |      | 进口   |      |
|-------------------|------|------|------|------|
|                   | 2000 | 2009 | 2000 | 2009 |
| 阿根廷               | 6    | 4    | 4    | 3    |
| 玻利维亚              | 18   | 11   | 7    | 4    |
| 巴西                | 12   | 1    | 11   | 2    |
| 智利                | 5    | 1    | 4    | 2    |
| 哥伦比亚              | 36   | 6    | 9    | 2    |
| 哥斯达黎加             | 30   | 2    | 15   | 3    |
| 厄瓜多尔              | 18   | 16   | 10   | 3    |
| 萨尔瓦多              | 49   | 36   | 23   | 4    |
| 危地马拉              | 43   | 25   | 19   | 3    |
| 洪都拉斯              | 54   | 11   | 21   | 6    |
| 墨西哥               | 19   | 7    | 7    | 2    |
| 尼加拉瓜              | 35   | 27   | 20   | 4    |
| 巴拿马               | 31   | 36   | 25   | 2    |
| 巴拉圭               | 15   | 15   | 3    | 1    |
| 秘鲁                | 4    | 2    | 9    | 2    |
| 乌拉圭               | 4    | 4    | 7    | 3    |
| 委内瑞拉 <sup>a</sup> | 35   | 2    | 18   | 3    |

注：欧盟成员国在排名中单列。

<sup>a</sup> 委内瑞拉2009年数据源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方向统计(DOTS)。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COMTRA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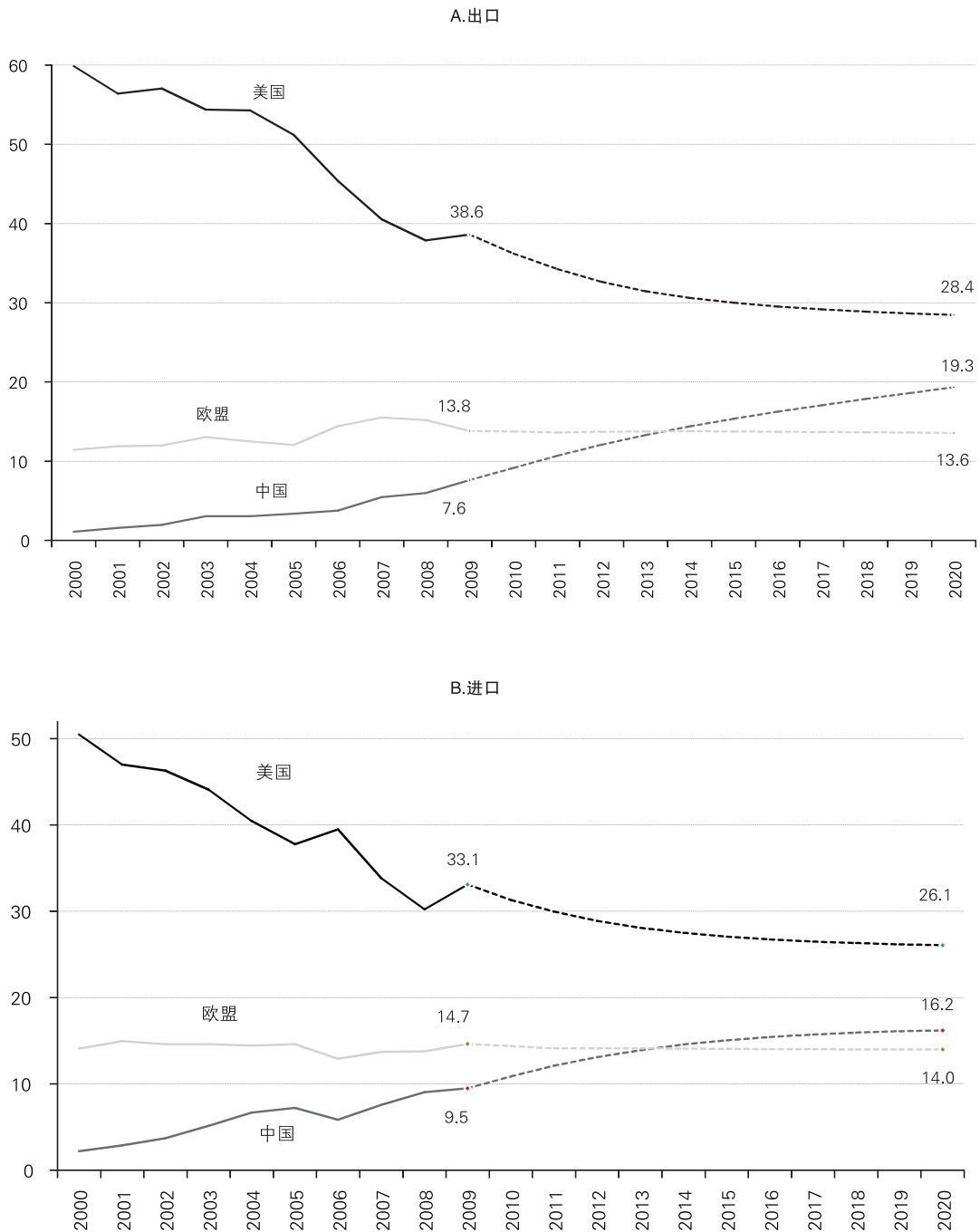


图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主要贸易伙伴占贸易总额的百分比份额，2000~2020年<sup>a</sup>

(百分比)

注：<sup>a</sup> 基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6个国家：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玻利维亚及乌拉圭。估测数据基于中国、美国、欧盟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假定进出口预测增长幅度与各自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增长率趋同。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和各国资料。



表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主要目的市场出口额变化情况，2000~2009年  
(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                   | 中国         |            | 亚太         |             | 美国          |             | 欧盟(27国)     |             | 拉丁美洲<br>和加勒比地区 |             |      |
|-------------------|------------|------------|------------|-------------|-------------|-------------|-------------|-------------|----------------|-------------|------|
|                   | 2000       | 2009       | 2000       | 2009        | 2000        | 2009        | 2000        | 2009        | 2000           | 2009        |      |
| 南美洲               | 阿根廷        | 3.0        | 6.6        | 9.4         | 15.3        | 12.0        | 6.2         | 18.0        | 18.6           | 48.1        | 42.2 |
|                   | 玻利维亚       | 0.4        | 2.5        | 1.4         | 18.5        | 24.0        | 7.7         | 17.3        | 9.1            | 44.2        | 59.9 |
|                   | 巴西         | 2.0        | 13.2       | 10.3        | 26.1        | 24.3        | 10.2        | 28.0        | 22.2           | 24.8        | 20.1 |
|                   | 智利         | 5.0        | 23.2       | 26.1        | 46.1        | 16.5        | 11.3        | 25.2        | 19.6           | 21.9        | 19.1 |
|                   | 哥伦比亚       | 0.2        | 2.9        | 2.6         | 6.0         | 50.4        | 39.7        | 13.9        | 14.2           | 28.9        | 24.6 |
|                   | 厄瓜多尔       | 1.2        | 0.9        | 10.9        | 2.6         | 37.9        | 33.5        | 12.9        | 15.0           | 31.5        | 42.6 |
|                   | 巴拉圭        | 0.7        | 1.1        | 2.0         | 1.1         | 3.9         | 1.8         | 13.6        | 16.0           | 74.5        | 75.1 |
|                   | 秘鲁         | 6.4        | 15.4       | 16.9        | 26.9        | 28.0        | 16.3        | 22.0        | 15.6           | 18.1        | 14.9 |
|                   | 乌拉圭        | 4.0        | 4.3        | 8.3         | 8.5         | 8.3         | 3.3         | 16.3        | 15.1           | 54.2        | 39.9 |
|                   | 委内瑞拉       | 0.1        | 2.9        | 1.9         | 7.6         | 59.6        | 48.8        | 5.8         | 9.4            | 19.6        | 10.4 |
| 中美洲               | 哥斯达黎加      | 0.2        | 8.8        | 5.5         | 17.7        | 52.0        | 35.8        | 22.1        | 17.4           | 19.0        | 27.3 |
|                   | 萨尔瓦多       | 0.0        | 0.1        | 0.4         | 2.8         | 65.5        | 46.6        | 5.7         | 5.8            | 27.8        | 43.5 |
|                   | 危地马拉       | 0.1        | 0.4        | 3.6         | 3.2         | 44.0        | 42.5        | 10.9        | 5.5            | 35.6        | 40.1 |
|                   | 洪都拉斯       | 0.0        | 1.5        | 1.6         | 4.7         | 79.3        | 40.7        | 4.5         | 23.0           | 6.0         | 29.8 |
|                   | 墨西哥        | 0.2        | 0.6        | 1.4         | 2.4         | 88.2        | 87.6        | 3.5         | 3.8            | 3.6         | 3.2  |
|                   | 尼加拉瓜       | 0.0        | -          | 0.8         | 2.5         | 57.2        | 29.5        | 16.4        | 13.3           | 23.4        | 68.1 |
|                   | 巴拿马        | 0.2        | 2.5        | 2.0         | 8.2         | 45.9        | 42.6        | 21.7        | 24.4           | 23.2        | 19.5 |
| 加勒比国家             | 巴哈马        | 0.0        | 0.0        | 2.4         | 24.6        | 48.3        | 33.7        | 29.8        | 24.7           | 1.5         | 10.5 |
|                   | 巴巴多斯       | -          | 0.4        | 0.7         | 1.1         | 13.5        | 7.5         | 18.5        | 12.4           | 16.2        | 75.8 |
|                   | 伯利兹        | -          | 0.0        | 0.8         | 7.0         | 45.0        | 30.3        | 27.8        | 37.3           | 30.6        | 12.2 |
|                   | 古巴         | 4.8        | 26.4       | 9.8         | 29.9        | -           | -           | 38.5        | 20.9           | 10.5        | 19.1 |
|                   | 多米尼加       | -          | 2.0        | 1.4         | 4.3         | 91.1        | 61.9        | 6.3         | 10.4           | 4.2         | 20.7 |
|                   | 多米尼克       | -          | 0.7        | 0.0         | 30.1        | 10.9        | 1.8         | 56.9        | 26.3           | 28.8        | 37.9 |
|                   | 格林纳达       | -          | 0.0        | 3.1         | 0.7         | 7.4         | 12.9        | 56.2        | 7.8            | 24.4        | 74.1 |
|                   | 圭亚那        | -          | 1.0        | 6.6         | 3.9         | 20.5        | 15.6        | 48.5        | 25.1           | 10.3        | 18.6 |
|                   | 海地         | -          | 0.7        | 1.2         | 2.5         | 83.0        | 78.7        | 12.5        | 3.7            | 6.5         | 9.6  |
|                   | 牙买加        | 0.0        | 1.1        | 1.0         | 5.5         | 28.4        | 38.2        | 31.8        | 21.1           | 5.1         | 9.1  |
|                   | 圣基茨和尼维斯    | -          | 0.0        | 3.3         | 0.5         | 61.3        | 62.7        | 34.2        | 4.5            | 3.8         | 13.1 |
|                   | 圣卢西亚       | -          | 0.0        | 0.1         | 21.3        | 16.6        | 9.3         | 68.9        | 46.0           | 8.7         | 22.1 |
|                   |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          | 0.4        | 0.0         | 5.7         | 10.6        | 0.5         | 54.6        | 74.9           | 34.0        | 17.2 |
|                   | 苏里南        | -          | 0.5        | 6.2         | 1.2         | 11.8        | 9.9         | 38.3        | 24.2           | 6.3         | 9.3  |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0.1        | 0.7        | 1.4         | 4.4         | 53.9        | 36.3        | 9.0         | 18.2           | 18.0        | 36.9 |
| <b>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b> | <b>1.0</b> | <b>6.9</b> | <b>5.0</b> | <b>14.6</b> | <b>59.7</b> | <b>40.1</b> | <b>11.1</b> | <b>13.9</b> | <b>16.3</b>    | <b>17.7</b> |      |

注：计算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国家总额时纳入制成品出口数据，将其计入美国。

2000年数据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2009年数据基于各国数据来源。

加勒比国家数据(多米尼加除外)基于贸易方向统计，不含2009年12月数据。

委内瑞拉2009年数据包括12月估值。

国家或地区占出口总额的相对份额增加幅度(>10%)。

国家或地区占出口总额的相对份额减少幅度(<10%)。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各国官方数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方向统计。

个国家的五大进口来源国之一（中国是洪都拉斯的第六大进口来源国）。随着双边贸易额的持续飙升，中国或将在未来数年内取代欧盟成为拉丁美洲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参见图6）<sup>3</sup>。拉丁美洲国家将采购更多产自中国的资本货物，尤其是电子商品、汽车零部件、设备、机械及瓷砖。以上中国产品已在拉丁美洲地区市场占有率较高份额。

2008年，中国成为巴西和智利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是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古巴及秘鲁的第二大市场（参见表2）。此外，中国还是其他4个国家的五大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对中国出口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南美洲，其次是中美洲和墨西哥。对中美洲国家和墨西哥而言，中国尚属于未开发的市场（哥斯达黎加除外）。对智利、哥斯达黎加及玻利维亚而言，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市场也相当重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出口至亚洲新兴国家的产品主要产自5个国家（即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及秘鲁），其出口额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9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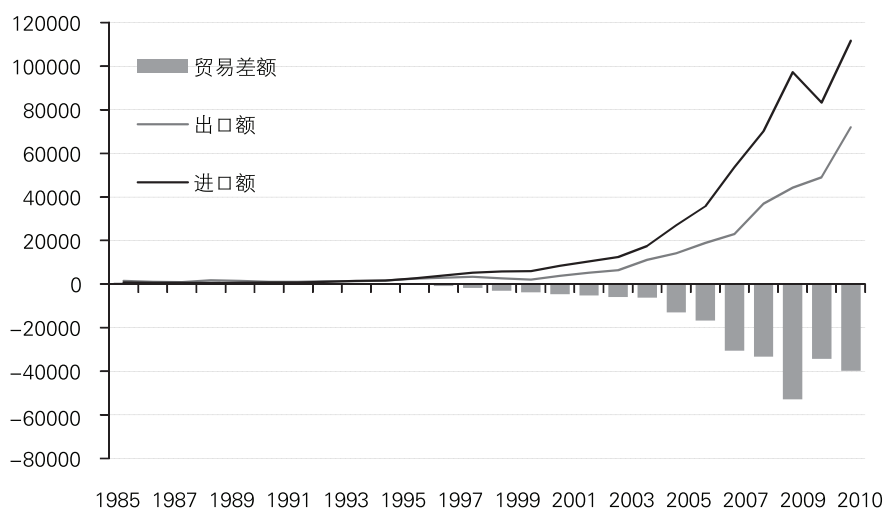
哥及秘鲁），其出口额占该地区出口总额的90%以上。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自亚太地区之进口商品集中度远高于该地区对亚太地区之出口商品集中度。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和巴西对亚太地区的出口额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亚太地区出口总额的近70%。仅智利和秘鲁自亚太地区进口额小于其对亚太地区出口额。2008年，中国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3个国家的五大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并且在5个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位居第一或第二。在过去几年间，尽管日本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出口略有回升，但就整个亚太地区而言，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

南美洲以及墨西哥和中美洲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存在差异（参见图7）。在本世纪前10年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出现赤字，主要归因于墨西哥以及中美洲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相比之下，在过去10年间，南美洲经济体与中国一直保持贸易平衡。中国已成为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不过其作为墨西哥和中美洲出口目的国的地位并未提升。墨西哥和中美洲应将消除这种不对称现象纳入各自的工作议程。

3 受近期欧盟与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安第斯共同体以及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之间已商定之联合协议的影响，该趋势或将有所变化。

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B. 南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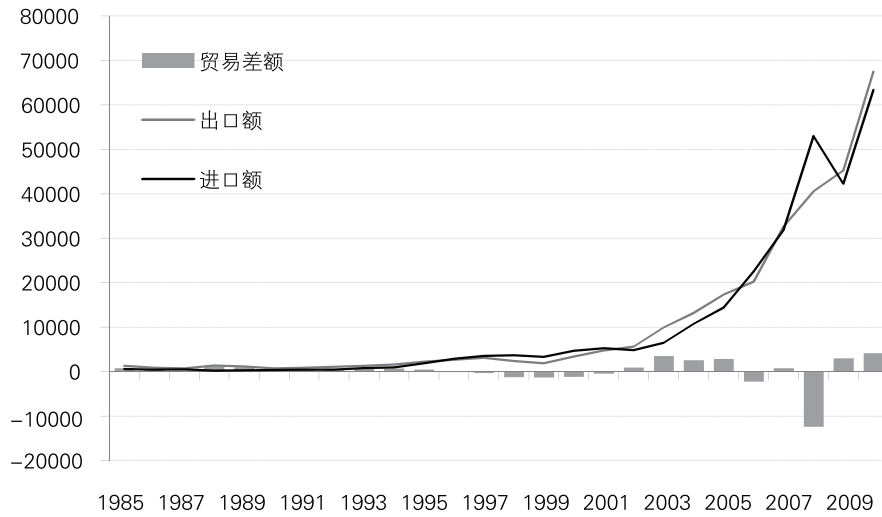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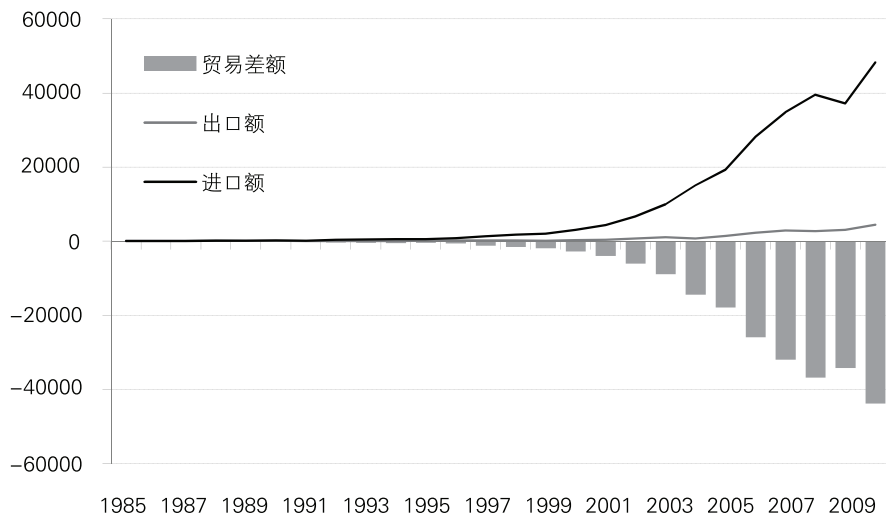
C. 墨西哥和中美洲<sup>a</sup>

图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的进出口额和贸易差额，1985~2009年  
(10亿美元)

注：<sup>a</sup> 包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及巴拿马。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各国官方数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方向统计。

初级商品（加工或未加工）出口额占拉丁美洲对亚洲新兴国家出口商品总额的90%以上。该份额在过去20年间未出现显著变化。该出口结构反映了拉丁美洲的比较优势，以及中国和亚洲其他新兴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亚洲新兴国家设置的壁垒会根据进口产品的加工水平逐步增加<sup>4</sup>。

此外，拉丁美洲国家出口至中国的产品种类单一。除墨西哥之外，拉丁美洲国家五类主要出口产品占其出口总额的80%。在过去十年间，由于原材料价格飙升，这五类主要产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以价值计）上升。然而，这份清单未包括若干类新产品，例如，鱼类产品和猪肉以及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电信设备以及数据处理设备等高科技制成品。此类制成品表明拉丁美洲可逐步加入亚太地区的供应链网络。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出口至中国的产品数量有限。利用六位数调和关税制度（包含5052个税则号列）分析可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口至中国产品的平均数量远远少于出口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出口至中国市场之产品的税则号列仅占所有税则号列的4%，表明出口多元化的程度很低。反之，中国出口至拉丁美洲的产品主要为制成品，既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又包括汽车和电子产品。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90%以上为制成品，其中85%以上是非自然资源制成品。

从本质上而言，拉丁美洲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基本为产业间性质，即拉丁美洲向中国出售原材料，中国向拉丁美洲出售制成品。这导致双边贸易难以增长，共同投资项目极少，拉丁美洲国家难以进入亚太地区的供应链。该供应链的产业内性质愈加明显。

在2008年的下半年，拉丁美洲出口至中国的初级商品数量和价格双双下降，但在2009年和2010年迅速反弹。对初级商品净出口国家而言，出口产品的全球价格上涨促使本币汇率上升，同时增加了与资源开采和出口相关的个人收入和财政收入，进而改善了此类国家的财政账户和对外账户状况。鉴于未来几十年内中国和亚洲

其他新兴国家将保持快速增长，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或将保持高位（Rosales，2010）。

尽管存在短期效益，但低附加值商品增加将导致拉丁美洲国家丧失发展其他高科技和高附加值行业的机会。此外，若初级产品收入飙升导致实际货币升值以及“荷兰病”现象，此类行业或将遭受更大冲击。以上两类趋势可能将加快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7；Jenkins和Dussell Peters，2009）。Jenkins和Dussell Peters表示，以阿根廷和巴西为例，在2001~2006年间，中国仅在自行车和摩托车、电视机、收音机以及基本电子产品等几个行业以较大优势取代了当地的生产商。

来自中国的竞争对墨西哥及若干中美洲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墨西哥和若干中美洲国家主要生产纺织品和价值链上的中间产品。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2005年1月1日《纺织品和服装协议》的废止，上述竞争日益加剧。针对电子和纺织行业所做的研究证实，中国在美国市场的强大竞争力导致墨西哥和若干中美洲国家的竞争力大幅削弱。美国给予墨西哥的进口配额持续减少，而中国扮演的角色则愈加重要。2003年，中国首次超过墨西哥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且其有利地位还在不断加强。

然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可扩大与亚洲新兴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例如，墨西哥向亚洲新兴国家出口大量的电信设备、电路及电子产品。巴西的制造行业与亚洲之间也有大量的贸易机会，尤其在航空产品、电信设备及汽车零部件领域。就阿根廷而言，加工食品出口领域的机会丰富。在农业和农工业领域，与中国及印度存在较大的潜在贸易机会。由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消费模式仍在变化，若此类国家的出口商能够进入价值链，丰富出口产品并促进创新，将发现新的发展机会。与促进产品创新一样，发展经济领域出口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阿根廷、巴西、智利以及乌拉圭已经拥有增长潜力较大的农业食品行业，这些国家应通过集体谈判全面进入亚洲市场。

## 2. 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投资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双边对外直接投资

4 这一地区特征忽略了国家之间的性质差异。墨西哥、哥斯达黎加以及哥伦比亚的制成品种类较高（其中哥伦比亚相对较低），但这三个国家的出口在拉丁美洲国家对亚洲新兴国家出口总额中仅占较小份额。

量远远小于双边贸易流量。在过去几年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迅速上升。然而，官方数据显示，除厄瓜多尔之外，中国在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都未进入前五位。根据中国提供的官方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近17%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投资规模为410亿美元。然而，其中95%以上都流向两个经济体：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由于这两个经济体均为避税港，这显然削弱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投资的总体影响。

2010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直接投资额显著上升。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估算结果，中国跨国公司当年在该地区的投资额超过150亿美

元，占该地区吸引外资总额的9%，成为继美国（17%）和荷兰（13%）之后的第三大投资国（参见图8）。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投资90%以上涉及自然资源采掘，主要涵盖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以及采矿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Sinopec）以7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雷普索尔YPF巴西公司40%的股份，是中国企业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最大投资。石油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和中国中化集团公司（Sinochem）也分别在巴西和阿根廷展开重大收购行动。中国铝业公司（Chinalco）和中国五矿集团公司（Minmetals）（在秘鲁）以及武汉钢铁集团（Wuhan）（在巴西）在该地区采矿业投入巨资。

**表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2008~2009年**  
(百万美元和百分比)

| 国家/地区      | 中国对外直接<br>投资存量，<br>2008年年末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br>2009年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br>存量，2009年年末<br>(估值) | 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br>额占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br>额的百分比，<br>2009年年末 |
|------------|----------------------------|----------------------|--------------------------------|---|
| 全球总计       | 184,000                    | 43,300               | 220,000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32,240                     | 8,939                | 41,179                         | 100.0   |
| 开曼群岛       | 20,327                     | 7,354                | 27,682                         | 67.2  |
| 英属维尔京群岛    | 10,477                     | 1,330                | 11,807                         | 28.7  |
| 巴西         | 217                        | 72                   | 289                            | 0.7   |
| 秘鲁         | 194                        | 85                   | 279                            | 0.7   |
| 阿根廷        | 173                        | 39                   | 213                            | 0.5   |
| 委内瑞拉       | 156                        | 20                   | 176                            | 0.4   |
| 墨西哥        | 173                        | 2                    | 175                            | 0.4   |
| 厄瓜多尔       | 89                         | 1                    | 90                             | 0.2   |
| 巴拿马        | 67                         | 10                   | 77                             | 0.2   |
| 古巴         | 72                         | 0                    | 72                             | 0.2   |
| 圭亚那        | 70                         | 0                    | 70                             | 0.2   |
| 苏里南        | 68                         | 0                    | 68                             | 0.2   |
| 智利         | 58                         | 5                    | 63                             | 0.2   |
| 玻利维亚       | 29                         | 5                    | 34                             | 0.1   |
|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 32                         | 0                    | 32                             | 0.1   |
| 巴拉圭        | 5                          | 15                   | 20                             | 0.0   |
| 哥伦比亚       | 14                         | 1                    | 15                             | 0.0   |
| 格林纳达       | 8                          | 0                    | 8                              | 0.0   |
| 巴巴多斯       | 3                          | 0                    | 3                              | 0.0   |
| 牙买加        | 2                          | 0                    | 2                              | 0.0   |
| 乌拉圭        | 2                          | 0                    | 2                              | 0.0   |
| 安提瓜和巴布达    | 1                          | 0                    | 1                              | 0.0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1                          | 0                    | 1                              | 0.0   |
| 多米尼克       | 1                          | 0                    | 1                              | 0.0   |
| 巴哈马        | 1                          | 0                    | 1                              | 0.0   |
| 伯利兹        | 0                          | 0                    | 0                              | 0.0   |
| 多米尼加       | 0                          | 0                    | 0                              | 0.0   |
| 洪都拉斯       | 0                          | 0                    | 0                              | 0.0   |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中国商务部（MOFCOM）数据，2010年4月。

此外，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ZTE）对该地区电信行业进行投资，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BYD）、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Chery）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Geely）已对当地汽车行业进行投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巴西、阿根廷及秘鲁——这三个国家均与中国保持牢固的贸易关系。对厄瓜多尔和圭亚那等部分较小的经济体而言，中国是重要的投资来源国。除哥斯达黎加之外，中国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几乎可以忽略（参见表

3）。中国公布的2011年投资额总计227亿美元。目前尚难断定如此规模的投资额属于暂时飙升，还是表示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关系已进入新阶段。中国与该地区之间牢固的贸易关系通常伴随着自然资源、制成品、基础设施以及服务领域投资额的不断上升。

除来自开曼群岛和英属维京群岛的大量对外直接投资之外，拉丁美洲流向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小。除了这两个避税港，拉丁美洲对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是阿根廷、巴西、智利以及墨西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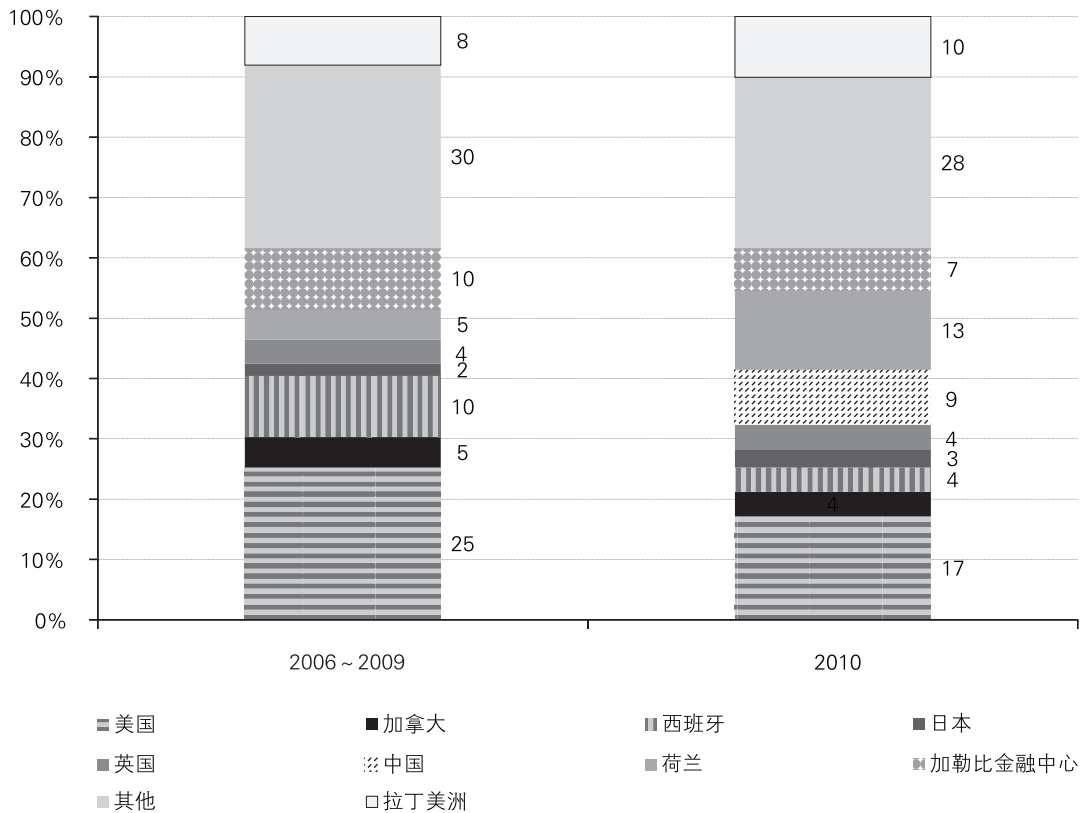


图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2006~2010年<sup>a</sup>  
(百分比)

注：<sup>a</sup> 此处数字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基于2011年4月15日的官方数字和估测数字。



## 四、总结与建议

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在短短的数年间，中国已成为该地区贸易战略和国际定位政策的重要伙伴。双边关系正朝着互利战略联盟的方向发展。为了建立战略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必须加倍努力，提高出口至中国的商品多元化程度以及价值和知识含量，加强与中国的商贸和科技的合作关系。此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还须加大在中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投资力度，以便更全面地加入围绕中国建立的亚洲供应链和价值链。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应当在本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加强把中国作为战略伙伴的重要地位。该目标包含若干挑战：①利用对自然资源的持续旺盛需求和由此带来的南美洲贸易条件的改善，加大对基础设施、创新及人力资源领域的投资；②利用初级商品出口攀升的利好条件，围绕自然资源价值链和供应链（包括服务、物流和研发）创建技术联盟；③加强贸易和投资关系，采取措施吸引中国投资并投资中国。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密。这一利好形势为该地区国家创造了良机，使其能够将实现创新和提升竞争力列为国家和地区发展议程的中心任务。面对中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协调策略（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并围绕成为其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伙伴之目标），必将有助于消除拉丁美洲在竞争力、创新力以及生产力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已成为拉丁美洲落实生产转型和平等战略过程中取得进步的长期障碍。作为发展中地区的平等伙伴，中国和拉丁美洲应努力深化互利关系。双方应通过对话、磋商或协商解决可能出现的分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0）。

中国加强与拉丁美洲的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后者可满足中国目前和未来对原材料及矿产资源的需求。中国从而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广大人口的营养需求。目前的出口方向和投资格局反映出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原材料的兴趣：矿产、金属及林木（智利和秘鲁），鱼类和能源（阿根廷、委内瑞拉、厄瓜多尔）、钢铁（巴西）以及大豆、肉类及其他食品（阿根廷、巴西、智利及秘鲁）。

发展亚洲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关键是中国与巴西之间的关系，以及巴西允许南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受益的有效空间。事实上，作为金砖四国和二十国集团成员，中国和巴西这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关系为亚太地区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之间开展战略对话搭建了平台。若没有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牢固关系，中国不可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绽放异彩。与之类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战略必须由相关各方共同制定，产生并利用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进而与亚太地区建立可持续的互利关系。为此，各国必须发起推广跨国项目的贸易和投资计划，重点发展基础设施、物流、能源及科技行业。就此而言，通过合作制定次区域议程增强与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巴西在此方面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再往北部，墨西哥可在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协调配合中发挥类似作用。如前所述，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和南美洲与中国的关系截然不同。因此，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从本质上而言，这些国家不向中国出售初级商品，制造行业与中国生产的制成品在北美洲展开竞争。这两大因素共同导致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目前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利用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与北美市场的紧密关系，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此类紧密关系带来诸多优势，表明通过制定计划改善与北美及其他市场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物流条件将有助于加强墨西哥与中美洲的关系，以及中美洲地区内部的相互关系。中国在增长过程中产生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也影响了自2010年来墨西哥和中美洲制造业面对的竞争环境。因此，吸引中国投资推进落实中美洲项目不仅可帮助中美洲增强竞争力，而且有助于创造机会，建立中国与中美洲商业联系，进而改变目前双方相互竞争的格局。

拉丁美洲的出口规模持续上升，但多元化程度较低。中国是巴西和智利的第一大商品进口国，是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古巴及秘鲁的第二大商品进口国。中国对食品、能源、矿产及金属的巨大需求惠及出口此类

商品的国家，这些国家进而能够改善自身贸易条件并刺激增长。然而，中国和拉丁美洲地区在深化和丰富贸易及投资关系方面仍有广阔空间。

亚太地区对农产品和由自然资源制成的部分制成品征收高额关税——拉丁美洲在相关行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能对拉丁美洲地区造成不利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起正式启动，涵盖19亿人口，年贸易额达45亿美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取消了中国与东盟10个经济体之间的多数贸易关税。由于拉丁美洲出口至中国的若干类产品不得与受益于优惠关税制度的东盟产品展开竞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削弱拉丁美洲此类产品的竞争力。拉丁美洲的出口产品不仅要与亚洲进口产品竞争，还要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以及美国的进口产品（取决于产品类别）竞争。拉丁美洲地区在保持竞争力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必须加强自身在与自然资源（拉丁美洲地区在该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相关之亚洲价值链的地位。在这方面，与中国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协定以及在亚洲价值链领域的地区投资将相对补偿其他进口产品构成的威胁。

中国认识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提高出口多元化程度的需求。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最近访问阿根廷和巴西期间）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会长万季飞，均表达了上述观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正在利用与拉美国家建立的商会开展相关工作。同时，各国政府必须联手加强落实相关举措，同时制定旨在提高出口多元化程度的宏远计划，促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快速发展。

提高拉丁美洲与亚洲贸易的多元化程度将为开展产业内贸易和互惠投资创造更多机会。同样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应在建立区域和次区域价值链的过程中效仿亚洲的一体化经验。拉丁美洲国家还应加强在生产领域的相互关系，在技术领域开展合作，以期与亚洲新兴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为达到该目标，双方应制定共同的发展战略。

中国与拉丁美洲共同关心的另一个领域是吸引中国游客赴拉丁美洲地区旅游。除少数国家以外，大部分地区的旅游业较为落后，仍有巨大发展潜力。拉丁美洲和中国亟需共同制定旅游业推广措施，例如为本地区游客

交通出行提供便利、简化签证过程以及与中国酒店业共同制定合作计划<sup>5</sup>。此外，中国政府还提及两个地区之间有待加强合作的其他领域，例如银行、电信、交通运输、教育及医疗服务。

拉丁美洲地区必须消除贸易量上升与互惠投资规模较小之间的显著不对称现象。2010年，中国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额飙升，呈现出积极发展态势，但尚不能确定该上升趋势是否会长期存在。拉丁美洲地区政府应共同提出一揽子投资项目，吸引中资银行、企业以及中国政府的兴趣。中国对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投资不仅有助于增强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还会对其自身一体化进程产生积极的外部影响。基础设施领域最引人注目的项目是南美洲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IIRSA）和中美洲项目。

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首选投资国。这些国家的资金实力雄厚，可帮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能源、交通运输及物流等领域的发展计划填补资金缺口。由于预计未来5年内工业化国家将继续保持低利率水平且低增速，亚太国家应会重点关注上述项目。主要困难在于确定和评估项目，以制定能够最大程度利用亚洲投资的一揽子方案。

另一个有助于提高拉丁美洲国家的出口多元化程度及其中小企业出口领域参与度的渠道是获得中资银行提供的资金。此类资金可直接获得，亦可通过美洲开发银行（IDB）或安第斯开发协会（CAF）的专项资金获得。此类计划有助于减缓拉美地区出口至中国商品明显的“返祖”趋势。诚然，中国和拉丁美洲均不愿再次形成中心—外围关系，这种关系曾对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前景造成严重影响。

通过建立独具特色的地区推广和监督网络，为上述投资提供便利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关键举措。此类投资不仅有助于增加与亚太地区的贸易量，而且也有助于加快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因此，该地区应在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与亚太地区建立战略联盟。

此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必须评估亚洲，尤其

5 到2015年，中国游客数量将跃居全球第一。

是中国的生产一体化情况，同时努力加入近期形成的价值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还应培养自身在工程和生物技术领域（重点是两大领域的商品和相关商业服务）的比较优势。除了加入亚洲价值链，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应着重通过生产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制成品，提高出口多元化程度。采取以上措施有助于促进两个地区之间展开双向投资，建立类似于亚洲经济体之间相互密切依存为特点的贸易关系。为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政府应加大中国与本地区之间的投资力度。此外，各国政府还应促进本地企业与中国企业建立联盟，效仿亚洲经济体围绕区域和次区域供应链和价值链积累的生产一体化经验。

良好的经贸环境有助于重建和改善两个地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而言，两个地区有利的增长环境创造了宝贵机会，为与中国以及亚太地区建立全新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奠定了基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能够并且必须落实以下举措：①提高与亚太地区区域贸易的多元化程度；②在两个地区之间创建商业联盟；③提升相互投资水平，着力改善地方基础设施，提高本地区在亚洲价值链和供应链中的参与；④在创新、商业技术及人力资本方面加大合作力度，提高贸易多元化程度提升出口商品的价值和知识含量；⑤增进高层对话，在全球共同面对的相关问题上达成共识，例如多哈回合、气候变化、高效能源、寻找非常规可再生能源以及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

亚太地区、中国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应当共同制定对话、贸易合作及投资议程。该议程可包括以下内容：获取信息、贸易和投资促进、市场准入、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方面的进步、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区域一体化激励方案。例如，议程可包括以下措施。

①促进在采矿、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及科技领域签署投资和贸易协定。在以上各领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必须努力吸引相关各方为开展专业技术对话提供便利。这方面的合作有助于在能效、可再生能源、超净技术及气候变化等议题方面取得进展。中国正在以上领域采取重大举措。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企业、大学以及技术机构可在这些领域成立合资企业。

②针对机会和市场准入交换信息，包括基本经济指标、立法、投资和地区间贸易趋势、技术标准、卫生和

检疫措施、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重要的贸易保护制度。

③就以下方面交换信息：投资，包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双边、区域及多边投资协定；与投资项目相关的劳动和环境保护措施；包含投资奖励方案的计划；影响亚太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投资和经济活动的规章制度。

④落实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优先在两个地区的中小企业协会和多边开发银行之间建立制度联系，为风险资本、技术升级、培训活动以及联合或合作项目开拓新的融资渠道。

⑤通过三个领域的制度渠道建立对话关系：(a)贸易和投资促进政策，旨在确定和消除现有壁垒，确定与提升创新能力和知识水平并行不悖的可持续增长模式；(b)双边贸易争端或对国内或第三方市场特定产业竞争力构成的严重威胁，必须本着着眼长远、互补互利的原则，通过开展协议或仲裁谈判解决此类问题；(c)宣传两个地区的最佳实践，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和促进创新和区域一体化为导向。

目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应共同确定该地区与中国关系的发展重点<sup>6</sup>。该地区的国家政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制定区域（或次区域）议程，将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物流、旅游以及技术交流纳入各自针对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战略之中。该地区国家政府应在此类议程中利用亚洲经济体的发展活力创建稳定完善的可持续增长模式，该模式应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并且将创新作为主要着力点。反之，中国则可更有效地利用其巨额外汇储备支持上述投资活动。中国还可利用其参与区域多边金融活动的机会，选择提升拉丁美洲中小企业生产、技术及出口实力的项目。中国也可促进大学和技术机构开展更积极的交流，推进与商业组织之间就制定共同感兴趣的议程展开对话，通过对话和共享利益预见并避免贸易争端。

迄今为止，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加强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的主要手段。除了一些部长级和总统级的重要访问，拉丁美洲与亚洲国家之间的交往甚少，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与智利、墨

6 参见Osvaldo Rosales在第三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2009年11月25日，圣菲波哥大）上的发言（[www.cepal.org/comercio](http://www.cepal.org/comercio)）。

西哥、秘鲁以及中美洲若干国家之间签署的跨太平洋贸易协定。此类协定固然重要，但尚不足以激励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技术联盟，消除贸易额不对称现象以及提升互惠投资水平。各国应贯彻更加协调的战略，以加强贸易、投资、生产及技术领域的相互关系。此类战略应包括旨在提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竞争力、创新能力以及商业国际化水平的多种公私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8）。

2007年，拉丁美洲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展论坛（LAPA）（由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以及中美洲5个国家组成的联盟）成立，代表该地区为建立更紧密关系做出的初步努力。论坛的首要目标是面向亚太地区实施战略与合作举措（例如共同努力吸引亚洲投资基础设施和能源产品领域）以及通过实施诸如原产地累计规则等策略强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融合。上述举措仍处于早期阶段（Rosales, 2010）。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以及秘鲁于近期成立的拉美太平洋联盟（2011年4月）旨在改变拉丁美洲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展论坛工作进展缓慢的状况，是为建立紧密联盟的又一次努力。拉美太平洋联盟针对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以及其他领域的合资企业问题制定了更为宽泛的计划。

目前应通过提议成立互利战略联盟以确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关系的重点内容。中国业已制

定面向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并于2008年11月发表的《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也称《白皮书》）。该文件认识到拉丁美洲的发展潜力，并提议加强中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在政治和经济关系、社会、文化、法律以及社会安全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作为回应，拉丁美洲应尽快制定面向中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方针。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必须与中国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关系及时纳入本地区一体化（统一市场）的各个方面。第一，本地区必须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性。第二，应改善司法确定性以及合同义务的合规性，这对于集团间合作至关重要。第三，南美洲必须巩固和深化贸易协定网络，重点关注同质化、原产地累计、制度统一化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第四，必须在基础设施、能源、网络连通、创新以及贸易便利化方面深化区域合作。第五，政府和商业组织必须改善与本地区相关机构之间的关系，推进实施跨国项目，创建商业联盟以及成立联合技术企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面临的巨大挑战是通过改善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以提升国内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例如，可将生物技术运用于采矿、能源、渔业、林业、果业、葡萄酒业以及农用工业。本地区的几个国家在上述领域具有相当实力，可为合作项目吸引资本，并且推进与亚洲技术机构建立联盟。

#### 参考文献

-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0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owards a Strategic Relationship* (LC/L.3224-P), Santiago, Chile, May.
- \_\_\_\_\_ (2010b),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World Economy 2009-2010. A Crisis Generated in the Centre and a Recovery Driven by the Emerging Economies* (LC/G.246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0.II.G.5.
- \_\_\_\_\_ (2009), *Latin America in the World Economy 2008-2009. Crisis and Opportunitie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LC/G.2413-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9.II.G.62.
- \_\_\_\_\_ (2008), *"Opportunities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Asia-Pacific"* (LC/L.2971), Santiago, Chile, November.
- Goldman Sachs (2007), *BRICs and Beyond*, New York, Global Economics Department.
- Jenkins, Rhys and Enrique Dussel Peters (eds.) (2009),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onn,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 Maddison, Angus (2010),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online] <http://www.ggdcc.net/MADDISON/oriindex.htm>.
-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7),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Outlook 2008*, Paris.
- Rosales, Osvaldo (2010), "El dinamismo de China y Asia emergente: oportunidades y desafíos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Pensamiento iberoamericano*, No. 6, Madrid.
- \_\_\_\_\_ (2009), "Speech given at the Third China-Latin American Business Summit" (Bogotá, November 25) [online] <http://www.cepal.org/comercio>.
- \_\_\_\_\_ (2008), "G20 Summit and the road ahead", *China Daily*, Beijing, November 19.





## 关键词

出口  
进口  
制成品  
中国  
数据分析  
数学模型  
贸易数据

# 全球对华制成品 出口的决定因素 (1990~2006年)

*Roberto Álvarez E.、Eugenio Figueroa B.、  
María Pía Figueroa Z.和Macarena Palma E.*

## 本

研究分析了对华制成品出口的决定因素。根据1990~2006年间79个国家的数据和引力方程的估测，本研究分析了各国要素禀赋、地理特征及经济开放度的各自影响。分析结果符合要素丰裕度模型的特点，反映出人力资本禀赋程度较高的国家对华制成品出口较高。经济总量较大且与中国地理邻近的国家对华出口制成品的可能性也较高。分析结果未显示其他国家特征（例如贸易开放度、出海口以及单位劳动力土地或资本禀赋）具有重要影响力。本研究结果对希望通过丰富制成品出口种类以从生机勃勃的中国经济获益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Roberto Álvarez E.

智利中央银行金融政策部  
高级经济学家  
⇒ ralvarez@bcentral.cl

Eugenio Figueroa B.

智利大学  
经济学系教授  
⇒ efiguero@econ.uchile.cl

María Pía Figueroa Z.

智利大学经济学系  
副研究员  
⇒ mfiguero@fen.uchile.cl

Macarena Palma E.

智利大学经济学系  
副研究员  
⇒ mpalma@fen.uchile.cl



## 一、引言

过去20年间，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对外国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大幅上升。中国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也从过去的较低水平逐渐演变为如今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国的制成品贸易额占全球制成品贸易总额的15%左右（Lehmann、Moreno和Jaramillo，2007）。若保持这一快速发展势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华商品（尤其是中国缺乏竞争优势或发展前景的商品）出口额将继续飙升。

目前，发展中国家对华出口商品以原材料为主。然而，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和强劲增长的预期使中国将成为制成品出口领域颇具吸引力的市场。有鉴于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对华制成品出口的决定因素。根据1990~2006年间79个国家的数据，本研究首先说关于对华制成品出口的主要典型事实，之后利用引力模型验证其决定因素，其中重点分析了要素禀赋、地理变量、国际贸易开放度以及经济规模的作用。相关分析结果为发

现哪些国家（尤其是不太发达的国家）最有机会成为中国较大的出口制成品供应国提供了基础。

尽管许多文献研究了中国参与世界贸易产生的影响<sup>1</sup>，不过其中甚少涉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这一机会将其专业化结构转向制成品的的问题。这对大宗商品出口国尤为重要，此类易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的国家如果拥有更加多样化的出口结构，就可以即能减轻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本研究与Mesquita Moreira（2007）的研究目的类似。Moreira指出中国是拉丁美洲在制成品贸易领域的强劲竞争对手。但本研究与其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探讨了中国能否成为主要的制成品出口目标市场，而且我们研究的国家样本更多。

本研究共分五部分。引言之后的第二部分分析对华制成品出口的演变。第三部分介绍信息源及其具体说明。第四部分介绍并讨论引力模型估测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

## 二、对华出口

中国充满经济活力，过去17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这反映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市场活动具有深远意义。在长期实行贸易封锁政策之后，邓小平主导的经济改革大大降低了贸易壁垒。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额也因此显著上升。

如图1所示，1990~2006年，中国的进口额从530亿美元升至略高于7900亿美元，其中同期制成品进口额从410亿美元升至略高于5700亿美元（图2）。

我们的问题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分享中国贸易增长的情况如何。图3显示，总体而言，各国和地区均受益于中国市场机遇，对华出口额获得大幅提升。北美对华出口额从80.3亿美元升至669.6亿美元；亚洲其

他国家和地区对华出口额从115.4亿美元升至3158.4亿美元；大洋洲对华出口额从14.8亿美元升至206.1亿美元；欧洲对华出口额从66.3亿美元升至884.3亿美元；非洲对华出口额从2.4亿美元升至65.3亿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华出口额从11.7亿美元升至335.2亿美元。表1为以上结果概要。

对华出口商品构成和制成品的相对重要性值得关注<sup>2</sup>。图4显示1990~2006年各地区对华制成品出口额在其对华出口总额中的所占比重。如图所示，欧洲的占比最高，平均达82%。亚洲的占比也大幅上升，从1990

□ 本文作者对Mario Cimoli、Filipa Correia和Daniel Titelmann提供的帮助以及Osvaldo Kacef、Joseluis Samaniego和Luis Yáñez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1 本章及下文采用的是Leamer（1984）改进的制成品分类方法，该方法的细节如附录。

2 参见Blázquez-Lidoy、Rodríguez和Santiso（2006）、Claro（2006）、Devlin、Esteveadoral和Rodríguez-Clare（2006）以及Rosales和Kuwayama（2007）的近期研究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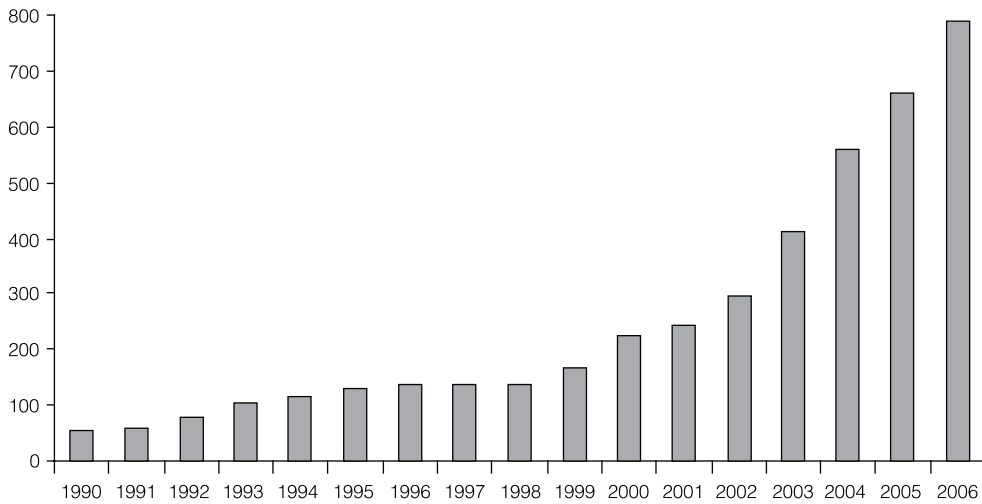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进口总额，1990~2006年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的数据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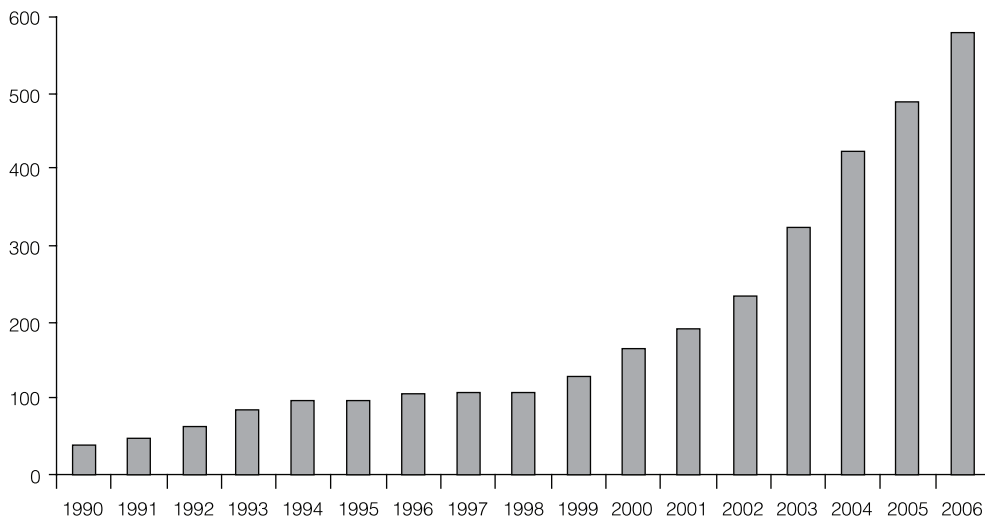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制成品进口额，1990~2006年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的数据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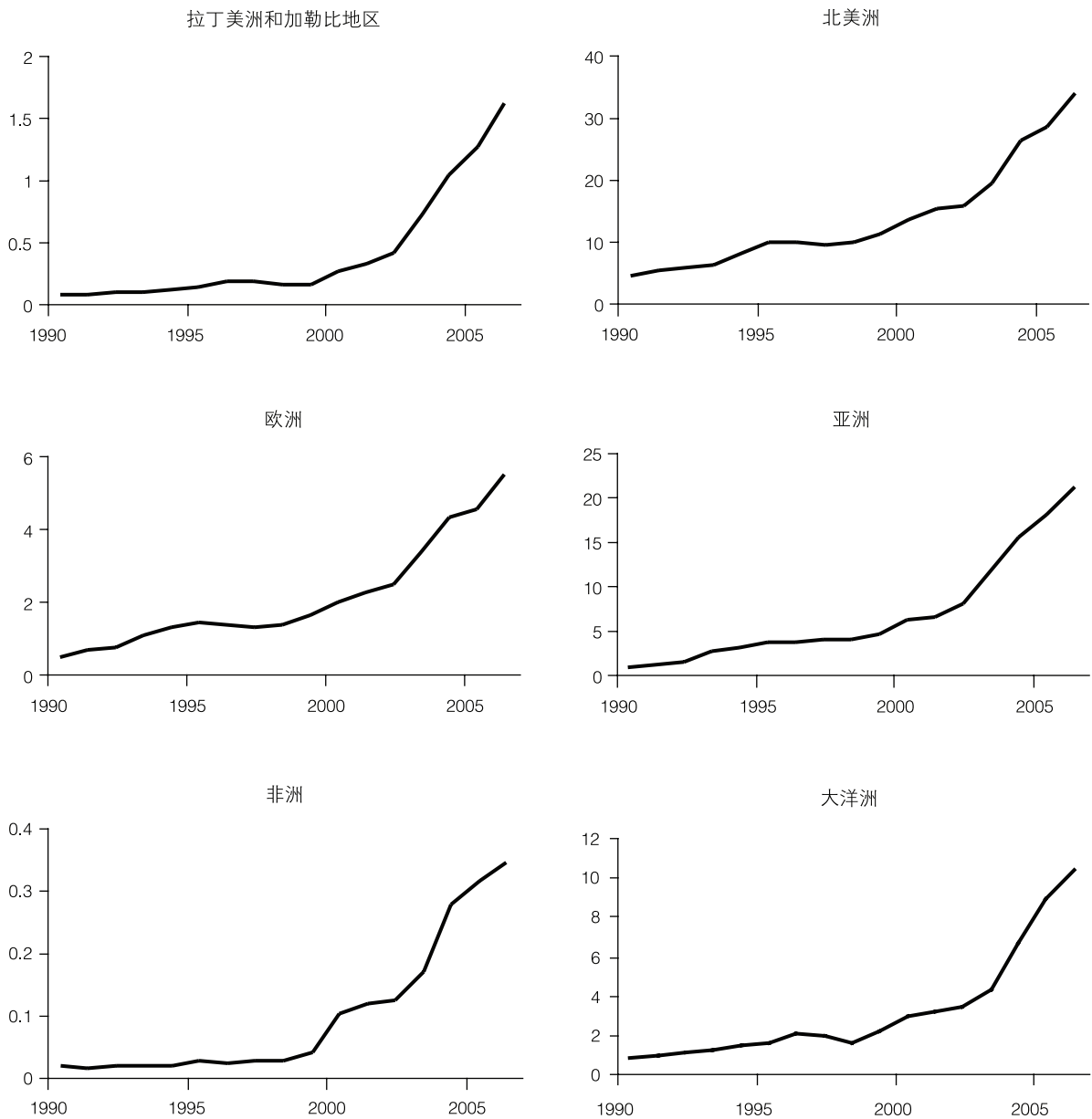


图3 各地区对华出口额，1990~2006年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的数据编制。

年的41%升至2006年的67%，而北美洲2006年占比升至61%。大洋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占比均未超过41%，其中大洋洲占比上升，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比则出现下降。

总体而言，对华制成品出口的演变似乎体现了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Leamer, 1995）原理，即较为富裕的国家（即拥有丰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国家）在制成品生产领域具有比较优势。此外，以上

演变似乎还表明欧洲和北美大国专注于制成品的出口（Perkins和Syrquin, 1989）。

表2更加详细地说明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中国制成品进口中的比重。该表显示从整体看该比重极小且持续下降。其中20世纪90年代较大国家在中国制成品进口的比重也出现下降。巴西占比从0.74%降至0.43%、阿根廷从0.36%降至0.09%、墨西哥从0.34%降至0.31%，但2006年回升至0.53%。

表1 1990~2006年对华出口额

| 地区         | 1990<br>(10亿美元) |      | 2006<br>(10亿美元) |     | 1990~2006年变动<br>(百分比) |       | 年增长率 <sup>a</sup><br>(百分比) |       |
|------------|-----------------|------|-----------------|-----|-----------------------|-------|----------------------------|-------|
|            | 总计              | 制成品  | 总计              | 制成品 | 总计                    | 制成品   | 总计                         | 制成品   |
| 北美洲        | 8.03            |      | 66.96           |     | 734                   |       | 13.89072                   |       |
| 亚洲         | 11.54           |      | 315.84          |     | 2 637                 |       | 20.38544                   |       |
| 大洋洲        | 1.48            |      | 20.61           |     | 1 293                 |       | 19.31248                   |       |
| 欧洲         | 6.63            |      | 88.43           |     | 1 234                 |       | 17.77355                   |       |
| 非洲         | 0.24            |      | 6.53            |     | 2 621                 |       | 24.75957                   |       |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1.17            |      | 33.52           |     | 2 765                 |       | 19.61709                   |       |
| 所有国家       | 53.3            | 41.5 | 791             | 576 | 1 384                 | 1 288 | 16.36                      | 15.59 |

注：<sup>a</sup> 1990~2006年期间年增长率几何平均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的数据编制。

表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国家）：在中国制成品进口总额中的占比，1990~2006年  
(该时期之平均百分比)

| 国家          | 时期        |           |           |           |           |           |
|-------------|-----------|-----------|-----------|-----------|-----------|-----------|
|             | 1990~1992 | 1993~1995 | 1996~1998 | 1999~2001 | 2002~2004 | 2005~2006 |
| 阿根廷         | 0.36      | 0.18      | 0.15      | 0.13      | 0.14      | 0.09      |
|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巴西          | 0.74      | 0.68      | 0.28      | 0.29      | 0.58      | 0.43      |
| 智利          | 0.02      | 0.01      | 0.03      | 0.03      | 0.03      | 0.05      |
| 哥伦比亚        | 0.00      | 0.00      | 0.00      | 0.01      | 0.02      | 0.05      |
| 哥斯达黎加       | 0.00      | 0.00      | 0.00      | 0.01      | 0.19      | 0.35      |
| 厄瓜多尔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萨尔瓦多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危地马拉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圭亚那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洪都拉斯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牙买加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墨西哥         | 0.34      | 0.11      | 0.14      | 0.31      | 0.59      | 0.53      |
| 尼加拉瓜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巴拿马         | 0.00      | 0.01      | 0.00      | 0.00      | 0.00      | 0.00      |
| 巴拉圭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秘鲁          | 0.01      | 0.00      | 0.01      | 0.00      | 0.00      | 0.01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1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0.01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 乌拉圭         | 0.27      | 0.08      | 0.07      | 0.06      | 0.03      | 0.02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0.05      | 0.01      | 0.01      | 0.01      | 0.05      | 0.04      |
| 总计          | 1.80      | 1.08      | 0.69      | 0.85      | 1.63      | 1.58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的数据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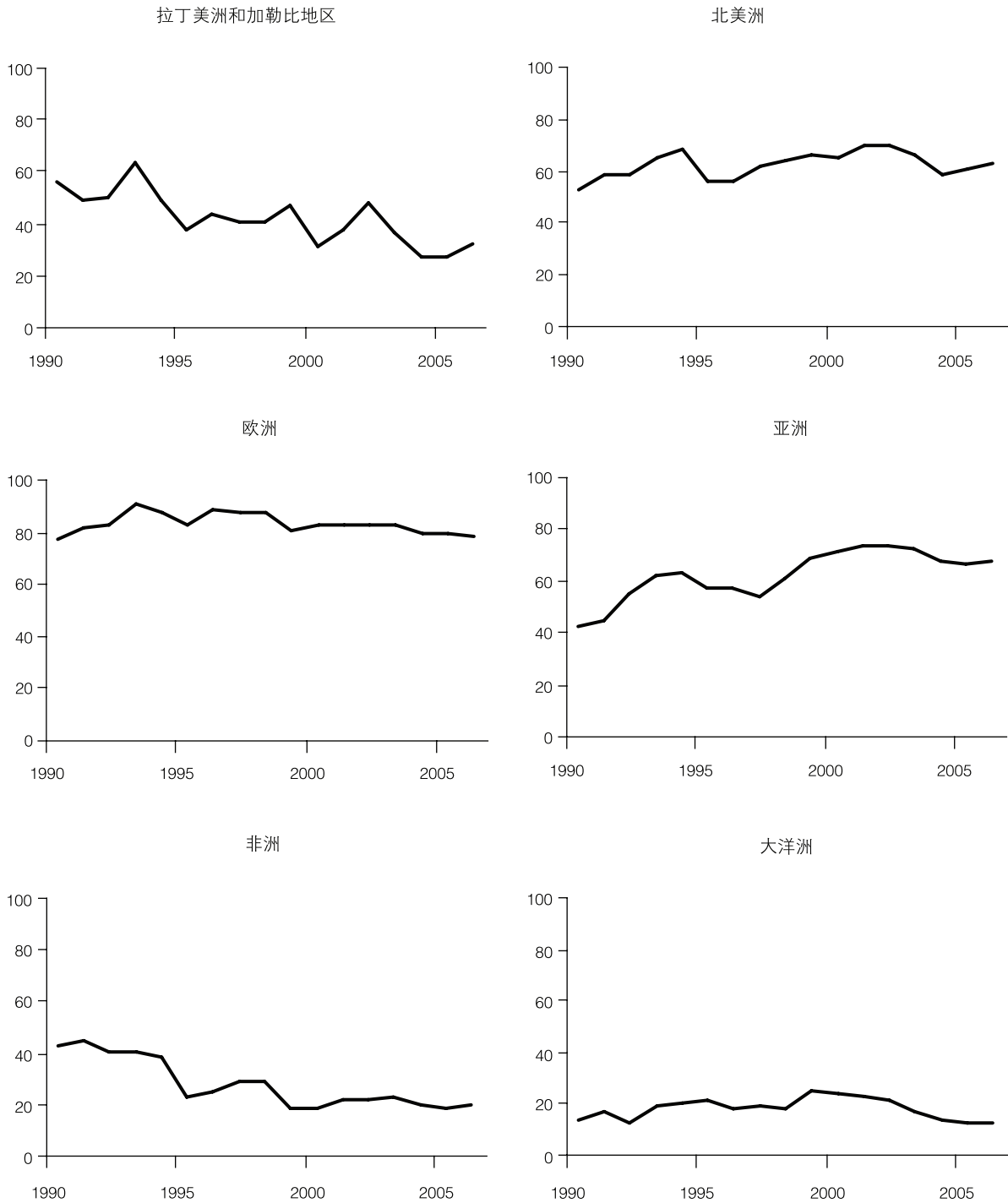


图4 1990~2006年各地区对华制成品出口额  
(占对华出口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的数据编制。

### 三、实证分析

#### 1. 模型设定

引力模型是确定商品贸易及数量重要性的决定因素过程中使用最广泛且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该模型由 Tinbergen (1962) 首先提出, 广泛用于下列问题的解决: 优惠协定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Baier和Bergstrand, 2007)、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 (Rose, 2004) 和电子商务的决定因素 (Blum和Goldfarb, 2006) 等。

基本方程如下:

$$X_{ij} = a_0 (GDP_i)^{a_1} (GDP_j)^{a_2} (DIST_{ij})^{a_3} e^{a_4 BORD_{ij} + a_5 LANG_{ij}} \varepsilon_{ij} \quad (1)$$

其中,  $X_{ij}$  表示国家  $i$  对国家  $j$  的出口额,  $GDP_i$  表示国家  $i$  的国内生产总值,  $DIST$  表示两国之间的距离,  $BORD$  和  $LANG$  表示拥有共同边界和语言国家的分类变量。

对方程两边求对数, 可得:

$$\ln(X_{ij}) = a_0 + a_1 \ln(GDP_i) + a_2 \ln(GDP_j) + a_3 \ln(DIST_{ij}) + a_4 BORD_{ij} + a_5 LANG_{ij} + \varepsilon_{ij} \quad (2)$$

本研究分析了基于1990~2006年期间可获得信息, 79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参见附录2国家列表)。可对以上引力模型进行扩展, 以此确定不变地理因素 (例如距离和共同边界) 和其他变化因素 (相关国家规模、要素禀赋及贸易政策) 在对华制成品出口变化的作用大小。

为了分析其他地理变量、要素禀赋及贸易关税壁垒的影响, 作者扩展了方程 (2), 增加了拥有出海口之出口国家的分类变量。在要素禀赋方面, 方程将有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自然资源的估测数据纳入其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衡量标准是15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比率。基于 Leamer (1987) 和 Schott (2003) 的研究, 将单位劳动力可耕地面积用于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贸易壁垒由各出口国平均进

口关税表示<sup>3</sup>, 该变量反映了对相关出口国的贸易开放度, 而非中国设置的进口壁垒。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如果一国密集使用其最丰富的生产要素, 那么其产品则获得比较优势, 由此我们将教育、单位劳动力资本量以及自然资源丰裕度变量纳入方程。罗伯津斯基定理假设制成品属于资本密集型商品, 那么对华制成品出口量应反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差异。换言之, 资本更大的国家的对华出口应更多。通过扩展以上基本模型, Leamer (1987) 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度会影响一国经济发展进程, 使其不太可能在制成品的生产上获得比较优势。有鉴于此, 单位劳动力土地面积作为控制变量被纳入方程。

除了距离、平均关税及自然资源丰裕度, 所有解释变量均具有正面预期结果。这是因为预计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共同语言和边界、出海口、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以及较高的单位劳动力物质资本将有助于增加一国制成品出口额。

在79个国家的1343个观察结果中, 关于对华出口的123个观察数据之结果等于零。鉴于如求对数, 这些观察数据将被忽略不及, 从而丢失相关信息, 因此本研究采用了另一常用可选自变量  $\ln(1+X)$ 。

#### 2. 数据来源

本研究贸易数据取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COMTRADE)<sup>4</sup>, 该数据库是按行业划分的, 即四位数字行业 (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 (第2版)) 的进出口双边贸易详细信息。考虑到本研究主要分析的是1990~2006年期间的制成品出口情况<sup>5</sup>, 因此采用了 Leamer (1984) 设计的制成品分类法。贸易流

3 所有变量均为对数计算值。

4 参见 comtrade.un.org。

5 可获得自1962年以来的所有数据, 但由于1990年之前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规模较小, 该阶段的分析意义不大。

量与Rose（2004年）一样以名义美元计，并使用美国批发物价指数进行平减。

对各国要素禀赋使用了不同的信息源。关于语言、距离、是否拥有出海口以及毗邻性的数据来自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sup>6</sup>。关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农业用地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编制的《世界发展指数》，关于教育水平和单位劳动力资本量的数据来自Bosworth和Collins（2003）。关于进口关税（用于衡量贸易开放程度）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表3列举了估算时所采用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6 参见<http://www.cepii.org/anglaisgraph/bdd/bdd.htm>。

表3 关于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变量           | 观察数据  | 平均数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 Ln（1+出口额）    | 1 343 | 8.77  | 5.00  | 0      | 18.17 |
| Ln（距离）       | 1 343 | 9.11  | 0.54  | 6.91   | 9.86  |
| 出海口          | 1 343 | 0.86  | 0.35  | 0      | 1     |
| 毗邻性          | 1 343 | 0.03  | 0.16  | 0      | 1     |
| 共同语言         | 1 343 | 0.03  | 0.16  | 0      | 1     |
| Ln（可耕地）      | 1 343 | -0.9  | 1.12  | -7.68  | 2.06  |
| Ln（国内生产总值）   | 1 264 | 24.52 | 2.01  | 19.91  | 30.03 |
| 教育           | 1 343 | 6.62  | 2.83  | 0.79   | 12.12 |
| Ln（单位劳动力资本量） | 1 343 | -5.07 | 2.77  | -13.82 | -1.2  |
| 平均关税         | 1 343 | 13.02 | 10.28 | 0      | 94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B. Bosworth和S.M. Collins，“The empirics of growth: an update”，《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集》，第34卷第2期，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2003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

## 四、估算结果

本章说明了引力模型的结果。表4列有不同时间段的横截面估测数据。为减少每年的波动（例如某些产品价格变化或短暂冲击）对估算质量的影响，以3年为一个时间段。由于部分相关变量，如距离和共同语言，不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而且会被出口国的固定效应抵消，因此，我们没有使用一个数据面板生成估测数据。

衡量出口国与中国之间距离的变量为负值，且数据在所有模型中均具有意义，参数值为-1.98至-1.47之间。根据此前预测，距离中国越远，贸易成本越高，对华出口额则越低。为根据以上估测定量分析距离的重要性，我们利用一个拉美国家和一个亚洲国家

与中国之间的平均距离以及与相对应的同一时间段的估算参数计算这两个国家出口差异。计算该出口额差值的方程如下：

$$\partial \ln(X) = -1.47[\ln D_{LA} - \ln D_{ASIA}] = 1.91 \quad (3)$$

该结果表明，若拉美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距离和亚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距离相等，那么拉美国家对华出口额将增加190%以上。

如同所预计的一样，与中国语言相同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从第二阶段开始其贡献值显著大于零。该结果符合此前关于语言相同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较高的研究结果（Rose，2004）。



在本研究时间段内，毗邻性变量数据并不显著。预期结果为正值，因为相邻国家之间贸易成本较低，从而更偏向开展互惠贸易。然而，样本中的79个国家中仅有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与中国接壤。另一个地理要素似乎对制成品出口没有影响，即出口国是否有出海口。

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丰裕度（此处以土地/资本率衡量）看起来并没有显著影响研究时间段内对华制成品的出口。尽管有可能存在衡量自然资源禀赋的更合适的变量，但没有获得本研究时间段内的样本国家。

出口国家的经济规模（根据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估算值为正，且数据在所有研究时间段内有意义。经济规模之所以影响较大，可能归因于制成品生产存在规模经济（Perkins和Syrquin，1989），也可能是较大的国家的每种商品出口量通常都较高（Hanson和Xiang，2004）。为了解经济规模能够产生的结果，我们挑选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巴西两个经济规模分别

位列样本后10%和前10%的国家。根据上一阶段的估计数据，我们计算了两国制成品出口额之间的百分比差值：

$$\partial \ln(X) = -1.618[\ln(GDP_{Brazil}) - \ln(GDP_{T\&T})] = 6.53 \quad (4)$$

以上数据表明，经济规模可导致制成品出口能力出现显著差异。

总体而言，以上结果似乎相当符合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衡量人力资本丰裕度的变量与制成品出口额正相关。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为正值，该数据在所有时间段（第一阶段除外）均有意义。因此，出口差异可通过拉丁美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平均教育水平进行说明。鉴于相关参数在不同时间段有所不同，且某些情况下没有意义，因此本研究使用了四个时间段的平均数。结果显示，若拉美中等水平国家与欧洲中等水平国家的教育水平相当，则其出口额将上升近35%。此外，单位劳动力资本变量在所有时间段内均无意义。

表4 横截面估计数据，1990~2006年

| 变量             | 1990~1992                      | 1993~1995                      | 1996~1998                      | 1999~2001                      | 2002~2004                      | 2005~2006                      |
|----------------|--------------------------------|--------------------------------|--------------------------------|--------------------------------|--------------------------------|--------------------------------|
| Ln（距离）         | -1.781 <sup>a</sup><br>(0.529) | -1.980 <sup>a</sup><br>(0.430) | -1.981 <sup>a</sup><br>(0.409) | -1.876 <sup>a</sup><br>(0.417) | -1.511 <sup>a</sup><br>(0.481) | -1.469 <sup>a</sup><br>(0.535) |
| 共同语言           | 2.083<br>(1.279)               | 2.104 <sup>b</sup><br>(0.997)  | 2.764 <sup>a</sup><br>(0.829)  | 3.310 <sup>a</sup><br>(0.493)  | 3.571 <sup>a</sup><br>(0.474)  | 3.557 <sup>a</sup><br>(0.511)  |
| 毗邻性            | 0.734<br>(1.454)               | 1.425<br>(1.135)               | 2.812 <sup>c</sup><br>(1.416)  | 0.908<br>(1.600)               | 0.817<br>(1.476)               | 0.00422<br>(1.406)             |
| 出海口            | -0.135<br>(1.053)              | 0.392<br>(0.758)               | -0.259<br>(0.723)              | -0.455<br>(0.693)              | -0.774<br>(0.704)              | -0.650<br>(0.686)              |
| Ln（单位劳动力可耕地）   | 0.163<br>(0.260)               | 0.218<br>(0.215)               | 0.211<br>(0.208)               | 0.365<br>(0.360)               | 0.282<br>(0.388)               | 0.155<br>(0.410)               |
| Ln（国内生产总值）     | 1.288 <sup>a</sup><br>(0.175)  | 1.339 <sup>a</sup><br>(0.153)  | 1.289 <sup>a</sup><br>(0.164)  | 1.581 <sup>a</sup><br>(0.150)  | 1.528 <sup>a</sup><br>(0.148)  | 1.618 <sup>a</sup><br>(0.154)  |
| Ln（教育）         | 0.302<br>(1.165)               | 1.731 <sup>b</sup><br>(0.793)  | 2.308 <sup>a</sup><br>(0.712)  | 2.098 <sup>a</sup><br>(0.751)  | 2.274 <sup>a</sup><br>(0.717)  | 1.264 <sup>b</sup><br>(0.540)  |
| Ln（单位劳动力资本量）   | 0.253<br>(0.221)               | 0.0499<br>(0.149)              | 0.0577<br>(0.150)              | -0.0218<br>(0.132)             | -0.0282<br>(0.174)             | -0.0453<br>(0.162)             |
| Ln（平均关税）       | 0.0182<br>(0.567)              | -0.372<br>(0.387)              | -0.444<br>(0.347)              | 0.326<br>(0.456)               | 0.389<br>(0.397)               | 0.313<br>(0.418)               |
| 常数             | -5.890<br>(8.942)              | -8.099<br>(7.239)              | -7.590<br>(7.072)              | -16.81 <sup>a</sup><br>(6.122) | -18.17 <sup>a</sup><br>(6.255) | -18.68 <sup>a</sup><br>(6.262) |
| 观察数量           | 79                             | 79                             | 78                             | 77                             | 77                             | 77                             |
| R <sup>2</sup> | 0.687                          | 0.810                          | 0.817                          | 0.777                          | 0.754                          | 0.730                          |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性标准误。

<sup>a</sup> p < 0.01, <sup>b</sup> p < 0.05, <sup>c</sup> p < 0.1。

资料来源：由作者编制。

最后，根据平均进口关税衡量的贸易开放度结果，未显示开放度较高国家的对华制成品出口量更大。这一结果显然需谨慎的分析，因为无法获得样本国家的相关信息，我们的估算并未将例如非关税限制措施等其他贸易壁垒纳入考虑。但是由于多数国家过去几十年间都实

行经济开放政策，因此我们的结果也可能符合关税壁垒不再是制成品出口主要障碍的观点。Wacziarg和Horn-Welch（2003）的研究结果也显示，1990~2000年间，对国际贸易实行开放政策的经济体占比已从略高于40%升至73%。

## 五、结论

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以及作为原材料和制成品等高级加工商品主要消费国的重要地位，为全球各出口国创造了大量机会。对于旨在利用比较优势和参与国际市场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规模庞大且迅速发展的中国是越来越重要的潜在需求来源地。

本研究旨在运用包含与国家地理条件、要素禀赋以及贸易政策相关变量的引力模型，发现对华制成品出口方面的决定因素。

研究结果反映了三个基本要素的重要性：出口国与中国之间的距离、要素禀赋以及经济规模。鉴于经济规模对于经济部门出台的政策是相对的外生性因素，本研究主要探讨距离以及要素禀赋因素。

虽然距离因素对国家经济也是外生性因素，但相关政策可减少该因素对贸易、尤其是制成品出口的消极影响。事实上，运输成本对贸易的消极影响意味着远离中国以及其他全球贸易中心的国家处于天生劣势地位。这些国家必须通过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抵消这一劣势。就此而言，拉丁美洲国家面临的挑战比具地理优势的国家更大。有关完善公路基础设施（尤其是连接制造中心与出口港之间的道路）、开展设备升级以及提高港口和机场现代化和机械化水平的公共政策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建造必要公共基础设施即可获得经营权的政策可免于投资资金的限制，而在拉美，部分国家严重缺乏资金。此外，提高海关系统和出口认证机制的效率并消除腐败的政策也将大有裨益，此类系统有时也会导致出口

企业成本上升。相应地，针对这些问题，相关提高公共服务部门透明度、国家官员培训以及推动并建立专业化公共服务（实行任人唯贤的政策，不受政治影响支配）的政策和计划任重道远。在某些国家，由于抢劫运输商的现象日渐增多，产品和商品的运输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应采取改善控制以及加强安保和警力的政策以降低出口企业成本，尤其是制成品企业，因为制成品企业是这类不法行为最常见的目标。

最后，要素禀赋对制成品出口影响的研究发现表明，不太发达的国家在改变其出口商品专业化类型中面对的挑战。为了成为制成品出口国，这些国家必须增加其人力资本禀赋。对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必须制定政策为其人口接受各类教育和培训创造更多机会。其中大多数国家还须增加2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同时制定和实施相关公共政策建设基础设施以及儿童保健和托儿机构，以为这20%最贫困人口中的母亲参加工作以及儿童较早接触培养学习技能的环境创造条件。展望未来，教育质量似乎已成为拉美地区最重要的变量，对已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取得进步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这是公共政策的巨大难题，即便对资源没有拉美那么匮乏的发达国家而言，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培训领域存在类似挑战，尤其是在职培训。公共和民间领域可共同制定可切实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计划的政策，例如，对投入大量人力和资源开展劳动力培训和提高专业化水平的企业和生产部门实施减税政策。

## 附录1 Leamer商品分类法

| 制成品分类       |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
|-------------|----------|
| 劳动密集型       |          |
| 非金属矿产       | 66       |
| 家具          | 82       |
| 旅行用品、手袋     | 83       |
| 服装          | 84       |
| 鞋类          | 85       |
| 日杂用品        | 89       |
| 邮政包装, 未分类   | 91       |
| 特殊交易, 未分类   | 93       |
| 硬币 (非黄金)    | 96       |
| 资本密集型       |          |
| 皮革          | 61       |
| 橡胶          | 62       |
| 纺织纱线、织物     | 65       |
| 钢铁          | 67       |
| 金属 不另作说明    | 69       |
| 卫生设备和配件     | 81       |
| 机械          |          |
| 发电          | 71       |
| 专业          | 72       |
| 金属加工        | 73       |
| 一般工业        | 74       |
| Office和数据处理 | 75       |
| 电信和声音       | 76       |
| 电气          | 77       |
| 道路车辆        | 78       |
| 其他运输车辆      | 79       |
| 专业和科学仪器     | 87       |
| 摄影器材        | 88       |
| 枪械和弹药       | 95       |
| 化学品         |          |
| 有机          | 51       |
| 无机          | 52       |
| 印染和制革       | 53       |
| 医药产品        | 54       |
| 香精和香料       | 55       |
| 肥料          | 56       |
| 炸药和烟火       | 57       |
| 人造树脂和塑料     | 58       |
| 化学材料 不另作说明  | 59       |

资料来源: E.E. Leamer,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第77期,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 1995年。

## 附录2

| 国家名称          | 国家代码 | 国家名称             | 国家代码 |
|---------------|------|------------------|------|
| 阿尔及利亚         | DZA  | 马达加斯加            | MDG  |
| 阿根廷           | ARG  | 马里               | MLI  |
| 澳大利亚          | AUS  | 马拉维              | MWI  |
| 奥地利           | AUT  | 马来西亚             | MYS  |
| 孟加拉国          | BGD  | 毛里求斯             | MUS  |
| 比利时           | BEL  | 墨西哥              | MEX  |
|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 BOL  | 摩洛哥              | MAR  |
| 巴西            | BRA  | 莫桑比克             | MOZ  |
| 喀麦隆           | CMR  | 荷兰               | NLD  |
| 加拿大           | CAN  | 新西兰              | NZL  |
| 智利            | CHL  | 尼加拉瓜             | NIC  |
| 哥伦比亚          | COL  | 尼日利亚             | NGA  |
| 哥斯达黎加         | CRI  | 挪威               | NOR  |
| 科特迪瓦          | CIV  | 巴拿马              | PAN  |
| 塞浦路斯          | CYP  | 巴基斯坦             | PAK  |
| 丹麦            | DNK  | 巴拉圭              | PRY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DOM  | 秘鲁               | PER  |
| 厄瓜多尔          | ECU  | 菲律宾              | PHL  |
| 埃及            | EGY  | 葡萄牙              | PRT  |
| 萨尔瓦多          | SLV  | 卢旺达              | RWA  |
| 埃塞俄比亚         | ETH  | 塞内加尔             | SEN  |
| 芬兰            | FIN  | 新加坡              | SGP  |
| 法国            | FRA  | 南非               | ZAF  |
| 德国            | GER  | 西班牙              | ESP  |
| 加纳            | GHA  | 斯里兰卡             | LKA  |
| 希腊            | GRC  | 瑞典               | SWE  |
| 危地马拉          | GTM  | 瑞士               | CHE  |
| 圭亚那           | GUY  | 坦桑尼亚 ( 联合共和国 )   | TZA  |
| 洪都拉斯          | HND  | 泰国               | THA  |
| 印度尼西亚         | IDN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TTO  |
| 印度            | IND  | 突尼斯              | TUN  |
| 伊朗 ( 伊斯兰共和国 ) | IRN  | 土耳其              | TUR  |
| 爱尔兰           | IRL  | 乌干达              | UGA  |
| 以色列           | ISR  | 英国               | GBR  |
| 意大利           | ITA  | 美国               | USA  |
| 牙买加           | JAM  | 乌拉圭              | URY  |
| 日本            | JPN  | 委内瑞拉 ( 玻利瓦尔共和国 ) | VEN  |
| 约旦            | JOR  | 赞比亚              | ZMB  |
| 肯尼亚           | KEN  | 津巴布韦             | ZWE  |
| 韩国            | KOR  |                  |      |

资料来源：由作者编制。

## 附录3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变量

| 变量     | 说明       | 原始资料来源                    |
|--------|----------|---------------------------|
| X      | 出口额      |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 DIST   | 距离       | 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                 |
| SEA    | 出海口      | 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                 |
| BORD   | 毗邻性      | 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                 |
| LANG   | 语言       | 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                 |
| LAND   | 可耕地      |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
| WFORCE | 劳动力      |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
| R      | 单位劳动力可耕地 |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
| EDU    | 受教育年限    | BOSWORTH和COLLINS ( 2003 ) |
| KL     | 单位劳动力资本量 | BOSWORTH和COLLINS ( 2003 ) |
| OPEN   | 进口关税     | 世界银行 <sup>a</sup>         |

注：回归模型中的变量以自然对数表示。

<sup>a</sup> 数据来源：<http://go.worldbank.org/LGOXFTV55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 ( CEPII )；B. Bosworth和S.M. Collins, “The empirics of growth: an update”, 《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集》，第34卷第2期，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2003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 COMTRADE )。

## 参考文献

- Álvarez, R. and J.R. Fuentes (2006), "Paths of development, specializa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abundance", Working Paper, No. 383, Santiago, Chile, Central Bank of Chile, December.
- Baier, S.L. and J.H. Bergstrand (2007), "Do free trade agreements actually increase members'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71, No. 1, Amsterdam, Elsevier.
- Blázquez-Lidoy, J., J. Rodríguez and J. Santiso (2006), "Angel or demon? China's trade impact o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CEPAL Review*, No. 90 (LC/G.2323-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Blum, B. and A. Goldfarb (2006), "Does the Internet defy the law of grav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70, No. 2, Amsterdam, Elsevier.
- Bosworth, B. and S.M. Collins (2003), "The empirics of growth: an updat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34, No. 2,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Claro, S. (2006),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merge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region. Background paper: Chile", *Integration and Trade*, No. 24, Buenos Aires, Institut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TAL)/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 January/July.
- Devlin, R., A. Estevadeordal and A. Rodríguez-Clare (2006), *The Emergence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David Rockefeller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Feenstra, R.C. and others (2004), "World trade flows: 1962-2000",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04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Hanson, G. and C. Xiang (2004), "The home market effect and bilateral trade patter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 No. 4,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Leamer, E.E. (1995),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7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_\_\_\_\_ (1987),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good n-factor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5, No. 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_\_\_\_\_ (1984),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and Evid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Lehmann, S., D. Moreno and P. Jaramillo (2007), "China, commodity prices and Latin American performance: a few stylized facts", Working Paper, No. 424, Santiago, Chile, Central Bank of Chile, August.
- Mesquita Moreira, M. (2007), "Fear of China: is there a future for manufacturing in Latin America?", *World Development*, vol. 35, No. 3, Amsterdam, Elsevier.
- Perkins, D.H. and M. Syrquin (1989), "Large countries: the influence of size",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2, Amsterdam, Elsevier.
- Rosales, O. and K. Kuwayama (2007), "Latin America meets China and India: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CEPAL Review*, No. 93 (LC/G.2347-P), Santiago, Chile.
- Rose, A. (2004), "Do we really know that the WTO increases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 No. 1,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Schott, P.K. (2003), "One size fits all? Heckscher-Ohlin specialization in global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3,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Tinbergen, J. (1962),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Suggestions for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 Wacziarg, R. and K. Horn Welch (2003),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growth: new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15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December.



## 关键词

大宗商品  
国际贸易  
供给与需求  
中国  
大宗商品价格  
出口  
出口收益  
统计数据  
拉丁美洲

# 大宗商品价格和拉丁美洲 出口收益的“中国效应”

*Rhys Jenkins*

## 在

2002~2008年间，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一度繁荣，该现象对拉丁美洲增加出口收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刺激该时期大宗商品市场繁荣的要素之一是中国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众多学者已就拉丁美洲对华出口额上升的直接影响展开广泛研究，但却鲜少关注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增长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本文估算了中国的需求增长对该地区出口的15种主要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产生的影响。根据以上数据，本文还计算了全球价格领域的“中国效应”对拉丁美洲地区整体出口收入增长所做的贡献。此外，本文还估算了由中国因素引起的价格走高现象对17个拉丁美洲国家贸易平衡所产生的净效应。

Rhys Jenkins

英国诺里奇东安格利亚大学

国际发展学院教授

⇒ R.O.Jenkins@uea.ac.uk



## 一、引言

自本世纪初以来，得益于大宗商品市场的日益繁荣以及随之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步伐不断加快。在2002~2008年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根据多方研究结果，中国乃至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增长的经济增长，以及初级产品净进口额的上升，是造成以上现象的关键原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5，第II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第5章；Streifel，2006；Park和Zhai，2006；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06；Cheung和Morin，2007）。尽管2008年年中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曾一度走低，然而由于中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推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需求增长是导致近期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然而，几乎没有估算中国对具体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程度的相关研究。反之，学术界更多关注在中国对全球需求增长所做的贡献，或大宗商品价格与中国经济活动之间愈加紧密的相互关系。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06）对中国对原油和铝价格产生的影响开展研究，是一个例外，但其研究的大宗商品较少。

就拉丁美洲而言，若干研究对近年来中国和拉丁美

洲产出活动的同步性不断提高进行了研究（Lehmann等，2007；Cesa-Bianchi等，2009；Calderón，2009）。研究表明“需求溢出”是同步性提高的主要因素，“需求溢出”主要反映了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而非拉丁美洲与中国之间双边贸易的扩大。因此，深入探讨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对于认识中国崛起为拉丁美洲地区重要经济伙伴的影响至关重要。

本文旨在估算中国经济腾飞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对拉丁美洲出口收益增幅的影响。第二部分介绍拉丁美洲出口的主要大宗商品，分析中国对这些商品需求的增长情况以及国际价格的上升态势。第三部分阐释用于计算中国对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之贡献度的局部均衡方法以及采用的相关数据。第四部分运用实证分析法估算中国需求对在2002~2007年间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产生的影响。第五部分估算中国在需求飙升进而促使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出口收益的增幅。第六部分深入分析上述因素对拉美地区国家产生的影响。结论部分总结研究结果并将之与中国与拉美直接贸易的影响作比较。

## 二、拉丁美洲大宗商品出口情况与“中国效应”

尽管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在20世纪后半叶大力推进工业发展，然而该地区至今仍高度依赖大宗商品出口。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的相关数据，拉丁美洲2007年大宗商品出口额占该地区当年出口收益总额的一半以上。在不考虑墨西哥的情况下，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大宗商品出口占比更高，相当于出口总额的2/3以上。与我们的预测一致，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表现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密切相关（Lehmann、Moreno及Jaramillo，2007）。

出于研究目的，本文分析了2007年拉丁美洲出口额

表1 拉丁美洲：大宗商品出口情况，2007年

| 产品类别     | 大宗商品      |
|----------|-----------|
| 能源       | 原油        |
| 矿物、矿石及金属 | 铜；铁矿石；铝；锌 |
| 饲料       | 大豆；豆油；鱼粉  |
| 热带食品和饮料  | 咖啡；蔗糖；香蕉  |
| 肉类产品     | 牛肉；家禽     |
| 林业产品     | 木料；木浆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二次修订版编制。

最高的15种大宗商品<sup>1</sup>。这些商品可分为性质不同的六大类（参见表1）。

2007年，这15种产品在拉美的出口额约为2600亿美元，占该地区初级产品出口总额的2/3，占出口收益总额的1/3左右。

中国逐渐成为拉丁美洲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大宗商品出口的重要市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8，第1.8章；Gallagher和Porzecanski，2009；Rosales和Kuwayama，2007，第85页）。目前，中国是多类大宗商品的全球主要消费国，其需求在全球需求总量中占有相当大份额。

与其他研究结果相同（例如Streifel，200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第5章），表2显示“中国效应”对全球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矿物、矿石及金属领域。中国的国民收入已达到一定水平，金属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显著上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5，图2.2）。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随着中国将生产重心从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服装）转向资本密集型行业（例如电气电子），中国对金属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Cheung和Morin，2007）。此外，建筑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也持续推动金属产品需求的上升（世界银行，2009，专栏2.5）。

与我们的预测一致，中国对全球铁矿石需求增加的贡献度最高，其铁矿石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40%以上。由于中国在2002年铁矿石消费量的初始比例高于在全球消费总量中的所占份额，且在2002~2007年间，该份额大幅上升，也因此这一时期的全球需求走高。促使中国铁矿石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是中国钢铁业的快速成长。2002~2007年，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份额从1/5升至1/3，从而从钢铁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国际钢铁协会，2004和2008）。此外，纵使不像铁矿石的明显，中国在其他金属（铜、铝及锌）消费量的增加也对全球需求上升起到了助推作用。

继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经济改革后，中国在八九十年代以后的能源消费量增长步伐慢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速度。但自2000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能源

**表2 中国大宗商品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份额，2002年和2007年**  
(百分比)

|                 | 中国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份额 |      | 价格涨幅      |
|-----------------|-----------------|------|-----------|
|                 | 2002            | 2007 | 2002~2007 |
| <b>燃料</b>       |                 |      |           |
| 原油              | 6.9             | 9.3  | 185.1     |
| <b>矿物、矿石及金属</b> |                 |      |           |
| 铁矿石             | 22.3            | 43.9 | 184.7     |
| 铜               | 18.2            | 27.1 | 356.5     |
| 铝               | 21.1            | 33.2 | 95.4      |
| 锌               | 22.4            | 32.4 | 316.4     |
| <b>饲料</b>       |                 |      |           |
| 大豆              | 18.4            | 20.9 | 80.6      |
| 豆油              | 21.2            | 25.9 | 85.1      |
| 鱼粉              | 23.0            | 27.5 | 83.6      |
| <b>热带食品与饮料</b>  |                 |      |           |
| 咖啡              | 0.3             | 0.4  | 125.6     |
| 蔗糖              | 7.9             | 9.3  | 46.4      |
| 香蕉              | 8.8             | 9.4  | 28.6      |
| <b>肉类产品</b>     |                 |      |           |
| 牛肉              | 10.6            | 12.3 | 22.6      |
| 家禽              | 16.8            | 17.2 | 23.9      |
| <b>林业产品</b>     |                 |      |           |
| 锯木              | 4.0             | 8.6  | 63.6      |
| 化学纸浆            | 5.7             | 7.8  | 55.5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以下文件中的价格数据计算中国消费量所占份额：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8），《2008年贸易与发展报告》，日内瓦，表2.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08.II.D.21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强度再次上升（Cheung和Morin，2007，第4页）。此外，主要能源消费类型煤炭的占比持续下降，原油、天然气以及水力发电等其他能源的占比则出现上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5，第49~50页）。原油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自2002年以来，中国原油需求占全球需求总量的份额不断上升（参见表2）。

除矿物和金属之外，中国的饲料消费量也在全球消费总量中占据较高份额。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上升以及消费模式的转变，中国对动物饲料（包括水产养殖中的鱼饲料）的需求快速上升。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每人每日卡路里摄入量已经相对较高，居民对肉、鱼、植物油以及水果的消费量攀升，尤其是城镇地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5，第45页）。目前，中国已成为大豆和鱼粉的主

1 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二次修订版0-4和68类别定义大宗商品。

要市场，其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份额不断上升。

如表1所示，中国肉类产品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份额相对较低，这一结果在上述背景下或许令人惊讶。家禽方面，2004年爆发的禽流感导致在2002~2007年间中国对家禽的需求低迷<sup>2</sup>。牛肉方面，中国的人均消费量约为美国的1/10、欧盟27国平均水平的1/4（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服务处，全球分析办公室）。因此，尽管中国占全球需求总量的份额不断上升，但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林业产品方面，随着中国国内造纸业和包装业产能的增长，其化学纸浆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份额持续上升。在1995~2004年间，中国纸张消费量增长1倍以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06，表4-3）。这主要是受到制造业对包装材料的巨大需求的推动。但是部分制造企业使用由废纸生产的包装材料，废纸使用量近年来的上升速度快于纸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06，表4-1和4-2）。因此，中国占全球纸浆需求的份额或许低于预期水平。

自2002年以来，中国锯木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份额增幅超过木浆（参见表2）。非法砍伐行为普遍存在，受到广泛关注，官方统计数据从而可能降低了进口额。因此，中国对全球木材需求的影响可能超过已公布的数字（英国国际发展部，2005）。

中国尚不是全球热带农业产品市场的重要消费国。中国的咖啡消费量仍处于极低水平，较为常见的香蕉和蔗糖几乎全部产自国内。因此，中国这两类产品消费量出现的增长基本上不会对全球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表2还显示在2002~2007年间多数大宗商品价格飙升。金属（以铜和锌为代表）和原油价格上升的幅度最大。饲料价格也明显走高，但是这是主要是种植生物燃料原料作物的土地需求上升所致（世界银行，2009，第61~63页）。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幅度较小。

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然而，直至21世纪初，中国方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产生显著影响。因为虽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强度和金属强度下降，但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得到扭转

（Cheung和Morin，2007；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5，第47~49页）。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经济改革，中国的产业效率不断提高，工厂的能源和金属消费量下降。同时，中国的产业重心从重工业（计划经济时期）转向轻工业（出口导向型市场经济实行初期）。在此过程中产业构成的变化也导致中国能源和金属消费量下降。然而，如前述，中国近期将产业重心转向包括道路建设和建筑工程在内的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在此背景下，自本世纪初以来，金属和能源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弹性呈现上升态势。

此外，由于诸多大宗商品需求超过国内供应，过去十年间中国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关系更加紧密<sup>3</sup>。铜、铁矿石、镍、原油以及大豆等大宗商品的净进口额飙升即是印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图2.8）。另一方面，就供给而言，中国可基本保持自给自足，因此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极小。

最后，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中国需求的增速，还取决于其占全球消费总量的初期份额，而且直至21世纪初，中国才成为影响诸多主要大宗商品价格的重要消费国。例如，Calderón（2009，第54页）表示“2002~2003年代表着中国产值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关系的转折时期”。

尽管本文的重点是研究中国需求增加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但必须谨记中国需求增加并不是近年来影响价格的唯一因素。就需求面而言，其他大宗商品市场也实现增长，而且中国对不同大宗商品全球需求增幅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相近替代品的价格波动也对需求构成影响。

供给面因素也对价格构成显著影响，供给状况受气候因素影响的农产品尤其如此。所有大宗商品可能都会受供给曲线的投入成本变化的影响。原油和矿物会受新资源发现情况的影响。此外，原油和矿物可能还会因产地的政治冲突或劳工骚乱而中断。

除了实体经济的供求因素，金融因素也会对大宗商品价格构成影响。由于大宗商品价格通常以美元计价，美元汇率的变化会影响报价。2002年美元达到最高点，

2 2004年，中国人均家禽消费量下降，此后缓慢回升（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服务处，全球分析办公室）。

3 例如，中国国内铁矿石产量占国内消费量的百分比从1990年的85%降至2003年的45%（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5，第74页）。

到2007年年末下降了25%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专栏1.4）。以美元计算，2002~2007年期间大宗商品价格（原油除外）上升了113%，以特别提款权（SDR）计算仅上升了80%（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8，表2.1）。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若美元汇率保持2002年的水平，2007年年末的每桶原油价格将较实际价格低25美元（比当时实际水平低25%以上），非燃料大宗商品价格则比实际价格低12%。

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投机活动所产生的影响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各界普遍认为，近年来金融投资对众多大宗商品市场的重要性上升（世界银行，2009，第2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9，第2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5类大宗商品（原油、铜、蔗糖、咖啡和棉花）所做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该结论饱受诟病）：几乎无证据表明，投机活动对长期价格水平或短期波动性构成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6，专栏5.1）。反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认为，投机活动数量上升或许加快并扩大了价格波动。

本文无意估计上述因素在近年来对大宗商品价格所构成的影响。本文将重点分析中国需求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同时运用局部均衡方法分析中国需求对全球价格产生的首轮效应。

### 三、方法与数据

分析的第一步，是确定中国增长对从拉丁美洲出口的大宗商品之全球需求量的影响。分析时期为从2002年大宗商品牛市开始至2007年。由于2008年牛市结束时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以及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缺少2008年的贸易数据，因此本文并未分析2007年之后的情况。表3所列的15种大宗商品全球需求和对中国需求基于多个资料来源。

若干可能存在的反事实可运用在估计全球需求领域的“中国效应”。一种可能性是对比2007年每类大宗商品的全球实际需求与剔除中国的需求，相当于“中国不存在”的反事实。第二种方法是单纯计算在2002~2007年间中国每类大宗商品的消费量，并从全球需求总量中减去该数字。该方法意味着中国消费量保持不变或“中国不增长”的反事实。然而，由于我们希望了解中国需求的飙升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的影响，更合适的反事实是中国的需求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同样的增速。因此，对2007年15种大宗商品全球需求的假设基于2002~2007年期间中国需求的增幅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同的前提<sup>4</sup>。根据该数字与2007年实际需求之间的差值，我们可估算自2002年以来，中国卓越的经济表现对相关产品的全球需求增幅中的贡献。本文采用该方法。

该方法的局限性之一，是假设中国需求的增幅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增幅无关。针对该假设的第一个异议如下：如果中国的快速增长推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上升，那么中国增速放缓也将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放缓。问题是：中国的需求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长影响有多大？<sup>5</sup>在2003~2007年间，中国需求在全球需求总量中的占比较小，平均为4.6%（Timmer，2010，表1），说明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需求的影响相当有限。

第二个异议：就具体的大宗商品而言，中国需求的增长或许部分归因于某些产业从其他国家转移至中国，而非全球大宗商品需求的上升。例如，中国铁矿石需求飙升的部分归因于全球钢铁业转移至中国，则其他国家的铁矿石需求相对降低。因此，中国铁矿石需求的额外增长或许并不代表全球需求额外增长。中国需求的增幅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需求的增幅无关的隐含假设并非严格有效。

上述第一个异议说明，忽视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的“中国效应”，容易导致低估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产生的总体影响，第二个异议的含义则与之相

4 这一反事实可称作“中国占比未上升”情景。

5 该问题对目前关于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讨论来说至关重要。关于反面观点，请参见Dollar（2009）和Timmer（2010）。



反。虽然没有理由假设两类效应一定可相互抵消，但两类效应在相反方向产生作用，间接效应可能小于直接效应，部分程度上说明此处不应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用于计算中国的快速增长对大宗商品价格之影响的反事实，假定以上探讨的其他影响价格因素（例如供给曲线移动、汇率变化以及投机活动）保持不变。换言之，作者关注的问题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中国需求占全球需求总量的份额与2002年相同，2007年大宗商品的价格低于实际水平的幅度。事实上，这意味着需求曲线下移的反事实，因此，对价格的影响取决于各类大宗商品的全球供给弹性。

关于相关大宗商品的全球供给弹性的估测数据极难获得，现有估测数据的范围通常较大。鉴于此，本文采用了弹性范围值而非单一值用于计算对全球价格的影响。随后将弹性数据应用于估算中国的快速增长对各类大宗商品全球需求的贡献，以此获得对全球价格影响的数据。

最后，在剔除中国对价格的推高作用后，利用2007年拉丁美洲各类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出口额降幅计算中国对全球需求的影响给拉丁美洲带来的收益。其中考虑了由于在2002~2007年间中国需求过度增长导致价格上涨，拉丁美洲地区2007年出口价值下降的因素。整个拉美地区使用了出口总额数据，以获得“中国效应”为拉丁美洲带来额外出口收益的估测数据（参见表5）。然而，由于拉丁美洲地区各国可能是上述大宗商

品的净出口国或净进口国而受到不同影响，因此针对国家层面的估测使用的是净出口额数据。因此，此类数据可反映价格变化对贸易平衡产生的影响（表6）。对于作为某种受中国需求影响导致该大宗商品价格猛涨的净进口国而言，后者必然为负值。

关于各类大宗商品全球和中国消费量的数据基于多个资料来源。原油消费量数据源自《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08》，铁矿石消费量数据源自国际钢铁协会的《世界钢铁数据》（多期），其他矿物数据源自世界金属统计局的《世界金属统计数据》。肉制品、粮食、肉类、食用油及蔗糖数据源自美国农业部对外农业服务处，林业产品、咖啡及香蕉数据源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本文采用的弹性估测数据来源于大量数据的搜寻（参见附录）。由于分析时期仅为5年且价格上涨主要集中于后期阶段，研究过程中采用了中短期供给弹性数据，此类数据通常低于长期弹性数据。以往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反映本世纪初的供给弹性，因此，必须根据近期关于相关大宗商品的供给的研究结果合理判断并确定弹性估测数据的可信范围。

为了估测拉丁美洲经济体出口收益和贸易平衡方面的“中国效应”，本文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采集了2007年17个国家15种大宗商品的进出口额。作者没有找到委内瑞拉2007年的出口数据，因此采用了该国2006年和2008年每类大宗商品出口额的平均值。

## 四、大宗商品价格的“中国效应”

### 1. 中国对全球需求上升的贡献度

如上所述，估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中国效应”的第一步工作是，计算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增加的全球需求。换言之，此处研究的问题是：若在2002~2007年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保持相同增速，各类大宗商品的全球需求将比实际水平增加多少？

表3前两列对比在2002~2007年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大宗商品消费量的增长情况。除家禽之外，中国所有大宗商品需求的增速均快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一点可从中国此类产品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

量的份额上升得到反映（如表2所示）。表3第三列是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保持相同增速的假设前提下，各类大宗商品的全球消费量高出实际水平的幅度。换言之，该列计算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快速增长对全球需求的影响程度。

一如所料，表3显示额外需求层面的“中国效应”主要集中在以铁矿石为代表的矿物、矿石及金属等领域。饲料领域的影响程度其次。额外需求对原油和林业产品领域的影响相对有限。在热带食品和饮料以及肉类产品的领域中，中国需求增长产生的影响最小。

**表3 中国需求对全球需求的影响程度，2007年**  
(百分比)

|          | 消费增幅2002~2007 |           | 中国的需求效应 <sup>a</sup> |
|----------|---------------|-----------|----------------------|
|          | 中国            | 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 |                      |
| 燃料       |               |           |                      |
| 原油       | 48.7          | 6.6       | 2.7                  |
| 矿物、矿石及金属 |               |           |                      |
| 铁矿石      | 224.9         | 19.5      | 38.4                 |
| 铜        | 77.6          | 6.1       | 12.3                 |
| 铝        | 124.3         | 20.4      | 18.2                 |
| 锌        | 70.7          | 2.9       | 14.8                 |
| 饲料       |               |           |                      |
| 大豆       | 37.2          | 17.7      | 3.1                  |
| 豆油       | 54.2          | 18.4      | 6.4                  |
| 鱼粉       | 24.8          | -1.9      | 6.3                  |
| 热带食品与饮料  |               |           |                      |
| 咖啡       | 32.3          | -1.9      | 0.1                  |
| 蔗糖       | 30.6          | 9.2       | 1.5                  |
| 香蕉       | 25.0          | 17.0      | 0.6                  |
| 肉类产品     |               |           |                      |
| 牛肉       | 27.1          | 7.2       | 2.0                  |
| 家禽       | 21.6          | 18.7      | 0.4                  |
| 林业产品     |               |           |                      |
| 锯木       | 131.8         | 2.8       | 5.0                  |
| 化学纸浆     | 45.0          | 3.3       | 2.3                  |

注：<sup>a</sup> 该数字为在2002~2007年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保持相同增速的假设前提下，2007年大宗商品全球消费高出实际水平的幅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表2资料来源编制。

**表4 中国需求对世界价格水平的估测影响，2007年**

|      | 中国需求的影响<br>(百分比) | 供给价格弹性 |      | “中国效应”<br>(百分比) <sup>a</sup> |      |
|------|------------------|--------|------|------------------------------|------|
|      |                  | 低      | 高    | 最大值                          | 最小值  |
| 原油   | 2.7              | 0.1    | 0.25 | 27.1                         | 10.8 |
| 铁矿石  | 38.4             | 0.25   | 0.4  | 153.6                        | 96.0 |
| 铜    | 12.3             | 0.1    | 0.25 | 122.6                        | 49.1 |
| 铝    | 18.2             | 0.25   | 0.4  | 72.8                         | 45.5 |
| 锌    | 14.8             | 0.1    | 0.25 | 147.6                        | 59.1 |
| 大豆   | 3.1              | 0.4    | 0.6  | 7.7                          | 5.1  |
| 豆油   | 6.4              | 0.4    | 0.6  | 16.0                         | 10.7 |
| 鱼粉   | 6.3              | 0.4    | 0.6  | 15.6                         | 10.4 |
| 咖啡   | 0.1              | 0.1    | 0.4  | 0.5                          | 0.2  |
| 蔗糖   | 1.5              | 0.1    | 0.5  | 15.5                         | 3.1  |
| 香蕉   | 0.6              | 0.2    | 0.4  | 3.0                          | 1.5  |
| 牛肉   | 2.0              | 0.3    | 0.6  | 6.6                          | 3.3  |
| 家禽   | 0.4              | 0.3    | 0.6  | 1.4                          | 0.7  |
| 锯木   | 5.0              | 0.2    | 0.6  | 25.1                         | 8.4  |
| 化学纸浆 | 2.3              | 0.2    | 0.6  | 11.5                         | 3.8  |

注：<sup>a</sup> 该数字为在2002~2007年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保持相同增速的假设前提下，2007年大宗商品的全球消费高出实际水平的幅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表3以及附录中资料的弹性估测数据编制。

## 2. 全球价格的“中国效应”

需求效应的大小并非是决定中国需求增长对各类大宗商品全球价格之影响的唯一因素。该影响程度还由全球供给对需求增加的响应程度、一体化全球市场的覆盖范围以及中国与该市场的融合度决定。

表4第二列和第三列列有各类大宗商品供给弹性区间高低端的估算数据。由于涉及中短期范围，此类数据相对较低，反映难以在短期内增加供给，原油和部分矿产品领域尤其如此。生长期较长之树木作物（例如咖啡树和木材）的供给弹性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家畜和谷物的供给弹性较高。

就金属而言，短期供给弹性取决于可用于提高产量和库存水平的产能。以铜为例，20世纪90年代铜价较低，因此产能投资规模极小，以至于在2002年之后需求上升时导致供给出现不足，库存量从2002年年末的170万公吨骤降至2006年的70万公吨（智利铜业委员会(COCHILCO)，2008）。这一点可从供给弹性较低的估测值得到印证。锌的情况与之相似。近年来，锌的需求超过供给量，在2003~2006年间，库存量降低一半（国际铅锌研究小组）。大部分锌来自地下作业，由于产能扩张的资本成本较高，现有锌矿提高产量存在困难（Williams援引Harlyn Meade博士，2007）。

铁矿石和铝假设的供给弹性更高。相比铁矿石，铜和锌的供给形势似乎更加乐观，其产能近年来大幅提升（Ostensson，2005）。与其他矿产相反，铁矿石的价格由主要生产商与进口商之间的谈判而非商品交易所决定，因此投机活动不会对价格构成影响。最后，铝的产能扩大（特别是在中国）意味着产能保持在一定水平，在2002~2006年间的库存未显著下降（美国地质勘探局，矿产品年鉴：铝）。

此外，原油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供给问题，高价并未促使产能扩大，反而导致原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有效闲置产能自2002年之后出现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图1.18）。原油行业供给面响应不力是归因于价格上涨与扩大投资的滞后时间比过去更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理和技术因素，例如油田平均规模缩小以及开采深海油田或油砂等非常规资源面临诸多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专栏1.5）。与铜类似，

这表明原油的供给弹性估测值较低。

农产品生长期普遍较短，因此短期供给弹性高于原油和矿产品。但咖啡树等树木作物和林业产品不同，它们的生长期长达数年。大豆等一年生作物的供给量对价格上涨的响应相对较快，因为可利用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转种大豆。例如，由于全球需求上升，阿根廷和巴西的大豆种植面积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扩大了一倍（Ray，2008）。

表4第四列和第五列根据第二列和第三列的供给弹性计算出中国需求上升对全球价格水平的影响。第四列基于第二列供给弹性低端得出区间高端，第五列基于第三列的弹性高端得出可能对价格产生的最小影响。

四类金属受影响最大。当然这四类大宗商品的价格在整个时期上涨的幅度也最大，自2002年以来，锌和铜的价格上涨四倍，铁矿石和铝分别上涨近三倍和近两倍（参见表2）。

据估计，由于中国铁矿石的需求增长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增速，导致全球价格水平上升一倍，但正如前述，就中国需求上升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下降而言，以上估算数据过高。就铜和锌而言，由于供给无弹性，全球价格水平方面的“中国效应”明显。与此同时，由于供给弹性较高，估计对铝价的影响略低。总体而言，由于中国的需求上升，估计价格至少上涨40%。

根据估算，“中国效应”对四类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介于10%~25%。就原油而言，尽管中国需求占全球需求总量的比重相对较小，但由于比重在整个时期上升以及供给弹性较低，价格深受中国需求增长的影响。然而，由于该时期原油价格涨幅超过180%，显然其他因素在推动价格上涨方面的作用远大于中国<sup>6</sup>。其他三类产品包括豆油、鱼粉及锯木。就前两类而言，这反映中国此类产品的消费量在全球消费总量中占有较高份额，而该时期中国锯木的消费量占全球消费总量的份额则快速上升。

就其他所有大宗商品而言，估计该时期中国需求对价格的效应不到10%。中国近年来大豆需求的增长获得

6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针对1995~2004年期间的研究得出类似结论，该委员会估计原油价格若上涨200%，其中12%~37%归因于中国需求量的增长（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06，第A.6页）。



了主要是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种植面积扩大的支持。直至2007年以后，生产生物燃料作物的土地竞争（尤其是美国）愈加激烈，导致大豆价格飙升（Ray，2008）。

中国需求对热带食品和饮料价格的影响很小。表4所列的咖啡（由中国导致的估算的价格涨幅可忽略不计）和香蕉（由中国导致的估算的价格涨幅相对较小）数据即反映了这一点。蔗糖方面的估算数据高得多，但考虑到中国并非重要进口国，而且全球蔗糖市场高度分散（归因于优惠协议），中国不太可能对全球蔗糖产品的价格产生实质影响。

相对而言，肉类产品价格未受中国需求状况影响。如

前述，禽流感对中国家禽的消费量造成影响。中国牛肉需求上升，不过对价格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牛肉是2002年以来所有产品类别中价格涨幅最小的类别（参见表2）。

如上所述，就林业产品而言，中国的需求状况对化学纸浆价格的影响不大，对锯木价格的影响更大。就锯木而言，非法木料贸易规模未计入中国木料消费估算数据，导致“中国效应”未得到显现，由此造成中国需求状况的影响被低估。另一方面，运输成本较高意味着锯木市场具有明显的地区化特征，中国进口的锯木主要来自俄罗斯和东南亚。因此，中国需求上升产生的价格影响基本不会波及拉丁美洲国家。

## 五、拉丁美洲出口收益的“中国效应”

最后，本文需计算中国需求的快速增长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对拉丁美洲出口收益增幅的影响。表5是基于15种大宗商品做出的估算。第一列代表2007年的出口额。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是“中国效应”（推高全球价格）对拉丁美洲大宗商品出口额影响的估测值高端和低端。第四列为最佳估测值，大部分为第二列和第三列数值区间的中点。就蔗糖和香蕉而言，最佳估测是基于中国未对拉丁美洲出口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最可行假设。

表5显示两类大宗商品——原油和铜——约占大宗商品价格领域“中国效应”推高出口总收入的3/4。这两类大宗商品的贡献基本相当，尽管拉丁美洲原油出口总额远高于铜。这反映了如前文已述，中国需求对铜价的影响超过对原油价格的影响。铁矿石的重要性排名第三，占外汇收益增幅总额的10%左右，其次是铝和锌。

就贡献度而言，紧随其后的是大豆和豆油，但这两类产品领域创造的额外出口收益相对有限，2007年的总额介于12亿~17亿美元之间。排在饲料之后的出口产品类别是林业产品，其新增的外汇收益总额估计介于4.5亿~12亿美元之间，木材和纸浆约各占一半。

肉类产品出口收益领域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其中牛肉的额外收益占主要部分，家禽的额外收益几乎为零。最后，如上所示，中国对全球热带水果和饮料的价格几乎未产生影响。因此，为了获得更加实际的总额，

忽略香蕉和蔗糖方面的估计效应合乎情理。

中国需求对拉丁美洲所有15种大宗商品出口收益的总体影响估计为410亿~730亿美元，最佳估值超过560亿美元，占2007年所有15种大宗商品出口额的21%以及拉丁美洲出口总额的7%。

对于以上估算值，需注意下列问题。首先，由于取自多个来源的弹性估值未必准确，应将估算值视作数量级而非精确值。将各类大宗商品的假设弹性提高一倍会导致预估效应减少一半。由于对总体影响产生主要作用的大宗商品（原油和金属）领域的弹性较低，或许将导致中国对拉丁美洲出口收益的影响被高估。

可能导致高估价格和出口收益领域“中国效应”的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的需求增长可能并不总是会导致全球需求增长。由于以某种大宗商品为原料的产业转移至中国，那么部分增幅被其他市场的需求下降所抵消。金属领域最有可能发生此类情况，金属占额外收益总估算值的大部分。

第三个因素是为了计算新增出口收益，此处所列估值基于拉丁美洲地区15种大宗商品的出口总额。但有些国家也进口以上部分大宗商品，因此分析净进口额而非总进口额更加合适。若采取该方法，大宗商品价格的“中国效应”将使拉丁美洲地区新增的出口收益估算值下降16%左右（340亿~610亿美元，而非410亿~730亿美元）。

**表5 中国：对拉丁美洲15种大宗商品出口收益的影响估算值，2007年**  
(百万美元)

|           | 出口额            | 中国对出口额影响的估算值  |               |               |
|-----------|----------------|---------------|---------------|---------------|
|           | 2007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最佳值           |
| 原油        | 129 294        | 27 580        | 12 651        | 20 116        |
| 铁矿石       | 11 585         | 7 016         | 5 674         | 6 345         |
| 铜         | 50 494         | 27 815        | 16 618        | 22 217        |
| 铝         | 6 587          | 2 775         | 2 060         | 2 418         |
| 锌         | 4 789          | 2 856         | 1 779         | 2 317         |
| 大豆        | 11 237         | 799           | 546           | 672           |
| 豆油        | 6 509          | 898           | 627           | 763           |
| 鱼粉        | 1 970          | 266           | 186           | 226           |
| 咖啡        | 8 584          | 43            | 17            | 30            |
| 蔗糖        | 6 251          | 838           | 188           | 0             |
| 香蕉        | 3 273          | 95            | 48            | 0             |
| 牛肉        | 6 596          | 407           | 210           | 308           |
| 家禽        | 4 708          | 65            | 33            | 49            |
| 锯木        | 3 279          | 657           | 253           | 455           |
| 化学纸浆      | 5 422          | 558           | 200           | 379           |
| <i>总计</i> | <i>260 579</i> | <i>72 670</i> | <i>41 090</i> | <i>56 295</i>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编制。

## 六、大宗商品博弈过程中的赢家与输家

前文的分析内容主要围绕中国大宗商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拉丁美洲的整体影响。然而，正如前述，中国对不同大宗商品的影响不同，中国大宗商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拉丁美洲地区各国的影响各不相同。具体而言，对于上述大宗商品净出口国而言（尤其是矿产品和原油），此类影响具有正面意义。但部分净进口国可能蒙受损失。本章将分析范围延伸至拉丁美洲国家层面。

本章将通过表4计算的价格变动情况估算各国15种大宗商品净出口额的外汇收益。因此，对于进口受“中国效应”导致价格上涨的大宗商品的国家而言，其外汇收益出现下降，而对于净出口国而言，其外汇收益则上升。

表6总结了17个拉美国家2007年的相关结果。该表显示在中国对这15种大宗商品需求在全球的占比持平于2002年的情况下，各国大宗商品贸易差额高于（低于）实际水平的百分比。同前文，此处列出的两类估算值是基于各类大宗商品价格弹性的高端和低端。

本章将拉美国家分为四类。首先是从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受益较多的国家，“中国效应”使其外汇收益增

**表6 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净出口收益的影响估算值，2007年**  
(百分比)

| 国家               | 最大值         | 最小值         |
|------------------|-------------|-------------|
| 阿根廷              | 11.9        | 6.9         |
| 玻利维亚             | 40.0        | 23.8        |
| 巴西               | 16.0        | 11.9        |
| 智利               | 47.8        | 28.8        |
| 哥伦比亚             | 9.1         | 3.3         |
| 厄瓜多尔             | 17.4        | 7.9         |
| 墨西哥              | 16.2        | 6.7         |
| 巴拉圭              | 7.2         | 4.4         |
| 秘鲁               | 48.2        | 29.3        |
| 乌拉圭              | -9.4        | -3.9        |
| 委内瑞拉             | 21.4        | 10.1        |
| <i>墨西哥和南美洲小计</i> | <i>23.8</i> | <i>13.3</i> |
| 哥斯达黎加            | -13.3       | -7.5        |
| 萨尔瓦多             | -37.0       | -19.0       |
| 危地马拉             | 3.4         | 0.1         |
| 洪都拉斯             | 3.6         | 1.6         |
| 尼加拉瓜             | -14.9       | -7.5        |
| 巴拿马              | -9.3        | -7.6        |
| <i>中美洲小计</i>     | <i>-6.0</i> | <i>-4.0</i> |
| <i>拉丁美洲总计</i>    | <i>23.3</i> | <i>13.0</i>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编制。

加20%~50%。此类国家包括秘鲁、智利及玻利维亚，主要出口矿产品。第二类由三个原油出口大国（委内瑞拉、墨西哥及厄瓜多尔）和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多样化程度最高的两个国家（巴西和阿根廷）组成，其外汇收益增加7%~20%。另有四个国家在“中国效应”下所实现的增长较小，其外汇收益的增幅低于10%，其中包括两个中美洲国家（其外汇收益增幅极小）、以及哥伦比亚和巴拉圭。最后，中国需求对五个国家大宗商品价格的净影响为负，其中包括四个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及巴拿马）和乌拉圭。总体而言，因上述大宗商品出口价格走高而增加的收益高于进口领域增加的成本。

以往关于拉丁美洲之“中国效应”的分析阐释了对南美洲和墨西哥（以及中美洲部分国家）产生的不同影响（Devlin等，2006，第2章；Ellis，2009，第2章；González，2008）。以阿根廷、巴西、智利以及秘鲁为代表的南美洲诸多国家的对华出口额大幅上升，因此被视为中国增长的主要受益国。另一方面，墨西哥在美国市场面临中国商品愈加激烈的竞争而受到负面影响。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平衡也反映了这一点，其中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保持高额贸易逆差，而四个南美洲国家则保持贸易顺差。另外一些国家既非对华出口大国，又非中国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对手，因此相对

未受影响。

本文针对大宗商品价格的探讨进一步充实了中国需求对拉丁美洲地区不同影响的分析。相关探讨显示，主要对华出口国也受益于因中国需求增长而引起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走高。此外，一些对华出口额不高的国家也从价格走高现象中受益，尤其是玻利维亚和三个原油出口国（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及墨西哥）。墨西哥的情况尤其引人关注，该国通常被认为受到中国的负面影响<sup>7</sup>。

另一方面，中美洲国家整体上在中国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的影响中受到负面影响。除哥斯达黎加之外的其他中美洲国家仍与台湾保持邦交国关系，其对中国大陆出口额较低。此外，这些国家（以及多米尼加和墨西哥）在美国市场与中国的竞争过程中损失最为惨重（Jenkins，2008）。它们出口的大宗商品（例如咖啡和香蕉）并未因需求上升而明显受益，而同时进口大宗商品的成本却出现上涨，尤其以原油为甚。因此，出口市场的中国竞争因素加重了大宗商品价格“中国效应”对上述国家产生的负面影响。

---

7 墨西哥从不断走高的大宗商品价格中受益。然而，由于该国在与中国进行美国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损失严重，其出口的制成品价格降低，上述收益未必能弥补损失部分。

## 七、总结

本文首次尝试估算中国需求增长对拉丁美洲国家产生的主要间接影响。此前已有大量研究分析中国的竞争对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向第三方市场出口制成品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且往往会讨论中国在大宗商品牛市中的作用，但在中国需求对拉丁美洲地区大宗商品出口额的定量影响方面却并无涉及。

本文虽然无法准确计算拉丁美洲从中国致使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的过程中新增收益的准确数字，但分析表明新增收益区间为420亿~750亿美元，其中原油和矿产品占主要部分。拉丁美洲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出口总额在2007年为410亿美元，2002年之后的出口增

幅达340亿美元。拉丁美洲对华出口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中国需求上升所引起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现象，因此即便保守估计，在推高拉丁美洲地区出口收益方面，全球价格受到的间接影响大于对华出口的直接影响。

由此可见，任何未将上述间接影响纳入考虑范畴的分析都会低估中国对拉丁美洲国家产生的影响。毋庸置疑，中国需求的增长已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推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的出口收益上升。然而，就该地区不同的国家而言，多数国家的出口收益上升，也有部分国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走高而蒙受损失。主要受益国为大宗商品

出口国，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出口国，由此产生了关于此类增长方式的环境可持续性，以及通过提高大宗商品专业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中美洲国家由于大

宗商品价格走高而蒙受损失，同时在制成品出口方面也面临中国愈加激烈的竞争。这两个因素对此类国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 附录 计算弹性估值过程中引用的资料

| 大宗商品     | 资料来源  |
|----------|---|
| 燃料       |   |
| 原油       | Kirchene (2005)                                     |
| 矿物、矿石及金属 |   |
| 铁矿石      | Slade (1992) ; Behrman (1979)                       |
| 铜        | Choe (1990) ; Behrman (1979)                        |
| 铝        | Choe (1990) ;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2006)                      |
| 锌        | Choe (1990)   |
| 饲料       |   |
| 大豆       | 美国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 (未知) ; Williams和Thompson (1984) |
| 豆油       | Valdez和Zietz (1980)                                 |
| 热带食品和饮料  |   |
| 咖啡       | Akiyama和Varangis (1990) ; Behrman (1979)            |
| 蔗糖       | 美国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所 (未知) ; Behrman (1979)                  |
| 香蕉       | Borrell和Hanslow (2004) ; Behrman (1979)             |
| 肉类产品     |   |
| 牛肉       | Sarmiento和Allen (2003) ; Behrman (1979)             |
| 家禽       | 美国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所 (未知)                                   |
| 林业产品     |   |
| 锯木       | Solingen和Sedjo (1996)                               |
| 化学纸浆     | Bergman和Braunalund (1995)                           |

#### 参考文献

- Akiyama, T. and P.N. Varangis (1990),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ffee Agreement on Produc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4, No.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hrman, J. (1979),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agreements: an evaluation of the UNCTAD Integrated Commodity Programme", *Policy Alternatives for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 Economic Analysis*, W.R. Cline (ed.),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 Bergman, M. and R. Braunalund (1995), "Measuring oligopoly power: an application to the Swedish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sation*, vol. 10, New York, Springer.
- Borrell, B. and K. Hanslow (2004), *Banana Supply Elasticities*, Canberr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BP (British Petroleum) (2008),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8*, London.
- Calderón, C. (2009), "Trade, specialisation, and cycle synchronization: explaining output comovement between Latin America, China and India", *China's and India's Challenge to Latin America: Opportunity or Threat?*, D. Lederman, M. Olarreaga and G. Perry (ed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esa-Bianchi, A. and others (2009), "On the Transmission of Global Shocks to Latin America Before and After China's Emergence in the World Economy", draft.
- Cheung, C. and S. Morin (2007), "The impact of emerging Asia on commodity prices", *Working Paper*, No. 07-55, Ottawa, Bank of Canada.
- Choe, B.J. (1990), "The metals price boom of 1987-89: the role of supply disruptions and stock chang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4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OCHILCO (Chilean Copper Commission) (2008), *Anuario de estadísticas del cobre y otros minerales, 1988-2007*, Santiago, Chile.
- Devlin, R., A. Estevadeordal and A. Rodríguez-Clare (2006), *The Emergence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DFID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5), *China and Forest Trade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Implications for Forests and Livelihoods: Overview*, London.
- Dollar, D. (2009), "Can China become the engine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East Asia & Pacific on the rise* [online] <http://blogs.worldbank.org/eastpacific/print/2558>
-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8),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Asia-Pacific: the Link with China*, (LC/L.2959), Santiago, Chile, October.
- Ellis, R.E. (2009), *China in Latin America: The Whats and Wherefores*, Boulder, Lynne Reiner.
- FAPRI (Food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s/f), *Elasticities Database*, University of Iowa [online] <http://www.fapri.iastate.edu/tools/elasticity.aspx>
- Gallagher, K. and R. Porzecanski (2009), "China and the Latin America commodities boom: a critical assessment", *Working Paper*, No. 192, Amherst,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Gonzalez, F. (2008), "Latin America in the economic equation. Winners and losers: what can losers do?",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mplication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 Roett and G. Paz (ed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IISI (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2008), *World Steel in Figures, 2008*, Brussels.
- \_\_\_\_\_(2004), *World Steel in Figures, 2004*, Brussels.
-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8),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April.
- \_\_\_\_\_(2006),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 Jenkins, R. (2008), "China's global growth and Latin American exports", *wider Research Paper*, No. 2008/104, Helsinki,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 Krichene, N. (2005), "A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for world crude oil and natural gas markets", *IMF Working Papers*, No. 05/32,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Lehmann, S., D. Moreno and P. Jaramillo (2007), "China, commodity prices and Latin American performance: a few stylized facts", *Working Paper*, No. 424, Santiago, Chile, Central Bank of Chile.
- Ostensson, O. (2005), *The Outlook for Iron Ore Supplies*, presentation at the OECD Special Meeting at High Level on Steel (Paris, 12 -13 January 2005).
- Park, C-Y. and F. Zhai (2006), "Asia's imprint on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ERD Working Paper*, No. 90,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Ray, D. (2008), *China's Dramatic Growth in Soybean Imports and Its Commodity Price Impact*,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Agricultural Policy Analysis Center.
- Rosales, O. and M. Kuwayama (2007), "Latin America meets China and India: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CEPAL Review*, No. 93 (LC/G.2347-P), Santiago, December.
- Sarmiento, C. and P.G. Allen (2003), "Dynamics of beef supply in the presence of co-integration: a new test of the backward bending hypothesis",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22, No. 2, Wisconsin, Agricultural &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 Slade, M. (1992), "Environmental costs of natural resource commodities: magnitude and incidence",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No. 99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Solingen, B. and R. Sedjo (1996), "A comparison of timber models for use in public policy analysis", *Discussion Papers*, No. 96-12,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 Streifel, S. (2006), *Impact of China and India on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Focus on Metals and Minerals and Petroleu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Timmer, H. (2010), "Can China become the engine for world economic growth?",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online] <http://blogs.worldbank.org/prospects/print/562>
-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9),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UNCTAD/TDR/2009), Geneva.
- \_\_\_\_\_(2008),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8* (UNCTAD/TDR/2008), Genev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8.II.D.21.
- \_\_\_\_\_(2005),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UNCTAD/TDR/2005), Genev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5.II.D.13.
-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2006), "The effects of increasing Chinese demand on global commodity markets", *Staff Research Study*, No. 28, Washington, D.C.
- Valdez, A. and J. Zietz (1980), *Agricultural Protection in OECD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 Williams, L. (2007), *Global Capital and the Zinc Market*, Global Capital Conference [online] <http://www.mineweb.com/mineweb/view/mineweb/en/page36?oid=37500&sn=Detail>
- Williams, G. and R.L. Thompson (1984), "Brazilian soybean policy: the international effects of interven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66, No. 4, Wisconsin, Agricultural &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 World Bank (2009),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9*, Washington, D.C.



#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及其对加勒比海盆地国家的影响

*Eduardo Gitli和Randall Arce*

# 中

国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简称“世贸组织”），无疑会对许多国家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重点关注其对美国和加勒比海盆地国家间贸易的影响。墨西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成员的身份给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带来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可能因该新形势引起的力量转变愈演愈烈。中国出口美国纺织品和服装的主要扩张将加剧盆地国家和墨西哥在美国市场面临的竞争。尽管如此，美国最近授予加勒比海盆地国家更多的贸易利益，于2000年10月1日生效。这为这些国家寻求巩固其出口，尤其是服装类，提供了一个短暂的缓冲（约5年时间）。针对鞋类市场，中美间日益增长的贸易可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出口美国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关于医疗器械，中国出口将与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出口在美国市场产生激烈竞争。

Eduardo Gitli

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国际研究中心  
(CINPE), 哥斯达黎加  
⇒ [egitli@racsa.co.cr](mailto:egitli@racsa.co.cr)

Randall Arce

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国际研究中心  
(CINPE), 哥斯达黎加  
⇒ [marce@racsa.co.cr](mailto:marce@racsa.co.cr)



## 一、引言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体中的重要成员。近几年，中国对其生产和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成功地保持了高经济增长率，成为世界领先的进出口国之一。然而，因为中国不是世贸组织成员，其表现受到极大的影响。这一身份问题也限制了其贸易扩大的范围。

鉴于此，在推出世贸组织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简称“关贸总协定”）长达半世纪后，

中国正寻求加入世贸组织，旨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贸易地位，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好处。1999年11月，中国和美国签署双边协议，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双边协议中关于中美贸易的范围还有待观察。然而，必须考虑到其对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和美国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本文的主要目标。

## 二、背景

中国是1948年关贸总协定的23个创始国之一。然而，1949年之后，台湾当局宣布中国不再是关贸总协定的组成成员。1986年，中国政府提出希望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并有意付诸行动。1987年3月，分析中国现状的工作组成立，第一次会议于同年10月举行（世贸组织，2000）。

中国拥有约13亿人口，且近几年增长迅速。1990~199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长超过11%，成为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期平均通货膨胀低于8%，并且1998年和1999年价格实际分别下降了0.8%和1.4%（世界银行，199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b）。大约从1996年开始，71.2%的国家工业产品总值来源于私有企业<sup>1</sup>，私有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城镇就业的42.6%（Lin、Cai 和 Li，1998，第422页）。

虽然中国人均收入较低，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是巴西的4倍，德国的2倍以上。因此，中国是一个在食品、生产资料和基本家用电器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的消费者。该国的出口生产主要局限在小范围区域内。约70%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集中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沿海五省市：广东、江苏、

福建、上海和山东<sup>2</sup>。这些省份被视为“中国奇迹”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1985~1989年期间，其增长速度超过20%（Mody 和 Wang，1997，第294页）。部分原因是其所处的特殊经济区（SEZs，简称“特区”）位置，但也反映了中国当局允许的贸易组织在地域上的集中分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9b，第2~23页）。

这些区域的公司获得了大量的优待，例如免除利润税和进口用于再加工的生产资料或原材料的关税。这些地区是香港和台湾低加工业务，尤其是服装产品的主要接收地（Bosworth和Ofer，1995）。

外国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相当重要。1998年，亚太区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的51.8%都进入了中国（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sup>3</sup>。在中国，外国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来源地。1997年，近一半的新增外国直接投资来自香港（表1），而日本（9.6%）、台湾（7.3%）、美国（7.2%）和新加坡（5.8%）则贡献平平。外国直接投资的集中可能源自中国对资金流的限制，但香港不受限，因此其中的部分资本可能实际来源于台湾。外国直

<sup>2</sup> 出于研究考虑，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的投资，简称香港和台湾，在此被列为国外投资。

<sup>3</sup> 这些数据不包括在日本的投资。若涵盖1997年回归中国的香港，该数据将上升至53.7%。

<sup>1</sup> 诠释该比例时需注意其包含部分乡镇企业以及私有企业。

**表1 中国:累计外国直接投资, 依据来源地划分, 1997年**  
(百万美元和百分比)

| 来源地  | 价值     | 百分比   |
|------|--------|-------|
| 香港   | 20 630 | 45.6  |
| 日本   | 4 330  | 9.6   |
| 台湾   | 3 290  | 7.3   |
| 美国   | 3 240  | 7.2   |
| 新加坡  | 2 610  | 5.8   |
| 韩国   | 2 140  | 4.7   |
| 英国   | 1 860  | 4.1   |
| 德国   | 990    | 2.2   |
| 澳门   | 390    | 0.9   |
| 加拿大  | 340    | 0.8   |
| 澳大利亚 | 310    | 0.7   |
| 小计   | 40 130 | 88.6  |
| 其他   | 5 148  | 11.4  |
| 总计   | 45278  | 100.0 |

资料来源: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9b)。

接投资中, 62%的资本进入了制造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1999b, 第2~14页)。

若考虑出口目的地, 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香港(22.7%)、日本(20.2%)和美国(18.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0a)。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服装、鞋类、玩具、游戏、运动器材和皮革制品是该国主要的出口产品。这反映了一个事实: 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匮乏的国家。

中国最大的几个供应商是香港(34.8%)、日本(12.8%)、台湾(9.8%)、美国(7.4%)和韩国(7.1%)。主要进口产品为飞机, 电气机械, 化肥和非电动机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0a)。<sup>4</sup>

中国的贸易结构在过去2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初级产品主导结构转变为生产型结构。1997年, 中国出口商品中85%是制成品。<sup>5</sup>

4 香港的一些进出口实际上是重定向, 所以该结构可能不完全准确。

5 作者的估计基于世界贸易数据库(PC-TAS)。

### 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

中国是目前正在谈判加入世贸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的30个国家之一。中国正在实施重大改革, 使其经济更为市场化。世贸组织成员组成的工作组正在进行入市谈判。最初(自1987年)关贸总协定的附属工作组分析了中国的有形贸易体制。但从1995年起, 附属于新成立的世贸组织的小组将服务贸易、非关税措施的新规则以及知识产权的规则纳入了分析范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非常重要的一步在于与该组织利益成员的双边谈判。这些成员国正在进行双边谈判, 考察中国加入的先决条件。在谈判进程结束时, 中国须获得2/3成员国的支持, 才能加入世贸组织<sup>6</sup>。该工作组负责监督双边讨论的总体进程<sup>7</sup>。

图1显示了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前需经历的阶段。首先必须完成与提出谈判要求的成员进行的谈判, 该阶段包含了与欧盟的艰难谈判。在此之后, 工作组将整合所有的谈判, 各成员国决定是否批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然后总理事会(由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组成)将在全部的期限及条件下决定通过或拒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理事会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决定, 如果无法达成一致, 成功加入世贸组织须获得2/3的多数通过。最后中国将开始履行其义务, 成为世贸组织成员(GAO, 2000, 第9页)。

#### 中国单方面开放

1998年, 中国报告了其递交重新加入关贸总协定(现世贸组织)申请后12年间作出的一些让步。其中部分内容如下(世贸组织, 2000):

— 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992年的42.7%(农产品除外)减至1998年的17%, 并计划进一步降低, 至2005

6 虽然本阶段的谈判是双方的, 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双边优惠将自动惠及所有最惠国待遇原则下的其他国家。

7 至2000年7月, 中国已完成与35个成员国的谈判。由于在中国开放服务相关行业方面存在分歧, 例如电信、金融服务和保险, 中国与欧盟的协议被推迟。

年平均关税为10%。

— 关税措施从1992年的1247个减至1998年的不足400个，并有取消与世贸组织规定不一致的措施时间表。

— 中国同意签署信息技术协议，协议规定该品种

下的许多产品的关税将减至零。

— 中国坚称没有实施农产品出口补贴制度。

— 中国坚持在服务贸易谈判方面已取得进展。当时，在中国经营的外资银行达150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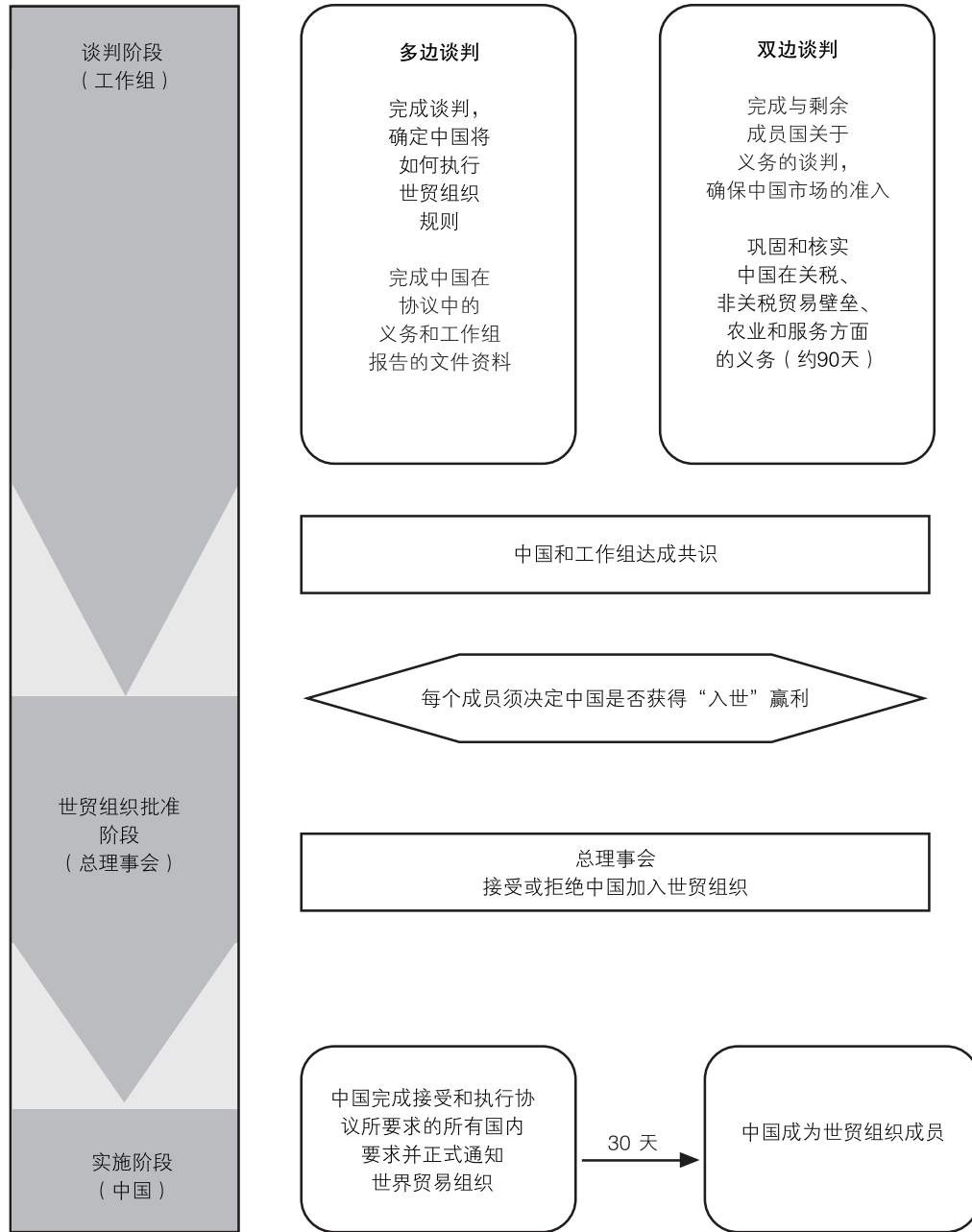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剩余阶段

资料来源：GAO (2000)。

## 四、中美两国的关系

### 1. 中美贸易

中国是美国的重要双边贸易伙伴之一。1997年，美国7.2%的进口商品来自中国，较1993年记录的5.4%有大幅增长（见表2）。1993~1997年，美国至中国的出口保持稳定，约占其出口总量的1.9%。该数据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量有大幅增加的潜力。中国在美国的进口原产国中排名第4位，在美国的出口国家中排名第13位。

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1997年，美国占中国出口份额的25.9%，占进口供应的15.1%。贸易收支顺差达497.47亿美元，这种情况对中国非常有利。

表3展示了1998年中美两国间的贸易结构。由此可见，美国的进口商品主要分为四类：机械电器、电气设备和零部件（29%），杂项制品（21.4%），鞋帽类和人造花卉（13.1%）以及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10.1%）。同时，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集中于三类：机械电器、电气设备及零部件（31.9%），运输设备（26.6%）和化工产品或相关行业（11.5%）。

**表2 美国和中国：双边贸易的重要性**  
(百分比)

|                     | 1993 | 1997 |
|---------------------|------|------|
| 美国从中国进口所占美国进口总量的百分比 | 5.4  | 7.2  |
| 美国出口至中国所占美国出口总量的百分比 | 1.9  | 1.9  |
| 中国从美国进口所占中国进口总量的百分比 | 13.0 | 15.1 |
| 中国出口至美国所占中国出口总量的百分比 | 22.4 | 25.9 |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 (USDC)、国际商业增长分析模块 (MAGIC) 和联合国 (PC-TAS)。

### 2. 中美协议<sup>8</sup>

1999年11月15日，美国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双边协议，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基础。协议涵盖的内容包括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准入、投资服务业的机会、贸易和分销权以及其他事宜。

该协议并非一次性协议。相反，其构成了中美关系

的转变的一部分，这要归功于中国在近年来取得的重要地位。天安门广场事件后，两国关系被制约了十多年。然而1996年，克林顿总统宣布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将是其第二个任期内的首要任务。1997年两国首脑的首次会晤向人们发出了一个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强烈信号。

双边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 (1) 总则

该协议包含一系列条款，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面临美国在一些领域设置的单方面防御措施。首先，它包括一个特殊保障机制，在中国入世12年后仍然有效。该机制可用于控制从中国进口的快速增长，以免在美国引发或可能引发问题。

#### (2) 反倾销方法

对于从中国进口的反倾销案例，美国可以继续实施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方法。这个条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15年内有效。此外，如果美国确定并量化补贴产生的可能收益时，该条款允许美国考虑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与此同时，中国可要求美国审查具体部门，或将中国经济作为整体，以确定是否为市场经济，从而毋须完全受制于其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方法。

#### (3) 贸易和分销权

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可在中国销售进口产品以及在该国生产的产品，这为其扩大对华出口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以前，公司只可销售直接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如果他们进口商品，需由专门设立的国有企业进行销售。美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工厂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够在中国这个重要的市场进行销售。根据协议条款，美国公司可以在毋须考虑生产地的情况下销售其产品，从而增加出口。

#### (4) 服务

该协议规定：中国将开放其通讯业、保险业、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计算机相关服务领域。在电信领域，

8 中美协议的主要特征描述基于美中贸易委员会（2000年）。

表3 美国和中国：根据1998年编码协调制度分析的相互贸易结构<sup>a</sup>  
(10亿美元和百分比)

|    |                   | 进口       | 百分比  | 出口       | 百分比  |
|----|-------------------|----------|------|----------|------|
| 十六 | 机械及机械用具, 电机设备及其零件 | 20 385.0 | 29.0 | 4 472.8  | 31.9 |
| 二十 | 杂项制品              | 15 041.3 | 21.4 | 101.3    | 0.7  |
| 十二 | 鞋帽和人造花卉           | 9 230.4  | 13.1 | 33.2     | 0.2  |
| 十一 | 纺织品及纺织制品          | 7 114.9  | 10.1 | 267.4    | 1.9  |
| 十五 | 贱金属及贱金属物品         | 3 052.6  | 4.3  | 469      | 3.3  |
| 十八 | 光学、摄影器具和乐器        | 2 991.7  | 4.3  | 682.2    | 4.9  |
| 八  | 生皮、手袋等            | 2 972.4  | 4.2  | 166.6    | 1.2  |
| 七  |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 2 388.2  | 3.4  | 445      | 3.2  |
| 六  | 化学或相关工业产品         | 1 453.9  | 2.1  | 1 613.6  | 11.5 |
| 十三 | 石头、石膏、水泥、陶瓷、玻璃制品  | 1 276.1  | 1.8  | 90.6     | 0.6  |
| 小计 |                   | 65 906.5 | 93.7 | 8 341.7  | 59.4 |
| 其他 |                   | 4 473.4  | 6.3  | 5 692.2  | 40.6 |
| 总计 |                   | 70 379.9 | 100  | 14,034.3 | 100  |

注：<sup>a</sup> 编码协调制度分为21个部分。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参照美国商务部和国际商业增长分析模块的数据。

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国运营商可拥有高达25%的移动通信公司，这一比例第三年将升至49%。在互联网领域，外国公司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可拥有高达30%的运营商，两年后当所有地域限制消失时，该比例将增至50%。虽然中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其金融服务，但外国私有公司的参与程度仍然非常低。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强劲增长成为美国政府寻求进入这些市场的主要动力（联合国，1999）。

#### (5) 工业产品

中国的工业品关税应从1997年整体从价平均水平的24.6%（比现今实施得高）降至2005年一般平均水平9.4%。美国关键的工业品关税降至从价平均水平7.1%，其中大部分关税削减将于2003年生效。汽车关税将从现今的80%~100%的从价水平迅速下降到2006年的25%。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年后关税降幅最大。中国同意降低关税<sup>9</sup>以换取一个稍微较长的宽限期。同时，中国还同意依据信息技术协议（中国是签署国）取消计算机、电信设备、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所有关税。至2005年，该类型产品的关税到将从现今的

13.3%降至零。

对于木材和纸张，关税将从目前的12%~18%（木材）和15%~25%（纸张）削减至5%~7.5%。对于纺织品，协议包括一个基于1997年签订的纺织品协议的文本，即美国公司和工人可以通过调用保障机制，应对不断增加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该保障将在2008年12月31日前，即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及成衣协议停止实施4年后仍然有效（白宫，2000）。

#### (6) 农业产品

中国允许农产品的私营贸易。中国对美国重点产品的关税将从整体平均从价的31%最晚于2004年1月降至14%。此外，中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将从22%降至17.5%。协议中针对美国某些特定利益部门的关税条款列于表4中。

中国还同意取消出口补贴，这是美国大米和棉花生产商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其他承诺包括，取消没有科学依据的卫生和植物检疫壁垒，给予商品进口和在中国的分销权，而无需经过国营贸易机构的允许。<sup>10</sup>

9 然而，美国国内抱怨协议的关税水平可能过高，会继续限制美国的出口部门（商务期刊，2000a）。

10 尽管美国正在要求欧盟、世贸组织和美国取消农业补贴，但其本国的国内农业补贴在过去两年间分别为60亿美元和90亿美元（商务期刊，2000c）。

表4 中国：与美国的关税谈判

| 美国重点产品 | 当前关税 (%) | 协定关税 (%) |
|--------|----------|----------|
| 葡萄     | 40       | 13       |
| 牛肉     | 45       | 12       |
| 鸡和火鸡   | 20       | 10       |
| 鱼      | 25.3     | 10.6     |
| 奶酪     | 50       | 12       |
| 酸奶     | 50       | 10       |
| 冰淇淋    | 45       | 19       |
| 猪肉     | 20       | 12       |
| 酒      | 65       | 12       |
| 鸡      | 20       | 10       |

资料来源：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00）。

### 3. 美国对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立场

美国工会组织反对与中国签订协议，坚持认为中国在享受正常贸易关系前应改善其劳动待遇。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廉价产品会扰乱美国市场，并导致工人失业（商务期刊，2000c）。

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是签订协议受到抵制的原因之一。一些人认为，只有中国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不再受到侵犯后，美国才可与中国签署协议（公共公民，1999）。而其他人士则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这方面的改进是循序渐进的，因此这个问题不应成为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Bates，1999）。这些顾虑似乎已受到关注，因为最终通过的立法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将结

果告知国会。

环境问题似乎并非是协议中的首要问题。有人认为，中国近几年经济繁荣发展，随之产生的环境问题威胁到国家脆弱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经济基础设施。他们要求美国借此机会与中国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展开合作（经济，1999）。2000年5月19日，两国共同签署了环境合作的联合声明，强调了与气候变化、清洁技术的使用和转让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事宜。该声明在环境和发展论坛的框架下发表。该论坛是美国和中国自1997年以来举行的一系列讨论。然而，目前尚未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将中美在该领域的合作变成现实。

除了商业考虑，该协议对美国而言具有相当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从一个贫穷封闭的社会（仅开放小面积的经济特区）转变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具有经济意义，同时对于缓和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中国和印度或俄罗斯间长久经济伙伴关系的困境，政治和军事对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六位前任国务卿，包括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等都发表公开信支持克林顿。<sup>11</sup>

11 在通过该立法的过程中，美国国会就两项相关主题展开辩论：①中国履行其入世义务，中美签署协议；②通过对华正常贸易关系的立法，之后不必每年更新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2000年9月，该法律即将获得通过时，遭到一些国会议员的阻止。他们要求将人权和武器贸易纳入条款之中。

专栏1

#### 何谓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最惠国待遇（MFN）贸易地位是当前美国立法规定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是指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保证向其他成员实施永久正常关税条款，所以如果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也将被会员国授予此待遇。

美国将不得不通过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立法，因为目前的法律，即1974年贸易法案第四条剥夺了中国获得此地位，因此目前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条款每年都必须更新。如果中国未获得新的贸易地位，美国将无法从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所作的最大让步中受益，例如金融服务、电信和分销自由化。因此，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批准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非常重要。

资料来源：Lardy（2000）。



## 五、对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近期与美国签署的双边协议可能对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和美国间的贸易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为对某些特定行业而言，中国的加入使竞争更为激烈。<sup>12</sup>

如表5所示，在四个行业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加剧其与加勒比海国家产品的市场竞争：①服装，②鞋类，③机械器具、电器设备及零部件，以及④光学、摄影、乐器及器具。虽然所有中美洲国家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都生产服装，但只有多米尼加共和国生产鞋类，1999年其出口占全部出口至美国产品的6.6%，而对于加勒比海的其他国家，出口所占比例低于0.7%。接下来将对各个行业分别进行分析。

### 1. 服装制造业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服装供应商之一。然而如表6所

示，服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从1990年的13.9%下降至1998年的11.4%，主要原因是配额限制，限制了这些商品出口美国市场的增长。许多中国出口商品受制于个别配额，导致其年增长率减少0.2%或0.5%（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9a）。<sup>13</sup>

#### (1) 市场占有率

1997年2月，美国与中国签订了有关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新协议。其中一项协议将美国对中国非丝商品的配额延长了4年，有效期至2000年底。中国不断违反限额，利用第三国未用完的配额。该配额的延长则消减了这些商品的配额。同时，关于此类贸易的规则变得严格（专栏2）。

同时，20世纪90年代，由于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受配额限制，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增加了其商品在美国

12 有别于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和中国建立的贸易机会，将在另一篇研究中进行分析。

13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海上运输成本并非是个重要的差分（Gitti 和 Arce, 2000a），反而涉及解决具体问题时，交货时间和距离是需要关注的，航空费用可能是对于中国更为重要的因素。

表5 1998年美国从中国和加勒比海盆地国家进口商品结构，根据编码协调制度<sup>a</sup>

（百万美元和百分比）

|                     | 中国       | 百分比   | 加勒比海盆地国家 | 百分比   |
|---------------------|----------|-------|----------|-------|
| 十一 纺织品及纺织制品         | 7 114.9  | 10.1  | 8 390.9  | 50.2  |
| 二 蔬菜产品              | 295.3    | 0.4   | 1 828.0  | 10.9  |
| 五 矿产品               | 696.8    | 1.0   | 1291.0   | 7.7   |
| 十六 机械及机械用具、电机设备及零部件 | 20 385.0 | 29.0  | 1 159.5  | 6.9   |
| 四 粮食、饮料和烟草          | 299.7    | 0.4   | 1 052.4  | 6.3   |
| 一 牲畜及畜产品            | 451.7    | 0.6   | 605.4    | 3.6   |
| 六 化学或相关工业产品         | 1 453.9  | 2.1   | 535.9    | 3.2   |
| 十八 光学、摄影器具及乐器       | 2 991.7  | 4.3   | 420.8    | 2.5   |
| 十二 鞋帽和人造花卉          | 9 230.4  | 13.1  | 378.7    | 2.3   |
| 十四 天然或养殖珍珠和贵金属      | 399.5    | 0.6   | 315.4    | 1.9   |
| 小计                  | 43 318.9 | 61.6  | 15 978.0 | 95.6  |
| 其他                  | 27 061.0 | 38.4  | 16 722.0 | 4.4   |
| 总计                  | 70 379.9 | 100.0 | 11 940.6 | 100.0 |

注：<sup>a</sup> 编码协调制度分为21个部分。

资料来源：作者，参考美国商务部和国际商业增长分析模块的数据。



表6 各国占美国服装进口的份额, 1990~1999年

|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
| 中国       | 13.9 | 14.5 | 15.8 | 17.4 | 15.3 | 12.9 | 13.2 | 13.4 | 11.4 | 11.1 |
| 加勒比海盆地国家 | 8.4  | 10.4 | 11.3 | 12.9 | 13.1 | 14.7 | 15.5 | 16.8 | 16.4 | 16.5 |
| 墨西哥      | 2.8  | 3.5  | 3.9  | 4.3  | 5.3  | 7.4  | 9.6  | 11.4 | 13.1 | 14.3 |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参考美国商务部数据。

## 专栏2

## 中欧协议

2000年5月19日，中国与欧盟达成了关税优惠的双边协议，前者给予后者优惠，旨在授予欧盟中国市场准入。以下是该协议的主要条款。

对欧洲国家150类重点产品，平均关税从18.6%消减到10.6%。

对于占欧盟出口70%的五类鞋类产品，关税将从25%消减至10%。

对于与“机械与应用”相关的52类产品，占欧洲所有出口的26%，其关税将从目前的35%以上消减为5%到10%。

农业产品方面欧盟获得的部分让步是：

| 产品  | 目前关税协议 | 关税  |
|-----|--------|-----|
| 黄油  | 30%    | 10% |
| 奶粉  | 25%    | 10% |
| 面食  | 25%    | 15% |
| 葡萄酒 | 65%    | 14% |
| 柑橘  | 40%    | 12% |

同与美国一样，中国承诺签署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关于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的协议。

至于电信领域，国外运营商可以拥有中国总额的25%。协议生效后，第一年和第三年份额将上升至35%和49%。

在保险领域，欧洲公司获得了7个可提供保险服务的新牌照。零售分销业务将不再受50-50战略联盟限制，也不再受限于20000平方米的最大范围或不超过30家分店的规定。

资料来源：欧盟（2000）。

的市场份额。自1994年以来，墨西哥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授予的关税优势，增加了对美国的服装出口。毋庸置疑，墨西哥是该类商品出口美国增长最快的国家，已占据亚洲国家失去的大部分市场份额；1998年，过去十年呈现增长趋势的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在市场份额上整体下滑。受1994年底该国货币贬值的影响，自1995年以来墨西哥市场份额得以增长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优势（Gitli 和 Arce, 2000a）。

相当大比例的加勒比海盆地国家产品按照生产共享的基础进入美国市场。在服装领域，盆地国家占据了本

系统（表7）进口总量的83.7%。在生产共享基础上，63.9%价值的产品来源于美国原产地，因此盆地国家对于该比例的产品不需要支付关税。<sup>14</sup>

拉美国家使用的美国零部件和其他国家使用的存在很大差异。前者最低的比例是43.2%（危地马拉），而

14 对于服装行业，依据生产共享的基础进入市场意味着布料在美国已被剪裁，送至盆地国家缝制，而只需缴国外增值部分的关税。相比之下，中国支付了整个产品的关税。现在还不清楚这对于盆地国家而言存在的优势有多大，因为中国不仅劳动力廉价，布料也很便宜。

其他地方只有16.5%。这反映了一个事实，离美国越远的国家，例如亚洲国家，没有太大的可能依据产品共享制生产服装，因为将布料和其他美国投入从美国转移用于生产商品存在困难。

如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目前纺织品和服装协议中正在实施的配额将于2005年取消。这将使中国在全世界的市场份额大幅增加，极大地影响这些商品的其他区域供应商。事实上，依据美国政府预测，如果取消这些配额，2005年中国产品的世界市场份额可以提高至少6个百分点。这将有助于中国保持世界领先服装产品供应商的地位，而且之后市场份额稳定在37%左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9）。

就美国市场而言，中国的入世和配额的取消将会对美国服装进口国的构成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见表8）。随着数量限制的取消，这些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预计在2005年将增加3个百分点。南亚国家<sup>15</sup>也将受益于配额取消：他们的份额在2005年前后将上升约4个百分点，并在随后几年呈上升趋势。中国和南亚国家市场份额的增加意味着“其他所有国家”的市场份额下降约4个百分点，其中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将无疑遭受重创。<sup>16</sup>

15 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

16 如第四部分所述，尽管美国有权将纺织品保障措施实施至2008年，但在这段时间却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

**表7 美国：依据生产共享基础进入美国市场的服装及明细，1997年**

（百万美元和百分比）

|          | 生产总量   | 生产共享   | 所占比例 | 美国量   | 生产共享比例 |
|----------|--------|--------|------|-------|--------|
| 墨西哥      | 6 586  | 5 187  | 78.8 | 3 368 | 64.9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2 349  | 2 154  | 91.7 | 1 358 | 63.0   |
| 洪都拉斯     | 1 875  | 1 586  | 84.6 | 1 130 | 71.2   |
| 萨尔瓦多     | 1 170  | 1 006  | 86.0 | 580   | 57.7   |
| 哥斯达黎加    | 827    | 791    | 95.7 | 524   | 66.2   |
| 牙买加      | 422    | 382    | 90.5 | 309   | 80.9   |
| 危地马拉     | 1 150  | 706    | 61.4 | 305   | 43.2   |
| 海地       | 225    | 211    | 93.8 | 155   | 73.5   |
| 哥伦比亚     | 364    | 253    | 69.5 | 148   | 58.5   |
| 尼加拉瓜     | 232    | 67     | 29.9 | 47    | 70.1   |
| 其他       | 38 374 | 599    | 1.6  | 99    | 16.5   |
| 总计       | 53 574 | 12 939 | 24.2 | 8 024 | 62.0   |
| 加勒比海盆地国家 | 8 307  | 6 949  | 83.7 | 4 438 | 63.9   |

资料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9b)。

**表8 供应服装的国家：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配额的取消，其美国市场份额可能发生的变化**

| 美国重点产品              | 世界市场   | 美国    |
|---------------------|--------|-------|
| 中国                  | 增加6%以上 | 约增加3% |
| 墨西哥和加拿大             | 小幅减少   | 损失2%  |
| 其他所有国家 <sup>a</sup> | 约损失3%  | 约损失4% |

注：<sup>a</sup>“其他所有国家”包括加勒比海盆地、巴西、欧盟国家和其他小供应国。由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研究并没有分离出任何情况下对盆地国家的影响，所以这些数字是本文作者的估计。

资料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9b）。

由于美国2000年通过贸易和发展法案，加勒比海盆地国家现享有比加勒比海盆地优惠方案（CBI）规定的更广泛的关税优惠。我们认为这部2000年10月1日生效的法律，无疑将为盆地国家的生产注入新的活力，并缓解由中国配额取消造成的影响。因此，在“其他所有国家”中，盆地国家将是唯一不会受到不利影响的区域。<sup>17</sup>

17 见表8脚注的“其他所有国家”的定义。

由于服装类商品配额的取消，美国政府还预计从2005年起墨西哥的市场份额将略有下降。然而，由于享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优惠，该国所受的影响将减少。

## (2) 相对价格和竞争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出口美国商品的相对价格。为此，我们需参考1998年盆地国家出口美国的三种主要服装产品：男士长裤和马裤，男士T恤和男士棉衬衣<sup>18</sup>。表9可见，中国出口美国市场这三类商品的价格与盆地国家的出口价格非常相近。如此看来，至少这种产品不存在价格上的竞争。由此证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产生的主要分歧将是配额取消。

然而现今，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廉价服装供应商之一，同时也正成为一个高品质、高价值服装的低成本生产者，这可能是由于美国为防止进口低质量产品所实施的配额限制。同时，高价值产品的生产正从香港向中国大陆转移，因此香港制衣业的就业人数也从1993年的12.8万人下降至1998年的4.5万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9b，第8章，第6页）。

通过立法扩大对加勒比海盆地国家的优惠，美国促进的其实是其本国的生产。因为盆地国家的生产主要集中于生产分享制，这些国家出口服装中64%的原料来源于美国。因此，立法的通过将增加美国纱和布在盆地国家的使用，所以盆地国家纺织和服装工业未来的增长将使美国抵消其国内纺织业的不利发展，美国纺织业的就业人数从1993年的67.5万人减少至1998年的59.6万人（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9b，第8章，第2页）。因大量使用美国原材料产生的生产联系相当可观，所以盆地国家市场份额的增长将有利于美国的纺织工业。

纺织品生产商、服装生产商和经销商的利益冲突关系极其难于理清。表2总结了这些群体间的结构和相互关系，以及有时相互矛盾的方式。经销商往往要求“完整包装”（Arias, 1999; Zúñiga, 1999; Gereffi, 2000）。既然如此，经销商（通常以分包的形式生产服装）对布源不太感兴趣，只关注材料的质量和规格。因

18 这些产品分别占美国从加勒比海盆地国家进口的3.7%，2.6%和2.4%，在编码协调制度中的关税分类为6203424015，6109100012和6105100010。

**表9 加勒比海盆地和其他国家/地区：美国主要进口服装产品的相对价格<sup>a, b</sup>**  
(1995~1998年平均价格)

| 国家/地区   | 男裤   | 男士T恤 | 男士棉衬衫 |
|---------|------|------|-------|
| 中国      | 0.97 | 1.00 | 1.42  |
| 哥斯达黎加   | 0.95 | -    | -     |
| 萨尔瓦多    | -    | 0.78 | 0.64  |
| 危地马拉    | -    | -    | 0.81  |
| 香港      | 1.14 | 2.85 | 1.70  |
| 洪都拉斯    | 1.00 | 0.88 | 0.77  |
| 牙买加     | -    | 0.91 | -     |
| 墨西哥     | 0.98 | 1.01 | 0.77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1.00 | 0.80 | 0.86  |

注：<sup>a</sup> 没有给出加勒比海盆地国家的某些特定产品的数据，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不出口这些产品，而是他们不属于该区域这些商品的前三大供应商。

<sup>b</sup> 美国从香港的进口很可能产自中国大陆，因此这些数字应该谨慎处理。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和国际商业增长分析模块。

此，他们愿意与任何人谈判（中国、CBI等）。相比之下，美国纺织品生产商关注扩大生产范围和生产共享的效益，以此扩大其布料市场。

在这一点上，Gereffi（2000）对美国服装部门的改革进行了分析，并得出墨西哥和亚洲的生产商都致力于生产“完整包装”的结论。在墨西哥，这种趋势的产生是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提供的生产一体化的机会，而在亚洲是由于亚洲制造商之间的密切联系。Ng 和 Yeats（1999）发现，亚洲国家间组件和零部件的贸易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例如，1996年，这些国家中该类产品在的所有进口中有58.5%是区域间贸易，体现了在亚洲国家中盛行的“生产共享”的重要性。<sup>19</sup>

由于工资成本低，中国在国际服装市场享有充分的竞争力。目前的工资水平只有哥斯达黎加的17%，墨西哥的28.5%和危地马拉的33.6%。这意味着该国产品的最终价格要比盆地国家生产的产品低很多（见表10）。

1995年中国的服装企业中约42%是外商独资，近40%是乡镇企业，7%是私营部门公司，只有6%为国有企业。出口产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香港、意大利、日本、韩国和台湾以及其他地区进口的布料，其中55%的服装由进口布料制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9b，第8章，第5页）。

19 在此我们正考虑将“生产分享”不作为海关分类，而作为劳动分工，即每个国家根据其劳力和知识水平负责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

专栏3

### 美国对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关税优惠的延长

作为1984年加勒比海盆地优惠方案的一部分，2000年美国贸易和发展法案延长了盆地国家所享的关税优惠。

对于鞋类<sup>a</sup>、金枪鱼、石油及其衍生产品、钟表和皮革制品，例如钱包<sup>b</sup>，如果遵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原产地规则，所收关税将与墨西哥相同。

纺织和服装产品仍特殊制度限制，以下产品可能无配额和无关税<sup>c</sup>：

①用美国的布和纱生产、并在美国裁剪的服装（生产分享或出口加工），对于这些产品，允许额外的洗涤和加工。美国的布也允许在该地区裁减，尽管在这些情况下，缝制之后的程序可能不被允许。

②某些使用美国的纱线在受益国缝制的产品（编码协调制度6115项下所列的紧身衣除外），在一个或多个受惠国针织、裁剪和完全缝制的服装使用了美国产的纱制成的布料。这项宽减措施设定的最初标准是每年相当250万平方米的布料，当法律将规定配额增长时，直至2004年数量将以每年16%的速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立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可能会出现生产之后的步骤不被允许。

③其他纺织材料中的针织或钩编的棉质T恤，内衣除外（编码协调制度61091000）和针织或钩织的T恤（61099010），生产于一个或多个受惠国，使用了该地区一个或多个国家生产的布料和美国生产的纱线。对于这种情况，使用符合原产地规则的布制作的T恤上限为420万打，到2004年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之后，增速依据法律规定。

④在美国或其他任意受惠国裁减、缝制或组装，根据子项目621210分类的任何服装产品（胸罩）。如果这些产品包含至少75%的美国布料，则可获得优惠待遇。

⑤由在该地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不批量销售的纤维、纱线或布制成的产品。手工制品、工艺制品和纺织行李箱。

最后，对于之前受制于配额和关税限制的一些特别敏感的农产品，例如糖<sup>d</sup>、牛肉、冰冻果汁、烟草和首饰盒，不受新法的影响。对于这些，没有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平价。

注：<sup>a</sup>自1990年以来，出口加工鞋免关税。

<sup>b</sup>自1990年以来，平板产品关税降低。

<sup>c</sup>在某些情况下，如第2和第3点指出的，产品受配额限制。

<sup>d</sup>进入加勒比海盆地国家食糖市场的产品受配额限制但免关税。

资料来源：Gittli 和 Arce（2000b）。

正如我们所见，2005年中国可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开放纺织品配额，这将对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带来重大危机，盆地国家需认真应对这一挑战。在此期间需进行投资来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

## 2. 鞋类

鞋类（编码协调制度中代码64）可能是中国给加勒

比海盆地国家造成竞争威胁的另一种产品。正如之前的表5所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鞋帽和人造花卉”占13.1%，是两国贸易中的第三大类别。在加勒比海盆地国家中，鞋主要由多米尼加共和国生产，所以接下来的分析将主要集中在在这个国家。

此处需要加以说明的是鞋类：①不享受普遍优惠制的关税优惠；②半排除在加勒比海盆地优惠方案之外（如果一个盆地国家依据生产共享制生产鞋类，进入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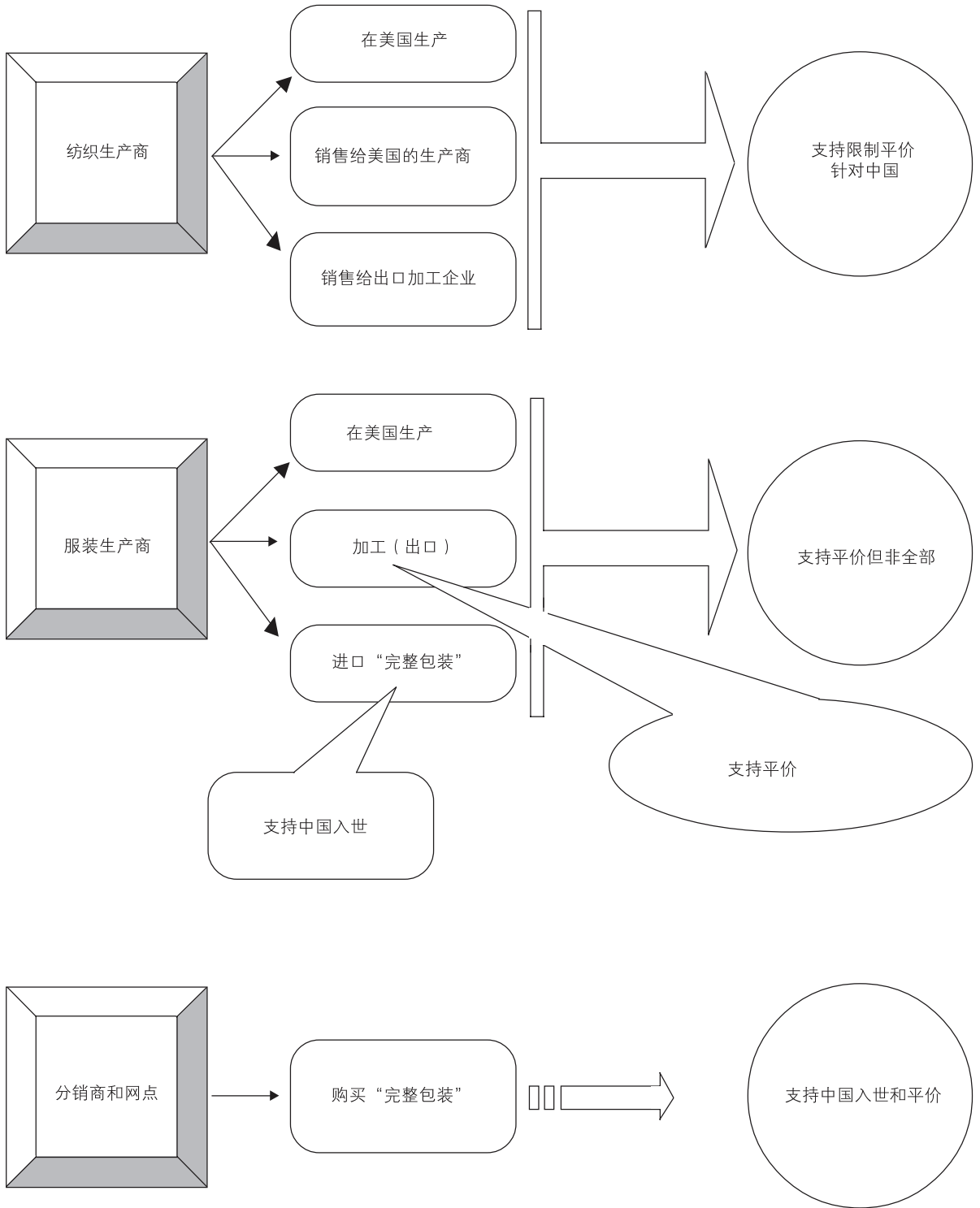


图2 纺织服装链：生产和销售流程及中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平价的意见

**表10 各经济体服装行业的劳工成本<sup>a</sup>**  
(美元/小时)

|         | 1996 | 1998  |
|---------|------|-------|
| 美国      | 9.56 | 10.12 |
| 香港      | 4.51 | 5.20  |
| 韩国      | 4.18 | 2.69  |
| 哥斯达黎加   | 2.38 | 2.52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    | 1.49  |
| 墨西哥     | 1.08 | 1.51  |
| 危地马拉    | 1.31 | 1.28  |
| 洪都拉斯    | -    | 1.05  |
| 中国      | 0.28 | 0.43  |
| 印度      | 0.36 | 0.39  |
| 孟加拉国    | 0.31 | 0.30  |
| 印度尼西亚   | 0.34 | 0.16  |

注：<sup>a</sup> 劳工成本包括社会费用。

资料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9b，第8章，第7页）1996年和1998年的数据，Gitli（1997）中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洪都拉斯的数据。

国时免税)；③自2000年新法案生效以来，包括在加勒比海盆地优惠方案中。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鞋类出口中有34.2%依据生产共享制生产。这一比例中，66.5%产品的原材料来自美国，因此在进入美国市场时，可享受部分免税的优惠。在这方面较中国更具优势，而中国本可以利用生产共享的好处，但由于东亚生产结构间的相互联系而不能利用该好处，必须从区域内内部供应。

我们现在来分析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两种主要出口产品中，看中国是否与其存在竞争，以及在什么价格水平下产生竞争。为此，我们应当分析多米尼加共和国出口美国鞋类中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产品：①鞋类部件、其他鞋面及加劲皮革（6406106500）与②鞋类外底橡胶/塑料、自然或再生皮革（非运动）和纺织鞋面（6404193515）。

第一类产品——“鞋类部件、其他鞋面及加劲皮革”——占多米尼加共和国出口美国总额的4%左右，是该国出口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从1990年的47.3%上升至1998年的60.5%，1994年达到顶峰63.3%，其后开始略有下降。墨西哥在美国市场的份额有所增加<sup>20</sup>尤其是自1995年以来，这可能是由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激励措施以及1994年下半年墨西哥货币贬值造成的。中国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大幅增加，从1990年的0.5%增加至1998年的7.7%，但于1995年达到高峰10%后开始下滑。

如果我们分析每个主要供应此类产品国家的相对价格结构<sup>21</sup>，可以发现多米尼加共和国供应的价格比其他所有供应商的平均价格高出27%，而墨西哥供应的价格比平均价格低4%。而中国销售的价格更是远远低于墨西哥，比所有供应商的平均水平低54%（见表11）。

现在来分析多米尼加共和国排名第二的出口产品。

“鞋类外底橡胶/塑料，自然或再生皮革（非运动）和纺织鞋面”占多米尼加共和国出口美国总额的0.5%。多米尼加共和国在1990~1998年间所占的美国市场份额大幅增加，从0%上升至37.1%。1990~1998年，其主要竞争对手中国所占市场份额从14.2%上升到35.5%。1990年，墨西哥作为的主要供应商，市场份额从82%下降至1998年的18%。

相对价格与前一类产品存在同样的情况：多米尼加共和国产品的相对价格高于平均水平（1996~1998年间约高于平均水平60%而1995~1998年为100%），而中国产品的价格1995~1998年低于平均水平28%。

鉴于这种情况，如果签署的协议鼓励美国从中国进口该产品，中国将在美国市场以更低的价格与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和墨西哥竞争，并可能影响他们的市场竞争力。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因为中国将获得最惠国关税待遇，这几乎和削减关税一样重要，而这将维持与该国的贸易稳定。

### 3. 其他内科、外科、牙科或兽医仪器<sup>22</sup>

美国从加勒比海盆地国家进口的产品中排名第四的是“其他内科、外科、牙科或兽医仪器”。1998年，这类产品占美国从盆地国家进口总额的2.8%，主要供应商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市场份额分别是30.3%和5.5%。墨西哥也在此类贸易中占近30%的份额。中国供应美国的量只有0.2%，因此中国并非是盆

20 此外，美国货值8%的鞋类来自墨西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99c）。

21 相对价格是指每个国家的进口价格相较于所有国家进口的平均价格。

22 本产品在国际协调制度中为9018908000。



地国家的主要竞争对手。

#### 4. 自动数据处理仪器零配件<sup>23</sup>

此类产品在美国从加勒比海盆地国家进口的产品中排名第六，1998年占总进口量的2.6%。盆地国家中出口此类产品的是哥斯达黎加，因为英特尔于1997年入驻该国后，第二年该国的市场份额为2.2%。墨西哥同样也向美国出口此类产品，1998年占美国采购同类产品量的7.9%。同年，中国在美国拥有5%的市场份额，因此对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而言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市场的垄断正在减轻哥斯达黎加的问题。

**表11 加勒比海盆地及其他国家：出口美国主要鞋类产品的相对价格<sup>a</sup>**

(1995~1998年平均值)

|         | 零件，其他鞋面<br>及部件 | 鞋类(非运动) |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1.27           | 2.01    |
| 中国      | 0.46           | 0.72    |
| 墨西哥     | 0.96           | 0.92    |
| 加拿大     | -              | 1.54    |
| 洪都拉斯    | 0.95           | -       |
| 印度      | 1.05           | -       |
| 哥斯达黎加   | 1.59           | -       |
| 阿根廷     | 1.49           | -       |

注：<sup>a</sup>没有给出某特定国家相对产品的价格，并非意味该国不出售此类产品，而是其不是美国进口此类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和国际商业增长分析模块。

## 六、总结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对该国与美国的互惠贸易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会影响两国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发展。

中国出口美国增幅最大的领域将是纺织品和服装。该贸易至今仍受配额限制，但从2005年起，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市场的廉价产品供应商之一，这不仅会损害美国的纺织品和服装工业，而且会加剧与现今服装产品主要供应商——加勒比海盆地和墨西哥的竞争。事实上，美国政府预计中国这部分商品的出口占美国市场的份额将增加3个百分点。

这会给盆地国家经济带来严重问题，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1994年12月墨西哥货币贬值，其纺织品出口增速下降。然而，近期通过的立法延长了加勒比海盆地享有的关税优惠，使基本规则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但对于其他服装出口国而言将产生问题。

该领域最重要的事情是，无论中国是否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市场取消服装产品配额都不可避免。最大的赢家似乎是南亚国家，而主要的利益受损者将是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其次是墨西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进一步加剧上述情况，因为该国将获得更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

会，从而进一步限制盆地国家的增长机会。然而正如前面所述，这些都受到贸易利益扩张的推动。

综上所述，盆地国家在2000~2005年有机会重组其纺织和服装部门，以便能抓住机会采取主动。这表明其不能适用与此，但应考虑组织对该部门支持政策的需求以及寻求投资的基础。

在制鞋领域中，中国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强劲的竞争对手，迄今一直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因此，中美间稳定的贸易关系可能在未来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出口该类型产品产生不利影响。

在“其他医疗器械”领域，中国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出口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中国在该领域增加出口将备受关注。至于“数据处理设备零件”，中国似乎不是哥斯达黎加的主要竞争对手，因为它只占美国市场份额的0.2%。

从上可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加勒比海盆地国家的服装和鞋类商品。

最后，盆地和美洲大陆其他国家应将加勒比海盆地优惠方案的延长视为美国发出的关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前景的第一个实际的积极信号。针对于盆地国家这种特殊情况，立法规定美国总统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定盆地国家的贸易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会晤的时间表，以达

23 本产品在编码协调制度中为8473301000。



成对美国和加勒比海盆地国家双方都有利、并包含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类似规定的协议。这意味着盆地国家

有机会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平价变成现实。

#### 参考文献

- Arias, C. (1999): *Guatemala busca alternativas competitivas, Georgia*, Apparel Industry International/Bill Communications, September-October.
- Bates, G. (1999): *Limited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4,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 Bosworth, P. and G. Ofer (1995): *Reforming planned economies, An Integrating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Chacón, F. (2000):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xtiles and garments: Global restructuring of the sources of supp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90s*, *Integration and Trade*, vol. 4, No. 11,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
- Economy, E. (1999): *Painting China green*,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 Elliot, R. (2000): *Argentina Sees Fatter Farm Exports with China Pact*, Reuters, 22 March.
- EU (European Union) (2000): *The Sino-EU agreement o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Results of the bilateral negotiations*, Brussels, May, [www.europa.eu.int](http://www.europa.eu.int).
- GAO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2000):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hina's Membership Status and Normal Trade Relations Issues*, Washington, D.C.
- Gereffi, G. (2000):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apparel industry: Is NAFTA a curse or a blessing?*, *Integration and Trade*, vol. 4, No. 11, Washington, D.C., IDB.
- Gitli, E. (1997): *La industria de la maquila en Centroamérica*, San José, Costa Ric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December.
- Gitli, E. and R. Arce (2000a): *The imbalances of the Caribbean Basin countries with respect to NAFTA: The garment 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Trade*, vol. 4, No. 11, Washington, D.C., IDB.
- \_\_\_\_\_ (2000b): *¿Qué significa para la cuenca del Caribe la ampliación de preferencias comerciales de EE.UU.?*, *Capítulos*, No. 59, Caracas,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System (SELA).
-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0a): *Balance of Payment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 \_\_\_\_\_ (2000b):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 Lardy, N. (2000):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for China*, Policy Brief No. 58,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y.
- Lin, J.Y., F. Cai and Z. Li (1998): *Competition, policy burden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No. 2,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2000): *Proceso de adhesión de China a la OMC: estado a mayo de 2000*, San José, Costa Rica, Foreign Trade Office.
- Mody, A. and F. Wang (1997): *Explaining industrial growth in coastal China: Economic reforms...and what else?*,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1, No. 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Ng, F. and A. Yeats (1999): *Production Sharing in East Asia: Who Does What for Whom and Wh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Trade Team,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 Public Citizen (1999): *Clarifying the rules on WTO accession. China and MFN status*, Washington, D.C., Public Citizen Global Trade Watch, 24 May, <http://www.citizen.org>.
- The Economist (1997): *A survey of China: Ready to face the world?*, London,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March.
- The Journal of Commerce (2000a): *China should listen*, The Journal of Commerce Online, 4 February, <http://www.joc.com>.
- \_\_\_\_\_ (2000b): *Time runs down on China Pact*, The Journal of Commerce Online, 18 February, <http://www.joc.com>.
- \_\_\_\_\_ (2000c): *Clinton's biggest battle this year: trade*, The Journal of Commerce Online, 23 February, <http://www.joc.com>.
-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1999):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 United Nations (1999):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1999. Trends and Polic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9.II.C.1.
- 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 (2000): *Copy of U.S.-China Bilateral Market Agreement as Released by USTR on March 14, 2000*, Washington, D.C., <http://www.uschina.org>.
- USITC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1999a): *Industry and Trade Summary: Apparel*, Publication No. 3169, Washington, D.C., March.
- \_\_\_\_\_ (1999b): *Assessment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on 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Investigation No. 332-403,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 \_\_\_\_\_ (1999c): *Production Sharing: Use of U.S.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in Foreign Assembly Operations, 1995-1998*, Investigation No. 332-237, Washington, D.C., December.
- White House (2000): *Summary of U.S.-China Bilateral WTO Agreement*, Washington, D.C., China Trade Relations Working Group, 2 February.
- World Bank (199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999*, Washington, D.C.
-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0):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www.wto.org/wto/about/china.html](http://www.wto.org/wto/about/china.html).
- Zúñiga, C. (1999): *El Salvador se enfoca en el paquete completo*, *Apparel Industry International*, Georgia, Bill Communications, November-December.

# 天使还是恶魔

## ——中国的贸易 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Jorge Blázquez-Lidoy、Javier Rodríguez和Javier Santiso*

# 跨

越式的经济发展已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的贸易国。对拉丁美洲来说，中国的发展既是威胁，又是机遇。除了个别情况，拉丁美洲显然从中国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好处。为了分析中国的贸易影响，我们分析了该国的进出口结构。我们建立了620种不同商品的数据库和两个贸易竞争指数，来比较1998~2004年中国对34个经济体的影响（其中包括15个拉美国家）。总体而言，研究证实中国和拉丁美洲在美国市场中没有相关的贸易竞争。拉丁美洲的出口主要商品面临的竞争更少，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中国是原材料的净进口国，而拉丁美洲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

Jorge Blázquez-Lidoy

西班牙总统办公室经济局

⇒ [blazquezlidoy@telefonica.net](mailto:blazquezlidoy@telefonica.net)

Javier Rodríguez

毕尔巴鄂比斯开阿根廷银行(BBVA)

全球市场部经济学家

⇒ [javier.rgarcia@grupobbva.com](mailto:javier.rgarcia@grupobbva.com)

Javier Santiso

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

副主任兼首席发展经济学家

⇒ [javier.santiso@oecd.org](mailto:javier.santiso@oecd.org)

##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官方数据显示<sup>1</sup>，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近20年内以年均近9.5%的惊人速度增长。中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微不足道的1%增加到了6%以上。

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是最近几十年的一个重大国际事件。根据市场汇率<sup>2</sup>，200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第四大贸易国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的贸易趋势，中国将很快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5年，中国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

□ 2004年，本论文在乔治敦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拉美研究所、“亚洲与拉美：机遇和挑战”——世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与市场相遇”第九次会议（世行与德意志银行在纽约举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学会第九次会议（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和安第斯开发公司会议（加拉加斯）上发表。2005年，本论文在经合组织发展研究中心会议、美洲开发银行董事会年会、“世界经济中的拉丁美洲和亚洲：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与合作”官方研讨会（冲绳）和世行发展经济学年度会议（阿姆斯特丹）上发表。2006年，该论文在世行发展经济学年度会议（东京）上发表。三位作者要感谢Santiago Sanz, Juan Antonio Rodríguez和Luciana Taft的技术支持和有益的评论；同时，要感谢José María Álvarez Pallete, Claustre Bajona, Jean Christophe Bas, Dominique Bocquet, Guillermo Calvo, Eliana Cardoso, Luis Miguel Castilla, Carlos Elizondo, Barry Eichengreen, Antoni Estevadeordal, Albert Fishlow, Ernesto Gaba, Alicia García-Herrero, Andrea Goldstein, Ricardo Hausmann, Bert Hofman, Louka Katseli, Nathaniel Karp, Sanjay Lall, Richard Lapper, Nicholas Lardy, Bénédicte Larre, Eduardo Lora, 刘亚兰（音译），José Luis Machinea, Osmel Manzano, Diane McCollum, Alejandro Micco, Charles Oman, Jim O' Neill, Luisa Palacios, 裴米欣（音译），Guillermo Perry, Nicolas Pinaud, Philip Poole, Helmut Reisen, Germán Ríos, Dani Rodrik, Manuel Sánchez和David Taguas提供资料、建议和意见；最后，要感谢修改本论文的盲审评委。本论文如有问题和错误，完全由作者承担。

1 中国的统计数字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2003年的官方GDP是9.1%。但是，几乎所有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怀疑实际数字应该超过11%。2005年，中国官方又调整了2003年的GDP增长数据。另一方面，芝加哥大学的Alwyn Young估计1978~1998年的实际增长速度比官方数据低1.7个百分点（Young, 2000和2003）。

2 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几乎所有的华尔街分析家都强调中国的崛起是近十年最重要的事件。任何与一个拥有13亿人口国家有关的数字无疑都非常巨大。高盛预计到204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sup>3</sup>。许多分析可能过于乐观，令有些分析师怀疑中国的高速发展否由投资泡沫造成；而另一些分析师则警告中国经济可能会硬着陆，他们对人民币与美元挂钩<sup>4</sup>及中国的银行体制<sup>5</sup>表示担忧。其他分析师认为中国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以法律、尊重产权和市场经济为基础。最后，中国的国有银行是否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分配资本，在负面冲击下是否脆弱也不甚清楚。清楚的是，几乎其他所有的市场都经历过中国式的“淘金热”。例如，由于中国债券的发行，债券市场就是如此。2004年10月中旬，中国发行的十年期十亿欧元债券吸引了芬兰养老基金、意大利资产管理公司等众多欧洲大投资者，超额订购达4倍以上。这批中国债券和美国国库债券相比，有50~60个基点的利差，可与智利投资级票据或发达国家债券比肩。例如，同一周西班牙发行的债券就有20个基点的利差。

无论如何，外国投资者对中国“金矿”的兴趣越来越大。但是，经济史学家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和随之而来

---

3 最近几年，高盛实施积极策略进入中国市场。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投资银行将亚太区总部设在香港，同时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办公室。高盛在亚洲的雇员超过1000人，其中有150人负责中国业务。高盛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可参见Yao、Li及其他（2003）。

4 在美国举行大选的2003和2004年，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越来越多（Eichengreen, 2004及2006）。

5 有关中国银行体制问题，见Deutsche Bank(2004)和the Bank of Spain(2004)。在过去20年中，外资银行不断涌入中国金融市场，反映了中国和外部世界不断加深的贸易关系。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银行主要有汇丰、花旗、丰业、里昂信贷和法国巴黎银行。投资银行中，在中国市场最活跃的是高盛、摩根斯坦利、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根据英国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英国一家主要数据提供者）的估计和在《金融时报》发布的消息，2003年，国际投行为中国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所支付的费用超过2亿美元（当然，这还不足以弥补他们的支出）。

的繁荣并非全新或史无前例。<sup>6</sup>在有记载历史中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直到15世纪，中国的人均收入为世界之首。1820年，虽然中国的人均GDP早被欧洲超过，但其GDP总量仍占世界的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汇丰银行指出，很容易把中国近来的发展经历和日本或新兴亚洲经济体进行比较。的确，中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仍然远低于日本(IMF, 2004; HSBC, 2005)。这些研究强调，中国占世界产出的比重不断上升、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已经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是亚洲(Ahearne, Fernald及其他, 2003)，就连遥远的非洲也感受到了这一点(Goldstein、Pinaud及其他, 2006)。

中国对拉美影响不断增加也引起了参与本地区事务主要机构的关注(ECLAC, 2005; Ande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2006)。美洲开发银行仿效亚洲开发银行(Lin, 2004; Lal和Weiss, 2004)，大幅增加关于中国发展对拉美的影响的研究。<sup>7</sup>同时，它还建立了广泛的研究网络和安排了大量的活动，促进亚洲和拉美间的研究。<sup>8</sup>在利马举行的美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中国正式提出加入申请，而日本当选为2005年年会的东道国。2004年10月1日，美洲开发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与拉美的大型研讨会，并出版了一份详细的报告(IDB, 2004)。与会的美洲开发银行行长Enrique Iglesias表示，举办这样的活动是在美洲开发银行历史上尚属首次。

作为一家主要的欧洲银行，毕尔巴鄂比斯开阿根廷银行在拉美有很大的特许经营权。它也发表了多份研究中国对拉美的影响的报告。在《拉美观察》月刊上，该行发表了两篇相关文章。2003年6月发表的“世界贸易中的墨西哥和中国”认为(BBVA, 2003)，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国对墨西哥而言是一个负面事件。2004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潜力和对阿根廷的机遇”则认为(BBVA, 2004)，和墨西哥不同，阿根廷将会从中国的

发展中受益。同一期刊发表了两篇结论截然相反的案例研究，至少让人感到非常惊讶。中国崛起对拉美的影响的认知似乎存在矛盾。一方面，中国非常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强大的竞争力对其他经济体是一个风险。另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带来了机遇。那对拉美来说，中国究竟是天使还是恶魔？

本文以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大国为出发点，评估中国对拉美国贸易的影响。文中，我们借鉴了Rumbaugh和Blancher的研究成果(2004)，但将中国崛起带来的风险和机遇的分析范围扩大到全球。不过，Rumbaugh和Blancher在研究中排除了拉美(2004)。大多数研究中国的贸易对新兴市场的影响都倾向于把重点放在亚洲，因为中国的出口往往倾向把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产品挤出市场(Eichengreen及其他, 2004)。事实上，美国增加对华商品的进口，并没有牺牲墨西哥或中美洲国家(受地域相邻保护)，而是以日本或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代价。例如，1988年，美国近60%的鞋类产品来自韩国或中国的台湾省，仅2%来自中国大陆。到2005年，中国鞋类产品占据了美国7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进口鞋类产品大幅缩减。

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贸易大国，其速度和深度可谓史无前例。中国经济比大多数新兴市场都要开放得多。2005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占GDP的70%以上，而美国、日本或者巴西则不到30%(中国的外贸比重与智利或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相似，后二者的比重在60%~65%之间，也和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类似)。在内需和外需的推动下，从中期来看，中国外贸增长的趋势是可持续的。根据Soler的研究(2003)，从2003~2012年，伴随外贸的增长，中国劳动生产率每年将提高1%。这意味着从中期来看，中国目前的增长是可持续的。随着中国日益发展，其经济增长可能会减速，但仍然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本文不仅评估中国经济增长和外贸短期的影响，还评估其中期的影响。论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主要的贸易国；第三部分论述中国的贸易结构；第四部分分析中国的贸易竞争；第五部分讨论中国旺盛的需求带来的贸易机会，探讨地域问题及其对华贸易的影响；第六部分审视中国长期的影响；最后，给出结论。

6 参见经合组织发展中心Angus Maddison从历史视角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Maddison, 1998)，以及Carol Shiue和Wolfgang Keller的论文(2004a和2004b)。

7 例如Lora(2004a)和IDB(2006)。

8 参见拉美—加勒比—亚太经商联合会(LAEBEA)的网站：[www.laeba.org/index.cfm](http://www.laeba.org/index.cfm)。

## 二、中国崛起成为世界主要的贸易国

自1978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05年，中国年均GDP增速达9.5%<sup>9</sup> 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封闭之后，中国在过去的20年内成为世界主要的贸易国。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这些年来，中国大幅减少关税，积极融入全球贸易。中国现在的加权平均关税率为6.4%，而十年前高达40.6%（见表1）。

在商业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占世界市场的比重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出口增速在某些方面不如一些拉美国家。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智利和哥斯达黎

9 中国经济的表现及其持续性，见Yifu Lin（2004）；Zijian Wang和Wei（2004）。

加的出口增速高于中国同期（Lora,2004b）。良好的出口表现使中国赢得了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见表2）。这也意味着，其他经济体将失去在发达国家的部分市场份额。

这是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视中国为强劲的贸易竞争对手的原因之一<sup>10</sup>。一些国家甚至将自己近年出口成绩不佳归咎于中国<sup>11</sup>。确实，中国正在取代其他新兴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这

10 一个例子就是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指控不断增加，使得贸易摩擦加剧。中国已经成为头号反倾销目标（Chu和Prusa，2004）。

11 例如，美国经济虽然在2002~2004年期间显著增长，但有人将其工业部门糟糕表现间接归咎于中国，认为美国企业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中国。也有人认为，中国导致墨西哥近年出口表现不佳。

表1 最近20年的中国关税

|      | 非加权平均 | 加权平均 | 离散度（标准差） | 最大值   |
|------|-------|------|----------|-------|
| 1982 | 55.6  | —    | —        | —     |
| 1992 | 42.9  | 40.6 | —        | 220.0 |
| 1997 | 17.6  | 16.0 | 13.0     | 121.6 |
| 2002 | 12.3  | 6.4  | 9.1      | 71.0  |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年）。

表2 中国出口产品在主要市场的份额

（占主要市场总进口额的比例）

|                 | 1960 | 1970 | 1980 | 1990 | 2000 | 2002 | 2004 | 2005 <sup>a</sup> |
|-----------------|------|------|------|------|------|------|------|-------------------|
| 日本              | 0.5  | 1.4  | 3.1  | 5.1  | 14.5 | 18.3 | 20.8 | 21.0              |
| 美国              | —    | —    | 0.5  | 3.2  | 8.6  | 11.1 | 13.8 | 14.2              |
| 欧盟 <sup>b</sup> | 0.8  | 0.6  | 0.7  | 2.0  | 6.2  | 7.5  | 14.1 | 10.1              |

注：<sup>a</sup> 2005年1~6月。

<sup>b</sup> 不包括欧盟国家的区内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和《贸易统计》。



种负面看法进一步加深。入世意味着全球各个市场向中国产品打开了大门，中国在这些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越发明显。实际上，中国和其他专门出口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工业产品经济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所以，从短期上来说要付出一些代价。

中国占世界出口的份额在过去20年中快速增长，似乎也印证了上述的负面观点。1980年，中国占世界出口的比重只有0.9%；2002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了5%；2003年，增加到近6%；2004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出口国。从1990~2002年，世界出口增加了约90%；而中国出口增加了约425%。中国出口的增长意味着其他国家正在失去市场份额。很明显，一些国家将在短期内付出代价。

中国能够以很低的成本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这是因为和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更丰富。和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只有他们的1/4。2002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月薪是112美元，而墨西哥大约是440美元，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等中美洲城市出口加工业国家约为300美元。但是，如果从完全负面的角度看这些问题未免太天真了。

以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对华贸易能够带来好处。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其国内市场也将日益繁荣。中国的崛起将带来长期的贸易利益。已经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东亚国家将从这一过程中受益。

### 三、中国的贸易结构

我们需要研究中国的进出口结构，从而分析中国外贸的短期影响。

首先，商品进出口额差距巨大，达304亿美元。正如上一部分所述，中国贸易平衡这一特点只是一个暂时现象。换言之，我们预计，中国贸易平衡长期来看将更加可持续。

我们这里使用了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库<sup>12</sup>，它包含了620种不同商品，使用了小数点后三位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为了方便表述，这里使用小数点后一位的分类。

在出口方面，2004年的三个关键部门是制成品、机械和交通设备、以及杂项制成品。这三个部门占出口总额的87.4%（见表3）。

这里要特别关注机械和交通设备业的优异表现。1998年，此类商品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8.0%，六年后上升到46.6%，上升幅度达18.6个百分点。相反，杂项制成品的比重正在迅速下降。

在进口方面，我们发现制成品、机械和交通设备、以及化学品是三个主要的部门。2004年，它们占总进口额的69.2%（见表4）。进出口相似的结构表明，产业内贸易非常活跃。实际上，这也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区域生产中心和再出口的生产基地。

和出口方面一样，机械和交通设备也增长迅速。相反，制成品在进口总额的比重正在下降。实际上，如果我们使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国际贸易数据交互式图像系统（SIGCI），会发现同样的结果。该数据库将贸易结构分为高技术制成品、中等技术制成品、低技术制成品、自然资源制成品、原材料和其他交易（见表5）。

相对类似的贸易结构表明产业内贸易的存在。高技术制成品的份额增加迅速；而低技术制成品在进出口结构中的比重都在下降。

但是，这些数据并没有揭示中国的优势和劣势。我们需要更具体的分析，以研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12 该数据库可在www.intracen.org上找到。

表3 中国的出口结构

( 占总出口额的百分比 )

|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
| 机械和交通设备         | 28.0 | 31.1 | 34.2 | 36.8 | 40.3 | 44.0 | 46.6 |
| 杂项制成品           | 37.3 | 36.2 | 33.7 | 31.9 | 30.2 | 28.1 | 25.6 |
| 制成品             | 16.0 | 15.3 | 15.4 | 14.8 | 14.5 | 14.0 | 15.2 |
| 化学品             | 5.4  | 5.1  | 4.6  | 4.7  | 4.5  | 4.2  | 4.2  |
| 食品和动物           | 5.8  | 5.4  | 4.9  | 4.8  | 4.5  | 4.0  | 3.2  |
| 矿物燃料和润滑剂        | 2.8  | 2.3  | 3.1  | 3.1  | 2.6  | 2.5  | 2.4  |
| 初级产品            | 2.1  | 2.1  | 1.9  | 1.9  | 1.8  | 1.6  | 1.6  |
| 原油物料 (不包括食品和燃料) | 1.7  | 1.8  | 1.6  | 1.4  | 1.2  | 1.0  | 0.9  |
| 饮料和烟草           | 0.5  | 0.4  | 0.3  | 0.3  | 0.3  | 0.2  | 0.2  |
| 动物和植物油/脂/蜡      | 0.4  | 0.3  | 0.3  | 0.3  | 0.2  | 0.2  | 0.1  |

资料来源: Intracen, 2004年。

表4 中国的进口结构

( 占总进口额的百分比 )

|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
| 机械和交通设备         | 38.8 | 40.5 | 40.3 | 42.3 | 45.3 | 45.9 | 44.4 |
| 制成品             | 22.5 | 21.2 | 19.0 | 17.7 | 17.2 | 16.2 | 13.6 |
| 化学品             | 13.8 | 13.8 | 12.7 | 12.4 | 12.3 | 11.1 | 11.2 |
| 杂项制成品           | 7.8  | 7.3  | 6.1  | 7.7  | 7.6  | 8.6  | 9.4  |
| 原油物料 (不包括食品和燃料) | 7.5  | 7.6  | 8.8  | 9.0  | 7.6  | 8.2  | 9.8  |
| 矿物燃料和润滑剂        | 4.9  | 5.5  | 9.2  | 7.2  | 6.6  | 7.1  | 8.6  |
| 食品和动物           | 2.7  | 2.2  | 2.1  | 2.0  | 1.8  | 1.4  | 1.6  |
| 初级产品            | 1.1  | 1.5  | 1.4  | 1.3  | 1.2  | 1.0  | 0.9  |
| 动物和植物油/脂/蜡      | 0.6  | 0.4  | 0.2  | 0.1  | 0.2  | 0.3  | 0.4  |
| 饮料和烟草           | 0.1  | 0.1  | 0.2  | 0.2  | 0.1  | 0.1  | 0.1  |

资料来源: Intracen, 2004年, 联合国贸发会议/世贸组织。

表5 中国的进出口结构

( 占总进出口额的百分比 )

|             | 1990 | 1995 | 2000 | 2003 | 2004 | 2005 |
|-------------|------|------|------|------|------|------|
| <i>出口结构</i> |      |      |      |      |      |      |
| 高技术制成品      | 5.3  | 13.0 | 22.4 | 30.3 | 32.5 | 33.2 |
| 低技术制成品      | 40.2 | 46.3 | 41.2 | 35.2 | 32.5 | 31.5 |
| 中技术制成品      | 20.8 | 18.8 | 19.6 | 20.4 | 21.7 | 22.0 |
| 自然资源制成品     | 11.4 | 12.0 | 9.9  | 9.1  | 9.3  | 9.4  |
| 原材料         | 20.2 | 9.0  | 6.2  | 4.5  | 3.5  | 3.3  |
| 其他交易        | 2.1  | 0.7  | 0.7  | 0.6  | 0.5  | 0.5  |
| <i>进口结构</i> |      |      |      |      |      |      |
| 高技术制成品      | 13.4 | 17.4 | 28.0 | 34.0 | 34.2 | 35.7 |
| 中技术制成品      | 45.9 | 42.0 | 30.4 | 31.1 | 29.4 | 27.0 |
| 原材料         | 10.8 | 10.3 | 13.7 | 11.5 | 14.5 | 16.4 |
| 自然资源制成品     | 11.9 | 13.9 | 15.2 | 13.0 | 13.2 | 12.6 |
| 低技术制成品      | 17.0 | 14.9 | 11.6 | 9.9  | 8.2  | 7.8  |
| 其他交易        | 1.0  | 1.0  | 1.1  | 0.6  | 0.5  | 0.6  |

资料来源: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国际贸易数据交互式图像系统。



## 四、短期代价：中国的贸易竞争

虽然我们认为长期来看，中国将使其他新兴经济体受益，但短期上的确会付出一些代价。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正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展开竞争。在拉美国家中，就有传闻认为墨西哥付出了短期代价<sup>13</sup>。

我们使用两种贸易竞争指数，评估中国的竞争引发的短期代价。该指数比较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特定时间内的贸易结构。如果两国贸易结构相似，那么在第三方市场的竞争可能性就更大，如拉美国家出口的主要市场——美国。

我们在构建指数时，使用了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库。该指数是广为人知的专业化系数（CS）和一致性系数（CC）的修正版。

$$CS = 1 - \frac{1}{2} \sum_n |a_{in}^n - a_{jn}^n|$$

$$CC = \frac{\sum_n a_{in}^n a_{jn}^n}{\sqrt{\sum_n (a_{in}^n)^2 \sum_n (a_{jn}^n)^2}}$$

$a_{in}$ 和 $a_{jn}$ 分别代表某段时间 $t$ 内，商品 $n$ 占 $i$ 国和 $j$ 国总出口额的比重。其中一个国家是中国，另一个是我们选取的国家。如果两国（ $i$ 和 $j$ ）出口结构完全一致，则两指数都为1。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贸易竞争很激烈。另一方面，如果两国的出口结构没有交集，则两指数等于0。我们使用了两个指数，而非一个指数，以确保结果的一致性<sup>14</sup>。我们通过计算专业化系数和一致性系数，比较中国和34个经济体（其中包括15个拉美国家）之间的竞争，选取的时间段是1998~2004年，分别得出每年的专业化系数和一致性系数。

总结，我们比较了中国和34个国家的出口结构，选取了7个不同的年份（1998~2004年），最后针对每一

年份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指数。我们整理数据，用尽可能最简单的方式展示结果。最后的数据CI是两指数的算数平均（见表6和图1）。

结果非常有趣。除墨西哥以外，其他拉美国家的数据相对偏低。总体而言，结果表明中国和拉美国家在美国市场中没有直接竞争。出口主要商品的国家面临的竞争更少。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是原材料的净进口国。巴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巴拿马在选取的34个国家中的数据是最低的，也就是说，它们面临中国贸易的竞争最少。巴西和哥伦比亚的情况可以被认为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之间。

当我们比较拉美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特别是在亚洲的新兴国家之后，我们发现总体而言，中国带来的竞争不是问题。因此，从贸易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拉美国家在贸易上的短期代价，即使有也不会很大。实际上，大多数拉美国家对华出口大幅增加。例如，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巴西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2003年的出口额比2002年增加了80%。2001~2004年，双边贸易翻了两番。但是，双边贸易过度集中在五类商品，大豆、铁矿石、钢铁、大豆油和木材占巴西2005年对华出口的75%。一些巴西大公司，如拉美最大的木纸浆生产商阿拉克鲁斯（Aracruz）在过去两年中对华销售额增加了一倍以上（现在占公司出口总额的12%）<sup>15</sup>。中国还是铁矿石生产商淡水河谷等其他巴西公司的主要贸易伙伴。对巴西来说，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出口产品的可持续性。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中国将不断扩大出口，新产品将不断在第三方市场中获取份额。一些巴西经济学家(Paiva de Abreu, 2005)指出，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巴西产业，如钢铁业，中期会受到中国竞争的影响。长远来看，汽车产业也会是一个问题。

13 参见，例如《美洲经济》（2003）和《华尔街日报》（2004）。

14 两指数的相关性是0.94，表明两数据是一致的。

15 2004年5月，巴西总统卢拉率领400名企业家组成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表6 中国和拉美国家在美国市场的贸易竞争, 2002~2004年<sup>a</sup>

|       | 专业化系数<br>(CS) <sup>b</sup> | 一致性系数<br>(CC) <sup>b</sup> | 算数平均<br>(CI) <sup>b</sup> | 算数平均<br>(CI 2002) <sup>c</sup> |
|-------|----------------------------|----------------------------|---------------------------|--------------------------------|
| 巴拉圭   | 0.08                       | 0.02                       | 0.05                      | 0.07                           |
| 委内瑞拉  | 0.10                       | 0.03                       | 0.06                      | 0.10                           |
| 玻利维亚  | 0.12                       | 0.04                       | 0.08                      | 0.11                           |
| 巴拿马   | 0.11                       | 0.06                       | 0.08                      | 0.11                           |
| 智利    | 0.14                       | 0.04                       | 0.09                      | 0.11                           |
| 洪都拉斯  | 0.14                       | 0.05                       | 0.09                      | 0.13                           |
| 俄罗斯   | 0.15                       | 0.06                       | 0.10                      | 0.12                           |
| 乌拉圭   | 0.18                       | 0.07                       | 0.12                      | 0.17                           |
| 秘鲁    | 0.19                       | 0.08                       | 0.13                      | 0.17                           |
| 阿根廷   | 0.20                       | 0.08                       | 0.14                      | 0.17                           |
| 危地马拉  | 0.24                       | 0.11                       | 0.17                      | 0.16                           |
| 哥伦比亚  | 0.25                       | 0.12                       | 0.18                      | 0.20                           |
| 萨尔瓦多  | 0.31                       | 0.21                       | 0.26                      | 0.25                           |
| 巴西    | 0.30                       | 0.21                       | 0.26                      | 0.28                           |
| 巴基斯坦  | 0.30                       | 0.26                       | 0.28                      | 0.32                           |
| 斯洛文尼亚 | 0.40                       | 0.23                       | 0.31                      | 0.33                           |
| 西班牙   | 0.42                       | 0.22                       | 0.32                      | 0.34                           |
| 哥斯达黎加 | 0.34                       | 0.32                       | 0.33                      | 0.29                           |
| 印度    | 0.42                       | 0.25                       | 0.34                      | 0.38                           |
| 日本    | 0.41                       | 0.35                       | 0.38                      | 0.38                           |
| 菲律宾   | 0.40                       | 0.37                       | 0.39                      | 0.33                           |
| 保加利亚  | 0.43                       | 0.36                       | 0.39                      | 0.41                           |
| 克罗地亚  | 0.45                       | 0.34                       | 0.40                      | 0.42                           |
| 波兰    | 0.44                       | 0.35                       | 0.40                      | 0.46                           |
| 土耳其   | 0.43                       | 0.38                       | 0.41                      | 0.49                           |
| 印度尼西亚 | 0.46                       | 0.39                       | 0.43                      | 0.42                           |
| 美国    | 0.43                       | 0.44                       | 0.44                      | 0.44                           |
| 罗马尼亚  | 0.45                       | 0.45                       | 0.45                      | 0.52                           |
| 新加坡   | 0.45                       | 0.52                       | 0.48                      | 0.43                           |
| 捷克    | 0.50                       | 0.52                       | 0.51                      | 0.43                           |
| 马来西亚  | 0.48                       | 0.57                       | 0.53                      | 0.46                           |
| 墨西哥   | 0.52                       | 0.54                       | 0.53                      | 0.50                           |
| 韩国    | 0.50                       | 0.60                       | 0.55                      | 0.48                           |
| 匈牙利   | 0.54                       | 0.66                       | 0.60                      | 0.55                           |
| 泰国    | 0.57                       | 0.71                       | 0.64                      | 0.57                           |

注：<sup>a</sup> 按算数平均升序排列。

<sup>b</sup> 2002~2004年平均水平。

<sup>c</sup> 2000~2002年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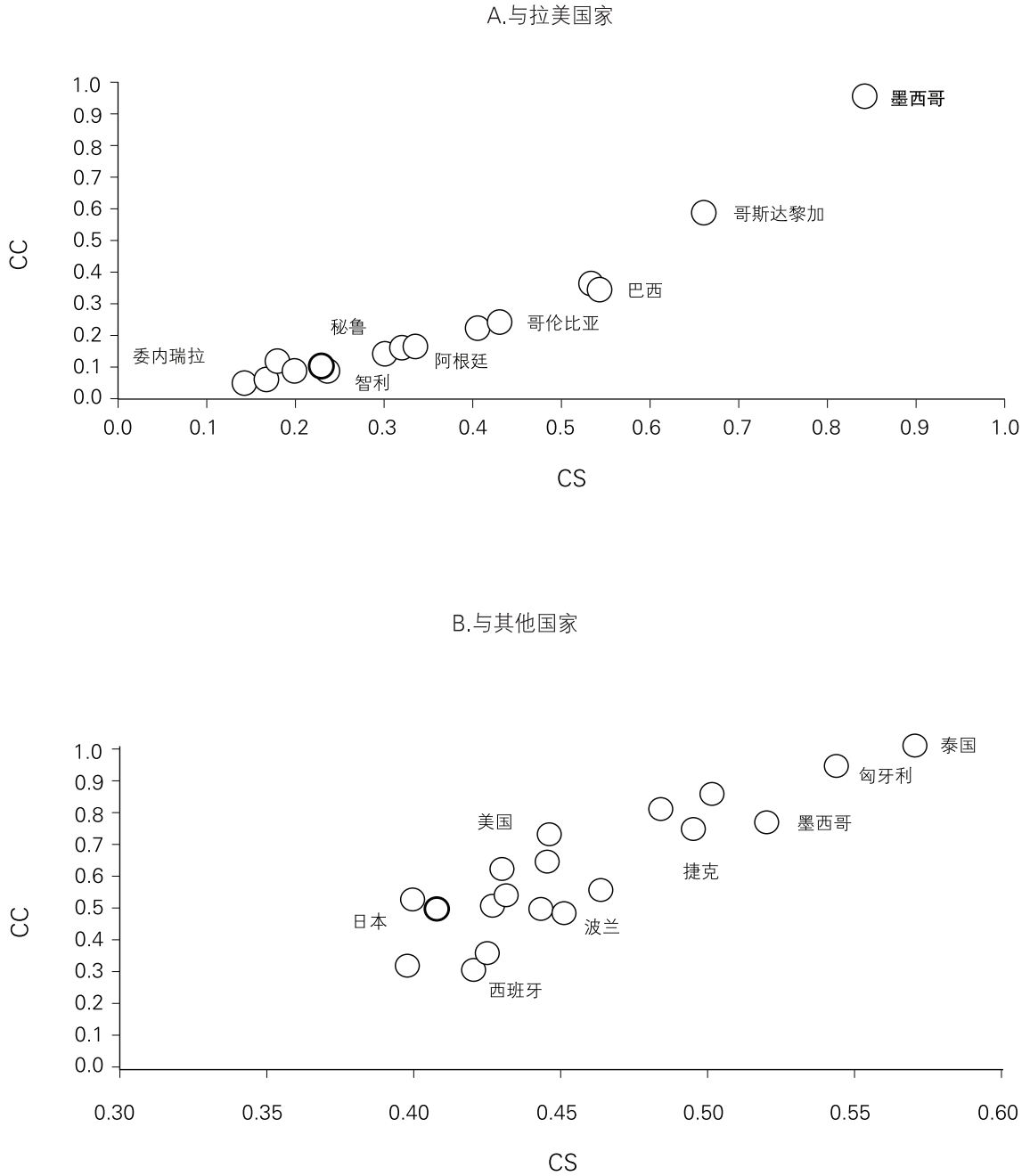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和拉美国家在美国市场的贸易竞争，2002~2004年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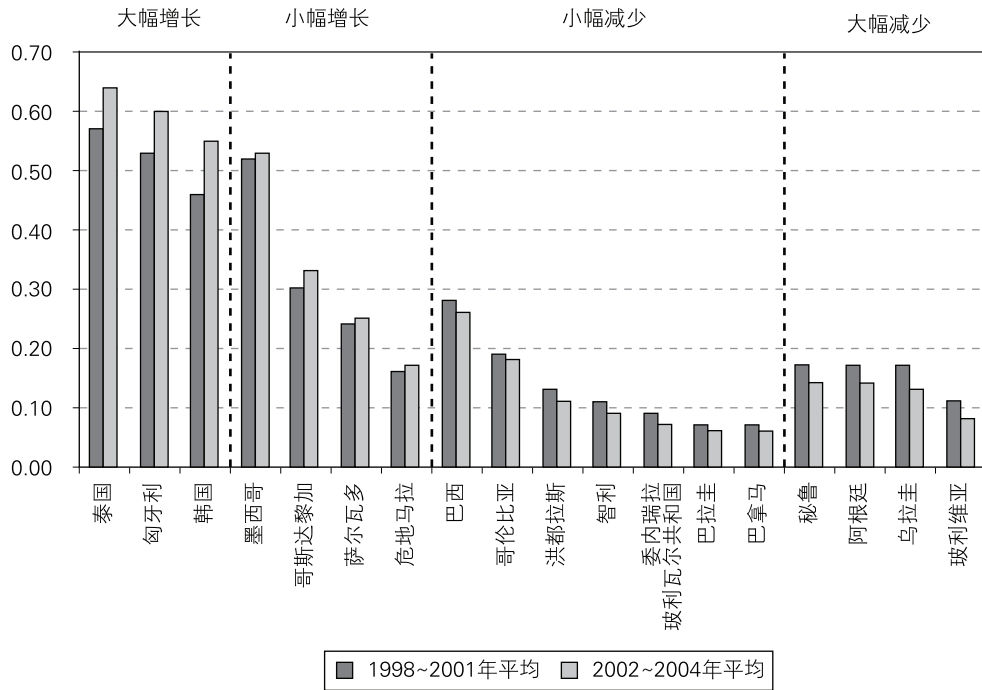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的贸易竞争，1998~2001年和2001~2004年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

墨西哥则显然是另外一种情况。结果表明，墨西哥面临强有力的商业竞争<sup>16</sup>。实际上，只有韩国、匈牙利和泰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潜在竞争。由此看来，经验证据证实了形式分析。更重要的是，CI指数表明<sup>17</sup>，中国的贸易竞争将会日趋激烈。

在第二阶段，中国的竞争将在贸易竞争已经非常激烈的国家进一步加剧，如泰国、匈牙利和韩国。相反，拉美国家整体面临的中国的贸易竞争较少。在我们研究的15个拉美国家中，11个国家的指数呈下降趋势（见图2）。

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会影响部分墨西哥产品出口国外市场。经验证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目前，美国是墨西哥出口商品的最大的市场。2005年，85%的墨西哥

出口产品销往美国。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为12.1%，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墨西哥。Berges (2004)对这些趋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根据巴拉萨指数<sup>18</sup>，墨西哥的出口拳头产品是信息技术产品、电子消费品、电子零部件、服装、交通设备和杂项制成品。该指数根据巴拉萨公式计算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它涉及14个不同的行业，比较某个行业占本国和世界出口额的比重。如果该指数大于1，则该国在这个行业中具有优势。相反，中国在信息技术产品、电子消费品、服装、杂项制成品、纺织、基本制成品和皮革类产品上具有优势。因此，中墨两国具有优势的领域相似。在墨西哥看来，交通设备是唯一没有中国竞争的领域。

16 Soler的研究(2003)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损害了墨西哥的出口。但是，对墨西哥最终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贸易竞争，也取决于资本流动的变化。

17 其他国家的数据，参见附录1。

18 相关信息可在www.intracen.org上找到。

表7 巴拉萨专业化指数

|            | 中国 2002 | 中国 2004 | 墨西哥 2002 | 墨西哥 2004 |
|------------|---------|---------|----------|----------|
| 木材产品       | 0.45    | 0.43    | 0.26     | 0.26     |
| 皮革产品       | 3.70    | 3.34    | 0.34     | -        |
| 化学品        | 0.46    | 0.42    | 0.35     | 0.34     |
| 食品加工       | 0.57    | 0.47    | 0.57     | 0.56     |
| 纺织品        | 2.43    | 2.39    | 0.53     | 0.49     |
| 矿产品        | 0.29    | 0.28    | 0.83     | 1.06     |
| 基本制成品      | 1.01    | 0.96    | 0.76     | 0.69     |
| 非电子类机械     | 0.52    | 0.52    | 0.82     | 0.84     |
| 生鲜食品       | 0.77    | 0.68    | 0.69     | 0.80     |
| 杂项制成品      | 1.59    | 1.48    | 1.08     | 1.07     |
| 交通设备       | 0.25    | 0.27    | 1.43     | 1.34     |
| 服装         | 3.65    | 3.46    | 1.39     | 1.29     |
| 电子零部件      | 1.04    | 1.04    | 1.49     | 1.53     |
| 信息技术和电子消费品 | 2.00    | 2.43    | 1.81     | 1.75     |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根据Intracem制作，联合国贸发会议/世贸组织，2004年。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墨西哥的出口模式存在风险。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生效。墨西哥专注于出口加工业等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中国也能够生产同类产品，且成本更低。中国的劳动力也比拉美国家相对更充足。上文已经提到，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有拉美国家的1/4。此外，中国政府通过“一站式服务”计划，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提供税收减免和技术支持。加入世贸组织打开了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大门。由于中国的竞争，墨西哥现有的出口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新加坡、中国台湾省和韩国已经正在通过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调整出口结构。

但是，如果不考虑生产和劳动成本，我们很难预测墨西哥的出口结构会如何变化；也很难评估中国对墨西哥未来的影响。与中国相比，墨西哥有一大明显的竞争优势：地理位置接近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地理距离的阻碍时，强调交通和贸易成本（Hummels，2001a）。距离导致的延期问题也增加了贸易、运输和交易成本。然而，Harrigan和Venables(2004)及Hummel (2001b)认为，贸易问题中距离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时间，即送达最终和中间产品耗费的时间。时间成本不仅在数量上是地理相近的重要方面，生产和运输同步性的质量高低也非常关键，这能够促进产业的聚集。墨西哥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就是确定距离和时间在其中具有核心比较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产品。

Evans和Harrigan(2003)在具体研究中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其中及时交货非常重要，因此产品就近在最终需求地生产，这样工资成本较高。在他们的模型中，及时交货是核心优势，因为这样零售商可以快速有效地应对最终需求的波动，不必保持高成本的库存。唯有就近生产，才有可能及时交货。这一理论模型与20世纪90年代的实证范例和趋势相一致。当时，一些生产基地从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如中国，转移到了墨西哥这样工资更高的国家。美国的服装市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时间对季节性产品非常重要。通过对一家主要百货商店的研究，他们发现了有力的证据，证明附近的生产商专门生产对时间要求高的产品，这与他们的理论模型是一致的。

对于墨西哥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来说，减少贸易成本能够增强自身的战略优势，因为贸易成本已经比生产成本重要得多(Dearoff，2004)。一些研究发现，贸易对距离的弹性适度下降，尽管大多数研究认为几乎没有变化，甚至适度升高(Disdier 和 Head，2004)。有数据表明从长期来看，引力方程的估计会有所增加(Brun、CarrèBr 及其他，2005) Anderson和vanWincoop (2003)估计贸易成本差不多平均是生产成本的两倍。这表明贸易成本是比较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甚至比中国所具备的生产成本优势更加重要。

实际上和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同，在过去的几十

年中，距离对贸易的影响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sup>19</sup>。Hummels (2001b)提出了证据，用航运成本的具体数据证明，远洋运输成本实际上增加了，而美国的空运成本1955~1997年间大幅下降（这一结论也被Glaeser和Kohlhase 2003年的陆路运输成本研究所证实）。因此，并非所有的运输成本都随时间的推移而降低。Berthelon和Freund (2003)发现：在他们研究的近770个行业中，距离对25%以上的行业贸易，即30%以上贸易有重大和日益增加的影响，而且没有任何行业贸易中距离因素的重要性有所下降。Carrere和Schiff (2003)在研究距离如何随时间的推移影响国家的贸易之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1962~2000年，大多数国家（除了美国）的贸易距离——考察一国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心距离的指标，DOT——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换句话说，一些国家（仍然）因为距离世界经济活动的中心较近而受益；另一些国家则因为距离较远而处于不利的位置。Disdier和Head (2004)系统地考察了55篇论文中856个距离影响如何随时间的推移减少或增加，发现距离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在20世纪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还需要减少交通成本，提高基础设施效率。对大多数希望进入美国市场的拉美国家而言，交通成本比进口关税构成了更大的障碍<sup>20</sup>。在一份针对美国市场航运成本的具体分析中，Clark、Dollar和Micco (2004)研究了每年30多万条记录的航运产

19 参看Anderson和van Wincoop的研究 (2004)。

20 从这个而言，巴拿马-普埃布拉高速公路的修建能够极大地促进中美洲国家、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贸易。

品数据库，发现港口效率是航运成本的一项重要决定因素<sup>21</sup>。随着（亚洲和拉美国家）降低平均关税壁垒，交通成本作为贸易决定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上升，这也是个相关的问题。除墨西哥外，拉美国家的平均货运成本与其亚洲竞争对手相近，有时甚至还更高。

对智利和厄瓜多尔这样的拉美国家来说，进入美国市场的交通成本比平均关税要高20多倍。降低交通成本，提高基础设施效率，能够提高拉美出口商的出口<sup>22</sup>。Clark、Dollar和Micco (2004)非常关注港口效率对交通成本的影响，他们发现，如果拉美国家港口效率从全世界最低的1/4提高到效率最高的1/4，航运成本将降低12%以上。在靠近美国的墨西哥，如果港口效率能够提高到法国或者瑞典的水平，交通成本将减少约10%。根据他们的估计，如果巴西或厄瓜多尔达的港口效率到发达国家水平，他们的海运成本将减少15%以上。拉美国家的港口效率被认为世界上最低的，海关存在严重的问题，平均通关延误7天（厄瓜多尔最慢15天，委内瑞拉11天）。此外，港口集装箱吞吐成本高，严重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威胁海港的基础设施。很明显，拉美国家在许多方面可以改进。总而言之，根据三位学者的估算，如果港口效率从全世界最低的1/4提高到效率最高的1/4，航运成本将降低12%以上，相当于距离缩短5000英里。

21 他们的研究还表明距离的重要性，距离与交通成本相关性（1%）。也就是说，距离增加一倍，交通成本会增加约18%。参见附录2的表格。

22 Limao和Venables (2000)的研究表明，交通成本增加10%，贸易额将减少20%以上。他们还发现，基础设施落后使交通成本增加了40%以上。

## 五、短期机遇：中国的强劲需求

如上文所述，除个别例外，中国对拉美的影响总体是积极的。即使对墨西哥这样在美国市场面临日益严峻的竞争压力的国家，中国（至少在理论上）也是机遇，是内部贸易的潜在出口市场。

为了评估中国需求增加的潜在收益，我们构建了两个指数。和前例相同，我们使用了包含620种不同商品的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这两个数据库对15个拉美国家的出口结构和中国的进口结构进行了比较。如果某国



的出口结构和中国的进口结构相似，拉美经济体就能获得潜在的贸易收益。必须指出的是，即使两指数的值趋近1，该国也未必与中国进行贸易。我们必须强调存在潜在的收益和一个明显的商机。

这两个指数是著名的专业化系数（ $CSm$ ）和一致性系数（ $CCm$ ）的修正版。

$$CSm = 1 - \frac{1}{2} \sum_n |a_{it}^n - a_{jt}^n|$$

$$CCm = \frac{\sum_n a_{it}^n a_{jt}^n}{\sqrt{\sum_n (a_{it}^n)^2 \sum_n (a_{jt}^n)^2}}$$

$a_{it}$ 代表 $t$ 时间内商品 $n$ 占某拉美国国家总出口的比重， $a_{jt}$ 代表 $t$ 时间内商品 $n$ 在中国总进口中的比重。如果中国的进口和该拉美国国家的出口完全对应，则两指数等于1。在构建两指数时，我们考虑到要确保结果的一致。和上一章一样，我们计算了1998~2004年每年的 $CSm$ 和 $CCm$ 指数。最后，为便于表述，我们将两指数合为一个新的指数 $CI_m$ （见表8）。

表8 对华贸易的潜力

|       | $CSm^{ab}$ | $CCm^{ab}$ | $CI_m^b$ | $CI_m$<br>2002 <sup>c</sup> |
|-------|------------|------------|----------|-----------------------------|
| 巴拿马   | 0.09       | 0.03       | 0.06     | 0.08                        |
| 洪都拉斯  | 0.13       | 0.04       | 0.08     | 0.08                        |
| 巴拉圭   | 0.10       | 0.08       | 0.09     | 0.10                        |
| 秘鲁    | 0.16       | 0.09       | 0.13     | 0.15                        |
| 玻利维亚  | 0.16       | 0.09       | 0.13     | 0.14                        |
| 乌拉圭   | 0.18       | 0.07       | 0.13     | 0.15                        |
| 智利    | 0.17       | 0.12       | 0.15     | 0.17                        |
| 萨尔瓦多  | 0.21       | 0.11       | 0.16     | 0.17                        |
| 危地马拉  | 0.24       | 0.14       | 0.19     | 0.16                        |
| 委内瑞拉  | 0.17       | 0.30       | 0.23     | 0.25                        |
| 哥斯达黎加 | 0.24       | 0.25       | 0.25     | 0.25                        |
| 哥伦比亚  | 0.25       | 0.28       | 0.27     | 0.27                        |
| 阿根廷   | 0.31       | 0.23       | 0.27     | 0.30                        |
| 巴西    | 0.40       | 0.33       | 0.36     | 0.36                        |
| 墨西哥   | 0.44       | 0.50       | 0.47     | 0.47                        |

注：<sup>a</sup>  $CI_m$ 升序

<sup>b</sup> 2002~2004年平均

<sup>c</sup> 2000~2002年平均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

结果并不让人感到鼓舞。主要原因是拉美国国家是初

级产品出口国，所以与中国的潜在贸易集中在几种商品。换句话说，拉美国国家（除了墨西哥和巴西）的出口结构使得其很难与中国开展行业内贸易。

为了便于表示，我们只提供了较大国家的出口专业化指数。附录表1.2（附录1）提供了11个拉美国国家的数据。黑色粗体代表拉美国国家擅长而中国不擅长的领域，如木材、食品加工、矿产和消耗品。很明显，这些都是原材料行业。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在化学品行业拥有优势<sup>23</sup>，墨西哥在交通设备上具有竞争力。

总体而言，拉丁美洲在出口初级产品方面具有优势。这意味着潜在的贸易收益局限在极少数几个领域。此外，由于中国的强劲需求，对华贸易将加剧拉美国国家在这些领域的专业化，从而加大这些国家陷入“原材料陷阱”的风险，无法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实际上，中国也在增加自己在一些原材料市场的需求（见表9）。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棉花、铜和大豆进口国，和第四大石油进口国<sup>24</sup>。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不断上升，特别是铜和大豆（需求每年上升50%）。石油进口每年上升近20%。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铜进口国，刺激了智利和秘鲁的铜出口。由于重工业扩张和经济繁荣，供应商不得不竭力满足巨大的石油需求，中国从而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3年，全球每日石油消费增长的1/3源于中国的需求。

表9 中国和世界：1997~2004年均进口增长  
(百分比)

|                 | 中国   | 世界  |
|-----------------|------|-----|
| 石油              | 24.4 | 2.9 |
| 铜               | 18.4 | 4.0 |
| 大豆 <sup>a</sup> | 20.5 | 6.9 |

注：<sup>a</sup> 2001~2004年均。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世界金属统计》和英国石油公司

23 但是，中国主要从东亚国家进口化学品。这一领域也是东亚国家擅长的领域。参见Ianchovichina和Walmsley（2003）。

24 200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进口的大豆占世界大豆进口总额的34.3%，而在1997年，仅占7.4%。2004年，中国的铜进口占世界铜进口总额的25.3%，而在1997年仅占5%。最后，中国的石油进口占2004年世界石油进口总额的7.2%，而在1997年仅占2.3%。

虽然只限于几种初级产品，中国对原材料的强劲需求对拉美国家来说是个好消息。在经济方面，可以将其视为积极的需求冲击。此外，虽然对华直接贸易量没有增加，但仍然对该地区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初级产品几乎是同质化的产品。例如，如果中国增加对原油的需求，产油国应当增加产量，否则油价就会上涨。自2004年以来，中国对石油的旺盛需求将油价推至1983年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进行石油期货交易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总部位于巴黎的经合组织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04年第一季度全球每日石油消费额增加了180万桶，中国的消费量就占了100万桶。2000~2004年，中国占世界石

油需求增长的近40%。

拉美国家主要出口铜、石油、大豆和咖啡四种初级产品，占原材料出口的66%。除了咖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销往中国。

同时，拉丁美洲是世界初级产品主产区之一，全世界47%的大豆，40%的铜和9.3%的原油产自该地区。由于对初级产品出口享有专业化水平，中国强劲的需求短期对大多数拉美国家来说是机遇。如果这一强劲需求持续下去，对整个地区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拉美国家必须提高专业化水平。否则，对初级产品的依赖会不断增加，贸易冲击的风险将依旧存在。

表10 拉美七国的出口结构  
(各国出口百分比)

|      | 食品 | 燃料 | 金属 | 制造类 |
|------|----|----|----|-----|
| 墨西哥  | 6  | 10 | 2  | 81  |
| 巴西   | 31 | 1  | 9  | 54  |
| 阿根廷  | 49 | 12 | 2  | 34  |
| 哥伦比亚 | 32 | 31 | 1  | 31  |
| 秘鲁   | 35 | 7  | 39 | 17  |
| 智利   | 25 | 1  | 48 | 16  |
| 委内瑞拉 | 2  | 83 | 2  | 12  |

资料来源：LatinFocus (2004)。

## 六、中国对贸易的长期影响

上文对中国影响的负面解释认为需求冲击是暂时的。正如经济理论所预言，从长期来说，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和世界贸易的增长对其他国家有益。《世界经济展望》(IMF, 2004)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情况，分析中国对世界贸易和增长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审慎对待研究结果，因为这两种情况都显示中国长期将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大多数地区都会从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强有力需求中受益，虽然有些地区因为与中国劳动力的竞争相对较强而受益较少。此外，这份研究还强调，结构更灵活的国家将获得更多的好处。这些结论与

lanchovichina和Martin (2003)的研究结果相似。

然而，全球贸易大国的崛起并非新鲜事物<sup>25</sup>。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目前的状况与日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历进行比较(见 Yang, 2003; HSBC, 2005)。21世纪伊始，日本是世界关键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总额9%。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时的工资水平也相对较低。之后的20多年，日本推行刺激增长和出口的经济政策，一跃

25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望也分析了东亚的崛起(IMF, 2004)。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来看，日本经济的良好表现和当时整个世界经济（包括拉美经济）的表现是分不开的。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经济表现和日本有相似之处，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日本经济在1952~1972年期间和中国经济从1979~1999年期间都高速发展，年均增长长达8.5%。此外，两国各自贸易<sup>26</sup>年均增长约13%。<sup>27</sup>

但是，中日两国不仅在贸易和增长方式上相似，两国在可比时期内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大致相当。两国平均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0.6%。具体来说，1952~1972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5.8%，其中日本贡献了0.6%；1979~1999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3.7%，其中中国贡献了0.6%。（见图3）

但是，我们通过比较也发现了一些明显的差异。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GDP构成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GDP构成非常相似（见表11），大约60%是消费，15%是投资，25%以上是净出口<sup>28</sup>。在上述时期内，两国的GDP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的GDP构

成中，消费和净出口下降，投资上升；而中国的消费下降，净出口和投资上升。

**表11 中日两国的GDP构成**  
(占GDP的百分比)

| 日本  | 1953 | 1972 |
|-----|------|------|
| 消费  | 60   | 53   |
| 投资  | 14   | 35   |
| 净出口 | 26   | 11   |
| 中国  | 1979 | 1999 |
| 消费  | 57   | 47   |
| 投资  | 17   | 21   |
| 净出口 | 27   | 32   |

资料来源：Summers 和Heston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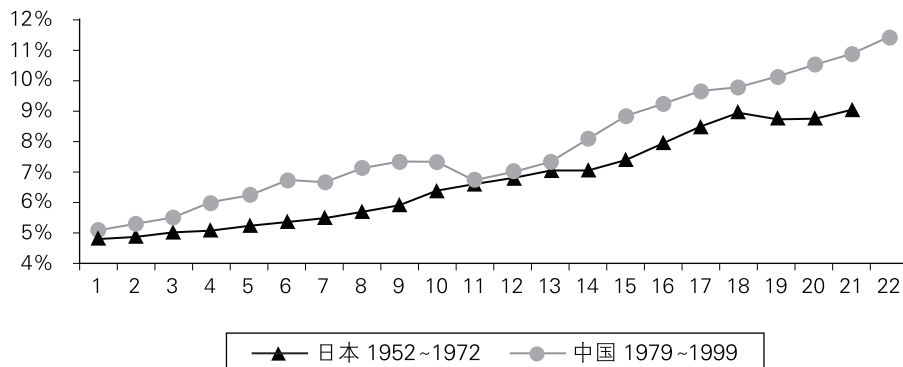
这些数据揭示了为何中国被视为竞争对手而非贸易伙伴。数据显示，中国的出口远远超过了进口。所以，其他国家认为中国的增长并没有扩大到其他地区。但是，这种局面不会长期持续。最终，中国将大量进口，净进口将随之减少<sup>29</sup>。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库显示，2005年中国商品进口占世界总额的6.1%。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占世界的7.3%。进出口差额达1019

26 本文将贸易定义为进出口总额。

27 我们使用了Summers 和 Heston数据库（PWT 6.1）。见Heston和Summers（1997）。

28 净进口指的是实际进出口之差。

29 Ianchovichina和Martin在2001年也同意中国的净进口将减少，中国将大幅增加进口。



**图3 中日占世界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Summers 和 Heston数据库。

亿美元，是厄瓜多尔名义GDP的3倍。现在正值21世纪头十年中期，中国生产商已经开始大量增加进口，决定了从铜到微芯片几乎所有商品的全球价格。

另外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日本已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见图4）。2000年，中国人均GDP大约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根据Summers-Heston数据库<sup>30</sup>，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厄瓜多尔的水平。这表明，虽然中国过去二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人均GDP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仍需要一段时间。换句话说，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一些人士已经对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做出了简单的预测（见表12）<sup>31</sup>。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是10.1%，世界经济是3.3%，拉美经济是3.4%。如果这一势头继续保持20年，中国将远远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sup>32</sup>

30 人均GDP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得出。

3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32 更多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参见Wilson和Purushothaman（2003），Gaulier、Lemoine和Ünal-Kesenci，（2005），以及高盛（2005）。

2002年，中国商品进口已占世界总额的4.4%。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口平均增长约16%，而世界出口（除去中国）平均增长约7%。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保持，2010年中国出口将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2020年将占18%。

表12 中国和拉美占世界GDP的比重，2002~2020年  
（百分比）

|    | 2002 | 2010 | 2020 |
|----|------|------|------|
| 中国 | 12.7 | 21.1 | 40.1 |
| 拉美 | 7.9  | 7.9  | 8.0  |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

很难具体预测中国崛起对其他国家经济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影响。但是，我们知道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影响可能不对称。一些部门可能从中受益，另一些部门可能因为中国的竞争而受损害。特别是，中国尤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竞争优势，因此这些产业获得的潜在受益会更低，资本密集型行业则正好相反。<sup>33</sup>

33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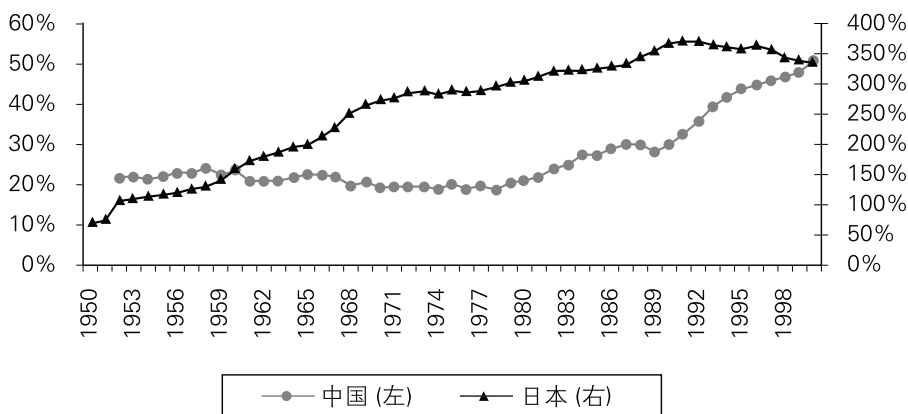


图4 中日人均GDP

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之比

资料来源：Summers 和Heston数据库。

## 七、更广阔背景下的中拉贸易关系

总体而言，中国的贸易对拉美国家的影响中短期看来是积极的。我们的研究结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及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相一致(Lall 和 Weiss, 2004)。平均而言以及从贸易影响的角度来看，拉美将从不断增长的中国需求和发展中受益。比较而言，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的那样，唯一真正的输家是南亚，而对拉美的影响将是积极的。对拉美国家的农业及其他行业来说，到2020年左右，中国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预计产生明显有利的影响（产出提高4%）。但是，纺织业和拥有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的国家将是输家。我们需要进行更加具体的研究，特别是分析中国的贸易对拉美国家，如墨西哥，国内市场的影响。

过去十年中，中国和拉美国家的贸易关系不断加强<sup>34</sup>。根据中方统计数字，中拉贸易额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0亿美元上升到了2001年的150亿美元。2000年以来，巴西和中国的贸易增长了近3倍，对于债务累累的巴西经济，特别是大豆、钢铁和铁矿石出口商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这些商品占巴西出口总额的2/3。总体而言，拉美国家拥有商品禀赋盈余，能够满足中国进口食品和能源避免短缺的需要和战略。

但是，中国对拉美商品的旺盛需求可能会带来一个负面的后果。第一，中国的强劲需求将深化拉美国家对一些商品的专业化，而这些商品通常存在严重的价格波动。从财政的角度说，这将增加财政收入的波动。第二，随着拉美国家与中国关系的日益紧密，拉美将日益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2003年，中国的交货瓶颈和需求抬高了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但是中

国的工业也受经济衰退和繁荣周期的影响。近年来，因为中国在巴西重要的出口产品如铁矿石和大豆上拥有越来越大的定价权，中巴两国关系有所紧张。出口产品对中国的日益依赖也使拉美国家不得不更加关注亚洲和中国的发展态势。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2003年，中国成为巴西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并一直保持着该地位<sup>35</sup>。2004年，巴西一半的出口收入增长来自中国，中国由此成为巴西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推手，官方GDP增长目标的1/4需要依靠中国才能实现。随着中国试图给其过热的经济降温，巴西的对华出口增长也将放缓。

资本流动本文没有涉及，但值得深入的分析。拉美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下降，而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在不断增长。2001~2003年，流入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70亿美元下降到110亿美元，尽管2004年和2005年有所反弹。巴西2003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和上一年相比也突然下降了52%（墨西哥同期下降了30%）。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国，2003年达到了550亿美元（几乎是拉美国家吸收外资总额365亿美元<sup>36</sup>的两倍），2004年和2005年都达到了600亿美元左右。换句话说，在过去三年内，每周都有超过1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sup>37</sup>

确实，相当一部分对华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往返旅行”的资金(Xiao, 2005)。专家估计，这部分资金占对华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4。但是，其他地区对华

34 中国和拉美国家的贸易联系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6世纪70年代，双方就建立了贸易关系，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棉纱就通过马尼拉出口到墨西哥和秘鲁(参见 Shixue, 2004)。

35 参见ECLAC (2004a)。

36 参见ECLAC (2004b)。2003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达到了拉美国家历史上的最高水平（880亿美元，1999年）。

37 对华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见MIT经济学家Huang的研究（2003）。也可参见美国国会听证：<http://www.cecc.gov/pages/hearings/092403/huang.php>。



直接投资也在增加。2002年，美国公司对华投资比十年前增加了10倍以上。13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吸引了无数公司涌入中国市场，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尚未牢固地植根于法律、产权保护和自由市场。<sup>38</sup>

有些研究指出，中国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完全融入国际分工之后<sup>39</sup>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分流”。对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亚洲国家来说，如果外国直接投资被分流到中国，将造成巨大的损失。他们有可能经历去工业化过程，重新扮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角色(McKibbin 及 ThyWoo, 2003)。但是，研究和数据都表明，这种影响非常小。根据对1984~2001年的研究，Garcia-Herrero和其他人得出结论，就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不存在负面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拉美国家的替代效应。但是，该研究也指出近年来（1995~2001年）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吸收外资有影响。

2004年和2005年的数据好坏参半。中国仍然大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达600多亿美元；而拉美国家吸收的外资开始从近十年的极低水平复苏。2004年，巴西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上涨了80%，超过了180亿美元。墨西

哥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出现了23%的恢复性增长，达136亿美元，而智利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66%，接近50亿美元。除非拉美国家再次出现私有化进程，否则20世纪9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结束。

但是，在资本流动领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成为意外的收获。中国不再单纯地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同时也大幅度增加对外投资。1991~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约为350亿美元。2003年，中国对外投资比上年翻了一番多，超过了20亿美元（当然，这仍然是一个较低的水平）。之后，这一趋势也没有改变。2004年，中国50%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了拉美国家（30%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了亚洲）。2005年，中国跨国公司创纪录地在海外投资了近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亚洲（60%），但拉美仍旧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占总额的16%）。

确保粮食和初级产品的需求正推动中国通过战略国际伙伴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将目光瞄准在安哥拉、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资源部门投资。它们已经是非洲的主要投资者，特别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一百家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sup>40</sup>，中国是未来几年内仅次于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世界第五大投资国。2004年，中国公司多次试图在其他新兴市场乃至发达国家增加投资，例如联想以17.5亿美元收购IBM的生产部门，五矿试图以50亿美元收购加拿大诺兰达公司，以及中海油试图以130多亿美元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

正如几十年前的日本公司，中国公司似乎也在寻求海外扩张。看起来这对拉美国家是一个机遇。亚洲主要国家（中国和日本）不仅对拉美感兴趣，也有着同样的目标：确保原材料、农产品及其附属产品的持续供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两国都希望在拉美有可行的基础设施（更高效的港口、机场、道路和铁路）。对拉美来

38 外国公司和他们的中国伙伴不断增加的争议证明对华投资存在风险。2004年，瑞士农业化学品公司先正达就起诉一家中国竞争对手假冒其注册杀虫剂。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通过诉讼来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在中国投资能否赢利也需要打个问号。过去十年中，外国酿酒企业在中国投资了数亿美元。但是根据《经济学家》(2005)的报道，平均净利润是非常微薄的，中国最大的400家酿酒企业（包括外国合资企业）的利润只有0.5%。如果和拉美国家进行比较的话，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中国经济季刊》的一个研究发现，2001年所有美国企业和下属公司在华直接和间接利润仅28亿美元，差不多只有美国在墨西哥同期利润44亿美元的一半，而中国的人口是墨西哥的十倍以上。另外一份中国上市公司政治控制和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发现，地方党委（相对于最大股东）的决策权和公司业绩成正比（参见 Chang 和 Wong, 2003; Wong、Oppper 和 Hu, 2004）。

39 拉美的实证分析，见Garcia-Herrero和Santabárbara（2004）；Chantasasawat, Fung等人（2004）；其他关注亚洲的分析，见Eichengreen和Tong（2005a和2005b）；以及Mercereau（2005）。

40 见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04年。



说，这是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机遇，通过工业化战略避免初级产品贸易专业化加剧，同时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促进多样化（例如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发展附加值更高的产业。

中国企业已经注意到了拉美国家。截至2001年，中国在拉美国家建立了300多家企业，合同投资总额超过10亿美元。之后，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宝钢在巴西开展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资项目，总额达15亿美元。中国同时宣布投资巴西铝业20亿美元的计划，但尚未证实。中国已经通过首钢集团控制了秘鲁一家主要的铁矿，在厄瓜多尔的一个油田拥有控股权，同时还试图在委内瑞拉生产石油，并重新开发了该国的金矿。预计中国将对巴西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铁路和港口进行投资。中国非常关注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希望实现初级产品到港口运输的便利化。在阿根廷，中国已承诺对一粮食港口投资2500万美元，同时对阿根廷与智利之间的一条公路投资2.5亿美元，推动阿根廷原材料通过智利港口的出口。

2004年10月，西班牙电信（西班牙一家在拉丁美洲享有特许经营权的龙头企业）与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签署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西班牙电信帮助华为进入拉美市场，华为向西班牙电信在拉美的所有分公司出售产品。<sup>41</sup> 2006年，为了增强其在华影响力，西班牙顶

---

41 华为是中国公司国际化的代表。该公司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全球扩张计划，希望将其海外市场的销售额从2004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00亿美元以上。2003年，华为40亿美元投资总额中，有27%投入了海外市场，包括瑞典和荷兰。现在，华为在70多个国家有分支机构，24000多名员工中有3000多人在海外工作。根据《经济学家》和《金融时报》的报道，2004年，华为50亿美元的收入中，40%来自海外(The Economist, 2005; Financial Times, 2005)。但是，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所指出的，大多数中国大公司实际上是海外公司。2004年收购IBM个人电脑的联想就是很好的例子。技术上来说，联想是一家海外企业，因为按照组织结构，在中国大陆的分公司是其香港分公司的分支机构。被《福布斯》杂志评为最有活力的四家中国企业的总部均位于香港。黄亚生指出，看来“中国的成功更多地是因为远离效率低下的机构，而不是因为创造了效率高的机构”（Huang, 2005）。参见<http://web.mit.edu/yshuang/www/>。

级银行毕尔巴鄂比斯开阿根廷银行(BBVA)在上海和北京开设了分支机构，同时扩大了在香港的分行。该行与中国银行达成协议，共同开发华人从美国和秘鲁等拉美国家寄往中国的汇款业务。

拉美公司也正在寻找在中国的商机，巴西总统卢拉和近400名企业家2004年正式访华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拉美大公司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例如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已经在中国销售和生产飞机<sup>42</sup>，另一家生产客车底盘的巴西企业MARCOPOLO计划在中国建立一家工厂。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巴西企业是恩布拉科公司(Embraco)，早在1995年，该公司就在北京建立了工厂。十年之后，发动机制造商WEG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家巴西全资子公司。钢铁生产商Gerday宣布收购一家中国工厂；巴西和比利时合资企业英博(INBEV)则收购一家当地啤酒制造商。显然，在贸易流动的关系中，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资本流动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但是，除了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外，对华贸易还有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影响：认知效应。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务实。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独特结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著名经济学家Ricardo Hausmann和Dani Rodrik已经强调了贸易在这个非凡的、崛起的巨人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中国的经济奇迹不仅仅在于其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其较高的品质(Rodrik, 2006年；Hausman、Hwang和Rodrik, 2006年)。中国执政者非常务实的经济政策吸引了世界各国决策者的关注。中国奇迹不是“芝加哥学派”的功劳，也不是甘末尔顾问团(Kemmerer mission)的产物。中国没有外国顾问或者经济发展的外国权威。如果说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曾经为玻利维亚出谋划策，但他从未去过北京，至少他的建议也从未被北京接受。中国发展的经验就是发展没有灵丹妙药，打开发展奇迹大门的特殊关键模式根本不存在。

---

42 见Goldstein的案例分析(2004)。

## 附录1 中国和拉美的贸易竞争

表1.1 拉美十五国年均CI<sup>a</sup>, 1998~2004年<sup>b</sup>

|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
| 墨西哥                 | 0.49 | 0.51 | 0.52 | 0.54 | 0.54 | 0.52 | 0.53 |
| 哥斯达黎加               | 0.31 | 0.26 | 0.28 | 0.33 | 0.36 | 0.31 | 0.33 |
| 巴西                  | 0.25 | 0.27 | 0.3  | 0.3  | 0.28 | 0.25 | 0.26 |
| 萨尔瓦多                | 0.21 | 0.23 | 0.23 | 0.27 | 0.26 | 0.24 | 0.26 |
| 哥伦比亚                | 0.19 | 0.16 | 0.19 | 0.21 | 0.19 | 0.18 | 0.18 |
| 危地马拉                | 0.16 | 0.15 | 0.16 | 0.17 | 0.16 | 0.18 | 0.17 |
| 阿根廷                 | 0.17 | 0.16 | 0.18 | 0.17 | 0.15 | 0.13 | 0.14 |
| 秘鲁                  | 0.17 | 0.16 | 0.17 | 0.17 | 0.15 | 0.13 | 0.13 |
| 乌拉圭                 | 0.19 | 0.17 | 0.16 | 0.16 | 0.13 | 0.13 | 0.12 |
| 智利                  | 0.11 | 0.11 | 0.11 | 0.11 | 0.1  | 0.09 | 0.09 |
| 洪都拉斯                | 0.11 | 0.15 | 0.12 | 0.14 | 0.12 | 0.09 | ...  |
| 玻利维亚                | 0.11 | 0.12 | 0.11 | 0.11 | 0.08 | 0.08 | 0.08 |
| 巴拿马                 | 0.12 | 0.11 | 0.11 | 0.11 | 0.1  | 0.08 | 0.08 |
| 委内瑞拉 (Bol. Rep. of) | 0.11 | 0.08 | 0.09 | 0.08 | 0.07 | 0.06 | 0.06 |
| 巴拉圭                 | 0.07 | 0.07 | 0.08 | 0.07 | 0.06 | 0.05 | 0.05 |

注: <sup>a</sup> CI平均是专业化系数和一致性系数的算术平均。

<sup>b</sup> 根据2004年数据按降序排列。

资料来源: 本文作者。

表1.2 巴拉萨专业化指数

|                | 中国   | 墨西哥         | 哥斯达黎加       | 巴西          | 萨尔瓦多        | 哥伦比亚        | 危地马拉        | 阿根廷         | 秘鲁          | 智利          | 委内瑞拉        |
|----------------|------|-------------|-------------|-------------|-------------|-------------|-------------|-------------|-------------|-------------|-------------|
| 木材制品           | 0.43 | 0.26        | 0.51        | <b>2.26</b> | <b>2.99</b> | 0.78        | 0.91        | 0.60        | 0.58        | <b>4.10</b> | ...         |
| 皮革制品           | 3.34 | ...         | 0.60        | 2.88        | 1.40        | 0.93        | 0.66        | 1.98        | ...         | ...         | ...         |
| 化学品            | 0.42 | 0.34        | 0.75        | 0.62        | <b>1.16</b> | 0.86        | <b>1.44</b> | 0.68        | 0.35        | 0.62        | 0.29        |
| 食品加工           | 0.47 | 0.56        | <b>2.11</b> | <b>2.93</b> | <b>5.17</b> | <b>1.49</b> | <b>4.73</b> | <b>6.60</b> | <b>4.13</b> | <b>2.53</b> | 0.16        |
| 纺织品            | 2.39 | 0.49        | 0.23        | 0.60        | 2.23        | 0.71        | 0.77        | 0.20        | 0.68        | 0.17        | ...         |
| 矿产             | 0.28 | <b>1.06</b> | ...         | <b>1.05</b> | 0.54        | <b>3.63</b> | 0.76        | <b>1.75</b> | <b>2.56</b> | <b>1.67</b> | <b>7.54</b> |
| 基本制成品          | 0.96 | 0.69        | 0.44        | <b>1.60</b> | <b>1.39</b> | <b>1.04</b> | 0.77        | 0.75        | <b>2.86</b> | <b>3.66</b> | <b>1.09</b> |
| 非电子类机械         | 0.52 | 0.84        | 0.10        | 0.82        | 0.11        | 0.09        | 0.12        | 0.22        | 0.06        | 0.07        | 0.05        |
| 生鲜食品           | 0.68 | 0.80        | <b>5.67</b> | <b>4.13</b> | <b>3.00</b> | <b>4.14</b> | <b>7.18</b> | <b>5.50</b> | <b>2.52</b> | <b>4.54</b> | 0.11        |
| 杂项制成品          | 1.48 | 1.07        | 1.39        | 0.27        | 0.92        | 0.44        | 0.51        | 0.20        | 0.35        | 0.11        | 0.05        |
| 交通设备           | 0.27 | <b>1.34</b> | 0.03        | 0.88        | ...         | 0.10        | ...         | 0.45        | ...         | 0.08        | 0.15        |
| 服装             | 3.46 | 1.29        | 1.51        | 0.12        | 1.93        | 1.48        | 1.14        | ...         | 2.81        | ...         | ...         |
| 电子零部件          | 1.04 | 1.53        | ...         | 0.20        | 0.24        | 0.12        | 0.20        | 0.05        | ...         | ...         | ...         |
| 信息技术<br>和电子消费品 | 2.43 | 1.75        | 2.40        | 0.26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 Intracen, 联合国贸发会议/世贸组织, 2004年。

## 附录2 集装箱处理费用

| 国家或地区 | 货物处理<br>限制指数 | 强制服务<br>指数 | 价格限制<br>协议指数 | 合作协议<br>指数 | 平均通关<br>指数(天) | 港口效率<br>指数 | 犯罪指数<br>(1-7) | 集装箱处理费用                 |                          |                     |
|-------|--------------|------------|--------------|------------|---------------|------------|---------------|-------------------------|--------------------------|---------------------|
|       |              |            |              |            |               |            |               | 世界银行<br>指数 <sup>a</sup> | CMPCH<br>指数 <sup>b</sup> | LSU 指数 <sup>c</sup> |
| 新加坡   | 1            | 0.38       | 0            | 0.33       | 2             | 6.76       | 6.72          | 117                     | ...                      | ...                 |
| 香港    | 0            | 0.25       | 0            | 0          | ...           | 6.38       | 5.46          | ...                     | ...                      | ...                 |
| 台湾    | 0.5          | 0          | 0            | 0          | ...           | 5.18       | 4.49          | 140                     | 163                      | ...                 |
| 日本    | 0.75         | 0.13       | 0.89         | 1          | ...           | 5.16       | 5.16          | 250                     | 202                      | ...                 |
| 马来西亚  | 0            | 0.25       | 0            | 0.38       | 7             | 4.95       | 5.76          | 75                      | ...                      | ...                 |
| 西班牙   | 0            | 0.06       | 1            | 0          | 4             | 4.88       | 6.08          | 200                     | 105                      | ...                 |
| 韩国    | 0            | 0.38       | 0            | 0          | ...           | 4.12       | 5.22          | ...                     | ...                      | ...                 |
| 泰国    | 0.5          | 0.63       | 0            | 0.38       | 4             | 3.98       | 5.12          | 93                      | ...                      | ...                 |
| 阿根廷   | 0            | 0.13       | 0            | 1          | 7             | 3.81       | 4.52          | ...                     | 139                      | ...                 |
| 越南    | 0            | 0          | 0            | 0.5        | ...           | 3.81       | 5.02          | ...                     | ...                      | ...                 |
| 智利    | 0            | 0.25       | 0.43         | 1          | 3             | 3.76       | 6.05          | 202                     | 100                      | ...                 |
| 中国    | 0.5          | 0          | 0            | 0          | 7             | 3.49       | 4.44          | 110                     | ...                      | ...                 |
| 印度尼西亚 | 1            | 0.06       | 0            | 0.38       | 5             | 3.41       | 4.06          | ...                     | ...                      | ...                 |
| 墨西哥   | 0.5          | 0.38       | 0            | 1          | 4             | 3.34       | 2.61          | ...                     | ...                      | ...                 |
| 委内瑞拉  | 0            | 0          | 1            | 1          | 11            | 3.28       | 3.63          | ...                     | ...                      | ...                 |
| 萨尔瓦多  | 0            | 0          | 0            | 1          | 4             | 2.95       | 2.3           | ...                     | ...                      | 61                  |
| 巴西    | 0.5          | 0.75       | 0            | 1          | 10            | 2.92       | 4.45          | 328                     | 292                      | ...                 |
| 秘鲁    | 0.5          | 0          | 0.5          | 1          | 7             | 2.88       | 3.32          | ...                     | 142                      | ...                 |
| 印度    | 0            | 0          | 0            | 1          | ...           | 2.79       | 4.28          | ...                     | ...                      | ...                 |
| 菲律宾   | 0.5          | 0          | 0            | 0.38       | 7             | 2.79       | 3.51          | 118                     | ...                      | ...                 |
| 厄瓜多尔  | 0            | 0          | 0.43         | 1          | 15            | 2.63       | 3.65          | ...                     | 139                      | ...                 |
| 哥斯达黎加 | 0            | 0          | 0            | 1          | 4             | 2.46       | 3.28          | ...                     | ...                      | 68                  |
| 哥伦比亚  | 0.5          | 0.13       | 0.5          | 1          | 7             | 2.26       | 1.88          | ...                     | ...                      | ...                 |
| 玻利维亚  | ...          | ...        | ...          | ...        | 9.5           | 1.61       | 4.38          | ...                     | ...                      | ...                 |
| 乌拉圭   | 0            | 0          | 0            | 1          | 5             | ...        | ...           | ...                     | ...                      | ...                 |

注：<sup>a</sup> US\$/TEU国际标准箱单位。

<sup>b</sup> 智利海港协会 (CMPCH)。

<sup>c</sup> 美国国家港口和航道研究所LSU指数。

资料来源：Clark、Dollar和Micco (2004年)。

## 参考文献

- ADC (Ande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2006): *América latina en el comercio global. Ganando mercados*, Caracas.
- Ahearne, A., J. Fernald and others (2003): *China and Emerging Asia: Comrades or Competitors?*,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 No. 789, Washington, D.C.,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December.
- América Economía* (2003): El ataque del dragón, 26 December. Available in [www.americaeconomia.com](http://www.americaeconomia.com).
- Anderson, J. and E. van Wincoop (2003): 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1,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_\_\_\_\_ (2004): Trade cost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2, No. 3,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September. Available in <http://fmwww.bc.edu/ec-p/wp593.pdf>
- Bank of Spain (2004): Where is the Chinese Banking Sector Going? Banking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drid,

- April, unpublished.
- BBVA (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2003): México y China en el comercio mundial, *Latinwatch*, June.
- \_\_\_\_\_ (2004): Potencial económico de China y oportunidades para Argentina, *Latinwatch*, April.
- Berges, R. (2004): Implications of eventual changes to China's peg, *Latin America Investment Strategy Implications*, New York, Merrill Lynch.
- Berthelon, M. and C. Freund (2003): On the conservation of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Maryland/World Bank, November, unpublished.
- Brun, J.F., C. Carrère and others (2005): Has distance died? Evidence from a gravity model,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9, No. 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arrère, C. and M. Schiff (2003): On the geography of trade: distance is alive and well, Université d'Auvergne/World Bank, December, unpublished. Available in <http://team.univ-paris1.fr/teamperso/disdier/meta.pdf>
- Clark, X., D. Dollar and A. Micco (2004): Port efficiency, maritime transport costs and bilateral trad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5, No. 2, Amsterdam, Elsevier, December.
- Chang, E. and S. Wong (2003): Political control and performance in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ch, unpublished.
- Chantasawat, B., K.C. Fung and others (2004):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Is there 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ffect?*, ADBI Discussion Paper, No. 17,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Chu, T. and T. Prusa (2004): *The Reasons for and the Impact of Anti-dumping Protection: The Cas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s, No. 69, Honolulu, East West Center. Available in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stored/pdfs/ECONwp069.pdf>
- De Paiva de Abreu, M. (2005): China's emerge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Brazil, textos para discussão, No. 491, Rio de Janeiro,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unpublished.
- Deardoff, A. (2004): *Lo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Cos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Discussion Paper, No. 500,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Gerald 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February. Available in <http://www.fordschool.umich.edu/rsie/workingpapers/Papers476-500/r500.pdf>
- Deutsche Bank (2004):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Main Challenges*, Frankfurt, January.
- Disdier, A.C. and K. Head (2004): Exaggerated Reports of the Death of Distance: Lessons from a Meta-Analysis, Paris, Université de Paris I Panthéon Sorbonne/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February, unpublished. Available in <http://team.univ-paris1.fr/teamperso/disdier/meta.pdf>
-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4a): The effect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World Economy, 2002-2003*, LC/G.2221-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4.II.G.45.
- \_\_\_\_\_ (2004b): *Foreign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3, LC/G.2226-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4.II.G.54.
- \_\_\_\_\_ (2005): Strategic perspec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regi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World Economy*, 2004. Trends 2005, LC/G.2283-P, Santiago, Chile.
- Eichengreen, B. (2004): *Chinese Currency Controversies*,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4375,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May.
- \_\_\_\_\_ (2006): China's exchange rate regime: the long and short of it, Marc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unpublished.
- Eichengreen, B. and H. Tong (2005a): How China is reorganizing the world economy, Berkele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Bank of England, December, unpublished.
- \_\_\_\_\_ (2005b): *Is China's FDI Coming at the Expense of other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33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Eichengreen, B., Y. Rhee and H. Tong (2004): *The Impact of China on the Exports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76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eptember.
- Evans, C. and J. Harrigan (2003): *Distance, Time, and Speci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9729,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vailable in <http://www.ny.frb.org/research/economists/harrigan/papers.html>.
- Financial Times* (2005): The challenge from China: why Huawei is making the telecoms world take notice, 11 January.
- García-Herrero, A. and D. Santabárbara (2004): Does China have an impact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Latin America?, document presented at the First LAEBA Conference on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Emergence of China (Beijing), Bank of Spain.
- Gaulier, L. and D. Ünal-Kesenci (2005): *China's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roduction Sharing, FDI & High-Tech Trade*, Paris, Centre d'é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 June.
- Glaeser, E. and J. Kohlhase (2003): *Cities, Regions and the Decline of Transportation Costs*, Discussion Paper, No. 2014, Harvard, Harva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July. Available in <http://post.economics.harvard.edu/hier/2003papers/HIER2014.pdf>
- Goldman Sachs (2005): *How Solid are the BRICS?*, 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134, New York.
- Goldstein, A. (2004): A Latin American global player goes to Asia: Embraer in China,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unpublished.
- Goldsstein, A., N. Pinaud and others (2006):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What's in it for Africa?*,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 Harrigan, J. and A. Venables (2004): Timeliness, Trade and

- Agglome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404,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rch.
- Hausmann, R., J. Hwang and D. Rodrik (2006):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arch, unpublished.
- Heston, A. and R. Summers (1997): PPPs and Price Parities in Benchmark Studies and the Penn World Table, *CICUP 97-1*, document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STAT) Conference (Belgium).
- HSBC (2005): *Wild Geese Flying*, London, HSBC Global Research, December.
- Huang, Y. (2003): *Selling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5): China's big hope is not Hong-Kong, *Financial Times*, 14 January.
- Hummels, D. (2001a): Toward a geography of trade costs,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Krannert School of Management, September, unpublished. Available in <http://www.mgmt.purdue.edu/faculty/hummels/>
- \_\_\_\_\_ (2001b): Time as a trade barrier,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Krannert School of Management, July, unpublished. Available in <http://www.mgmt.purdue.edu/faculty/hummels/>
- Ianchovichina, E. and W. Martin (2001):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62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_\_\_\_\_ (2003): *Economic Impact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05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Ianchovichina, E. and T. Walmsley (2003): *Impact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on East Asia*,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109,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IDB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04): The emergence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ocument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The emergence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1 October 2004), Washington, D.C.
- \_\_\_\_\_ (2006): *The Emergence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Rockefeller Center.
-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4): The global implications of the US fiscal deficit and of China's growth,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April.
- Lall, S. and J. Weiss (2004):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petitive Threat to Latin America: an Analysis for 1990-2002*, Discussion Paper, No. 14, 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October, unpublished.
- LatinFocus* (2004): February.
- Limao, N. and A.J. Venables (2000): Infrastructure, geographical disadvantage and transport cost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5, No. 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Lin, J.Y. (200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u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November, unpublished.
- Lora, E. (2004a): Es posible competir con la China? Fortalezas y debilidades de China respecto a América Latina, Washington, D.C., Research Department,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April, unpublished.
- \_\_\_\_\_ (2004b): Can Latin America compete with China?, Washington, D.C., Research Department,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April, power point presentation.
- Maddison, A. (1998):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 McKibbin, W. and W. Thye Woo (2003): The consequences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for its neighbours,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2, No. 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Mercereau, B. (2005): *FDI Flows to Asia: Did the Dragon Crowd out the Tigers?*, Working Paper, No. 189,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Rodrik, D. (2006):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unpublished.
- Rumbaugh, T. and N. Blancher (2004):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WTO Accession*, Working Paper WP/04/36,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rch.
- Shiue, C. and W. Keller (2004a): *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77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_\_\_\_\_ (2004b): *Market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run Comparis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30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February.
- Shixue, J. (2004): Sino-Latin America economic relations and China's perspective on Latin American economy, Beijing,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npublished.
- Soler, J. (2003): Impacto sobre los flujos comerciales entre China y el mundo, in J. Soler (ed.), *El despertar de la nueva China. Implicaciones del ingreso de China en la Organización Mundial del Comercio*, Madrid, Catarata.
- The Economist* (2005): Special report: China's champions, London, 8 January.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04): Challenges from China spur Mexican factories to elevate aspirations, 5 March.
- 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04): Prospects for FDI flow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strategies and promotion policies: 2004-2007. Global investment prospects assessment (GIPA) research note 1: results of a survey of location experts, TD(XI)/BP/5, Geneva, April.

- Wilson, D. and R. Purushothaman (2003): *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99, October.
- Wong, S., S. Opper and R. Hu (2004): Shareholding structure, depoliticiz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China's listed firm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12, No. 1, Oxford, United Kingdom, Blackwell Publishing.
- Xiao, G. (2005): *Round-tripp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cal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ADBI Policy Research Brief, No. 10,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 Yang, Y. (2003):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WP/03/245,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Yao, Y., F. Li and others (2003): Goldman Sachs' China challenges, 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MIB Paper, Bergen, unpublished.
- Young, A. (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5, No. 4,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November.
- (2003): 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1, No. 6,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cember.
- Zijian Wang, S. and J. Wei (2004): *Structural Change, Capital's Contribu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Sou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1952-1998*, working paper, Göteborg, Göteborg University, unpublished.



# 为何拉丁美洲的经济 不安全感如此普遍

*Dani Rodrik*

## 普

遍存在的经济不安全感威胁着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支持基础，这已成为当今关于拉丁美洲事务的讨论中最为普遍掣肘之一。因此，应对经济不安全感看来是拉丁美洲改革未完成议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本文作者认为拉丁美洲的经济不安全感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并且有许多互相依存的根源。部分原因是源于就业保障力度的下降及家庭产出波动性的增加。一部分是因为资本流动的不规律性以及由稳定性工具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背离所导致的系统性不稳定。最后，拥有发言权和代表权的公共机构处于弱势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针对社会保障本身的方案只能起到部分的帮助作用而已。这些方案应与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特别是更有利于实体经济稳定性的资本流动和汇率政策，并且放松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控制。这些方案还需借力于代表性机构——工会、政党、立法机构——在现有基础上增强其反应能力和合法性。但也许拉丁美洲最需要的是在面对严重的不平等和不稳定局面时该如何保持社会凝聚力的远见，而这种局面因对市场力量依赖的加深而日益加剧。该地区应找到缓解市场力量与渴求经济安全感之间紧张关系的方法。

Dani Rodrik

哈佛大学

⇒ [dani-rodrik@harvard.edu](mailto:dani-rodrik@harvard.edu)

##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人均年收入约为2%，而在此之前的80年代却是以1%的年均速度下降。虽然90年代的表现仍不及1982年债务危机之前该地区经济扩张时期的增速，但是这也给我们切实带来了希望，该地区可能已完全摆脱了80年代的“失落的十年”。尽管如此，该地区的经济不安全感依然处于令人担忧的水平。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安全感威胁着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支持基础，这已成为当今关于拉丁美洲事务的讨论中最为普遍掣肘之一。

最近对该地区进行的调查即显示了这一点。一项涉及拉丁美洲14个国家的大型跨国调查最近发现，有6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父母生活得比他们自己更好。此外，

不到一半的受访者（46%）认为他们的孩子最终会过上比他们更好的生活，这一比例在各个国家略有不同，最低是墨西哥的30%，最高是智利的61%（见表1）。

同一项调查还发现了该地区对于社会保险的需求强烈。近3/4的受访者赞成增加失业保险金的支出，而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表达了他们对于增加养老金支出的渴望。此外，社会不同的阶层都表现出以上相同的需求。受访者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及职业类型等因素对希望增加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支出的偏好影响很小（见表2）。可预期的是，对于社会保险需求更大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对于未来的悲观情绪较高的国家。但也存在着有趣的例外情况。在墨西哥，尽管对于下一代的前景相当

**表1 拉丁美洲（14国）：对于生活水平预期变化的调查结果，1999年**

（单位百分比，除非另有说明）

|  | 总计    |      | 国家   |      |      |      |       |      |      |      |      |      |     |      |      |      |
|--|-------|------|------|------|------|------|-------|------|------|------|------|------|-----|------|------|------|
|  | 数量    | %    | 阿根廷  | 玻利维亚 | 巴西   | 哥伦比亚 | 哥斯达黎加 | 智利   | 厄瓜多尔 | 危地马拉 | 墨西哥  | 巴拿马  | 巴拉圭 | 秘鲁   | 乌拉圭  | 委内瑞拉 |
|  | 14839 | 100  | 1200 | 794  | 1000 | 1200 | 1000  | 1200 | 1200 | 1000 | 1200 | 1000 | 600 | 1045 | 1200 | 1200 |
| 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你认为你父母的生活和你现在的生活比较起来，较好、相同还是较差？ |       |      |      |      |      |      |       |      |      |      |      |      |     |      |      |      |
| 较好                                       | 9081  | 61.2 | 63   | 51   | 64   | 78   | 56    | 45   | 67   | 57   | 43   | 52   | 75  | 80   | 59   | 70   |
| 相同                                       | 3261  | 22   | 22   | 31   | 9    | 14   | 26    | 32   | 20   | 31   | 35   | 24   | 14  | 12   | 18   | 19   |
| 较差                                       | 2139  | 14.4 | 12   | 16   | 25   | 8    | 14    | 22   | 10   | 11   | 20   | 21   | 6   | 6    | 20   | 10   |
| 没有回答                                     | 358   | 2.4  | 3    | 3    | 2    | 1    | 5     | 1    | 2    | 1    | 3    | 3    | 5   | 2    | 3    | 2    |
| 你认为较之现在的生活，你的孩子将来的生活将会较好、相同还是较差？         |       |      |      |      |      |      |       |      |      |      |      |      |     |      |      |      |
| 较好                                       | 6843  | 46.1 | 43   | 56   | 58   | 36   | 52    | 61   | 34   | 51   | 30   | 48   | 48  | 37   | 46   | 53   |
| 相同                                       | 3071  | 20.7 | 22   | 20   | 12   | 21   | 25    | 22   | 21   | 23   | 23   | 20   | 26  | 19   | 22   | 17   |
| 较差                                       | 3261  | 2    | 20   | 13   | 21   | 38   | 11    | 11   | 29   | 17   | 41   | 21   | 13  | 26   | 19   | 19   |
| 没有回答                                     | 1664  | 11.2 | 16   | 11   | 9    | 6    | 12    | 7    | 16   | 8    | 6    | 12   | 13  | 19   | 13   | 12   |

资料来源：美洲民意调查（1999），《华尔街日报》交互镜像。

□ 这篇论文原本是为世界银行而作并由其赞助。很感谢Guillermo Perry邀请我做这篇论文，同时也要感谢Jorge Dominguez, Nora Lustig, Norman Hicks, Bill Maloney, Guillermo Perry, Martín Rama,

Guilherme Sedlacek, Luis Serven 和 Mariano Tommasi对我早期文稿提出的宝贵意见。Vladimir Kliouev提供了专业研究协助。然而，以上个人以及世界银行并不对本文中所陈诉的任何观点承担任何责任。

表2 拉丁美洲（14国）关于社会保险方面的调查结果，按社会经济种类划分<sup>a</sup>

（单位百分比，除非另有说明）

|       | 样本总数  |      | 年龄段   |       |      | 职业   |      |      |    |    | 教育   |     |    |    | 收入 |    |    |    |
|-------|-------|------|-------|-------|------|------|------|------|----|----|------|-----|----|----|----|----|----|----|
|       | 总数    | %    | 18~29 | 30~49 | 50以上 | 个体经营 | 政府部门 | 私营企业 | 失业 | 退休 | 家庭主妇 | 未上学 | 小学 | 中学 | 大学 | 低  | 中  | 高  |
| 失业保险  |       |      |       |       |      |      |      |      |    |    |      |     |    |    |    |    |    |    |
| 没有回答  | 551   | 3.7  | 3     | 4     | 4    | 4    | 5    | 3    | 3  | 4  | 4    | 3   | 4  | 3  | 4  | 4  | 4  | 3  |
| 支出增长  | 10088 | 73.4 | 74    | 73    | 73   | 74   | 69   | 74   | 80 | 74 | 73   | 74  | 74 | 75 | 71 | 72 | 73 | 74 |
| 支出减少  | 2543  | 17.1 | 18    | 18    | 16   | 17   | 19   | 17   | 13 | 16 | 17   | 19  | 16 | 16 | 19 | 19 | 17 | 17 |
| 不知道   | 857   | 5.8  | 5     | 5     | 7    | 5    | 7    | 6    | 3  | 6  | 7    | 5   | 7  | 5  | 6  | 4  | 6  | 6  |
| 养老金   |       |      |       |       |      |      |      |      |    |    |      |     |    |    |    |    |    |    |
| 没有回答  | 172   | 1.2  | 1     | 1     | 1    | 1    | 2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2  | 1  | 1  |
| 支出增长  | 12426 | 83.7 | 83    | 83    | 86   | 83   | 84   | 84   | 88 | 88 | 84   | 82  | 83 | 85 | 83 | 83 | 85 | 83 |
| 支出减少  | 1861  | 12.5 | 13    | 13    | 10   | 13   | 12   | 13   | 9  | 9  | 12   | 15  | 13 | 12 | 14 | 14 | 11 | 13 |
| 不知道   | 380   | 2.6  | 3     | 3     | 3    | 3    | 2    | 2    | 1  | 2  | 3    | 2   | 3  | 2  | 2  | 2  | 2  | 3  |
| 国防和军队 |       |      |       |       |      |      |      |      |    |    |      |     |    |    |    |    |    |    |
| 没有回答  | 623   | 4.2  | 4     | 5     | 5    | 4    | 6    | 3    | 3  | 5  | 4    | 3   | 4  | 4  | 5  | 5  | 5  | 3  |
| 支出增长  | 4810  | 32.4 | 33    | 31    | 34   | 34   | 28   | 29   | 36 | 33 | 35   | 32  | 37 | 33 | 27 | 32 | 31 | 34 |
| 支出减少  | 8359  | 56.3 | 58    | 57    | 53   | 56   | 59   | 60   | 56 | 54 | 52   | 60  | 50 | 57 | 62 | 58 | 56 | 57 |
| 不知道   | 1047  | 7.1  | 5     | 7     | 9    | 6    | 7    | 7    | 5  | 8  | 9    | 5   | 8  | 7  | 7  | 6  | 8  | 7  |

注：<sup>a</sup>该问题是：你认为贵国以下各项的支出是应该增长还是减少？

资料来源：美洲民意调查（1999），《华尔街日报》交互镜像。

的悲观，有关于增加社会保险支出的需求却较为平淡。与此同时，在对未来期望持相当乐观态度的智利，高达85%的受访者支持增加失业保险金的支出，而更有93%的受访者赞同增加养老金支出。

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一种可能性是这些是对调查中其他问题的答复。例如，当同一个受访者被问到关于国防和军队的问题时，只有不到1/3的人表示他们希望看到在这两方面的经费支出有所增加（见表2）。这说明受访者将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并且认为前者要比后者重要的多。另一种可能性是来自于与其他不同环境下类似调查结果所做的比较。当在发达工业国家进行此类调查时，赞同增加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支出的受访者比例通常明显低于上述报告的数字。此外，根据收入水平的不同，这个比例呈现出显著的变化<sup>1</sup>。最近《纽约时报》就特别报道了一个发生在巴西令人心酸的事例，1999年8月多达100万人（也就是

每160个巴西人当中就有1个）参与竞聘巴西银行一万个办公室工作职位，该政府经营的机构能够“按时足额支付薪水”并提供全面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我需要稳定的生活”，一名23岁的求职者在被问到为什么要来竞争这份工资低于她目前收入水平的工作时，这样回答记者（Romero, 1999）。应对经济不安全感看来是拉丁美洲改革未完成议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决策者们在这方面如何取得进展？第一步就是要了解经济不安全感的根源所在。在本文中，我将凸显三组关键成因的作用。第一，我们必须从20世纪80年代的创伤谈起。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在债务危机的余波中所经历的严重经济衰退让人不禁联想起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大萧条。虽然大萧条造成了收入的急剧下降，然而经济恢复也更为迅速。在美国，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困难，特别是中产阶级所遭受的损失，促使政府出台了一套新的方案，统称为新政，新政极大地扩大了政府的作用，建立起社会保障网络并且提供社会保险。而在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实际上削弱了社会

1 有关比较数据，参阅Taylor Gooby（1989）。

保险机制。就业不稳定变得较为普遍，而公共社会保障网络受到削弱。

第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宏观经济高度波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稳定的资本流动所致，或者说至少加剧了经济的波动。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扩张，而拉丁美洲地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较高，这导致宏观经济政策依赖于（而且往往受制于）短期投资者的喜好。管理流动资本的需要，已经使得像财政政策和汇率这样的关键调控手段不堪重负，而无暇顾及国内经济的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与实体经济逐渐脱节。这加剧了长时间以来各代家庭之间所享受到的经济成果的波动性。

第三，拉丁美洲社会一个重大缺陷是和社会和政治体制迄今没有对提升经济安全性的呼声做出充分的回应。如上所述，对于管理市场化社会的风险所带来的额外责任，国家不是承担而是尽量削减。但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问题。整个政治体制没有可行的发声机制：国家立法机关分散且缺乏代表性，政党的力量也很薄弱。工会一直都不能制定应对工作不稳定的恰当全面策略，而且工会成员也在流失。而关于政策的讨论基本上围绕着狭隘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发展政策，严重受制

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求”，这阻止了其他（或至少是互补的）以地方担忧因素和国家意愿为主旨的经济改革设想的出现。

在下文中，我将讨论以上问题及其政策影响。但首先需强调的是本文关注的并不是贫困人口和最弱势群体本身。我并不研究脱贫政策，也不讨论如何减少贫困人口对于波动和冲击影响的敏感程度<sup>2</sup>。拉丁美洲的贫困人口一直是被排斥的，也是脆弱的。较为新颖的观点认为现在下向流动的恐惧同样影响了很大一部分的中产阶级。上文提到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一些拉丁美洲地区中的大国，特别是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和最低收入群体相比，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他们子女的未来更加悲观。事实上，这凸显了“社会保障”的需求在该地区的政治意义。本文的重点将聚焦更为宽泛的经济不安全感概念及其后果。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这篇论文旨在激发讨论，提出假设，并为进一步研究设置议程，并且本文在支持性论据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观点。下文中我的许多论点是推测性的。我现在所做的经验“验证”只是提示性而非决定性的。但如果能够为研究开辟出新思路，那么也就达到了本文的目的。

## 二、20世纪80年代的创伤

1982年的债务危机席卷拉丁美洲，带来严重而漫长的经济衰退。图1显示了该地区领先国家的人均收入指数，并与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情况作对比。在美国，从1929~1933年收入平均下降了35%，而1933年的失业率更是达到了25%的最高值。如图1所示，1981年后的拉丁美洲，其实际收入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并不剧烈：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降幅约为20%，而巴西是10%。在主要国家中，只有秘鲁（归咎于Alan García总统的灾难性政策）的收入降幅与大萧条时期美国收入跌幅相当。然而，除了智利是一个显著的例外，整个拉丁美洲的复苏也是比较缓慢的。美国花了10年的时间才恢复到危机前的人均收入水平。阿根廷和巴西分别花了12年和13年的时间，但直到1997年（可

获得国民收入预测的最近年份（世界银行，1999），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的人均收入仍然低于1981年的水平。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部分程度上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使得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的扩张速度远高于20年代。可是拉丁美洲在20世纪90年代的增长率甚至无法与60年代和70年代相比。

美国为应对大萧条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体制创新，这极大地发展了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与过去的决裂。许多创新都发生在社会保险领域（Bordo、Boldin和White（合编），1998，第6页）：社会保障、失业救济、公共工程、公共所有权、

2 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章，请参阅Lustig（编辑），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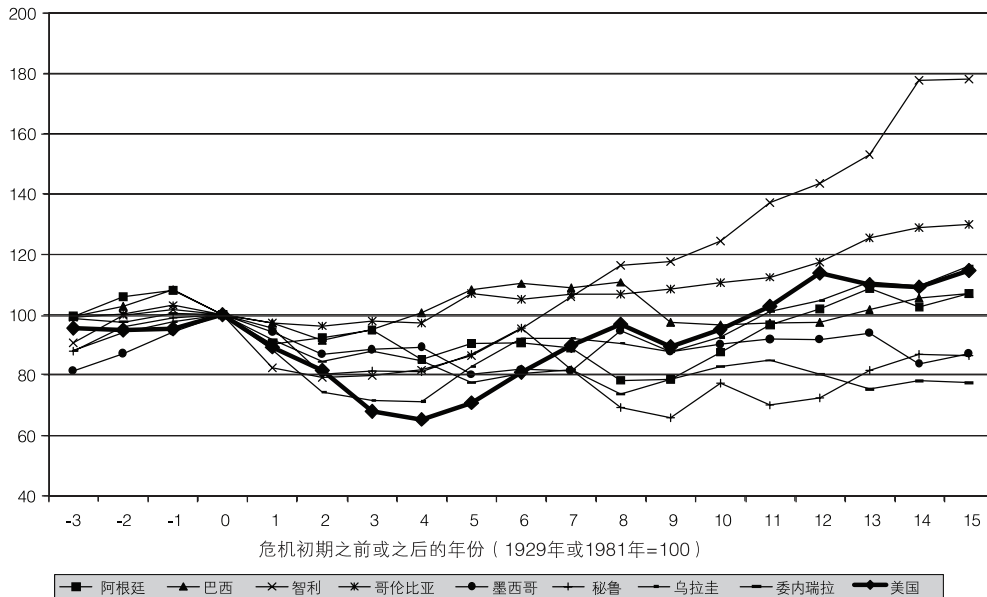


图1 1981年后的拉丁美洲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之间的比较：实际人均收入的下降

存款保险、有利于工会的立法等新机制的创建用于应对私有市场存在的不足。正如Jacoby (1998) 所述，中产阶级在大萧条之前一般都能够自我保险或者向私有中介机构购买保险。由于这些私有保险形式的崩溃，中产阶级在社会保险的推广及后来被称之为“福利国家”的创建过程背后投注了他们大量的社会影响力。

大萧条有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它破坏了中产阶级在应对劳动力市场风险时对于私有体系的信任；“福利资本主义”的崩溃，再加上大规模的裁员与银行倒闭，引发了信任危机，这导致美国的中产阶级纷纷行动起来寻找替代品。其次，它使中产阶级意识到其社会地位岌岌可危；现实的或潜在的下向流动缩小了中产阶级与更低阶层之间的社会差距。跨阶层联盟的建立可能性增加，对再分配方案的抵制被削弱，这些都可能推动下向流动。总之，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经历使得美国中产阶级倾向于支持社会团结而不是严格的个人主义：这一转变促进了福利国家，公共教育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开支 (Jacoby, 1998, 第29~31页)。

请注意在债务危机后拉丁美洲经历的相似之处。对于美国的情况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给拉丁美洲的私有保险行业带来很大的压力。例如，Glewwe和

Hall (1998) 在他们对于秘鲁的研究分析中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5年家庭间的转让关系网络几乎完全崩溃。因为转让而建立的家庭在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也同样遭受到损害，由收入支持的私人体系往往不能灵活有效地应对宏观冲击。而正如我们在引言部分已经提到过的，范围较广的危机的影响之一是，社会保险也已经成为拉丁美洲中产阶级的关注焦点。

但在美国对政府方案的发展也存在着思想观念方面的支持。Rockoff (1998) 认为对政府作用态度的转变得益于至少大萧条前10年，经济学家们已经从放任自由政策转向干预政策的思想。由于宏观经济学家往往较为保守，微观经济学家“领衔众多改革的制定，例如最低工资保障、职业介绍所、养老金、公有地区发电站等等 (Rockoff, 1998, 第134页)。因此，思想观念和实际利益的吻合催生社会保险方案的出台。

就政府的作用而言，拉丁美洲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处于与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完全不同的有利地位。该地区大部分国家已经在政府强制的贸易限制保护下完成了工业化，国有企业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了，而财政赤字和宏观经济管理不善才是引发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政府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但与美国一样，学术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很大转变，但此时



是转向支持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干预。

相应地，拉丁美洲在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所采取的改革旨在增大市场范围并约束政府范围。私有化、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是“华盛顿共识”的关键条款。如前面所提到的民意调查普遍表明，较政府管控，大多数拉丁美洲人偏好市场和私有企业制度。然而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在“华盛顿共识”中完全没有应对经济不安全感的方案。

尤其是在考虑到许多市场化的改革预计将增加劳动者和家庭的风险时，这一缺失就更为突出。私有化、放松管制和贸易自由化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和增大失业风

险，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公有部门的削减意味着相对稳定的公共就业机会减少。金融自由化可能会带来经济环境的波动。资本流动性的提升意味着特殊的国家风险从富有流动性的资本转向缺乏流动性的劳动力。只到最近这种影响的重要性才被承认。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由长期债务危机所引发的经济不安全感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该地区所有国家最终实施的市场化改革没有辅以社会保险方案。美国对大萧条的应对是显著增强社会保障，但拉丁美洲对债务危机的应对却是在面对着劳动力市场风险增长时削弱社会保障力度。

### 三、工作保障的降低

虽然在拉丁美洲进行的许多改革预期都可能提高工作不安全感，至少短期内如此，可是想要获得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却不是那么容易。可获得的非自愿性裁员指标并不多，而且常会被一些由经济不安全感引起的行为反应干扰：工人在感觉不太安全时，为了避免失业可能会接受降薪或者做出其他让步。此外，关于就业保障的正式法规没有太多变化，尽管有关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具“灵活性”的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Márquez和Pages, 1998）。然而，现有的证据表明，在该地区几乎所有有相关数据的国家中，拥有“安全”工作的劳动者比例均已下降。

这方面的一个迹象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智利以外，所有国家的工会密度急剧下降。这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代表其成员就提高工作安全性谈判是工会的主要职能。表3列出了国际劳工组织（ILO）对拉丁美洲10个国家的工会成员数量和工会密度所做的统计。

只要将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数据进行比较，这些数据通常均急剧下降。例如，在阿根廷，工会中非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从1986年的49%下降到1995年的25%。在墨西哥，相应比例在1989~1991年的两年时间内就从54%下降到31%（如果该统计数字是可信的）。由于Augusto Pinochet政权的终结和民主化转变推动工

会成员数量及密度最初上升，智利成为了唯一的例外情况。然而，即使是在智利，较近期的数据也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会成员的比例也下降了，现在甚至恢复到民主化之前的水平。<sup>3</sup>

表3还显示出工作不安全性的另一个指标：未受正式书面合同“保护”或列入社会福利方案的劳动者的比例。国际劳工组织1999年关于无保护就业的定义略显圆滑，在不同的国家所包含的范围不同。例如，阿根廷的数据是指没有签署书面合同的私营企业雇员占大布宜诺斯艾利区的私营企业雇员总数的比例。在玻利维亚，该数据是指没有被劳动和社会法规所覆盖的就业人口占有薪酬的就业人口总数的比例。巴西的数字（Ferreira和Paes de Barro, 1999）是指没有正式记录的就业人员占全体支薪职员和个体经营业者的比例。

在所有可以进行2个时间点之间比较的7个国家当中，数据显示“无保护”就业呈上升态势：阿根廷从22%上升到34%，巴西从64%上升到69%，墨西哥从44%上升到50%。此次智利也不例外，从17%上升到22%。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比例不能用于国家间横向比

3 智利劳工部数据，经济学人信息部报导（1998）。



表3 拉丁美洲（10个国家）：就业保障指标

|      | 工会会员数（千人） |       | 工会会员数 工会覆盖率<br>(占非农就业人口的百分比 %) |       | “无保护”的就业 <sup>a</sup><br>(占就业人数的百分比) |       |
|------|-----------|-------|--------------------------------|-------|--------------------------------------|-------|
|      | 年份        | 千人    | 年份                             | 覆盖率 % | 年份                                   | 百分比 % |
| 阿根廷  | 1986      | 3262  | 1986                           | 48.7  | 1990                                 | 21.7  |
|      | 1995      | 3200  | 1995                           | 25.4  | 1996                                 | 34    |
| 玻利维亚 | 1994      | 276   | 1994                           | 16.4  | 1991                                 | 28    |
|      |           |       |                                |       | 1997                                 | 34.8  |
| 巴西   | 1991      | 15205 | 1991                           | 32.1  | 1985                                 | 63.6  |
|      |           |       |                                |       | 1996                                 | 68.5  |
| 智利   | 1985      | 361   | 1985                           | 11.6  | 1990                                 | 17    |
|      | 1993      | 684   | 1993                           | 15.9  | 1996                                 | 22.3  |
| 哥伦比亚 | 1985      | 877   | 1985                           | 11.2  |                                      |       |
|      | 1995      | 840   | 1995                           | 7.0   |                                      |       |
| 萨尔瓦多 | 1985      | 79    | 1985                           | 7.9   | 1994                                 | 59.1  |
|      | 1995      | 103   | 1995                           | 7.2   | 1997                                 | 61.3  |
| 墨西哥  | 1989      | 9500  | 1989                           | 54.1  | 1990                                 | 43.4  |
|      | 1991      | 7000  | 1991                           | 31.0  | 1997                                 | 49.6  |
| 秘鲁   | 1991      | 442   | 1991                           | 7.5   | 1990                                 | 25.2  |
|      |           |       |                                |       | 1996                                 | 34.1  |
| 乌拉圭  | 1990      | 222   | 1990                           | 19.9  |                                      |       |
|      | 1993      | 151   | 1993                           | 11.6  |                                      |       |
| 委内瑞拉 | 1988      | 1700  | 1988                           | 25.9  |                                      |       |
|      | 1995      | 1153  | 1995                           | 14.9  |                                      |       |

注：<sup>a</sup> “无保护”的就业是指在每个国家中没有合同或社会保障福利的私营部门或城镇就业人口比重。有关原始来源及更多细节参见国际劳工组织，1999，表7。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1997，表1.1和表1.2；国际劳工组织，1999，表7；Ferreira和Paes de Barros，1999，表1。

较，因为覆盖样本差异很大，而且其比例绝对值本身意义不大（与其增幅不同）。由于分母通常覆盖更多优势就业人口（在城镇或受薪的就业人口），该绝对值在大多数情况下低估了无保护劳动者的比例。人们经常提到的说法是，在过去的20年里非正规经济为拉丁美洲创造了八成就业机会（参见国际劳工组织案例，1999），为这些调查结果提供补充。<sup>4,5</sup>

4 认为正规部门就业人口比例的下降多少是受限制性就业法律规定——例如最低工资和强制性福利的影响，这一观点仍然值得商榷。Amadeo和Camargo（1997年）认为就巴西的情况而言，这样的立法政策仅仅是小部分原因。Pessino（1997年）提供了对阿根廷的另一种观点。

5 请注意，尽管普遍存在就业安全水平较低的情况，但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并不一定意味着更糟糕。在许多情况下，劳动者更倾向于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避免支付所得税和其他税费。

由于法规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些趋势不得不被解释为经济对于债务危机和结构性改革的联合冲击所产生的内生性反应。比如自债务危机以来，智利出现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最高水平。此外，贸易自由化使得那些长期雇佣关系比较少见而自由就业较多的行业（特别是林业和农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产业（如铜矿开采业和制造业）。出口的扩大也带动了分包合同的增加，通常将风险转嫁给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林业出口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其发展的一种工作组织具有分包活动比例高且就业情况不稳定的特点”（国际劳工组织，1998）。以欧洲甚至美国的标准，巴西的劳动力流动性相当高，这种情况被Amadeo和Camargo（1997）形容为就业弹性“过度”。

总体较低的失业率是否补偿了就业保障的明显降

低？从有关解雇成本和失业率之间关系的实证文献中并没有得出有力的结论。跨国的证据一般表明，就业保障的优先效应是呈分布式的：受益者趋向于年龄较长的男性劳动者，而年轻人、女性劳动者则无法受益。但是放宽就业保障法规看来对整体就业水平的影响较弱。从拉丁美洲所得到的有限的证据与以上研究结果一致（Márquez和Pages，1998）。

表4表现了自1981年以来拉丁美洲16个国家在1981~1988年、1989~1993年、1994~1998年这三个时间段内的失业率。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都呈U型。债务危机后的最初几年失业率普遍较高。20世纪80年代末期失业率下降，但随后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上升。巴西、墨西哥、乌拉圭和委内瑞拉都表现出这种独特的模式。但也有例外。智利的失业率仍然是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水平。阿根廷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有技能等级就业人口的失业率增幅基本稳定（Pessino，1997）。令人吃惊的是表中半数国家（16个国家当中有8个国家）1994~1998年的失业率高于1981~1988年（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巴拉圭和委内瑞拉）。

因此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就业保障的下降都伴随着失业水平的上升。即使工会会员人数没

有减少或其他形式的就业保障没有遭到削弱，失业率可能将进一步上升，但是世界其他国家的证据表明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在失业一段时期后失去工作的风险似乎明显增加。

**表4 拉丁美洲（16个国家）：失业率**  
（百分比）

|       | 1981~1988 | 1989~1993 | 1994~1998 |
|-------|-----------|-----------|-----------|
| 阿根廷   | 5.4       | 7.6       | 15.3      |
| 玻利维亚  | 7.6       | 6.9       | 3.6       |
| 巴西    | 5.6       | 4.7       | 5.7       |
| 智利    | 14.9      | 7.2       | 7.6       |
| 哥伦比亚  | 11.6      | 9.9       | 10.4      |
| 哥斯达黎加 | 6.2       | 4.4       | 5.4       |
| 厄瓜多尔  | 8.2       | 8.1       | 8.8       |
| 萨尔瓦多  | 9.4       | 8.5       | 7.2       |
| 危地马拉  | 9.1       | 4.1       | 4.0       |
| 洪都拉斯  | 10.3      | 7.1       | 5.6       |
| 墨西哥   | 4.0       | 2.9       | 4.8       |
| 尼加拉瓜  | 13.0      | 14.7      | 16.5      |
| 巴拉圭   | 5.6       | 5.6       | 6.0       |
| 秘鲁    | 6.9       | 8.3       | 7.8       |
| 乌拉圭   | 11.3      | 8.8       | 10.8      |
| 委内瑞拉  | 10.4      | 8.4       | 10.5      |

资料来源：美洲开发银行（IDB）。

## 四、宏观经济的波动及其与家庭收入的关系：一种分解

与裁员和失业相关的收入大幅度下降所带来的恐惧是经济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种是家庭收入流的急剧波动。正如Gavin和Hausmann（1998）在他们的研究中所强调的那样，拉丁美洲是一个动荡的地区，其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速的标准差平均是工业经济体水平的约两倍。对于单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收入流的波动。同时，从定义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可以成功避免受到经济通常波动（体现在总体国民生产总值走势）的影响，但不同家庭收入不确定性的分布的确取决于家庭风险与国民产

出相关的程度<sup>6</sup>。

我们可利用一个简单分解来说明家庭收入与国民收入波动之间的关系，即以下等式：

$$dlny_{it} = dlny_t + (dlny_{it} - dlny_t)$$

其中 $y_{it}$ 和 $y_t$ 是在时间 $t$ 的家庭收入和国民收入，而 $dlny_{it}$ 和 $dlny_t$ 分别是第 $i$ 个家庭的收入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我们将家庭收入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定义

6 出于讨论目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互换。

为：

$$\begin{aligned} d\ln y_{it} &= \delta_{it} \\ d\ln y_t &= \delta_t \end{aligned}$$

此外，设定家庭收入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水平的相对关系为：

$$(d\ln y_{it} - d\ln y_t) = \rho_{it}$$

现在我们可以将第*i*个家庭收入的增长分解成三个独立的因素：

$$\sigma_{\delta_i}^2 = \sigma_{\delta}^2 + \sigma_{\rho_i}^2 + 2\text{cov}(\rho_{it}, \delta_t)$$

第一项因素 ( $\sigma_{\delta}^2$ ) 代表国民经济波动，主要反映影响经济的宏观冲击，也是Gavin和Hausmann (1996) 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波动。

第二项因素 ( $\sigma_{\rho_i}^2$ ) 代表相应的家庭收入波动，主要反映对一个特定的家庭的特定冲击。

最后，第三项因素 ( $\text{cov}(\rho_{it}, \delta_t)$ ) 代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一个家庭的相关收入之间的协方差。每当家庭相关收入呈现出顺周期性，即在经济向好时期，家庭收入增速高于平均水平，而当经济低迷时，家庭收入增速低于平均水平，该因素为正。显然，第三个因素不能作为经济中所有家庭的共同指标。Lustig (1999) 援引的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每下降一个百分点，贫困人口数量就增加2%。如果像这些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贫困人口更容易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那么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家庭的第三项因素为正值，而对于处于收入分配顶层的家庭，该因素为负值。

这个分解是非常有用的，它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家庭层面的不确定性。它强调了三个不确定性的来源以及三种不同类型的政策影响。如果大多数的不确定性处于宏观层面，那么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质量是减少家庭风险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如果大多数的不确定性具有特殊性，针对个别家庭来说，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无论由私营部门或政府提供的保险。如果大量的不确定性源于特定家庭对于宏观经济衰退的过度敏感，那么恰当的反应是包括找出这些家庭并

确保转移机制①具有适当的针对性②具有应对宏观冲击的韧性。<sup>7</sup>

完成这种分解需要重复的家庭面板数据，这在许多国家是不存在的。秘鲁生活水平衡量调查提供了面板数据。Glewwe和Hall (1998) 利用该数据找出易受冲击的家庭。

为了说明如何利用分解，我将根据较易获得的平均实际工资数据来做一个非常粗略的例子。该案例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的说明性计算。我们假设一个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是工资，且其工资水平为该经济体平均工资水平，工作时间不能改变。那么这个家庭的相关波动分解可为：

$$\sigma_w^2 = \sigma_{\delta}^2 + \sigma_{\rho}^2 + 2\text{cov}(\rho, \delta)$$

这里， $\sigma_w^2$ 代表实际工资增长的波动， $\sigma_{\rho}^2$ 代表实际工资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而其他因素已经有了很清晰的解释。如前所述，该等式将平均的工人收入波动分为三部分：一个是宏观因素，一个是特质因素，还有一个是协方差。

需重点说明：该计算是基于整体经济平均工资水平计算的，这与分解方法的目的相悖，因为它掩盖了特质和宏观风险之间的差别。工人之间的风险发生率被忽略了。该计算所能体现的唯一特定风险来源是影响平均（正式部门）劳动收入的风险（相对于影响其他收入来源的风险）。出于这个原因，该案例不能作为特质与宏观风险孰大孰小的准确指导。它只是对一个“普通的”工人经历的说明性指导。

根据实际工资数据的可得性，表5选取智利、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这四个国家进行计算。每一个国家都分别计算了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的两个分时间段的数据。表5表现的主要结果是智利与样本中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第一，除了智利以外，其他所有国家的实际工资波动性在20世纪90年代都大幅度上升。自80年代的崩溃以来，智利的工资增长明显稳定得多。第二，

7 见Lustig (1999)，特别是关于贫困人口对负面冲击的敏感度的构思。Lustig呼吁建立反经济周期安全网机构，以保护贫困人口免受经济衰退带来的过度伤害。

表5 拉丁美洲(4个国家): 实际工资波动性的分解<sup>a</sup>

| 时间段  | Var (dlmw)  |      | Var (dlmw) |       | Var (dlmw - dlmy) |      | 2xcov (dlmy, dlmw - dlmy) |       |      |
|------|-------------|------|------------|-------|-------------------|------|---------------------------|-------|------|
|      | 数值          | %    | 数值         | %     | 数值                | %    | 数值                        | %     |      |
| 智利   | 1981 ~ 1986 | 2.13 | 100        | 0.777 | 36                | 3.13 | 147                       | -1.77 | -83  |
|      | 1987 ~ 1992 | 0.22 | 100        | 0.13  | 60                | 0.29 | 131                       | -0.20 | -91  |
| 墨西哥  | 1984 ~ 1989 | 0.40 | 100        | 0.66  | 165               | 0.21 | 54                        | -0.48 | -119 |
|      | 1990 ~ 1995 | 0.86 | 100        | 0.35  | 41                | 0.42 | 48                        | 0.09  | 11   |
| 秘鲁   | 1983 ~ 1988 | 3.11 | 100        | 1.30  | 42                | 1.12 | 36                        | 0.70  | 23   |
|      | 1989 ~ 1994 | 6.90 | 100        | 1.61  | 23                | 3.25 | 47                        | 2.04  | 30   |
| 委内瑞拉 | 1983 ~ 1988 | 0.36 | 100        | 0.34  | 93                | 1.16 | 320                       | -1.13 | -312 |
|      | 1989 ~ 1994 | 1.77 | 100        | 0.53  | 30                | 0.91 | 51                        | 0.33  | 19   |

注: <sup>a</sup> 方差和协方差均乘以100。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199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年)和美洲开发银行(无日期)的数据计算。

表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6个国家)波动性指标<sup>a</sup>

|          | 国民生产总值波动性 |        | 收入贸易条件波动性 |        | 私人资本流量波动性 |        |
|----------|-----------|--------|-----------|--------|-----------|--------|
|          | 1980年代    | 1990年代 | 1980年代    | 1990年代 | 1980年代    | 1990年代 |
| 阿根廷      | 0.048     | 0.050  | 0.007     | 0.004  | 0.032     | 0.058  |
| 巴哈马      | 0.028     | 0.023  |           |        |           |        |
| 巴巴多斯     | 0.052     | 0.030  |           |        | 0.047     | 0.045  |
| 伯利兹      | 0.032     | 0.010  |           |        | 0.031     | 0.011  |
| 玻利维亚     | 0.045     | 0.031  | 0.009     | 0.016  | 0.025     | 0.003  |
| 巴西       | 0.044     | 0.039  | 0.008     | 0.003  | 0.009     | 0.040  |
| 智利       | 0.070     | 0.027  | 0.021     | 0.029  | 0.049     | 0.018  |
| 哥伦比亚     | 0.015     | 0.016  | 0.019     | 0.011  | 0.010     | 0.012  |
| 哥斯达黎加    | 0.045     | 0.024  | 0.042     | 0.014  | 0.068     | 0.028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0.047     | 0.043  | 0.030     | 0.035  | 0.023     | 0.036  |
| 厄瓜多尔     | 0.044     | 0.012  | 0.030     | 0.027  | 0.035     | 0.009  |
| 萨尔瓦多     | 0.027     | 0.007  | 0.039     | 0.022  | 0.026     | 0.009  |
| 危地马拉     | 0.049     | 0.052  | 0.013     | 0.013  | 0.011     | 0.006  |
| 圭亚那      | 0.026     | 0.024  | 0.063     | 0.197  | 0.058     | 0.051  |
| 海地       | 0.017     | 0.069  | 0.026     | 0.016  | 0.004     | 0.014  |
| 洪都拉斯     | 0.036     | 0.024  | 0.026     | 0.040  | 0.010     | 0.014  |
| 牙买加      | 0.042     | 0.038  |           |        | 0.039     | 0.024  |
| 墨西哥      | 0.051     | 0.023  | 0.016     | 0.008  | 0.029     | 0.017  |
| 尼加拉瓜     | 0.069     | 0.026  | 0.032     | 0.060  |           |        |
| 巴拿马      | 0.083     | 0.053  | 0.021     | 0.019  |           |        |
| 巴拉圭      | 0.035     | 0.015  | 0.020     | 0.011  | 0.021     | 0.016  |
| 秘鲁       | 0.047     | 0.019  | 0.014     | 0.006  | 0.017     | 0.032  |
| 苏里南      | 0.060     | 0.074  |           |        | 0.140     | 0.034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0.043     | 0.022  |           |        | 0.037     | 0.032  |
| 乌拉圭      | 0.055     | 0.028  | 0.026     | 0.008  | 0.037     | 0.033  |
| 委内瑞拉     | 0.050     | 0.052  | 0.060     | 0.030  | 0.085     | 0.104  |
| 平均值      | 0.045     | 0.032  | 0.026     | 0.028  | 0.037     | 0.028  |
| 中值       | 0.045     | 0.027  | 0.023     | 0.016  | 0.031     | 0.024  |

注: <sup>a</sup> 波动性是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标准差, 以及总私人资本流量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标准差。

资料来源: 有关国民生产总值和贸易条件的数据来自美洲开发银行数据库, 私人资本流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1999)。

工资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呈现出顺周期性（秘鲁），或在90年代也变成如此（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但智利除外。换句话说，在这些国家，宏观经济波动向工资的传递被放大。第三，在除智利以外的三个国家，普通工人工资波动中“特质”因素占总工资波动的一半或更少。因此，宏观冲击及与工资走势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工资波动的一个重大——如果不是重大也是部分原因。在智利，特质因素是工资波动的主导性原因。

这些计算和结论当然都是试验性的，尤其是利用家庭水平数据而不是平均工资进行分解。尽管如此，它们能够说明，除特质冲击以外，宏观经济不稳定在导致该地区工人收入不确定的影响及其愈加扩大的作用。言下之意，增强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将为劳动者的经济安全做出重大的贡献，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还超过了社会保险方案本身。

拉丁美洲的总体宏观经济波动水平的确非常高。虽然自债务危机以来，该地区波动性有所下降，但是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表6列举了该地区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波动性数据。在未加权的情况下，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波动性从20世纪80年代的4.5个百分点下降到90年代的3.2个百分点。即便如此，这仍然是工业经济体如美国的波动性水平的2倍。此外，在许多重要的情况下，波动性上升：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的波动性在平均水平之上，20世纪90年代的波动性甚至超过了80年代的水平。

在表7当中我们加入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数据对该地区的大国进行更长期的比较。我没有选取原始标准差，而是选择略有不同形式的数据。表中的数据回答了以下这个问题：在任意给定的年份，人均收入下降5%或更多的概率是多少？由于经济不安全感往往是基于对于收入锐减的恐惧，那么这似乎是比波动性本身更好的一种衡量方法。我的计算基于十年平均增长率及它

们的标准差，假设年增长率相等且正态分布。

对于一个给定的增长率，收入下降5%的概率随波动性而增加。而对于一个给定的波动性水平（以增长的标准差来表示），在平均增长率的条件下，收入下降5%的概率是下降的。因此，表7所示的概率结合了收入增长率及其波动性双方面的信息。

该表显示，较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改善巨大。但它也清楚地表明，对于大部分列表中的国家来说，20世纪90年代总体收入的不安全感远高于60年代和70年代。在巴西、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在任何给定年份内平均收入下降5%或更多的概率位于10%~20%的区间，远远高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水平。在同一衡量标准下，只有阿根廷和智利在收入保障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如果将所有的样本国家看作是一个整体，在20世纪90年代收入急剧萎缩（5%或以上）的平均概率（8.0%）大约是60年代和70年代观察水平的两倍（3.0%和4.6%）。

表7 拉丁美洲（8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动荡

|      | 1960年代 | 1970年代 | 1980年代 | 1990年代 |
|------|--------|--------|--------|--------|
| 阿根廷  | 7.9    | 5.4    | 36.5   | 3.3    |
| 巴西   | 2.3    | 0.2    | 12.4   | 14.4   |
| 智利   | 0.4    | 25.5   | 17.5   | 0.0    |
| 哥伦比亚 | 0.0    | 0.0    | 0.5    | 0.0    |
| 墨西哥  | 0.0    | 0.0    | 17.1   | 19.0   |
| 秘鲁   | 3.5    | 3.6    | 36.5   | 17.8   |
| 乌拉圭  | 4.3    | 0.3    | 28.7   | 0.4    |
| 委内瑞拉 | 5.4    | 1.5    | 37.3   | 9.0    |
| 平均值  | 3.0    | 4.6    | 23.3   | 8.0    |
| 中值   | 2.9    | 0.9    | 23.1   | 6.1    |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的计算是基于十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平均值及其标准差，假定增长率在十年内相等且正态分布。



## 五、宏观经济波动的来源：资本流动的重要性

Hausamann和Gavin (1996) 对拉丁美洲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进行了调查研究。正如这两位作者强调，波动性由外部冲击和国内政策失误共同导致。对外方面，贸易条件和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是关键因素。有关这些外部影响因素的数据如表6所示。政策方面，盯住汇率制度的崩溃和不稳定的货币政策通常都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一般来说，外来的冲击以及国内的制度和政策都很重要。

对于20世纪90年代，有证据表明，私人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也许是宏观经济波动唯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表8所示的回归体现了该核心信息。

该表通过若干决定因素说明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波动回归水平的结果：收入贸易条件的波动，总私人资本流动的波动，货币环境的波动，金融深度，人均收入和90年代的虚拟变量。<sup>8</sup> 第一列汇集了这两个十年的平均值（包含每个国家最多2个观察值），表明了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与国民生产总值波动高度相关。贸易条件波动的预计系数为正但无意义。金融深度（由M2/GDP表示）似乎不相关。国内货币环境的波动从统计的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但是只有90%的置信水平。20世纪90年代的虚拟变量为负且有意义，估计系数粗略等于这两个十年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波动的下降幅度。最后，人均收入和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面关联。表8的第二列忽略了贸易条件的波动和金融深度这两个无意义的变量，以期获得一些额外的看法。结果保持不变。特别是总私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是意义性较高的系数。

表8的最后两列显示了以十年为周期计算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与私人资本流动的波动之间的关联特别密切。事实上，资本流动波动性连同人均收入一起，占据了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国民生产总值波动中将近一半的跨国变化，而在80年代这个数据低于20%。系数估计表明，总私人

资本流动的标准差（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标准差至少增长半个百分点。如图2所示，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与国民生产总值波动性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如该图所示，该地区一些较小的国家（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基本上无法获得私人资本流，因此受到的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水平最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则是另一个极端，它们受私人资本流动波动性影响很大，宏观波动性相应地也高。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管理私人资本流动，介于二者之间。

如果强调相反方向的因果关系，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些结果。也许资金流动只是简单地回应经济环境中潜在的波动性，而不是它的一个影响因素。假定私人资本流动遵循基本规律且不存在多重均衡，因此资本流动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扰动源，那么以上的解释就比较恰当。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结果仍然表明资本流动对于其他冲击非常敏感，潜在地放大了这种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私人资本流动非常开放的国家也许要承受资金回流带来的额外波动性，即使资本流动仅仅是响应经济基本规律。这一点在下一节中有更详细的阐述，表明了即使当资本只是回应外生的“生产率”冲击时，资本的流动性如何加重国内经济的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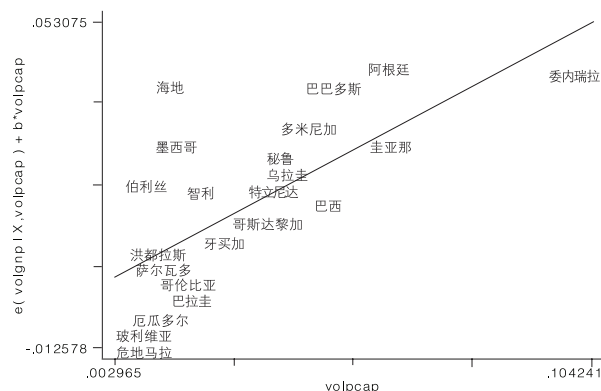


图2 20世纪9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波动性和总私人资本流动波动性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人均收入和货币波动）

8 参见Easterly、Islamc和Stiglitz在1999年所做的性质类似的跨国分析。



表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波动性的决定因素<sup>a</sup>

|                          | 因变量：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标准差     |                       |                      |                       |
|--------------------------|-----------------------|-----------------------|----------------------|-----------------------|
|                          | (1)                   | (2)                   | (3)                  | (4)                   |
| 常量                       | 0.087*<br>( 0.029 )   | 0.067*<br>( 0.019 )   | 0.044<br>( 0.031 )   | 0.079*<br>( 0.024 )   |
| 人均收入对数                   | -0.009**<br>( 0.004 ) | -0.006**<br>( 0.003 ) | -0.003<br>( 0.005 )  | -0.009**<br>( 0.003 ) |
| 货币政策的波动性<br>( M1增长的标准差 ) | 0.011***<br>( 0.006 ) | 0.010***<br>( 0.005 ) | 0.012<br>( 0.007 )   | 0.003<br>( 0.009 )    |
| 收入贸易条件的波动性               | -0.049<br>( 0.112 )   |                       |                      |                       |
| 总私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 0.505*<br>( 0.130 )   | 0.454*<br>( 0.099 )   | 0.419**<br>( 0.177 ) | 0.509*<br>( 0.127 )   |
| 金融深度 ( M2/GNP )          | 0.0000<br>( 0.0003 )  |                       |                      |                       |
| 对90年代的虚拟变量               | -0.010**<br>( 0.005 ) | -0.010**<br>( 0.004 ) |                      |                       |
| 涵盖的时间段                   | 20世纪80年代<br>20世纪90年代  | 20世纪80年代<br>20世纪90年代  | 只有20世纪80年代           | 只有20世纪90年代            |
| N                        | 36                    | 44                    | 22                   | 22                    |
| 调整后的R <sup>2</sup>       | 0.39                  | 0.41                  | 0.16                 | 0.46                  |

注：<sup>a</sup>回归使用每个国家最多两个观察值进行计算：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括号内是标准误差。星号代表数据有意义：\*=99%，\*\*=95%，\*\*\*=90%。这些回归计算使用的样本里排除了四个私人资本流动非常不稳定的小国家：苏里南、巴拿马、巴哈马和尼加拉瓜。

## 六、资本流动性和宏观风险的发生率

不稳定的资金流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密切相关这一发现，对于宏观经济风险在国内家庭住户间的分布具有重要的意义。像我们在上一部分所强调的分解那样，相对收入流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起变动的家庭要比那些相对收入呈反周期性的家庭承担更大的收入风险。特别是，正如我在说明性实证应用中强调的那样，实际工资呈近周期性的劳动者，也就是那些在顺境中实际工资增长高于全国水平而在逆境中下降也更快的劳动者，他们因宏观经济波动而蒙受的损失不成比例。

资本流动的一个含义正是大多数的宏观风险被转嫁给国内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而这些国内生产要素不能进行国际流动。比方说，由于资本能够应国内生产率冲击而流进流出，所以它能够规避由国内经济环境的随

机性引发的风险。但资本流动因此也对国际缺乏流动性的群体施加了外部效应，因为后者现在不得不承担更多国内不可分散的风险。

一个改编自Rodrik (1997) 的简单模型对此进行了说明。假设有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生产（并出口）单一产品，其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这种产品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使用劳动力和资本。不同于劳动力，资本可以跨境流动，但有一定的成本。成本的大小将是体现该经济体中资本流动程度的参数。劳动者的福利是分析的重点，他们只消费进口品。该模型唯一的不确定性源自出口部门随机的生产力水平。劳动收入由工资收入和国内资本税收收益组成。

将出口部门的生产函数表示为 $pf(k, l)$ ，以及一般的

规律性条件:  $f_k > 0$ ,  $f_l > 0$ ,  $f_{kk} < 0$ ,  $f_{ll} < 0$ , 和  $f_{kl} > 0$ 。  
 随机生产力参数为  $p$ 。(我们可以等价地将  $p$  视为贸易条件。)我们将经济体中固定的劳动养老规整统一, 因此生产力函数也可以表示为  $pf(k)$ 。国内拥有的资本存量是外生地固定为  $k_0$ 。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内使用的资本  $k$ , 当资本流入或流出该国家时不同于  $k_0$ 。一个关键的假设是因为资本跨越国界流动, 所以日益增加的成本由资本家引起。我们可以将这个成本视为在一个不太熟悉的环境中经营的成本, 将最终产品运回母国的运输费用以及与设在不同国家的分公司沟通的费用等等。增加的资本流动性将由模型中参数  $\lambda$  的减少来表示。

这个模型可以用三个等式来描述:

$$r = pf_k(k) - \tau \quad (1)$$

$$r = r^* - \lambda(k_0 - k) \quad (2)$$

$$w = pf_l(k) \quad (3)$$

国内资本回报 ( $r$ ) 由国内税收资本净值的边际价值产品决定。资本服务的国际贸易要求这个回报等于国际回报 ( $r^*$ ) 减去与海外流动资本的成本相关的利润。因此, 将国内资本存量减少至  $k$  水平的资本外流会降低国内资本家赚取的资本回报率至  $r^* - \lambda(k_0 - k)$ 。等式 (2) 体现了这种套利条件。最后, 等式 (3) 指出国内工资 ( $w$ ) 等于劳动的边际价值产品。这三个等式确定了系统里的三个内生变量  $w$ ,  $r$  和  $k$ 。

图3展示了该模型运行的图形化视图。向下倾斜的图表曲线显示了等式 (1) 中  $r$  和  $k$  的负相关关系。随着国内生产力 ( $p$ ) 的左右移动, 图表曲线呈现该移动态势。直观地说, 对于任意给定金额的国内资本投资, 资本的回报随出口部门的生产率变化而波动。图表中向上倾斜的曲线代表了等式 (2) 所表达的关系。这里展示了曲线的两个版本, 一个是高  $\lambda$  (低资本流动性), 一个是低  $\lambda$  (高资本流动性)。 $\lambda$  越低, 曲线就越平坦。在临界情况下, 资本零成本地充分流动, 该曲线呈水平状, 它将国内回报率固定在  $r^*$  水平。

我们将国内使用资本的均衡水平记为  $k(p, \tau, \lambda)$ 。将参数组合  $k(p, \tau, \lambda) = k_0$  视为初始平衡。在这个平衡点, 也就是图3中的A点,  $r = r^*$ 。从这个初始平衡开始,  $\lambda$  变化不会对  $w$  或  $k$  (或  $r$ ) 产生影响, 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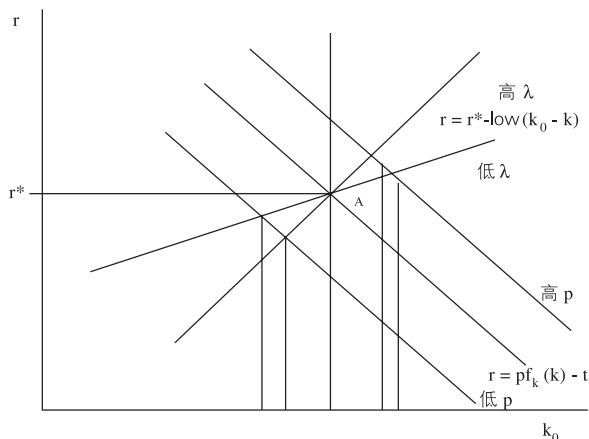


图3 模型的运行

$$\frac{dk}{d\lambda} = \frac{k - k_0}{pf_{kk} - \lambda}$$

$$\frac{dw}{d\lambda} = pf_{kl} \left[ \frac{k - k_0}{pf_{kk} - \lambda} \right]$$

而且当  $k = k_0$  时, 这两个表达式均等于0。直观地看, 我们固定初始平衡这样资本就没有在国内经济结构中流入或流出的动力, 因此流动成本的变化就没有意义 (保持  $p$  恒定)。

现在我们考虑一下当  $p$  波动时, 会发生什么情况。 $p$  的减少压低了国内资本回报导致资本外流, 其幅度和  $\lambda$  成反比例关系。如图所示, 资本流动性越大, 应对世界价格变化的国内资本存量波动的幅度就越宽。形式上,

$$\frac{dk}{dp} = \frac{f_k}{\lambda - pf_{kk}} > 0,$$

$\lambda$  递减。其对劳动力的影响很容易推断出来。因为国内工资 (在进口方面) 由出口方面劳动边际产品价值决定, 如等式 (3), 资本流动性突出了消费工资方面的波动。 $\lambda$  越低,  $w$  波动的幅度就越宽:

$$\frac{dw}{dp} = f_l + \frac{pf_{kl}f_k}{\lambda - pf_{kk}} > 0,$$

$\lambda$  逐渐减少。

事实上, 只要劳动者收入的一部分来自资本税, 情况于劳动者而言就更糟糕。用  $l$  表示劳动者总 (实际)

收入。

$$I = w + \tau k$$

因此， $I$ 的波动不仅是工资波动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为寻求更高回报而来回移动所引发的税基（ $k$ ）波动的结果。

所以，通过让资本对国内生产率的变动更敏感，资本流动放大了国内劳动者收入的波动幅度。结果就此显现，原因是劳动者收入不仅取决于国内生产率，还取决于：①随生产率冲击而波动的国内资本存量；②该经济

体的税基，由于资本流动，其波动范围也更大。资本流动的影响就是加大了劳动力与宏观经济风险的接触。这可以视为资本施加于劳动力的负外部性。此外，当资本流动性足够高时，不可能通过资本税收的适当调整来补偿劳动力：资本流动允许资本家逃税，使得劳动者的情况变得更糟糕。因此，该模型以扼要的方式展示了一个全球面临的政策困境，在拉丁美洲尤其突出，该地的资本流动波动性特别显著。

## 七、汇率、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波动

我们已经注意到汇率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联：不可持续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历来是拉丁美洲国家不稳定的重要来源。Hausmann和Gavin（1996）的研究结果之一就是实行弹性汇率制的国家通常要比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经历较低的国内生产总值波动。原因之一与避免货币危机有关。另一个原因是弹性汇率能更好地抵御现实冲击：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或贸易条件的降低可以通过即时货币贬值来弥补，而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改变国内价格简化调整过程，且所需时间也更长。

20世纪90年代的资本流动削弱了弹性汇率制维稳的能力。当汇率不固定时，币值的升降受竞争能力和贸易差额变化冲击的驱使较少，而更多考虑维持短期资本流动和投资者信心。关于该地区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如何应对冲击，Michael Gavin做了如下总结：

“最典型事实是无论外部冲击的幅度有多大，大多数国家在使用汇率灵活性时都非常谨慎……秘鲁这个形式上汇率浮动的国家，曾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和贸易条件崩溃双重打击，累计货币贬值勉强与通货膨胀持平。智利不顾铜价的大幅下跌以及亚洲进口需求的大幅下降，也只允许汇率最小幅度的变动。”（Gavin，1999）

Gavin接着论述回应策略选择由利率所取代，以此来积极地捍卫汇率。换言之，拉丁美洲国家政府选择收

紧货币条件以防止贬值，而不是让名义汇率降低到足以刺激实体经济增长。汇率政策和实体经济的需求脱钩。

表9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表述，分析实际汇率变化与各种形式国际收支平衡流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课题的灵感来自于国际劳工组织一个类似的报告（1999，表3），但只包括一个单独的拉丁美洲国家。它计算了实际汇率的季度变化和两种流动之间的相关系数，这两种流动是“真实的”流量和“金融的”流量。第一种流量解释为经常账户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总和。第二种流量涵盖了除外国直接投资和储备变动之外的所有资本账户变动，还包括错误和遗漏。<sup>9</su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报告了主要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一段时间的相关季度数据，这个课题就是这些国家中展开的。总共有6个国家。

分析结果与我们的观点一致。在所有的国家，金融流量和实际汇率变动之间的相关性是负值，除了一个国家（秘鲁是唯一的例外）。这表明，存在着为回应资金流入实际汇率升值的一般趋势。另一方面，六个国家中有五个的实际汇率与实际流量正相关（智利在这个情况下是唯一的例外）。换句话说，在除智利以外的所有国

9 注意：由于计算中不包含储备变动，两组相关性不必产生对称的结果（绝对值相等而符号相反）。

家，经常账户（和外国直接投资余额）的恶化和实际汇率的升值相关联。

这些结果似乎反映的是一个日益普遍的模式，金融流量推动实际汇率的变动。对国内产出的稳定需求而言，在金融流动的情况下汇率往往朝着“正确的”方向移动：资本流入减少使得实际汇率下降；但在贸易流动的情况下汇率却朝着“错误的”方向移动：经常账户的恶化常伴随着实际汇率的上升。这种模式在墨西哥最清晰明了，1988~1994年的金融资本流入增加和经常账户的恶化正好与当时的货币实际升值相匹配。表9体现了资金流和实际汇率之间非常紧密的相关性。当然，墨西哥的情况也可以解释为在对未来生产率提高的预期下货币的平衡升值，尽管最终还是发生了比索危机。尽管如此，掌控实际汇率的是短期投资者的期望，而不是国内需求的状况或者庞大的日益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

表9 拉丁美洲（6个国家）：实际汇率和国际收支流动之间的相关性<sup>a</sup>

|      | 与实际汇率之间的相关性系数 |        |                  |
|------|---------------|--------|------------------|
|      | 经常账户+国外直接投资   | 金融流入量  | 时间段 <sup>b</sup> |
| 阿根廷  | 0.19          | -0.52* | 89Q2-98Q4        |
| 巴西   | 0.40***       | -0.23  | 93Q1-97Q4        |
| 智利   | -0.24         | -~0.03 | 89Q1-98Q4        |
| 墨西哥  | 0.68*         | -0.69* | 89Q1-98Q4        |
| 秘鲁   | 0.40          | 0.21   | 94Q1-97Q4        |
| 委内瑞拉 | 0.24          | -0.06  | 94Q1-98Q4        |

注：<sup>a</sup> 汇率定义为每单位外币可兑换的本国货币的单位，因此增加代表实际汇率的贬值。金融流入量指除国外直接投资和储备的变动以外的所有资本账户变动，包括错误和遗漏。根据季度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时间段。数据有意义的水平是：\* =99%，\*\*=95%，\*\*\*=90%。

<sup>b</sup> Q代表季度。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年的数据计算。

## 八、作为社会保险的外汇汇率弹性

20世纪90年代，汇率政策操作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导致该地区经济更加不安全。以实体经济为目标的汇率不仅具有维稳功能，同时也具有社会保险功能。原因是，当汇率遵循经常账户的运行状况，对个别行业竞争力的冲击通过改变货币的价值而消散在整个经济体中。另一方面，当汇率固定或者主要回应金融资本流动，那么受影响的行业就不得不承担冲击的全面影响。由于这一观点未获广泛的认识，我将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详尽阐述。

我们假设有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该经济体生产两种可交易商品（用1和2表示）和一种不可交易商品（用n表示）。为了简单起见，假定这两种可交易商品都不在国内消费，国内的全部产出均用于出口。家庭住户消费不可交易商品和不在国内生产的进口商品。我们将（外生性的）可交易商品依据世界价格统一定价。用 $e$ 代表名义汇率，每单位外币可兑本国货币的单位数。

因此三种可交易商品（两种可出口商品和一种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由 $e$ 决定。设不可交易商品的价格为 $p$ 。

我们将进一步简化该经济体结构，假设劳动力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并且国内三个生产部门中的每一个都将特定的劳动力投入到特定的生产活动中。跨部门的劳动力流动不存在。设定每种类型的无弹性劳动力供给为 $\bar{l}_1$ ， $\bar{l}_2$ 和 $\bar{l}_n$ ，相应的工资为 $w_1$ ， $w_2$ 和 $w_n$ ，而三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a_1$ ， $a_2$ 和1。

为了让名义汇率政策产生真正的影响，我们应当假设 $w_1$ 和 $w_2$ 是向下的刚性。其潜在的含义是当单位劳动力成本超过任意一个出口部门的价格时，该部门的劳动力将成为失业者。形式上，

$$l_1 = \begin{cases} \bar{l}_1 & \text{if } w_1 \leq ea_1, \\ 0 & \text{otherwise} \end{cases} \quad (2.1)$$

而其他出口部门也相似:

$$l_2 = \begin{cases} \bar{l}_2 & \text{if } w_2 \leq ea_2, \\ 0 & \text{otherwise} \end{cases} \quad (2.2)$$

非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始终是充分就业, 并且该部门的价格成本关系是

$$w_n = p \quad (2.3)$$

请注意只要各自类型的劳动力没有失业, 则(2.1)和(2.2)当中的不等式就会保持相等。

为了使模型能够关闭, 我们必须指明需求与供给相等。假定保持贸易平衡, 则足以满足我们的目的: 说明可交易商品供求平衡。令  $Y = ea_1l_1 + ea_2l_2 + pl_n$  为总收入,  $D(e, p, Y)$  是进口商品的需求函数。贸易平衡方程是:

$$a_1l_1 + a_2l_2 - D(e, p, Y) = 0.$$

采用具有特定功能的形式分析较为便利, 所以我们倾向于Cobb-Douglas。 $\alpha$ 代表进口商品的预算份额, 所以  $D(\cdot) = \alpha Y/e$ 。贸易平衡方程可以写成:

$$(1 - \alpha)a_1l_1 + (1 - \alpha)a_2l_2 - \alpha \left(\frac{p}{e}\right) \bar{l}_n = 0. \quad (2.4)$$

要弄清模型如何运作, 我们先考虑没有工资刚性的情况。从而我们就有充分就业  $\bar{l}_1 = l_1$  和  $l_2 = \bar{l}_2$ , 而等式(2.4)决定了“实际汇率” ( $e/p$ ) 是劳动生产率  $a_1$  和  $a_2$  的一个函数。任何一个出口部门的生产率下降都会导致实际利率的贬值 ( $e/p$  上升)。等式(2.1) - (2.3) 给我们带来三个额外的等式连同三个内在变量  $w_1$ ,  $w_2$  和  $w_n$ 。我们现在一共有4个等式和5个价格 (3个工资水平加上  $p$  和), 所以只有4个相对价格可以确定。无论是将名义汇率或任意一个工资水平拿来作为分子都可以。

为便于未来参考, 我们在没有名义刚性的情况下进行静态比较分析 (这种情况下的解决方案在工资刚性的条件下仍然有效, 只要可贸易部门的工资没有为了平衡而下向调整)。我们考虑  $a_1$  变化而  $a_2$  不变的情况。令  $\theta = \frac{a_1 \bar{l}_1}{a_1 \bar{l}_1 + a_2 \bar{l}_2} l > \theta > 0$ 。那么相关价格变动就如下所示:

$$\hat{w}_1 - \hat{e} = \hat{a}_1 \quad (2.5)$$

$$\hat{w}_1 - \hat{p} = (1 - \theta) \hat{a}_1 \quad (2.6)$$

$$\hat{w}_2 - \hat{e} = 0 \quad (2.7)$$

$$\hat{w}_2 - \hat{p} = \theta \hat{a}_1 \quad (2.8)$$

$$\hat{w}_n - \hat{e} = \theta \hat{a}_1 \quad (2.9)$$

$$\hat{w}_n - \hat{p} = 0, \quad (2.10)$$

其中一项表示比例的变化 ( $\hat{x} \equiv dx/x$ )。这些关系使我们能够确定这三组工人的实际工资以及福利的含义。

假设部门一的生产率下降 ( $\hat{a}_1 < 0$ )。我们从等式(2.5)和(2.6)中可以明确地得知部门一的工人遭受损失。然而, 其他出口行业 (部门二) 的工人却从中受益, 因为从进口商品的角度来看, 他们的工资保持不变, 而非交易商品的角度来看却是上升了, 见等式(2.7)和(2.8)。由于汇率的实际贬值, 非交易商品部门的工人也遭受损失。这些结果不依赖于“汇率制度”, 因为在一个没有工资刚性的模型里, 名义利率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 1. 名义工资刚性和固定汇率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 如果我们要求两个可贸易部门的工资都下向刚性, 也就是  $\hat{w}_1 \geq 0$  和  $\hat{w}_2 \geq 0$ , 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汇率就有关系了, 因为在固定汇率制下 ( $\hat{e} = 0$ ), 与贸易产品价格相关的工资下向调整受阻。因为当一个行业受到负生产率冲击时, 为维持充分就业, 这种调整非常必要, 所以结果只能是失业。

和之前一样  $\hat{a}_1 < 0$ , 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 相对静态分析会得出以下结果:

$$dl_1 = -\bar{l}_1 \quad (2.11)$$

$$\hat{w}_2 - \hat{e} = 0$$

$$\hat{w}_2 - \hat{p} = \theta \hat{a}_1 + \theta \quad (2.8')$$

$$\hat{w}_n - \hat{e} = \theta \hat{a}_1 - \theta \quad (2.9')$$

$$\hat{w}_n - \hat{p} = 0.$$



我们注意到三个改变。第一，部门一的所有工人都失业了，如等式(2.11)。第二，部门二的劳动者现在实际工资获得更大收益，比较等式(2.8)和(2.8')，记住条件是 $\hat{a}_1 < 0$ 。第三，非交易部门工人实际工资下降更多，比较等式(2.9)和(2.9')。当工资刚性结合固定汇率共同导致失业时，上述后两种结果产生的原因是实际汇率的急剧变化。直觉如下：当出口部门一因丧失竞争力倒闭时，初期的贸易赤字要大得多，而所需的相对价格调整也相应较大。

我们认为重要的结果是生产率冲击的分配影响得以突显。工资刚性与固定汇率相结合产生的后果不单是效率低下(这里特指失业)，还扩大分配结果的分散性。

## 2. 名义工资刚性和弹性汇率

当汇率不固定并以贸易平衡为目标时，这些效果能

够被名义利率的贬值抵消。这种贬值大到足以使部门一的单位劳动成本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即 $\hat{e} = -\hat{a}_1$ )。 $e$ 的灵活性可以让部门一的工资根据贸易商品的价格减少，消除失业现象。因此，等式(2.5)到(2.10)继续描述经济体的行为，尽管 $w_1$ 存在下向刚性。分配结果和缺乏工资刚性的结果一致。

生产率冲击对部门二造成的结果类似，无需详细讨论。表10总结了在积极的和消极的冲击下，对于三个部门的分配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在积极的生产率冲击下，分配影响不取决于汇率是否固定或者是否以贸易平衡为目标。原因是工资刚性是下向而不是上向这一(可能的)假设。因此，只有当其中一个部门受到消极的冲击时，固定汇率的条件下才能获得非典型的结果。发生这种情况时，固定汇率条件下分配影响通过上述两种渠道加剧：一是因失业受到不利影响的部门收入崩溃；二是存在着对其他可贸易部门有利或对非贸易部门有害的相对价格更大的调整。

表10 不同汇率制度下的生产力冲击的分配影响<sup>a</sup>

| 汇率制度 | 对出口部门一的冲击                |   |     |                          |    |     | 对出口部门二的冲击                |   |     |                          |     |     |
|------|--------------------------|---|-----|--------------------------|----|-----|--------------------------|---|-----|--------------------------|-----|-----|
|      | 积极的冲击( $\hat{a}_1 > 0$ ) |   |     | 消极的冲击( $\hat{a}_1 > 0$ ) |    |     | 积极的冲击( $\hat{a}_2 > 0$ ) |   |     | 消极的冲击( $\hat{a}_2 > 0$ ) |     |     |
|      | 对该部门的意义                  |   |     | 对该部门的意义                  |    |     | 对该部门的意义                  |   |     | 对该部门的意义                  |     |     |
|      | 1                        | 2 | $n$ | 1                        | 2  | $n$ | 1                        | 2 | $n$ | 1                        | 2   | $n$ |
| 固定汇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弹性汇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sup>a</sup> 该模型假定部门一和部门二工资下向刚性。有关模型描述和讨论见文字部分。

## 九、“发声”体制

过去20年中，拉丁美洲最令人鼓舞的进步是军事统治的消亡，转型民主。多个国家的证据强烈表明政治开放性与参与性越高，社会就能更好地适应外部冲击，经历的经济波动性越小，产生的通胀也越低

(Rodrik, 1998)。因此，民主制度化归根结底应该在该地区创造更稳定的经济成果和减少经济的不安全因素。

文中图4与图5的国际性证据显示了政治体制类型与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图显示了20年中(20世纪



70年代与80年代)非精英政治参与和两个宏观经济波动指标之间的(部分)关联程度。波动程度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图4)与平均通胀率之间的标准偏差(图5)。参与程度(标准公司)是一项指数,指数的数据来自Jagers和Gurr(1995)的《第三政体》,其含义是“非政治精英能够进入政治机构表达政治诉求的程度”。虽然后者与普遍的民主程度高度相关(例如通常被使用的自由屋指数),但是我发现用它来预测宏观经济波动更适合。回归散布图包括了以下额外的调节要素:人均收入、人口规模、有条件的贸易波动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的地区代表。散布图显示了政治参与和波动之间的联系,以及为其他这些变量所作的调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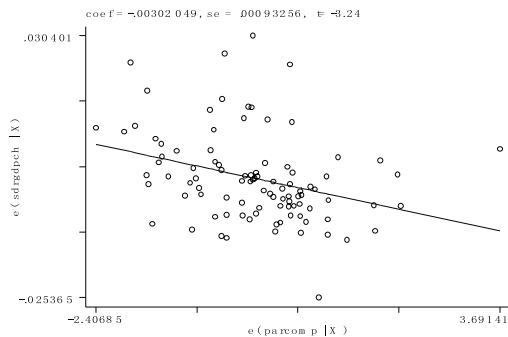


图4 国内生产总值波动性与政治参与度之间的关系，1975~1990年（96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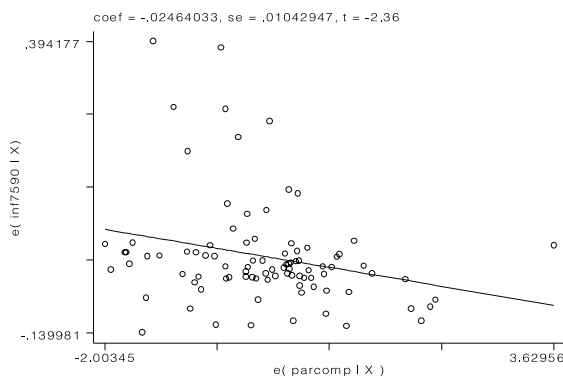


图5 通货膨胀与政治参与度之间的关系，1970~1990年（96个国家）

政治参与被证明与国内生产总值波动和通胀水平强烈负相关。虽然这种相关性不能证明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其他的计量经济工作以及一系列的案例研究表

明:政治参与开放程度的高低影响宏观经济管理质量的好坏(Rodrik, 1999)。参与在很多方面都起到作用。首先,民主政治能确保政权顺利地由失败的政策与政治家手里移交到新政府领导团队手中。其次,参与使协商谈判成为一种机制,允许政策制定者通过这种机制了解舆论需要,从而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再次,“发声”的制度化机制有助于消除暴动、抗议和其他具有破坏性的暴力活动,降低了其他社会团体对此类暴力行为的支持度。

虽然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正在转向民主化,但是该地区的政治参与机制仍然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缺陷。必须将这些缺陷视为加剧经济不安全性的因素之一:当大量民众遇到影响他们利益的事件,无法通过有效的“发声”机制来表达其诉求,会很自然地感觉到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如前所述,作为一个代表集体的发声的重要机构,工会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智利除外)已经失去了政治成员资格。工会对于工人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工会在政治领域扮演压力团体的角色,而且在工作场所促进决策的参与。两种情况下,工会给成员更多掌控工作环境的感觉。Pencavel(1997, 第58页)在其有关拉丁美洲的讨论中写道:

“它很重要……,工人不会感觉到被经济和社会体制所疏远,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程序很重要:即使结果相同,雇员们也看重他们或者代理人帮助塑造工作环境。工会已经成为实现这一状况的主要工具。”

老式工会在拉丁美洲的主要活动是游说政府,为工人们争取法律规定的就业保障以及更好的薪水,但是现在,这种形式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以及较小的生产经营单位的需要。过去,工会过多地与民粹主义者以及贸易保护政策联系在一起。Márquez和Pages(1998)认为,无论是工会领导人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没能塑造一个能够让工会成为充分代表工人利益需求团体的环境。

拉丁美洲更广泛的政治体制正面临着被Domínguez(1997)称为“代表性危机”的局面。正如他所说,“当必须寻求公众支持以确保经济改革与宪政的稳定时,长期存在的代表形式——民粹主义的政党和所谓的

社团主义者团体——此刻已被明显削弱……拉丁美洲的政府官员被视为腐败，政党不过是各派系的集合，立法机关没有作为，总统或者作为救世主或者作为流氓遭到弹劾。尽管军事政变已经完全消失，但针对立宪主义新的威胁已经出现：总统命令成为法令，心怀不满的中级军官领导兵变，总统对立法机关、法院与所有帮助民间社会寻求其利益拥护和代表的媒介发动‘政变’（Domínguez, 1997, 第109~112页）。军队内部的兵变已经在阿根廷、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巴拉马和委内瑞拉出现。有人试图在危地马拉、秘鲁和委内瑞拉发动总统政变。

委内瑞拉伞兵军官Hugo Chávez上校是这些趋势的典型代表人物。1992年，他试图推翻委内瑞拉的民选政府但以失败告终。尽管没有成功，但是他的意图却被广泛地传达给公众，最终他在1998年以明显多数当选总统。1999年底，尽管Chávez解散了立法机构，用起草新宪法的宪制议会取而代之，但是他仍然保持了很高的

支持率。这表明拉丁美洲民众对其政治体制有明显的挫败感。

和很多其他例子一样，智利对于上述诸多趋势而言都是一个例外。智利在1990年通过工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对话以及一系列的年度三方协议，完成了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通过增加社会项目支出和借鉴工人运动，Patricio Aylwin的民选政府寻求其经济政策的社会合法性。Aylwin政府第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法案是增税，以期获得更多的社会开支（Domínguez, 1998）。三方协议允许工会参与相关国策的制定，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改革劳动法等。用Cortázar（1997）的话说，自1990年中间偏左联盟在智利执政以来，就把工会视为“发展的机遇而非威胁”。雇主认为后Pinochet时代有一位社会伙伴在谈判桌对面的好处是可以避免社会动荡。结果是产生了比较和谐的劳资关系制度<sup>10</sup>和具有普遍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尽管智利未能认真解决Pinochet政权遗留的问题。

## 十、结论

我在文章中谈到了拉丁美洲的经济不安全感体现在多个方面，并且许多来源相互影响。一些经济不安全感源于就业保障的降低和家庭成果波动性的加剧。有些是由于资本流动不稳定和稳定化手段与实体经济背离所产生的系统性不稳定。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有发言权和代表权的机构表现软弱。

这方面一个重要的意义是社会保障方案本身也只能起到部分作用。运转良好的社会安全网——由失业补偿、养老和医疗以及有针对性的社会基金等构成——可能会帮助解决一些家庭所面临的特质风险。但仍须辅以有利于实体经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关于资本流动和汇率方面），并且放松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控制。他们还需借力于那些拥有比现有机构更敏感、更具合法性的代表，例如工会、政党和立法机构。

但也许拉丁美洲最需要的一种前瞻力，即：面对巨大的不平等和不稳定的局面时，该如何保持社会凝聚

力。由于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力量，这种局面正在日益加剧。在当今先进工业化国家中，市场作用的扩大历来与社会保险机构的增强携手共进。美国实施的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更是如此，均意味着公共部门的增长和福利国家的兴起。如果拉丁美洲想为自己寻求一条不同的道路，必须建立另一个愿景，阐明如何缓解市场力量与对经济安全感的渴求之间的紧张关系。

好消息是，这个问题至少是正在处理当中。坏消息是，至今没有人，至少还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能够提供非常有用的答案。

---

10 一项1997年在圣地亚哥300家私企中进行的调查表明，高达83.7%的雇主认为工会有助于劳资关系，只有6%的雇主认为工会让劳资关系变得恶劣。而有65.3%的工会领导者认为在大多数时间里，雇主有利地推动了工会的工作。见《经济学家信息部》报道，1998年。

## 参考文献

- Amadeo, E. J. and J. M. Camargo (1997): Brazil: regulation and flexibility in the labor market, in S. Edwards and N. Lustig (eds.), *Labor Markets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Bordo, M. D., C. Goldin and E. N. White (eds.) (1998): *The Defining Momen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rtázar, R. (1997): Chile: The evolution and reform of the labor market, in S. Edwards and N. Lustig (eds.), *Labor Markets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Domínguez, J. (1997): Latin America's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1,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 Inc.
- \_\_\_\_\_ (1998): Free politics and free markets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9, No. 1, New York,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 Easterly, W., R. Islam and J. E. Stiglitz (1999): *Shaken and Stirred: Volatility and Macroeconomic Paradigms for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Michael Bruno Memorial Lecture, XII World Congress of the IEA, Buenos Air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 27 August.
- Ferreira, F. H. and R. Paes de Barros (1999): *The Slippery Slope: Explaining the Increase in Extreme Poverty in Urban Brazil, 1976-1996*, Texto para discussão, No. 404, Rio de Janeiro,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 Gavin, M. (1999): Latin American central banks: Reluctant to react,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Policies*, vol. 7,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 Office of the Chief Economist.
- Gavin, M. and R. Hausmann (1996): *Sources of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IDB.
- Glewwe, P. and G. Hall (1998): Are some groups more vulnerable to macroeconomic shocks than others? Hypothesis test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Peru,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6, No. 1,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B.V.
- Hausmann, R. and M. Gavin (1996): *Securing Stability and Growth in a Shock Prone Region: The Policy Challenge for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IDB.
- IDB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und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 Base (<http://database.iadb.org/esdbweb/scripts/esdbweb.exe>)
-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1997): *World Labour Report 1997-1998*, Geneva.
- \_\_\_\_\_ (1998): *Studies o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Geneva.
- \_\_\_\_\_ (1999): *Progress Report on the Country Studies on the Social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Geneva, 24 March.
-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various year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 Jacoby, S. M. (1998): *Risk and the Labor Market: Societal Past as Economic Prologue*,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Jagers, K. and T.R. Gurr (1995): Tracking democracy's third wave with Polity III dat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2, Oslo,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
- Lustig, N. (ed.) (1995): *Coping with Austerity: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Lustig, N. (1999): *Crises and the Poor: Socially Responsible Macroeconomics*, Washington, D.C., IDB, September.
- Marquez, G. and C. Pages (1998): *Ties That Bind: 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IDB, February.
- Mirror on the Americas Poll 1999 (1999): New York, Wall Street Journal Interactive Edition.
- Pencavel, J. (1997):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S. Edwards and N. Lustig (eds.), *Labor Markets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Pessino, C. (1997): Argentina: The labor market during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n S. Edwards and N. Lustig (eds.), *Labor Markets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Rackoff, H. (1998): By way of analogy: The expans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e 1930s, in M. D. Bordo and others (eds.), *The Defining Momen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drik, D. (1997):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IE).
- \_\_\_\_\_ (1998): Where has all the growth gone? External shocks, social conflict, and growth collaps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No. 4,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_\_\_\_\_ (1999): *The New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aking Openness Work*, Washington, D.C.,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ODC).
- Romero, S. (1999): Brazilians eagerly seek a big bank's entry-level jobs, *The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26 August.
- Taylor-Gooby, P. (1989):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R. Jowell and others,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Special International Report*, vol. 6, Aldershot, U.K., Gower Publishing.
-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1998): *Country Report for Chile*, London, 17 August.
- World Bank (199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999*, CD-ROM.



## 关键词

国际贸易  
出口  
出口多样化  
经济增长  
新兴市场  
经济指标  
贸易数据  
拉丁美洲  
加勒比地区  
东亚

# 新兴经济体 出口多样化和经济增长

*Manuel R. Agosin*

**本**文探讨并检验了以引入新出口产品作为国家主要增长点的增长模式。这些国家处于全球技术前沿，并根据自身经济环境调整现有商品结构以实现经济增长。该模式试图说明韩国、中国台湾、毛里求斯、芬兰、中国和智利等依赖于进口多样化且情况截然不同的国家/地区增长背后的特征。因此，扩大比较优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本文利用增长经验模型检验出口多样化的假设。影响增长、出口多样化的其他变量（无论是单独考虑，亦或是结合人均出口量增长）与1980~2003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度相关。

Manuel R. Agosin

智利大学经济和商业学院  
经济系教授

⇒ [managosin@econ.uchile.cl](mailto:managosin@econ.uchile.cl)

## 一、引言

本文通过参考东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中不同的经济增长经验，以探讨出口的增高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关联。亦关注出口增长是否与整体经济增长相关的问题。由于出口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因此两者间必定存在统计学意义。然而，本文重点关注是否存在某种出口增长方式可保证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均持续增长。本文假设，相比出口仅局限于少数商品的国家，出口结构多样化的国家能够获得明显较高的出口增长。

第二部分分析了生产和出口多样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第三部分通过建立模型说明基于适应外国商品

而非自主创新的经济体增长的特征。通过分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亚洲的出口和经济增长经验后（第四部分），我们证明受出口集中和生产波动性的影响，出口集中度与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第五部分）。第六部分说明出口多样性指数以及出口增长与该指数（多样化加权出口增长率）的互相作用，能够作为其基于1980~2003年期间横截面数据的简单经验增长模型的有效解释变量。第七部分运用经验模型中的系数估算出口多样化、投资和法治对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水平。第八部分为结论。

## 二、分析要素

为何出口多样化有利于经济增长？关于该问题存在两类效应。第一类是源自金融文献中所称的组合效应。多样化程度越高，出口收益的波动程度则越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差也越小。该现象属多样化的积极效果之一，因为难以（或无法）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国家在出口和生产出现强烈波动的情况下无法促使消费企稳。

此外，增长率方差和平均值可能会由于其他的原因而遭受消极影响。滞后性是波动对平均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经济收缩导致生产力遭到破坏，劳动力技术水平下降，这两个问题在下一轮繁荣期间难以获得解决。此外，相比出口结构多样化的国家，出口高度依赖一种或少数几种产品的国家其实际汇率往往更容易出现波动，而实际汇率出现的波动则会抑制对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投资。

第二类是出口多样化所产生的动态效应。增加商品生产类别可维持长期增长。该观点认为增加出口产品类别和产品种类可加快经济增长。在内部几乎没有生产率增长来

源的国家中，投资成为提高生产率的主要途径，原因是新资本品体现生产方法的变化，并发展出要素生产率超过现有水平的新行业。此类行业虽已存在，但对于引入该行业的经济体而言属于新生事物，并代表着技术变革。

人均收入低的国家独有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其仅有少数商品具备比较性的优势。换言之，缺乏技能或补充投入（非贸易）意味着此类国家无法应用世界其他地区积累的生产知识。随着国家发展扩大了生产的商品种类，一国逐渐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生产和出口多样化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出口能力是符合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之一。

此外，出口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可能存在因果关系。新的比较优势或许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换言之，比较优势局限于少数低技术含量商品的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而能够扩大比较优势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会更快。以上为本文的主要假设。

□ 感谢Alfie Ulloa和Alejandro Támara在作者开展研究工作期间给予的帮助。作者分别于2005年9月1日和2日在智利圣地亚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总部举行的“Economic growth with equity”研讨会以及2006年12月18日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全中国经济国际会议上推出本文第一版，最终于2007年正式发表（Agosin）。作者感谢

Robert Devlin和Roberto Bouzas所做的评论。Ricardo Ffrench-Davis通读全稿，并提出了改进意见。此外，作者对智利大学经济系的同事在该系周会上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本文中所述之拉丁美洲包含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一国生产高技术产品需要有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而这类商品的引入也加快了劳动力的培训，因为新企业的员工也会对其他员工进行培训。此外，由于受雇于新行业的员工可能会提出新的生产理念，在新的生产方式被采用后，出现新行业的几率则会增加。

近期的一些文章认为生产企业并不完全了解所在国经济领域具有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生产新产品的过程中会发现比较优势的要素；即引入新的出口产品能够产生附带影响，因为其他生产企业会发现该经济的潜在成本结构。然而，由于技术创新无法在所在国家取得专利，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轻松复制新产品和新技术，因此造成该国的领先企业无法获得所有投资收益（Hausmann和Rodrik，2003）。

另一个类似的观点强调挖掘国外的需求（Vettas，2000）。某种新产品的出口或许暗示国内生产商国际市场对可在（或已在）国内生产的产品有需求的存在。<sup>1</sup>事实上，通过使消费者了解某种新商品及其特征即可创造在海外的需求。与成本发现相似，由于容易复制，需

求发现代表非专利创新。此处会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增长将持续大幅上升。

上述引述的文章进一步指出，推出新出口产品能够获得更好的促进增长效应。出口发现并非无规律可循，而是按某种顺序进行。在生产某种出口产品方面占有优势的国家或许可在相关行业形成比较优势。观察中发现，新的出口产品往往以集群形式出现，或在一段时间内集中于某个类别，例如中国出口的电视机、数字多功能光盘（DVD）和手机，智利出口的各种水果以及东亚和中美洲出口的各种服饰。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产品集群往往会利用相同或相似的公共产品（特定公共机构）和不可贸易要素（道路、物流服务）。因此，出口发现对于相同或密切相关行业的出现有帮助。如此以来，出口发现不仅能够促进行业内的增长，对相关行业发展也具有溢出效应（Hausmann和Klinger，2007；Hausmann和Rodrik，2006）。

以上的假设表明出口多样化应与经济增长相关，即两者间存在因果关系。

### 三、将生产和出口多样化与增长相联系的模型

本模型的建立旨在分析上述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是试图充实经典的“后发优势”（Gerschenkron，1962）推动发展的观点。换言之，技术落后的经济体只要复制其他国家的技术即可快速实现增长，无须开拓前沿技术<sup>2</sup>。一些国家得益于相关政策或有利的制度安排就可获得居于技术前沿的优势；而其他国家则无法实现。但是引入其他国家的创新性商品则较为容易。事实上，这也正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无法获得市场的原因还有无法受益于发现效应，如果具备以上特征的经济体要想实现增长的话。

唯有引入更新和更成熟的产品，才能带来总产量效应和技术变革。总产值是一国生产之所有产品的产值总和。首先，以利用土地和劳动力生产某种传统产品（例如蔗糖）的国家为例。蔗糖是经济体的衡量商品（其价格唯一）。引入新产品是概念的产生，按照Hausmann和Rodrik（2003）的表述即所谓的“自我发现”；为了实现赢利，任何新概念均要求该行业公共产品的存在（简称“基础设施”）。因此，信息外部性（因为引入新概念的经营者的无法获得所有益处）和协调问题（因为缺乏必需的基础设施，新概念就无法获利）将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实现。

Romer（1993）认为总产值是所有产品的价值总和。假设要素禀赋由土地（T）、非熟练劳动力（L）及初始人力资本（HO）构成。生产蔗糖需要土地和劳动力，不需要人力资本；生产所有现代产品则需要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不需要土地。按照Lewis（1954）的观

1 以智利葡萄酒为例。智利自17世纪起即开始生产葡萄酒，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口，主要是因为少数经营者发现改变某些生产工艺后，智利葡萄酒能够在欧洲高价出售（Agosin和Bravo-Ortega，2007）。

2 这也是计算发展中经济体的总要素生产率基本毫无意义的原因。

点, 非熟练劳动力的供应是无限的, 因此无须担心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而且其工资可维持在基本生存水平点上 ( $\bar{w}$ )。

$$Y = F(T, L_T) + \sum_j \sum_i p_{ij} G_{ij}(L_{ij}, H_{ij}; A_{ij}, B_j) \quad (1)$$

$$\begin{aligned} B_j &= 0, A_{ij} = 0 \\ \text{此处 } B_j &= 1, A_{ij} = 0, 1 \\ j &= 1, \dots, n \\ i &= 1, \dots, m \end{aligned}$$

一个经济体必须拥有配套基础设施 ( $B_j$ ) 方可生产产品  $G_{ij}$ , 这是必要非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经营者必须运用的概念 ( $A_{ij} = 1$ )。若行业基础设施没有就位, 则无法开展生产 ( $A_{ij} = 0$ )。在该模型中, 对基础设施作投资是由公共部门决定。实现增长的方式可通过引入新产品, 或投资现有非传统产品。此处假设蔗糖产量未出现上升。<sup>3</sup>

该模型总结了与韩国 (Amsden, 1989)、中国台湾 (Wade, 1990)、毛里求斯 (Wellisz和Lam Shin Saw, 1993)、芬兰 (Jantti, Saari和Vartiainen, 2005) 以及智利 (Agosin, 1999; Agosin和Bravo-Ortega, 2007) 等情况截然不同的国家/地区积累的经验。

人力资本 (初始禀赋除外) 指在职培训。没有仅适用于某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本。换言之, 受过培训的员工无须支付再培训成本即可转入经济体中的其他现代行业。已培训完成的员工可培训其他员工。因此, 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时期中的人力资本增幅与其初始禀赋和现代行业雇佣的人力资本之和成正比。该经济体亦还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输入人力资本<sup>4</sup>。在正常情况下, 某些产品 ( $G_{ij}$ ) 可带来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人力资本 ( $H_{ij}$ )。

$$\dot{H} = \mu \left( H_0 + \sum_j \sum_i H_{ij} \right) \quad (2)$$

新概念是该经济体实现增长的关键。由于许多新概

念与现有概念不同, 因此, 新概念 (以及新的生产行业) 是经济体利用概念的数量与 ( $A_{mm}$ ) 人力资本存量间的函数。

$$\dot{A} = J \left( A_{mm}; H_0 + \sum_j \sum_i H_{ij} \right) \quad (3)$$

公共部门的建设有助于落实新概念行业的基础设施。我们在此假设: ①公共部门平衡其预算, ②所有收入源自现代行业和蔗糖生产的应纳税利润, ③政府的支出用于投资新建基础设施项目或消费 ( $C_G$ ) 并且④各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本相同 (等于 $\lambda$ )。根据公共部门的预算平衡状况, 可获得已开展的新建基础设施项目的数量:

$$\dot{B} = (\tau / \lambda) \left( \pi_s + \sum_j \sum_i \pi_{ij} \right) - C_G / \lambda \quad (4)$$

如该模型所示, 新建基础设施项目可促进增长。然而, 由于新建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须依靠税收, 而且税率会降低现代行业企业利润, 这些新建项目与现有企业对现代行业的投资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因为投资资金源自留存收益)<sup>5</sup>。假设现代行业的所有税后利润全部用于对现有企业的再投资。蔗糖的税后利润全部被消费吸收。

一个经济体应在何时引入某种新产品? 假设一位潜在经营者在阶段0借入  $C_0$  以收集引入新概念的信息。该经营者还认识到  $C_1$  的资本是项目运行的必要因素, 同时只有在获得必要信息确认项目能够实现赢利的时候才会在阶段1投入该部分资本。该项目在阶段2产生利润  $\pi_{ij}$ , 但所有潜在经营者均获知阶段1确保项目赢利所需的信息。<sup>6</sup>

假设在风险中性的情况下, 若预计阶段2的税后利润超过阶段0的搜寻成本和阶段1的资本投资成本, 该经营者将会决定收集与该项目相关的信息:

5 如下所示, 此处已简化假设条件: 该国无资本, 新生产需预付成本 (例如雇用熟练员工和非熟练员工), 该成本将在未来获得偿付。对初始者而言, 还须在收集信息方面进行额外投资。

6 该结构与Hausmann和Rodrik (2003) 使用的结构有所不同。后者的模型要求存在垄断时期, 以使创新者获得收益。此处仅要求该项目的预期利润至少可完全抵消搜寻及启动生产所需的成本。

3 另一种假设是蔗糖产量以全球需求量的增速增长, 即需求收入弹性 (通常远低于单位弹性) 与全球产量增幅的乘积。

4 这是Romer (1993) 在其最初建立的模型中设定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之一。

$$(1 - \tau)E(\pi_{ij}) \geq C_0(1+r+\varphi)^2 + C_1(1+r+\varphi) \quad (5)$$

此处， $r$ 表示国际利率， $\varphi$ 表示国家风险溢价。两者也还分别表示银行存款利率和存贷利差。

若预期利润呈正态分布且下降幅度较大，平均实现利润将等于预期利润。若所有经营者的信息来源相同，一些经营者可获得令人满意(5)的利润，另一些则不行。

后来的效仿者由于可观察哪些项目能够赢利，因此其处境更加有利。对此类投资者而言，在 $A_{ij}$ 该行业的投资可实现赢利的条件是：

$$(1 - \tau)\bar{\pi}_{ij} \geq C_1(1+r+\varphi) \quad (6)$$

这表明坐等其他投资者实现自我发现是值得的，也就是说发现的过程中存在次优的投资机会。

发现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Hausmann和Rodrik(2003)提出的成本发现，即与行业投入产出系数相关。简单来说，我们假设此类系数是固定的。通过分析成本发现问题，可知经营者必须预估这些系数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达到预期成效。删除下标

$$C = C_0(1+r+\varphi)^2 + C_1(1+r+\varphi)$$

后公式简化为：

$$(1 - \tau)E(\pi) = (1 - \tau)[p - \bar{w}E(l) - sE(h)]G \geq C \quad (7)$$

通过将(9)转换成等式可确定 $l, h$ (产生高于投资 $C$ 的正利润)的最高水平。若 $l$ 和 $h$ 之和在图1的三角形之内，则可以进行投资，此处 $\bar{C} = p - C / [G(1 - \tau)]$ 。<sup>7</sup>

若该经营者的投入产出系数不在三角形之内，则其投资不会产生赢利。此外，由于规模较小，单个经营者不会考虑其投资对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所产生之影响。然而，成本发现的影响之一是因效仿者的投资提升了工资水平，降低了创始者的最终资本回报率。熟练劳动力工资的上升将使投入产出线出现向内移动的趋势(仅体现在 $h$ 轴，如图1中虚线所示)。

同理，在特定情况下，若一国生产者的整体需求曲

线趋于下行，产品价格则会下降<sup>8</sup>。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投入产出线将向原点内移。若税率上升，投入产出线也将内移，进而降低发现投资的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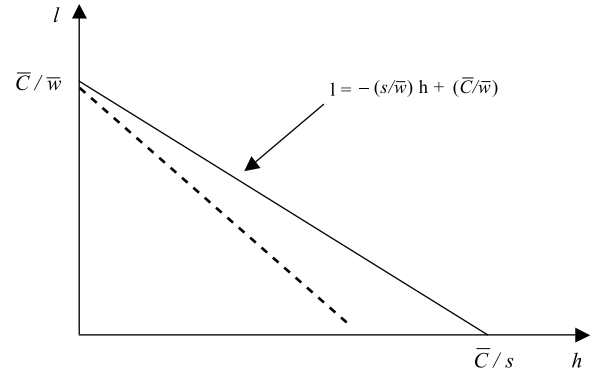


图1 投入产出线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上文提到过还存在另一种发现：需求发现。经营者或许了解某种产品的成本结构，但不确定是否可在国外销售该产品。一旦在国外建立了销售该产品的市场，其他生产者即可直接进入该市场而无须承担市场的开拓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投资决策的公式如下：

$$(1 - \tau)E(\pi) = (1 - \tau)[E(p) - \bar{w}l - sh]G \geq C \quad (8)$$

此处存在可确保企业赢利的最低价格，也就是公式(8)中等式成立的情况。效仿者进入新产品市场后，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会被抬高，产品价格则会下降。这会减少创始者和效仿者的利润，同时也会降低经营者开拓市场的积极性。

因此，我们发现由于要素回报提高或产品价格下降，后来者的行为导致创始者的利润下滑。然而，无法获得市场的根源是相同的：如果能够获得成功，创始者承担着后来者可轻松获利的风险。因此坐等其他投资者的发现成果是值得的，而且自我发现不是最佳选择。

该模型的特征值得关注。在仅生产蔗糖的情况下，开拓新行业的潜力受政府蔗糖税收(不会进行再投资)的限制。因此，或许应压缩传统行业的利润，从而(在

7 为找到明智的解决方案， $\bar{C} / \bar{w} \bar{C} / s$  必须为正。

8 这不仅仅是一种假设情况。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间出口猕猴桃导致几年后猕猴桃的国际价格骤降，其国内生产者的经济状况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恢复正常。

本模型中)降低消费,以增加对其他(新兴)行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新产品的引入潜力受税基狭窄因素的限制。由于税基随着新行业的涌现而拓宽,政府能够获得资金进而投资新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借此加快增长速度。然而,新建基础设施以及开拓新行业与私有行业对现有的现代行业的投资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通过引入的新概念以及现有熟练员工培训非熟练员工促使人力资本的形成。对人力资本投入较高时(即提高模型中的 $\mu$ 值)可减轻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方面存在的压力(归因于投资现代行业和新产品的发现)。此外,人力资本形成的速度越快,新产品发现的速度也就越快。

在以上模型中,政府扮演三重角色:投资尚未建立之行业的基础设施,以此促成新产品引入的可能;根据相关信息市场失灵的情况补贴发现成本;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及技能形成的速度(假设通过提高 $\mu$ 值)<sup>9</sup>。如前所述,政府应在公共投资需求与税收对现代行业投资(主要来自留存收益)的拖累之间达成平衡。<sup>10</sup>

该模型可解释引述文献中讨论的若干增长限制的

因素,亦可用于说明Hausmann、Rodrik以及Velasco(2005)所使用的决策树方法。例如,融资成本高会制约增长。这体现在利差( $\phi$ )上,利差会提高自我发现活动所需的预期利润的门槛<sup>11</sup>。一国经济可能会因为发现回报率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独占而不能实现充分的增长。如果税率过高,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因为过高的税率会降低新产品的投资收益率<sup>12</sup>。税收不仅用于投资基础设施,还包括消费。新技能的形成速度或许太低,却难以阻止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升至抑制投资的水平。等式(2)中较低的 $\mu$ 值即反映了该情况。

上述分析可解释为何某些经济体的发展速度高于其他国家:这些经济体会通过多种途径为引入新产品的活动提供补贴;或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的政策,或者为赢家提供贷款,将借贷成本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上(参见Amsden, 1989, 基于韩国经验);或将政府收入用于投资而非消费;或维持合理的税率;以及对人力资本的形成进行投资。多数成功的亚洲国家均实施了以上部分或全部举措,而拉美国家则做得不够,未能确保较充分的自我发现速度。

## 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亚洲的贸易与经济增长 (1980~2003年<sup>13</sup>)

本章通过分析东亚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近期的经验论证了出口多样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假设的合理性。如表1所示,在1981~2003年间,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速度远高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即使不考虑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失落的十年”),1990年之后的情况仍是如此,当时亚洲地区生产和出口增长率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近两倍。图2显示出现以上差距并非偶然,因

为国内的平均值也存在同样情况:亚洲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增长率均高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即使在1991~2003年间,样本中的亚洲十个国家中仍有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最高增长率(智利)。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增长率

9 后两个因素的成本未列入模型。

10 假设对现有现代行业的投资源于留存收益,而建立新行业所需的资金则来自贷款。

11 若新项目无法获得信贷,则 $\phi$ 实际上是无穷大。

12 值得注意的是,对蔗糖利润所征的税收由于被消费而可忽略不计,不过,若税收很高,则会影响传统产品和新产品的利润。对后者所征税收会通过降低收益的独占性而抑制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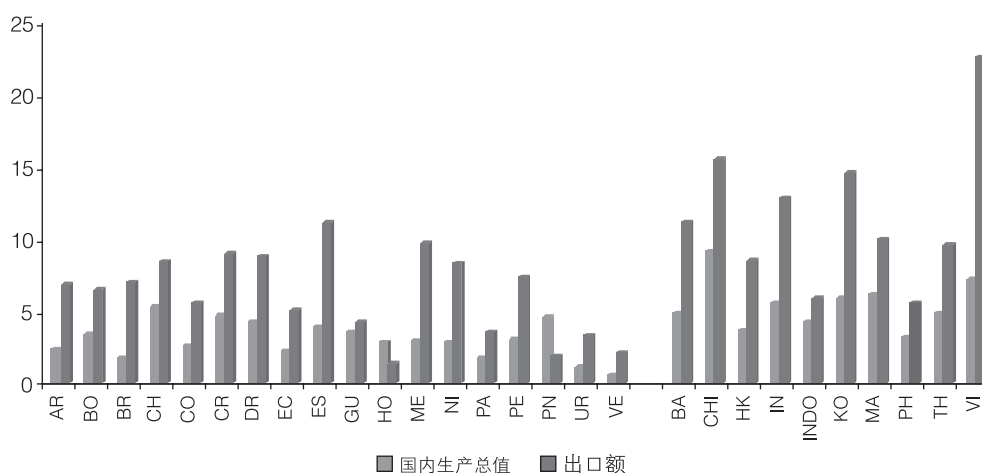
13 在2004~2007年间,初级商品的价格史无前例地大幅上涨,导致拉丁美洲赫芬达尔—赫希曼系数远高于该地区的“正常”水平。

**表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亚洲（部分国家/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增长情况，1981~2003年**  
(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变化百分比以及商品和服务实际出口额)

|               | 1971~1980 | 1981~1989 | 1990~1997 | 1998~2003 | 2004~2008 | 1990~2008 | 2009 |
|---------------|-----------|-----------|-----------|-----------|-----------|-----------|------|
| 阿根廷           | 2.8       | -1.0      | 5.0       | -1.3      | 8.4       | 4.0       | 0.9  |
| 巴西            | 8.6       | 2.3       | 2.0       | 1.5       | 4.7       | 2.6       | -0.2 |
| 智利            | 2.5       | 2.8       | 7.0       | 2.7       | 4.9       | 5.4       | -1.5 |
| 哥伦比亚          | 5.4       | 3.7       | 3.9       | 1.1       | 5.5       | 3.6       | 0.8  |
| 墨西哥           | 6.5       | 1.4       | 3.1       | 2.9       | 3.5       | 3.1       | -6.5 |
| 秘鲁            | 3.9       | -0.7      | 3.9       | 2.0       | 7.6       | 4.4       | 0.9  |
| 乌拉圭           | 2.7       | 0.4       | 3.9       | -2.1      | 8.3       | 3.2       | 2.9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1.8       | -0.3      | 3.8       | -2.7      | 10.3      | 3.5       | -3.3 |
| 拉丁美洲（19）      |           |           |           |           |           |           |      |
| 总GDP          | 5.6       | 1.3       | 3.3       | 1.4       | 5.4       | 3.2       | -1.9 |
| GDP/工人        | 1.7       | -1.5      | 0.6       | -1.1      | 3.0       | 0.6       | -3.8 |
| 人均GDP         |           |           |           |           |           |           |      |
| 拉丁美洲（19）      | 3.0       | -0.8      | 1.5       | -0.2      | 4.0       | 1.7       | -2.9 |
| 亚洲（6）         | 4.9       | 5.0       | 5.6       | 2.0       | 3.5       | 3.9       | -1.0 |
| 美国            | 2.2       | 2.4       | 1.6       | 2.1       | 1.4       | 1.7       | -3.3 |
| 全球            | 1.9       | 1.4       | 1.2       | 1.3       | 2.2       | 1.5       | -3.2 |

注：出口额指商品和服务的实际出口额（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减去相应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国家和地区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乌拉圭；亚洲：孟加拉、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泰国和越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依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图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亚洲（部分国家/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增长情况（1991~2003年）**  
(年均增长率)

注：国家/地区名称英文缩写如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阿根廷（AR）、玻利维亚（BO）、巴西（BR）、智利（CH）、哥伦比亚（CO）、哥斯达黎加（CR）、多米尼加共和国（DR）、厄瓜多尔（EC）、萨尔瓦多（ES）、危地马拉（GU）、洪都拉斯（HO）、墨西哥（ME）、尼加拉瓜（NI）、巴拿马（PA）、秘鲁（PE）、巴拿马（PN）、乌拉圭（UR）和委内瑞拉（VE）；亚洲：孟加拉（BA）、中国（CHI）、香港特别行政区（HK）、印度（IN）、印度尼西亚（INDO）、韩国（KO）、马来西亚（MA）、菲律宾（PH）、泰国（TH）和越南（VI）。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依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表2 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和亚洲制成品出口国家/地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出口集中度（1980~2002年）

|                        | 1980 | 1986 | 1992 | 1998 | 2002 |
|------------------------|------|------|------|------|------|
| 拉丁美洲 <sup>a</sup>      | 0.36 | 0.40 | 0.30 | 0.26 | 0.25 |
| 阿根廷                    | 0.15 | 0.17 | 0.15 | 0.13 | 0.14 |
| 玻利维亚                   | 0.39 | 0.52 | 0.32 | 0.20 | 0.25 |
| 巴西                     | 0.15 | 0.12 | 0.09 | 0.09 | 0.09 |
| 智利                     | 0.41 | 0.37 | 0.31 | 0.28 | 0.27 |
| 哥伦比亚                   | 0.58 | 0.58 | 0.24 | 0.25 | 0.22 |
| 哥斯达黎加                  | 0.32 | 0.39 | 0.30 | 0.19 | 0.21 |
| 厄瓜多尔                   | 0.55 | 0.45 | 0.47 | 0.35 | 0.39 |
| 萨尔瓦多                   | 0.38 | 0.71 | 0.24 | 0.24 | 0.13 |
| 危地马拉                   | 0.31 | 0.47 | 0.22 | 0.24 | 0.19 |
| 洪都拉斯                   | 0.37 | 0.50 | 0.46 | 0.44 | 0.20 |
| 墨西哥                    | 0.48 | 0.27 | 0.15 | 0.11 | 0.13 |
| 尼加拉瓜                   | 0.37 | 0.52 | 0.29 | 0.32 | 0.18 |
| 巴拿马                    | 0.26 | 0.37 | 0.45 | 0.30 | 0.31 |
| 巴拉圭                    | 0.28 | 0.40 | 0.36 | 0.43 | 0.38 |
| 秘鲁                     | 0.26 | 0.25 | 0.27 | 0.22 | 0.25 |
| 乌拉圭                    | 0.24 | 0.20 | 0.18 | 0.17 | 0.19 |
| 委内瑞拉                   | 0.67 | 0.57 | 0.56 | 0.49 | 0.75 |
| 亚洲出口国家/地区 <sup>a</sup> | 0.22 | 0.17 | 0.13 | 0.14 | 0.14 |
| 中国                     | ...  | 0.17 | 0.08 | 0.07 | 0.09 |
| 香港特别行政区                | 0.16 | 0.16 | 0.15 | 0.18 | 0.12 |
| 中国台湾                   | 0.12 | 0.10 | 0.09 | 0.14 | 0.15 |
| 印度                     | 0.11 | 0.16 | 0.14 | 0.14 | 0.13 |
| 印度尼西亚                  | 0.53 | 0.34 | 0.19 | 0.16 | 0.12 |
| 韩国                     | 0.09 | 0.10 | 0.11 | 0.15 | 0.15 |
| 马来西亚                   | 0.30 | 0.23 | 0.16 | 0.20 | 0.22 |
| 泰国                     | 0.20 | 0.14 | 0.09 | 0.11 | ...  |

注：<sup>a</sup> 各国/地区未加权平均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贸易和发展统计数字手册》，日内瓦。

一直高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事实上，在以上两个时期中，两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与出口增幅之比几乎相同。不过，下文分析将表明，除了出口增长速度更快之外，亚洲国家的出口“质量”也更高；即其出口多样化程度显著高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当然，由于两个地区国家之间还存在其他诸多差异，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出口增长更快是亚洲国家比拉美国家更加成功的关键因素。然而，出口增长速度更快、出口多样化程度更高以及上述两种现象背后的因素是具有影响作用的。

事实表明，生产和出口多样化一直是亚洲发展模式的特点之一。此处采用的生产和出口多样化的参考指标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sup>14</sup>，该指数源自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国际贸易和发展统计数字手册》，是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三位数标准计算。虽然该指数未臻完美，但涵盖了垂直和水平多样化两方面的内容。垂直多样化意指从出口初级商品转向出口制成品。水平多样化意指通过丰富同类商品的种类优化出口结构，例如从有籽葡萄到无籽葡萄，从普通咖啡到高级咖啡。

从表2可看出，亚洲国家在1980年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均值远低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到2002年，亚洲各国/地区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均持续下降（中国台湾和韩国除外，这两个地区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于1992年触底反弹）<sup>15</sup>。然而，台湾和韩

15 台湾和韩国的人均收入超过样本中亚洲和拉丁美洲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列为发达经济体。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上升或许验证了Imbs和Wacziarg（2003）发现的产业集中度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U形关系。

14 根据以下公式确定j国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HI_j = \sum_i \left(\frac{x_{ij}}{x_j}\right)^2$ ，其中 $x_{ij}$ 代表该国商品i的出口值， $x_j$ 代表该国出口总值。



**表3 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和亚洲制成品出口国家/地区：出口商品种类，1980~2002年**  
（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三位数标准计算）

|                              | 1980       | 1986       | 1992       | 1998       | 2002       |
|------------------------------|------------|------------|------------|------------|------------|
| <i>拉丁美洲<sup>a</sup></i>      | <i>141</i> | <i>112</i> | <i>142</i> | <i>163</i> | <i>169</i> |
| 阿根廷                          | 198        | 201        | 211        | 221        | 220        |
| 玻利维亚                         | 47         | 42         | 82         | 119        | 130        |
| 巴西                           | 225        | 213        | 219        | 222        | 225        |
| 智利                           | 181        | 147        | 195        | 209        | 201        |
| 哥伦比亚                         | 162        | 149        | 189        | 197        | 201        |
| 哥斯达黎加                        | 144        | 113        | 142        | 179        | 175        |
| 厄瓜多尔                         | 80         | 53         | 116        | 148        | 151        |
| 萨尔瓦多                         | 116        | 86         | 113        | 149        | 164        |
| 危地马拉                         | 168        | 121        | 137        | 167        | 168        |
| 洪都拉斯                         | 99         | 56         | 90         | 120        | 131        |
| 墨西哥                          | 201        | 208        | 221        | 229        | 229        |
| 尼加拉瓜                         | 97         | 41         | 63         | 86         | 137        |
| 巴拿马                          | 136        | 64         | 75         | 88         | 120        |
| 巴拉圭                          | 63         | 24         | 61         | 90         | 94         |
| 秘鲁                           | 176        | 135        | 162        | 187        | 190        |
| 乌拉圭                          | 156        | 130        | 149        | 166        | 150        |
| 委内瑞拉                         | 153        | 128        | 193        | 196        | 194        |
| <i>亚洲出口国家/地区<sup>a</sup></i> | <i>189</i> | <i>182</i> | <i>212</i> | <i>217</i> | <i>225</i> |
| 中国                           | ...        | 90         | 233        | 232        | 233        |
| 香港特别行政区                      | 164        | 165        | 175        | 179        | 227        |
| 中国台湾                         | 210        | 214        | 219        | 221        | 219        |
| 印度                           | 211        | 205        | 214        | 222        | 227        |
| 印度尼西亚                        | 144        | 154        | 208        | 216        | 227        |
| 韩国                           | 207        | 212        | 215        | 220        | 217        |
| 马来西亚                         | 214        | 217        | 222        | 227        | 224        |
| 泰国                           | 176        | 197        | 211        | 222        | ...        |

注：<sup>a</sup> 各国/地区未加权平均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贸易和发展统计数字手册》，日内瓦。

国在2002年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低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的多数国家。印度尼西亚在1980年时出口以石油为主，在1980~2002年间，其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急剧下降，从0.53跌至0.12。中国的情况与之相似，虽然其1986年的指数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后来大幅下滑至不到0.10，与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亚洲多数出口国家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与发达国家非常接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正在丰富其出口商品的种类。尤其是墨西哥、哥伦比亚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下降幅度较大，智利的降幅略小。在1980~2002年间，阿根廷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一直较低，但其出口商品种类比亚洲国家的出口更为集中。

出口商品种类的情况也是这样（依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三位数标准计算也获得同样结果，参见表3）。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三位数的最大值为239，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正在迅速地接近该数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商品出口量也呈现上升的趋势，不过上升的幅度较小，因此平均值仍为最大值的一半左右。<sup>16</sup>

16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多数拉美国家的产品出口量出现下滑（或许是因债务危机而造成的另一个结果）。

## 五、组合效应论证

生产和出口多样化对增长产生的组合效应意味着出口多样化与增长相关。若产生组合效应，则存在图3总结的因果关系。由于可降低出口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方差，出口多样化与增长正相关。如前所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波动性的减少可促进经济的正面增长。

以上的假设与1980~2003年期间的相关数据没有矛盾。图3表明出口多样化与出口增长方差之间负相关，出口增长方差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差之间正相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方差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负相关。<sup>17</sup>

相关数据（参见图3）证实了以上观点。所有相关系数均符合预期，且与0有显著差异，处于1%的水平。出口多样化公式为 $DIV = 1 - HHI$ 。 $DIV$ 的升幅与出口增长的方差下降高度相关。与此同时，出口增长方差的下降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差的下降高度相关。最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差的下降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密切相关。

尽管无法完全证实组合效应存在与否，以上的简单相关性仍表明与该效应或许足够产生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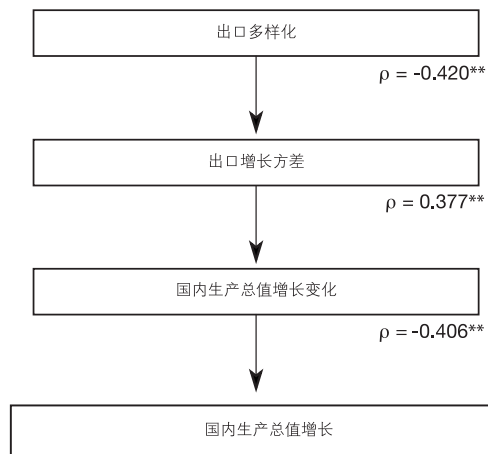


图3 出口多样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组合效用（1980~2003年）<sup>a</sup>

注：<sup>a</sup>  $\rho$ 值代表相邻两个方框内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所有数值在1%的水平具有意义。使用196个国家在1980~2003年期间的数据。出口增长是按2000年美元汇率计算的商品和服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依2000年美元汇率计算。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依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贸易和发展统计数字手册》，日内瓦。

17 国内生产总值高波动性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产生影响的部分原因是该波动性对投资产生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高波动性可导致投资速度放缓，进而造成经济增长的速度减慢。

## 六、关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出口多样化是否还有其他影响

本章研究出口多样化是否对增长经验模型具有解释力，并检验了代表产品多样化和出口多样化的两个变量。一个是 *DIV*，另一个是多样化加权人均出口增长；也就是 *DIV* 与人均出口增长的互相作用 ( $RX \cdot DIV$ )。我们在下文将会分析，虽然 *DIV* 是正确的指标且数据有较大的意义，但互相作用的变量具有最强的解释力。纳入该变量的原因是当一国的出口迅速增长时，多样化的作用就更大。以哥伦比亚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差异为例：两

国2002年的 *DIV* 均为0.78 (*HHI*为0.22)，但马来西亚在1980~2003年的出口平均增长率为10.7%，哥伦比亚仅为5.7%。马来西亚的多样化加权人均出口年均增长5.9%，哥伦比亚仅为2.5%。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6.4%，哥伦比亚则为3.1%。

在估算时，我们将 *DIV* 和  $RX \cdot DIV$  加入关于人均增长的标准经验模型。考虑的变量包括初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初始开放程度（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

表4 关于增长的经验模型

(因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80~2003年)

| 变量             | (1)               |                    | (2)               |                   | (3)                 |                     | (4)                 |                     |
|----------------|-------------------|--------------------|-------------------|-------------------|---------------------|---------------------|---------------------|---------------------|
|                | OLS               | IV                 | OLS               | IV                | OLS                 | IV                  | OLS                 | IV                  |
| log YPC80      | -0.102<br>(-0.87) | -0.366<br>(-2.57)* | -0.014<br>(-0.16) | -0.080<br>(-0.72) | -0.800<br>(-6.99)** | -0.717<br>(-5.41)** | -0.683<br>(-5.94)** | -0.581<br>(-3.92)** |
| TRADE80        | 0.006<br>(1.51)   | 0.014              | 0.005<br>(1.62)   | 0.006<br>(1.68)+  | -0.001<br>(-0.44)   | 0.000<br>(0.01)     | -0.000<br>(-0.01)   | 0.003<br>(0.83)     |
| I/Y            |                   |                    |                   |                   | 0.192<br>(9.12)**   | 0.249<br>(4.88)**   | 0.159<br>(6.49)**   | 0.119<br>(3.09)**   |
| RL             |                   |                    |                   |                   | 1.345<br>(7.30)**   | 0.949<br>(3.48)**   | 1.198<br>(6.41)**   | 0.911<br>(3.53)**   |
| DIV            | 4.646<br>(5.12)** | 12.147<br>(4.71)** |                   |                   | 2.309<br>(3.59)**   | 5.05<br>(2.92)**    |                     |                     |
| $RX \cdot DIV$ |                   |                    | 0.326<br>(9.37)** | 0.465<br>(9.26)** |                     |                     | 0.176<br>(5.43)**   | 0.312<br>(5.65)**   |
| Adj. R2        | 0.165             | -                  | 0.427             | 0.365             | 0.655               | 0.608               | 0.677               | 0.640               |
| 观察次数           | 124               | 118                | 118               | 117               | 113                 | 112                 | 109                 | 108                 |

注：核心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数据以2000年美元汇率常数计。出口指商品和服务。法治指数来自Kaufman、Kraay和Mastruzzi (2005) 编写的资料，为1996年数值。未显示常数；括号内为t比率；IV估算值含有稳健标准误。

\* 与0有显著差异，处于10%的水平。

\*\* 与0有显著差异，处于5%的水平。

\*\*\* 与0有显著差异，处于1%的水平。

变量定义：

YPC80 =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TRADE80 = 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进出口总额数值

I/Y =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该时期平均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RL = 法治指数（1996）

DIV = 出口多样化指数（1 - HHI），该时期平均值（数据截至2002年年底）

$RX \cdot DIV$  = 多样化加权人均出口增长率

用于计算DIV、 $RX \cdot DIV$ 以及I/Y的工具变量：工业品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人口规模和法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数据取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国际贸易和发展统计数字手册》，日内瓦。

的百分比)、该时期中固定资本形成的平均值以及Kaufmann、Kraay和Mastruzzi建立的数据库(2003)中的法治指数<sup>18</sup>。该模型的估算是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工具变量(IV)。后者用于纠正增长率、出口多样化以及投资率内生性导致的联立性偏误。计算投资率以及 $DIV$ 和 $RX * DIV$ 的工具变量包括工业品占出口之比例、人口规模以及法治指数。

表4为计算结果。等式(1)和等式(2)仅使用了初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初始开放程度。 $DIV$ 和 $RX * DIV$ 在各自用于回归计算时显示为正确指标且数值具有意义。加入 $DIV$ 和 $RX * DIV$ (未显示)后, $DIV$ 接近零,而与 $RX * DIV$ 相关的系数则几乎未变且仍有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贸易在初始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无法解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初始人均收入也无法做出强有力的说明,原因是根据模型计算的该变量相关系数的显著性与在估算方法下计算的显著性相差较大。下文将会显示出,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后会推翻以上结果。

接下来将 $DIV$ 和 $RX * DIV$ 引入更加完整的包括固定投资总额和法治指数在内的模型,即等式(3)和(4)。从统计学角度看,该模型效果明显。初始人均与国内生

产总值有意义,开放程度变量仍未能解释国家间增长的差异,投资和法治均是正确的指标且具意义。这一结果确认相关文献关于增长与投资正相关的研究结果,这一假设符合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及部分最新文献中关于内生增长的相关内容<sup>19</sup>。以上的结果还确认近来强调制度是实现增长的决定要素的观点。

法治(RL)只有在政府有能力执行时才能发挥作用,而社会契约则可决定该能力的大小。若其他因素相同,政府志在为社会谋福利的国家会具有更巩固的法治能力,这一点足以解释为何法治水平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及法治相关系数均具有意义的原因。

用于确定生产和出口多样化的两个变量( $DIV$ 和 $RX * DIV$ )均有意义,但互相作用变量的显著性高于 $DIV$ 。注意:此模型可解释3/5到2/3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这方面存在的国际差异。工具变量估算值提高了与多样化以及多样化加权人均出口增长相关的系数值。在等式(3)中的 $DIV$ 系数上升一倍。等式(4)中的 $RX * DIV$ 增幅不到100%。同时,在以普通最小二乘法转向工具变量估算的过程中,其他变量的系数基本不变。以上分析证实,两种方法下的出口多样化都是亚洲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增长表现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 七、增长差异：生产和出口多样化之解释程度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与生产和出口多样化相关的系数有意义,但未能有效地解释增长差异。通过利用 $DIV$ 、 $RX * DIV$ 、 $I/Y$ 以及RL的地区平均值进行的简单计算后可发现,生产和出口多样化变量可有力地解释亚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工业品出口国家增长的表现差异。

首先分析与主要变量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解释增长表现的差异。如表5所示,亚洲表现较好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而在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则较低。

亚洲几乎所有因素的表现均超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下两个因素的表现尤为突出:亚洲投资额占国内市场的比率高出近9个百分点,多样化加权人均出口增长高出6.7个百分点。后一项出现差异的原因是亚洲的出口多样化程度以及增速明显优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8 还运用了大量不同的控制参数,包括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但对等式没有产生影响。

1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关文献指出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变相的AK模型。然而,由于缺乏历史知识,没有经济学家指出AK模型只是变相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发展国家生产率的提高主因是得益于进口机械,因此,相对发达国家,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要。

借助这些数据，我们简单地计算了以上确定的三个因素（投资、法治和出口多样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亚洲经济增速较快国家间的增长差异。表6列有相关结果。大约80%的增长率差异可由投资率、法治以及出口多样化方面存在的差异解释。通过分析表4中等式（3）中的系数（工具变量估算值）可知投资是造成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

出口多样化对亚洲增长的卓越表现的贡献率并不小，为0.7%。通过利用等式（4）中的系数进行分析后，可知多样化加权人均出口增长是造成增长差异的最重要因素。该因素可解释亚洲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增长率产生近50%差异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出口增长的多样化是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增长的变量。

**表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部分国家）和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以及造成增长差异的若干要素，1980~2003年**  
(除RL和DIV指数以外，均以百分比表示)

| 国家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 I/Y         | RL           | DIV         | RX*DIV     |
|------------------|------------|-------------|--------------|-------------|------------|
| <i>拉丁美洲</i>      | <i>0.4</i> | <i>20.2</i> | <i>-0.27</i> | <i>0.71</i> | <i>1.9</i> |
| 阿根廷              | 0.3        | 18.1        | 0.28         | 0.86        | 3.4        |
| 玻利维亚             | -0.2       | 16.0        | -0.66        | 0.73        | 1.3        |
| 巴西               | 0.8        | 20.8        | -0.26        | 0.90        | 5.2        |
| 智利               | 3.5        | 21.7        | 1.26         | 0.69        | 4.3        |
| 哥伦比亚             | 1.1        | 19.0        | -1.04        | 0.70        | 2.5        |
| 哥斯达黎加            | 1.2        | 22.2        | 0.64         | 0.71        | 3.2        |
| 厄瓜多尔             | 0.3        | 21.1        | -0.39        | 0.58        | 2.0        |
| 萨尔瓦多             | 0.0        | 15.3        | -0.48        | 0.69        | 1.5        |
| 危地马拉             | 0.0        | 15.0        | -0.64        | 0.75        | -0.5       |
| 洪都拉斯             | -0.1       | 25.1        | -0.85        | 0.62        | -1.2       |
| 墨西哥              | 1.0        | 22.4        | -0.12        | 0.82        | 6.5        |
| 尼加拉瓜             | -1.3       | 23.9        | -0.68        | 0.71        | 0.1        |
| 巴拿马              | 1.4        | 21.0        | -0.68        | 0.66        | -0.1       |
| 巴拉圭              | 0.1        | 24.0        | -0.50        | 0.62        | 1.5        |
| 秘鲁               | 0.1        | 22.6        | -0.35        | 0.75        | 1.7        |
| 乌拉圭              | 0.1        | 14.7        | 0.53         | 0.81        | 3.0        |
| 委内瑞拉             | -1.1       | 21.2        | -0.66        | 0.41        | -0.1       |
| <i>亚洲出口国家/地区</i> | <i>4.8</i> | <i>29.0</i> | <i>0.32</i>  | <i>0.85</i> | <i>8.6</i> |
| 中国               | 8.2        | 36.0        | -0.45        | 0.92        | 18.1       |
| 香港特别行政区          | 4.0        | 28.3        | 1.71         | 0.84        | 8.2        |
| 印度               | 3.8        | 22.6        | -0.01        | 0.86        | 6.6        |
| 印度尼西亚            | 3.7        | 26.8        | -0.36        | 0.80        | 2.3        |
| 韩国               | 5.6        | 32.4        | 0.81         | 0.87        | 10.0       |
| 马来西亚             | 3.6        | 30.7        | 0.85         | 0.80        | 5.9        |
| 泰国               | 4.7        | 31.4        | 0.49         | 0.89        | 3.0        |
| 越南               | 4.7        | 23.6        | -0.50        | 0.78        | 15.0       |

注：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数据以2000年美元汇率常量计。出口指商品和服务。法治指数来自Kaufman、Kraay和Mastruzzi（2005）编写的资料，为1996年数值。

变量定义：

|        |  |
|--------|--|
| I/Y    | =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该时期平均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           |
| RL     | = 法治指数（1996）                           |
| DIV    | = 出口多样化指数（1 - HHI），该时期平均值（数据截至2002年年底） |
| RX*DIV | = 多样化加权人均出口增长率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在线数据库] <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贸易和发展统计数字手册》，日内瓦。

**表6 拉丁美洲和亚洲工业品出口国家：解释增长率差异<sup>a</sup>**  
(百分比)

|             | 计算结果 I | 计算结果 II |
|-------------|--------|---------|
| 增长差异        | 4.4    | 4.4     |
| 贡献率：        |        |         |
| 投资          | 2.2    | 1.0     |
| 法治          | 0.6    | 0.5     |
| 出口多样化       | 0.7    |         |
| 多样化加权人均出口增长 |        | 2.1     |
| 以上因素总和      | 3.5    | 3.6     |

注：<sup>a</sup> I列数值和II列数值分别基于等式(3, IV)以及等式(4, IV)中的系数。

资料来源：表4中的结果和表5中的数据。

## 八、结论

本文建立的理论模型旨在说明部分经济体增长的特征：此类经济体自身并无创新实践，而是通过拓宽生产和出口结构进入技术前沿。该模型显示，出口多样化是扩大比较优势的表现以及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

本文的经验分析表明出口多样化与加快经济增长相关。我们认为多样化的出口增长通过两个渠道刺激生产增长。第一个称之为组合效应。出口多样化有助于降低出口从而降低生产的波动性。相对比受经济周期影响不明显的国家，经济非常不稳定的国家的增速更慢。相关数据与以上推理过程并行不悖。

另一个渠道是与为扩大比较优势而实施的成功举措相关的动态益处，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学习和信息外部性。我们的结果是对Hausmann和Klinger(2007)最近研究结果的补充，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模式可有效的预测未来的增长情况。一国在产品出口方面效仿高收入国家即可迅速提高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低收入国家通常仅有少数甚至只有一种商品具有比较优势。这些国家可通过扩大比较优势来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实施生产和出口多样化策略是产生水平或垂直溢出效应的唯一途径。任何一种新出口产品的信息都有利于其他计划进入相关行业的潜在企业。新行业的出现有助于建立其

他利用相同不可贸易因素或公共产品的部门。

经验分析结果与本模型相符。在跨国家计量经济增长模型中，生产和出口多样化的指标(出口多样化程度以及人均出口增长与出口多样化之间的互相作用)有意义，并且可有效地解释各国增长率差异。

该经验模型显示，除了出口多样化，变量也可用于解释各国经济增长的差异。投资即是其中的一个。本文中曾提到活力十足的亚洲国家的投资率显著高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投资实力与出口增长以及多样化息息相关：一国经济多样化的程度越高，其可获利的投资机会就越多。此外，强大的自我发现能力也能促进投资的扩大。最后，出口多样化的程度越高，部分出口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就会越紧密。<sup>20</sup>在本文的经验模型中，将多样化加权出口增长引入作为解释变量后，投资规模的重要性就急剧下降。这很大程度上表明出口的迅速增长和多样化均可有效激励投资。

20 然而，投资和出口多样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不紧密，将两者共同纳入计量经济学模型中不会导致其中一个因素失去显著性。事实上，多样化变量系数与引入投资密切相关。



## 参考文献

- Agosin, M.R. (2007), "Trade and growth: why Asia grows faster than Latin America", *Growth with Equity in Latin America*, R. Ffrench-Davis and J.L. Machinea (eds.), Basingstoke, Palgrave-Macmillan.
- \_\_\_\_\_ (1999), "Trade and growth in Chile", *cepal Review*, No. 68 (LC/G.2039-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Agosin, M.R. and C. Bravo-Ortega (2007), *The Emergence of New Successful Export Activities in Chile*,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Amsden, A.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rschenkron, A.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usmann, R. and D. Rodrik (2006), *Doomed to Choose: Industrial Policy as Predica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 \_\_\_\_\_ (2003),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self-discove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72, No. 2, Amsterdam, Elsevier.
- Hausmann, R., D. Rodrik and A. Velasco (2005), *Growth Diagnos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unpublished.
- Hausmann, R. and B. Klinger (2007),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duct sp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cid Working Paper*, No. 146,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 Imbs, J. and R. Wacziarg (2003),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3, No. 1,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Jäntti, M., J. Saari and J. Vartiainen (2005), "Country case study: Finland. Combining growth with equity", document presented at the WIDER Jubilee Conference (Helsinki, 16-17 June 2005) [online] <http://www.wider.unu.edu/conference/conference-2005-3/conference-2005-3.htm>.
- Kaufmann, D., A. Kraay and M. Mastruzzi (2005), "Governance matters IV: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4", *World Bank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363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May.
- Lewis, W.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The Manchester School, May.
- Romer, P. (1993), "Two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ideas and producing idea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Vettas, N. (2000), "Investment dynamics in markets with endogenous demand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vol. 48, No. 2,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ellisz, S. and P. Lam Shin Saw (1993), "Mauritiu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Five Small Open Economies*, R. Findlay and S. Wellisz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关键词

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  
资本流动  
商业周期  
经济发展  
生产力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汇率  
资本市场  
拉丁美洲

# 发展之宏观经济学： 从“金融家主义” 到“生产主义”

*Ricardo Ffrench-Davis*

## 有

观点认为拉美地区已找到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本文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本文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失误部分程度上导致了该地区近十年来不尽如人意的经济和社会表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生产者一直疲于应付极不稳定的需求、汇率和融资渠道，这些因素使生产力和投资的积极性受到挫伤。金融资本的流动是这种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决定因素。本文审视其内在顺周期表现，并得出结论：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环境必须对资金流动进行反周期性监管。它描述了如何协调总需求与潜在GDP的发展，如何协调汇率与经常账户以及如何协调资金流动与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刻革新，从而远离“金融家主义”，向着“生产主义”迈进。

Ricardo Ffrench-Davis

智利大学

商业经济系教授

⇒ rffrench@fen.uchile.cl

## 一、引言

在“华盛顿共识”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各国均实施了深度经济改革，包括影响深远的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和新的财政纪律，认为这将足以保障稳定性、经济增长以及促进民生。而实际上，在过去20年中，虽然物价实现稳定（通胀基本处于可控状态），但平均GDP增长率处于低水平，实体经济（即产出和就业）高度不稳定。

常常有人提出，该地区已经能够有效地应对宏观经济挑战，不足之处在于微观经济。但事实上，生产和就业均受到经济活动、总需求、信贷获取和汇率的大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这些关键的宏观经济变量形成了商品和服务生产者运营的环境。本文将分析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是如何挫伤了资本形成、就业以及实际生产力。金融资本流动在此发挥了核心作用。

尽管拉丁美洲国家具有多样性，但其经济活动、总需求、实际汇率、存款率、投资和资本流动的波动方向大体相似。这种共性在大部分大中型国家中尤为显著，而较不发达国家则差异颇大。

宏观经济环境是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国内资本市场和资本账户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反之，这种环境又影响着经济增长及其利益分配的速度和稳定性，其中的主要影响途径是它对资本形成和就业的作用。与传统上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之间分界非常大不同，扶贫、社会平等程度和经济增长都受到宏观经济环境质量的巨大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虽导致经济严重衰退和萧条，但也带来益处，即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方式的核心重要性及有必要考虑改正现有政策做法提供支持（Blanchard、Dell’Ariccia和Mauro，2010）。这对于实现公平增长的发展策略而言至关重要。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需要摆脱目前普遍流行的“金融家主义”和“短视主义”，转向另一种方式，也就是

明确优先生产力发展和及其对平等所起的作用。这就要求应用综合性方法，不但要结合微观和宏观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因素，还要考虑到本国市场显著的结构差异以及国际金融流动内在的顺周期性本质。其中一方面，我们提到的不稳定性对于大企业和小企业、对投资和消费以及对熟练工和非熟练工所产生的作用迥异。政策的渐进性及其货币、汇率、金融和财政等之间的协调性对经济增长和分配效果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相互作用的关系涵盖了静态和动态的影响。举个例子，静态影响包括对劳动力和资本的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利用率的波动将不断地拉大产能或潜在GDP与实际创造的GDP之间的差距。这些差距，以及实际汇率等变量的波动将产生深远的动态影响，例如投资率及其对发展趋势的影响；出口附加值及其和其他GDP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创新；中小企业的发展；劳动力市场中的用工手续或用工手续的缺失。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方式对于所有以上变量将产生重大影响，并是该地区1990~2008年GDP年增长率仅温和增长3.2%的关键因素。<sup>1</sup>

因此，在捍卫控制通胀和财政规则所取得的成果时，还需要不断创造出一个对各类GDP生产者都更为“友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第二部分概括描述了1990年以来拉丁美洲各国的总体成就和失误。本文分析中所关注的变量对大部分人口的影响效果很相似，尽管各国间的差异明显。文中重点突出了通胀控制、财政规则和出口走势方面取得的成功。之后本文说明在取得成功的同时，经济增长疲弱且资本形成水平极低。第三部分描述了不同生产者不得不对极其不稳定的总需求和汇率，而且这种不稳定性还使金融资本流动以及近期的贸易条件经常受到外部冲击。

第四部分探讨了金融流动的特点并论述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流动本质上属于顺周期性的原因。第五部分探

□ 笔者自一篇文章刊登在CEPAL REVIEW No.60（1996）后，撰写了数篇有关新兴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形态的文章。该议题之后在Ffrench-Davis（2006和2008）进一步被探讨，加上为不同的会议和出版物制定的版本。在此，笔者试图总结其了解的关于本议题的所有内容。笔者感谢Rodrigo Heresi和Felipe Labrin的协助。

1 Ffrench-Davis（2006）研究了这些改革及其效果。参见综合数据库（1997）、世界银行（199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98和2000）、Williamson（2003）、世界银行（2005，在一次有趣的自我批判行动中）、Rodrik（2006）和Ocampo（2008）。

讨了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尤其潜在产出或生产边界同实际GDP之间出现的隐性差距。之后分析了这些差距如何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预期以及就业产生不良影响。这些年来经济活动的不稳定性主要造成国内市场产能利用率不足。这部分的GDP（非出口GDP）对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最大，也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接

下来探讨了该地区频繁发生的经济萧条所造成的动态后果，表现为生产性投资比率下降以及就业形势恶化。

第六部分说明将发展宏观经济学应用于政策时的经验教训，应该从“金融家主义”转向“生产主义”，以更有效地促进公平增长。重点分析财政、货币、汇率、国内金融和资本账户政策。第七部分为结论。

##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深度的经济改革和疲软的经济增长

在“华盛顿共识”的酝酿期间，该地区多个国家都出现严重的通胀问题。因此90年代的改革者高度重视控制通胀和实施财政纪律。作为措施之一，他们设法避免让货币管理受到政府预算赤字的压力。这促使中央银行将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实施独立于宏观经济的其他领域，控制通胀成为它们“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目标（Blanchard、Dell’ Ariccia和Mauro，2010，第3页）。

到90年代中期，通胀得到了控制；从1997年开始，年平均增长率降至个位数。通胀控制自然大大改善了财政平衡和融资状况。由于这两方面的重要进展以及该地区市场取消了公共部门干涉，现行方式认为这会自发刺激经济增长（世界银行，1997；综合数据库，1997；Fischer，1993）。在取得宏观经济成就的同时，预计大幅放开进口（出口的主要促进因素）、国内

表1 拉丁美洲（19国）：GDP增长率，1970~2009年  
（年平均百分比）

|               | 1971~1980 | 1981~1989 | 1990~1997 | 1998~2003 | 2004~2008 | 1990~2008 | 2009 |
|---------------|-----------|-----------|-----------|-----------|-----------|-----------|------|
| 阿根廷           | 2.8       | -1.0      | 5.0       | -1.3      | 8.4       | 4.0       | 0.9  |
| 巴西            | 8.6       | 2.3       | 2.0       | 1.5       | 4.7       | 2.6       | -0.2 |
| 智利            | 2.5       | 2.8       | 7.0       | 2.7       | 4.9       | 5.4       | -1.5 |
| 哥伦比亚          | 5.4       | 3.7       | 3.9       | 1.1       | 5.5       | 3.6       | 0.8  |
| 墨西哥           | 6.5       | 1.4       | 3.1       | 2.9       | 3.5       | 3.1       | -6.5 |
| 秘鲁            | 3.9       | -0.7      | 3.9       | 2.0       | 7.6       | 4.4       | 0.9  |
| 乌拉圭           | 2.7       | 0.4       | 3.9       | -2.1      | 8.3       | 3.2       | 2.9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1.8       | -0.3      | 3.8       | -2.7      | 10.3      | 3.5       | -3.3 |
| 拉丁美洲（19）      |           |           |           |           |           |           |      |
| 总GDP          | 5.6       | 1.3       | 3.3       | 1.4       | 5.4       | 3.2       | -1.9 |
| GDP/工人        | 1.7       | -1.5      | 0.6       | -1.1      | 3.0       | 0.6       | -3.8 |
| 人均GDP         |           |           |           |           |           |           |      |
| 拉丁美洲（19）      | 3.0       | -0.8      | 1.5       | -0.2      | 4.0       | 1.7       | -2.9 |
| 亚洲（6）         | 4.9       | 5.0       | 5.6       | 2.0       | 3.5       | 3.9       | -1.0 |
| 美国            | 2.2       | 2.4       | 1.6       | 2.1       | 1.4       | 1.7       | -3.3 |
| 全球            | 1.9       | 1.4       | 1.2       | 1.3       | 2.2       | 1.5       | -3.2 |

注：亚洲（6）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台湾，其中不包括中国台湾1971~1980年的数据。

GDP：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制作。2009年的数字为暂定数据。

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将发挥战略性作用，成为发展的推动因素。

虽然各有差异且执行状况有所不同，但显然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达到了“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的平衡要求。甚至出口大幅扩张，较全球贸易增速高出1/3，表现令人满意。

然而，经济增长和公平的成果甚微。如表1所示，1990~2008年的年均GDP增长（包括可出口性和不可出口性生产）仅为3.2%，远远低于东亚水平，同美国相当，而美国的人均收入是拉丁美洲的4倍。各国的均值中包括2003年后经济繁荣GDP大幅增长的阶段；2004~2008年的5年期间，GDP平均增速为5.4%，是自7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这段繁荣时期在2009年戛然而止，全球危机导致实际产出和就业率下降。表中数据截至2008年，以便于评估和量化数据可突出结构性因素。<sup>2</sup>

GDP波动及其负面影响的数据显示，从生产GDP的实体经济稳定性的角度看，以上文提到的两大支柱（低通胀和财政纪律）为主的宏观经济方式不尽如人意。事实上，GDP增长率出现了剧烈波动。这些波动影响了拉丁美洲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原因不是突然的结构性或微观经济变化，而是总需求和汇率（影响到其构成），以及

经济参与者预期或情绪的大幅波动。所有这些均是宏观经济的变量。

这些宏观经济变化导致1990~2009年期间的潜在和实际GDP之间的隐性差距，其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周期性变动。<sup>3</sup>

低增速表明该地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仍然巨大。根据2008年所获得数据，拉丁美洲的人均GDP仅为七国集团（G7）国家居民的27%以及美国居民的23%。而且拉丁美洲国家第十个与第一个收入十分位数比率（34）几乎为G7（12）的3倍，因此仍存在巨大的社会差距。

GDP的走势取决于多个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投资率。设备和机器、商业/住宅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支出构成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它同生产性投资者所面对并预计未来出现的宏观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可见，同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和该地区在70年代的表现相比，该资本形成比率相当之低（见图1）。1990~2008年期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率平均为GDP的18.5%，而70年代为23.3%。

2 若要保持1990~2012年间3.2%的温和平均增速，2010~2012年三年的累计GDP增速必须达到15%。

3 由此造成的宏观经济不稳定不但造成萧条并压制增长，而且还导致经济显著倒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0；Ffrench-Davis，2010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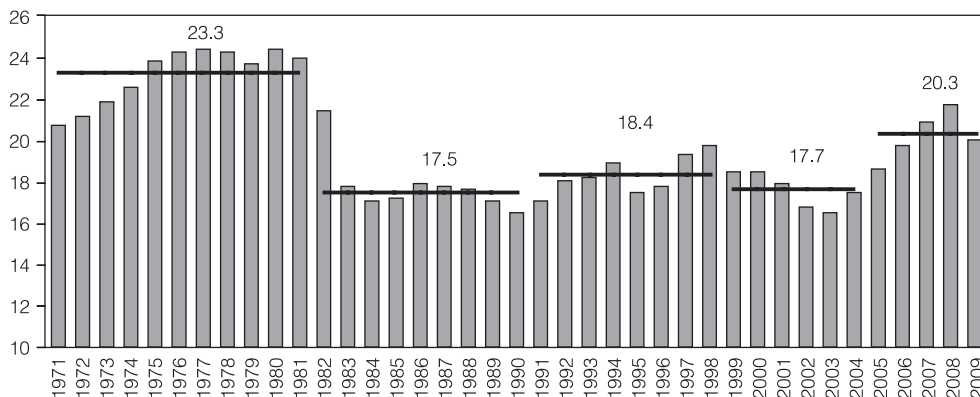


图1 拉丁美洲：固定资本形成总额，1971~2009年  
(占GDP百分比)

注：2000年价格。2009年数据为初步数据。横线上方的数字为相应时期的年均值。

GDP：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数据。



### 三、价格稳定性与实体经济的不稳定性

影响拉丁美洲国家经济表现的宏观经济环境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员工、投资者和国家——不得不对总需求（或国内需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价格的大幅波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0，第6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0，第2章；Ffrench-Davis，2006，第1章和第2章）。图2生动地展示了总需求“过山车”般的变化状态。

在实施“华盛顿共识”改革的20年中，宏观经济一直是地区产出表现波动且不尽如人意的决定性因素。图中显示需求的波动紧随着GDP的波动；根据定义可知，这是由于可获得资本和劳动力的利用率波动。若经济体处于宏观经济平衡状态，那么潜在GDP（GDP\*）和实际GDP（GDPa）<sup>4</sup>之间则没有显著的“隐性差距”，强劲持久的内需（如1990~1994年、1996~1997年和2004~2007年）将带来较为稳定的GDP发展趋势，以及通胀高涨和外部平衡

恶化（相当于总需求的增长水平），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出现；相反导致GDPa的高涨，而只有在两种GDP衡量指标之间存在差距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一结果具有重要意义，即从80年代开始，该地区基本上徘徊在生产边界之下，而波动则将产出与潜在GDP之间的差距拉近或拉远，但这种情形均不长久。当GDPa接近GDP\*时，通常会因货币升值过快所造成的高额的外部赤字。这是一种严重的宏观经济不平衡。

90年代之前的总需求波动常常是印制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所致，但近期波动主要是资本账户和贸易条件带来的外部冲击。图3为该地区遭受外部冲击的指数，包括贸易条件和净资本流动（净资源转移）的波动以及它们同总需求发展的关系。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许多国家，支出超过产出（即外部赤字）的波动大部分出现在私营部门。<sup>5</sup>

4 这种隐性或输出差距的定义不同于常见定义（GDP连续下降的两个季度）。一般定义似乎适用于有经济活动小波动的经济体，但不适用于拉美各国。

5 向不平衡的转变最初并非产生于国内经济，而是受正面的外部金融冲击所致。在经济上升时期，外部赤字增加的同时加上国际储备增长便证明了这点。经过最初的外部冲击之后，流动因顺周期性国内货币和汇率政策而成为内生型流动。对不同国家时期的分析证实了以上针对拉美地区整体的结论。见Ffrench-Davis（2006），第7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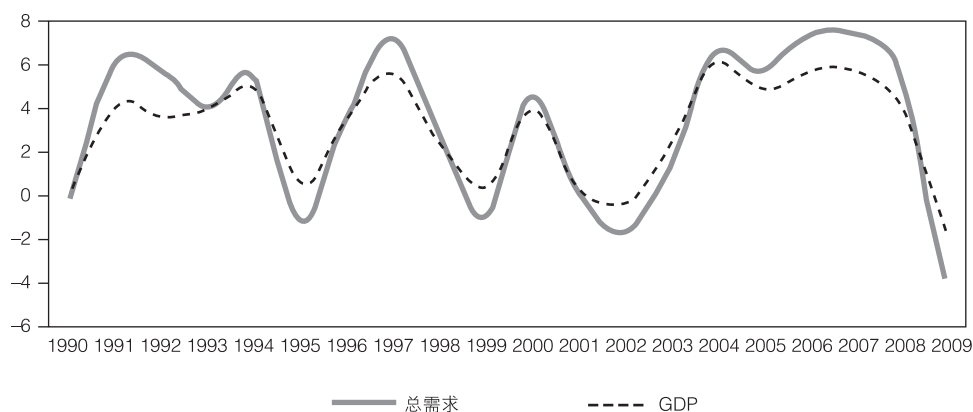


图2 拉丁美洲（19国）：总需求和GDP，1990~2009年  
（年增长百分比）

资料来源：R. Ffrench-Davis，《市场原教旨主义之后的拉丁美洲经济体改革》（Reforming Latin America's Economies after Market Fundamentalism），纽约，Palgrave Macmillan，2006年，最新数据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平等时机：拉近差距，开辟新路》（Time for equality: closing gaps, opening trails（LC/G.2432（33/3章节）），圣地亚哥，智利，2010年5月，图II.5，19个国家。

如Marfán所述（2005），从财政账户变得更加稳定和平衡的事实中可得出结论：总需求和外部平衡的不稳定性主要是私营部门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已经实现完全平衡、高效或可有效地为发展服务并对抗不公平；它仅仅意味着外部平衡的顺周期性波动在私营部门的集中程度比公共部门更高。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大量的外部融资供给与被动的顺周期性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所致（Kaminsky、Reinhart和Vegh, 2004；Ocampo, 2007），其中的许多政策受到金融市场和风险评估机构的热捧。

2004~2008年拉丁美洲地区再次出现与1990~1994年和1996~1997年类似的调整过程，不同的是此次受贸易条件改善的推动，经济进入了繁荣期。此次改善的大部分涉及公共收入的提升，体现在公共债务的减少，有时是稳定基金的建立，2003~2007年间出现了基本财政盈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a和2010，第2章）。贸易条件的改善使得当时的拉丁美洲地区拥有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由于自身资源的积聚和债务减少，该地区此时的情况好于之前的两个周期。因此当2008~2009年外部平衡突然因国际金融危机而发生逆转时，该地区许多政府能够实施反周期政策以减轻危机蔓延造成的经济萧条和衰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

会，2009a）。

除影响总需求以外，每次周期外部融资供应膨胀时通常会造成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的货币升值。对货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刺激金融代理人在本国货币预期升值期间引导更多资金进入该地区。<sup>6</sup> 拉丁美洲各国的经验是，作为影响可贸易产品生产 and 支出决策的宏观价格，实际汇率表现出极强的顺周期性。汇率走势与周期性金融资本流动紧密相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0，图11.8）。每次资金供应上升都会导致货币大幅升值，从而一再导致经常账户的急剧增长。在开放的资本账户、较高的流动负债和贬值预期的出现的共同作用下，资本将大规模且通常是突然流出，而一旦市场发觉这些弱点，通常会带来损害性的估值下滑。

政策设计的一个突出影响是，发展策略应该吸收成功之处，不能将汇率设定寄希望于某些金融代理人的“短期主义”行为；选择这种方式会导致政策严重的不一致性。

6 若预计货币将持续升值，将削弱对本地投入密集的可贸易产品生产的投资。因此观察经济扩张或繁荣时期的汇率变化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时期容易出现外部不平衡和货币以及期限不匹配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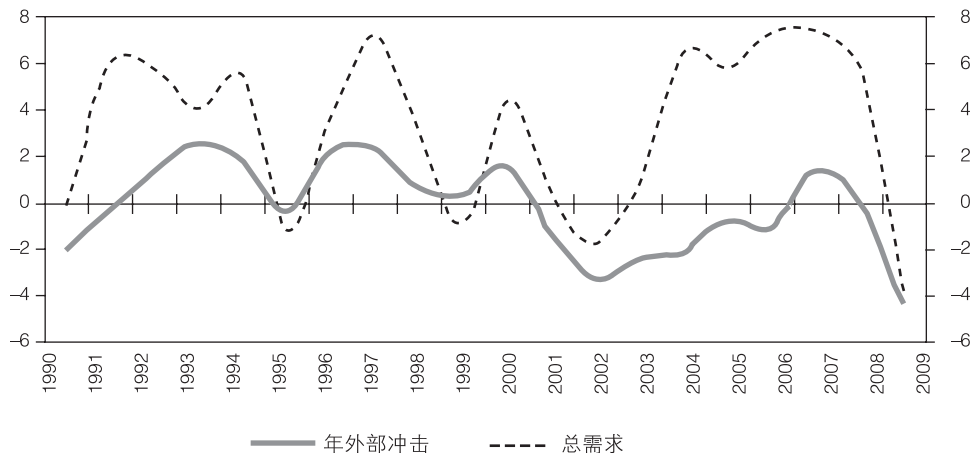


图3 拉丁美洲（19国）：外部冲击和总需求增长，1990~2009年  
(GDP百分比，年度增长率)

注：外部冲击包括来自国外的资源净转移加上贸易条件的影响，两者均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衡量。资源净转移包括资本净流量（包含错误和省略）加上净生产要素收入平衡再加上净即期余额平衡，不含对外移民的汇款。

资料来源：R.French-Davis, 《市场原教旨主义之后的拉丁美洲经济体改革》(Reforming Latin America's Economies after Market Fundamentalism), 纽约, Palgrave Macmillan, 2006年, 更新后的图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的官方数据。

## 四、本质上的顺周期性金融流动

东亚和拉丁美洲近期宏观经济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这些地区影响到了被国际金融机构、金融代理人和风险评级机构归类为“成功”的经济体。<sup>7</sup>由此，大量的私人资本进入新兴经济体，利差不断缩小，同时外债不断增长。

拉丁美洲国家从而成为脆弱的地区：不断增加的高流动性外债组合；国内信贷活跃；货币和期限不匹配；高额的外部赤字；汇率上升；股市价格/盈率处于高位；高端地产价格高企；生产性投资率低。而与此同时宏观经济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却被专注于短期金融市场板块的代理人的看法所左右。

关于金融不稳定性来源的研究非常多：贷款人和借贷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无法恰当吸收各金融代理人所产生的负面外部因素（表现为越来越容易受影响）构成了外部融资的充裕和短缺周期的基础（Krugman, 2000; Rodrik, 1988; Stiglitz, 2000; Harberger, 1985）。正如Heymann（2000）和Ocampo（2007）所强调的那样，金融对应的是预期状况，显然无法获得具体的“信息”。人们通常会将看法和预期等同于“信息”，从而导致一种从众心理和多种均衡的状态。在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曾经出现过蔓延失控的情况，起初是过于乐观，后来是过于悲观，这些不平衡常常受到风险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Reisen, 2003）。

贷款人普遍过于乐观的情绪一般是由于金融代理人追随“领导者”的风险“偏好”，其实是对潜在风险的无知或低估。<sup>8</sup>同时，如下文所述，“领导者”并不是特别偏好风险，而是相信其资本收益已获得保证。对于借贷人来说，在过度乐观时大部分借贷人在借款时并没有打算不偿还或寄望于救助或受益于暂缓止赎。大家普遍希望能够获得较高收益——例如从货币的持续升值中获益。借贷人也是经济繁荣时期金融业高歌猛进的受害人。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金融债权人的另外两个特点在解释他们表现出内在顺周期性行为时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是供应方的领导者的特殊本质。不同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和目标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对称性。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代理人是短期投资的专家，以短期操作为主，因此对于影响短期回报的变量极为敏感。

第二个特点是，在新兴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信息会在能够扩大供应的金融代理人之间逐渐传播开来。处于不同金融市场领域的金融代理人获知新兴经济体之前忽略或没有意识到的获利机会后，逐渐被吸引到新的国际市场上。这正解释了为何拉丁美洲的资金供应增长历时数十年时间（1977~1981年，1991~1994年，1995~1997年和2004~2007年）而非一次性完成大量的资金流入。

这时产生了反馈效应，即在以上时期之初利用不足的产能（潜在GDP）在经济上升期逐渐获得使用；政府、市场和部分计量经济学家常常会错误地将之解读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持续结构性增加<sup>9</sup>。这实际上是自强机制，部分变量——股票市场、汇率、风险评级和房地产价格——会向某个特定方向移动，先是复苏，然后过热，并在较长时期内偏离可持续平衡，使经济参与者“确信”金融市场将只会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并刺激追求资本收益的资本流动（寻租流）。

在此情况下，应在公共政策设计时对金融资本流动波动的两种不同类型进行区分：短期或随机移动波动以及中期不稳定性。后者意味着汇率、股票、股份以及房地产价格等变量可持续向某个特定方向移动，给市场提供虚假的保证，即上文所述的资产价格和回报的移动方向只有一个。这就刺激资金进一步的连续流入，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逐渐开始对宏观经济基本面造成不利影响，但仍然能提供连续较高的短期收益。这些金融代理人自然专注于寻找资本收益，而不是推动生产力的增长，直到资产价格和实际汇率明显偏离基本的水平。这时

7 见Fanelli（2003），Frenkel（2003）和Reisen（2003）的补充性分析。

8 Calvo和Mendoza（2000）研究了全球化通过阻碍信息收集推动了危机的蔓延，因为全球化提供更强大的收益刺激人们模仿市场的投资组合。这导致了一种新的市场“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信息不对称。

9 潜在GDP和实际GDP之间的体系区别将避免这种错误解读。它是发展主导型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发出警告，人们纷纷开始逆转资金流向，与周期性一致的方向行动，动作强烈且成本高昂。与基本上无法逆转的固定资本投资不同，这种金融资本完全可以逆转。

一旦国家进入“脆弱区域”，贷款人在某个时刻（可能非常突然）会对不利消息非常敏感。然后贷款人将注意到：①他们在该市场持有的资产额；②该市场对更多净流动的依赖程度，这与经常账户赤字相关；③汇率升值水平；④股市价格及盈余率；⑤国家的短期和流动债务存量。因此，随着估值进一步深入这些脆弱区，预期逆转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也并不出人意料。

经济体在脆弱区涉足越深、时间越长，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后果也越严重。这凸显了实施有效监管以确保资本流动能增强生产性投资，并符合可持续宏观经济环境。成分、量和资金流趋势的偏离是关键变量。在结构性不平衡普遍存在的背景下，关键取决于在不同国内市场操作的金融代理人的行动能力和反应的差异。

总而言之，两个要素——代理人的本性和调整过程的本质——决定长期资本流动的走势：甚至在实体宏观经济基本面走向恶化的时候，这些要素还会促使供应方继续提供资金。

因此，在周期扩张时期的顶端之时，金融提供商对外部资产累积和资金流动随后的骤然逆转均可视为个人代理人的“理性”反应——就它们的短期期限而言可谓理性。这是因为只要这些投资者预期获得短期回报而继续投资，那么实际基本面是否改善或恶化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关键是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指标——房地产、债券和股价以及汇率——能否继续产生短期收益，当然，他们也在意市场的流动性是否良好，以便在必要时及时改变决策。因此他们将制造净流动，直到预计马上

会出现逆转的状况。

需再次强调的是，对于金融业者而言，最重要的变量并非该国经济的长期基本面，而是其产生的短期回报。这就是他们为何会突然且彻底改变对某个国家的看法的原因，即使金融家的情绪从过度乐观转变为过度消极，其经济基本面而不是外汇流动性仍然保持不变。

一旦债务人市场下调幅度“充足”，反向过程肯定将开始并可能持续数年，例如1991~1994年和1995~1997年，可能还包括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时期。总之，专门从事金融投资的经济参与者可能在其领域非常突出，他们所受的培训和可获得的回报驱使他们做出短期金融投资计划，而且由于他们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设计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宏观经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家主义者”的影响力超过了“生产主义者”，这与公平增长的双重目标相左，公平增长要求更好地激励提高生产力，而非优先发展金融寻租或资本收益。为了获得可持续的公平增长，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参与者的观点和发展重点应予以平衡。

由于资本账户在近期的金融全球化中表现出的不均匀特性，因此辨别其不同成分之间的行为和后果便非常重要。在周期中，与资本品进口相关的新建项目的直接外国投资和长期信贷相对比较稳定，并同生产投资紧密相连。但金融流动表现出高度的顺周期波动性，该特质意味着仅有一小部分这类资金流向生产性投资（Uthoff和Titelman，1998）；这些资金最终往往用于购买现有资产和消费，创造泡沫且减少国民储蓄。实际上，它们常常加大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而非增加其稳定性，同时也无助于生产性资本的形成。<sup>10</sup>

## 五、实际宏观经济不稳定带来的衰退和压制增长的作用<sup>11</sup>

实际宏观经济不稳定会造成衰退和后退，与地区经济体的价格僵化、要素市场不完整和深度结构性不均匀相关联。它在整个周期中的影响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总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点在文献中较为常见，但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近年来多少受到了忽

视。结果便是潜在生产能力和利用之间一再出现差距，

1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Prasad（2003）及其他和Singh（2006）的两份重要论文中观点相反。

11 一份专为国际劳工组织（ILO）所制作的报告研究了这种不稳定性的作用，同样是衰退（French-Davis，2010b）。



这一情况在繁荣期之后的停滞期尤为常见。在一些行业，全部产能的需求受限于利用率，而在另一些行业，需求则明显不足。因此，在时停时进的情形下，总需求的不稳定性必然意味着平均净利用率低于生产能力，且实际生产率低于接近生产边界时的生产率。显然，不稳定性越大，隐性产出差距就越大，对劳工市场的影响也越恶劣，同时随意性也不断增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0，第5章）。

### 1. 结构性不均匀的市场和不稳定性

在实际宏观经济中，不平等和不稳定之间的关系源自发展中经济体结构性不均匀的特点。它包括了不同市场板块中代理人各不相同的行为和反应能力（大企业和小企业，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生产性或GDP制造性投资者和金融投资者或现有资产购买者，生产性投资者和消费者），以及他们各自对经济活动和宏观价格

不稳定性反应的不对称性。在经济上升期（相对于经济活动中较为稳定的趋势），由于资本市场中长期板块的疲软，对消费者流动性限制的放宽往往快于对生产性投资者的放宽。同样，消费者比生产性投资者反应更快，因为后者需要较长时间对项目进行考察、设计和开发。此外，投资的不可逆转性意味着，在长期投资者进行新投资之前，必须让他们感受到投资良好预期的可持续性。

生产边界显然为实际GDP的复苏设置了界限；其一般只能短期地超越潜在GDP。相反，在萧条期，实际GDP可能长期远远低于潜在GDP。因此，经济不稳定性具有内在的不对称性，并且一般而言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潜在生产力利用不足并减少实际产出。复苏增加当前产出的流动直到现有的产能得以充分利用，但过去没有创造的产出却无法恢复。只要这两个水平之间存在紧缩缺口，其对生产性投资、劳工市场、中小企业以及非常规领域的压制性影响便会存在。

因此，实际需求和生产边界之间的差距会带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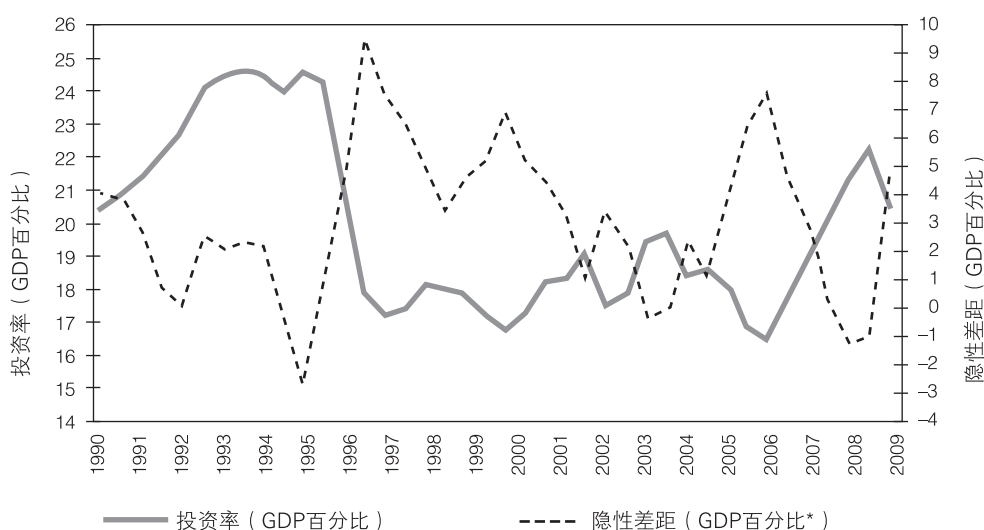


图4 拉丁美洲（9国）：隐性差距和总投资比率，1990~2009年

注：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投资比率衡量了总固定资本形成和实际GDP之间的比例。隐性产出差距衡量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潜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差距（同后者相比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R. Ffrench-Davis, 《市场原教旨主义之后的拉丁美洲经济体改革》(Reforming Latin America's Economies after Market Fundamentalism), 纽约, Palgrave Macmillan, 2006年, 更新后的数据和图源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平等时机：拉近差距, 开辟新路》(Time for equality: closing gaps, opening trails (LC/G.2432 (33/3章节)), 智利圣地亚哥, 2010年5月, 图II.9, 根据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数据以及A. Hofman和H. Tapia, 《拉丁美洲的潜在产出：1995-2000年期间的标准模式》(Potential output in Latin America: a standard approach for the 1995-2000 period), Estudios estadísticos y prospectivos系列, 第25部分 (LC/L.2042-P), 智利圣地亚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ECLAC), 2003年。联合国出版物, 销售号E.03.II.G.205。

大的静态和动态影响。首先，它能影响可观测到的生产力（实际全要素生产率）和所实施项目的回报。第二，更高的资本利用率一般意味着更高的平均雇佣水平，且劳动力拥有更多的实物资本进行支配。可观测生产力的提升意味着，由于平均劳动力利用指数的提高，劳工和投资者的福利（工资和利润）可随之立即改善。财政收入也同样增加。在这种形势下，通常贫困人口将减少；同时在经济复苏阶段，改善收入分配情况的可能性将增加。分配的效果如何取决于经济复苏期间的微观和综观经济变革。经济增长本身可能渐进或渐进。第一种情况，其通常是可持续并增强的“内因化”，而第二种情况，经济增长则往往可逆并有限。（Bourguignon和Walton，2007）。

## 2. 隐性差距和资本形成动态

从动态角度看，稳定程度对于未来的构建会产生一系列影响。高利用指数和随之而来的平均实际生产力的提高（在传统经济计量学中表现为实际全要素生产力的增加）将可能刺激对新生产能力的投资。如果公共政策能让实际需求接近生产边界，从而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实体产生厚望；如果当局另外实行改革以完备长期资本市场，同时采取措施提升对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并鼓励创新，那么稳定性将对投资比率产生更为实质的动态影响。

图4展示了拉丁美洲隐性差距和投资率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体现了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主要负面动态影响中之一。该关系产生的原因如下（Ffrench-Davis，2006，第3章；Aizenman和Marion，1999）：①大量闲置的产能自然会阻碍在新生产性资产方面的投资；②经济活动和汇率多变的环境将阻碍不可逆转性投资；③利用不足意味着利润变低和内部资金缺乏，衰退时通常资本市场不愿意资助流动性有问题的企业。④隐性差距及其波动往往会影响项目评估的质量；⑤不愿意购买新机器和设备影响相关的技术革新；⑥大规模衰退波动容易影响公共收入，导致扶助私人投资所需的公共投资被削减（Easterly和Servén，2003）。

图4还表明，随着紧缩缺口逐渐关闭，出现的复苏过程的连续性与平衡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相关性。这表明耗时更长的经济复苏已经导致投资比率的升级。

2007~2008年期间，投资比率达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随后是始于2003年的长期复苏；此后，随着危机的蔓延，该比率在2008年的水平上降低了两个百分点。

智利的范例很好地论证了宏观经济环境对投资的影响。20世纪70和80年代期间，智利的投资率平均占了GDP的15%；经历了1990年的衰退调整之后，该比率恢复稳定，1998年回升了约8个百分点（Ffrench-Davis，2010c）。该过程的持续进行能有效刺激投资者将其资金和信贷用于生产活动所必需的长期投资。

自相矛盾的一点是资本形成比率的波动主要由经济周期带来，而非该区域的微观和综观经济改革所引起。实施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提高生产力，减少结构性不均匀。假设宏观经济表现良好，人们将期待微观和综观经济改革能决定投资比率的变化。

因此，多变性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通过其对固定资本投资额度的影响发挥作用。事实上，资本形成是潜在GDP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影响着就业和实际全要素生产率（Ffrench-Davis，2006，图III.1和III.2；De Long和Summers，1991）。同亚洲国家相比，该地区不尽如人意的经历不仅仅因为生产性发展政策方面这一关键问题，也源自宏观经济失误和“华盛顿共识”资本市场改革的本质（见第六部分）。

## 3. 重要宏观价格——汇率的不稳定性

第三部分讨论了金融流动引起的汇率不稳定。这种实际汇率的不稳定性对出口增长和多元化及其融入国内经济都是有害的（Agosin，2007）。无法将如此剧烈波动的汇率视为“可持续平衡”不同水平的有效体现；

“可持续平衡”水平受国内经济和贸易伙伴之间相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受可持续并可有效吸收的净基本流动量的影响）。这些“结构性”变量的发展变化通常逐渐发生而非突然出现。因此，许多国家实际汇率的大幅摆动通常是因顺周期资本流动才出现失调。

货币升值的重复周期，尤其在该地区实质性的进口自由化之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98年，第五章），意味着每次好转时，来自个人和企业的复苏性总需求中，进口型倾向越来越强烈。随着资本货品



进口的喜人增加，其他类型的进口也出现大幅上升，其中众多同本地中小型企业（SMEs）的资产和产出相竞争；由此，不但出口的数量和质量遭到冲击，与进口竞争的生产领域也同样受到排挤。

#### 4. 系统性竞争力和实际宏观经济

分析研究经济波动的出现之处很有意义。例如，1990~1997和1998~2003年期间，该地区GDP增长中90%的调整（平均增长率下降1.9%）集中在国内市场生产，即：非出口的GDP（Ffrench-Davis, 2006, 第6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0, 第2章）。这体现了两个因素：一个为微观因素，一个为宏观因素。微观因素是多次将资源从非贸易货物生产领域重新分配到可出口货物和进口替代物生产领域以及反向分配时遇到的困难。国际贸易机构的自由化和频繁的更替削弱了该地区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经济委员会，1998；Rodrik, 2008）。由此，切实可用的主要工具——汇率——变得更为重要。若经济部门不对它进行干预，任其自由浮动，就严重有悖于出口导向型的发展策略。

第二点是宏观经济。GDP中非出口的部分（大约4/5）取决于本地宏观经济环境，而出口则更依赖于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从收集到的信息可以看出，国内市场是不稳定性的主要受害者（Ffrench-Davis, 2006, 第5章）。<sup>12</sup>在此，该地区宏观经济政策的不足之处再次得到体现。这种政策一直处于顺周期性的实施状态，因此，它实际上放大而非弱化了对外贸易和金融冲击的传递。近年来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仍然微乎其微。

12 强劲增长意味着非出口型GDP仍然快速膨胀。这是成功发展生产的出口型新兴经济体的经验，范例包括韩国的几十年、智利的1990~1998年，当时非出口产出每年增长6.5%（Ffrench-Davis, 2010c, 表VII.6）。另一方面，就拉丁美洲总体而言，非出口产出仅增长了2.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0, 表II.2）。

## 六、宏观经济的发展：从“金融家主义”到“生产主义”

国内金融市场和基本账户尚不完善、主次不分和自由散漫的自由化为市场带来了代价昂贵的不稳定性冲击。事实证明，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循环的高额成本与其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顺周期性板块之间的紧密联系有关。随着自由化的到来，金融储蓄大幅上升，但国民储蓄没有任何增加，同时投资比率非常低，经济活动和就业情形波动很大。造成此现象的核心原因在于金融市场的主导者是精于短期而非生产性投资的代理人。因此，仅有一小部分流入的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而金融和货币的多变性导致的金融与货币危机令这一问题雪上加霜；另外，危机的隐形后果抑制了当地企业及雇佣劳动力的资本形成。

要想创造出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充分利用潜在GDP并鼓励创造新产能，必须制定出一套具有一致性的反周期财政、货币、汇率、国内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政策。<sup>13</sup>为此，需要努力“完善”资本、劳工和创新市

场，来创造出此类有利于发展的环境。

对于抗外部冲击能力薄弱的经济体而言，在调整过程中仅仅依赖于某项特定政策，产生的宏观经济结果劣于均衡实施多种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结果。实施多种宏观经济政策往往能带来极好的宏观经济成果：宏观价格更接近可持续发展水平，实际GDP也与潜在GDP更接近。

顺周期性且多变的资本流动是外部资金的组成部分，包括用于补充国内储蓄所需的外国储蓄——若希望实现投资率的大幅提升。所以，不存在“全有或全无”的可能性。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内金融市场改革）的一项基本目标应该是获取外部储蓄的潜在利益来支持国家发展，同时减弱资本账户周期的强度及其对于经济和社会变量的负面影响。

### 1. 财政政策

国际金融危机揭示了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维稳工具的核心重要性（Krugman, 2009；Griffith-Jones、

1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0, 第2章）研究了这些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Ffrench-Davis（2008）提供了更为全面的分析。

Ocampo和Stiglitz, 2009; Blanchard、Dell' Ariccia和Mauro, 2010)。结构性财政平衡的概念是所有反周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征在于对经济周期的预算进行衡量, 评估公共支出水平如何同公共领域收入趋向或生产性能力的充分利用达成一致。用这种方式稳定支出更具效率, 并使之避开财政收入的周期性波动, 同时还减轻或消除年度平衡预算政策的顺周期性偏离。该地区很多国家已经制定了一种不受严格年度限制所约束的预算规划形式。智利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Ffrench-Davis, 2010a)。

此类方式包括针对价格极不稳定的出口财政收入设立稳定基金。这些基金可帮助稳定一般财政支出, 为类似于2009年的金融危机提供应对资金, 并通过调供进一步稳定外汇市场。为此, 这就又需要财政部门 and 负责汇率政策的相关人员 (通常来自各个部门) 进行紧密协作 (Martner和Tromben, 2004)。

## 2. 货币政策

然而, 就算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得以加强, 通常也还是不够。该地区的一个重要情况是财政支出仅占总需求的一小部分 (大约1/5)。如果对私营部门开支有重大影响的各项政策依赖于多变的资金流动和顺周期性代理人的意见, 那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收效甚微。

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收支平衡融资方面的独立性对于大幅减少通货膨胀率相当关键。但是, 价格的稳定可以与潜在GDP和实际GDP之间的大幅差距并行不悖 (Blanchard、Dell' Ariccia和Mauro, 2010), 这在实践中已经得到明确证明。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央银行给每个宏观经济变量所加的权重, 另一个特性是与其他提到的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在通货膨胀率主要为个位数的地区内, 各中央银行倾向于忽略其他宏观经济目标, 丧失了它之前在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高通胀情况下可能具备的公正性。经济增长、就业和资本形成表现平庸的部分原因是政策冷落了这些方面, 它专注于通胀目标, 未能充分考虑到对其他方面造成的影响, 而这些方面都对发展有着关键的直接影响。

要让货币政策真正反周期并有利于发展, 就必须明确考虑它对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如经济活动、隐性差距、

外部平衡和就业的影响, 实现不同目标之间的可持续平衡, 并力求同财政政策相协调, 而非仅仅重视将防通胀的效果最大化。实际汇率是一种宏观经济变量, 和防通胀政策严重对立。由于汇率提高使得经济不稳定, 因此通货膨胀的目标一般可以实现。

## 3. 汇率政策

汇率是一种宏观经济变量, 对于宏观经济平衡和资源分配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在常规方法中, 仅有的汇率选择是固定名义汇率或完全自由浮动汇率, 假设市场将有利地设定可持续的平衡型实际汇率。该地区的很多国家已经正式采用了自由汇率体制。尽管各中央银行在一些情况下进行干预压制波动, 实际汇率对收支平衡变化反应非常强烈, 甚至超过了对经常账户变化的反应。

尽管自由浮动制度的优势防止了固定汇率制度可能造成的货币危机, 但该地区的许多货币变得对顺周期的外部资金供应极为敏感。因此, 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矛盾, 给资源分配, 尤其是积累, 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对进口所实行的自由化改革让可交易领域扮演了领导角色, 意味着汇率对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 (Williamson, 2000; Agosin, 2007; Rodrik, 2008; Eichengreen, 2008)。自相矛盾的是当局采用的一项政策导致了汇率多变, 主要受控于短期代理人。

这显然扭曲了项目评估, 鼓励了投机而非生产性投资, 人为地排挤了可进口贸易货物 (许多由中小企业所生产) 在当地的生产和阻碍生产者出口产品增值。

汇率政策的严重失误严重束缚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策略, 对于非常规货物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更是如此。它们产生了外部要素并与中小型企业相互影响。汇率政策的管理是在该领域取得成功所需整套变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间体制涉及受监管汇率灵活性, 例如不同类型的爬行钉住汇率机制, 受限制的汇率浮动, 或两者兼而有之, 代表一种严肃的实用主义倾向, 企图修正这种矛盾做法 (Williamson, 2000)。新自由主义方法倾向于将任何汇率干预表述为违反“市场”的做法并注定以失败告终。但是, 我们支持的替代方法背后的原理在于: 确保市场的真正动力——可出口货物生产者和进口者以及

可进口货物的生产者（生产发展和平等的重要参与者）成为汇率设定的主导者。应该由“市场”设定汇率，而不是由谋求短期利益者和寻租者来设定，二者常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创新和生产力之上。对此，经济主管部门应进行前后一致、有选择性的干预，尽管这种干预并非万无一失。这一点很重要。当任由汇率随大量顺周期性资金流动自由浮动时，为了避免极有可能出现的错误，有必要对各种风险进行评估。

总而言之，汇率政策需要进行深入更正，这样才能与发展策略相一致，让可贸易货物的生产和服务的创造扮演中心角色。这样将有助于提高系统竞争力，即国内和国外市场生产能力的发展。国内市场是大部分劳工和企业的家园。通过该途径提升系统竞争力有助于减少国内结构性不均匀，这是提高劳工市场和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公平的前提。

#### 4. 深化资本市场，为发展融资

正如本文所强调，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平衡、就业和资本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原因在于该地区经济体的两个特点。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有些领域发展薄弱或根本不存在。资本市场的失误对资源配置造成不良影响，而不同经济体之间显著的结构差异加剧了这种影响，从而损害了中小企业、低技能工人、创新以及资本有限的企业。融资获取的不均匀性加剧了生产能力和对更大市场参与度之间的不公平。在这个恶性循环中，资本较少的生产单位被置于脆弱的状况之中，难以有所发展。

近几十年来，该区域与多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之间关系密切。这不但加剧了这类缺点，还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低水平的生产性投资和脆弱的劳工市场。确实，这种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关系加剧了该区域的不稳定性。

##### (1) 从“华盛顿共识”到创新发展融资

谈到利率和期限，高昂的金融成本一直是铁律。新自由方式期望的投资融资“活跃市场”并未来到，反之而到的是深度分割并过度聚焦于短期利益的市场（Stallings和Studart，2005）。“华盛顿共识”中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实际上意在弱化开发性银行业务和长

期板块。结果，这些改革与“蒙特利尔共识”建议不一致（联合国，2007）——该共识的目的是增加分配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资源，使资本市场的运行具有高效包容和反周期特点。

在“华盛顿共识”改革之前，国家金融系统十分不完善、不充分。尽管如此，其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的投资率比新自由主义改革期间所获得的投资率还要高，并带来了GDP的大幅增长（见表1和图1）。极端地忽略这两个成果及其之间的差距是不明智的。

因此，对国家金融系统改革的革新应旨在将资源分配到储蓄和生产性投资中，这样能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必要的体制结构包括强有力的长期调节部门，将储蓄分配到生产性投资中，同时需要稳健的反周期性调控。该系统需让公有和私营部门发展银行发挥积极作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0）。

在诸如拉丁美洲这类新兴经济体中，如果资本账户随意开放，极难对国内市场进行改革。必须进行有效的反周期资本账户调整，才能发展宏观经济，同时保持货币政策和汇率的可持续性。（French-Davis，2006，第2章和第5章；Ocampo，2008）监管资本流动可同时为始终如一的反周期汇率和货币政策创造空间。

外部融资的极端自由化，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的状况，要求该区域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最具投机性的板块。因此，资本市场最活跃的板块主要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活动，包括短期资金流入和流出，不但具有顺周期多变性的特点，与生产性投资的联系也很薄弱。

对多变资本账户的监管可作为一种反周期宏观经济工具，从根源上作用于经济繁荣和萧条周期。在金融高亢期，它能够减轻货币增值的压力，让货币紧缩政策的采纳成为可能。在经济繁荣时期，采取预防性调节为在诸如全球性金融危机等重要事件期间实行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创造了空间。

同时，资本账户流入和流出的反周期调节为国内金融系统的重组提供了契机，旨在将资源导向生产投资领域，侧重包容性，帮助改善不同经济和社会板块之间结构性不均匀的现象。

##### (2) 反周期措施的国家经验

整体而言，限制短期或流动资本流入方面的经验显

示，这样的措施为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创造了良好条件，促进增长和就业（Ocampo, 2008; Stiglitz, 2000; Williamson, 2003）。这些限制的目的在于在繁荣期创造更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国内经济过热或外部不平衡时，尽可能减少代价高昂的衰退调整。

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成功经验有力地证明了反周期调节的效果。近年回归民主之后，由于经济表现较好，经济体规模较小以及新政府带来的政治稳定，智利在1990年获得的外部融资供应（相对于GDP）远远高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智利当局认为这些资金供应可能扰乱该国的宏观经济（尤其是总需求及其同潜在GDP的一致性以及可持续的外部平衡）和出口策略。

相应地，智利当局以信贷或股票市场投资的方式通过提高短期资金流的成本，调节资本流入的数量和组成。智利当局设立了一个无息准备金（encaje），占总流量的一定比例，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由中央银行持有，encaje的比率和期限随外部资金的供应量变化而变化。通过调节流入资金的组成和数量，准备金为同时实施积极的反周期货币和汇率政策创造了有效条件（Magud和Reinhart, 2006; Edwards和Rigobon, 2009）。由此智利得以保持总需求水平，与其生产能力和可持续汇率相一致。这些平衡带来了投资率和潜在及实际GDP增长率的大幅提高，年均增长率超过7%。20世纪90年代后期，智利采用更盛行的政策思路，允许在2001年放开资本账户前弱化准备金的调节力。（Ffrench-Davis, 2010c, 第VIII章和第IX章；Le Fort 和Lehmann, 2003）因此，智利成为1999年亚洲危机蔓延的受害者

之一，GDP增长率从1990到1998年的7.1%下降到1999到2008年的3.8%。

该地区在资本账户调节方面的经历多种多样。将对资本流出的控制同高额财政赤字和明显高估的汇率相结合，往往效率低下且很不稳定。本文所述资本账户调节的目的在于实现实际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平衡，而不是寻求持续的不平衡。在寻求这些平衡的过程中，该地区近期实施了一些有趣的调节试验，主要目的是防止货币过度升值。可提到的例子包括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秘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b）。

其他地区也在近期或正在进行资本账户调节。韩国就是这方面的范例。该经济体在经济高速繁荣发展的30多年里，一直保持严格的资本控制。20世纪90年代初的资本流入自由化导致了1998年的危机。之后该国一直控制居民对外转移资金（Mahani、Shin和Wang）。同时，还有较为传统的控制手段。中国和印度采取的传统控制措施（如禁止短期金融借款、股票市场投资配额和资本外流控制）证实：这些措施能有效弱化国内经济和多变的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这两个国家均成功地抵御了当前危机，其控制手段为目前进行的经济复苏计划创造了条件。

总之，迫切需要对“华盛顿共识”改革进行革新，而且此次革新应侧重金融系统（当地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与国内投资过程和国内经济体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与短期外部金融市场的联系。此外还应改善国内需求和宏观价格的稳定性，如汇率。

## 七、宏观经济大挑战

进行这些反思时，全球经济似乎已经避免再次出现许多分析家担心的类似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种情况未发生的原因并非是运气好，也不是市场进行自我修正，而是通过刻意的公共行动修正了全球宏观经济状况。这种修正行为同消极政府和“中立经济政策”的主导模式背道而驰。世界头号经济时报之以强有力的反周期性财政政策。世界上大部分人幸运地避免了一次经济大

崩溃，现在任务是在国际机构和我们每个国家中，如何应对目前的衰退形势以及如何完善整套修正措施。

本文讲述了宏观经济方式的选择如何关键地影响增长的稳定性和速度，以及如何影响国内市场内部结构的平等程度。在获取储蓄并将其用于投资方面，国家金融系统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国外资本可作为本地储蓄的重要补充；资金流动的组成和稳定性于此非常重要。



事实证明，在实现经济发展、实际宏观经济稳定以及减少不平等方面，不带偏颇的金融自由化效率非常低下。全球金融危机——不受监管的“金融家主义”带来风险的案例——为在该地区制定更实用的政策和对资本账户

进行反周期性调节创造了空间。

对于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宏观经济学而言，改革国家资本市场及其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方式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 参考文献

- Agosin, M. (2007), “Trade and growth: why Asia grows faster tha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Growth with Equity: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R. Ffrench-Davis and J.L. Machinea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Aizenman, J. and N. Marion (1999), “Volatility and investment: interpreting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a*, vol.66, No. 262,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Akerlof, G. (2007), “The missing motivation in macro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No. 1,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rch.
- Blanchard, O., G. Dell’Ariccia and P. Mauro (2010), “Rethinking macroeconomic policy”, *IMF Staff Position Note*, SPN/10/03,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ebruary.
- Bourguignon, F. and M. Walton (2007), “Is greater equity necessary for higher long-term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Growth with Equity: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R. Ffrench-Davis and J.L. Machinea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alvo, G. and E. Mendoza (2000), “Rational contag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ecurities marke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51, No. 1, Amsterdam, Elsevier.
- De Long, J.B. and L. Summers (1991), “Equipmen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No. 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Dodd, R. and S. Griffith-Jones (2007), “Report on derivatives markets: stabilizing or speculative impact on Chile and a comparison with Brazil”(LC/W.134),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 Easterly, W. and L. Servén (2003), *The Limits of Stabilization: Infrastructure, Public Deficits and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0), *Time for Equality: Closing Gaps, Opening Trails* (LC/G.2432(SES.33/3)), Santiago, Chile, May.
- \_\_\_\_\_ (2009a),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8-2009* (LC/G.2410-P), Santiago, Chile, Jul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E.09.II.G.2.
- \_\_\_\_\_ (2009b),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9* (LC/G.2424-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E.09.II.G.149.
- \_\_\_\_\_ (2000), *Equity, Development and Citizenship* (LC/G.2071/Rev.1-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0.II.G.81.
- \_\_\_\_\_ (1994),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olicies to Improve Linkages with Global Economy* (LC/G.1800(SES.25/3)), Santiago, Chile.
- Eichengreen, B. (2008),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No. 4, Washington, D.C.,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Fanelli, J.M. (2003), “Micro-macro interactions,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ics*, A. Dutt and J. Ros (ed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 Ffrench-Davis, R. (2010a), “Latin America: the structural fiscal balance policy in Chile”, *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No. 1, 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
- \_\_\_\_\_ (2010b), *Macroeconomía para el empleo decente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Santiago, Chil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_\_\_\_\_ (2008a), *Chile entre el neoliberalismo y el crecimiento con equidad: reformas y políticas desde 1973*, Santiago, Chile, J.C. Sáez Editor.
- \_\_\_\_\_ (2008b), “From financieristic to real macroeconomics: seeking development convergence in EEs”, *Working Paper*, No. 44, Washington, D.C.,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_\_\_\_\_ (2005), *Reformas para América Latina: después del fundamentalismo neoliberal*, Buenos Aires, Siglo XXI Editores/ECLAC.
- Fischer, S. (1993), “The role of macroeconomic factors in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32, No.3, Amsterdam, Elsevier.
- Frenkel, R. (2003), “Globalization and financial crises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80 (LC/G.2204-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Griffith-Jones, S., J.A. Ocampo and J. Stiglitz (eds.) (2009), *Time for a Visible Hand: Lessons from the 2008 World Financial Cri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berger, A. (1985), “Observations on the Chilean economy, 1973-198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3, No. 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pril.
- Heymann, D. (2000), “Major macroeconomic disturbances, expect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CEPAL Review*, No. 70 (LC/G.2095-P), Santiago, Chile, April.

- Hofman, A. and H. Tapia (2003), "Potential output in Latin America: a standard approach for the 1950-2000 period", *Estadísticas y prospectivos series*, No. 25 (LC/L.2042-P),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E.03.II.G.205.
- IDB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97), *Latin America alter a Decade of Reforms*, Washington, D.C.
- Kaminsky, G., C. Reinhart and C. Vegh (2004), "When it rains, it pours: pro-cyclical capital flow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78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 Krugman, P. (2009),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 New York, W.W. Norton.
- \_\_\_\_\_ (2000), "Crises: the price of globalization?", *Proceedings*, Kansa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 Le Fort, G. and S. Lehmann (2003), "The unremunerated reserve requirement and net capital flows: Chile in the 1990s", *CEPAL Review*, No. 81 (LC/G.2216-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Magud, N. and C. Reinhart (2006), "Capital controls: an evalu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97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anuary.
- Mahani, Z., K. Shin and Y. Wang (2005), "Ajustes macroeconómicos y la economía real en Corea y Malasia: la respuesta a la crisis asiática", *Investigación económica*, vol. 64, No. 254, Mexico City,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October-December. Published also in R. Ffrench-Davis (ed.), *Seeking Growth under Financial Volatil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ECLAC, 2006.
- Marfán, M. (2005), "La eficacia de la política fiscal y los déficit privados: un enfoque macroeconómico", *Los desafíos del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J.A. Ocampo (ed.), Bogotá, D.C., ECLAC/Alfaomega.
- Martner, R. and V. Tromben (2004), "Tax reforms and fiscal stabi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Gestión pública series*, No. 45 (LC/L.2145-P),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Jun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E.04.II.G.73.
- Ocampo, J.A. (2008), "A broad view of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N. Serra and J.E. Stiglitz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7),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boom", *CEPAL Review*, No. 93 (LC/G.234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Prasad, E. and others (2003), "Effect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MF Occasional Paper*, No. 220,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eptember.
- Reisen, H. (2003), "Ratings since the Asian crisis", *From Capital Surges to Drought*, R. Ffrench-Davis and S. Griffith-Jones (ed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Rodrik, D. (2008),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_\_\_\_\_ (2006), "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 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 A review of the World Bank'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4, No. 4,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December.
- \_\_\_\_\_ (1998), "Who needs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Should the IMF Pursue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P. Kenen (ed.),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20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Singh, A. (2006),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the policy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IMF Working Paper*, No. 166,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July.
- Stallings, B. and R. Studart (2005), *Finance for 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s Banks and Capital Markets after Liberaliz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Stiglitz, J. (2000), "Capital market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stability,"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6, Amsterdam, Elsevier, June.
- United Nations (2007), *Follow-up to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outcom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62/217)*, New York, August.
- Uthoff, A. and D. Titelman (199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and national savings under financial liberalisation", *Capital Flows and Investment Performance: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R. Ffrench-Davis and H. Reisen (ed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Williamson, J. (2003), "Overview: an agenda for 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P-P. Kuczynski and J. Williamson (ed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_\_\_\_\_ (2000), *Exchange Rate Regimes for Emerging Markets: Reviving the Intermediate Opti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World Bank (2005),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Washington, D.C.
- \_\_\_\_\_ (1997), *The Long March: a Reform Agenda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Next Decade*, Washington, D.C.
- Zahler, R. (2005), "Estabilidad macroeconómica e inversiones de los fondos de pensiones: el caso de Chile", *Crecimiento esquivo y volatilidad financiera*, R. Ffrench-Davis (ed.), Bogotá, D.C., Mayol Ediciones.



##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全球化  
经济形势  
发展中国家  
汇款  
国际贸易  
商品贸易  
资本流动  
经济指标  
拉丁美洲

# 全球金融危机 对拉丁美洲地区的影响

*José Antonio Ocampo*

## 本

文认为在2008年9月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流动资金的严重短缺。尽管如今我们已无需再为这一问题担忧，但工业化国家的借贷与生产活动都正在快速萎缩，而金融系统也面临资本不足的问题。所有将危机转移到拉丁美洲的外部渠道中，汇款的减少带来的影响最小。国际贸易额下降和商品贸易行情急剧恶化才是带来严重后果的罪魁祸首。此外，未来还将经历一个私营企业外部融资严重受限的时期。相比过去，本地区经济在遭受此次危机之前的情形要好于以往，这主要是因为债务少且国际储备额雄厚，不过这些因素只能片面减轻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

José Antonio Ocampo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前哥伦比亚财政与公共信贷部部长

⇒ [jao2128@columbia.edu](mailto:jao2128@columbia.edu)

## 一、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目前世界经济正经历着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尽管相比大萧条时期，此次工业国家生产萎缩的程度更小，但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经济衰退（“衰退”演化成“萧条”的临界点尚无明确的界定）。这场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作为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的主要推动者，其2008年11月与12月出口额的减少，以及第四季度经济发展几近停滞的事实，都充分证明了此次全球危机的严重程度。

2003~2007年期间，由于金融行业蓬勃发展，商品价格很高，外出务工人员的大量汇款，拉丁美洲市场形势一片大好，而如今这一胜景已不复存在。该地区一些国家2008年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墨西哥、委内瑞拉，以及几乎中美洲与加勒比海沿岸所有的小国。可以看出，自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融资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彼时，美国金融危机正进入第一阶段。接着2008年年中，商品价格开始下降。2008年9月中旬全球金融市场崩溃，引发了最深刻的变革，信贷枯竭，风险利差增大，商品价格一落千丈，以及工业国家陷入严重经济衰退。即便是2008年第三季度前仍蓬勃发展的部分拉丁美洲经济体，例如巴西与秘鲁，也未能幸免于难。

反思这一事件，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免于危机初期带来的影响，这主要归功于新一轮商品价格的抬高，相对安全的大量外汇储备，以及主要亚洲国家持续的强劲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就这些现象总结出一个理论，即发展中国家将与发达工业国家的衰退趋势“脱钩”。然而，用Calvo（2008）的话说，“小阳春”之后紧接着是2008年9月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狂风暴雨，显然“脱钩”理论不过是美好幻想而已。

本文首先分析国际经济危机对拉丁美洲地区的影响。继引言之后，第二部分将谈论美国的金融危机。第三部分分析将危机传入本地区的三个外界渠道，思考先前创造繁荣的机制后来如何导致问题的产生。第四部分探讨本地区经济的脆弱性，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第二部分会清楚地谈到，在本文完成之时（2009年1月），国际局势仍未稳定。国际金融行业严重缺乏资金，贷款继续减少，经济活动、国际贸易都在快速下滑。这意味着这场危机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仍是个未知数。与此同时，各国正在实施新的宏观经济调控计划，其中包括美国金融救市计划的第二阶段，奥巴马政府颁布的财政方案和英国政府提出的新一轮金融一揽子救市计划。因此，本文很多观点具有不可预见性。

## 二、全球金融危机

2009年1月，距离美国次贷证券化危机已过去一年半，距离2008年9月14日那个黑色星期天已过去四个月。那天，美国的五大投资银行之一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同日，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3月接受政府救助的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兼并。接下来的一周里，政府救助国内保险业排头兵美国国际集团（AIG），强制出

售主要的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和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美联银行。众多较小的公司纷纷倒闭，还有更多公司不断加入这一倒闭大潮。此外，那些仍然保持独立的投资银行，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日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将于10月份收购后者20%的股份），也都成为银行控股公司，开始接受美联储的监管。9月17日和18日两天，美国金融体系濒临全面瘫痪，这标志着“信贷危机”的开始；最严峻的时候，银行间贷款和商业票据的发行几乎完全停滞。一周内多家欧洲银行也纷纷宣布破产，并且破产范围还在扩大。一些英国银行早已举步维艰。

□ 本文作者在此感谢Maria Paula Carvajal女士协助筹备资料。本论文系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国家、民主和市场：拉丁美洲地区民主报告”项目所撰写。

伟大的经济历史学家Charles Kindleberger曾指出（Kindleberger和Aliber，2005），资本主义有史以来的一个固有属性就是存在经常性的金融危机。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起，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发生频率逐渐增高，与不同的全球经济自由化进程一致（Bordo等，2001）。就美国而言，这是近几十年来的第三次银行业危机。第一次是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由于巧妙操控，最终由拉丁美洲全部买单。尽管美国主要金融机构破产，但这并不为人所知。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储蓄和借贷体系发生危机。第三次便是全球当下经历的危机。论规模，本次危机可与一些严重的股市灾难相提并论，包括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本世纪初的科技股泡沫破裂和三次急性美元疲软，其中最近一轮发生在9月危机之前。

致使危机频繁出现的根源是金融机构对自身的监管不力，其必然导致在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埋下祸根。Minsky（1982）25年前指出，根本问题在于，金融市场繁荣时期，人们信心满满，金融机构也更愿意担越来越大的风险，使负债远大于当期收入，或从资产负债表

来说，杠杆越大，贷款创造的利润越高。这种繁荣时期的运行模式逻辑在于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允许有限的资本获得更多回报。而一旦市场繁荣不再，所有中介机构都将面临借款过多和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局面，这为借款方和金融中介之后的破产埋下伏笔。尽管该逻辑具有重复性，此次危机则堪称严峻的考验，说明即使是最完善的金融市场也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

上世纪末，由于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地区接连发生危机，很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经济崩溃，因此老派经济学家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即金融自由化必须在更谨慎有力的法规监管之下进行（自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都已采取此项措施）。然而这一建议却未被世界金融中心采纳，他们继续逐步放松管制。放松管制带来的结果包括，20世纪30年代订立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间的界限和对投资银行的资本要求分别于1999年和2004年被取消，这使得金融机构日后可以成倍利用杠杆作用。更有甚者，对于次级按揭及其证券化，金融衍生品的增值，特别是被称作信用违约掉期的新型信贷保险等“金融创新”根本没有任何法律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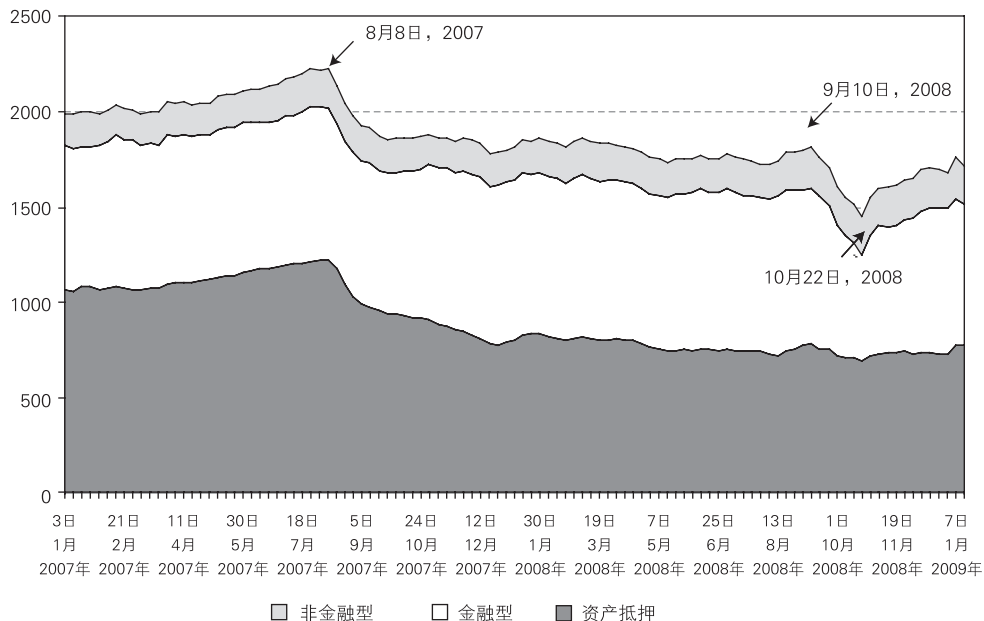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流通中的商业票据

(单位: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邦储备体系，华盛顿特区。

管。政府也无意控制监管最严格的机构（银行）持有日益扩大的表外金融资产，对冲基金等新兴金融中介根本不受任何约束。

除以上所述，许多非银行机构开始专做到期转换业务，即通过发行债券募集短期资金，再利用这笔资金进行长期贷款或投资，成为一种类似于“影子银行”的体系。这项本应由商业银行完成的功能，在危机当中造成巨大问题。银行挤兑是其造成最严重的后果之一，但尽管此次危机中该问题依然存在，由于储蓄保险已经普及，它有消失的倾向。然而，由于此类保险覆盖面有限，非银行机构不能办理，而且其保额很小，问题就转变为从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等项目中大量撤出资金。

金融主管机关一开始的应对措施是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减少央行对市场的干预，即大幅度削弱其作为最终贷款方的职能。为市场提供美联储贴现窗口贷款的举措最初是在2007年8月中旬提出，而不久前，抵押债券价格暴跌（图1显示了此次市场崩溃的一个方面，表现在商业票据证券化市场）。2007年9月，美联储首次下调了利率。在全世界主要的中央银行中，美联储与英格

兰银行在两方面都采取了大胆举措，而欧洲中央银行则选择了一条更为保守的路线。一段时间以后，信贷措施开始增加，之前未曾接触过这些措施的金融中介也可以加以利用。由于贝尔斯登破产，2008年3月，美国开始实施这一举措，投资银行可以申请美联储的专项贷款。

在危机第一阶段（从2007年8月中旬至2008年3月贝尔斯登破产），按揭证券市场迅速恶化。由于许多此类证券都在金融中介手中，并且未必会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导致双方对投资组合的可靠性产生怀疑，这种相互的不信任转化成危机中最致命的因素。美联储设立的信用额度一开始调节效果并不明显，直到2008年3月之后才逐渐发挥作用，也正因此，该月被视作危机第二阶段的起点。与此同时，美联储减持国债，私营企业则增持，这在总体上维持了投资组合的规模（表1）。截至2008年3月，政府大幅下调利率，达到3~4个百分点。下调范围包括短期国库券、银行间市场，以及银行储蓄与贷款利息，但资本市场（企业债券、各州和当地政府债券）和抵押相关投资的利率则保持不变（表2）。

2008年9月中旬的市场崩盘，标志着危机的第三阶

表1 美联储投资组合

（单位：10亿美元）

| 一周结束                                | 2007年<br>08/08 | 2008年<br>01/02 | 2008年<br>03/12 | 2008年<br>09/10 | 2008年<br>11/12 | 2009年<br>01/28 |
|-------------------------------------|----------------|----------------|----------------|----------------|----------------|----------------|
| 信贷总额                                | 850.6          | 891.7          | 869.2          | 888.3          | 2198.2         | 1989.9         |
| 非借入准备金                              | 787.3          | 724.1          | 697.5          | 361.7          | 271.2          | 376.2          |
| 私营企业所持信贷及有价证券                       | 22.3           | 102.0          | 130.5          | 428.1          | 1313.4         | 1105.4         |
| 传统信贷 <sup>a</sup>                   | 22.3           | 62.0           | 70.5           | 132.9          | 193.8          | 89.5           |
| 定期拍卖信贷                              |                | 40.0           | 60.0           | 150.0          | 415.3          | 415.9          |
| 联邦证券定期工具                            |                |                |                | 115.9          | 200.0          | 125.1          |
| 投资银行工具                              |                |                |                |                | 64.9           | 32.1           |
| 资产抵押商业票据                            |                |                |                |                | 80.2           | 14.6           |
| AIG所持信贷                             |                |                |                |                |                | 38.3           |
| 其他                                  |                |                |                |                | 82.3           | 0.0            |
| 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净商业票据投资组合                   |                |                |                |                | 249.9          | 316.2          |
| 梅登巷公司（Maiden Lane）的净投资 <sup>b</sup> |                |                |                | 29.3           | 26.9           | 27.0           |
| 梅登巷II和III的净投资 <sup>c</sup>          |                |                |                |                |                | 46.7           |
| 外币标价资产及其他<br>（央行流动性互换）              | 41.8           | 66.6           | 42.4           | 99.6           | 615.0          | 510.3          |
| 浮动                                  |                | -0.9           | -1.0           | -1.2           | -1.0           | -1.5           |
| -2.0                                |                |                |                |                |                |                |

注：<sup>a</sup> 具有回购协议、初级、次级和季节性贷款以及可隔夜拆借的国库券。

<sup>b</sup> 用于监管贝尔斯登集团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

<sup>c</sup> 用于监管AIG集团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

资料来源：联邦储备体系，《联邦储备数据快讯》，H.4.1华盛顿特区，2009年。

表2 美国：部分利率

| 一周结束              | 2007年<br>08/10 | 2008年<br>03/28 | 2008年<br>09/12 | 2008年<br>10/31    | 2009年<br>01/16 | 2009年<br>01/23 |
|-------------------|----------------|----------------|----------------|-------------------|----------------|----------------|
| 干预利率              |                |                |                |                   |                |                |
| 联邦基金              | 5.25           | 2.18           | 1.99           | 0.82              | 0.10           | 0.20           |
| 贴现率               | 6.25           | 2.50           | 2.25           | 1.68              | 0.50           | 0.50           |
| 银行间（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 5.43           | 2.67           | 2.82           | 4.70 <sup>a</sup> | 1.11           | 1.14           |
| 国库券               |                |                |                |                   |                |                |
| 1个月               | 4.82           | 1.22           | 1.53           | 0.28              | 0.04           | 0.03           |
| 10年               | 4.79           | 3.52           | 3.66           | 3.92              | 2.30           | 2.56           |
| 三个月定期存单<br>（次级市场） | 5.43           | 2.74           | 2.79           | 3.45              | 0.85           | 1.05           |
| 优惠贷款              | 8.25           | 5.25           | 5.00           | 4.43              | 3.25           | 3.25           |
| 企业债券              |                |                |                |                   |                |                |
| AAA               | 5.78           | 5.51           | 5.46           | 6.42              | 4.89           | 5.10           |
| BAA               | 6.66           | 6.93           | 7.05           | 9.49              | 7.97           | 8.15           |
| 州及当地政府债券          | 4.59           | 4.96           | 4.54           | 5.35              | 4.80           | 5.13           |
| 常规抵押贷款            | 6.59           | 5.85           | 5.93           | 6.46              | 4.96           | 5.12           |

注：<sup>a</sup>该周结束于2008年9月15日。

资料来源：联邦储备体系，《联邦储备数据快讯》，H.15华盛顿特区，1997年。

段开始，崩盘规模令政府和市场都深感意外。随着放贷停止，央行采取了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措施，包括决定通过一家由联邦政府支持的股份有限公司（实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管理的一项基金）购买商业票据。这一机制自三月份建立以来用于管理贝尔斯登集团的资产，随后计划用于管理AIG集团。这些措施将政策的着重点从支撑系统的流动性转向再次激活贷款体系。该目标逐渐为商业信贷（用于购买汽车、教育投入和信用卡）和抵押贷款带来更低的利率。

其结果之一就是新兴信贷工具的大量出现，覆盖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抵押贷款中介、共同基金甚至对冲基金。美联储对私营企业的放贷和收购的私营资产在9月10日那一周结束和11月12日那一周结束之间增加了近9000亿美元，并在后者当天达到最高点。此外，其还与世界其他央行订立了信用互换额度。在这短短两个多月里，美联储拥有的资产增加了1.3万亿美元（略超过GDP的9%）。这些资产都靠美联储的政府储蓄和剩余银行准备金来购买（全世界囤积流动资产行为的一个表现），如今这些资产产生利息。鉴于银行准备金是基础货币的一部分，后者在8~11月间增加了70%。其他工业国家的央行情况类似，不过规模稍小。

众央行的举措还辅以各国政府银行的救助计划。起先，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缺乏协作。在美国，执政党反对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助方案，该方案最终在反对派支持下，于10月初由国会通过。在欧洲，政府宣布一系列相互冲突的倡议，特别是在储蓄保险的问题上。大体说来，英国10月7日提出的措施为援助计划制定了议程。主要关注如何用公众的钱为金融机构积累资本，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国有化的竞争（其中包括美国的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AIG集团）。措施之二是增加储蓄保险和部分信用额度的政府担保，尤其是银行间的额度；之三则包括建立基金购买不良资产。尽管这些举措是在美国当初批准救助计划时的核心，但其后来遭到摒弃，因为购买形式复杂、种类繁多的证券困难重重。2008年11月末宣布的花旗银行援助计划和2009年1月英国提出的新一揽子计划则是上述第二种和第三种措施间的一条折中路线，即由政府出面担保金融机构所持不良资产带来的过度损失（或如花旗银行案例中的部分不良资产）。令人不解的是，直到2009年1月，援助计划中都没有提及如何救助借款人（特别是贫穷的抵押权人），尽管民主党部分议员不断施压，计划也未曾对破产法做任何修改，以便至少可就小额抵



押进行重新协商。

实行的措施纠正了10月中旬金融体系崩溃后产生的一些最突出的问题。银行间利率在危机后一个月内上涨了2个百分点，从10月中旬起趋于正常化（表2）。商业票据的发售也从10月22日的低谷中恢复过来（图1），美联储提供放贷工具的压力也从11月中旬起有所减轻（表1）。基础货币的增速有所放缓，但仍保持高位。2008年8月到2009年1月间共发放了855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近6%。<sup>1</sup>

同时，与施政方针相反，原定安全投资转移体现在降低短期国债利息上，使其成为代理货币，可是该过程恰好与市场汇率增高（亦可说是风险价差的大幅提高）相撞。然而从11月起，所有利率开始下调，其中长期国债的利率下调幅度最大。综合来说，美联储自2007年8月中旬以来利率下调了5~6个百分点，部分债券的利息仍高于以往（评级较低的企业债券和联邦与本地政府债券），其他的只是微微下调（评级高的企业债券）。

这意味着，尽管美国政府竭尽全力克服流动性缺乏这一第三阶段的主要问题，但自2009年1月以来其并未成功激活贷方市场。相反，该市场在2008年末随着银行贷款也遭冲击而开始全面萎缩。为银行注入公共资本是重建系统稳定性的关键措施，但自2009年初起，这一过程显然还未结束，甚至可能导致大量机构彻底国有化，该现象在英国尤为明显，在美国和部分欧洲大陆国家也有所显现。同时在经济产出尚未恢复之前，还很难确定资本化运动能否带来更具活力的贷款行为。

同时，经济活动大幅减少，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工业国家的经济活动每年减少5%~6%。<sup>2</sup>分析家一致认为美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该国实际上已陷入“流动性陷阱”，最主要表现在囤积了大多数流动证券（包括商业银行的储蓄额超过了美联储总额），而且短期国债需求强劲。因此，人们转而将目光投向先前提到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即强调激活借贷，减少借贷成本，和财政一揽子计划。美国的这项

计划规模最大，价值8000亿美元，略低于GDP的6%。其他国家的央行则坚持降低利率的政策，该政策在欧洲仍不完善。

对于近期事件做个总结，以金融体系流动性全面冻结为特征的危机第三阶段之后，第四阶段于11月开始。在该阶段，上述问题已不复存在，但金融机构仍然面临资金严重短缺、信贷活动十分有限的问题，此时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国家的生产活动崩溃，连带拖累其他国家。

2009年的走向取决于这些事件如何发展。2008年末，绝大多数预测都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国家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有所好转。这是一种乐观的预期。回顾发达国家过去的经历，例如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和日本20世纪末的“迷失的一代”，都表明了这场涉及去杠杆化和资产负债表根本性调整的危机中，经济衰退的影响将深远且长久。对2008年的预测，只有联合国发布的悲观预期被证实是准确的。这份报告称衰退会贯穿2009年全年，工业国家的GDP下降1.5%，全世界的总GDP下降0.4%（联合国，2009，表1.1）。考虑到最近发布的经济活动数据（有数据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第四季度明显放缓），连这种预期都显得乐观。即使通常位于最乐观预测机构之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1月末称全球GDP市价将下降的0.6%，比2个月前给出的数据降低了近2个百分点。而私营企业的预测则更加消极。

需要强调的是，一个贯穿危机始终的主要问题是国际政府间缺乏协作，除了各央行采取错似乎改善流动性供给之外。最近一个缺乏协作的例证便是欧洲就实施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无法达成共识。无论如何，必须记住的是，欧洲拥有比美国更好的自动稳定因素（尤其是更为慷慨的失业保险），因此美国必须采取更积极、更宽松的财政政策。人们同样在不断讨论是否一揽子财政计划应当着重于扩大支出，保证总体需求，或者纳入在保证总需求上不确定性更强的税收措施。

有一点非常清楚：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及管理金融全球化，制度的完善不可或缺。实际上，此次危机也揭示了在欧洲甚至美国建立新的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就美国来说，其审慎监管体系异常复杂，牵涉到众多联邦和州级政府机构。

1 根据美联储H.3系列报告，2009年1月最后两周的基础货币为1.698万亿美元，是2008年8月数据8430亿美元的两倍多。

2 1月30日的统计数据显示上一季度美国GDP下降了3.8%，但分析家认为实际上下降得更多。



### 三、经济危机传播的外部渠道

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述，2003~2007年，拉丁美洲强劲的经济增长归功于金融业的繁荣、商品价格的上涨以及移民劳工带来的大量汇款。然而，也正是这些带动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发生了逆转，才导致其成为将经济危机引入拉丁美洲的外部渠道。

#### 1. 汇款

在上述三种渠道中，有关移民劳工汇款的信息最不完整。然而，拉丁美洲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统计数据审查报告清楚地表明，移民汇款在2006年结束了其快速增长的势头。在过去的两年间，汇款的增长减缓了许多（平均增长率为3%），2008年墨西哥的移民汇款甚至还出现了一定的收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建筑业的衰退对移民劳工来说是最主要的危机传播渠道，因为在美国建筑工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墨西哥移民（达到13.8%，几乎是美国劳工市场中占到5.1%的墨西哥工人比例的3倍）（摩根大通，2008）。同样，西班牙主要吸收来自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工人，不景气的建筑业也影响了拉丁美洲的经济。

然而，总体来说，外来汇款不太可能有大幅的减少。世界银行2009年的预测认为汇款数额只会停滞（Ratha、Mohapatra和Xu，2008）。此外，如果收款国的货币贬值，汇款的购买力还会增加。因而出现了这种奇特的现象：汇款的持续可能对家庭消费有稳定作用。

#### 2. 国际贸易

在2003~2006年的繁荣发展期，世界贸易量每年增长9.3%，增速是全球GDP市价增长的两倍多（3.8%）（美国，2009，表I.1）。但是，贸易量的增长率对商业周期非常敏感，因此比全球GDP更加不稳定。所以，国际贸易能反映生产活动好转或衰退。2007年和2008年，贸易增长大幅下降，至2008年9月，增长率仅为2%（参看：美国，2009年，图I.9）。事实上，现有的部分数据表明，世界贸易在2008年第四季度已经收缩。世界银行预测（2009，表I.1）2009年贸易会减少2.1%，而联合国的悲观预测显示（2009，表I.1）将减少3.1%。

贸易量收缩将是给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带来危机

表3 商品实际价格

（根据生产价格指数平减，1945~1980 = 100）

|           | 非石油类总价 | 农业总价  | 热带农业  | 其他农业  | 金属    | 石油    |
|-----------|--------|-------|-------|-------|-------|-------|
| 1945~1970 | 98.4   | 98.9  | 100.1 | 97.5  | 96.4  | 64.6  |
| 1971~1980 | 104.1  | 103.0 | 99.6  | 106.4 | 109.4 | 192.1 |
| 1981~1990 | 81.1   | 75.5  | 63.1  | 88.2  | 106.6 | 246.3 |
| 1991~1997 | 75.3   | 73.7  | 57.9  | 89.9  | 82.4  | 139.5 |
| 1998~2003 | 69.4   | 67.0  | 50.7  | 83.6  | 80.4  | 193.7 |
| 2004      | 75.1   | 69.1  | 52.8  | 85.7  | 102.8 | 290.7 |
| 2005      | 80.3   | 72.1  | 59.5  | 84.9  | 118.3 | 410.7 |
| 2006      | 96.0   | 76.1  | 63.8  | 88.5  | 187.8 | 487.0 |
| 2007      | 102.4  | 80.7  | 69.7  | 91.9  | 202.3 | 518.7 |
| 2008-I    | 121.0  | 100.8 | 94.2  | 107.5 | 214.0 | 687.3 |
| 2008-II   | 123.3  | 102.1 | 99.1  | 105.0 | 221.5 | 860.7 |
| 2008-III  | 112.7  | 94.2  | 88.5  | 100.0 | 198.1 | 810.0 |
| 2008-Oct. | 87.9   | 77.3  | 66.6  | 88.2  | 137.0 | 503.4 |
| 2008-Nov. | 80.3   | 72.6  | 58.3  | 87.0  | 116.3 | 374.2 |

资料来源：José Antonio Ocampo和MaríaÁngela Parra，“二十世纪商品贸易条件”，《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评论》（CEPAL REVIEW），第79期（LC/G.2200-P）圣地亚哥，智利，2003年4月，笔者根据同一来源进行过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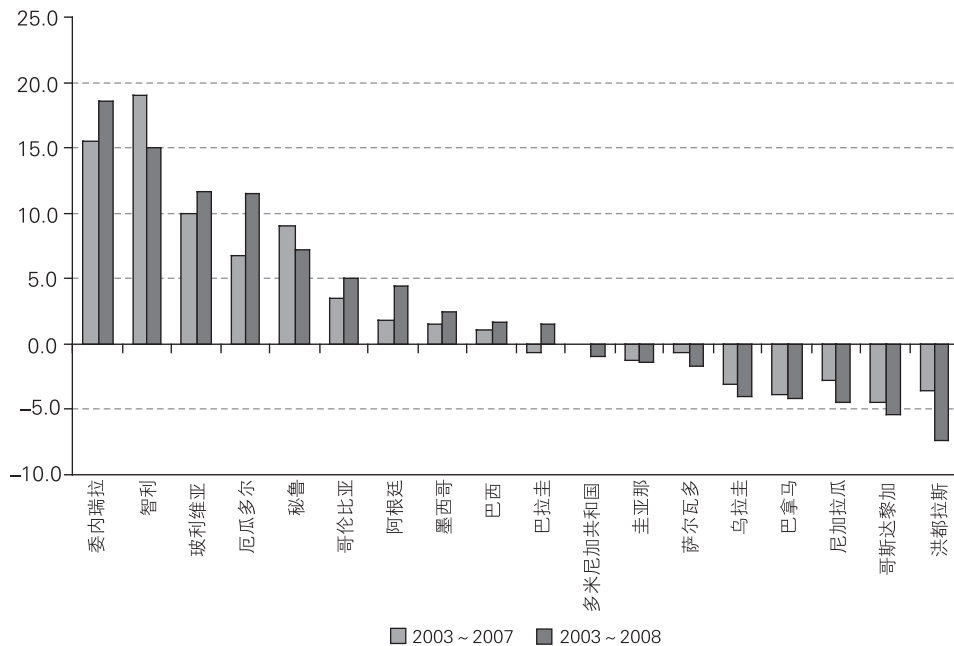


图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部分选定国家）：贸易条件收益及损失  
（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的资料整理而成。

的主要原因，然而受影响最大的将是那些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要出口结构的国家，例如墨西哥、中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反过来，商品价格变化趋势将是南美国家出口的决定性因素。

近年来，不论从期限（5年）或者强度和广度来看，世界经济均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可观的商品价格上涨（参看：世界银行，2009，第2章）。如表3所示，上涨主要集中在能源商品等工矿产品，而不是农产品。从事实数据中可以看出，在高峰期，即2008年第二季度，矿产品的真实价格远远高于其20世纪70年代的价格（事实上，相较于金属，能源产品的情况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勉强达到那个时期的水平。

这种情况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工矿商品的出口商经历了迄今为止贸易方面的最大改善，而农产品出口商的贸易只是或多或少处于稳定状态，制成品出口商的贸易条件则恶化了（联合国，2009，图II.6）。在拉丁美洲，贸易方面改善最显著的主要是安第斯国家，如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智

利，他们都是工矿产品的主要出口国<sup>3</sup>；而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这些农产品出口国的情况仅获得小小的改善，即使在2008年也是如此。同时，所有中美洲国家，加上乌拉圭，都是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他们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而结合了主要制造业出口和石油对外销售的墨西哥，其贸易条件略有改善（图2）

矿产和农业商品的不同表明决定这两类产品价格的因素不尽相同。就能源和矿产产品而言，主要的价格决定因素是低投资率，原因在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到21世纪初，该类商品的市场价格一直疲软。过去五年中，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其中包括中国对金属的大量需求），带动了高需求，引发价格大幅上涨。投资响应积极，但在所有的采矿项目中，投资决策制定和产出提高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问题。就农业而言，尽管2008年上半年粮食危机敲响警钟，供需不平衡要温和得

3 有些评论家没有将哥伦比亚纳入该模式，但事实上该国出口产品的2/5是能源商品（石油和煤炭）以及金属（镍和金）。

多。农业领域受危机影响的渠道就是高价能源导致农业商品价格坚挺，而这些农业商品则用于生物燃料的生产（Von Braun, 2007）。

商品价格在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高涨，美元贬值以及金融投机导致价格更高，于2008年年中左右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也就是在该年9月金融崩溃之前。由于信用体系的崩塌，商品价格，特别是能源和矿业商品的价格开始一落千丈。尽管如此，截至11月，它们的价格实际上仍然高于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热带农业商品的价格却恰恰相反，跌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最低水平。温带商品价格的跌幅则较为缓和。

商品价格的前景并不乐观。截至11月，它们已经跌破了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2009，表I.4），即：2009年能源商品价格的跌幅为25%，非能源商品价格的跌幅为23%。如累计11月以来的跌幅，还需要加上12月商品价格最新的下降数值。

国际贸易的减少可能是将全球金融危机传播到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渠道。鉴于目前拉丁美洲的经济贸易比以前开放许多，因此受到危机的影响不可避免。这一过程也会带来好处，主要是石油进口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形势将得到反转。历史经验表明，危机中也包含机遇，因为在多样化的生产结构中更具竞争力的汇率会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为了抓紧这些机遇，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需要为此类产品制定更积极的生产发展政策（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最新消息，2008a）。

### 3. 资本流动

过去4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动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因素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银行为公共部门提供贷款，而20世纪90年代，银行的作用被国际债券的发行所取代，最近的繁荣期内则由证券投资资本组合所取代。

通过审阅拉丁美洲领先经济体的外部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近期增长中金融流动本质（表4）<sup>4</sup>。其中，有

两个重大改变。首先是资产增长，特别是国际储备，但也包括国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按照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七个受分析国家在该方面的增速都超越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2003~2007年之间几乎翻了一番）。其次是负债的组成发生了明显转变，主要特点是借贷减少，投资组合负债增加。后者包括国际投资基金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投资，这些国际投资基金同样也参与本地的债券市场。这个过程必然促进了国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繁荣，债券市场2001~2007年的扩大幅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sup>5</sup>。本文稍后会研究股市的估值。

这些外部资产负债表的另外两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资产价格上涨和负债下降的综合效应意味着外部金融负债净值的大幅下降，其在2003~2007年间的下降幅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此外，该地区七个最大经济体都具备该特征。截至2007年底，其中三国（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净财务状况良好，另外两国（哥伦比亚和秘鲁）接近平衡状态。其次，如果同债务负债相比，储备积累看起来非常坚实，但如果同所有组合负债相比，则要少很多。这表明，储备积累可能抵销本类负债的积累。2007年底，在拉丁美洲最大的两国中，储备仅涵盖了组合负债相对较小的一部分，而另外四国（处于更强势地位的墨西哥，智利、秘鲁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近年来的增长速度比负债更缓慢。

外部资产负债表的改善毫无疑问是拉丁美洲地区最大的优势，因为它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十分乐观。特别是这意味着高额外部公共借款将来不会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或者更准确的说，它仅会影响到少数几个国家。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证券投资流动——即外部融资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再次被证明非常不稳定。此外，以后会发现一些私营公司的借款已成为不稳定性的新来源。

在整个繁荣期，外部融资作为该地区平衡国际收支盈余的来源，其相对重要性有提高的趋势。2002年年中和2004年年中之间，资本帐户余额几乎是零，此后资本帐户逐渐恢复并开始超过经常账目余额，成为

4 如需近年进入拉丁美洲的外部资金流动的详细分析，请参见Jara和Tovar（2008）以及Ocampo（2007）。

5 Ocampo和Tovar（2008）提供了近十年来拉丁美洲国家债券市场发展更加详细的分析。

**表4 拉丁美洲（7个国家）：外部资产负债表**  
（根据当前价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
| <b>资产</b>             |       |       |       |       |       |       |       |
| 总计 <sup>a</sup>       | 26.5  | 29.7  | 31.9  | 31.5  | 31.4  | 32.4  | 37.5  |
| 国外直接投资                | 5.8   | 6.9   | 7.0   | 7.2   | 7.0   | 7.5   | 7.9   |
| 投资组合资产                | 2.1   | 2.4   | 3.2   | 3.2   | 3.5   | 3.9   | 4.8   |
| 衍生性金融商品               | 0.0   | 0.0   | 0.0   | 0.1   | 0.0   | 0.0   | 0.0   |
| 其他投资                  | 12.1  | 13.3  | 13.4  | 12.6  | 11.4  | 10.8  | 12.5  |
| 国际储备 <sup>a</sup>     | 6.6   | 7.1   | 8.3   | 8.5   | 9.5   | 10.0  | 12.3  |
| <b>负债</b>             |       |       |       |       |       |       |       |
| 总计 <sup>a</sup>       | 62.4  | 65.4  | 70.4  | 66.4  | 61.5  | 60.3  | 65.6  |
| 国外直接投资                | 24.5  | 25.5  | 28.6  | 28.1  | 26.7  | 25.6  | 27.2  |
| 投资组合负债                | 19.8  | 20.1  | 23.1  | 22.9  | 22.8  | 23.8  | 28.0  |
| 股份                    | 5.5   | 4.9   | 7.2   | 8.4   | 10.4  | 13.0  | 16.9  |
| 债务                    | 14.3  | 15.2  | 15.9  | 14.5  | 12.3  | 10.9  | 11.1  |
| 衍生性金融商品               | 0.0   | 0.0   | 0.0   | 0.1   | 0.1   | 0.2   | 0.3   |
| 其他投资 <sup>a</sup>     | 18.0  | 19.8  | 18.6  | 15.4  | 11.9  | 10.7  | 10.2  |
| <b>资产—负债</b>          |       |       |       |       |       |       |       |
| 直接投资                  | -35.8 | -35.7 | -38.4 | -34.9 | -30.1 | -27.9 | -28.1 |
| 金融                    | -18.8 | -18.6 | -21.6 | -20.9 | -19.7 | -18.0 | -19.2 |
| 金融                    | -17.1 | -17.1 | -16.8 | -14.0 | -10.4 | -9.9  | -8.9  |
| <b>债务的百分比储备</b>       | 20.3  | 20.4  | 24.0  | 28.3  | 39.1  | 46.5  | 57.9  |
| <b>投资组合负债的百分比储备</b>   | 33.1  | 35.5  | 35.9  | 37.0  | 41.6  | 42.1  | 44.0  |
| <b>国内资本市场占GDP的百分比</b> | 34.2  | 32.1  | 38.7  | 39.8  | 43.8  | 44.5  | 49.1  |
| <b>金融资产—负债</b>        |       |       |       |       |       |       |       |
| 阿根廷                   | -0.3  | 19.8  | 20.1  | 22.0  | 29.5  | 26.2  | 29.0  |
| 巴西                    | -34.9 | -36.4 | -35.2 | -31.0 | -24.1 | -23.8 | -28.9 |
| 智利                    | -3.2  | -1.5  | 3.9   | 13.5  | 17.3  | 27.6  | 42.7  |
| 哥伦比亚                  | -13.8 | -13.6 | -14.5 | -10.2 | -5.2  | -3.1  | -0.9  |
| 墨西哥                   | -17.6 | -16.7 | -18.6 | -18.4 | -19.3 | -21.1 | -16.7 |
| 秘鲁                    | -29.4 | -27.9 | -26.4 | -21.3 | -14.4 | -7.6  | -6.8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23.9  | 35.9  | 48.7  | 44.6  | 49.3  | 50.8  | 51.3  |
| <b>投资组合负债的百分比储备</b>   |       |       |       |       |       |       |       |
| 阿根廷                   | 2.2   | -14.2 | 1.7   | 19.6  | 67.6  | 72.8  | 93.4  |
| 巴西                    | 18.1  | 13.1  | 13.6  | 15.7  | 23.1  | 28.6  | 35.4  |
| 智利                    | 142.4 | 145.8 | 108.3 | 98.9  | 93.3  | 98.3  | 83.6  |
| 哥伦比亚                  | 78.8  | 88.1  | 84.2  | 91.8  | 102.7 | 96.8  | 114.6 |
| 墨西哥                   | 30.8  | 41.6  | 42.7  | 39.0  | 35.8  | 30.0  | 29.0  |
| 秘鲁                    | 131.1 | 125.4 | 105.2 | 114.4 | 91.7  | 98.2  | 97.5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131.1 | 125.4 | 105.2 | 114.4 | 91.7  | 98.2  | 97.5  |

注：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美元数据来自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国内资本市场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关于7个最大的经济体（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以及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sup>a</sup>这些账户中已扣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负债价值。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金融统计》在线资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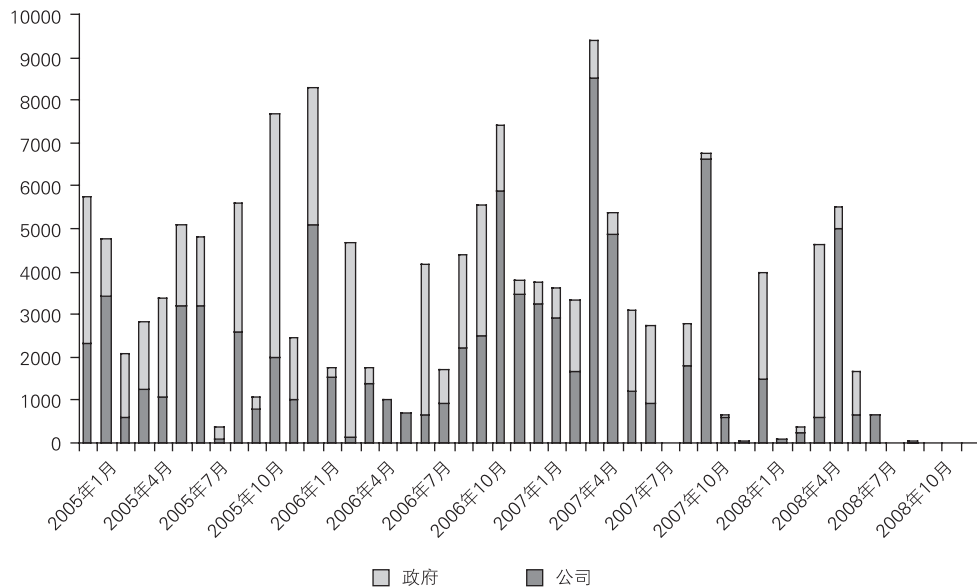


图3 国际市场上的债券发行  
(单位: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以摩根大通公司的数据为基础。

国际收支盈余的来源。自2006年年中至2007年年中, 资本开始真正大量涌入。在拉丁美洲地区七个最大国家中(除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外), 六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在2006年第四季度和2007年上半年接近1130亿美元, 其中1000亿美元属于资本账户(巴西约占其中的2/3, 其余分属其他五个经济体)(Ocampo, 2007)。

图3记录了拉丁美洲每月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债券, 证实其融资量在2006年年中至2007年年中达到顶峰。在这期间, 融资上升但不稳定, 而民营企业的主导地位提高(约占所有发行的70%)。总体来说, 与政府债券相比, 企业发行的成本较高, 平均期限较短, 因而需要更频繁的债务展期。由于上述原因, 他们更易受到资本可用性波动的影响。

图4展示了繁荣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外部融资成本的大幅下降。从2004年年中起, 拉丁美洲债券的国家风险利差总体而言与新兴市场相似, 比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要低。不仅如此, 这些利差起初比新兴市场的平

均水平要宽, 却有接近平均水平的趋势。与此同时, 虽然美联储的利率同期也在上升(从2004年9月起), 但对于长期国库券的利率——以国际债券市场上价格制定的基准而言, 其所受影响并不大。结果, 利差下降引发外部融资成本的急剧下降, 从2004年上半年的10%降到2007年4月和5月的最低点——略低于7%。这一趋势经历过两次改变: 其一在2005年3月, 受到所有市场利率上升的影响; 其二是在2006年第二季度, 以上海为中心引发的具体新兴市场冲击。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整个地区都经历了融资成本的降低, 尽管有两个国家(智利和墨西哥)在繁荣期之前就被认为是低风险国家, 他们的融资成本降低的不多。

这次金融市场的危机通过三种不同的渠道传入拉丁美洲。首先是通过外部融资成本的降低迫使国内利息率下调。其次(有时也是补充因素)就是这种压力体现在汇率上。最后, 强劲的风险偏好带来股市的膨胀。拉丁美洲股市的黄金期始于2004年年中, 当时该地区国家的风险利差开始急剧下降。按照美元价格的平均计算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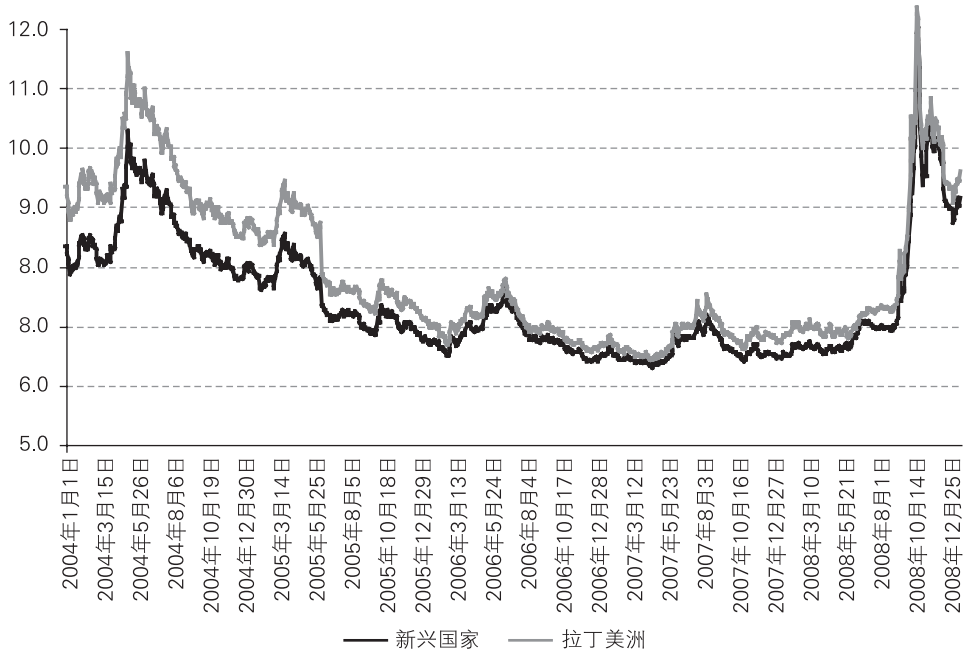


图4 拉丁美洲和新兴国家：主权债券收益率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摩根大通公司的数据整理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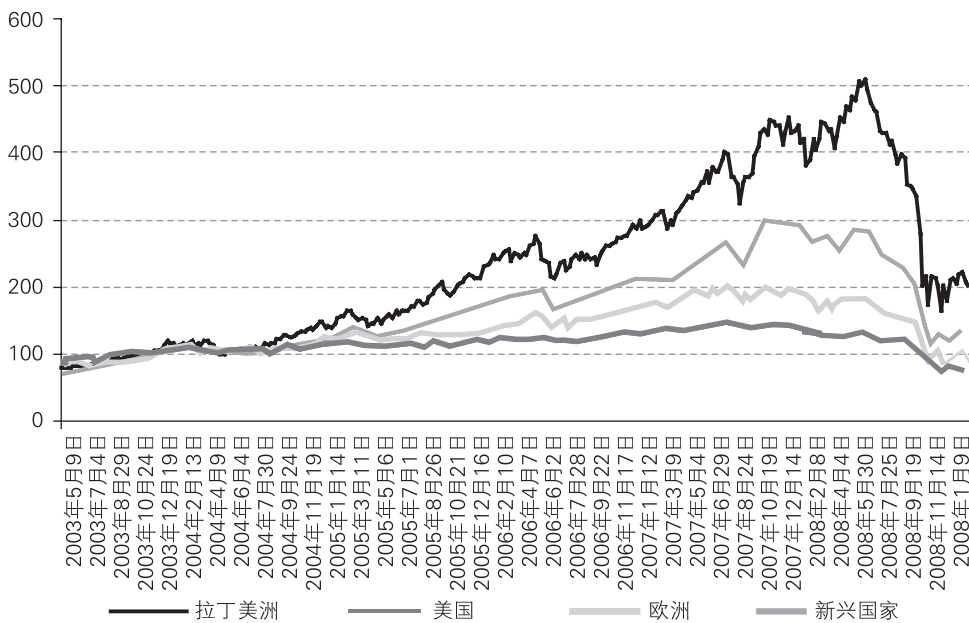


图5 股市

(2003年7月~2004年6月 = 10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摩根士丹利公司的数据整理而成。



来，该地区七个最大经济体的股票价格在2004年年中至2007年年中这段时间翻了两番（参见图5）。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以各种复杂的方式蔓延开来，并对该地区各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最初的影响是在2007年第三季度，主要体现在资本流动和债券发行的大幅下降（参见图3）、融资成本的平稳上升（参见图4）以及股市同样平稳的下降，其随后立即上升（图5）。同2006年5月至7月发生的市场冲击相比，2007年7月至9月间的利差波动相对更大，但其影响却多种多样。利差的增加和波动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幅度最大，这恰好显示出一种反映所谓“政治风险”元素的模式。同时，在巴西和哥伦比亚，正如2006年5月至7月一样，汇率对利差的短期走势十分敏感；在墨西哥，这两个变量之间也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是波动幅度要小很多。智利和秘鲁是受影响最小的两个经济体（表5）。

然而，紧随这次动荡之后的是一个“小阳春”——在此期间，融资成本再度回落，资金流动回续。但是，从每月债券发行中可以看出，后者并没有上升到原来的水平，而且变得更加没有规律。同全球模式（在2007年10月短暂的复苏后开始下降）相反，拉丁美洲的股票价格（以美元计算）恢复了上升趋势并于2008年5月达到顶峰，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巴西雷亚尔强劲升值的影响。

2008年6月，市场再次受挫，明显早于当年9月的金融崩溃。事实上，这同商品价格上涨的逆反趋势相符。这正是因为许多拉丁美洲新兴的跨国公司是工业商品（例如钢铁和水泥）生产商。6月和7月，债券发行锐减，8月之后就市场上消失了。到2008年9月经济崩溃之时，融资成本已经上涨了0.5个百分点。利差波动则保持了其在2007年第三季度市场冲击来临时的相同水平。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与其他几个大国情况不同，而巴西和哥伦比亚的汇率则再次被证明十分不稳定。股市急剧下跌，然而在九月震荡之前仍然保持着是2004年年中3.5倍的平均水平。

2008年9月中旬的金融崩溃大大增强了这些趋势。<sup>6</sup>

各种贷款枯竭，资本则通过一些令人无法预料的渠道撤出拉丁美洲：美国赎回作为互惠基金和对冲基金存款全球抛售的证券，日本贸易业务活动终止，受益者之一是巴西。这导致拉丁美洲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而美元和日元在国际市场上升值。此外，汇率浮动造成期货市场大面积亏损，特别是在巴西和墨西哥。虽然拉丁美洲在2008年第四季度净资产外流总额尚且未知，但是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储备损失已反映出了当时的情况。其他影响则非常明确：融资成本大幅上涨（图4），股市比发达国家的跌幅还大（图5）；利差变得十分不稳定，其与汇率走势的关联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变得更加紧密（表5）；巴西、智利和墨西哥成为了汇率最不稳定的国家，而哥伦比亚的汇率比先前几次震荡时要表现得更加稳定，其原因可能是该国要求流入资本具有法定准备金，这减少了更加不稳定资本的数额；阿根廷及委内瑞拉同其他拉丁美洲重要经济体间的利差差距明显拉大，达到十个或以上百分点。

与美国利率走势相一致（表2），融资成本在10月末达到顶峰（10月23日为12.35%），随后开始降低，并在12月月中趋于稳定，保持在9%~10%之间。这一水平同2004年开始的繁荣期之前的成本水平相差不大，并且比美国金融危机前公认的正常水平高出2~3个百分点。对货币市场的最大压力也出现在9月中和10月末；尽管自此货币贬值幅度减小，市场依旧十分不稳定。股市也有稳定的趋势。事实上，与其他市场的情况恰好相反，拉丁美洲国家的股市要比2004年年中表现得更好（图5）。

美国金融危机第三阶段内的市场流动性完全不足，虽然已有从危机中恢复的表象，其长久影响依然存在。目前所有的预测都表明，私人资本流动在不久的将来还会保持在较低水平。例如国际金融研究所预测（2009），同2007年超过6000亿美元的资金净流入相比，2009年进入所有新兴经济体的民间借贷资金不被看好，不过，2008年发生的证券投资资本外流的现象将得到遏制。所有研究都表明，拉丁美洲地区主要的私营公司如果试图滚转其债务，会引发最大的经济问题（摩根大通，2009）。因此，资本账户的主要弱点就是这些公司对工业商品的过分依赖以及金融期限的大幅缩短。

6 近期Bustillo和Velloso (2009)撰写的一篇文章详细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拉丁美洲经济体影响。

这些问题，加上金融危机引起的重大不确定因素，表明私营部门外部融资的不足状况将持续一段时间。然而，由于储备水平和外部债务的起始条件较好，因此拉丁美洲的资本账户危机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严重。除此

之外，新形势下一个有利的副作用就是减轻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繁荣期面临的货币升值的强大压力。这几个题目将是下一部分的重点。

表 5 拉丁美洲（部分选定国家）：动荡时期的汇率及风险利差波动

|                     | 阿根廷     | 巴西    | 智利    | 哥伦比亚  | 墨西哥   | 秘鲁     | 委内瑞拉<br>玻利瓦尔<br>共和国 | EMBI + |
|---------------------|---------|-------|-------|-------|-------|--------|---------------------|--------|
| 风险利差波动 <sup>a</sup> |         |       |       |       |       |        |                     |        |
| 2006年5~7月           | 26.2    | 19.6  | 3.6   | 27.7  | 14.7  | 10.1   | 20.9                | 16.4   |
| 2007年7~9月           | 60.6    | 21.9  | 14.5  | 31.6  | 15.0  | 23.5   | 64.6                | 25.0   |
| 2008年6月~9月12日       | 58.5    | 24.2  | 7.0   | 24.3  | 22.1  | 24.0   | 48.0                | 24.5   |
| 2008年9月15日~2009年1月  | 352.4   | 79.4  | 61.4  | 104.7 | 82.4  | 92.6   | 306.6               | 126.5  |
| 平均利差                |         |       |       |       |       |        |                     |        |
| 2006年5~7月           | 362.8   | 249.3 | 81.0  | 215.4 | 134.3 | 167.5  | 207.6               |        |
| 2007年7~9月           | 414.2   | 187.3 | 105.6 | 167.3 | 111.9 | 151.3  | 389.2               |        |
| 2008年6月~9月12日       | 632.5   | 226.5 | 173.0 | 211.5 | 168.5 | 190.1  | 623.4               |        |
| 2008年9月15日~2009年1月  | 1 572.6 | 450.7 | 323.5 | 502.6 | 384.0 | 470.1  | 1 492.2             |        |
| 汇率波动 <sup>b</sup>   |         |       |       |       |       |        |                     |        |
| 2006年5~7月           | 0.56    | 3.24  | 2.11  | 3.12  | 1.81  | 0.57   | 2.24                |        |
| 2007年7~9月           | 0.78    | 2.95  | 0.91  | 4.51  | 1.21  | 0.57   | 0.00                |        |
| 2008年6月~9月12日       | 0.59    | 3.16  | 2.74  | 5.99  | 1.55  | 2.17   | 0.00                |        |
| 2008年9月15日~2009年1月  | 3.63    | 8.20  | 6.28  | 3.64  | 7.70  | 1.86   | 0.00                |        |
| 平均汇率                |         |       |       |       |       |        |                     |        |
| 2006年5~7月           | 3.07    | 2.20  | 535   | 2494  | 11.16 | 3.26   | 2.59                |        |
| 2007年7~9月           | 3.14    | 1.92  | 520   | 2041  | 10.96 | 3.15   | 2.15                |        |
| 2008年6月~9月12日       | 3.03    | 1.62  | 507   | 1818  | 10.26 | 2.89   | 2.15                |        |
| 2008年9月15日~2009年1月  | 3.32    | 2.23  | 628   | 2260  | 12.87 | 3.09   | 2.15                |        |
| 汇率同EMBI+间的比率        |         |       |       |       |       |        |                     |        |
| 2006年5~7月           | 0.789   | 0.832 | 0.796 | 0.885 | 0.755 | -0.388 | 0.477               |        |
| 2007年7~9月           | 0.818   | 0.658 | 0.364 | 0.789 | 0.930 | 0.059  | 0.000               |        |
| 2008年6月~9月12日       | -0.145  | 0.440 | 0.752 | 0.788 | 0.177 | 0.375  | 0.000               |        |
| 2008年9月15日~2009年1月  | 0.751   | 0.876 | 0.901 | 0.678 | 0.901 | 0.808  | 0.000               |        |

注：EMBI = 新兴市场债券指数。

<sup>a</sup> 标准偏差。

<sup>b</sup> 变异系数。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摩根大通公司数据整理而成。

## 四、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缺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不仅是几次重大外部冲击（好坏都有），还有各国施行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不但未能减弱这些冲击对国内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反而有扩大其作用的趋势，比如一些顺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这种行为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在商业周期的有利阶段产生一系列经济缺陷，主要以公共或私营部门赤字的形式存在，这将导致大量借贷以及相应的当前国际收支平衡账户赤字，再加上本国货币的高估，使形势更加恶化。这些经济缺陷在外部情况恶化时显露无遗，此时各国不得不做出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如实行财政紧缩（包括各种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的组合政策），推出货币和信贷限制政策以及对汇率进行大幅调整。

同类似历史事件相比，人们一直认为是近期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体现在宏观经济的均衡获得了更高的优先权（联合国拉加经委会，2008c）。这个论点的支持者以拉丁美洲地区繁荣期的特点为论据，即更加健全的公共账户和富余的经常项目。

然而，对拉丁美洲近期经济史的这一解读还需要得到其他各方面的证明。笔者认为，美洲发展银行（IDB，2008）的观点更为符合现实，其主要以Izquierdo, Romero和Talvi三人的分析为基础（2008），笔者在先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持同样的观点（Ocampo，2007）。根据该观点，近期经济的良好发展主要由外部因素驱动，因为总体看来经济政策依然是顺周期性。过去，最重要且普遍的差异在于公共部门外部借款更少以及国际储备的建设。

表6概述了财政指标的发展。如表所示，2008年只有巴西、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三国的中央财政赤字超过了2%。此外，几乎所有国家的中央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比前一危机开始时低许多，巴西和哥伦比亚再次例外，也不包括阿根廷和乌拉圭。然而，这些积极的财政结果主要是由于公共部门的超额收入而不是保持顺周期性的支出政策，有一些例外情况。<sup>7</sup>其中

最值得注意的国家是智利。近十年来，智利对其财政账户一直秉承结构平衡规则，并在经济繁荣期通过两个稳定基金来加强这一政策的贯彻实施。这两个稳定基金分别是经济社会稳定基金和养老金储备基金，旨在拯救高铜价产生的财政盈余。

如表6所示，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主要支出GDP弹性指数都大于1。然而，根据反周期规则，在经济上升期，支出的增加应当大大小于GDP，也就是说GDP弹性指数应该小于1。除智利以外，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也是例外。尽管还有其他弹性指数小于1的国家，但是他们在繁荣期的实际主要支出增长已超过其长期增长率。

上世纪90年代末，各国制定很多财政责任法并建立了新的稳定基金，引入了一个复杂的机构体制。这同上述财政政策的顺周期行为恰好相反。规则在不断变化，提前指定资源利用的实践方式也表明，至今为止这些财政机构的作用已经受到限制（Jiménez和Tromben，2006）。

外部账户的发展模式也表明政策方针未能有效创造国际收支顺差。贸易的迅速改善再一次成为决定性的外部因素。图6对整个地区经常项目平衡做出了估计，并区分是否进行过贸易条件调整。经过调整的项目，其基准年是经济繁荣期的前一年，如2003年。如图所示，经常项目盈余全是基于贸易条件的改善。这一变量的调整也导致经常项目在整个经济繁荣期的赤字不断增长，并且在2008年达到GDP的5%。这个数字要远远高出拉丁美洲各国在20世纪末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

表7提供了一个更详细的全景图。如表所示，至2008年，唯一取得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家是三个氢碳化合物出口国（即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阿根廷。另外两个以矿产商品为基础出口品的国家（智利和秘鲁）到2007年还有盈余，但是2008年却急剧下降。如表7所示，如果进行调整，改变贸易条件，这两个国家2007年已经开始有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巴西的情况也类似，尽管该国的初始盈余较为稳定。2008年进行贸易条件调整且有经常项目盈余的

7 参看美洲发展银行（IDB，2008，第3章）。拉加经委会的一项研究（2008b，第4章）也包含一些有关此议题的重要看法。

表 6 拉丁美洲：财政指标  
(百分比)

|             | 中央政府盈余或赤字<br>(GDP百分比) |      | 中央政府债务<br>(GDP百分比) |      |                 | 实际主要支出增长<br>2003~2007 |
|-------------|-----------------------|------|--------------------|------|-----------------|-----------------------|
|             | 2007                  | 2008 | 2007               | 2008 | 变化<br>1998~2008 |                       |
| 阿根廷         | 0.6                   | 1.0  | 55.7               | 48.0 | 10.4            | 11.9                  |
|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 2.3                   | 3.0  | 37.1               | 30.7 | -24.4           | 5.0                   |
| 巴西          | -2.0                  | -2.6 | 32.7               | 30.1 | 5.9             | 9.0                   |
| 智利          | 8.8                   | 6.9  | 4.1                | 3.5  | -8.6            | 2.5                   |
| 哥伦比亚        | -3.0                  | -2.7 | 35.2               | 33.2 | 11.1            | 7.9                   |
| 哥斯达黎加       | 0.6                   | -0.5 | 27.7               | 23.5 | -19.4           | 5.1                   |
| 厄瓜多尔        | -0.1                  | -0.1 | 27.5               | 22.6 | -34.4           | 10.3                  |
| 萨尔瓦多        | -0.2                  | -0.6 | 34.5               | 31.2 | -2.1            | 0.4                   |
| 危地马拉        | -1.5                  | -1.2 | 21.7               | 19.3 | 2.9             | 2.9                   |
| 洪都拉斯        | -2.9                  | -1.9 | 17.4               | 17.4 | -57.6           | 7.4                   |
| 墨西哥         | 0.0                   | 0.0  | 21.1               | 20.4 | -7.4            | 5.9                   |
| 尼加拉瓜        | 0.6                   | 0.8  | 42.2               | 34.6 | -89.6           | 6.4                   |
| 巴拿马         | 1.2                   | -1.0 | 53.2               | 46.6 | -15.4           | 8.2                   |
| 巴拉圭         | 1.0                   | 0.5  | 17.3               | 12.1 | -8.4            | 4.4                   |
| 秘鲁          | 1.8                   | 2.3  | 27.2               | 22.8 | -14.4           | 7.4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0.6                   | -3.2 | 19.0               | 16.7 | -1.5            | 10.2                  |
| 乌拉圭         | -1.7                  | -1.0 | 50.7               | 39.9 | 15.9            | 6.4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3.0                   | -1.8 | 19.3               | 14.0 | -15.4           | 13.4                  |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资料整理而成。

国家只有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和乌拉圭。高价进口氢碳化合物导致了乌拉圭当前的赤字。这就意味着由于矿产和能源商品价格崩溃，此类商品出口国必须在未来几年内进行重大的经济调整。

对于经常项目在经济强劲增长期恶化的一个基本解释就是实际货币的升值趋势。如表7所示，这一趋势在巴西、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尤其明显，在一些较小的经济体中也有所体现（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乌拉圭）。智利同样也经历了比索的实际升值，然而升幅比较稳定。最值得注意的是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货币均没有出现升值；直到2006年阿根廷的货币也没有升值，但是表7所示的货币实际贬值更多是由于官方对近年来通货膨胀率的低估。而美国在繁荣期经历的货币实际贬值对三个美元国家（厄瓜多尔、萨尔瓦

多和巴拿马）产生了有利影响。

同时图7显示，拉丁美洲国家只在两个方面实施了比过去更系统和连贯的改善，即外部公共借贷和国际储备建设。图中的估算使用了2000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用来纠正实际汇率变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如图所示，到2006年为止较低的借款和此后国际储备的积累，使得净外债水平大幅改善。公共借款减少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明确的财政决策（外部融资减少和日益增长的国内资本市场的使用增多）；第二是有益于重债穷国的经济项目的实行以及阿根廷债务谈判的重启。

同时建立储备也是明确决策的结果，决策不仅决定积累经常项目盈余（正如我们所见，一般由特殊商品价格引起），同时也要求外部融资的大量涌入。后者在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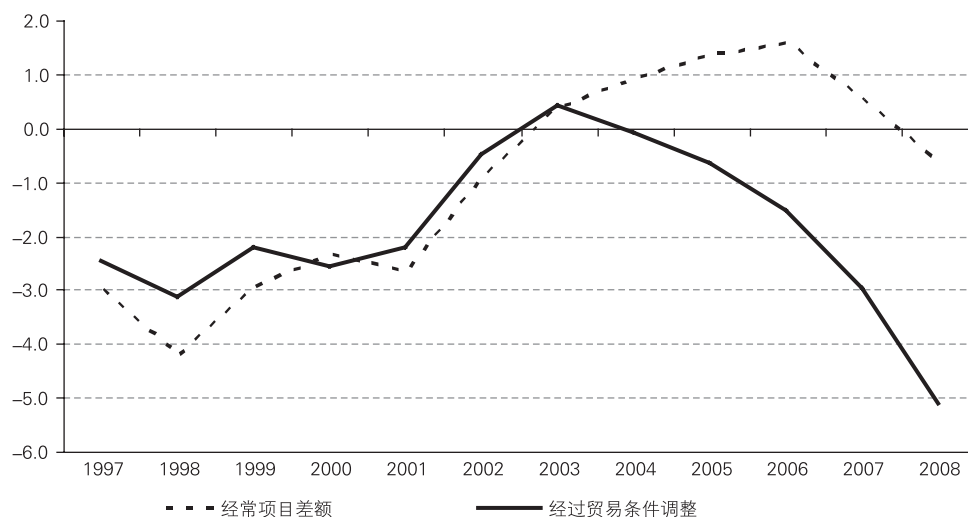


图6 拉丁美洲：进行贸易条件调整及未进行调整的经常项目  
(百分比, 基准年2003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资料整理而成。

可见。图8将储备建立计算成占GDP的比例，列出了拉丁美洲7大经济体中6个国家在大量外部融资三阶段的数据。如图所示，阿根廷是最先实行建立储备政策的国家之一（此例中，储备来源于经常项目盈余而不是资本账户）。与墨西哥不同，表中的其他国家都积极干预市场，积累2006年中期和2007年之间进入外部融资洪流的基金<sup>8</sup>。智利和秘鲁2008年上半年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不过要比其他国家的手段更强硬。当面临外部资金的激增，“对浮动的恐惧”就成了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管理在近期经济繁荣中最明显的特点（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这一情况），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没有起到防止实际货币升值的作用。

由于公共部门对外借款建设和储备的建立，几乎所有国家在这方面都表现很好（表7）。一些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巴拿马）是主要的例外，而那些还负担着先前经济危机带来的沉重外部债务的南美

国家（阿根廷、厄瓜多尔和乌拉圭）承受的压力相对减轻。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拥有大量盈余，巴西在2008年也达到了虚拟平衡。

在当前危机中，公共和外部借贷方面的有利形势是该地区的主要资产。就公共借贷而言，除去一些例外（巴西和哥伦比亚是最明显的例子），南美国家目前比过去有更多的空间可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智利显然更有实行这一政策的余力，因为该国在经济繁荣期存储了大量财政收入。在许多国家，大量的国际储备被用于减轻危机对出口部门以及没有融资途径的私营公司的影响。在危机最紧急的几个月中，他们甚至有采用提供流动资金政策的意向。各国中央银行随后开始降息，这一趋势自2009年初广泛蔓延开来。汇率比以往更快受到压力，使得几个经济体（主要是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已成为特色的高估现象迅速得到纠正。这些措施还辅以广泛的财政、部门和社会政策（参看：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9）。然而，除了一些货币迅速贬值，这些举措的宏观经济影响至今还不十分明显。

8 其中对智利的计算包括转移到稳定基金中的资源。这些基金的结余也被计入到总国际储备中，用以计算该国的对外借款比率。

表 7 拉丁美洲：外部指标  
(百分比)

|                 | 经常项目差额<br>(GDP百分比) |       | 经过贸易条件调整的<br>经常项目 <sup>a</sup><br>(GDP百分比) |       | 外部负债<br>(GDP百分比) |      | 净国际储备<br>外债<br>(GDP百分比) |       | 贸易条件变化    |           | 汇率变化 <sup>c</sup> |           |
|-----------------|--------------------|-------|--|-------|------------------|------|-------------------------|-------|-----------|-----------|-------------------|-----------|
|                 | 2007               | 2008  | 2007                                       | 2008  | 2007             | 2008 | 2007                    | 2008  | 2003-2008 | 2003-2008 | 2003-2008         | 2003-2008 |
| 阿根廷             | 2.7                | 3.5   | 0.9  | -0.9  | 47.2             | 42.8 | 29.6                    | 27.5  | 21.9      | 13.3      |                   |           |
|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 13.4               | 12.0  | 3.5  | 0.3   | 41.3             | 13.5 | 0.7                     | -30.9 | 49.6      | 5.3       |                   |           |
| 巴西              | 0.1                | -1.9  | -1.0                                       | -3.6  | 14.9             | 14.2 | 1.0                     | -0.1  | 13.7      | -42.3     |                   |           |
| 智利 <sup>b</sup> | 4.4                | -3.0  | -14.6                                      | -18.1 | 34.1             | 33.4 | 14.3                    | 13.0  | 72.2      | -14.2     |                   |           |
| 哥伦比亚            | -2.8               | -2.7  | -6.3                                       | -7.8  | 21.7             | 19.0 | 11.5                    | 9.4   | 47.8      | -32.8     |                   |           |
| 哥斯达黎加           | -5.7               | -7.0  | -1.3                                       | -1.6  | 32.0             | 29.4 | 16.3                    | 16.9  | -14.5     | -3.3      |                   |           |
| 厄瓜多尔            | 3.6                | 3.0   | -3.1                                       | -8.5  | 38.1             | 31.8 | 30.4                    | 21.1  | 45.4      | 15.8      |                   |           |
| 萨尔瓦多            | -5.5               | -5.9  | -4.8                                       | -4.2  | 44.5             | 40.8 | 33.7                    | 30.1  | -7.7      | 4.5       |                   |           |
| 危地马拉            | -5.1               | -4.6  | -3.8                                       | -3.2  | 12.6             | 12.0 | -0.3                    | 0.0   | -6.3      | -16.6     |                   |           |
| 洪都拉斯            | -9.9               | -14.9 | -6.4                                       | -7.4  | 24.6             | 22.5 | 2.4                     | 4.9   | -9.8      | -4.9      |                   |           |
| 墨西哥             | -0.6               | -1.4  | -2.1                                       | -3.8  | 12.2             | 11.8 | 3.7                     | 3.7   | 9.2       | 0.4       |                   |           |
| 尼加拉瓜            | -18.3              | -25.8 | -15.5                                      | -21.4 | 59.1             | 51.2 | 39.9                    | 34.7  | -9.9      | -2.0      |                   |           |
| 巴拿马             | -7.3               | -7.3  | -3.5                                       | -3.2  | 42.5             | 36.4 | 32.5                    | 28.9  | -8.4      | 9.9       |                   |           |
| 巴拉圭             | 0.4                | -2.1  | 1.0  | -3.7  | 25.8             | 19.5 | 5.2                     | 0.6   | 3.3       | -26.1     |                   |           |
| 秘鲁              | 1.4                | -3.8  | -7.7                                       | -11.1 | 30.4             | 27.1 | 4.5                     | 3.9   | 42.6      | 1.9       |                   |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5.4               | -12.7 | -5.5                                       | -11.8 | 18.4             | 17.3 | 11.3                    | 11.9  | -5.4      | -25.1     |                   |           |
| 乌拉圭             | -1.0               | -3.5  | 2.1  | 0.5   | 52.9             | 40.7 | 35.1                    | 21.6  | -16.5     | -23.6     |                   |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8.8                | 12.6  | -6.7                                       | -6.0  | 23.2             | 17.9 | 8.5                     | 5.9   | 163.8     | -30.3     |                   |           |

注：<sup>a</sup> 对照年：2003年。

<sup>b</sup> 净外债的计算中，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积累的资产。

<sup>c</sup> 一个表明贬值的积极现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资料整理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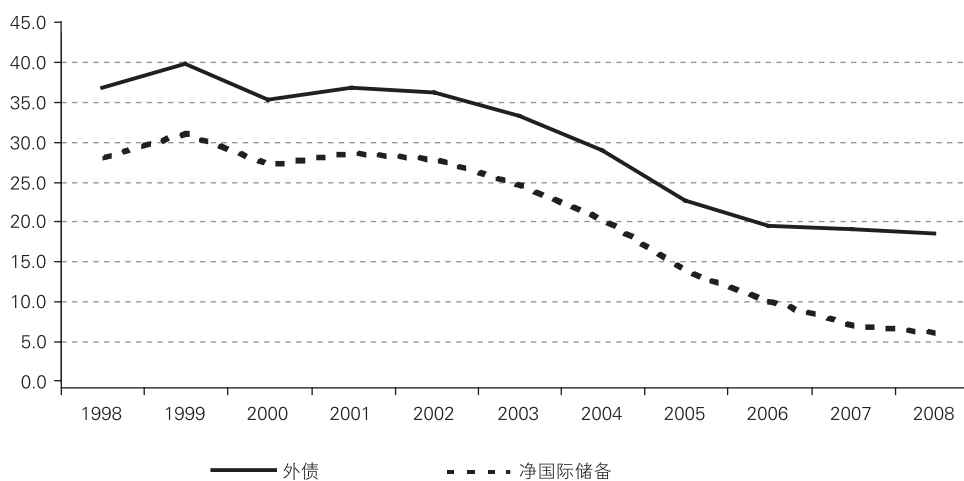


图7 拉丁美洲：外债、总国际储备和净国际储备  
(2000年汇率)

注：其中智利包括主权财富基金中的资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资料整理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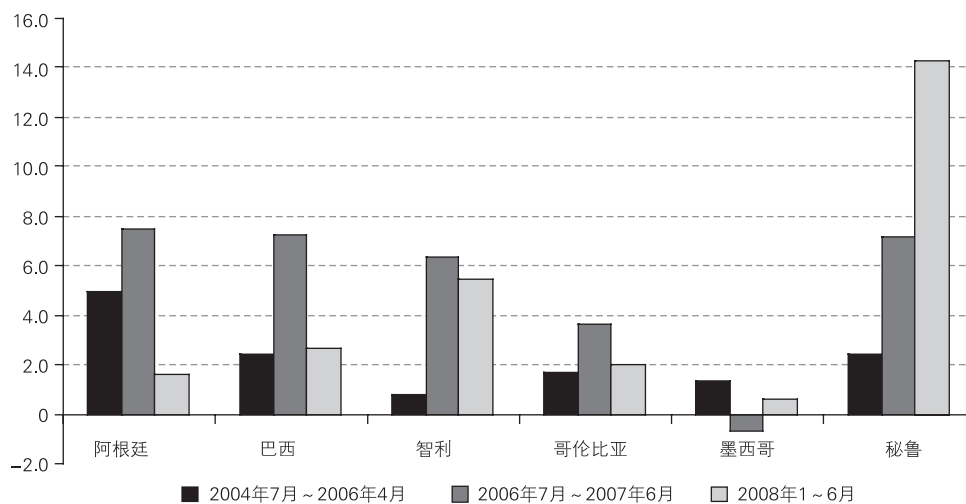


图8 拉丁美洲（部分选定国家）：外部融资富足时期积累的储备  
(GDP百分比)

注：其中智利的情况包括转移到主权财富基金中的资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金融统计资料整理而成。

## 五、结论

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对拉丁美洲产生了预期影响。在享受了各种特殊的有利外部条件之后，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繁荣走到了尽头，而原先所有的有利因素如今都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些因素之中，汇款量的下降带来的影响最小，因为一些国家的实际货币贬值会抵消其负面影响，这将积极影响提高接收汇款家庭的国内消费能力。

危机对贸易的影响最大也最广泛。所有国家目前都受到了实际贸易量收缩的影响，其中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尤其如此；而南美国家，特别是那些出口矿产和能源商品的国家，同样也受到了贸易量急剧下滑的打击。在一些较小的经济体中，能源价格的下降将部分抵偿国际贸易萎缩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外部融资的角度看来，与经济危机在最危急阶段（2008年9月中至10月末）所展现的与流动性不足相关的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已蓄势待发。然而，摆在我们眼前的仍然是受到大量限制的私营部门外部融资阶段，且此阶段的时长和强度都还未知。除非有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特大量发行赋予特别提款权等措施的辅助，否则多边融资只能部分弥补私人资金的匮乏。这类融资的效果还取决于基金资源使用的附加条款。这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私营部门融资的缺乏会特别影响那些需要滚动债务的大型私营公司。

拉丁美洲的经济体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比以往更坚强，但是相比一些对处理近期经济繁荣现象的研究而言，还是稍显逊色。除去一些例外（主要是智利），

财政政策一直保持顺周期性。此外，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经常项目有恶化的趋势，这一过程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货币升值引起。降低公共部门外部借款以及通过建立储备大量吸收外部融资，是新力量的两个关键要素，也是区别于过去处理经济上升的新方法。目前，我们不知道这些方法在危机中到底能为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多少空间。迄今为止，唯一真正确定的发展就是迅速纠正该地区对某些货币的恶性高估。

过去的危机表明，实际货币贬值是生产结构多样化发展的一个契机。事实上，它可能是当前形势能提供的最重要机遇之一，因此应该实行生产发展政策来积极抓住这个机遇。

区域市场也提供了多样化发展的机会，在整个地区而不仅在单个国家进行“进口替代”。然而，此类机遇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区域内贸易实际上已经高度顺周期化，而一体化的努力正经历疲软期甚至是危机期。此外，一体化协议中汇率调整的重大分歧，再加上各国的保护措施，实际上加深了一体化进程所面临的困难。

目前，实行反周期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范围比以前更大，并且已经开始慢慢投入应用，但是该范围仍然有限。这无疑将减轻各国的负担，无需采取过度限制政策。当然，那些在经济繁荣期明显是顺周期性的国家除外。总而言之，现在的拉丁美洲已经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但是在这场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这些准备只能减轻危机带来的部分影响。

### 参考文献

- Bordo, Michael and others (2001), "Is the crisis problem growing more severe?", *Economic Policy*, vol. 16, No. 32,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April.
- Bustillo, Inés and Helvia Velloso (2009),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hat happened and what's next", Washington, D.C., ECLAC office in Washington, D.C., January.
- Calvo, Guillermo (2008), "La super-crisis subprime: claves para entenderla y navegarla", document presented at the Andean

-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Workshop "La crisis financiera global y su impacto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1 December.
-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9), *La reacción de los gobierno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frente a la crisis internacional: una presentación sintética de las medidas de política anunciadas hasta el 30 de enero de 2009*, Santiago, Chile, 30 January.

- \_\_\_\_\_ (2008a),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20 years later: old problems, new opportunities* (LC/G.2367(SES.32/3)), Santiago, Chile.
- \_\_\_\_\_ (2008b),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7-2008*,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E.08.II.G.2.
- \_\_\_\_\_ (2008c),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8*(LC/G.2401-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E.08.II.G.2.
- IDB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08), *All That Glitters May Not Be Gold: Assessing Latin America's Recent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Washington, D.C., Research Department, April.
- II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9),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online] <http://www.iif.com>, 27 January.
-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9),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online] <http://www.imf.org>, 28 January.
- Izquierdo, Alejandro, Randall Romero and Ernesto Talvi (2008), "Business Cycles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 of External Factors",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CERES, February.
- Jara, Alejandro and Camilo E. Tovar (2008),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mplications of capital flow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IS Papers, No. 43, Basel,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November.
- Jiménez, Juan Pablo and Varinia Tromben (2006), "Fiscal policy and the commodities boom: the impact of higher prices for non-renewabl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EPAL Review*, No. 90 (LC/G.2323-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J.P.Morgan (2009), *Emerging Markets Outlook and Strategy*, 12 January.
- \_\_\_\_\_ (2008), "Determinants of Mexico's remittances from the U.S.", *Global Data Watch*, 17 October.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and Robert Aliber (2005),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Minsky, Hyman P. (1982), "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a restatement", *Can "It" Happen Again? Essays on Instability and Finance*,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 Ocampo, José Antonio (2007),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boom", *CEPAL Review*, No. 93 (LC/G.234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Ocampo, José Antonio and María Ángela Parra (2003), "The terms of trade for commod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EPAL Review*, No. 79 (LC/G.2200-P), Santiago, Chile, April.
- Ocampo, José Antonio and Camilo E. Tovar (2008), "External and domestic financing in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s, sustainabilit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mplications", document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Debt finance and emerging issues in financial integration", New York, April.
- Ratha, Dilip, Sanket Mohapatra and Zhimei Xu (2008), "Outlook for remittance flows 2008-2010: growth expected to moderate significantly, but flows to remain resilient",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No. 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1 November.
- United Nations (2009),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09*, New York, January.
- Von Braun, Joachim (2007), "The world food situation: new driving forces and required actions", *Food Policy Report*,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December.
- World Bank (2009),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9: Commodities at the Crossroads*, Washington, D.C.



## 关键词

经济危机  
经济增长  
环境退化  
自然资源  
初级产品  
初级产品价格  
通货膨胀  
财富  
收入分配

# 全球经济危机、 环境—资源匮乏 及财富集中

*Ramón López*



一个新的结构性因素引发了最近的全球危机：①若干人口大国加入增长过程；②环境资源和某些自然资源日益匮乏；③过去20年间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和财富高度集中。这些结构性变化促使全球增长与初级产品需求之间的联系显著增强；导致世界初级产品供给弹性下降，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上因素或导致世界经济领域极易爆发危机并阻碍当前的经济复苏。

Ramón López

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  
农业与资源经济学系教授  
⇒ [rlopez@arec.umd.edu](mailto:rlopez@arec.umd.edu)

## 一、引言

本文关注几个新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引发了当前全球危机，但普遍受到忽视，或将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分析三个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①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从数世纪经济停滞状态中觉醒以及作为工业产品供应大国和初级产品消费大国的崛起；②环境资源和某些自然资源日益匮乏，富国和穷国首次同时面临该问题；③过去20年间发达经济体等国家严重的财富集中现象。

结构性因素①和②导致初级产品价格对经济增长高度敏感。仍处于发展初期之人口大国（例如中国和印度等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影响力造成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初级产品和能源强度提高，原因是此类国家的发展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快速扩张（Farrell和Grant，2005）。此外，发达经济体通过提高对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重视程度普遍提升生产活动的非物质化水平，却未在消费领域实现相同的非物质化水平。这种不对称现象意味着发达国家日益依赖其他国家和地区满足自身对有形商品、能源以及其他初级产品不断增长的净需求。

作为第二个因素——全球自然资源日益匮乏——的结果，在世界增长助推初级产品需求走高的背景下，初级产品供给的响应能力变化越来越不灵活。因此，当前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初级产品价格的不断攀升。

为了应对价格攀升，各国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防止通胀指数走高产生压力，同时仍希望为经济持续增长留出空间（尽管增速或将放缓）。然而，由于以下将阐述的原因，第三个结构性因素——不断上升的财富集中度——导致实体经济对货币和财政紧缩政策的敏感性与过去相比显著上升，由此大幅减少了实施货币紧缩政策过程中经济持续增长的空间。

过去20年间，发达经济体和众多中等收入国家的财富集中现象与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的现象同时存在，两种现象均至少部分归因于这一时期实施的新政策

（Krugman，2006）。中产阶级备受压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称之为“大量财富转移”——致使多数家庭愈加依赖新借款消费，由此造成负债收入比飙升（Taylor等，2008）。由于多数债务往往受周期性利率调整影响，家庭可支配收入（还本付息后）对利率攀升的敏感性显著上升。此外，由于全球经济扩张严重依赖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费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更依赖这些国家更加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此类政策对于消费者轻松获得信贷资金以及在其负债收入比走高的背景下，为相对较低的还本付息负担提供支持至关重要。因此，中产阶级家庭能够在其实际收入走低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债务水平长期增加消费。

在美国，最富裕的10%家庭总收入所占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的35%左右攀升至2007年的50%，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Saez，2009）。不幸的是，上世纪唯一——一个最富裕的10%家庭占有近50%总收入的时期最终导致大萧条。事实上，1917~1928年期间最富裕的10%家庭总收入的所占份额增速几乎与1996~2007年持平，前期从40%增至49%，后期从40%增至50%（Picketty和Saez，2003）。显然，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巧合；由于保持需求增长愈加困难，收入集中度达极端水平后，依赖国内需求发展的经济体越来越容易受长期深层危机的影响。国内收入集中现象或许不会直接导致拉丁美洲国家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更容易爆发危机，但会导致美国等依赖国内需求发展的国家更容易爆发危机。此外，由于美国和其他诸多富裕国家占全球其他市场的主体部分，这些国家的需求下降很可能导致全球陷入经济衰退。<sup>1</sup>

1 在多数市场开放的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国家、中国及印度等国，国外需求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财富集中现象或许并不构成直接障碍。这种情况催生了“公地悲剧”的社会症状：由于财富集中不会影响单个国家的成长潜力，几乎完全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最大化目标为驱动力的政府未制定激励措施防止财富集中。然而，若全球化环境中多数国家运用相同政策促进增长而不顾及财富分配，财富集中现象将在全世界蔓延。这种情况将限制全球需求并导致全球经济持续增长陷入危险境地。

□ 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研究生Asif Islam和Amparo Palacios协助开展研究工作。



如下所述，初级产品价格对世界经济增长更高的敏感性，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宽松货币政策的更多依赖，可能导致未来难以在保持价格稳定的前提下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同时导致从当前危机中复苏更加困难。

本文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在由上述三个结构性因素形成的新经济秩序背景下于近期出现的大萧条。首先回顾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相互作用，着重分析大量人口众多的穷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功如何在更广范围内普及全球经济增长。第三部分回顾环境领域相关问题及其与全球经济的相关性。第四部分分析多个保守政府新制定的

激进政策产生的结果，此类政策基于发达经济体重新形成的知识分子自由放任的思想，全球众多中等收入国家业已认同该思想。实施此类政策的结果之一是多数国家的财富集中度上升（Jerzmanowski和Nabar，2008；Philippon和Reshef，2009）。因此，尽管各国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且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增长俱乐部，单个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增长愈加成为少数人群的特权。第五部分介绍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通货膨胀以及危机爆发之间的关系。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同时说明以上动态如何导致当前危机形成自身特性和冲击强度。

## 二、新经济秩序：回顾

### 1. 北方国家生产活动的非物质化过程

20世纪大部分时期，经济持续增长是由全球不到1/5人口组成之高级俱乐部的特权（下称“北方国家”）。随着富裕程度逐步提高，北方国家经历了持续的结构转变，其生产活动日益“非物质化”（López和Stocking，2009）。北方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越来越偏向服务业，尤其是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与之相反，基于自然资源的生产活动以及后期多数制造业部门的总产值所占份额逐步萎缩。图1阐释了过去50年间美国该过程的强度，该图显示商品生产和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均逐步下降。制造业、林业、渔业、石油开采业及采矿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总份额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40%多降至21世纪初的不到20%。

北方国家消费活动的非物质化进程与生产活动的非物质化进程不相匹配。消费结构出现一定转变——不再围绕食品等初级产品——北方国家的消费者继续扩大对能源产品和工业产品，尤其是耐用商品的需求，速度往往超过其人均收入的增长步伐（Ghertner和Fripp，2007）。北方国家消费活动非物质化的速度明显慢于国内生产活动非物质化的速度，导致其愈加依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南方国家”）依次供应初级产品（包括

能源及其他原材料）和制成品，过去30年里尤其如此。

例如，对美国贸易流的分析显示初级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净进口额占该国进口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上升。如图2所示，工业产品总额占进口总额的份额飙升，制成品和其他工业产品进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上升。包括金属在内的其他多数初级产品亦然（参见图3）。过去20年间，工业产品和初级产品进口总值增长尤其迅速。

### 2. 南方国家扮演的角色

本文将南方国家分为两类：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及部分亚洲国家）；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劳动力丰富的南方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这些国家的人口总量占全球很大比例；相反，资源丰富的南方国家人口相对稀少。整体而言，南方国家在某些时期能够实现一定增长。然而，直至最近三四十年，鲜有南方国家能够保持长期增长。资源丰富的南方国家基本只能被动地向北方国家供应能源和其他初级产品。

自殖民时期起，北方国家在资源丰富的南方国家设立旨在高效生产初级产品的飞地，产品几乎完全销往北方国家市场。这些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迅速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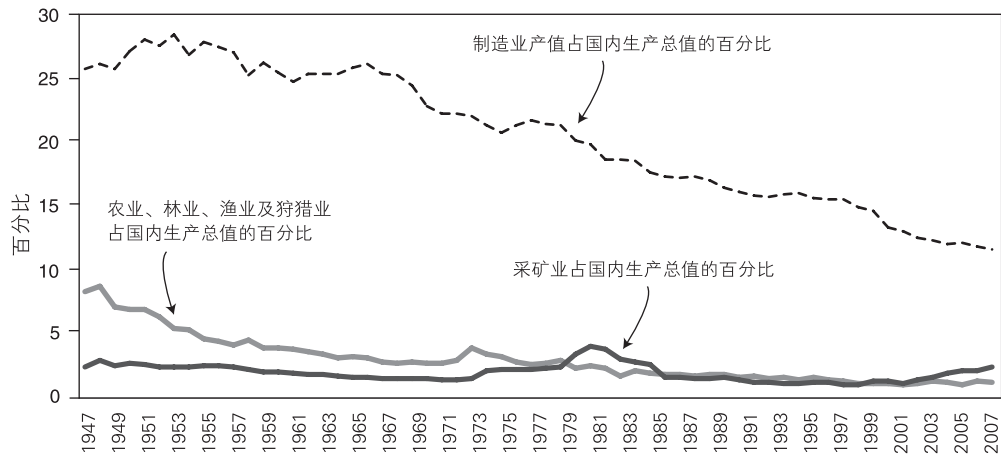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行业构成，1947~2007年  
(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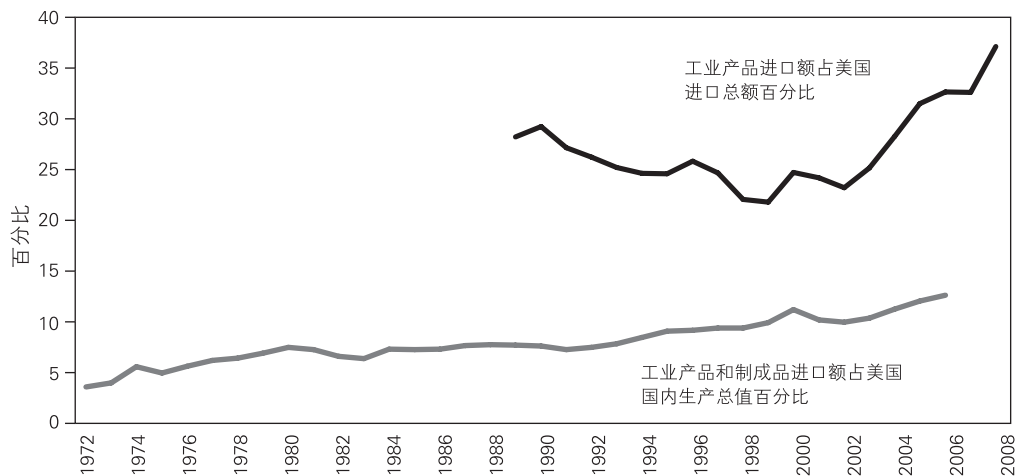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工业产品进口额占进口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份额<sup>a</sup>，1972~2008年  
(百分比)

注：<sup>a</sup>类别：燃料和润滑油，纸张和原纸，与非耐用商品相关的材料，部分建筑材料，与耐用商品相关的未加工金属和金属成品，与耐用商品相关的非金属。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R.C. Feenstra, J. Romalis及P. Schott, "United States imports, exports and tariff data, 1989-2001",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报告, 第9387号, 剑桥, 马萨诸塞州,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2001, <http://www.internationaldat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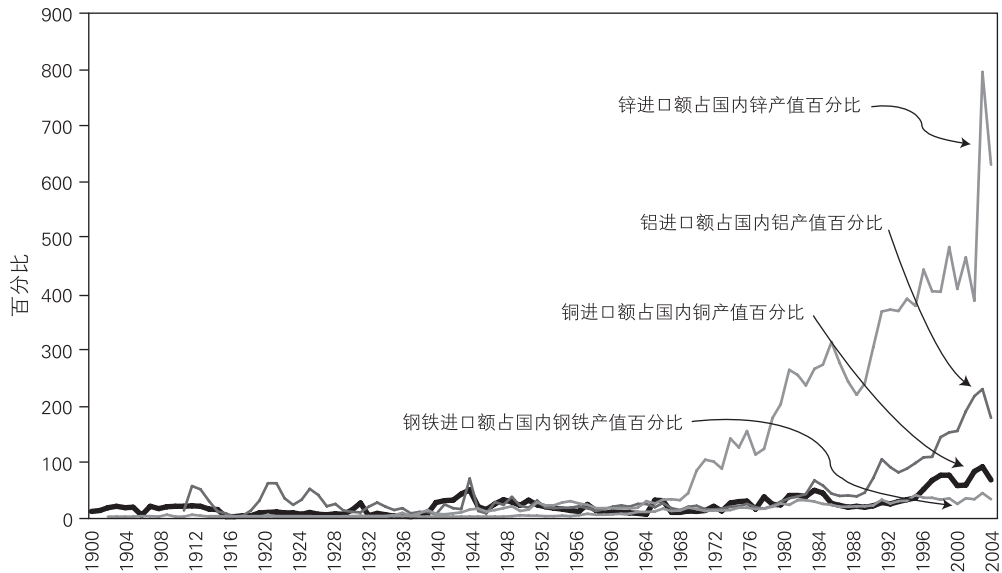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金属进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1900~2004年  
(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地质勘探局。

伴随而来的是北方国家通过不断开拓和新的投资活动扩大飞地的经济规模。南方国家资源丰富，缺乏有效法规限制开采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北方国家持续投资（资源丰富的）南方国家的资源开采业。这些因素导致全球初级产品的供给曲线长时期保持相对平坦（换言之，供给弹性高企），从而帮助初级产品的实际价格保持稳定（López和Stocking，2009）。如若干研究所示，此类生产性飞地与其他南方国家少有联系，对其经济增长几乎没有贡献（de Janvry，1975）。

资源和劳动力丰富的南方国家经济发展基本停滞不前，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压力甚小，对稳定初级产品物价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Sokoloff和Engerman，2000；Acemoglu、Johnson及Robinson，2001；Khor，2000）。得益于此，北方国家实现增长。与此同时，尽管整个20世纪北方国家的需求持续增加，初级产品物价仍保持稳定，实际价格有时甚至出现下降（参见图4）。

### 3. 劳动力丰富的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崭露头角

如所谓“资源诅咒”的文献所述，资源丰富的南方

国家的飞地不断扩张的自然资源开采活动多数难以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Barbier，2005）。相反，劳动力丰富的南方国家更容易从北方国家非物质化生产活动产生的对工业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中受益，过去30年里尤其如此。

#### (1) 首先，“新兴小国”

20世纪70年代，伴随东南亚若干小国/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的崛起，劳动力丰富的南方国家开始摆脱经济停滞状态。在制成品出口因素的推动下，这些国家长期保持快速发展。尽管规模较小，此类新兴工业化国家（NIC）却成为向北方国家出口制成品的国家。这些以出口制成品为特色的新兴小国使北方国家能够加大专业生产环保型非物质产品的力度，同时愈加依赖新兴工业化国家有效供给工业产品，以此满足北方国家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Krugman，1994；Lall和Albaladejo，2004；Noland，1997）。

尽管新兴工业化国家（NIC）的人口密度很高，其迅速发展的人口总量仍处于极低水平，对全球初级产品需求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此类国家的扩张对世界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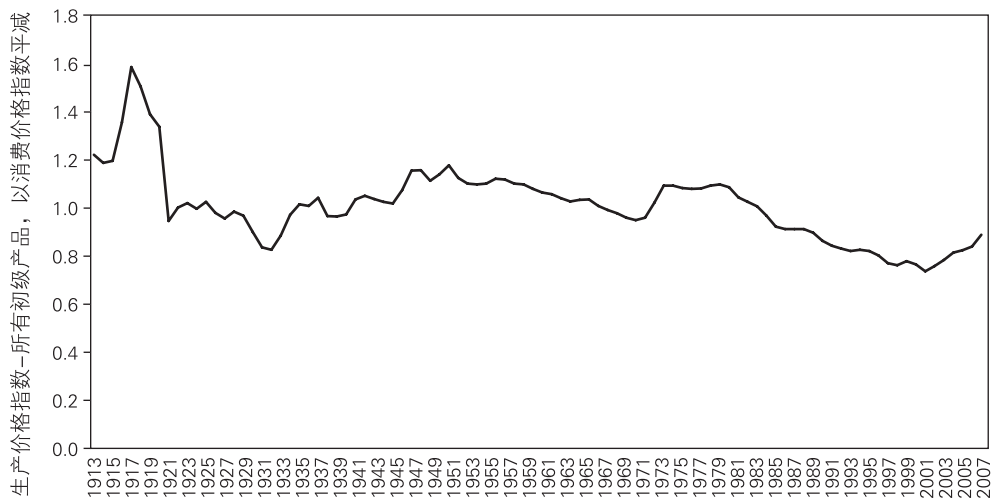


图4 初级产品实际价格走势：生产价格指数 (PPI)<sup>a</sup>，所有初级产品，1913-2007年

注：<sup>a</sup> 美国劳工统计局确定的初级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级产品价格未产生更大需求压力。如图4所示，此类价格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繁荣时期基本稳定。

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实现显著均衡：北方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快速增长——北方国家通过开展环保服务型生产活动为其实现低成本、生态“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极大便利；新兴工业化国家则以较低的市场价格向北方国家供应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满足其不断上升的净需求（尽管生产过程中耗费较高的国内环境成本）；仍处于缓慢发展阶段、资源丰富的南方国家则供应低价原材料，但是以不断破坏自然资源和环 境为代价。<sup>2</sup>

<sup>2</sup>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大力扭转环境退化现象。同期，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供应高污染行业生产的低成本产品逐步崛起。伴随该过程的是北方国家开始大量实施环境法规。正因为高污染行业生产产品的供给国崛起，北方国家日趋严苛的环境法规在政治层面上获得接受。López (2008) 表示北方国家能够以极低成本（据估算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实施重要环境法规的原因之一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后期其他工业产品供给国崛起，从而使北方国家得以停止多数高污染行业的生产活动。以上观点与Levinson和Taylor (2008) 提供的计量经济学证据一致。

## (2) 其次，“真正的大国”

随着南方国家中其他劳动力丰富的大国实行促进增长的政策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呈现出更加显著的变化。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在贫困状态中成功实现迅猛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大国实行了激烈的政策改革，助推其实现崛起。新政策包括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通过汇率政策和其他激励措施促进出口以及放松污染管制，后者给几乎没有环境约束的扩大制成品生产大开绿灯。北方国家消费者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并确保以上新政策取得成功。

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样，新兴工业化大国也能够有效供给工业产品，但规模远远大于前者（Bosworth和Collins, 2008；Panagariya, 2006；López, 2008；Lall和Albaladejo, 2004）。工业产品出口导向型增长确保这些国家在20多年间实现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是工业产品出口快速扩张以及汇率被低估。<sup>3</sup>这也意味着巨额外汇（参

<sup>3</sup> 根据Rodrik (2007) 的观点，过去20年间，中国和印度的汇率被低估，低估程度也在该时期逐步上升。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低估汇率促进工业产品出口增长。然而，与新兴工业化大国不同的是，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近期允许降低其实际汇率的低估程度——有时甚至高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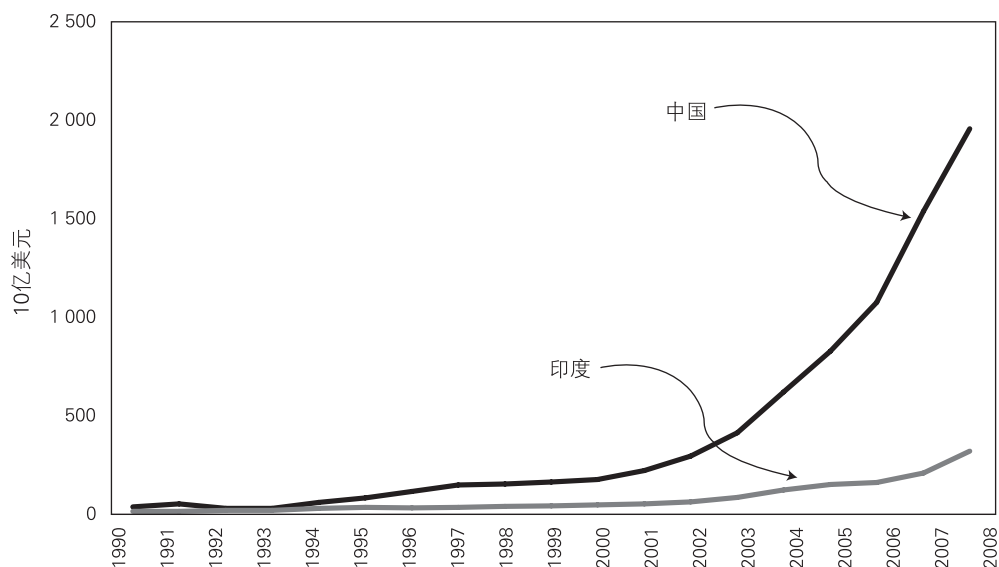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和印度：外汇储备，1990~2008年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印度银行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见图5)重回北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由此导致相关经济体产生大量经常账户赤字。<sup>4</sup>巨额资金流向北方国家使得这些国家的利率维持在低位，同时显著扩大信贷供给。与此同时，从新兴工业化大国和石油输出国流向北方国家的资金促使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从而在延长经济繁荣周期的同时催生了金融泡

沫。这种状况进一步满足了北方国家从新兴大国进口工业产品的巨大需求。

由此产生了另一个显著(暂时)的均衡现象：新兴大国通过在工业产品出口领域取得的成功产生的巨额资金助推北方国家实现繁荣，进而满足消费者对进口工业产品的需求，并且为新兴工业化大国持续扩张提供后盾。过去20年间，中国和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实际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是发达国家的3倍多(国

4 德国和日本例外，这两个国家大量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

表1 不同地区各时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分布  
(百万美元)

| 时期        | 中国和印度   | 发达经济体   |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 世界        |
|-----------|---------|---------|-----------|-----------|
| 1961~1969 | 5 154   | 366 333 | 120 100   | 491 587   |
| 1970~1979 | 12 198  | 514 740 | 47 150    | 574 088   |
| 1980~1989 | 36 740  | 472 160 | 94 735    | 603 635   |
| 1990~1999 | 86 310  | 519 200 | 116 040   | 721 550   |
| 2000~2007 | 201 375 | 618 875 | 274 525   | 1 094 775 |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数，世界银行。

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更重要的是, 21世纪初, 新兴工业化大国每年为全球增长贡献3500多亿美元——即世界经济年增长总量的1/3以上, 估计约为1.1万亿美元。如表1所示, 中国和印度的贡献额(约2000亿美元)占2000~2007年世界经济年增长总量的近20%。相比之下, 该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仅为5%。

#### 4. 最后, 初级产品需求压力

20世纪90年代后5年和21世纪初北方国家-新兴工业化大国在繁荣方面实现的全新均衡现象与此前北方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均衡现象存在差异: 近50%的人口居住在“新兴大国”, 而“新兴小国”的人口总量最多仅占全球人口总量的5%。换言之, 新兴工业化大国的崛起促使增长俱乐部显著扩大。此外, 许多南方国家(多数拥有丰富的劳动力)首次成为能源、原材料及其他初级产品的重要净消费国, 消费总量增长迅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不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如今, 全球多数人口生活在能够保持增长的国家, 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只有资源丰富的南方国家仍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新兴工业化大国最近在世界经济扩张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在此背景下, 此类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几十年前相比更具初级产品和能源密集型特征。此前, 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北方国家。出现该现象的原因是全球50%的人口加入增长进程促使经济增长的绝对规模显著扩大。此外, 目前正在扩张的新兴工业化大国的大量人口人均收入仍处于低位的事实意味着其食品、能源及其他初级产品的收入弹性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换言之, 收入增长致使世界初级产品的需求曲线目前持续向上倾斜的速度明显快过以往。

因此, 伴随新兴工业化大国的快速增长, 工业产品供给大幅增长, 此类国家对能源、食品及其他初级产品的需求也显著上升。由于初期消费水平极低, 新兴工业化大国对此类初级产品需求上升最初对世界市场基本未产生影响。然而,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此类国家成为初级产品、能源及其他原材料的重要净进口国。新兴工业化大国连续10多年保持8%~10%的年增长率。这些国家的大量人口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 占世界总需求量较大比例, 时至今日仍是如此。图6和图7显示过去20年间中国和印度的消费水平及其在世界能源和其他部分初级产品消费总量中所占份额快速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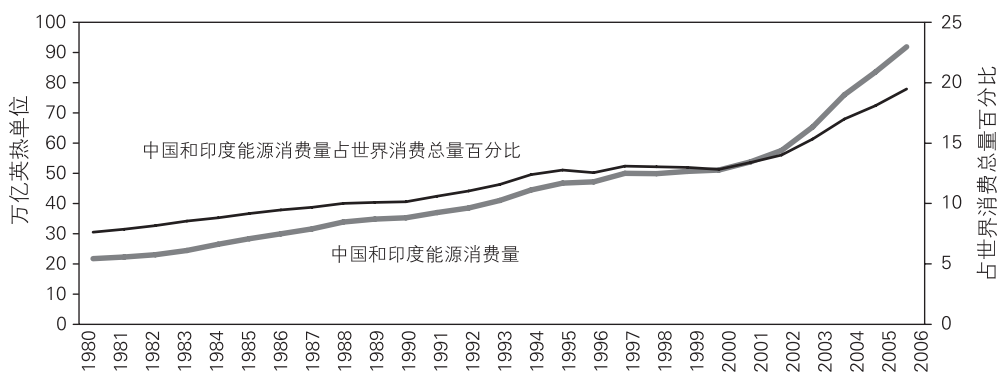


图6 中国和印度：能源消费量以及占世界消费总量份额，1980~2006年  
(英热单位)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E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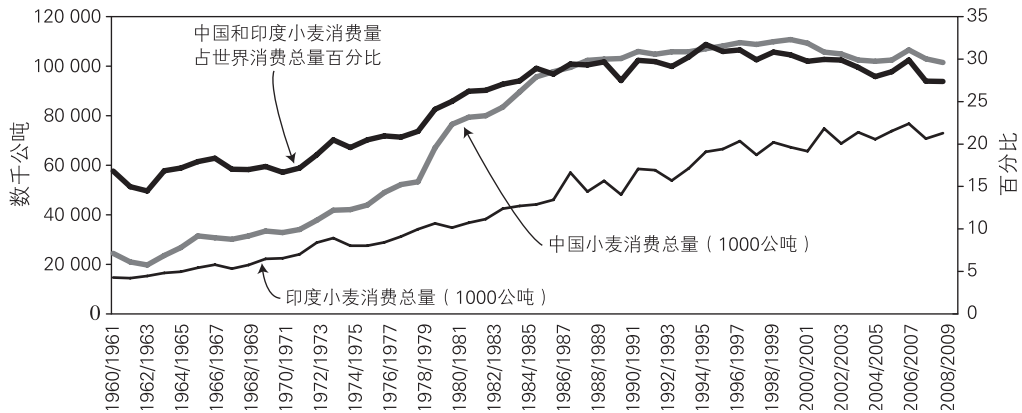


图7 印度和中国：不同时期小麦消费量以及占世界消费总量份额  
(百分比, 数千公吨)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USDA）。

### 三、环境—资源匮乏和初级产品供给

伴随新兴工业化大国加入增长进程，初级产品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与此同时，南方国家曾经拥有的大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政府已开始认真对待急速扩大自然资源开采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多数地下原材料或许仍大量存在，不过有迹象表明供给此类原材料必须开发日益昂贵的资源。此外，资源开采已产生巨额环境成本，对宝贵的生态系统、水质、森林以及其他日益匮乏的环境资产构成负面影响。<sup>5</sup>

迫于国际非政府组织（NGO）、正逐渐认识到对自然资源拥有既定权利的地方团体以及国内其他民间团体的不断加价，拥有丰富资源的南方国家政府最终开始实施政策限制初级产品开采所需的部分高额环境成本。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试点执行关于利用众多生态系

统的环境法规。毫无节制地开采资源或将破坏这些生态系统<sup>6</sup>。换言之，南方国家已开始实施少数拥有丰富资源的北方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及加拿大）数十年前采取的行动——通过严格限制资源开采活动减少对脆弱生态系统及其他可再生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些限制措施最终造成初级产品开采成本走高。

这意味着基于自然资源之初级产品的长期供给曲线弹性首次出现下降。自然环境有限的能在日趋垂直的初级产品供给曲线中得到验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该结果的主要原因并非不可再生的地下原材料匮乏，而是大规模开采不可再生资源导致对生命至关重要的生

5 除若干重要例外，决定初级产品供给真正上限因素并非地下原材料的匮乏程度，而是生产原材料期间日益高企的环境成本（Simpson、Toman及Ayres，2005）。资源开采（采矿、石油钻探及其他活动）对水质、土壤及森林构成严重影响（例如，为了采煤而移除山顶）。美国可通过扩大近海石油开采规模或阿拉斯加的产油规模大幅增加其石油产量，不过同时将在环境破坏方面面临更高风险。

6 例如，巴西已通过包括监禁等严厉制裁措施在内的环境犯罪法。非政府组织频繁游说实施法律保护亚马逊河（Da Motta，2003）。1991年，哥伦比亚宪法全面更新环境管理相关内容，要求更加严格地执行相关法律。根据规定，该国将优先运用经济手段，尤其是惩罚性和补偿性的污染收费和污染税（Huber、Ruitenbeck及da Motta，1998）。最近，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韩国落实了基本符合关于应对和减少温室气体之国际标准的政策。Engel和López（2008）详细介绍了有组织的地方团体近期如何在世界各地维护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利以及限制利用自然资源。

态系统和其他可再生自然资源日益退化。

简而言之，初级产品长期供给曲线弹性相对下降期间，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在加快世界初级产品需求曲线向上倾斜。因此，相比数十年前，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与初级产品价格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由此导致2003~2007年期间初级产品价格飙升以及目前的经济衰退（如下所示）。由于初级产品价格对经济增长逐步上升的敏感性具有对称性，以上现象也解释了初级产品价格为何在危机最严重期间骤降以及为何在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初显复苏迹象之时迅速反弹。

## 气候变化

大气在不对气候构成严重干扰的前提下吸收温室气体的能力是可再生资源限制初级产品和原材料导向型行业扩张的另一个典型例证。一旦环境政策将气候变化成本纳入其中，即在此类产品价格上升中得到反映。新兴工业化大国的崛起以及北方国家消费者对原材料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居高不下以及高层大气中此类气体浓度上升（Bohringer和Loschel，2003；Loschel和Zhang，2002）。与此同时，科学证据显示只有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方可避免气候灾难。长期

以来，大气的自我修复能力无法满足人类对其需求，导致改变气候的气体聚集，以至对人类发展构成重大的潜在障碍。

新兴工业化大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份额逐步上升，2006年超过25%（参见图8）。更重要的是，由于新兴工业化大国的生产行业密集使用包括石油、天然气及煤炭在内的化石燃料，其经济增长期间排放量的弹性居高不下，意味着这些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导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上升。

因此，相比20世纪末，全球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更加紧密；仅仅将全球排放量稳定在目前的不可持续水平将要求北方国家付出更多努力和成本补偿新兴工业化大国不断上升的排放量造成的损失。减小气候变化的影响（过去几十年被普遍忽视）对经济增长产生新的限制。换言之，伴随新兴工业化大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力量的崛起以及北方国家原材料产品消费量的不断上升，北方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但仍被忽视的限制因素愈加严重。

由于作为碳排放大国的美国、中国、印度及其他经济大国履行承诺不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The Kyoto Protocol）迄今为止尚未奏效。按照最初的设想，京都议定书机制旨在应对改变气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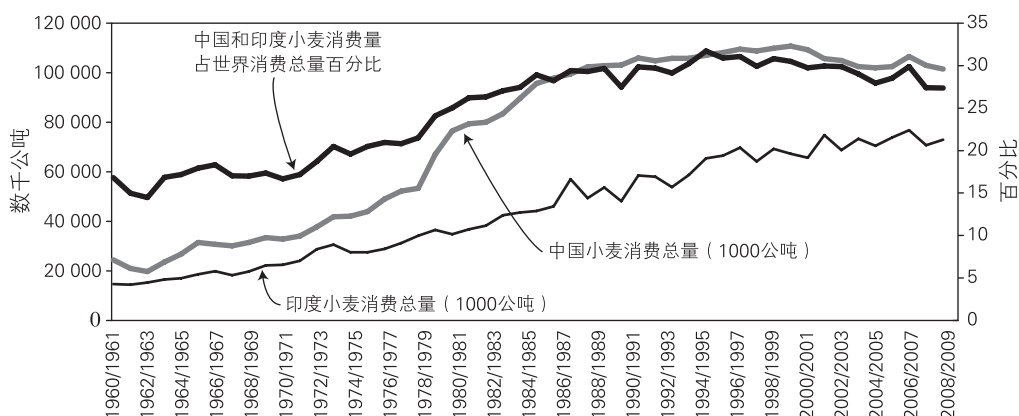


图8 中国和印度：化石燃料消耗和燃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 (CO<sub>2</sub>) 排放量  
(百万公吨)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

气体不断上升的排放量。世界各国已就制定有效限制碳排放的国际制度做出尝试，其中多数归于失败。尽管如此，各国终须承认以上限制因素。然而，严格限制碳排

放将对新兴工业化大国经济增长产生新的限制，甚至对其向北方国家大量供给（高碳强度）工业产品的角色构成威胁。

## 四、新经济政策

### 1. 北方国家通过“摆脱政府枷锁”实现“经济自由发展”

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北方国家已经开始“结构转变”的进程。决策者和经济学家普遍接受“万能政府”和过高税率压制私有经济的观点，并相信解决上述问题可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加快经济增长步伐。多数北方国家着手实施影响深远的政策试验，强化关于投资和创新的激励措施。

旨在转变结构的新政策包括若干市场化措施以及政府退出诸多经济领域的规定，具体包括大幅减税和关于在广泛范围内社会支出的财政紧缩措施以及大规模放松金融管制。然而，比放松金融管制更为重要的是“放松监管”的过程。该过程涉及审慎的政府行为，旨在通过削减监管机构的预算、人力及权力削弱其实力（Caprio、Demirguc-Kunt及Kane，2008）。此外，结构转变（尤其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还包括旨在削弱工会实力的政策和法规。各届政府允许逐步降低实际最低工资（Autor、Katz及Kearney，2006）。此类政策导致工人的议价能力显著削弱，最终或将降低除高管和金融交易员等群体之外所有人员的实际劳动收入。尽管部分政策或对鼓励投资，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投资活动，起到促进作用，然而这些政策似乎无意中将对财富分配造成严重影响。

在全球化水平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某些情况下迫于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众多南方国家效仿北方国家实施以上政策。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多数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均坚持认为北方国家应实行此类激烈改革。诚然，这种强化市场职能淡化政府职能（以及减少税负）的极端思想在部分程度上由精英集团直接或间接资助的机构，包括智库、大学及多数媒体提出和支持。诸多南方国家

的精英分子都通过此类机构逐步扩大其思想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成为其主要且最有效的游说手段。这为国际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充当实行类似政策改革的工具铺平了道路。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多数曾在美国的大学接受学术培训，实行上述改革无须对其做大量说服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遵循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可轻松获得国际信贷资金及其他形式的国际支持。

### 2. 国家不采取监管措施……财富愈加集中

以上政策最初旨在提高北方国家的经济效率并保持其经济增长。此类政策或许也是造成过去25年间收入明显集中的部分原因。<sup>7</sup>此类政策未必是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唯一原因，不过证据显示其是形成不平等趋势的重要因素（Sloan，1997）。图9和图10分别显示了美国和英国明显的收入集中现象，该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

7 北方国家从传统工业活动快速转向服务业是造成中产阶级利益受损以及收入集中度上升的另一要素。大量已获得中产阶级地位的工业劳动力在调整期失业并损失大量收入（有时称其为“迷惘的一代”）。诸多研究试图通过聚焦劳动力内部各大类人群的工资分配状况解释收入集中现象（Autor、Katz及Kearney，2006；Autor、Levy及Murnane，2003；Card和di Nardo，2002）。其中多项研究强调新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工资分配的影响。Gordon和Dew-Becker（2007）的研究分析了劳动力工会化水平下降过程中工资两极分化的后果——该过程自实行结构转变以来持续加速。几乎没有研究分析工资分配的末端状况——其中大部分工资收入呈现集中特征。Kaplan和Rauh（2009）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结果显示投资银行高管、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和共同基金经理人及交易员以及大公司其他类别高管薪资飙升可大体解释工资收入两极分化现象。高管薪资上升或许惠及至多1%劳动力。促使此类人群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初过于放松的金融管制以及该时期实行的其他结构调整政策。

初开始尤为突出。在美国，中产阶级（定义为家庭收入分配中第二、第三及第四个五分位数，约有2亿人）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1980年的近54%降至2006年的47%，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最低的20%）的份额则从5%降至4%。以上两类人群收入所占份额的减少惠及该国5%最富裕人口。同一时期，最富裕人口收入占全国家庭收入的份额从17%升至22.5%（2007年，全美最富裕的400个家庭年均收入为3.5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1.5%以上）。英国的情况与之相似。1980~2006年，该国中产阶级收入所占份额从55%降至50%，最贫困的五分位数人口收入所占份额从10%降至8%。与此同时，10%最富裕家庭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份额则从20%升至27%。

由于存在收入集中现象，过去30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实际平均收入增长极慢，仅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4.8万美元升至2007年的5.2万美元（参见图11）。换

言之，该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2%，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年增长率约为0.3%。与之相反，同一时期5%最富裕人口的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从15.5万美元飙升至29万美元，远远超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

### 3. 两难与悖论

新的监管环境激励了对经济扩张具有积极意义的商业利润。然而，收入集中导致将此类激励措施与扩大国内需求（长时期持续获得以上利润和助推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相匹配。收入集中度上升后，中产阶级——消费经济的支柱——数量减少，进而导致保持国内需求维持商业利润和经济增长以较高速度增长愈加困难。

北方国家能否维持高速经济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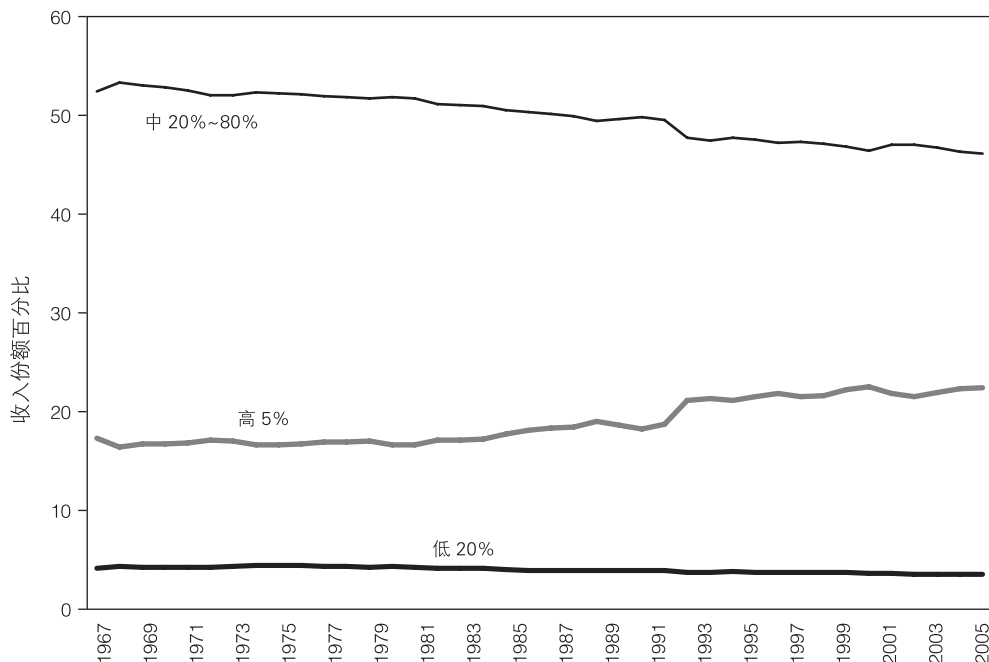


图9 美国：收入分配：不同群体收入份额，1967~2005年  
（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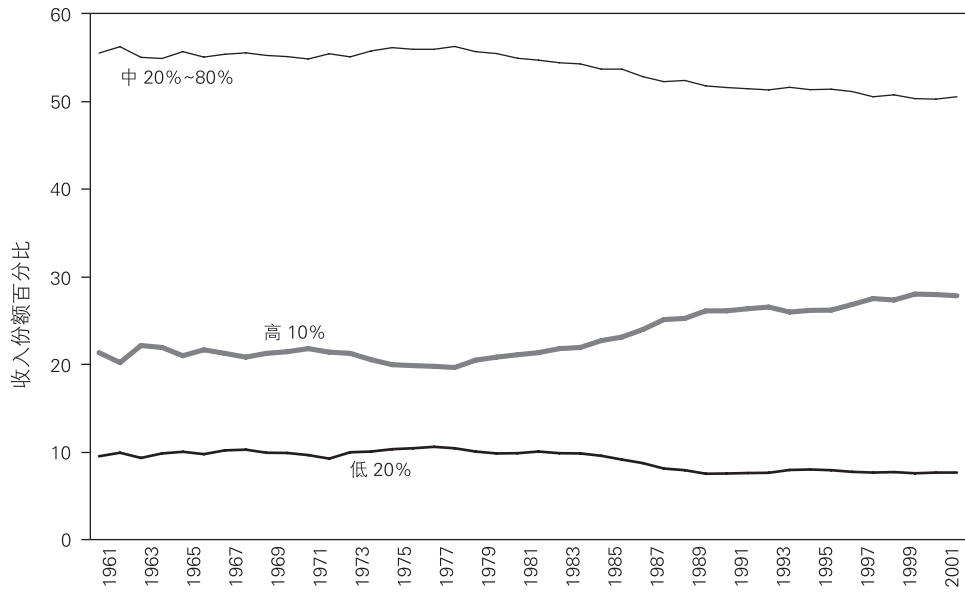


图10 英国：收入分配：不同群体收入份额，1961-2001年  
(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 (WIID)》，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 (UNU-WI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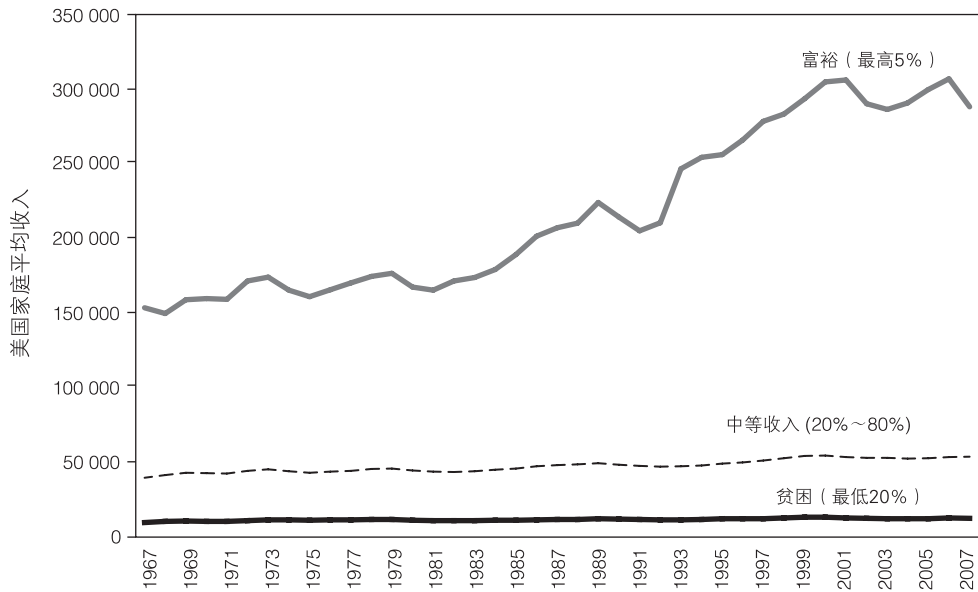


图11 美国：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实际收入，1967-2007年  
(2007年美元价格)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于相应的消费增长速度（Boone、Girouard及Wanner，2001；McConnell、Mosser及Perez- Quiros，1999）<sup>8</sup>。消费持续快速扩张需要繁荣的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速不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1/8。因此，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增速基本难以为北方国家维持历史增速所需的消费扩张提供支持<sup>9</sup>。此处的两难是如何说服中产阶级通过扩大消费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保持在2%~2.5%之间（其实际收入增速仅为0.3%）。

在以上环境中，只有信贷充裕及成本低廉且能够说服中产阶级接受日益升高的债务水平方可实现所需的消费增长。为何诸多家庭乐意接受宽松的信贷政策？来自新兴工业化大国和石油输出国的大量资金流是一个贡献因素；政府机构几乎完全放松金融管制和监督（致使新型高风险的金融工具激增）是另一因素。面对明显的资产—价格泡沫，美联储实施了一项以自由开放为基调的货币政策，并且未能有效落实其金融监管职能。

以上三个因素致使信贷及其他金融资源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消费经济领域，由此为奇迹（更准确地说是幻想）的最后一个要素创造了条件。该要素即各类资产价格飙升，尤其以房地产和股票为甚。资产价格飙升的驱动因素是对此类资产的需求迅速上升。大量金融资源持续流入消费经济领域助推以上需求迅速上升。由此产生的资本收益使普通民众感到更加富裕（尽管其收入水平基本未上升）——原因是收入增长的大部分由极少人口获得。（必要的）短期资本收益与更高的永久收入之间划分混乱，促使中产阶级家庭减少储蓄和快速扩大消费，放松信贷的措施提供所需资金，通常利用虚涨资产

8 实现增长的另一个潜在来源是出口。不过，鉴于出口产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重要性历来较低，即便出口快速扩张亦无法为国内增长提供足够支持。所占比例不足国内生产总值20%的投资亦不会对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此外，投资大体由消费需求自身驱动。

9 富裕人群税后收入飙升意味着其消费快速上升。与此同时，此类人群消费倾向远远低于中产阶级的事实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中产阶级的收入重新分配给富裕人群的行为对消费总量产生的净效应为负。

作为抵押。

通过放松信贷和降低利率，维持经济增长与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的两难问题得以“解决”。然而，此类措施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一增长模式要求在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梯段提升家庭债务水平。20年内，家庭债务负担增加2倍，占家庭年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45%升至2004年的120%（Taylor等，2008）。显而易见，以上措施并非永久性解决方案。

#### 4. 货币与金融监管综合症：“采取缓兵之计”

过去20年间，货币和金融领域由持续上升的收入集中度驱动的极端浪费行为为潜在的经济海啸创造了条件。中产阶级日趋依赖新借款为多数消费行为融资的现象导致限制货币政策和收紧金融监管的成本远远高过以往。事实上，利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还本付息后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下降速度为3倍。目前的负债收入比为1.2，20世纪80年代初为0.45。此外，由于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基本完全取决于新借款。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或实行更加严格的金融监管政策减少金融行业的高风险行为对消费领域具有更大的压制效应。因此，针对实体经济收紧金融和货币政策产生的效应或许明显高过以往。过去，家庭消费与永久收入之间的关系比其与新借款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货币和金融主管机构在认识到针对负债累累的经济体收紧货币和金融政策后，更不愿即时应对货币和金融领域的失衡现象，金融领域出现持久资产泡沫等严重“异常现象”的明显迹象后，也不愿实行有效监管，由此产生名为“成瘾”的严重监管综合症。在货币和金融领域实行改进措施拖延的越久，所涉及的短期调整成本就越高，决策者通过采取“缓兵之计”赢得时间，并将问题交由未来的金融和货币主管机构所需的激励措施越多。这种情况导致货币和金融主管机构愈加自满，由此加剧失衡现象。到货币和金融主管机构最终被迫采取必要措施之时，以上现象或将触发更加严重的危机。



## 五、初级产品价格与通货膨胀：危机

由于初级产品对北方国家消费需求的影响相对较小，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初级产品价格飙升最初几乎未对北方国家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然而，新兴工业化大国8%~10%的同比增长率对初级产品产生的大量需求导致此类产品价格猛涨（Bosworth和Collins，2008）。2003~2007年，初级产品价格飙升，开始影响美国等其他多个国家的整体消费价格指数（CPI）。消费价格指数若未影响所谓的“核心”通胀，这些国家的货币主管机构未必立即采取内化措施。然而，最终产生核心通胀现象。到2004年，消费价格指数上升1倍以上。该结果最终迫使美联储姗姗来迟地收紧货币政策，导致美国联邦基金实际利率从2004年第4季度的1.25%升至2007年年末的5%以上（参见图12）。

由于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不断增加的家庭债务和宽松的信贷措施（收入减少的中产阶级需要以此维持收入增长），2005~2007年期间的货币紧缩政策产生的严重后果远远超出以往同类政策。<sup>10</sup>事实上，此类政策导致经济繁荣结束，并且触发全球经济大衰退。首先，利率走高导致按揭利率随之上升，最终引发房地产市场瞬间崩盘。处于持久价格泡沫顶峰的房地产市场对按揭利率高度敏感。随着房地产价值走低以及早期资本收益大量蒸发，消费者突然意识到自己并非真正富有。

此外，信贷枯竭导致中产阶级继续借款愈加困难。更重要的是，消费者还本付息的成本大幅上升。

10 廉价信贷产生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属同类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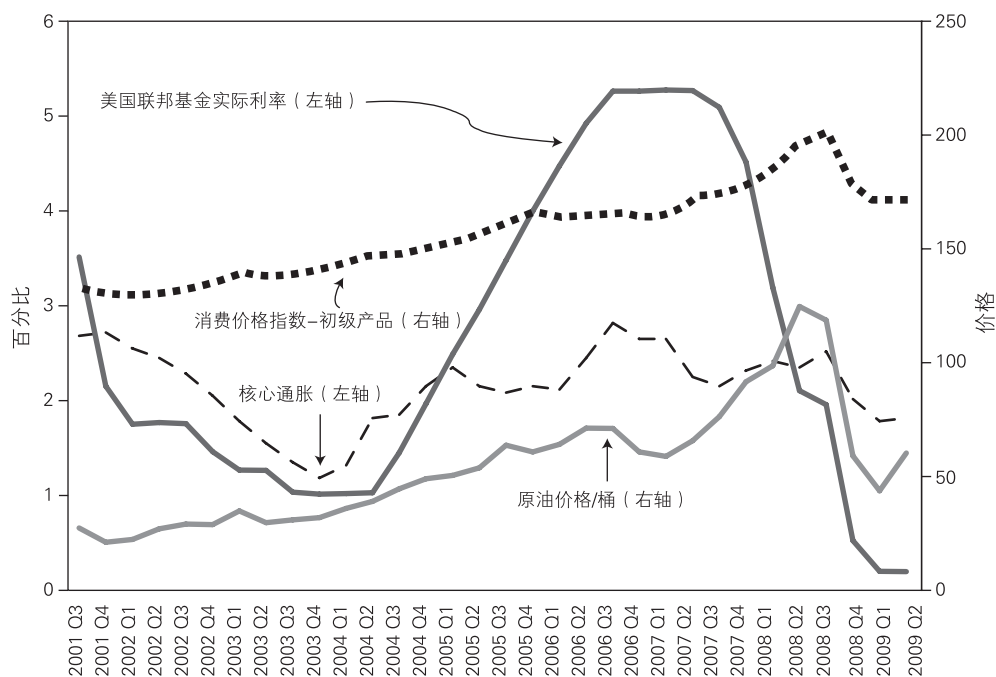


图12 美国：初级产品价格、通货膨胀及货币政策，2001-2009年

注：年份后的字母“Q”表示季度。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

高企的负债收入比致使消费者的收入更加难以承受利率上升的影响。这一切促使家庭针对其消费行为采取首轮调整措施，造成房地产市场广泛出现拖欠贷款的现象，进而导致金融崩盘，股票市场损失大量资金。大规模资金的损失意味着维持持续借款所需的抵押资产价值蒸发，进而对消费行为产生第二轮影响，最终导致危机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这种情况似乎正在对中产阶级收入和消费水平产生第三轮影响。随之而来的世界经济崩盘同时也导致全球初级产品需求和价格骤降。

### 应对危机的政策响应

北方国家的政府通过以下方式应对危机：①包括将国家资源大量转至大型金融和非金融公司的广泛救助过程；②显著放松货币政策，将短期名义利率几乎降至零，同时定量放松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由此顺利成为直接贷款方，尤其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购买中长期公债并直接借予大型金融机构；③大规模财政扩张，由此产生发达经济体史上鲜有的赤字。

预计基于赤字融资的全新财政支出将部分弥补大幅削减的私人开支，并在此过程中刺激经济复苏，后者或将吸引消费者恢复消费步伐。按照以上观点，经济复苏对私人消费产生刺激作用。经济复苏得益于两大因

素：一是财政扩张，二是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利率接近零。

然而，鉴于新的主流意识坚持拒绝通过进行结构转变将税务负担转至富裕人群，财政赤字意味着普通民众将承担大量新的金融负债，民众终须在提高税负和/或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偿债。换言之，消费者除了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崩盘而蒙受资金损失外，由财政赤字和增加的公债导致未来产生的潜在新债务也会进一步扩大其损失规模。这种消极的财富效应或将严重阻碍私人消费的显著复苏。因此，一旦收回大量临时性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世界经济将面临衰退风险。

此外，政府向金融企业及其他行业的大型企业提供的慷慨援助意味着资源从普通民众大规模转移至社会最富裕阶层。由此可能再次出现“大量财富转移”，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更易受到深层危机的影响。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加强对主要金融公司监管的事实意味着金融行业已“一切如常”。在此背景下，金融行业获得巨额利润，并向高管和交易员再次发放大量奖金。多数非金融行业则继续承受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

总之，亲精英的主流思想主导应对危机的政策响应内容。引发危机的部分结构性基础因素因此进一步恶化，意味着全球极易受到大规模危机影响。对中产阶级而言，从当前危机中复苏可能旷日持久并将承受阵痛。

## 六、结论

三大因素共同导致全球更易受到长期深层危机的影响，成为经济大萧条时期后前所未有的现象。其中一个因素——发达国家和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极端不平等——与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的状况同样严重。然而，与20世纪20年代不同的是，如今全球环境资源日渐匮乏。在关乎世界增长的全球初级产品需求弹性上升时期，上述问题正在降低初级产品供给的响应水平。因此，相比20世纪，经济增长如今与不断上涨的初级产品价格的关系更加紧密。愈加严重的财富不平

等现象、伴随而来的中产阶级贫困现象以及初级产品价格对全球扩张的高度响应将产生潜在的毁灭性经济后果。

如今，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水平受初级产品价格的直接影响有所减小。然而，由全球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初级产品价格持续攀升的现象导致核心通胀水平上升，进而迫使政府采取限制性货币政策。因此，目前全球更易爆发危机。相比过去，如今维持全球经济增长愈加困难。

为应对当前危机，发达国家前所未有地同时采取以下行动：大规模救助大公司，实行财政刺激措施和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崩盘导致民间借贷减少，公共借贷对缓解萧条状况起到了一定作用。实行宽松信贷政策的新时期似乎已经来临，唯一差异是如今的资源来自公共部门而非民间。此外，财政刺激措施产生巨额财政赤字，原因是政府通常不愿通过提高富人的税负——一些单独的象征性举措除外——至少为赤字提供部分资金。抵御危机的政策或许可防止大衰退演变为新的大萧条，不过对于解决本文探讨的结构性问题似乎基本没有作用。此外，救助大公司或许已通过从中产阶级到富豪阶层的第二轮财富转移导致其中某个因素恶化。

危机促使初级产品价格暂时降低以及通货膨胀率下降。然而，由于本文探讨的结构性因素继续存在以及应对危机期间形成的财政和货币领域严重失衡现象，即便世界经济适度复苏也使初级产品需求压力得到恢复。过去18个月，若干初级产品的价格增长了一倍以上。如果全球经济继续复苏，初级产品或将再次增加通胀压力。在此背景下，政府可能彻底改变货币政策，并通过提高税负减少财政赤字。此外，财政严重失衡意味着经济复苏必将对提升长期利率构成额外压力。最后，除非政府摒弃长期坚持的主流经济思想，否则未来必须增加的税负几乎必将由中产阶级承担，由此导致第三个结构性因素进一步恶化。<sup>11</sup>以上一切要素的净效应是或将抑制初期的增长复苏。

恢复持续经济增长要求解决基本的结构性因素问题：通过降低财富和收入集中度降低总需求对宽松信贷政策的依赖程度；通过加快技术变革减少全球经济增长对初级产品的依赖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实行新政策的前提是认识到基于精英思想的正统经济理论已归于失败。必须通过降低过高的财富集中度

再次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应通过大幅提高富豪阶层的税负消除中产阶级即将面临的税负上升产生的主要威胁。富豪阶层是唯一已经并将继续从危机中获益的群体。消除财政严重失衡现象的重任必须由富裕阶层而非中产阶级承担——不仅出于公平起见，同时也是经济持续复苏的前提条件。通过提高最高收入群体的税负恢复财政平衡将极大地提升普通民众信心，使其能够恢复消费扩张，进而提高财政和货币乘数，为更加持久的经济复苏铺平道路。

富裕阶层税负大幅上升是否将如主流思想所示危害经济增长？目前，美国边际所得税率最高为35%，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为91%。2009年，富裕阶层年收入超过200万等值美元。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边际所得税率长期高于60%。然而，该现象未阻止美国经济过去几十年间的快速增长。全球诸多其他实例表明，影响富裕阶层的极高边际税率未阻碍经济快速增长。

必须彻底改变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其他多项政策。必须加大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力度，同时在全球实施所谓的“托宾税”，对金融交易征收少量交易税。除了减少对无用金融投机活动的激励措施，以上措施还可提供重要的税收来源，从而帮助扭转多数发达经济体普遍存在的高危财政失衡现象。

得益于生产活动的非物质化和适当的环境监管行为，发达国家在控制其生产体系引起的环境和自然资源破坏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相关政策使内化生产行业产生的大量环境和自然资源成本成为可能。然而，外部性概念过于狭隘，仅关注经济活动对国内环境的影响。北方国家似乎并未因世界各地自然资源和環境遭到破坏而与发达国家以大量消耗原材料为特征的结构相关的事实感到不安。北方国家未认同其原材料消耗造成南方国家自然资源退化的事实导致全球初级产品短缺加剧。显而易见，必须通过监管北方国家的消耗行为内化对全球非北方国家内部造成的环境影响。此举将帮助南方国家防止环境遭到更多破坏，环境破坏将导致初级产品供给曲线弹性下降。

11 撰写本文期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支持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销售税。然而，众所周知，此类税负递减率较高，可能会对中产阶级构成新的打击。

##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S. Johnson and J.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5,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Autor, D., L. Katz and M. Kearney (2006),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6, No. 2,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Autor, D., F. Levy and R.J. Murnane (2003),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8, No. 4,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Barbier, E. (2005),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öhringer, C. and A. Löschel (2003), "Market power and hot air in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the impacts of US withdrawal from the Kyoto Protocol", *Applied Economics*, vol. 35, No. 6,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Boone, L., N. Girouard e I. Wanner (2001), "Financial market liberalisation, wealth and consumption",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308,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Bosworth, B. and S.M. Collins (2008),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2, No. 1,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Caprio, G., A. Demircuc-Kunt and E. Kane (2008), "The 2007 meltdown in structured securitization: searching for lessons, not scapegoat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756,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ard, D. and J.E. DiNardo (2002), "Skill 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rising wage inequality: some problems and puzzle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vol. 20, No. 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a Motta, R.S. (2003),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the Brazilian industrial sector", *Working Paper Series*, Rio de Janeiro,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IPEA).
- De Janvry, A. (197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57, No.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ngel, S. and R. López (2008), "Exploiting common resources with capital-intensive technologies: the role of external force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rrell, D. and A. Grant (2005), "China's looming talent shortage", *McKinsey Quarterly*, McKinsey & Company.
- Feenstra, R.C., J. Romalis and P. Schott (2001), "U.S. imports, exports and tariff data, 1989-2001", *NBER Working Papers*, No. 938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Ghertner, D.A. and M. Fripp (2007), "Trading away damage: quantifying environmental leakage through consumption-based, life-cycle analysis",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63, No. 2-3, Amsterdam, Elsevier.
- Gordon, R. and I. Dew-Becker (2007), "Selected issues in the rise of income inequalit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38, No. 2,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Huber, R.M, J. Ruitenbeek and R.S. da Motta (1998), "Market-based instruments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making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lessons from 11 countries",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 No. 38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Jerzmanowski, M. and M. Nabar (2008),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Wage Inequ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online] <http://ssrn.com/abstract=1280978>
- Kaplan, S.N. and J. Rauh (2009), "Wall Street and Main Street: what contributes to the rise in the highest income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23, No.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hor, M. (2000), "Globalization and the South: some critical issues", *Discussion Paper*, No. 147 (UNCTAD/OSG/DP/147),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April.
- Krugman, P. (2006), "The great wealth transfer", *Rolling Stone*, November.
- \_\_\_\_\_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Lall, S. and M. Albaladejo (2004), "China'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a threat to East Asian manufactured exports?", *World Development*, vol. 32, No. 9, Amsterdam, Elsevier.
- Levison, A. and M. Scott Taylor (2008), "Unmasking the pollution haven effec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49, No. 1,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Osaka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Association.
- López, R. (2008),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the ominous potency of structural change", document presented at the Sustainable Resource Use and Dynamics Conference (Switzerland, June 2008),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López, R. and A. Stocking (2009), "Bringing growth theory 'down to earth'", *Working Papers*, No. 09-01, 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Löschel, A. and Z. Zhang (2002),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the US repudiation of the Kyoto Protocol and the subsequent deals in Bonn and Marrakech",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vol. 138, No. 4, New York, Springer.
- McConnell, M.M., P.C. Mosser and G. Perez-Quiros (1999), "A

- decomposition of the increased stability of GDP growth”, *Current Issu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 Noland, M. (1997), “Has Asian export performance been uniqu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43, No. 1-2, Amsterdam, Elsevier.
- Panagariya, Arvind (2006), “India and China: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Working Paper*, No. 302, Stanford,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Philippon, T. and A. Reshef (2009), “Wages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US financial industry: 1909-2006”,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644,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Piketty, T. and E. Saez (2003),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8, No. 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February.
- Rodrik, D. (2007),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July.
- Saez, E. (2009), *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dated with 2007 estim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Shapiro, M.A. (2009),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East Asia: Policies and Technological Output*, document prepared for the APPAM-KDI Conference, Seoul.
- Simpson, D.R., M. Toman and R. Ayres (2005), *Scarcity and Growth Revisite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New Millennium*,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 Sloan, J. (1997), “The Reagan presidency, growing inequal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 25, No. 3,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Sokoloff, K.L. and S.L. Engerman (2000), “History lessons: institutions, factor endowments,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4, No. 3,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Taylor, P. and others (2008), *Inside the Middle Class: Bad Times Hit the Good Life*,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全球化  
经济形势  
发展中国家  
汇款  
国际贸易  
商品贸易  
资本流动  
经济指标  
拉丁美洲

# 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 与人类发展

*Gustav Ranis和Frances Stewart*

## 本

文探讨了拉丁美洲的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联系。随着资源基础扩张，经济增长可能促进人类发展，而较高水平的人类发展对经济增长又起到推动作用，因为健康和教育水平更高的人类有助于经济运行更完善。回归分析表明，拉丁美洲的人类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影响，但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却比世界其他地方要低很多，其原因很可能是债务危机带来的冲击。对成功和失败国家的案例分析表明，人类发展取得成功需要良好的经济表现以及高水平的社会支出，而人类发展履遭失败往往与冲突、自然灾害以及严苛的调整政策有关。对各国行为长期的跟踪研究证实，人类发展应予以优先考虑，以实现增长与更高水平的人类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Gustav Ranis**

Henry R. Luce, 耶鲁国际与地区  
研究中心 (YCIAS) 主任  
Frank Altschu, 耶鲁大学国际  
经济学教授  
⇒ [gustav.ranis@yale.edu](mailto:gustav.ranis@yale.edu)

**Frances Stewart**

牛津伊丽莎白女皇机构主任  
⇒ [frances.stewart@queenelizabeth-  
house.oxford.ac.uk](mailto:frances.stewart@queenelizabeth-house.oxford.ac.uk)

## 一、引言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人类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人类发展被定义为增加人们的选择，从而使他们活得更长、更健康、更充实。<sup>1</sup>这一定义非常宽泛，可以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众多选择。在本文中，我们把选择限定于健康和教育，因为健康和教育是实现其他选择的基本前提。本文沿袭了Al Berry众多著作的精神，他关注的重点不是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是分配，旨在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sup>2</sup>

在之前的一篇论文（Ranis、Stewart 和 Ramirez，2000）中，我们从理论及实证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发展（以本文中相当狭义的方式定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显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关联。一方面，

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资源支持人类发展的持续改善。另一方面，劳动力质量的提升构成了经济增长的要素。尽管这种总体的关联已然被人们接受，但还是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考察，才能对制定政策起到作用。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知道是否所有形式的经济增长都能促进人类发展，或是特定模式的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更有利；同样，是否所有形式的人类发展都能促进经济增长，还是特定类型的人类发展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是否在需要做出选择时明确优先顺序，比如，人类发展应优先于经济增长，还是先考虑经济增长，而把人类发展延后考虑。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基于世界各发展中地区的跨国数据，我们对理论上的关联进行了探讨，然后开展了实证分析。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我们得出了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在本文中，我们旨在研究这些总体结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拉丁美洲，以及从拉美的经验能得出何种政策结论。

本文的第二部分总结了我们前期工作的发现。第三部分针对拉丁美洲提出了一些经济计量学的估测结果，并与之前的全球发现进行对比。第四部分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最后，第五部分提出了简要的结论。

□ 本文最初是为纪念Albert Berry教授，在多伦多大学于2002年4月19日和20日主办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大会上发表。本文作者在此对Tavneet Suri的大力支持以及Prateek Tandon的宝贵帮助表示感谢。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中写道：“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使人们能够享受长寿、健康和有创造性的生活。”（UNDP，1990，第9页）该报告还把人类发展定义为“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第10页）。

2 早期的例子参见Berry和Urrutia（1976）；近期的例子参见Berry（ed.，1988）。

## 二、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前期研究的发现

我们认为，人类发展是人类活动的中心目标，而经济增长是推动人类活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同时，人类发展的成果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关键性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要审视两组**因果关系**：一组是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因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更多国民收入资源可用于促进人类发展；另一组是人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即人类发展作为终极目标如何帮助国民收入增长。这两组因果关系如图1所示。

### 1. 因果关系A：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人类发展决定因素相关文献的回顾，似乎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主要与以下渠道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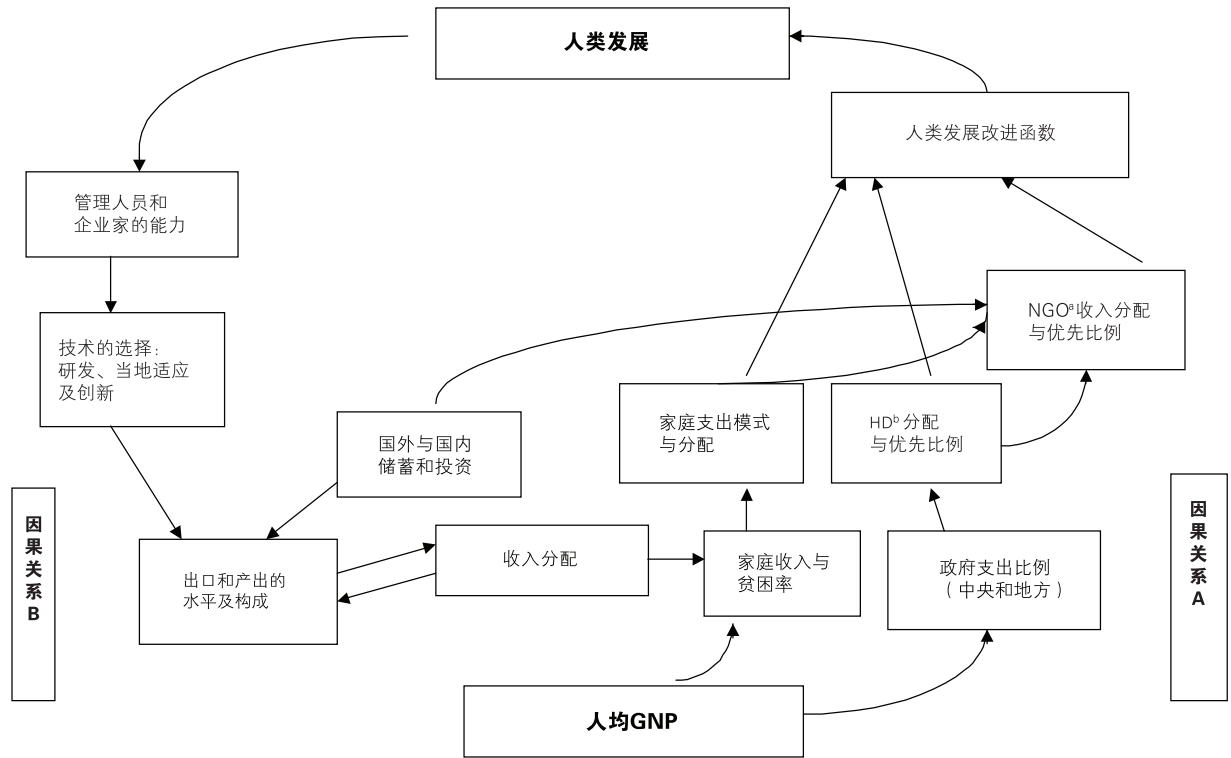


图1 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

注：<sup>a</sup> NGO: 非政府组织。

<sup>b</sup> HD: 人类发展。

资料来源: 本文作者。

①国内生产总值 (GDP) 在家庭与政府之间的分配。虽然两者角色不同, 但都对人类发展的条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间社会, 如通过社区组织和其他的非政府组织, 也起到一定作用。这些组织能得到多少资源取决于政府和家庭的资源分配决策。

②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由于贫穷家庭最缺乏资金, 因此提高这些家庭的收入更有可能促进本文所限定的人类发展 (教育和健康)。

③在贫穷国家, 家庭倾向于把税后收入用于最能直接促进人类发展的消费, 如食品、教育和医疗服务。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似乎是女性控制的收入比例。

④在政府方面, 用于提高人类发展的资源取决于公共部门支出总量、公共部门支出中用于人类发展相关领域的比例, 以及这些支出在各相关领域中的分配情况。

这可以通过三个比例来表达<sup>3</sup>: 公共支出比, 即各级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 (GNP) 的比例; 人类发展分配比, 即用于人类发展相关领域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 以及人类发展优先领域比, 即用于优先领域的支出占人类发展各相关部门总支出的比例。由于优先领域如何定义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 因此第三个比例相比之下更具主观性, 也更难衡量。但就医疗和教育而言, 有些支出显然比其他支出更有利于推进人类发展。例如, 特别是在那些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 人们普遍认为, 基础教育比高等教育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更大。

⑤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公民社会活动有可能促进人类发展。尽管这方面的资料比较零散, 但非政府组织的支

3 参见1991年人类发展报告。

出似乎非常明显地偏向于支持人类发展的目标, 如为穷人创造收入以及为学校、营养和健康项目筹资等。在大多数情况下, 非政府组织扮演着补充性甚至是边缘化角色, 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 孟加拉国农村促进委员会 (BRAC)、孟加拉国乡村银行, 肯尼亚的哈朗马比学校以及秘鲁的“民众食堂”都代表了促进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 (Riddell 等, 1995)。

⑥当然, 针对这些旨在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各种支出, 需要考虑其效果。人类发展的各项支出本身显然不是目的, 而是提升人们各方面基本福祉的工具。因果关系A中一个重要环节是, 哪类措施在哪个发展水平上最有成效, 以及不同的措施组合如何给人类发展带来变化。我们把这一环节称为人类发展改善函数; 就像生产函数一样, 它把人类发展的各项投入, 如医疗服务或饮用水方面的公共支出, 与实现更好的健康这一人类发展目标联系起来。

以上有关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的因果关系讨论表明, 经济与人类发展成就之间在总体上存在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但这些因果关系并非自动产生。因果关系A中的关联强度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 包括经济结构、收入与资产的分配以及政策选择。

## 2. 因果关系B: 人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现在我们来第二组因果关系。强有力的实证研究表明, 人们在健康、营养和教育状况更好的情况下能对经济增长做出更多的贡献。具体来说, 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①扩展基础教育可提高农村和城市劳动力的生产率。就农业而言, 教育提高了使用现代科技的农民的生产率, 但对于那些仍使用传统方法的农民影响较弱<sup>4</sup>。教育还是提升工业技术能力和促进技术变革的重要因素。

②健康与营养改善对劳动生产率有直接的影响, 对穷人而言更是如此<sup>5</sup>。例如, 在加纳和科特迪瓦开展的

研究 (Schultz和Tansel, 1993) 表明, 疾病对劳动生产率有负面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 有证据表明: 健康与营养对生产率的影响甚至大于正规教育所产生的影响, 尽管有关发展的文献更加强调教育的影响。

③中学教育, 包括职业学校, 促进技能及管理能力的掌握。

④高等教育支持基础科学的发展、进口技术的适当选择及国内改进和本地技术的开发。

⑤中等及高等教育是政府、法律和金融等领域关键机构发展的核心要素, 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⑥“新增长理论”从宏观角度纳入了技术进步的作用, 强调教育、从实践中学习以及研发。一些实证研究表明, 教育在宏观层面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但影响程度随教育的衡量方法及采用的具体宏观增长模型的不同而不同。<sup>6</sup>

⑦教育影响出口的性质和增长, 从而影响总体的增长率。有学者认为, 即便是无技能的工人在现代化工厂中也需要小学和初中教育所培养的识字、计算和守纪的能力 (Wood, 1994)。研究表明, 制造品出口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sup>7</sup>

⑧教育也会影响人口增长, 从而影响人均收入的增长。众多研究表明, 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生育率成反比 (Ainsworth、Beegle和Nyamete, 1995)。

⑨研究表明, 基础教育增强能带来更公平的收入分配 (Psacharopoulos等, 1992, 第48页)。近期研究表明, 更公平的资产和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sup>8</sup>。正如因果关系A中一样, 因果关系B中各环节之间的关联强度呈现变化, 人类发展水平提高并不一定带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当然, 光靠教育、健康和营养无法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国内及国外投资的质和量, 以及整体的政策环境, 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正如在因果关系A中一样, 收入分配在因果关系B中也显得很重要。

6 例如, Barro (1991) 以及Barro和Lee (1993a和b)。

7 例如, Michaely (1977), Krueger (1978), Ram (1985), Rana (1988) 和Edwards (1993)。

8 参见Alesina和Rodrik (1994), Alesina和Perotti (1994), Persson和Tabellini (1994) 以及Birdsall, Ross 和Sabot (1995)。

4 参见Schultz (1975), Welch (1970), Rosenzweig (1995), 以及Foster和Rosenzweig (1994)。

5 参见Behrman的调查, 1993和1996。

### 3. 实证研究发现

我们早期的实证研究使用了跨国回归分析，根据具体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35~76个发展中国家，时间跨度为1960~1992年。根据以上因果关系A的分析，我们检验了以下假设。

人类发展会取得更大进展：

A1: 经济发展更快；

A2: 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更低；在既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条件下，这意味着收入分配更加平均；

A3: 在既定收入水平的条件下，人们把更多的收入用于人类发展；这或许与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女性在家庭中财务支配权的大小有关；

A4: 政府用于社会支出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更高。

以预期寿命损失的降低为代表，将1970~1992年间的人类发展变化情况当作**因果关系A**中的因变量，我们发现：

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所有情况下都明显且强劲，更高的人均收入改善了人类发展水平。其中一个方程显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预计可使预期寿命降低减少3个百分点以上。

②政府的社会支出比例提高几乎总能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投入健康和教育的经费（滞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预期寿命降低就减少大约1.75个百分点。

③女性受小学教育的比例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显著，但对预期寿命的提高影响较小。我们将此归因于女性收入、知识和在家庭中的控制度对家庭行为的影响。

④出乎意料的是，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似乎并没有推动人类发展。

⑤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虚拟变量在这段时期都是负值且显著，考虑到参照的是高度成功的东亚，我们对此结果毫不意外。在每个案例中，系数都很小。

针对**因果关系B**，我们检验了以下假设。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会更好：

B1: 人类发展水平更高；

B2: 投资比例更高；

B3: 收入分配更平等。

把1970~1992年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当作因果关系B中的因变量，我们发现：

①人类发展初始水平的衡量总是显著相关，尽管系数低。

②预期寿命（1962~1982年）在所有情况下呈现积极显著变化，只有一个例外。

③国内投资率总是显著相关，但加入地区虚拟变量的情况除外。

④滞后的收入分配变量基本上都产生了预期的结果（如，更平均的收入分配与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关），且几乎总是显著相关，但加入地区虚拟变量的情况除外。

⑤拉丁美洲的地区虚拟变量都呈显著负相关，非洲的地区虚拟变量只有一例显著负相关。

总的来说，如果同时考虑两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并且人类发展也对经济增长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 4. 良性循环、恶性循环与畸形发展

我们的研究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这意味着高水平的人类发展会带来高增长，而高增长又会进一步促进人类发展，两者的良性互动不断推进经济体的发展。反之，低水平的人类发展可能会带来低增长，而低增长反过来又制约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

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我们把各国表现分为四类：良性循环、恶性循环及两类畸形发展，即人类发展水平高但经济增长速度慢的畸形发展（称为“人类发展偏重型”）以及人类发展水平低但经济增长速度快的畸形发展（称为“经济增长偏重型”）。在良性循环中，良好的人类发展加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促进人类发展。在恶性循环中，不良的人类发展会制约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表现不佳又妨碍人类发展的改善。以上所述的两组因果关系越强，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因果循环就表现得越明显，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两组因果关系表现较弱时，畸形发展可能会出现。一方面，如果因果关系中存在薄弱环节（如社会支出比例低），良好的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高水平的人类发展；另一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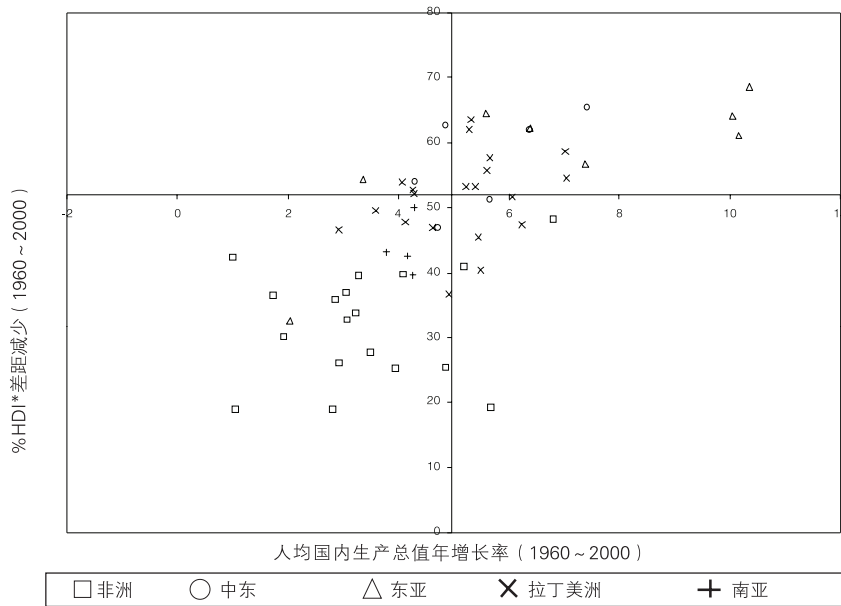


图2 各国表现分类，1960~2000年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

如果缺乏互补性资源（如投资率低），良好的人类发展不一定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然而，这种畸形发展难以持久。要么较弱的一方会拖累另一方并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要么通过政策调整加强因果关系之间的链接，最终进入良性循环。

为了从实证上给各国的表现分类，我们把每个国家的表现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做比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研究一个国家如何从一个类别转到

另一个类别。在我们早期研究中，两类畸形发展都不长久。事实上，研究得出的一个有趣的结论是，那些偏重经济增长的畸形发展国家没有一个转入良性循环模式，而是全部都陷入了恶性循环（不良的人类发展和低迷的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前期的全球分析表明，经济增长偏重型的畸形发展不可能转入良性循环，这是一条死胡同。相比之下，一些最开始偏重人类发展的国家都成功转入了良性循环。

### 三、拉丁美洲的角度

在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1960~2000年间的全球情景，其中纵向分界线代表发展中国家在减少人类发展差距上的平均值，横向分界线代表平均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两者都进行了人口加权。如图所示，拉丁美洲国家集中在人类发展偏重型的畸形发展及恶性循环类型。形成鲜明相比的是，东亚国家主要属于良性循环类型，而沙哈拉以南的非洲主要属于恶性循环类型。图2

采用的人类发展衡量方法，即人类发展指数，和UNDP计算人类发展指数（HDI）<sup>9</sup>的最新公式一样，唯一的区

9 UNDP人类发展指数目前包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最低为25岁，最高为85岁）；教育程度（成人识字率及小学、中学和大学加在一起的总入学率）；按照购买力平价加权计算的实际收入水平的对数（UNDP，2001）。



别是没有纳入收入这一指标，因为我们不想让收入作为人类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共同指标。

拉丁美洲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与该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债务危机的严重冲击有关。众所周知，80年代常被称为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如果我们来关注拉丁美洲各国之间在80年代的相对处境，我们可以看到那十年期间普遍都是负增长。像墨西哥这样于80年代收入不断下降的国家居然出现在良性循环象限。

以该地区的平均水平为基准，我们对拉丁美洲各国在1960~2000年期间的表现进行比较分类（如图3所示），发现有四个国家处于良性循环，分别是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巴拿马。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都处于恶性循环，少部分处于人类发展偏重型或经济增长偏重型的畸形发展象限。

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调查各国的变化轨迹很有启发性。表1列出了拉丁美洲各国在不同年代的相对位置。我们根据增长率和人类发展指数差距的缩小程度把这些国家分为良性循环、恶性循环、人类发展偏重型畸形发展和经济增长偏重型畸形发展四种类型，并关注各国在不同年代的分类变化。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变化都是

基于各国相对于拉丁美洲（而不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表现。我们发现，由于区域性总体特征及各国的具体原因，各国所属类型在不同时期发生了变化。和全球情况相比，拉丁美洲国家更为频繁地在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类型之间更迭。部分原因是参与比较的国家数量相对较少，且同一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似度更高，也就是说较小的变化就能导致一个国家转至另一个类别。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更为频繁的外部冲击可能导致此类变化的发生。

最重要的是，针对拉丁美洲的分析强化了我们之前的结论：一个国家不可能从经济增长偏重型的畸形发展转入良性循环。相比之下，人类发展偏重型的畸形发展国家却通常能转入良性循环，而经济增长偏重型的畸形发展国家则倾向于陷入恶性循环。这对政策的制定和排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遵循经常宣扬的增长优先模式，因为这一模式最终会损害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然而，促进人类发展则是创造持续增长及进一步提升人类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

我们可以把上述全球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发现应用于拉丁美洲，来验证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整体双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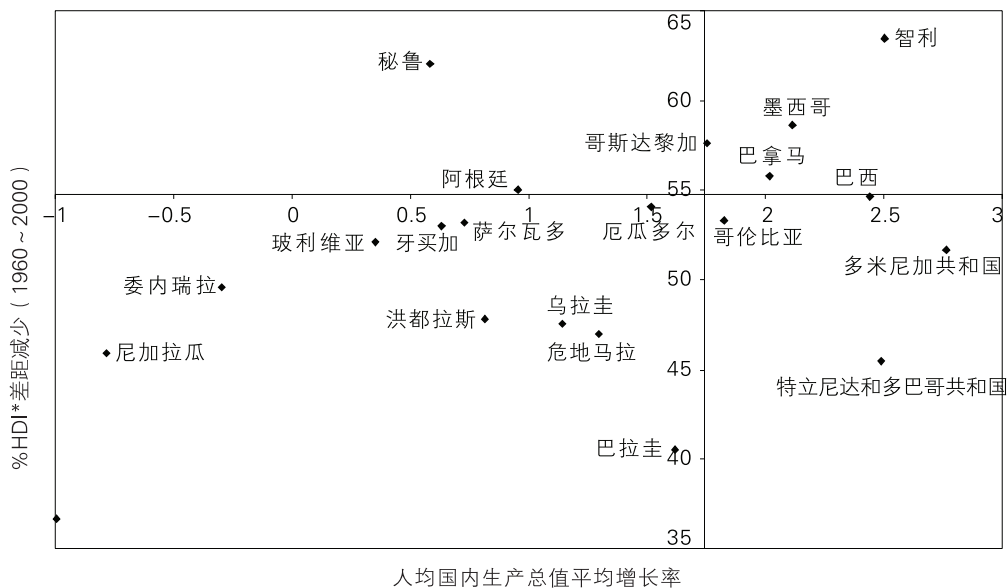


图3 拉美各国表现分类, 1960~2000年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

表1 拉丁美洲：根据人类发展（HD）与经济增长（EG）变化进行的国家分类，1960~2000年

| 国家       | 1960~1970 | 1970~1980 | 1980~1990 | 1990~2000 |
|----------|-----------|-----------|-----------|-----------|
| 阿根廷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良性循环      |
| 玻利维亚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 巴西       | 经济增长偏重型   | 经济增长偏重型   | 经济增长偏重型   | 恶性循环      |
| 智利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良性循环      |
| 哥伦比亚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良性循环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 哥斯达黎加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良性循环      | 良性循环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恶性循环      | 经济增长偏重型   | 经济增长偏重型   | 经济增长偏重型   |
| 厄瓜多尔     | 恶性循环      | 经济增长偏重型   | 良性循环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 萨尔瓦多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经济增长偏重型   |
| 危地马拉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 圭亚那      | —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良性循环      |
| 海地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 洪都拉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 牙买加      | 良性循环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良性循环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 墨西哥      | 良性循环      | 良性循环      | 良性循环      | 良性循环      |
| 尼加拉瓜     | 经济增长偏重型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 巴拿马      | 良性循环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良性循环      |
| 巴拉圭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良性循环      | 良性循环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 秘鲁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恶性循环      |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良性循环      | 良性循环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良性循环      |
| 乌拉圭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良性循环      | 良性循环      |
| 委内瑞拉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人类发展偏重型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各年）世界发展指标；UNDP（各年）人类发展报告。

关联以及两组因果关系中各个环节之间的关联程度。在拉丁美洲案例中，我们能进行的观测显然要少得多。因此，我们使用了每个年代及每个国家的数据（也就是时间序列加横截面）。分析结果见表2和表3。

针对**因果关系A**，我们把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作为可能的因变量进行调查（见表2的第一栏和第二栏）。在第一栏中，我们看到1960~2000年期间增长率和改善的人类发展指数之间存在正向不显著相关。在此，人类发展改善以预期寿命差距缩小来衡量。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sup>10</su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每个十年之初都与预期寿命差距缩小呈现正向显著相关。在第二栏中，我们看到女性小学入学率与婴儿死亡率差距缩小呈现正向显著相关。尽管我们还希望为收入分配引入一个变量，但由于数据有限，观测的数量会减少3/4。

针对**因果关系B**，我们发现人类发展成就的两个指

标（识字率与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的增长呈现正向显著相关。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组因果链条中，我们发现1990年的虚拟变量是负向的且高度显著。显然，这是债务危机带来的影响，表明人类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在20世纪80年代无法像在其他时段那样很好地促进经济增长。1999年的虚拟变量在因果关系B中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很可能是反映了提高和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持续影响。

从总体上看，我们发现在拉丁美洲的环境下，因果关系A比因果关系B更弱。也就是说，更好的人类发展在几十年中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却没有呈现与人类发展改善的显著相关。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及随后的调整需求，从而牺牲了用于人类发展的支出，而我们的全球研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此外，政策设定的变化，特别是优先领域所占的比例以及决定人类发展效率的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类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一点可在我们随后的国别案例分析中得到支持。

10 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故没有使用关于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数据。

**表2 因果关系A: 拉丁美洲经验提供的证据, 1960~2000年<sup>a,b</sup>**  
**最小平方方法: 因变量是人类发展在十年里的变化<sup>c</sup> (如1970~1980年)**

| 变量  | (1)                         | (2)                          |
|---|-----------------------------|------------------------------|
|   | 因变量: 预期寿命差距缩小               | 因变量: 婴儿死亡率差距缩小               |
| 十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br>(例如 1970~1980) X 100        | 3.99<br>(0.83)              | 1.23<br>(0.15)               |
| 教育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br>十年平均值 (如 1970~1980) X 100 | 1.23 <sup>d</sup><br>(1.92) | -0.25<br>(0.22)              |
| 女性小学毛入学率<br>十年平均值 (如1970~1980) X 10,000       | 1.42<br>(0.25)              | 0.17 <sup>d</sup><br>(1.74)  |
| 70年代虚拟变量 X 100                                | 0.90<br>(0.41)              | 9.80 <sup>e</sup><br>(2.54)  |
| 80年代虚拟变量 X 100                                | 3.22<br>(1.22)              | 12.07 <sup>e</sup><br>(2.63) |
| 90年代虚拟变量 X 100                                | -0.53<br>(0.23)             | 9.32 <sup>e</sup><br>(2.34)  |
| 截距 X 100                                      | 8.89 <sup>d</sup><br>(1.71) | 5.75<br>(0.63)               |
| 观察个数  | 76                          | 76                           |
| R <sup>2</sup>                                | 0.095                       | 0.220                        |

注: <sup>a</sup>如, 1970~1980年。

<sup>b</sup>70年代是省略的十年。

<sup>d</sup>表明显著性水平为10%。

<sup>c</sup>括号里的数字是t统计量绝对值。

<sup>e</sup>表明显著性水平为5%。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各年) 世界发展指标; UNDP (各年) 人类发展报告。

**表3 因果关系B: 拉丁美洲经验提供的证据, 1960~2000年**  
**(最小平方方法: 因变量为十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sup>a,b,c</sup>**

| 自变量   | (1)                                 | (2)                           |
|---|-------------------------------------|-------------------------------|
|   | 识字率, 十年平均值<br>(例如 1970~1980) X 1000 | 2.54 <sup>d</sup><br>(1.92)   |
| 预期寿命的对数, 十年平均值<br>(如 1970~1980) X 10              | -                                   | 3.94 <sup>d</sup><br>(1.80)   |
| 总的国内投资平均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br>十年值 (如1970~1980) X 1000 | 4.20<br>(1.05)                      | 4.54<br>(1.14)                |
| 70年代虚拟变量 X 100                                    | -0.45<br>(0.08)                     | -2.05<br>(0.36)               |
| 80年代虚拟变量 X 100                                    | -3.39 <sup>e</sup><br>(6.10)        | -3.63 <sup>e</sup><br>(6.03)  |
| 90年代虚拟变量 X 100                                    | -8.57<br>(1.49)                     | -11.53 <sup>d</sup><br>(1.75) |
| 截距 X 10   | -0.55<br>(0.53)                     | -14.80 <sup>d</sup><br>(1.72) |
| 观察个数  | 84                                  | 84                            |
| R <sup>2</sup>                                    | 0.414                               | 0.411                         |

注: <sup>a</sup>如, 1970~1980年。

<sup>b</sup>70年代是省略的十年。

<sup>d</sup>表明显著性水平为10%。

<sup>c</sup>括号里的数字是t统计量绝对值。

<sup>e</sup>表明显著性水平为1%。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各年) 世界发展指标。

## 四、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国别案例

在本部分中，我们要简要介绍三个成功的案例（良性循环）和三个失败的案例（恶性循环），目的是明确造成这些结果的特定环境和政策。

**智利**在整个40年期间都表现出色，尽管经历了政权的更迭和政策立场的巨大变化。

从20世纪初期开始，智利就致力于促进人类发展。早在1930年，就有3/4的成年人识字（Thorp, 1998）。在20世纪60年代及20世纪70年代早期Salvador Allende总统执政期间，政府通过大量的教育和医疗支出提升人类发展水平。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项社会支出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95%的6~14岁的孩子都接受小学教育，81%的新生婴儿由专业人士接生（Raczynski, 1987）。在此期间，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不大（每年1.6%），并且相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收入分配更为平均，因此造成了偏重于人类发展的结果。

Augusto Pinochet于1973年开始掌权，经济和社会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政策更加开放，并且减少了政府的作用。此后十年中，收入停滞不前（在初期上升之后），失业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6%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16%以上。然而，这些问题对人类发展的冲击被一些重要的就业计划所抵消。收入分配恶化，圣地亚哥的城市基尼系数从20世纪60年代的0.47上升到1978~1982年间的0.51<sup>11</sup>。1986年以后，经济迅速发展（在拉丁美洲增长率最高），主要原因是扩大了非传统初级产品的出口。

自20世纪60年代起，智利就建立起了广泛的国家福利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此外，那些得不到替代形式医疗的待产孕妇以及6岁以下的婴幼儿都可以参与到特别的治疗和预防医疗项目中。尽管总体的社会支出后来大幅削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5

年的4%下降到1990年的2%），但这些项目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由于实行分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瞄准机制的效果，智利的人类发展在开支下降的情况下得以持续提升。在教育方面，政府支出集中于中小学教育。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教育总支出比重从1980年的38%下降到1990年的19%。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的特别项目和补贴来保护弱势群体，特别是母亲和孩子，包括赤贫家庭补贴、母亲和学龄前儿童补充营养项目、营养不良儿童补助项目以及帮助减少辍学和留级的学校用餐项目（Raczynski, 1987）。公办学校的辍学率从1977年的7%下降到1984年的5%。公共医疗分权到市镇一级，由于预算有限，医疗资源更多地用于疾病预防，而不是治疗。婴儿死亡率从1972年的7.3%下降到1989年的1.7%。

从经济增长上来看，Augusto Pinochet执政的前十年并不成功，但由于削减社会开支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保持了人类发展的进步。也就是说，用于改善人类发展优先领域的支出所占比重明显提高，导致了偏重于人类发展的畸形模式。在Augusto Pinochet执政的最后几年，智利重新恢复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并且朝良性循环过渡。

1990年回归民主导致社会支出重新扩张，并且实现了持续且更平均主义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智利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5%，而20世纪80年代及70年代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和1.2%。失业率下降到低水平，公共就业计划可以停止，税制不断进行改革以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支付不断上涨的社会支出。从1990~1999年，教育与医疗方面的开支翻了一番多。因此，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良性循环，加快的增长和更多的社会支出支持了更高水平的人类发展；更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更高水平的人类发展又大大促进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提升。

和智利一样，**哥斯达黎加**也是长期致力于人类发展。到1950年，其文盲率仅为20%，而拉丁美洲地区

11 Riveros (1998)。Berry (ed., 1998, 第16页)认为，在1969~1978年期间，“大圣地亚哥地区家庭消费分布的数据显示在发展中国家有统计记录的最严重的分配不平等”。

的总体文盲率为40%以上(Thorpe, 1998)。1948年哥斯达黎加决定取消军队,从而腾出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支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高水平的社会支出才有所削减。1988年,政府再次将支出的一半用于健康和教育,近30%用于人类发展优先领域。

20世纪60~70年代,增长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年增长率达到5%~6%)。扩展后的福利制度几乎实现了全覆盖。哥斯达黎加用于教育的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小学适龄儿童全面入学,中学入学比例约占2/3,20~24岁的年轻人中有20%接受高等教育,并且男女入学比例相对均等。成人文盲率在20世纪60年代下降了8个百分点。到1980年,10岁以上的哥斯达黎加人中仅有13%不识字,到1999年该比例进一步下降到了4.5%。

健康的改善在20世纪60年代进展缓慢,但此后有所加快。20世纪60年代用于公共健康的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90年代末该比例上升到5%以上,增长很大一部分都在后期实现。20世纪60年代的预期寿命为67岁,到1980年上升到73岁,而在1995~2000年间则进一步上升到76岁。婴儿死亡率在整个60年代都处于较高水平,1960年为6.8%,到1970年稍有下降,为6.2%。此后进步明显,1980年下降到了1.9%,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1.2%。

在哥斯达黎加,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社会支出削减主要集中于人类发展的优先领域。位于社会底层的40%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从1980年的42%下降到1986年的36%。然而,社会支出在80年代后期恢复。此外,最低工资得到维持,收入分配没有变得更加不平均,人类发展重新实现了进步。因此,良性循环得以维系。

**墨西哥**在人类发展方面的进展要比智利或哥斯达黎加晚得多。20世纪60年代,1/3以上的成年人仍然是文盲。由于在1960~1999年期间人类发展的进步以及经济增长,墨西哥进入了良性循环,但达到的绝对水平仍明显低于智利和哥斯达黎加。例如到20世纪90年代末,预期寿命为67岁,略低于拉丁美洲平均水平(69岁),比智利(75岁)和哥斯达黎加(77岁)低一大截(Thorpe, 1998)。

在1970年以前Luis Echeverría总统执政期间,墨西哥

经历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人类发展也取得了进展。20世纪70年代,增长得到延续,但是需要靠大量的借贷和不断增长的财政失衡来维持。墨西哥在20世纪60年代末及整个70年代都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约为7%(人均增长在3%以上),制造业是全国的主要增长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绝对贫困从1960年的76%下降到1981年的45%,但收入分配保持在较高的不平等水平(基尼系数在0.5~0.6之间)(Maddison, 1992)。

墨西哥后革命时期的政府非常注重人类发展。20世纪60年代,人类发展主要强调土地改革、健康、卫生、教育和营养。20世纪70年代,教育开支平均占政府总开支的18%左右,而用于健康的开支所占比重为5%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年数据)。优先领域所占比重较高也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小学教育和疫苗接种得到了大量的公共资金支持。因此,人类发展从1960~1980年进展明显:预期寿命从59岁上升到66岁;婴儿死亡率从7.4%下降到5.3%;成人识字率从66%上升到83%;毛入学率几乎翻番,小学入学率从106%上升到120%,中学入学率从23%提高到49%,大学入学率从5%增至14%。

债台高筑的20世纪80年代情况则大大不同。墨西哥削减了公共支出比例,人类发展方面的支出也随之下降,1983~1988年期间每年下降6%。同期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也每年下降5%,失业率不断攀升,更多的人就业不足并陷入贫困。教育占总支出的比重几乎下降了30%,大部分削减的是小学教育经费(Friedmann、Lustig和Legovini, 1995)。1983~1988年期间,每所学校师生人数比率双双下滑,人均医疗机构、医院床位以及医生人数也都减少了。虽然在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方面乏善可陈,但墨西哥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仍然表现出色,尽管不能以世界标准来衡量。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经济改革之后,墨西哥的经济有所改善,其中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带来的外国投资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1994年和199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紧缩及社会支出的削减。在整个90年代,人均年增长率为1.25%(在80年代人均增长率为负值)。90年代初期,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度有所上升。1989~1993年间,教育支出增



加了90%，而健康支出增加了79%。食品补贴总体下降，但增加了瞄准机制（可惜效果不佳）。一个称为PRONASOL的大规模项目启动了，其目的是提高社会支出的投入产出比并促进更多的社区参与。其中一个称为“Solidaridad”（团结）的组成部分涵盖广泛的社会项目，包括教育和医疗，但却被批评受到当时执政党的政治操控。这些因素或许可解释墨西哥在90年代转入偏重经济增长的发展类型。上述项目在1995年重新命名为PRONOSOL并进行了重组，以减少其政治操控。

总体而言，由于其经济增长和社会支出，墨西哥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被纳入良性循环的类型。支持人类发展的另一个元素是女性权利更高的机制化，这促使了女性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瞄准机制不当，危机后削减社会支出以及80年代遗留下来的问题，90年代人类发展表现欠佳。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牙买加处于良性循环，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政府大力推进人类发展，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5.6%上升到1975年的12.2%。60年代，小学入学率从65%上升到85%，中学入学率则从15%上升到58%。到1970年，牙买加的预期寿命为68岁，识字率为86%，这两个指标都大大高于拉丁美洲地区的平均水平（Thorp, 1998）。然而，严重的经济问题及严苛的调整项目随后导致了人类发展滑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牙买加陷入了恶性循环。

20世纪70年代，多次严重的贸易冲击引发了经济紧缩。为了遵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金融建议，牙买加大幅削减了社会支出，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80年代。在严厉的调整政策下，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实际支出1980~1986年间下降了30%（世界银行，1984）。人类发展优先领域的支出所占比重也有所下降，尽管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相对稳定。普遍的食品补贴变成了针对特定人群的食品补贴，民众营养状况下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贫困人口增加。

牙买加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复苏，1986~1990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到2.4%，但社会支出并没有相应增长，因此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但社会支出在90年代初期有所上升，到1995年公共健康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2%，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4%。

牙买加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表现较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负值（90年代年均增长为-0.6%，而80年代为+0.3%）。但是，人类发展指标在90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也许为牙买加后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到90年代末，牙买加的预期寿命为75岁，成人识字率为86%，小学毛入学率为98%，中学毛入学率为90%，婴儿死亡率降低到2%。

圭亚那的情况和牙买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20世纪60年代，其不良的经济表现就制约了人类发展，此后包括削减社会支出在内的调整政策使人类发展雪上加霜。90年代，经济有所复苏，但人类发展方面并没有明显进展。

圭亚那1960年的预期寿命仅为60岁，婴儿死亡率则高达9.9%。1966年独立之后，圭亚那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社会支出有了明显的增长。例如，1970~1975年期间，教育支出增长了60%以上，健康支出的增幅超过了40%，中小学入学率也有所提高。20世纪70年代，政府大大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据估计，80%正式部门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由于外部环境的冲击（贸易条件恶化）以及内部管理不善，早期的经济增长很快终结，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经济危机。1975~1983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到低于独立前的水平。整个70年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约为0.7%。外部危机和内部管理不善在80年代仍然延续，政府接管了大部分零售与分销系统，但生产率却大幅下降。外汇配给和进口控制导致生产投入短缺，不良的基础设施进一步限制了经济的发展。80年代，经济增长为负值，人均收入每年下降3.9%，国内生产总值在十年期间累计下降28%。危机还导致社会支出削减，其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也下滑。1988年，教育支出仅占政府总支出的6.4%，健康支出占3.7%。

20世纪90年代，宏观政策发生变化，政府放开了外汇管制，取消了价格控制和进口限制，并鼓励私人投资。这些措施使经济增长大大提速。在这十年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2%（远高于拉丁美洲地区平均水平），但人类发展仍然滞后：圭亚那的预期寿命仅为64岁（拉丁美洲地区的平均水平为70岁），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为5.7%（拉丁美洲地区的平均水平为



3.1%)。然而,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从1990年开始有所上升。到90年代末,健康方面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9%,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8%。

**尼加拉瓜**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统治时期,包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桑地诺(Augusto Calderón Sandino)革命及随后的政府,其间内战不断;以及战后的90年代。尼加拉瓜是拉丁美洲在人类发展方面最后取得实质进展的国家之一。1960年,成年人中一半以上是文盲,预期寿命仅为47岁(Thorp, 1998)。

在索摩查时期,经济增长较快,但其结构严重失衡。索摩查家族就掌控了60%的国民经济活动。社会支出水平低,而且分配不均等。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仅有65%的适龄儿童上小学,而完成6年小学教育的仅为22%。在农村地区,3/4的人是文盲。婴儿死亡率高达10%。1965~1975年期间,5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人数翻了一番,而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也翻了一番。

1979年的革命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增长,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降了25%)。桑地诺政府致力于加大社会支出并改善资产和收入的分配状况。在其执政初期,即1980年和1981年,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了5%,社会支出和社会服务的范围也大大提高。中小学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了一倍,成人文盲率从50%下降到23%。医疗支出也大幅上升,疾病预防和基层医疗得以加强,集中消除婴儿、儿童和产妇死亡率的根源,扩

大了医疗覆盖范围,并鼓励了更高层次的社区参与。医疗和教育领域都设定了优先比例,取得了显著的进展。1980年,尼加拉瓜的预期寿命达到59岁(1960年为47岁),小学入学率达到94%(1960年为66%)。

然而由于受到内战、美国贸易禁运以及外国银行不愿投资的影响,1984~1990年期间尼加拉瓜的国内生产总值连年下降,80年代累计下跌超过40%。通货膨胀急剧上升,飓风和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到1990年,人均收入低于70年代的水平,并且在随后的十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下降4.1%。

尽管桑地诺政府做出了努力,但战争带来的经济崩溃和混乱最终影响了社会部门。例如,识字率回落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水平,婴儿死亡率在桑地诺执政早期一度降低到6.3%,但随后又开始上升,1989年达到7.2%。

战后的20世纪90年代充满了债务和调整问题,还有自然灾害,包括干旱和飓风。经济复苏从未真正开始,社会支出也受到削减。1990~1999年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勉强保持正值,为0.3%。

总而言之,索摩查时代表明,如果分配不平衡(收入和资产分配不均、社会支出水平低且优先领域所占比重不足),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不能转化成人类发展。相比之下,桑地诺政府在初期通过改进社会支出的分配和水平极大地促进了人类发展,但内战、贸易禁运和自然灾害又把这些成果一笔勾销。战后时期则饱受战争债务、资金不足以及严格的调整政策之苦。

## 五、结论

和全球发展中国家1960~2000年期间的平均水平相比,拉丁美洲地区整体上保持了较高水平的人类发展,但其经济增长表现却差强人意。拉丁美洲1960年的预期寿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这或许是由于该地区更早实现了政治独立并且在更大程度上致力于人类发展,特别是精英阶层。同时,拉丁美洲地区的收入分配

差距为全球最高(Berry, 1998)。

我们对两组因果关系A和B中各环关联强度的评估表明,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即因果关系A,在拉丁美洲显得比全球更具可变性。社会支出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并没有系统地转化成显著的人类发展,这说明各国具体的情况影响着因果关系链条

之间的关联强度。因果关系B，也就是人类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拉丁美洲的表现与全球结果更为一致，初始的人类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由于各国有关变量的资料有限并且能观察的国家个数更少，我们仅能对两组因果关系进行有限的检验。

我们通过拉丁美洲的国别案例了解到各国具体情况如何影响两组因果关系中的各环节关联强度。我们研究了在此期间三个转入良性循环的案例（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以及三个陷入恶性循环的案例（圭亚那、牙买加和尼加拉瓜）。

在三个成功的案例中，高增长和高水平的社会支出转化成了人类发展的成果。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墨西哥和20世纪60年代的智利都是如此。哥斯达黎加展现了另一条通往成功的路径，其特点是适度且分配较为均衡的增长，非常高水平的社会支出以及优先领域支出恰当。智利在中间一段时期（1975~1990年）展示了第三条成功路径，特点是瞄准机制非常好的社会支出，尽管增长很长时间都不均衡并且社会支出水平不高。后来，智利进入了高增长和高水平社会支出的行列。

显然，通向失败的路径多种多样。在索摩查执政时期，尼加拉瓜的个人收入以及社会服务分配都非常不平等，导致了因果关系链A中的关联强度显著下降。尽管

经济增速较快，却没有转化成人类发展的前进。20世纪80年代，牙买加经受了严重的经济冲击，在调整期间没能保持社会支出，因此导致人类发展领域的失败。圭亚那在同期的大部分时间以及尼加拉瓜在90年代也经历了类似的进程。80年代的内战和贸易禁运也削弱了尼加拉瓜的人类发展进程，而自然灾害更是每个年代都遭遇的问题。尼加拉瓜由于战争积累的沉重外债压垮了战后促进人类发展的努力，八九十年代的圭亚那也因债台高筑苦不堪言。

研究拉丁美洲各国跨时期的表现（见表1）证实了我们早期全球研究的结论，即必须促进人类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进步的良性循环。没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从偏重经济增长的畸形发展中转入良性循环。我们在拉丁美洲的回归分析还证实了一点：人类发展的进步确实会促进经济增长，尽管拉丁美洲地区经济增长并没有系统地转化成人类发展的成果。因此，我们的地区研究发现与通常倡导的政策顺序相矛盾。人们通常认为，经济增长处于优先地位，一旦经济发展了，人类发展就会自然跟上。最后乐观地来看，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在社会领域大幅增加投入，这也许会为21世纪前十年的经济加速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反观20世纪80年代，社会支出的削减不仅妨碍了经济增长，也影响了人类发展。

#### 参考文献

- Ainsworth, M., K. Beegle and A. Nyamete (1995): *The Impact of Female Schooling on Fertility and Contraceptive Use: A Study of Fourteen Sub-Saharan Countries*, LSMS working paper, No. 11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Alesina, A. and D. Rodrik (1994):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9, No. 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Alesina, A. and R. Perotti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Barro, R. (1991):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No. 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Barro, R. and J. Lee (1993a):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32, No. 3,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 \_\_\_\_\_ (1993b): Losers and winners in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Bank,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Behrman, J. R. (1993): The economic rationale for investing in nutri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1, No. 11, Oxford, U.K., Pergamon Press.
- \_\_\_\_\_ (1994): Intrafamily distrib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No. 33, Islamabad, Pakistan, TGE Pakista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_\_\_\_\_ (1996): The impact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on educatio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11, No. 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Berry, A. and M. Urrutia (1976):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olomb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erry, A. (ed.) (1998): *Poverty, Economic Refor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 Birdsall, N., D. Ross and R. Sabot (1995): Inequality and growth reconsidered: Lessons from East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 3,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Edwards, S. (1993): Opennes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1, No. 3,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Foster, A. D. and M. R. Rosenzweig (1994): Technical change and human resources and investments: Consequence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npublished.
- \_\_\_\_\_ (1995): Learning by doing and learning from others: Human capital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agricul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3, No. 6,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Friedmann, S., N. Lustig and A. Legovini (1995): Mexico: Social spending and food subsidies during adjustment in the 1980s, in N. Lustig (ed.), *Coping with Austerity: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everal years):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Yearbook*, Washington, D.C.
- Krueger, A. (1978): *Foreign Trade Regim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iberalization Attempts and Consequenc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allinger.
- Maddison, A. (199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 Brazil and Mexico*,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Michaely, M. (1977): Exports and growt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Developing Economics*, vol. 4, No. 1,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North-Holland.
- Persson, T. and G. Tabellini (1994):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5, No. 2,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Psacharopoulos, G. (1994): Returns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 global update, *World Development*, vol. 22, No. 9, Oxford, U.K., Pergamon Press.
- Psacharopoulos, G. and others (1992): *Pover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 1980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Raczynski, D. (1988): Social policy, poverty and vulnerable groups: Children in Chile, in G. Cornia, R. Jolly and F. Stewart (eds.), *Adjustment with a Human Face*, vol. 2,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 Ram, R. (1985):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Some additional ev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33, No. 2,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na, P. (1988): Exports, policy chang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fter the 1973 oil shock, *Developing Economics*, vol. 28, No. 3,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North-Holland.
- Ranis, G., F. Stewart and A. Ramírez (2000):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2, Oxford, U.K., Pergamon Press.
- Riddell, R. and others (1995):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veros, L. (1998): Chile's structural adjustment: Relevant policy lessons for Latin America, in A. Berry (ed.), *Poverty, Economic Refor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 Rosenzweig, M. R. (1995): Why are there returns to schooling?,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5, No. 2,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Schultz, T. W. (1975): The value of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3, No. 3,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Schultz, T. P. and A. Tansel (1993): *Measurement of Returns to Adult Health*, LSMS working paper, No. 9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Thorp, R. (1998): *Progress, Poverty and Exclusi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0):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lch, F. (1970): Education in produ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8, No. 1, Chicago,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od, A. (1994):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y: 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Driven Worl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1984): *Trend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 \_\_\_\_\_ (2001):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1*, Washington, D.C.



## 关键词

就业  
劳动力市场  
家庭收入  
贫困  
缓解贫困  
衡量  
数据分析  
统计数据  
住户调查  
拉丁美洲

# 1990~2005年 拉丁美洲的贫困与就业

*Simone Cecchini 和 Andras Uthoff*

## 自

199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贫困人口减少的原因是什么？本文深入研究了减少该地区贫困起作用的关键因素，特别包括了就业和劳动报酬。通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作者论述了适龄劳动人口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就业率、工作和其他来源的收入的变化对收入分布最低十分位组的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对贫困指标的影响。

Simone Cecchini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社会发展部社会事务官员  
⇒ [simone.cecchini@cepal.org](mailto:simone.cecchini@cepal.org)

Andras.Uthoff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社会发展部主任  
⇒ [andras.uthoff@cepal.org](mailto:andras.uthoff@cepal.org)

## 一、引言

对拉丁美洲的家庭而言，只有家庭成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获得较好的报酬，才是走出及远离贫困的最好且最具尊严的方式。因此，要减少贫困，经济增长必须能够为社会带来生产性就业机会和合理的工资，从而提高家庭收入。

联合国在其“千年发展计划”的新目标中认为劳动力相关因素在减贫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实现包括妇女和年轻人，让人人享有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及合宜的工作”（目标1.B）。这个新目标由联合国秘书长在2006年提出，2008年通过，并加入到第一个千年发展计划（即“根除极端贫困和饥饿”）中，强调在改善劳动力市场和人类福祉物质生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贸委员会（ECLAC）的最新评估，拉丁美洲贫困已到达较为严重的水平。数据表明：2006年，该地区37%的人口（1.74亿人）生活贫困，13%的人口（7100万人）生活极端贫困。即便仍有相当数量的拉丁美洲人生活资源有限，但贫困率已明显低于1990年的48%。就贫穷而言，情况相似。目前的比率较15年前的22.5%下降了9个多百分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7d）。然而，区域性的研究结果掩盖了国家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的事实，有些国家在过去的15年里根本没有减少贫困。

本文旨在找出自1990年以来促成拉丁美洲贫困减少的因素<sup>1</sup>。为此，我们采用了以下方法，即将家庭人均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并分析最脆弱的家庭人均收入变化，以确定与劳动力相关的变量以及人口统计变量、家庭结构和行为如何降低了该地区国家贫困的发生率。鉴于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国家资金转移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本文的分析还包括一个非劳动收入的变量，解释针对家庭的国家资金转移支付项目，以及诸如汇款、养老金或退休基金之类的其他收入来源。

本文所述的研究时间跨度为1990~2005年，即该地区国家必须达到千年发展计划第一个目标的25年计划期（1990~2015年）的前15年，该目标要求在此期间内将生活极端贫困的人口比例减半。虽然作者承认贫困是一个复杂、多维的现象，其中包括个人和集体福祉在多方面的匮乏（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3；Sen，1985），但本研究仍使用与第一个千年目标的后续衡量方式一致的货币收入作为指标。需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采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方法和关于贫困的定义，即指人们无法满足其最基本需要<sup>2</sup>。

考虑到该地区社会福祉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总贫困”<sup>3</sup>，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5a）为拉丁美洲提出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将生活在总贫困状况中的人口比例减半，而不仅仅是那些生活极端贫困的人口。本研究重点是所有贫困人口，而不仅限于极端贫困人口。因此，我们意识到，那些人均收入高出但非常接近贫困线的人群处于高度脆弱的境况，因为如果遇上经济危机或者可能暂时或永久减少家庭收入来源的情形时（疾病、家庭经济支柱残疾、孩子出生或其他），他们很容易陷入极端贫困。

第二部分，在有助于减少贫困的因素方面，我们使用了该地区16个国家通过住户调查所得的宏观数据，根据简单的分类方法计算。第三部分，通过分析数据来确定如何用总人口中的就业人员数量、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和总人口的非劳动收入的变化解释收入分配中不同十分位组人群的人均收入以及贫困指标变化。最后，第四部分阐述总结研究结果及探讨一些政策的意义。

□ 作者向Irma Arriagada, Reynaldo Bajraj, Christoph Ernst, Ernesto Espínola, Juan Carlos Feres, Marco Galván, Martín Hopenhayn, Arturo León, Fernando Medina, Pablo Villatoro, Jorge Rodríguez, Nora Ruedi和Jürgen Weller对本文之前的版本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

1 本文是评估有关劳动力和人口统计变量对减少贫困影响的一个新关注点。以收入为衡量标准考察决定贫困水平变化因素的最新研究有：Kakwani、Neri和Son（2006）关于巴西的研究，以及Núñez、Ramírez和Cuesta（2006）关于哥伦比亚的研究。

2 依据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贸委员会估算贫困的方法，当个人的人均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即无法满足其基本需求所需的最低金额时，则被归类为“穷人”。贫困线以相关国家的货币表示，由根据基本需求成本法计算而得的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决定。如需更多信息，参阅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贸委员会（2007d），box I.1。

3 “总贫困”指贫困人口及非贫困人口百分比（或数量）的总和。



## 二、与减少贫困相关的因素

### 1. 劳动力市场

在拉丁美洲，就业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为劳动报酬平均占家庭收入的80%以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7c）。但是，就业不足、失业、限制适龄劳动妇女参与劳动的高赡养比率、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和许多行业的低生产率都是高贫困率发生的原因。特别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7c）认为在该地区，工作质量的恶化已经削弱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减贫之间的联系。因此，首当其冲是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这样经济增长能够带来减贫的效果，而且能够提高贫困人口收入（Islam, 2004; Osmani, 2002）。

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已对拉丁美洲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有利的影响。自2003年以来，尽管就业人数显著增加，妇女也迅速进入劳动力市场，但该地区失业率呈下降趋势，在2007年达到8%，比2006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正规经济部门的实际工资也有所提高（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7b；国际劳工组织，2007）。

虽然2003~2007年间实现的积极成果，但造成贫困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该地区失业率仍然比1990年高出2个百分点，原因之一是经济活动参与的增加。失业人口，尤其是贫困人口中的失业人群仍然大量存在，拉丁美洲的城镇地区的失业人口总计有1700万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7b）。非正规经济部门<sup>4</sup>仍然是非常庞大，2005年所有城镇就业人员中近48.5%的人口从事非正式工作（国际劳工组织，2006）。该地区工人的医疗保险和退休福利覆盖的范围很小。此外，相比男性，女性的就业参与率仍然很低，失业率非常

高。劳动收入不平等非常明显。在该地区的每个国家，即使女性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工资水平仍低于男性，（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7a）。青年失业率是成年人失业率的两倍多：在当前这十年伊始，比值是16%比7%（Weller, 2006）。

### 2. 贫困的代际复制

两个主要因素造成贫困的复制及延续。其一是贫困家庭的劳动者收入低，原因是其人力资本有限和低生产率。另一个因素是贫困家庭中人口赡养比率高，这意味着家庭收入必须在更多的个人间分配。因此，贫困人群不仅劳动收入较低，而且还不得不摊薄该收入以确保大量受赡养家属的生存。在这两种情况下，特别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家庭行为和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贫困家庭中积极份子的人力资本不足是因为可选择的教育资源的有限，并且家庭要决定是否继续送子女上学。这是，至少部分程度上是就业机会有限的原因，并产生了恶性循环，复制出贫困：一方面，贫困家庭的成员受教育不多，得不到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这些家庭的儿童和年轻人很少有机会获得适当的教育和接受良好的培训（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7d）。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当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只得从事低生产率的工作。因此在贫困人群及那些虽然有工作但不太可能从事正式工作的工薪阶层中，失业率较高（见图1）。

当一个家庭在规模、结构以及成员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上的决定提升了受赡养的适龄工作家庭成员的百分比时，那么这个家庭的创收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决定的结果具有惯性，因为与家庭生命周期的某个特定阶段相关，也与生育有关的人口结构变化相关。关于家庭选址、家庭组成和分拆以及家庭生活安排的新类型的决定结果存在更间接的影响。当活跃

4 国际劳工组织将非正规经济部门定义为非专业自营者、家庭佣工、无薪家庭帮工和少于5名员工的公司的雇员的总和（国际劳工组织，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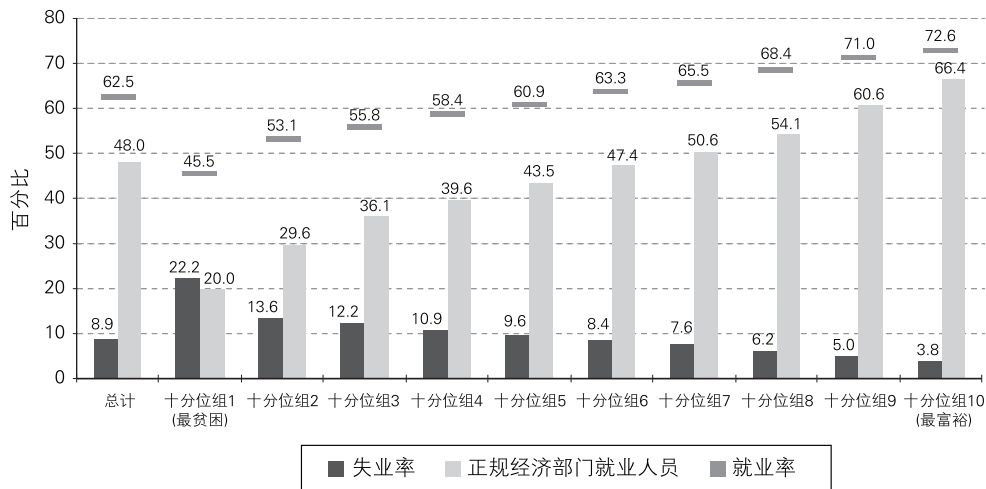


图1 拉丁美洲（18个国家，简单平均）：失业率、就业率和在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工人比例（相对于总就业人口），收入十分位数，全国总量，2005年左右<sup>a,b</sup>

注：<sup>a</sup> 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和乌拉圭的数据仅指城镇人口，而非总人口。

<sup>b</sup> 就业率指就业人口数量除以劳动年龄人口（E/WAP，总就业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在相关国家的住户调查数据基础上绘制。

成员离开家庭，或者年轻夫妇照顾不活跃成员，或者形成新的家庭单位分摊费用，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家庭分拆会改变赡养比率。

贫困家庭比非贫困家庭拥有更多家庭成员，且大部分是儿童，这导致了高赡养比率。虽然该地区各国赡养比率均有下降，带来所谓的“人口红利”<sup>5</sup>，但由于高生育水平，在最脆弱的社会经济阶层，赡养比率仍然非常高（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5b）。目前，最大的家庭可能主要存在于最贫困家庭的20%，而较小的家庭集中在最高收入的1/5家庭。在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城镇家庭平均拥有4.2~6.2名成员（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危地马拉），而最富有的家庭平均规模是2.1~4名成员（乌拉圭和尼加拉瓜）（Sunkel，2006）。

应切记拉丁美洲家庭的规模和机构由许多因素决定，包括国家人口结构转型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父权制家庭模式的危机。例如，在人口结构转型先进的国家，无子女的老年夫妇构成的核心家庭所占比例较高，与老年人和经济独立的年轻人构成的一人家庭的数量一样。正在经历中度或完全人口结构转型的国家，

有幼龄孩童的家庭更多。同时，在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家中，单亲家庭、延展家庭和复合家庭<sup>6</sup>所占比例更高（Arriagada，2004；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7a）。

将家庭内劳动分工的文化因素影响纳入考虑范围也同样重要，这大大限制了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在2005年左右，最贫穷的十分位组人群中有37%的拉丁美洲妇女参与经济活动，而最富裕的十分位组人群中有61%的拉丁美洲妇女参与其中。然而，对男性而言，几乎没有差别：在最贫穷的人群中的参与率是76%，而在最富裕的人群中的参与率是80%（见图2）。在此必须补充一点：照料经济的覆盖范围有限，这使得妇女无法在照顾子女、老人和家务与付薪工作之间兼顾。

简单地说，任何假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内，低生产率、低参与率、失业状况频繁出现和高人口赡养比率共同作用，成倍放大了相互之间的联系，由此构成了稀缺链。

6 延展家庭由父亲、母亲或父母双亲，有或无子女和其他亲属构成。复合家庭由父亲、母亲或父母双亲，有或无子女，有或无其他亲属或其他非相关人士构成，不包括与这个家庭或亲属居住在一起的家庭佣工。

5 见第四部分第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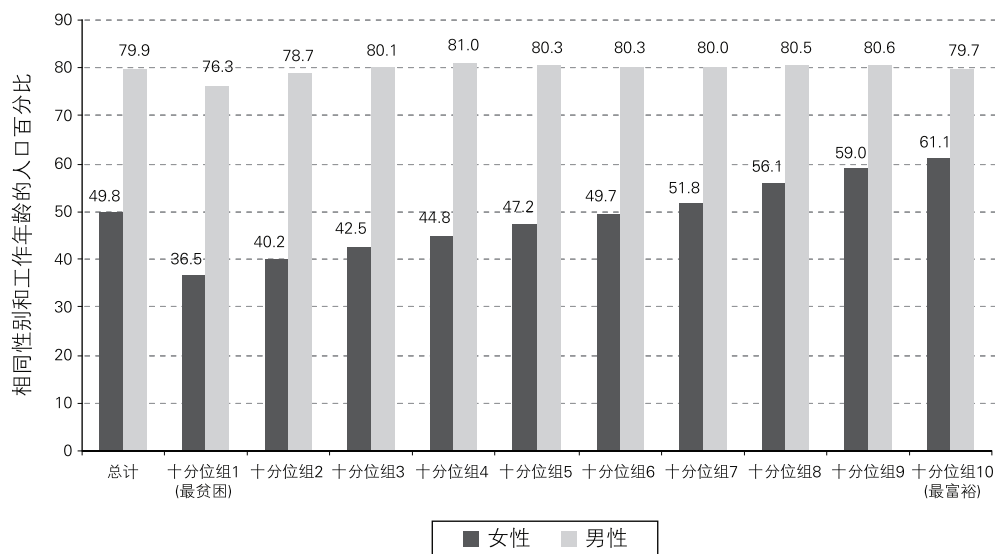


图2 拉丁美洲（18个国家，简单平均）：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收入十分位数，女性与男性，全国总量，2005年左右<sup>a</sup>

注：<sup>a</sup> 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和乌拉圭的数据仅指城镇人口，而非全国总人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在相关国家的住户调查数据基础上绘制。

### 3. 分解人均收入

贫困指标的趋势可以通过识别劳动力市场、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行为三者变化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分析。由于每个就业人口劳动收入（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代表性变量）和非劳动收入的提高带来的改变，以及就业人口数量相对总人口比例的变化（或“全球就业率”，为家庭结构和决定与劳动力市场中家庭成员的行为二者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贫困发生率可能会有所不同。其他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若有任何提升，特别是收入分配中处于较低十分位的组群，将有助于减少货币性贫困。同样，就业人员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或非劳动收入方面的任何增加，将有助于减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百分比。

人口的人均收入（ $Y/N$ ），是货币性贫困对家庭进行分类的指标，可以衡量从劳动力市场及其他来源，诸如国家资金转移、汇款、从金融资本所有权获得的利润

等获取收入的能力。将这个指标分解成三个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 全球就业率（或就业人员的数量 $E$ 除以总人口 $N$ ）：本测量结果涵盖了某一给定群体的年龄构成，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比例，以及该经济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2008年被采用，作为跟进千年发展目标的新官方指标，也被称为就业人口比率。
- 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 $YL/E$ ）：劳动生产率的代表性衡量指标。
- 人均非劳动收入（ $YNL/N$ ）：本测量结果指各种收入来源，包括国家对家庭的资金转移，私人对家庭的资金转移，物业租金和以估算租金形式获得的租金。

$$\frac{Y}{N} = \left( \frac{E}{N} \times \frac{YL}{E} \right) + \frac{YNL}{N} \quad (1)$$

全球就业率可依次分解为以下要素：

- 人口赡养比率：劳动年龄人口WAP比总人口N的比率
- 参与率：经济活跃人口EAP除以劳动年龄人口WAP
- 净就业率：就业人员数量E除以经济活跃人口EAP；这是对失业率的补充（ $E/EAP=1-$ 失业率）

$$\frac{Y}{N} = \left[ \left( \frac{WAP}{N} \times \frac{EAP}{WAP} \times \frac{E}{EAP} \right) \times \left( \frac{YL}{E} \right) \right] + \frac{YNL}{N} \quad (2)$$

为分析1990~2005年人均收入趋势，全球就业率、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人均非劳动收入主要部分的数值按以下公式计算：

$$\begin{aligned} \frac{Y}{N}(2005) - \frac{Y}{N}(1990) = & \left[ \frac{YL}{E}(2005) \times \left( \frac{E}{N}(2005) - \frac{E}{N}(1990) \right) \right] + \\ & \left[ \frac{E}{N}(1990) \times \left( \frac{YL}{E}(2005) - \frac{YL}{E}(1990) \right) \right] + \left( \frac{YNL}{N} \right)(2005) - \left( \frac{YNL}{N} \right)(1990) \end{aligned} \quad (3)$$

就业人数、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和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收入增加能够帮助开始走出贫穷的家庭减少货币性贫困。

#### 4. 经济周期的影响

整个经济周期，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在很大程度上由劳动生产率决定，因此倾向于顺周期，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时增加，经济衰退时减少。收入顺周期的程度取决于在一个给定的劳动力市场中调节机制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它们对数量（就业/失业）或是价格（工资）依赖性更大。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劳动收入，如劳动保护水平和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工会化的程度，集体谈判和其他方面）。

包括汇款、实物收入、租金收入等资金转移在内的非劳动收入不一定是顺周期，而针对贫困家庭的公共资金转移其实应该是反周期（换句话说，它们应该在经济危机时有所增加）。

因为就业人数预期与国内生产总值共同增长，经济

衰退时下降，所以净就业率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sup>7</sup>。但是，在经济增长长期时，经济活跃人口（该指标的分母）也有可能增加，因为更多适龄劳动人口可能想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可能抵消顺周期效应。

参与率说明了决定参与经济活动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行为。因此，它可以测量劳动力的供给，建立起工作或希望工作的人口数量（活跃人群）与正在工作的人口数量之间的联系（Navarrete, 2005）<sup>8</sup>。人们受需求、鼓励措施和阻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限制因素影响。如果不具备工作技能、身患残障或者必须履行一些妨碍外出工作的职责，各种不同的限制因素很容易阻止其外出找工作。另外一些情况是，激励措施可能鼓励一些人考虑进入劳动力市场，因为他们认为把时间花费在劳动力市场会得到更高的回报。另一些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受基本需求所迫，不得不从事一项谋生的经济活动。只要此前一直在从事无薪家务劳动的广大社会阶层（特别是妇女）能够开始从事付薪工作，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参与率上升。然而，因为不同人群在整个经济周期中需求、激励和限制因素不同，总参与率与经济周期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一直很清晰<sup>9</sup>。

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结构性组成成分，由人口趋势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决定。应当注意，劳动年龄人口仅代表家庭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可能来源，因为该部分包括了非活跃人员，且活跃人员中，有些就业，有些失业。此外，就业人员中，有些充分就业，有些未充分就业（Uthoff、Vera和Ruedi, 2006）。

7 同样，在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时，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比例很可能随着失业率一起上升（国际劳工组织，2006）。

8 “不活跃”人群指不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通常是从事无薪家务劳动的人员和学生，不过非活跃人员还包括退休人员、独立生活来源的人员以及残障人员。

9 Kakwani、Neri和Son（2006）发现，1995~2004年期间，巴西贫困人口参与率的顺周期性超过总人口的相应比率。

### 三、全球就业率变化以及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变化对减少贫困的影响

通过分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人均收入数据，可以研究涉及减贫的因素；分解需要考虑就业人员的比例、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和从非劳动来源获得的收入<sup>10</sup>。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改善对于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产生影响显而易见，而人口和家庭变化的影响将体现在就业人员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一个家庭关于其成员在劳动力市场上参与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劳动力市场上创造的新就业机会的拉动，另一个是不同国家对照料经济的内在限制。

如表1所示，对收入分布的每个十分位组，人均家庭收入数值（以贫困线的倍数表示）以及由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全球就业率、人均非劳动收入变化导致的预计变动，见以上的公式（3）。

在表1的基础上，表2根据该研究期间发生的变动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分组，分列出1990年左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十分位组人群人均收入的三个构成部分，以及各个国家在此期间贫困总发生率的变化。

#### 1. 贫困家庭变化要素的相对重要性

观察那些平均收入等于或低于贫困线的十分位组的变化趋势时，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除了最显著的乌拉圭城镇地区和程度较轻的巴拉圭亚松森大都会区，当贫困家庭的活跃成员比例较高时，国家已经承担起对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第二，全球就业率上升主要是人口赡养比率下降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少数情况下足以惠及最贫困家庭，智利、巴西和厄瓜多尔（城镇地区）除外。第三，由于本研究范围以外的某些原因，贫困人群的非劳动收入总体上已有所上升。如果没有把第三部分包括的收入来源进

行详细分解，就无法得出关于国家对家庭的资金转移、汇款和其他来源（诸如养老金和其他退休后的收入等）的相对重要性<sup>11</sup>。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研究范围内16个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实质性成果：3个国家实现了每个就业人员劳动收入的增加（智利、巴西、厄瓜多尔的城镇地区），墨西哥和巴拿马显著提高了就业人员比例。同时，墨西哥和巴拿马的妇女参与经济活动比率大幅上升。在巴拿马，还伴随着失业率的大幅下降。其余国家的减贫事业小幅改善或根本没有改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表现不佳。在贫困显著减少的国家中，主要变化体现在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组成和参与的家庭行为。虽然这些现象在其他国家也相当普遍，但是生产率的提高或对家庭的资金转移并未推动减贫效果的改善。

#### 2. 劳动力市场作为在不同国家间对贫困趋势差异的影响因素

通过比较减贫工作取得较好和较差成果的国家，可以发现劳动力市场表现存在显著差异（见图3）。如图中A部分所示，巴西、智利和厄瓜多尔城镇地区的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浅灰色条）的增长，与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黑色条）的增长相辅相成，体现了劳动力市场的强劲增长；这里还需提及非劳动收入的增加（深灰色条）。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国家的家庭收入显著增加，从而降低了贫困率。这从1990年（黑色曲线）和2005年（灰色曲线）人均收入分布曲线的向左移得到体现，即跨越了收入分布中较低十分位组的贫困线。另一方面，在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

10 研究贫困趋势时，就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趋势、总就业率趋势和人均非劳动收入而言，重要的是观察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状况。平均收入的增加可能掩盖不利于穷人人群的局面，如最富裕的十分位组的改善以及最贫困的十分位组的恶化。

11 近年来，国家对贫困家庭的资金转移往往是以贫困家庭的行为转变为条件，旨在帮助贫困家庭增加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提高生产率，提高时间利用率或为其提供生产性资产的机会（拉加经委会，2006）。有关汇款对贫困和不平等影响的讨论，参见拉加经委会（2005b）。



**表1 拉丁美洲（16个国家）：人均家庭收入及其由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全球就业率、人均非劳动收入<sup>a</sup>**  
**（以贫困线的倍数表示）变化导致的变动的分解，收入分布十分位数，1989年/1995~2001年/2005年**

| 国家   | 人均收入<br>(Y/N)   | 总计    | 十分位组<br>I  | 十分位组<br>II | 十分位组<br>III | 十分位组<br>IV | 十分位组<br>V  | 十分位组<br>VI | 十分位组<br>VII | 十分位组<br>VIII | 十分位组<br>IX | 十分位组<br>X |
|--|-----------------|-------|------------|------------|-------------|------------|------------|------------|-------------|--------------|------------|-----------|
| <b>第一集团：贫困显著减少</b> (贫困人口指数的变动低于-1.5% 每年) <sup>b</sup>        |                 |       |            |            |             |            |            |            |             |              |            |           |
| 智利   | Y/N 1990        | 2.41  | <b>0.3</b> | <b>0.5</b> | <b>0.7</b>  | <b>0.9</b> | 1.1        | 1.4        | 1.8         | 2.4          | 3.7        | 11.1      |
|  | Y/N 2003        | 3.71  | <b>0.5</b> | <b>0.9</b> | 1.2         | 1.5        | 1.8        | 2.2        | 2.8         | 3.7          | 5.5        | 17.2      |
|  | Δ Y/N (Δ YL/O)  | 0.85  | 0.06       | 0.15       | 0.21        | 0.23       | 0.40       | 0.48       | 0.64        | 0.83         | 1.23       | 4.21      |
|  | Δ Y/N (Δ O/N)   | 0.31  | 0.02       | 0.05       | 0.10        | 0.14       | 0.11       | 0.17       | 0.21        | 0.35         | 0.48       | 1.51      |
|  | Δ Y/N (Δ YNL/N) | 0.14  | 0.10       | 0.11       | 0.12        | 0.15       | 0.14       | 0.14       | 0.14        | 0.09         | 0.10       | 0.37      |
| 厄瓜多尔 <sup>c</sup>  | Y/N 1990        | 1.19  | <b>0.2</b> | <b>0.4</b> | <b>0.5</b>  | <b>0.6</b> | <b>0.7</b> | <b>0.9</b> | 1.1         | 1.4          | 1.9        | 4.3       |
|  | Y/N 2005        | 1.83  | <b>0.2</b> | <b>0.5</b> | <b>0.6</b>  | <b>0.8</b> | 1.0        | 1.3        | 1.6         | 2.1          | 2.9        | 7.4       |
|  | Δ Y/N (Δ YL/O)  | 0.27  | -0.01      | -0.02      | 0.01        | 0.04       | 0.06       | 0.12       | 0.16        | 0.30         | 0.48       | 1.86      |
|  | Δ Y/N (Δ O/N)   | 0.24  | 0.04       | 0.08       | 0.11        | 0.11       | 0.15       | 0.18       | 0.24        | 0.20         | 0.36       | 0.63      |
|  | Δ Y/N (Δ YNL/N) | 0.13  | 0.03       | 0.02       | 0.04        | 0.05       | 0.04       | 0.08       | 0.11        | 0.19         | 0.22       | 0.64      |
| 巴西   | Y/N 1990        | 2.40  | <b>0.2</b> | <b>0.3</b> | <b>0.5</b>  | <b>0.7</b> | <b>0.9</b> | 1.2        | 1.7         | 2.4          | 4.0        | 12.1      |
|  | Y/N 2005        | 2.95  | <b>0.2</b> | <b>0.5</b> | <b>0.7</b>  | 1.0        | 1.3        | 1.6        | 2.1         | 2.8          | 4.4        | 15.0      |
|  | Δ Y/N (Δ YL/O)  | -0.23 | -0.01      | 0.04       | 0.05        | 0.04       | 0.04       | -0.03      | -0.11       | -0.25        | -0.45      | -1.22     |
|  | Δ Y/N (Δ O/N)   | 0.22  | 0.04       | 0.04       | 0.07        | 0.09       | 0.09       | 0.17       | 0.09        | 0.35         | 0.36       | 0.53      |
|  | Δ Y/N (Δ YNL/N) | 0.56  | 0.02       | 0.07       | 0.09        | 0.13       | 0.23       | 0.27       | 0.47        | 0.33         | 0.52       | 3.51      |
| 巴拿马  | Y/N 1991        | 2.17  | <b>0.2</b> | <b>0.4</b> | <b>0.6</b>  | <b>0.8</b> | 1.0        | 1.3        | 1.8         | 2.4          | 3.6        | 9.5       |
|  | Y/N 2005        | 2.68  | <b>0.2</b> | <b>0.5</b> | <b>0.8</b>  | 1.0        | 1.4        | 1.8        | 2.3         | 3.2          | 4.7        | 11.0      |
|  | Δ Y/N (Δ YL/O)  | 0.02  | -0.06      | -0.05      | 0.01        | 0.02       | 0.08       | 0.10       | 0.08        | 0.04         | 0.01       | 0.24      |
|  | Δ Y/N (Δ O/N)   | 0.34  | 0.04       | 0.05       | 0.08        | 0.15       | 0.13       | 0.20       | 0.28        | 0.39         | 0.72       | 1.01      |
|  | Δ Y/N (Δ YNL/N) | 0.16  | 0.02       | 0.06       | 0.07        | 0.08       | 0.13       | 0.13       | 0.22        | 0.30         | 0.32       | 0.25      |
| 墨西哥  | Y/N 1989        | 1.87  | <b>0.3</b> | <b>0.5</b> | <b>0.6</b>  | <b>0.8</b> | <b>0.9</b> | 1.2        | 1.5         | 1.9          | 2.7        | 8.5       |
|  | Y/N 2005        | 2.27  | <b>0.3</b> | <b>0.5</b> | <b>0.7</b>  | 1.0        | 1.2        | 1.5        | 1.9         | 2.4          | 3.4        | 9.8       |
|  | Δ Y/N (Δ YL/O)  | 0.03  | -0.04      | -0.04      | -0.01       | -0.03      | 0.01       | -0.01      | 0.07        | 0.05         | 0.06       | 0.30      |
|  | Δ Y/N (Δ O/N)   | 0.36  | 0.04       | 0.08       | 0.10        | 0.16       | 0.19       | 0.30       | 0.24        | 0.44         | 0.58       | 1.39      |
|  | Δ Y/N (Δ YNL/N) | 0.01  | 0.04       | 0.05       | 0.04        | 0.06       | 0.05       | 0.04       | 0.10        | 0.03         | 0.07       | -0.31     |
| <b>第二集团：贫困轻微减少</b> (贫困人口指数的变动介于-1.5%与-0.5%之间每年) <sup>b</sup> |                 |       |            |            |             |            |            |            |             |              |            |           |
| 萨尔瓦多   | Y/N 1995        | 1.42  | <b>0.1</b> | <b>0.3</b> | <b>0.5</b>  | <b>0.7</b> | <b>0.8</b> | 1.0        | 1.3         | 1.6          | 2.3        | 5.6       |
|  | Y/N 2004        | 1.55  | <b>0.2</b> | <b>0.4</b> | <b>0.6</b>  | <b>0.7</b> | <b>0.9</b> | 1.1        | 1.4         | 1.9          | 2.6        | 5.7       |
|  | Δ Y/N (Δ YL/O)  | 0.00  | -0.12      | -0.03      | 0.01        | 0.02       | 0.03       | 0.04       | 0.09        | 0.11         | 0.09       | -0.04     |
|  | Δ Y/N (Δ O/N)   | 0.06  | 0.01       | 0.04       | 0.02        | 0.05       | 0.06       | 0.01       | 0.03        | 0.09         | 0.05       | 0.00      |
|  | Δ Y/N (Δ YNL/N) | 0.07  | 0.05       | 0.03       | 0.05        | 0.01       | 0.00       | 0.07       | 0.06        | 0.06         | 0.20       | 0.12      |
| 哥斯达黎加  | Y/N 1990        | 2.17  | <b>0.3</b> | <b>0.7</b> | <b>0.9</b>  | 1.2        | 1.5        | 1.8        | 2.2         | 2.8          | 3.6        | 7.0       |
|  | Y/N 2005        | 2.78  | <b>0.4</b> | <b>0.8</b> | 1.1         | 1.4        | 1.7        | 2.1        | 2.6         | 3.4          | 4.7        | 9.8       |
|  | Δ Y/N (Δ YL/O)  | 0.16  | 0.02       | -0.02      | -0.02       | -0.02      | 0.00       | -0.02      | -0.02       | 0.09         | 0.45       | 1.21      |
|  | Δ Y/N (Δ O/N)   | 0.33  | 0.02       | 0.08       | 0.13        | 0.17       | 0.22       | 0.27       | 0.39        | 0.47         | 0.46       | 0.96      |
|  | Δ Y/N (Δ YNL/N) | 0.13  | 0.07       | 0.05       | 0.04        | 0.07       | 0.03       | 0.05       | 0.04        | 0.05         | 0.21       | 0.62      |
| 哥伦比亚   | Y/N 1991        | 1.52  | <b>0.2</b> | <b>0.4</b> | <b>0.5</b>  | <b>0.6</b> | <b>0.8</b> | 1.0        | 1.2         | 1.6          | 2.3        | 6.6       |
|  | Y/N 2005        | 2.08  | <b>0.2</b> | <b>0.4</b> | <b>0.6</b>  | <b>0.8</b> | <b>0.9</b> | 1.2        | 1.5         | 2.0          | 3.1        | 10.2      |
|  | Δ Y/N (Δ YL/O)  | 0.10  | 0.01       | -0.01      | -0.01       | 0.01       | 0.03       | 0.06       | 0.06        | 0.12         | 0.26       | 0.55      |
|  | Δ Y/N (Δ O/N)   | 0.06  | -0.02      | 0.01       | 0.03        | 0.04       | 0.06       | 0.06       | 0.12        | 0.12         | 0.13       | -0.12     |
|  | Δ Y/N (Δ YNL/N) | 0.41  | 0.03       | 0.04       | 0.05        | 0.05       | 0.05       | 0.07       | 0.10        | 0.16         | 0.37       | 3.18      |
| 危地马拉 <sup>d</sup>  | Y/N 1989        | 1.18  | <b>0.1</b> | <b>0.2</b> | <b>0.3</b>  | <b>0.4</b> | <b>0.5</b> | <b>0.7</b> | <b>0.9</b>  | 1.2          | 1.8        | 5.7       |
|  | Y/N 2002        | 1.47  | <b>0.2</b> | <b>0.3</b> | <b>0.5</b>  | <b>0.6</b> | <b>0.7</b> | <b>0.9</b> | 1.2         | 1.6          | 2.4        | 6.3       |
|  | Δ Y/N (Δ YL/O)  | 0.00  | 0.03       | 0.02       | -0.02       | -0.03      | -0.04      | -0.08      | 0.12        | 0.06         | 0.14       | 0.51      |
|  | Δ Y/N (Δ O/N)   | 0.24  | 0.03       | 0.05       | 0.12        | 0.13       | 0.13       | 0.15       | 0.16        | 0.30         | 0.32       | 0.24      |
|  | Δ Y/N (Δ YNL/N) | 0.05  | 0.03       | 0.04       | 0.04        | 0.03       | 0.06       | 0.16       | 0.06        | 0.08         | 0.15       | -0.08     |



表1 (接前页)

| 国家  | 人均收入<br>(Y/N)   | 总计       | 十分位组<br>I  | 十分位组<br>II | 十分位组<br>III | 十分位组<br>IV | 十分位组<br>V  | 十分位组<br>VI | 十分位组<br>VII | 十分位组<br>VIII | 十分位组<br>IX | 十分位组<br>X |
|---|-----------------|----------|------------|------------|-------------|------------|------------|------------|-------------|--------------|------------|-----------|
| 尼加拉瓜  | Y/N 1993        | 0.99     | <b>0.0</b> | <b>0.2</b> | <b>0.3</b>  | <b>0.4</b> | <b>0.5</b> | <b>0.6</b> | <b>0.8</b>  | 1.1          | 1.6        | 4.5       |
|   | Y/N 2001        | 1.16     | <b>0.1</b> | <b>0.2</b> | <b>0.3</b>  | <b>0.4</b> | <b>0.6</b> | <b>0.7</b> | <b>0.9</b>  | 1.2          | 1.8        | 5.5       |
|   | Δ Y/N (Δ YL/O)  | -0.06    | 0.00       | 0.00       | 0.00        | -0.01      | -0.03      | -0.11      | -0.07       | -0.15        | -0.18      | 0.59      |
|   | Δ Y/N (Δ O/N)   | 0.24     | 0.03       | 0.05       | 0.06        | 0.10       | 0.11       | 0.20       | 0.18        | 0.25         | 0.32       | 0.47      |
|   | Δ Y/N (Δ YNL/N) | -0.01    | 0.00       | 0.00       | 0.00        | 0.00       | 0.01       | 0.00       | -0.02       | 0.00         | 0.02       | -0.10     |
| 洪都拉斯  | Y/N 1990        | 0.87     | <b>0.1</b> | <b>0.1</b> | <b>0.2</b>  | <b>0.3</b> | <b>0.4</b> | <b>0.5</b> | <b>0.6</b>  | <b>0.9</b>   | 1.4        | 4.4       |
|   | Y/N 2003        | 0.95     | <b>0.1</b> | <b>0.2</b> | <b>0.2</b>  | <b>0.3</b> | <b>0.4</b> | <b>0.6</b> | <b>0.8</b>  | 1.1          | 1.6        | 4.4       |
|   | Δ Y/N (Δ YL/O)  | -0.13    | 0.00       | -0.02      | -0.02       | -0.02      | -0.05      | -0.03      | -0.05       | -0.10        | -0.11      | -0.68     |
|   | Δ Y/N (Δ O/N)   | 0.09     | 0.00       | 0.02       | 0.03        | 0.06       | 0.06       | 0.06       | 0.06        | 0.10         | 0.14       | 0.07      |
|   | Δ Y/N (Δ YNL/N) | 0.13     | 0.02       | 0.02       | 0.03        | 0.02       | 0.06       | 0.06       | 0.13        | 0.19         | 0.18       | 0.52      |
| <b>第三集团: 无进展</b> (贫困人口指数的变动介于-0.5%至0.5%之间每年) <sup>b</sup> |                 |          |            |            |             |            |            |            |             |              |            |           |
| 委内瑞拉  | Y/N 1990        | 1.80     | <b>0.3</b> | <b>0.5</b> | <b>0.7</b>  | <b>0.9</b> | 1.1        | 1.4        | 1.7         | 2.2          | 3.0        | 6.5       |
|   | 玻利瓦尔<br>共和国     | Y/N 2005 | 1.97       | <b>0.2</b> | <b>0.5</b>  | <b>0.7</b> | 1.0        | 1.2        | 1.5         | 1.9          | 2.4        | 7.2       |
|   | Δ Y/N (Δ YL/O)  | -0.13    | -0.06      | -0.07      | -0.08       | -0.11      | -0.11      | -0.10      | -0.07       | -0.08        | -0.07      | 0.11      |
|   | Δ Y/N (Δ O/N)   | 0.34     | 0.06       | 0.12       | 0.19        | 0.22       | 0.28       | 0.30       | 0.28        | 0.31         | 0.32       | 0.60      |
|   | Δ Y/N (Δ YNL/N) | -0.03    | -0.09      | -0.06      | -0.07       | -0.06      | -0.06      | -0.06      | -0.04       | -0.03        | 0.02       | 0.04      |
| 玻利维亚 <sup>e</sup>   | Y/N 1989        | 1.67     | <b>0.1</b> | <b>0.4</b> | <b>0.5</b>  | <b>0.7</b> | <b>0.9</b> | 1.1        | 1.4         | 1.9          | 2.8        | 7.0       |
|   | Y/N 2004        | 1.71     | <b>0.3</b> | <b>0.5</b> | <b>0.6</b>  | <b>0.7</b> | <b>0.9</b> | 1.1        | 1.3         | 1.8          | 2.7        | 7.3       |
|   | Δ Y/N (Δ YL/O)  | -0.38    | 0.01       | -0.07      | -0.10       | -0.10      | -0.19      | -0.24      | -0.35       | -0.45        | -0.58      | -1.10     |
|   | Δ Y/N (Δ O/N)   | 0.21     | 0.13       | 0.11       | 0.10        | 0.09       | 0.14       | 0.14       | 0.15        | 0.10         | 0.20       | 0.27      |
|   | Δ Y/N (Δ YNL/N) | 0.21     | 0.00       | 0.03       | 0.05        | 0.06       | 0.07       | 0.08       | 0.16        | 0.26         | 0.31       | 1.13      |
| 阿根廷 <sup>f</sup>  | Y/N 1990        | 3.10     | <b>0.5</b> | <b>0.8</b> | 1.1         | 1.4        | 1.8        | 2.2        | 2.7         | 3.5          | 4.8        | 12.2      |
|   | Y/N 2005        | 3.14     | <b>0.4</b> | <b>0.8</b> | 1.1         | 1.4        | 1.7        | 2.1        | 2.6         | 3.4          | 4.8        | 13.1      |
|   | Δ Y/N (Δ YL/O)  | -0.27    | -0.15      | -0.14      | -0.11       | -0.09      | -0.06      | -0.22      | -0.33       | -0.45        | -0.62      | -0.12     |
|   | Δ Y/N (Δ O/N)   | 0.28     | 0.06       | 0.15       | 0.12        | 0.25       | 0.04       | 0.09       | 0.15        | 0.23         | 0.60       | 0.76      |
|   | Δ Y/N (Δ YNL/N) | 0.02     | -0.02      | -0.04      | -0.03       | -0.16      | -0.01      | 0.05       | 0.07        | 0.10         | 0.02       | 0.25      |
| 乌拉圭 <sup>c</sup>  | Y/N 1990        | 3.09     | <b>0.6</b> | <b>0.9</b> | 1.2         | 1.5        | 1.8        | 2.2        | 2.6         | 3.2          | 4.3        | 12.7      |
|   | Y/N 2005        | 2.77     | <b>0.5</b> | <b>0.8</b> | 1.1         | 1.4        | 1.8        | 2.1        | 2.6         | 3.3          | 4.5        | 9.6       |
|   | Δ Y/N (Δ YL/O)  | -0.36    | -0.10      | -0.14      | -0.11       | -0.15      | -0.13      | -0.08      | -0.10       | -0.07        | 0.20       | -2.71     |
|   | Δ Y/N (Δ O/N)   | 0.00     | 0.00       | 0.01       | 0.01        | 0.04       | 0.05       | 0.01       | -0.02       | -0.03        | -0.08      | -0.16     |
|   | Δ Y/N (Δ YNL/N) | 0.03     | 0.05       | 0.04       | 0.02        | 0.04       | 0.04       | 0.05       | 0.12        | 0.17         | 0.09       | -0.24     |
| <b>第四集团: 贫困增加</b> (贫困人口指数的变动高于0.5%每年) <sup>b</sup>        |                 |          |            |            |             |            |            |            |             |              |            |           |
| 巴拉圭 <sup>g</sup>  | Y/N 1990        | 1.69     | <b>0.3</b> | <b>0.5</b> | <b>0.7</b>  | <b>0.9</b> | 1.1        | 1.2        | 1.5         | 2.0          | 2.8        | 5.9       |
|   | Y/N 2005        | 1.67     | <b>0.3</b> | <b>0.5</b> | <b>0.6</b>  | <b>0.8</b> | <b>0.9</b> | 1.2        | 1.4         | 1.8          | 2.6        | 6.6       |
|   | Δ Y/N (Δ YL/O)  | -0.21    | -0.11      | -0.13      | -0.19       | -0.13      | -0.18      | -0.27      | -0.27       | -0.42        | -0.50      | -0.14     |
|   | Δ Y/N (Δ O/N)   | 0.09     | 0.02       | 0.03       | 0.05        | -0.04      | -0.02      | 0.11       | 0.08        | 0.10         | 0.11       | 0.62      |
|   | Δ Y/N (Δ YNL/N) | 0.10     | 0.04       | 0.05       | 0.07        | 0.06       | 0.08       | 0.09       | 0.08        | 0.13         | 0.14       | 0.24      |

注: <sup>1</sup> 粗体且压灰底的数据说明该十分位组的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 (<1.0)。国家顺序依照2001~2005年贫困水平由低到高排列。

<sup>a</sup> 人均收入的变动组成依据公式3进行估计, 主要由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变化 $\Delta Y/N$  ( $\Delta YL/E$ ), 总就业率的变化 $\Delta Y/N$  ( $\Delta E/N$ ), 和人均非劳动收入的变化 $\Delta Y/N$  ( $\Delta YNL/N$  (以贫困线的倍数表示)) 构成。

<sup>b</sup> 每个国家贫困率的年度变化, 通过公式 $VAP = [((PF-PI)/PI) * 100] / A$ 估算而得, 因此我们可以将国家分级成不同的集团, 这里VAP代表贫困的年度变化, PF代表期末贫困率的百分比, PI代表期初贫困率的百分比, A代表考察期包含的年份数。

<sup>c</sup> 城镇地区。

<sup>d</sup> 在危地马拉, 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十分位组的数据高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拉丁美洲社会全景》中贫困水平的数字。处理数据时, 必须做些调整, 以反映1989年10岁以下人口数据和2002年7岁以下人口数据缺失的状况。

<sup>e</sup> 科恰班巴, 奥尔托, 拉巴斯, 奥鲁罗, 波多西, 圣克鲁斯, 塔里哈, 特立尼达。

<sup>f</sup> 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

<sup>g</sup> 亚松森大都会区。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国家的住户调查数据基础上绘制。

**表2 拉丁美洲（16个国家）：依据全球就业率、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的趋势划分的国家类型，十分位组，包括贫困家庭，1989年/1995~2001年/2005年**

| 贫困趋势<br>(年平均)                        | 期初<br>贫困率<br>(%) <sup>a</sup> | 全球<br>就业率<br>(E/N) | 每个就业人员<br>劳动收入<br>(YL/E) | 人均非<br>劳动收入<br>(YNL/N) | 期末<br>贫困率<br>(%) <sup>a</sup> |
|--------------------------------------|-------------------------------|--------------------|--------------------------|------------------------|-------------------------------|
| <b>显著减少</b><br>(变动低于-1.5%每年)         |                               |                    |                          |                        |                               |
| 智利, 1990~2003                        | 38.3                          | ++                 | ++                       | ++                     | 18.6                          |
| 厄瓜多尔, 1990~2005                      | 61.8                          | ++                 | +                        | +                      | 45.1                          |
| 巴西, 1990~2005                        | 47.4                          | ++                 | +                        | ++                     | 36.2                          |
| 巴拿马, 1991~2005                       | 42.8                          | ++                 | -                        | +                      | 32.7                          |
| 墨西哥, 1989~2005                       | 47.4                          | ++                 | -                        | +                      | 35.5                          |
| <b>轻微减少</b><br>(变动介于-1.5%与-0.5%之间每年) |                               |                    |                          |                        |                               |
| 萨尔瓦多, 1995~2004                      | 54.0                          | +                  | -                        | +                      | 47.5                          |
| 哥斯达黎加, 1990~2005                     | 26.2                          | +                  | + -                      | +                      | 21.1                          |
| 哥伦比亚, 1991~2005                      | 55.6                          | +                  | =                        | +                      | 46.8                          |
| 危地马拉, 1989~2002                      | 70.3                          | ++                 | =                        | ++                     | 58.4                          |
| 尼加拉瓜, 1993~2001                      | 73.6                          | ++                 | --                       | =                      | 69.3                          |
| 洪都拉斯, 1990~2003                      | 80.5                          | ++                 | --                       | ++                     | 74.6                          |
| <b>无进展</b><br>(变动介于-0.5%与0.5%之间每年)   |                               |                    |                          |                        |                               |
| 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 1990~2005             | 40.0                          | ++                 | --                       | -                      | 37.1                          |
| 玻利维亚, 1989~2004                      | 52.1                          | ++                 | --                       | +                      | 51.6                          |
| 阿根廷, 1990~2005                       | 21.1                          | +                  | -                        | =                      | 22.6                          |
| 乌拉圭, 1990~2005                       | 17.8                          | =                  | -                        | +                      | 19.1                          |
| <b>增加</b><br>(变动高于0.5%每年)            |                               |                    |                          |                        |                               |
| 巴拉圭, 1990~2005                       | 42.2                          | + -                | --                       | +                      | 47.7                          |
| 图例:                                  |                               |                    |                          |                        |                               |
| ++                                   | 显著进步                          |                    |                          |                        |                               |
| +                                    | 有进步                           |                    |                          |                        |                               |
| = / +-                               | 无变化/进步和恶化                     |                    |                          |                        |                               |
| -                                    | 恶化                            |                    |                          |                        |                               |
| --                                   | 显著恶化                          |                    |                          |                        |                               |

注：<sup>a</sup> 这些百分比也许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发布的《拉丁美洲社会全景》中所表述的数据不一致，是因对家庭务工数据的处理方式不同。  
在危地马拉，在数据处理时做了些调整，以反映1989年10岁以下人口数据和2002年7岁以下人口数据缺失的状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国家的住户调查数据基础上绘制。

区)、玻利维亚、巴拉圭(亚松森大都会区)、乌拉圭(城镇区域)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贫困人群中每个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下降, 而且即使全球就业率或非劳动收入上升, 也不足以弥补该降幅。出于同样的原因, 他们在减少贫困方面没有进展。

图3也说明了该分析的三个重要方面。首先, 家庭人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越低, 即相应的曲线倾斜得越不明显, 每个就业人员的收入或国家货币转移增加时, 贫困将减少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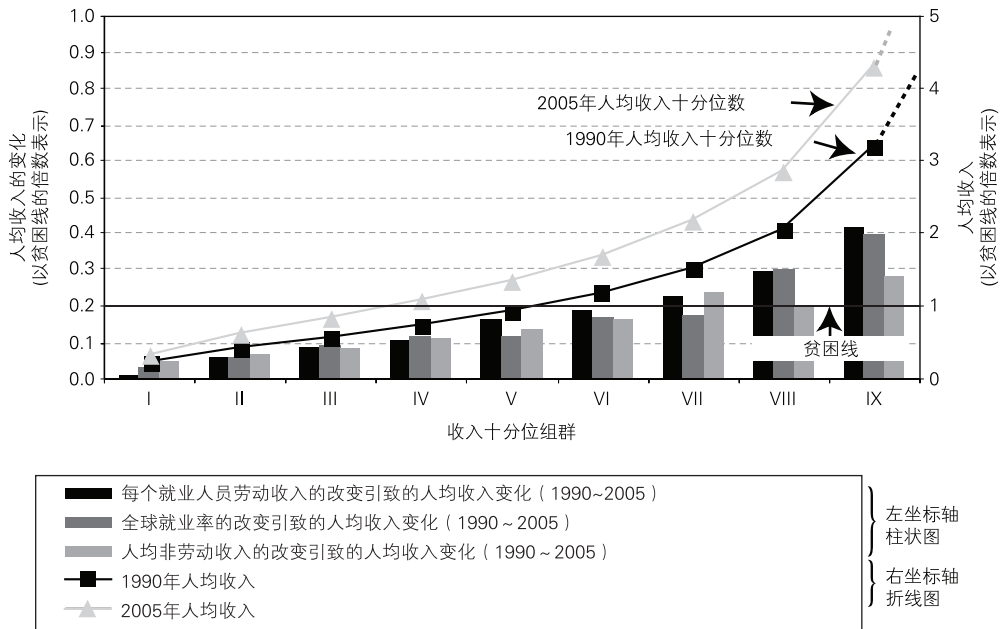
其次, 该数据也显示, 在2005年左右, 在所观察的

国家当中, 大约有1/3的人口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 更大一部分人口的收入仅略高于贫困线, 说明他们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sup>12</sup>。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 因为拉丁美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处于收入分布第五个十分位组的人群, 其平均人均收入等于或高于贫困线的两倍(表1)。

第三, 作为贫困线比例的衡量标准, 每个就业人员

12 图3中, 人均收入曲线在第八个十分位组之后倾斜更明显, 说明70%的人口生活非常困难。

A. 贫困大幅减少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国家  
(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城镇地区, 简单平均)



B. 减贫没有成效或贫困加剧的国家  
(阿根廷、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拉圭、乌拉圭, 简单平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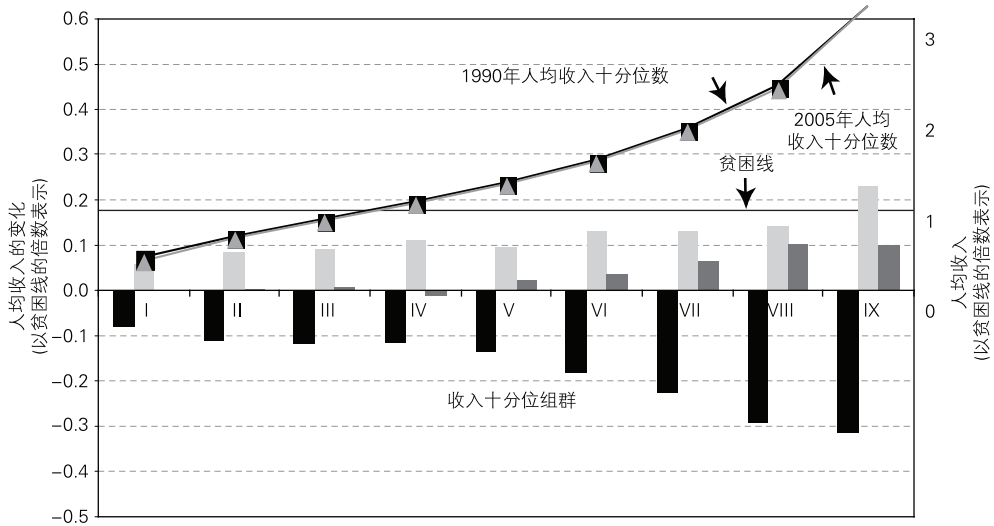


图3 贫困发生率变化的影响因素, 十分位组1~10, 1990~2005年<sup>a</sup>

注: <sup>a</sup> 1990年与2005年左右。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国家的住户调查数据基础上绘制。

的劳动收入变动反映了收入分配情况，因此较高的十分位组群的收入更高。这与以下的假设一致：首先是正规企业的生产率获得提高，这些企业的工作人员很大程度上因此受益，然后按比例分配给前面的收入阶层，这样收入不会再重新自我分配，而是根据薪酬等级慢慢地发放。

### 3. 贫困工人现象

最后应当注意，鉴于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目前的运作模式，大部分工人无法战胜贫困。在拉丁美洲的城镇地区，10%（智利）到54%（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就业人员生活在贫困中（见图4），而在农村地区，生活

贫困的就业人员比例甚至更高，幅度从11%（智利）到81%（洪都拉斯）不等。可以预料，在1990~2005年期间，在最贫穷家庭劳动收入显著增长的国家中（智利、巴西、厄瓜多尔的城镇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就业人员百分比下降，而在劳动收入增加的国家中（阿根廷城镇地区、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巴拉圭和乌拉圭），这个百分比上升。因此，当务之急是提高加入到劳动力市场大部分劳动力的人力资源质量，尤其是来自最贫困家庭人员的质量。特别是，这需要确保有适当的工资，稳定的合同，安全的工作场所（涵盖各种工伤意外和职业病），有权使用医疗体系和保险，加入社保体系并定期缴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7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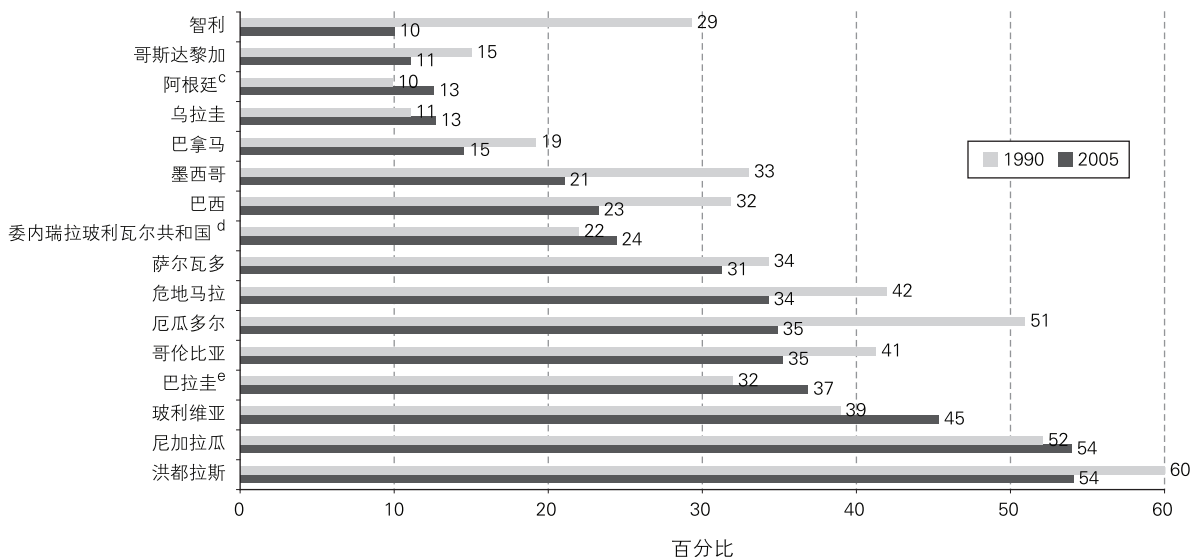


图4 拉丁美洲（16个国家）：就业贫困人群的比例<sup>a</sup>，1990~2005年<sup>b</sup>

注：<sup>a</sup> 指生活在收入居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就业人员的比例。

<sup>b</sup> 1990年与2005年左右。

<sup>c</sup> 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

<sup>d</sup> 自1997年起，调查样本设计不允许区分城镇与农村地区。因此，该数据指的是全国总人数。

<sup>e</sup> 城镇地区：指亚松森大都会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国家的住户调查数据基础上绘制。

## 四、关于人口红利和公共政策面临挑战的思考

在减贫过程中，拉丁美洲国家不但已经从中受益，而且还将持续受益，因为持续下降的人口出生率使得每位劳动人口扶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的负担大幅减轻。这种被称之为“人口红利”现象令人欣喜，因为由于每个有经济能力的成员负责赡养的人口减少，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随之上升。

然而，人口红利有时间限制，因为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会增加老年人的负担，造成赡养比率回升。此时，医疗和经济安全将会产生额外的需求。可以肯定的说，当赡养比率上升时，人口红利将结束<sup>13</sup>。

虽然只要工作年龄人口（特别是女性）不断提高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这种人口红利就可以持续存在，但其多数红利效应却得不到保障，因为这些红利效应取决于人口红利发生时，该地区经济产生是否能创造就业机会，穷人是否能找到薪水较好且附有社保的工作，以及家庭的构成是否能够使他们可以被组织起来抵御不可预见的情况。因此，为善加利用人口红利则必须为日益增加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减少在该地区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与非正式性。

特别是，虽然极端贫穷的家庭需要更好的薪水收入，但却有不少因素限制与阻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如果人力资本禀赋有限的，那么家庭成员获得就业的机会就较少，甚至更有可能失业或只是获得微薄的劳动收入。相应地，高生育率和赡养率以及出于照顾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使得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受到进一步的限制。

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人口红利和每被雇佣者收入增加促使许多国家实现减贫，但是智利、巴西与厄瓜多尔（城镇地区）的整体效果至今尚不乐观。我们必须牢记，人口红利对促进发展和减少贫困的积极作用最终将会起到反作用。

人口红利的终结将对该地区所有国家造成极大地冲击，尤其对于那些减贫效果是因为工作年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率或参与率提高，却没有显著改善就业状况和每被雇佣劳动力的收入的国家，还有就是贫困程度加深的国家。大约在2010年时，古巴将成为第一个结束人口红利的拉丁美洲国家，随后将是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在2015年左右），接着是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乌拉圭（在2020年左右）。

虽然第一项千年发展目标的确获得进展，但这主要归功于人口红利，而实际上最贫困国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量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仍是不足的。

假如拉丁美洲国家想要继续减少贫困，必需要执行积极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将使照顾家庭劳动与有偿劳动配合，以提高最贫困家庭成员的就业率的可能性，而且如有需要，应划拨社会支出满足这些最贫困群体的需求。同样，还应将鼓励女性（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女性）照顾家庭与从事有偿工作两不相误的相关措施提升至公共政策水平，从而提高贫困家庭的就业参与率。同样重要的是，让女性能充分行使其生育权利，使其能决定自己的家庭规模以及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动态。为此，政府应辅之以适当的一般性政策，例如为从事低生产率工作的工人提供在职培训与再培训，以便他们能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

这些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必须纳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些需求将变得更加紧迫。因为当人口红利达到顶峰时，人口发展趋势将不利于人均收入的增加。

该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并非空穴来风。必须找到调节三大变革的解决机制，而这些变革只能诉诸于公共政策。其一是应对人口惯性的变革，例如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其二是依赖经济主体表现的变革，例如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下提高生产率；其三是政治经济体的变革，这与国家角色和规模的相关。

13 然而，某些学者提出了“二次人口红利”的假设，即人口的老龄化可刺激储蓄的增长，从而促进投资与经济增长(Mason 和 Lee, 2004)。

## 参考文献

- Arriagada, I. (2004): Estructuras familiares, trabajo y bienestar en América Latina, in I. Arriagada and V. Aranda (eds.), *Cambio de las familias en el marco de las transformaciones globales: necesidad de políticas públicas eficaces*, Seminarios y conferencias series, No.42, LC/L.2230-P,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No. de venta: S.04.II.G.150
-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4):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02-2003*, LC/G.2209-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E.03.II.G.185.
- \_\_\_\_\_ (2005a):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Perspective*, LC/G.2331-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S.05.II.G.107.
- \_\_\_\_\_ (2005b):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05*, LC/G.2326-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E.06.II.G.133.
- \_\_\_\_\_ (2006): *Shaping the Future of Social Protection: Access, Financing and Solidarity*, LC/G.2294(SES.31/3), Santiago, Chile, March.
- \_\_\_\_\_ (2007a):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06*, LC/G.2326-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S.06.II.G.133.
- \_\_\_\_\_ (2007b):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7*, LC/G.2355-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E.07.II.G.161.
- \_\_\_\_\_ (2007c): *Social Cohesion: Inclusion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LC/G.2335, Santiago, Chile.
- \_\_\_\_\_ (2007d): *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 2007*, LC/G.2351-P, Santiago, Chile
- \_\_\_\_\_ (2008): *Superar la pobreza mediante la inclusión social*, LC/W.174, Santiago, Chile.
- ILO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04): *World Employment Report 2004-2005*, Geneva.
- \_\_\_\_\_ (2006): *Panorama laboral 2006*, Lima, ILO Regional Offic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_\_\_\_\_ (2007): *Panorama Laboral 2007*, Lima, ILO Regional Offic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Islam, R. (2004): *The Nexus of Economic Growth, Employ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Issues in Employment and Poverty Discussion Paper, No.14,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Kakwani, N., M. Neri. And H.H Son (2006): Linkages Between Pro-poor growth, Social Programmes and Labour Market: the Recent Brazilian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Poverty Centre Working Paper, No.26, August, Brasilia, Centro Internacional de la Pobreza.
- Mason, A. and R. Lee (2004): 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document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Demographic Window and Healthy Aging: Socioeconomi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eijing, China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 Navarrete, M. (2005): *Clasificación económica de la población: indicadores sobre empleo y nivel de actividad*, Montevideo, Universidad de la República.
- Núñez, J., J.C. Ramírez and L.Cuesta (2006): *Determinantes de la pobreza en Colombia, 1996-2004*, Estudios y perspectivas series, No.13, LC/L.2579-P, Bogotá, D.C., ECLAC office in Bogotá.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S.06.II.G.109.
- Osmani, S.R. (2002): Exploring the employment nexus: topics in employment and poverty, document prepared for the Task Force on the Joint ILO-UNDP Programme on Employment and Poverty, New York.
- Sen, A. (1985): El bienestar la condición de ser agente y la libertad. Conferencias Dewey de 1984, *Bienestar, justicia y mercado*, Barcelona, Paidós.
- Sunke, G. (2006): *El papel de la familia en la protección social en América Latina*, Políticas sociales series, No.120, LC/L.2530-P,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S.06.II.G.57.
- Uthoff, A., C. Vera and N. Ruedi (2006): Relación de dependencia del trabajo formal y brechas de protección social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in A.Sojó and A.Uthoff(eds.), *Desempeño económico y política social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los retos de la equidad, el desarrollo y la ciudadanía*, Mexico City, ECLAC/FLACSO/Distribuciones Fontamara.
- Weller, J. (2006): *Los jóvenes y el empleo en América Latina: desafíos y perspectivas ante el nuevo escenario laboral*, Bogotá, D.C., ECLAC/Mayol ediciones.



## 关键词

经济发展

生产率

测量

评价

环境方面

污染

二氧化碳

统计资料

拉丁美洲

# 拉丁美洲：将环境因素 纳入到生产效率 和技术变革的测量中

*Daniel Sotelsek 和 Leopoldo Laborda*

本文从产出（GDP）最大化和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最小化这个双重视角分析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从1980~2004年的发展情况。为此构建了马姆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此外，在分析所估算的效率的收敛（或发散）程度时采用了内核密度函数。所得的结果表明，与用较传统的方式测量所得的估算值相比，将环境因素纳入到效率和生产变革的测量中能够显著改善对该地区某些国家的估算水平。

**Daniel Sotelsek**

阿尔卡拉大学（西班牙）

拉丁美洲研究协会主任

⇒ [daniel.sotelsek@uah.es](mailto:daniel.sotelsek@uah.es)**Leopoldo Laborda**

阿尔卡拉大学（西班牙）

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副研究员、

世界银行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

金融和私有部门发展处顾问

⇒ [leopoldo.laborda@uah.es](mailto:leopoldo.laborda@uah.es)

## 一、引言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和测量拉丁美洲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思考和实证分析经济增长、效率水平的趋同程度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这项研究的主要思路是了解资源利用时的技术效率如何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理念相结合。实践方式是估算拉丁美洲国家1980~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通过计算马姆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将其分解为效率增进与技术变革。

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等非参数技术衡量生产率，由此分列出来的国与国的结果就可以用来提升效率和革新技术，同时考虑了一系列生产因素的外部性影响。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检测拉丁美洲国家1980~2004年期间可能的收敛（或发散）的增长模式。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重要，因为在过去的25年里拉

丁美洲的发展一直很温和；与此同时，除了发展的步伐之外，发展的质量与稳定性也很重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需要花费精力分析经济以这样一种方式增长的原因。该方式将技术效率变化（追赶）的内部效果区分出来，而不只是一个综合指数。

环境因素等已经成为关于经济增长质量讨论的一部分，而这项研究中使用的定性分析和方法为构建增长的测量提供了一种包含了该变量的方式，以期分析当全要素生产率被修正并能够比较增长情况时环境因素的影响力。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了有关于增长、趋同程度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主要已知事实。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个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和分析趋同程度方法的概述。第四部分说明了所使用的资料并给出调查结果。最后，第五部分对该项研究进行总结。

## 二、背景资料

### 1.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效率趋同

自从Solow（1957）开创关于增长核算（剩余因子）的工作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时常被测量以确定经济增长原因，从而减少Solow所谓的“我们无知的衡量”。

这一领域的进展已相当显著。最初的努力试图通过观察劳动力和资本的特性，侧重于分辨要素累积的影响因素。这个思路实质上是要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经济会发展，以及趋同的发展前景如何？

Romer（1986）发表的文章提出了与公司外部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增长理论从此进入第二阶段。在那个年代，为了试图解答与以前相同的问题，研究工作开始将技术进步与效率分离出来，作为两个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不

同测量方法，所谓的内生增长模型也就应运而生。

趋同假说的研究工作已经出现了重要的新转折，同时，Abramovitz（1986）、Baumol（1986）和Maddison（1987）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发达国家间趋同情况的证据，但是当样本延伸至发展中国家时，这一假说并不成立。Barro（1991）、Barro和Sala-i-Martin（1992）以及Mankiw、Romer和Weil（1992）也证明了趋同情况的存在以稳定状态的特征为条件。

除了定义绝对趋同和条件 $\beta$ 趋同之外，Quah（1993）还定义了第三种测量方法，称为 $\sigma$ 趋同<sup>1</sup>。对于拉丁美洲的情况，Elías（2001）分析了1960年到1994年间7个国家的 $\sigma$ 趋同，发现这些国家间存在着一定的趋同程度，但是当把美国整合入样本中时，情况显然呈发散方式。

本文只从效率的角度来介绍 $\sigma$ 趋同的思路，因此不

□ 本文的初稿是在由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的伊比利亚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CILAS）主办的研讨会上提交的。我们对于美洲开发银行（IDB）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给予的机构支持以及José Luis Machinea对这个版本提出的意见表示感谢。

1  $\sigma$ 趋同通过计算随着时间（t）的推移每个国家收入（Yit）的标准差来测量收入的分散程度（Barro和Sala-i-Martin，1992）。

会全面阐述这个主题，因为重要的是从这个角度补充完善关于拉丁美洲效率的看法<sup>2</sup>。

有证据表明，在过去的40年拉丁美洲的发展温和且不稳定，特别是1980~2000年期间的波动。Hofman (2001) 对于拉丁美洲增长的分析给出了最初的引导，他详细分析了该地区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趋同倾向、生产率和效率。在其他的特征中，该研究采用了一种分析增长过程的创新方式，将“近因”（增长源的传统分析和 $\beta$ 趋同）和所谓的“终极原因”（制度、收入分配和宏观经济稳定性）区分开并相互联系起来。

结论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主要内容是该区域内存在着明显的趋同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要素生产率以40%的速度稳定地发挥作用，反映了资本和劳动力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变量这一事实。（Hofman, 2001, 第12页）

就1980~2000年而言，这项研究包含了对该地区结构性弱点及其对增长过程的影响方式的解释，虽然事实证明这很难被量化。

按照类似的思路，Solimano和Soto (2005) 力求找出有关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进程及其与上个世纪最后几十年发展周期关系的重要细节。为此，他们首先设定了有关该地区经济成效的程序化事实：①长期增长中异质性和波动性的存在；②1980年之后经济发展状况的恶化；③国家间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变。

其次，本文着重分析经济增长的来源，结论是上个世纪最后几十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恶化实质上是由于全因素生产率的下降。该研究指出一些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可能导致增长的下降，包括商业周期、劳动力素质、外部冲击和宏观经济不稳定（Solimano和Soto, 2005, 第35~36页）。

某些研究采用的思路与我们的工作类似，即通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和马姆奎斯特指数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在国家层面上区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变的方法：

- Lanteri (2002) 估算了九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组成要素在1970~2001年间变化，包括美国

和若干拉丁美洲及东南亚国家。考虑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中测量效率的重要性，这里必须提到阿根廷在这一时期每年减少0.5%（美国是新的领域），但是如果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该时期的效率以每年0.3%的速度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变革每年减少0.7%。

- Taskim和Zaim (1997) 对23个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在1975年到199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了研究，试图通过测量这种变化来检验技术效率变化假说，并评估该方法蔓延的速度。总体而言，所有国家生产力损失非常小，但是高收入国家每年提高0.37%，而低收入国家每年下降0.38%。
- 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Dowrick和Nguyen (1989) 以及Färe、Grosskopf和Norris (1994) 的研究结果表现出效率变化的明显趋同，然而该结果并不适用相对于新领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相对于新领域的解释。
- Ching-Chen和Yir-Hueih (1999) 研究了亚洲国家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他们使用基于马姆奎斯特指数的距离函数，将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创新）之间的生产率分隔开来，从亚太经济合作论坛（APEC）19个成员国构成的样本中揭示出一些有趣的结果。数据表明，美国（也包含在样本中）不是该地区唯一的创新者；20世纪80年代，事实证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都能够调整国家新领域，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擅长调整也擅长创新。
- 通过采用非参数技术，避免生产新领域的使用而产生的效率偏见，Maudos、Serrano和Pastor (1999) 考虑了效率低下行为的可能性；Färe、Grosskopf和Norris (1994) 也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将效率增益的重要性标志为经和组织国家劳动力生产率趋同的根源。

## 2.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环境

最近的文献资料已经将环境因素纳入分析当中，试图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变并将它们分化成效率和技术进步。

虽然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的研

2 参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8，第17~51页）对拉美趋同程度的分析。

究课题，但是它存在的时间也不很长。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问题必然以某种方式和经济发展相关的观点才得以确定。

这一课题的历史始于《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Carlson, 1962），书中详细阐述了滥用农药和杀虫剂给环境带来的问题。几年后，Boulding（1966年）在其论文“未来地球宇宙飞船经济学”中，试图从资源和污染的角度展现不受限制的经济发展的危险。

Meadows等人共同撰写的报告（1972）说明了经济发展存在局限性，该假说主要涉及以不可再生资源作为约束条件。辩论集中在三点：技术进步的变化率、产出构成的未来变化以及替代的范围。（Elkins, 1993, 第271页）

辩论和今天的基本相同；然而，关于环境的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增长与环境）存在的实证研究、排放物的尺度分解和复合效应已经对讨论有所澄清。有人认为，经济增长不一定与环境恶化相关联，但与此相反，可以与改善环境共存（Cole, 2007）。

20世纪80年代，布伦特兰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的报告（WCED, 1987）统一了术语“可持续发展”的使用（WCED, 1987）<sup>3</sup>。经济上而言，目的是协调从产品和服务中获得的社会福利与其生产所付出的环境成本。

20世纪90年代，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变得很普遍，不只是因为有更多的资料可以使用。Grossman和Krueger（1995）以及Shafik（1994）找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规模、构成和技术效应方面）的支持证据。关于转折点也有所保留，但是这取决于每个经济体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特征（Cole、Elliot和Shimamoto, 2005；Stern, 2004）<sup>4</sup>。

从那时起，许多有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效率和趋同的经济论文都包含了环境话题，而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被接受了：

- Kumar（2006）通过思考商品和服务的产出以及环境外部负效应的产生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而其他

人将其视为污染治理成本。传统的生产率测量方法忽视了由于减排活动带来的不必要排放物的减少，因为不必要排放物没有价格，除非存在流通商品市场。

- 该研究计算了41个发达和欠发达国家1971~1992年间调整的马姆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因素，将技术进步和效率区分开来（当排放物被忽略时，指数相等的无效假说不被接受）。研究发现只有六个国家（都是发达国家）是创新者而低收入国家都不是。
- Färe、Grosskopf和Hernández-Sancho（2004，第349页）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技术，设计了一个用于测量环境行为的指数，指的是生产的商品数量指数和环境外部效应指数之商。该指数显示了一个部门、企业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功地生产产品，同时也解释了环境的负效应。为了应用这个指标，他们以17个经合组织成员国1990年的数据为样本，比较了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与环境排放（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的数据及能源消耗。结果发现，法国和瑞典的商数最好而希腊的最差。
- Ball等人（2005）研究了生产率增长与其对环境不良影响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们考虑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指出当一种环境属性的负外部性不断上升时，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被高估（Denison, 1979；Robinson, 1995）。本文作者通过构造一个称为马姆奎斯特成本生产率指数（MCP）来阐述这个问题，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测量方法用于测量考虑外部效应的更高的生产率。使用固定样本数据，他们展示了当环境负外部性被忽略时生产率测量值如何上升。当与生产相关的风险下降时，相反地，生产率提高（Ball等，2005，第382~386页）。
- 在此基础上，Färe、Grosskopf和Pasurka（2007）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考虑用于环境外部性投入数据缺失的情况下，能否建构一个生产率测量的方法。为此，他们提出将传统的生产率测量放置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下，称为“联合生产的观点”<sup>5</sup>。

3 虽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维持几代人之间的公平性，但是这一概念忽视了对收入平等和贫困水平（代内平等）的关注（Markandya, 1992）。

4 Cole（2007，第245页）分析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的估算结果。

5 这种方法有一些优点：①有关减排技术的成本信息不是必须的；②没必要调查实际的减排策略；③这种测量方法捕捉到不止一个污染问题的减排效果。

- 他们使用发电厂1985~1995年间的数 据，包括一个产量，即净发电量，和两个外部性因素，即二氧化碳（CO<sub>2</sub>）和氮氧化物（NO<sub>x</sub>）。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治理活动与传统生产率下降和技术变革相关联，然而这些差异并没有统计学意义（Färe、Grosskopf和Pasurka，2007，第680页）。
- Schuschny（2007）通过考察经济活动指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使用化石燃料或清洁替代能源的能源消耗量，分析了37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能源绩效。调查结果表明，已经有一些国家努力提高他们国家的经济活跃程度，同时寻求清洁能源技术以满足其能源消耗需求。

与Schuschny（2007）的研究相比，本文不是将污染物（本项研究中指二氧化碳排放量）看作一个需被最小化的因素，而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产出或外部因素。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是因为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展开经济增长的核算工作（因此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因素的选择以及产量、国内生产总值的选择，也是依照这种文献类型的标准），同时也考虑这种经济增长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结束本节内容时，我们必须强调将现有的分析设定在拉丁美洲地区，一个包含着“失去的十年”、华盛顿共识和经济复苏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时间段的重要性。

### 三、效率分析方法

#### 1. 测量生产效率和 技术变革：马姆奎斯特指数

在这次调查中所提出的分析需要对马姆奎斯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进行估算，而使用的方法由Färe等人（1994）提出，即两个时间段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通过计算与通用技术相关的每一个数据点距离的商数得来。假设在t时期有一项技术，那么在s时期（基期）和t时期之间的（以产出为导向的）马姆奎斯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m_0^t(q_s, x_s, q_t, x_t) = \frac{d_0^t(q_t, x_t)}{d_0^t(q_s, x_s)} \quad (1)$$

或者，使用s时期的参照技术，该指数可以定义为：

$$m_0^s(q_s, x_s, q_t, x_t) = \frac{d_0^s(q_t, x_t)}{d_0^s(q_s, x_s)} \quad (2)$$

在等式（1）和（2）中， $d_0^t(q_t, x_t)$ 代表了从t时期观察值到s时期技术，术语上已做定义。因此，大于1的 $m_0$ 值表明从s时期到t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增长，而小于1的值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正如Färe、Grosskopf和Roos（1998）主张的那

样，如果该技术是希克斯中性，即：产出的距离函数对于任意t都可以表达为 $d_0^t(q_t, x_t) = A(t) d_0(q_t, x_t)$ ，这两个指数才相等。

为了避免强加这个约束条件或者武断地选择两种技术其中的一种，根据Fisher（1992）和Caves、Christensen和Diewert（1982）的看法，马姆奎斯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经常被定义为这两个指数的几何平均。即：

$$m_0^s(q_s, x_s, q_t, x_t) = \left[ \frac{d_0^s(q_t, x_t)}{d_0^s(q_s, x_s)} \times \frac{d_0^t(q_t, x_t)}{d_0^t(q_s, x_s)} \right]^{\frac{1}{2}} \quad (3)$$

这个生产率指数中的距离函数重组后表明上述指数等于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的乘积。

$$m_0^s(q_s, x_s, q_t, x_t) = \frac{d_0^t(q_t, x_t)}{d_0^s(q_s, x_s)} \quad (4)$$

$$\left[ \frac{d_0^s(q_t, x_t)}{d_0^t(q_t, x_t)} \times \frac{d_0^s(q_s, x_s)}{d_0^t(q_s, x_s)} \right]^{\frac{1}{2}}$$

在上述等式中，括号外的商数用来测量s时期与t时期之间Farrell产出导向技术效率测量值的变化。等式（4）中



指数的剩余部分是技术变革的程度，即两个时期之间技术变革的几何平均，在  $(x_t)$  和  $(x_s)$  进行评估。

Färe、Grosskopf和Roos (1994) 认为，技术效率变化应当分解为以“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为代表的两部分<sup>6</sup>。这种分解涉及等式(4)第一个条件中所采用的效率变化的程度<sup>7</sup>和将它分离成纯效率变化部分及规模效率变化部分，分别可由以下等式表示：

$$\text{纯效率变化} = \frac{d_{0v}^t(q_t, x_t)}{d_{0v}^s(q_s, x_s)} \quad (5)$$

规模效率变化 =

$$\left[ \frac{d_{0v}^t(q_t, x_t)/d_{0c}^t(q_t, x_t)}{d_{0v}^s(q_s, x_s)/d_{0c}^s(q_s, x_s)} \times \frac{d_{0v}^s(q_t, x_t)/d_{0c}^s(q_t, x_t)}{d_{0v}^s(q_s, x_s)/d_{0c}^s(q_s, x_s)} \right]^{\frac{1}{2}} \quad (6)$$

等式(6)中的规模效率变化部分实际上是两个规模效率变化程度的几何平均，第一个与t时期的技术有关，第二个与s时期的技术有关。

数据包络分析将用于估算以上规模效率变化部分<sup>8</sup>。这项技术的本质在于将有效边界定义为评估不同生产单元(本研究中指国家)绩效观察值变化的参照点<sup>9</sup>。数据包络分析法不创建有关功能形式的假设，是一个非参数绩效评估方法；然而，它允许包含不同的输入与输出，这对于本研究的目的和使用它的主要理由来说必不可少。

数据包络分析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它可用于处理具有不同单元的多个输入和输入，而不需考虑生产要素的完全使用或要求明确的功能形式。至于存在的弊端，这个方法对测量误差敏感(参照点具备高度生产性)，不允许统计检验的简单应用，识别出的是相对而不是绝对无

6 只有当采用的等式的距离函数用于估算规模报酬恒定的技术时，才能使之成为可能。

7 在这种情况下，意思是规模报酬恒定假定为两个距离函数的商。

8 Schuschny (2007) 对这项技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对生产率和效率的定义给出了一个极好的述评。

9 换句话说，在本项研究中使用这项技术，摆在我们面前的初始假设是样本中所有国家在效率最佳水平上应该都能够发挥作用，这由包含在其中的高效率国家决定。在专业文献中，这些高效率国家被称为“同侪”国家，是决定效率前沿的国家，因此有效边界的距离代表了效率或缺乏效率的程度。

效率 (Schuschny, 2007, 第22~23页)。

## 2. 效率的动态分布

了解整体效率分布的动态目的在于同Birchenal和Murcia (1997) 一样使用随机内核估算量来分析趋同性。

图1说明了这种方法，展示了在两个时期，t时期和t+s时期，可能的效率分布。t时期的分布表明，存在着一个所考察的大部分经济体共享的平均效率水平，很少有特别高或者特别低的效率。相比之下，t+s时期将效率最高和最低的经济体分组，创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而中等效率群体已经消失。

图1的箭头表示分布的内部动态。例如，箭头2及箭头3显示了在分布区域内经济体的“流动性”，箭头1和4显示了经济体的“持久性”，在t时期和t+s时期之间保持了他们原来的位置。

为了分析这种动态，思路是将效率空间分割成无限个区域或连续集。在本例中，相应的转移概率矩阵将趋于一个连续的行和列，成为一个随机内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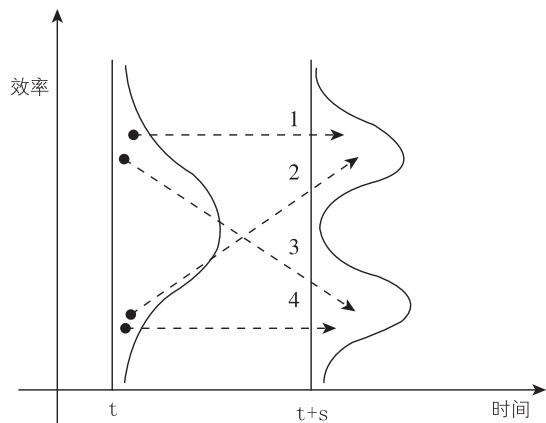


图1 效率分布的改变

资料来源：参照资料 J.A. Birchenal 和 G.E. Murcia, 区域性的趋同：以哥伦比亚为例的回顾 (“Convergencia regional: una revisión del caso colombiano”)，宏观经济档案，No. 69，波哥大，D.C.，国家计划部，1997年。



## 四、实证数据和研究成果

要应用此方法分析1980~2004年间一组拉丁美洲国家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我们使用国内生产总值（以2000美元为单位）资料数据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吨）作为主要的外部因素<sup>10</sup>。至于投入，用总劳动力和资本形成总额（以2000美元为单位）来表示。有关

数据由世界银行与其他国际机构合作生成<sup>11</sup>。

附录中的表1列出了对样本中18个拉丁美洲国家使用的变量基础统计资料的描述性分析。

用这些变量分析样本中考察的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分解（效率变化、技术变化、纯效率变化和规

10 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化石燃料的使用和水泥的生产。我们将固态、液态和气态燃料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都包含在内。

11 本文作者特别感谢这些机构慷慨提供了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数据库的访问权限。

表1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1980~2004年平均年增长

| 时期        | 马姆奎斯特指数汇总（正常指数） |        |       |       |       | 马姆奎斯特指数（环境指数） |        |       |       |       |
|-----------|-----------------|--------|-------|-------|-------|---------------|--------|-------|-------|-------|
|           | EFFCH           | TECHCH | PECH  | SECH  | TFPCH | EFFCH         | TECHCH | PECH  | SECH  | TFPCH |
| 1980~1981 | 1.032           | 0.958  | 0.983 | 1.05  | 0.989 | 1.023         | 0.972  | 1.007 | 1.016 | 0.995 |
| 1981~1982 | 0.959           | 1.141  | 0.96  | 0.999 | 1.093 | 0.961         | 1.157  | 0.977 | 0.983 | 1.112 |
| 1982~1983 | 0.942           | 1.169  | 0.958 | 0.983 | 1.101 | 0.918         | 1.207  | 0.911 | 1.008 | 1.108 |
| 1983~1984 | 1.038           | 0.938  | 1.061 | 0.978 | 0.974 | 1.117         | 0.871  | 1.097 | 1.018 | 0.973 |
| 1984~1985 | 0.955           | 1.05   | 0.977 | 0.978 | 1.003 | 0.99          | 1.006  | 1.02  | 0.971 | 0.997 |
| 1985~1986 | 1.028           | 0.951  | 1.037 | 0.991 | 0.977 | 0.986         | 0.971  | 0.977 | 1.009 | 0.957 |
| 1986~1987 | 0.965           | 0.956  | 0.986 | 0.979 | 0.923 | 0.986         | 0.943  | 1     | 0.986 | 0.93  |
| 1987~1988 | 0.861           | 1.179  | 0.922 | 0.934 | 1.016 | 0.906         | 1.141  | 0.945 | 0.959 | 1.035 |
| 1988~1989 | 0.916           | 1.123  | 0.836 | 1.095 | 1.029 | 0.807         | 1.287  | 0.789 | 1.022 | 1.038 |
| 1989~1990 | 1.081           | 0.895  | 1.182 | 0.914 | 0.967 | 1.03          | 0.947  | 1.146 | 0.899 | 0.975 |
| 1990~1991 | 1.332           | 0.713  | 1.153 | 1.155 | 0.95  | 1.348         | 0.705  | 1.164 | 1.158 | 0.95  |
| 1991~1992 | 0.976           | 0.958  | 0.998 | 0.978 | 0.935 | 1.068         | 0.884  | 1.043 | 1.024 | 0.944 |
| 1992~1993 | 0.992           | 0.98   | 0.97  | 1.023 | 0.971 | 0.911         | 1.076  | 0.932 | 0.977 | 0.981 |
| 1993~1994 | 0.77            | 1.255  | 0.888 | 0.868 | 0.966 | 0.759         | 1.274  | 0.873 | 0.869 | 0.966 |
| 1994~1995 | 1.189           | 0.823  | 1.096 | 1.085 | 0.978 | 1.188         | 0.818  | 1.103 | 1.076 | 0.971 |
| 1995~1996 | 0.962           | 1.086  | 1.01  | 0.952 | 1.044 | 0.963         | 1.09   | 1.019 | 0.945 | 1.049 |
| 1996~1997 | 1.078           | 0.855  | 1.029 | 1.047 | 0.922 | 1.214         | 0.76   | 1.09  | 1.113 | 0.922 |
| 1997~1998 | 1.047           | 0.909  | 1.019 | 1.028 | 0.952 | 1.058         | 0.908  | 1.035 | 1.022 | 0.96  |
| 1998~1999 | 0.957           | 1.155  | 1.035 | 0.925 | 1.105 | 0.91          | 1.207  | 0.998 | 0.912 | 1.098 |
| 1999~2000 | 1.002           | 1.014  | 0.955 | 1.05  | 1.016 | 1.041         | 0.963  | 1.002 | 1.039 | 1.002 |
| 2000~2001 | 0.98            | 1.028  | 0.954 | 1.027 | 1.008 | 1.014         | 0.994  | 0.968 | 1.047 | 1.008 |
| 2001~2002 | 0.843           | 1.205  | 0.874 | 0.964 | 1.016 | 0.87          | 1.164  | 0.935 | 0.93  | 1.012 |
| 2002~2003 | 1.12            | 0.911  | 1.127 | 0.994 | 1.02  | 0.988         | 1.043  | 0.966 | 1.023 | 1.031 |
| 2003~2004 | 1.035           | 0.945  | 0.999 | 1.036 | 0.978 | 1.126         | 0.862  | 1.082 | 1.041 | 0.971 |
| Mean      | 0.996           | 1      | 0.997 | 0.999 | 0.996 | 1             | 0.998  | 1     | 1     | 0.998 |

注：TFP：全要素生产率。

EFFCH：技术效率变化。

TECHCH：技术变革。

PECH：纯技术效率变化。

SECH：规模效率变化。

TFPCH：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世界发展指标（WDI）和全球发展金融（GDF）的数据基础上编制。

模效率变化)。这个估算值由传统方法(我们称之为正常方法)得来,该方法中唯一考虑的产出是国内生产总值,再加上另一种方法(我们称之为环境的方法),引入了一种不受欢迎的额外的产出,表现为伴随着这一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1. 全要素生产率和效率分析

分析从分解表1中总结的年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开始。它首先介绍了此期间(1980~2004年)所经历的变化,同时也对不同分时期的变化进行了评述,以提供更多关于这些变量变化的信息<sup>12</sup>。

12 对于结果的简单解释是,当观察值大于1时代表经济增长情况改善,而当观察值小于1时代表经济增长情况恶化。

广义上来说,用这两个指数进行估算在量值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两种情况下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在整个时期略微下降(当全要素生产率被分解且使用正常指数估算时,这种下降显然在由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下降引起;相反地,当使用环境指数估算时,技术变革是全要素生产率减少的原因)。虽然最终的结果相同,但是初步结论、因此采取的政策和鼓励建议也许会有不同,这取决于使用了哪种全要素生产率测量法。

分析全时期会发现,1981~1982年与1982~1983年这两个分时期是两种态势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大约10%)的年代,但用环境指数测算的增长更高一些,特别是1981~1982年期间。1986~198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用两种指数测算都是下降(大约7%)最严重的时期,这显然表明该时期已经进入所谓的“失去的十年”,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出消极的发展态势。在20

表2 各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 1980~2004年平均年增长

| 国家          | 马姆奎斯特指数汇总(正常指数) |        |       |       |       | 马姆奎斯特指数(环境指数) |        |       |       |       |
|-------------|-----------------|--------|-------|-------|-------|---------------|--------|-------|-------|-------|
|             | EFFCH           | TECHCH | PECH  | SECH  | TFPCH | EFFCH         | TECHCH | PECH  | SECH  | TFPCH |
| 阿根廷         | 1               | 0.997  | 1     | 1     | 0.997 | 1             | 0.998  | 1     | 1     | 0.998 |
|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 1.007           | 0.995  | 1     | 1.007 | 1.001 | 1             | 0.996  | 1     | 1     | 0.996 |
| 巴西          | 0.994           | 1.009  | 1     | 0.994 | 1.003 | 0.999         | 1.001  | 1     | 0.999 | 1     |
| 智利          | 0.999           | 1.004  | 0.999 | 1     | 1.002 | 0.997         | 1.002  | 1     | 0.997 | 1     |
| 哥伦比亚        | 0.997           | 1      | 0.996 | 1.001 | 0.997 | 0.995         | 1.001  | 0.995 | 1     | 0.996 |
| 哥斯达黎加       | 0.985           | 1.004  | 0.989 | 0.996 | 0.989 | 0.985         | 1.002  | 0.99  | 0.995 | 0.986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0.998           | 0.997  | 1     | 0.998 | 0.996 | 1.005         | 0.992  | 1.004 | 1.001 | 0.997 |
| 厄瓜多尔        | 1.001           | 1.006  | 1.005 | 0.996 | 1.006 | 1.013         | 1.009  | 1.012 | 1.001 | 1.023 |
| 萨尔瓦多        | 0.987           | 0.998  | 0.987 | 1     | 0.986 | 0.99          | 0.997  | 0.99  | 1     | 0.987 |
| 危地马拉        | 0.991           | 0.998  | 0.991 | 1     | 0.989 | 0.997         | 0.995  | 0.995 | 1.002 | 0.992 |
| 洪都拉斯        | 0.99            | 0.998  | 0.982 | 1.009 | 0.988 | 1             | 0.994  | 0.994 | 1.006 | 0.994 |
| 墨西哥         | 1.006           | 0.99   | 1     | 1.006 | 0.995 | 1.004         | 0.984  | 1     | 1.004 | 0.989 |
| 尼加拉瓜        | 0.997           | 0.991  | 1     | 0.997 | 0.988 | 1             | 0.995  | 1     | 1     | 0.994 |
| 巴拿马         | 0.994           | 1.009  | 1     | 0.994 | 1.003 | 0.995         | 1.006  | 1     | 0.995 | 1.001 |
| 巴拉圭         | 1.009           | 1.002  | 1.012 | 0.996 | 1.011 | 1.011         | 1.003  | 1.014 | 0.997 | 1.014 |
| 秘鲁          | 0.994           | 0.997  | 0.999 | 0.995 | 0.991 | 0.998         | 0.993  | 1     | 0.999 | 0.991 |
| 乌拉圭         | 1.006           | 1.009  | 1.002 | 1.004 | 1.015 | 1.006         | 1.01   | 1.002 | 1.004 | 1.015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0.984           | 0.989  | 0.986 | 0.997 | 0.972 | 1             | 0.993  | 1     | 1     | 0.993 |
| 平均值         | 0.996           | 1      | 0.997 | 0.999 | 0.996 | 1             | 0.998  | 1     | 1     | 0.998 |

注: TFP: 全要素生产率。

EFFCH: 技术效率变化。

TECHCH: 技术变革。

PECH: 纯技术效率变化。

SECH: 规模效率变化。

TFPCH: 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资料来源: 本文作者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的数据基础上编制。

世纪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在1996~1997年期间大幅下降并在1998~1999年期间恢复。这似乎与拉丁美洲及全世界的金融和银行危机以及从危机中复苏相一致。

在生产率有升有降的时期内，最大的影响来自于技术变革，还涉及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技术变革的变化比效率变化的变化要明显得多。

为了作更详尽的分析，表2展示了所考察的每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同时也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这张表透露出用这两个指数进行估算在量值上并没有大的差异，就像表1的数据一样。然而有几个国家的表现值得评论，当使用正常指数时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一个小的平均增长，但是使用环境指数时全要素生产率却呈现下降趋势。

至于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情况如下。在厄瓜多尔，全要素生产率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增长，但是环境指数显示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整个时期的平均增长率为2.3%，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测量值，显然说明了考虑环境外部因素时厄瓜多尔付出的主要效率努力。与此同时，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下降，但是如果包括环境排放，趋势要好得多，因为只用国内生产总值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下降2.8%，若使用环境指数测算其仅下降0.7%。

全要素生产率的细分显示出与表1讨论的不同的行为模式。在厄瓜多尔，可以看到一些改善尤其由效率变化引起，若采用环境指数则主要归因于纯技术效率变化，但采用正常指数时基本上是用技术进步来解释这个（小得多的）积极变化。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得到的结论一样：正常指数测得的下降由效率和技术引起；而当采用环境指数时，效率（纯效率）弥补了技术变革的减少。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情况也相当清楚：使用环境指数时，（纯）技术效率的良好表现有助于抵消技术变革的下降，而使用正常指数时这两项因素表现非常相似。

总之，可以说，对全时期进行考察时，将这两种测算方法相比较，得到的结果一般都相当一致（除了已经提到的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例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乌拉圭（两种指数均录得1.015）和厄瓜多尔（正常指数录得1.006，环境指数录得1.023）；同

时，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正常指数录得0.972，环境指数录得0.993。

最后，可以得出结论，就所观察年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言，该地区的表现一直比较差，从技术变革和技术效率来看都是如此，虽然后者在环境指数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于远离平均值的国家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

## 2. 拉丁美洲技术效率的综合分析

使用非参数技术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得到了拉丁美洲过去技术效率发展的详细信息（见图2）。比较用这两个指数获得的量值，揭示出一个随时间推移呈现出的非常相似的趋势，虽然整体而言，用环境指数比用正常指数得到的数值略高。

图2显示了这个变量若干阶段的趋势，用这两种方法测得的全要素生产率恰好在1989年和1994年均出现了大幅下降。无需着手进行详细的分析，就可以说趋势中的第一个变化与“失去的十年”的末尾及华盛顿共识的实施相一致，而1994年的趋势变化可以用最终导致了1995年金融危机的扩张性政策来解释。趋势的另一个变化发生在2002年，拉丁美洲的表现与该地区大部分区域稳定的宏观经济指标相吻合。另一个要点是环境指数与正常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的差异大于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差异，说明了作为某些规定的实施结果，排放效率的努力变得更具实质性，这与给予提高环境标准更多的关注不谋而合，不过应该记住的是，这种改善（或者更少的恶化）更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技术效率（特别是纯技术效率）而不是技术进步。

随着所分析的技术效率的进展，有趣的是观察这是否有利于同化这些国家已存在的最接近前沿（汇聚点）并因此效率趋同的技术。

为了确定离散程度，图3显示了由效率指数对数的标准差计算而得的 $\sigma$ 趋同。

如图3所示，这些年技术效率发展的趋势有着显著的变化。如果把由两种指数获得的量值相比，则再一次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趋势还是很相似，尽管在收敛性方面，环境指标得出的数值比正常指标稍高一

些。这一趋势反映了1983~1987年、1989~1992年、1994~1998年效率提升的阶段趋于缩小国家间的差异。在那些时期，最接近前沿的国家的效率提高再一次扩大了不均衡。

重要的一点是整段时期内环境函数的收敛性比正常

函数高，在收敛性最高的时间段（1987年、1992年、1998年），如果采取5年（该时间点的前两年及后两年）作为时间间隔，环境指数与正常指数之间收敛性差异就更大。因此，收敛水平越高，指数之间的差异就越大，这显然说明了用环境收敛指数比用正常收敛指数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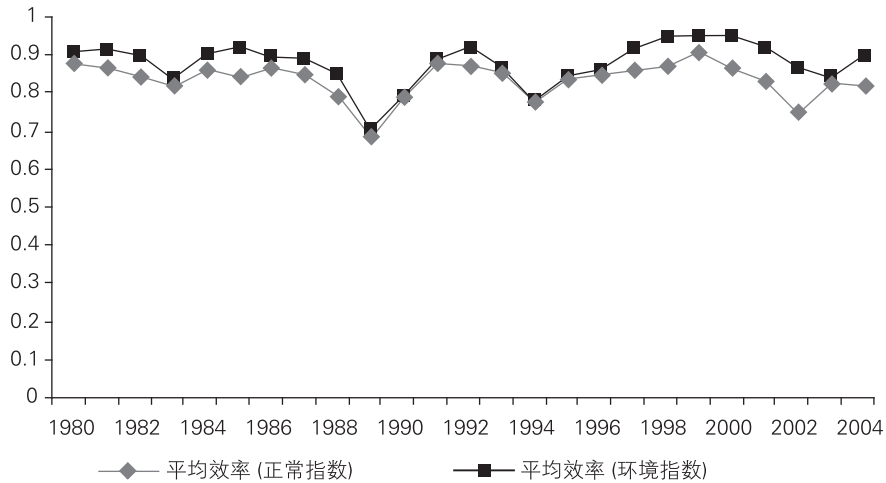


图2 1980~2004年平均效率指数的年度变化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的数据基础上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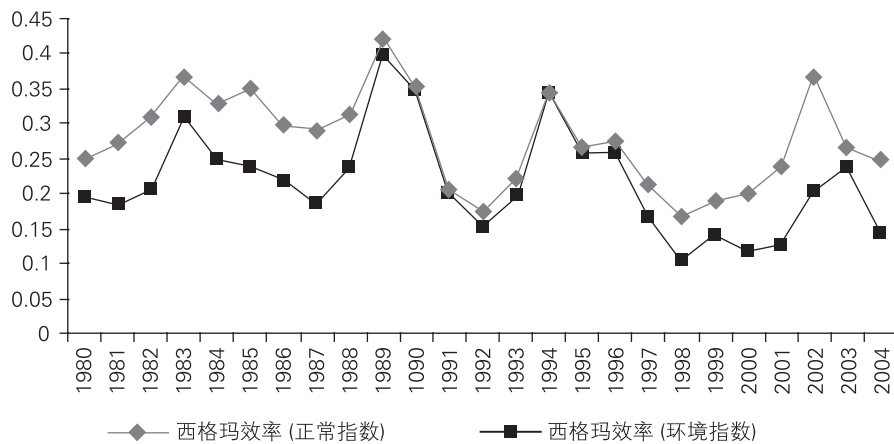


图3 1980~2004年平均效率指数σ 趋同的年度变化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的数据基础上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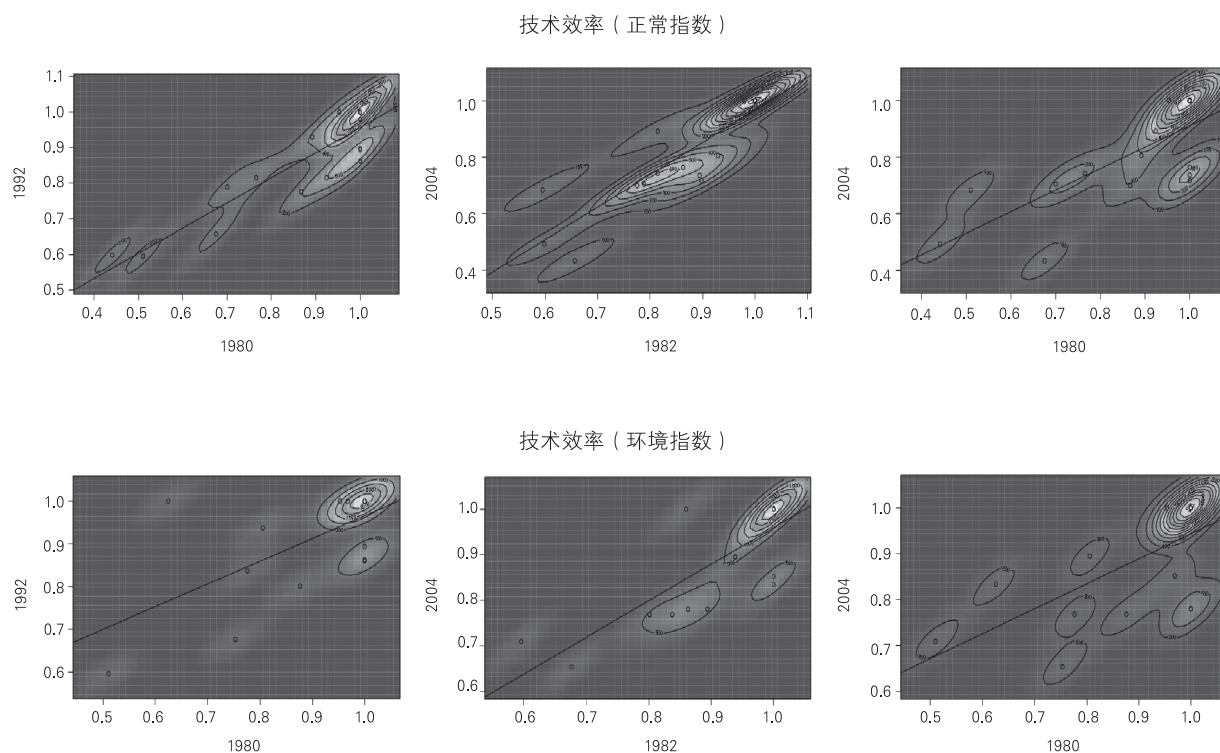


图4 效率分布动态：内核密度函数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的数据基础上绘制。

表3 1980~2004年各国正常技术效率指数与环境技术指数之间差异的威尔科克森比较检验

|             | 正常技术效率指数 | 环境技术效率指数 | 正常技术效率指数 | 环境技术效率指数 | 威尔科克森统计比较检验 | P值                        |
|-------------|----------|----------|----------|----------|-------------|---------------------------|
| 阿根廷         | -        | -        | -        | -        | -           | -                         |
|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 1.0      | 1.0      | 20.9     | 30.1     | 427.5       | 0.00613147 <sup>a</sup>   |
| 巴西          | -        | -        | -        | -        | -           | -                         |
| 智利          | 0.833    | 0.938    | 22.4     | 28.6     | 390.0       | 0.133593                  |
| 哥伦比亚        | 0.78     | 0.852    | 23.44    | 27.56    | 364.0       | 0.321335                  |
| 哥斯达黎加       | 0.869    | 0.882    | 24.54    | 26.46    | 336.5       | 0.640475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0.704    | 0.847    | 18.62    | 32.38    | 484.5       | 0.000874616 <sup>a</sup>  |
| 厄瓜多尔        | 0.481    | 0.735    | 17.38    | 33.62    | 515.5       | 0.0000851074 <sup>a</sup> |
| 萨尔瓦多        | 0.968    | 0.968    | 25.08    | 25.92    | 323.0       | 0.836961                  |
| 危地马拉        | 0.814    | 0.832    | 24.36    | 26.64    | 341.0       | 0.586772                  |
| 洪都拉斯        | 0.566    | 0.679    | 22.76    | 28.24    | 381.0       | 0.182123                  |
| 墨西哥         | -        | -        | -        | -        | -           | -                         |
| 尼加拉瓜        | 1.0      | 1.0      | 24.5     | 26.5     | 337.5       | 0.580007                  |
| 巴拿马         | -        | -        | -        | -        | -           | -                         |
| 巴拉圭         | 0.56     | 0.564    | 24.94    | 26.06    | 326.5       | 0.793175                  |
| 秘鲁          | 0.719    | 0.722    | 25.02    | 25.98    | 324.5       | 0.823365                  |
| 乌拉圭         | -        | -        | -        | -        | -           | -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        | -        | -        | -        | -           | -                         |

注：<sup>a</sup> 95%置信水平。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的数据基础上编制。



容易产生收敛性。

不仅考察收敛的测量方法同时也考察技术效率的分布（分布形式的变化和分布内的分布动态）（Quah, 1993和1997）<sup>13</sup>，现在要呈现的是技术效率分布的动态，这一动态是基于对Lucy、Ayckroyd和Pollard（2002）提出的内核密度函数的估计。以规范的形式记录数据，图4显示了拉丁美洲国家1980~1992年、1992~2004年和1980~2004年局部时期获得的技术效率水平的收敛性（离散性）和持久性（流动性）。

为了帮助解释这个图表，一种策略是分析说明整体分布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流动性、持久性和收敛性极端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持久性将反映在整个分布当中，在 $t$ 时期和 $t+s$ 时期之间保持它原有的特征，也就是说高效的国家保持高效而低效国家保持低效。关于流动性，存在着一个国家初始状况的完全逆转，因此在 $t$ 时期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国家在 $t+s$ 时期将变得高效率，而原先认为是高效率的国家却变得低效<sup>14</sup>。最后，如果分布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在与 $t$ 坐标轴平行的平面周围，而效率首先正态分布在横截面（即围绕着 $t+s=1$ 的值聚集），则可以说这个分布情况在国家效率水平的均等上趋同。

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考虑到观察期内这些国家的行为具有相当的异质性，似乎得到的结果是一个关于这些年来所获得的效率水平流动性的模式，在更高效率水平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收敛性（这表现为标志着不同水平曲线的散点越来越接近于穿越整个图像的轴线）。

当我们考察整个时期的正常技术效率指数时，我们

发现收敛模式具备一定程度的极化，朝着更高技术效率价值发展。通过区分不同分时期，我们注意到分布中的流动性，特别是1992~2004年这一期间。

当考察整个时期的环境技术效率指数时，我们虽然发现收敛模式具备一定程度的极化，朝着更高技术效率价值发展，但是与前面的情况不同的是，这个极化并没有被强烈凸显出来。通过区分不同分时期，我们也注意到1992~2004年期间分布中更大的流动性。总而言之，观察处于分布上部的国家如何在效率水平均等时并不明确地收敛非常有趣，特别是使用环境技术效率指数时。

### 3. 拉丁美洲国家在国家层面的技术效率分类分析

为了获得所分析的18个拉丁美洲国家技术效率的各自信息，统计附录中的表II和表III分别提供了1980~2004年25年观察期的正常指数和环境指数。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阿根廷是整个时期处于效率前沿的国家，因此其余国家朝着前沿方向发展将与阿根廷的技术发展相关。

根据按年和按国家的指数观察值获得的效率分析，有可能可以确定提出的这两种测算方法是否真实地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显著差异。我们提出用威尔科克森（Wilcoxon）比较检验作为配对样本的非参数方法<sup>15</sup>。

表3呈现的威尔科克森比较检验结果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断，在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厄瓜多尔，观察期内两种指数生成的相同技术效率估计值假设被拒绝了。

13 Quah（1997）认为，趋同联盟或俱乐部能够在国家间内生地形成，而收敛动态的差异取决于国家特征的初次分配。

14 根据Birchenal和Murcia（1997）的研究，领会其中含义的一个简单方法是观察分布的图形是否集中在 $t-t+s$ 平面标记的45度线上（在本例中，分布在时期内连续）。如果分布的图形集中在垂直于这条45度线的线段上，则在这个分布内就存在着完全的流动性。

15 在本例中，存在着 $n$ 对值 $(x_i, y_i)$ 可以作为两种不同测算方法每一个项目的测算变量。这是通过考虑样本配对之间的差异，按他们的绝对值从低到高排序而得。最后，每一个等级与相应差异的正负号相联系，而 $W$ 统计是正等级总和与负等级总和二者之间的较小值（如果 $W$ 值太小， $H_0$ 会被否决）。



## 五、结论

本文试图证明，考虑效率以及将环境因素引入生产率测量在评价该地区经济体时是否会产生更大差异。本文一开始讨论了经济增长的分析中使用这些测量方法并把考虑到环境外部性的方法补充到分析当中的重要性，旨在达到效率的收敛性的目标。

因此，本文用分析了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1980~200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采用的分析工具是马姆奎斯特生产率指数的框架，其中包含了用非参数线性规划技术计算得出的环境因素。

这种方法能使我们获得每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经济体的行为信息，该行为信息来源于其全面目标体系。目标不仅包含国内生产总值之类的最大产量输出目标，还包含减少环境污染等外部性经济目标。

特别要指出的是，据观察，与仅仅测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规模的传统方法相比，把环境因素引入测量效率和生产率变化中意味着会使该地区一些国家的估算值明显提高。

在考虑到修正有涵盖环境变量与没有涵盖环境变量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时，同样重要的是要突出纯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区别。

我们相信，这一新观点包含的可持续发展元素对于评估该地区效率与生产率增长决定相关政策尤为重要。

这些测量方法还辅以一个 $\sigma$ 趋同分析，允许两种测量（环境指数和正常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同时被分析，用以反映效率收敛性的变化。额外包括

了随机内核分析，从而得出结论：两种情况下收敛模式不同。

最后，我们的结论反映了环境敏感性的概念，利用提出的一些早期思想研究，比如Prieto和Zoffo（1996）的研究，他们使用数据包络分析估算得来的非参数生产函数，依照技术前沿者那样塑造环境治理效果的模型，使环境效率敏感指数（EESI）的发展成为可能：

$$EESI = \frac{E_A}{E_N} \quad (7)$$

在这个指数里，环境效率EA作为增加预期产出的能力，例如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减少的不必要的产物（例如二氧化碳），进行测量；而正常效率EN则作为增加预期产出同时忽略不必要的产物进行测量。

环境效率敏感指数显示了当不必要产物被忽略后，效率水平所受的影响。统计附录表IV表明，如果指标数值为1，正常效率与环境效率一样，这时如果忽略外部性的负面影响，利用上述两种方法也不会影响效率的测量结果。

然而，如果指标数值超过1，忽略外部性负面影响会导致正常效率结果和环境效率结果相距甚远（值越高，差距越大）。举例来说，厄瓜多尔使用的两种效率测量方法结果差距很大，因为该国环境效率敏感指数1982年、1984年与2002年都超过了2。

## 附录

表1 1980~2004年各国基本产出及投入统计

| 国家          | 国内生产总值<br>(以2000美元为单位) |                       |                       |                       | 二氧化碳排放量<br>(千吨) |           |           |           | 资本形成总额<br>(以2000美元为单位) |                       |                       |                       | 总劳动力       |            |            |            |
|-------------|------------------------|-----------------------|-----------------------|-----------------------|-----------------|-----------|-----------|-----------|------------------------|-----------------------|-----------------------|-----------------------|------------|------------|------------|------------|
|             | 平均值                    | 标准差                   | 最大值                   | 最小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最大值       | 最小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最大值                   | 最小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最大值        | 最小值        |
| 阿根廷         | 2.33x10 <sup>10</sup>  | 3.85x10 <sup>10</sup> | 2.97x10 <sup>11</sup> | 1.82x10 <sup>11</sup> | 117 898.1       | 13 100.74 | 141 659.2 | 97 582.32 | 3.79x10 <sup>10</sup>  | 9.46x10 <sup>9</sup>  | 5.65x10 <sup>10</sup> | 2.14x10 <sup>10</sup> | 13 669 895 | 2 429 348  | 17 935 785 | 9 994 149  |
|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 6.72x10 <sup>9</sup>   | 1.41x10 <sup>9</sup>  | 9.36x10 <sup>9</sup>  | 5.07x10 <sup>9</sup>  | 6 413.327       | 2 175.794 | 10 315.01 | 3 772.89  | 1.03x10 <sup>9</sup>   | 3.93x10 <sup>8</sup>  | 2.02x10 <sup>9</sup>  | 4.98x10 <sup>9</sup>  | 2 790 266  | 662 825.5  | 4 030 275  | 1 904 508  |
| 巴西          | 5.44x10 <sup>11</sup>  | 9.22x10 <sup>10</sup> | 7.17x10 <sup>11</sup> | 4.02x10 <sup>11</sup> | 245 350.2       | 58 048.56 | 331 856.8 | 170 399.1 | 8.97x10 <sup>10</sup>  | 1.83x10 <sup>10</sup> | 1.18x10 <sup>11</sup> | 5.22x10 <sup>10</sup> | 68 240 356 | 14 048 140 | 90 112 347 | 46 383 610 |
| 智利          | 5.19x10 <sup>10</sup>  | 2.12x10 <sup>10</sup> | 8.82x10 <sup>10</sup> | 2.54x10 <sup>10</sup> | 39 921.13       | 15 394.37 | 63 311.29 | 21 322.32 | 1.05x10 <sup>10</sup>  | 5.99x10 <sup>9</sup>  | 2.02x10 <sup>10</sup> | 2.25x10 <sup>9</sup>  | 5 199 154  | 881 040.1  | 6 440 791  | 3 764 594  |
| 哥伦比亚        | 6.9x10 <sup>10</sup>   | 1.58x10 <sup>10</sup> | 9.44x10 <sup>10</sup> | 4.6x10 <sup>10</sup>  | 54 977.97       | 7 340.267 | 67 882.72 | 39 816.81 | 1.26x10 <sup>10</sup>  | 3.55x10 <sup>9</sup>  | 2.03x10 <sup>10</sup> | 8.87x10 <sup>9</sup>  | 15 005 980 | 3 998 424  | 21 624 471 | 8 767 824  |
| 哥斯达黎加       | 1.14x10 <sup>10</sup>  | 3.74x10 <sup>9</sup>  | 1.84x10 <sup>10</sup> | 6.77x10 <sup>9</sup>  | 3 943           | 1 506.379 | 6 488.858 | 1 999.998 | 2.11x10 <sup>9</sup>   | 1.02x10 <sup>9</sup>  | 4.12x10 <sup>9</sup>  | 7.12x10 <sup>8</sup>  | 1 270 419  | 324 250.8  | 1 890 374  | 803 514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1.37x10 <sup>10</sup>  | 4.34x10 <sup>9</sup>  | 2.14x10 <sup>10</sup> | 8.77x10 <sup>9</sup>  | 13 064.6        | 5 457.289 | 21 476.17 | 6 080.58  | 2.59x10 <sup>9</sup>   | 1.26x10 <sup>9</sup>  | 4.91x10 <sup>9</sup>  | 1.18x10 <sup>9</sup>  | 2 912 533  | 598 930.2  | 3 922 804  | 1 970 477  |
| 厄瓜多尔        | 1.42x10 <sup>10</sup>  | 2.48x10 <sup>9</sup>  | 1.96x10 <sup>10</sup> | 1.09x10 <sup>10</sup> | 20 042.91       | 3 980     | 29 241.73 | 13 428.56 | 3.95x10 <sup>9</sup>   | 7.24x10 <sup>8</sup>  | 5.65x10 <sup>9</sup>  | 2.49x10 <sup>9</sup>  | 4 141 844  | 1 154 034  | 6 094 389  | 2 481 790  |
| 萨尔瓦多        | 1.01x10 <sup>10</sup>  | 2.48x10 <sup>9</sup>  | 1.42x10 <sup>10</sup> | 7.3x10 <sup>9</sup>   | 3 835.894       | 1 748.742 | 6 373.62  | 1 582.416 | 1.51x10 <sup>9</sup>   | 6.41x10 <sup>8</sup>  | 2.45x10 <sup>9</sup>  | 7.01x10 <sup>8</sup>  | 2 054 709  | 347 329.5  | 2 652 950  | 1 573 128  |
| 危地马拉        | 1.5x10 <sup>10</sup>   | 3.57x10 <sup>9</sup>  | 2.17x10 <sup>10</sup> | 1.12x10 <sup>10</sup> | 6 415.232       | 2 821.467 | 12 208.78 | 3 146.517 | 2.39x10 <sup>9</sup>   | 9.12x10 <sup>8</sup>  | 4.08x10 <sup>9</sup>  | 1.24x10 <sup>9</sup>  | 3 037 231  | 514 338.6  | 4 007 775  | 2 294 138  |
| 洪都拉斯        | 5.72x10 <sup>9</sup>   | 1.33E+09              | 8.41x10 <sup>9</sup>  | 4.05x10 <sup>9</sup>  | 3 501.681       | 1 661.561 | 7 608.051 | 1 761.903 | 1.36x10 <sup>9</sup>   | 5.85x10 <sup>8</sup>  | 2.36x10 <sup>9</sup>  | 5.22x10 <sup>8</sup>  | 1 804 894  | 478 641.7  | 2 780 670  | 1 151 767  |
| 墨西哥         | 4.55x10 <sup>11</sup>  | 8.76E+10              | 6.18x10 <sup>11</sup> | 3.46x10 <sup>11</sup> | 38 6282.6       | 4 4395.27 | 437 629.6 | 305 871.5 | 9.52x10 <sup>10</sup>  | 2.66x10 <sup>10</sup> | 1.39x10 <sup>11</sup> | 5.8x10 <sup>10</sup>  | 31 956 418 | 6 875 134  | 41 947 700 | 20 949 972 |
| 尼加拉瓜        | 3.38x10 <sup>9</sup>   | 4.73x10 <sup>8</sup>  | 4.41x10 <sup>9</sup>  | 2.81x10 <sup>9</sup>  | 2 719.997       | 769.3747  | 4 003.659 | 1 542.123 | 8.96E+08               | 2.46x10 <sup>8</sup>  | 1.43x10 <sup>9</sup>  | 4.89x10 <sup>8</sup>  | 1 473 547  | 297 830.1  | 2 005 893  | 1 048 795  |
| 巴拿马         | 8.91x10 <sup>9</sup>   | 2.19x10 <sup>9</sup>  | 1.34x10 <sup>10</sup> | 6.19x10 <sup>9</sup>  | 4 202.047       | 1 389.2   | 6 996.33  | 2 457.873 | 1.75x10 <sup>9</sup>   | 8.13x10 <sup>8</sup>  | 3.09x10 <sup>9</sup>  | 3.13x10 <sup>8</sup>  | 1 010 102  | 240 724.1  | 1 429 199  | 650 672.8  |
| 巴拉圭         | 6.17x10 <sup>9</sup>   | 1.13x10 <sup>9</sup>  | 7.8E+09               | 4.51x10 <sup>9</sup>  | 2 851.133       | 1 138.477 | 4 498.164 | 1 373.625 | 1.41x10 <sup>9</sup>   | 3.01x10 <sup>8</sup>  | 2x10 <sup>9</sup>     | 9.55x10 <sup>8</sup>  | 1 841 108  | 482 349.4  | 2 710 230  | 1 122 132  |
| 秘鲁          | 4.54x10 <sup>10</sup>  | 7.53x10 <sup>9</sup>  | 6.13x10 <sup>10</sup> | 3.61x10 <sup>10</sup> | 24 014.04       | 3 103.941 | 31 465.17 | 19 113.53 | 9.13x10 <sup>9</sup>   | 2.44x10 <sup>9</sup>  | 1.31x10 <sup>10</sup> | 5.02x10 <sup>9</sup>  | 9 061 440  | 2 179 845  | 12 711 846 | 5 574 149  |
| 乌拉圭         | 1.7x10 <sup>10</sup>   | 2.84x10 <sup>9</sup>  | 2.16x10 <sup>10</sup> | 1.25x10 <sup>10</sup> | 4 585.343       | 789.5953  | 6 161.166 | 3 139.191 | 2.39x10 <sup>9</sup>   | 7.42x10 <sup>8</sup>  | 3.68x10 <sup>9</sup>  | 1.23x10 <sup>9</sup>  | 1 422 088  | 166 220.8  | 1 658 579  | 1 145 160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1.02x10 <sup>11</sup>  | 1.36x10 <sup>10</sup> | 1.21x10 <sup>11</sup> | 8.25x10 <sup>10</sup> | 133 977.7       | 33 705.71 | 182 325.8 | 87 681.23 | 1.8x10 <sup>10</sup>   | 6.95x10 <sup>9</sup>  | 3.22x10 <sup>10</sup> | 7.87x10 <sup>9</sup>  | 8 100 614  | 2 181 901  | 12 389 620 | 4 995 009  |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使用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的数据基础上编制。

表II 1980~2004年各国每年技术效率估算值: 正常指数

| 国家          | 1980  | 1981  | 1982  | 1983  | 1984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
| 阿根廷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 1     | 1     | 1     | 1     | 0.558 | 1     | 0.626 | 0.566 | 0.988 | 0.943 | 0.98  | 0.994 | 1     | 1     | 1     | 1     | 0.86  | 0.768 | 0.93  | 0.962 | 1     | 0.663 | 1     | 1     | 1     |
| 巴西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智利          | 0.924 | 0.886 | 1     | 0.997 | 0.966 | 1     | 0.939 | 0.917 | 0.608 | 0.606 | 0.774 | 0.815 | 0.677 | 0.68  | 0.673 | 0.687 | 0.721 | 0.749 | 0.833 | 0.748 | 0.816 | 0.947 | 0.912 | 0.912 | 0.893 |
| 哥伦比亚        | 0.892 | 0.85  | 0.696 | 0.554 | 0.613 | 0.755 | 0.775 | 0.87  | 0.827 | 0.61  | 0.59  | 0.939 | 0.93  | 0.683 | 0.504 | 0.557 | 0.604 | 0.843 | 0.918 | 1     | 1     | 0.685 | 0.78  | 0.806 | 0.806 |
| 哥斯达黎加       | 1     | 1     | 1     | 1     | 1     | 0.829 | 0.753 | 0.81  | 0.847 | 0.848 | 0.83  | 0.863 | 0.869 | 0.895 | 1     | 1     | 0.994 | 0.807 | 1     | 0.889 | 0.749 | 0.855 | 0.858 | 0.764 | 0.764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0.7   | 0.85  | 0.801 | 0.649 | 0.86  | 0.787 | 0.701 | 0.681 | 0.726 | 0.487 | 0.563 | 0.862 | 0.789 | 0.799 | 0.651 | 0.814 | 0.719 | 0.778 | 0.745 | 0.622 | 0.604 | 0.582 | 0.449 | 0.591 | 0.704 |
| 厄瓜多尔        | 0.441 | 0.481 | 0.4   | 0.348 | 0.416 | 0.424 | 0.45  | 0.438 | 0.5   | 0.316 | 0.326 | 0.525 | 0.598 | 0.541 | 0.373 | 0.499 | 0.503 | 0.6   | 0.584 | 0.974 | 0.692 | 0.487 | 0.311 | 0.459 | 0.493 |
| 萨尔瓦多        | 1     | 1     | 1     | 0.968 | 1     | 1     | 1     | 0.794 | 0.511 | 0.901 | 1     | 0.894 | 0.893 | 0.714 | 0.803 | 1     | 1     | 1     | 1     | 1     | 0.884 | 0.76  | 0.589 | 0.653 | 0.736 |
| 危地马拉        | 0.867 | 0.815 | 0.728 | 0.71  | 0.814 | 0.874 | 0.949 | 0.802 | 0.84  | 0.63  | 0.77  | 0.875 | 0.776 | 0.89  | 0.706 | 0.934 | 1     | 1     | 0.915 | 0.85  | 0.779 | 0.72  | 0.515 | 0.641 | 0.699 |
| 洪都拉斯        | 0.675 | 1     | 1     | 1     | 1     | 1     | 1     | 0.489 | 0.398 | 0.596 | 0.663 | 0.657 | 0.536 | 0.467 | 0.549 | 0.56  | 0.566 | 0.703 | 0.559 | 0.547 | 0.53  | 0.399 | 0.466 | 0.434 | 0.434 |
| 墨西哥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尼加拉瓜        | 1     | 0.463 | 0.447 | 0.367 | 0.365 | 0.33  | 0.395 | 0.426 | 0.353 | 0.304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巴拿马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巴拉圭         | 0.51  | 0.51  | 0.504 | 0.478 | 0.51  | 0.482 | 0.528 | 0.53  | 0.493 | 0.361 | 0.451 | 0.56  | 0.595 | 0.633 | 0.507 | 0.622 | 0.581 | 0.578 | 0.913 | 1     | 1     | 0.794 | 0.779 | 0.767 | 0.683 |
| 秘鲁          | 0.765 | 0.693 | 0.621 | 0.637 | 0.801 | 1     | 0.862 | 0.816 | 0.821 | 0.612 | 0.476 | 0.748 | 0.815 | 0.742 | 0.454 | 0.537 | 0.516 | 0.692 | 0.719 | 0.688 | 0.722 | 0.745 | 0.541 | 0.674 | 0.743 |
| 乌拉圭         | 0.953 | 0.997 | 0.948 | 0.923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1     | 0.989 | 0.894 | 1     | 0.979 | 0.907 | 0.949 | 0.943 | 0.903 | 1     | 1     | 0.995 | 0.898 | 1     | 1     | 1     | 1     | 0.773 | 0.762 | 0.721 | 0.665 | 0.698 | 0.704 | 0.948 | 0.716 |
| 平均值         | 0.874 | 0.863 | 0.836 | 0.813 | 0.853 | 0.838 | 0.858 | 0.844 | 0.783 | 0.681 | 0.784 | 0.873 | 0.867 | 0.848 | 0.775 | 0.833 | 0.843 | 0.856 | 0.866 | 0.899 | 0.861 | 0.827 | 0.746 | 0.819 | 0.815 |

资料来源: 本文作者在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的数据基础上编制。

表III 1980~2004年各国每年技术效率估算值：环境指数

| 国家          | 1980  | 1981  | 1982  | 1983  | 1984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
| 阿根廷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0.902 | 0.764 | 0.988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巴西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智利          | 1     | 0.938 | 1     | 1     | 1     | 1     | 1     | 0.95  | 0.981 | 0.608 | 0.619 | 0.776 | 0.86  | 0.677 | 0.68  | 0.731 | 0.771 | 0.809 | 0.835 | 0.952 | 0.901 | 0.922 | 0.988 | 0.965 | 1     |
| 哥伦比亚        | 0.968 | 0.94  | 0.88  | 0.554 | 0.716 | 0.809 | 0.802 | 0.888 | 0.897 | 0.61  | 0.59  | 0.941 | 1     | 0.683 | 0.504 | 0.557 | 0.604 | 0.926 | 1     | 1     | 1     | 1     | 0.804 | 0.787 | 0.852 |
| 哥斯达黎加       | 1     | 1     | 1     | 1     | 1     | 1     | 0.85  | 0.753 | 0.81  | 0.847 | 0.848 | 0.83  | 0.863 | 0.873 | 0.916 | 1     | 1     | 0.995 | 0.871 | 1     | 0.99  | 0.787 | 0.867 | 0.882 | 0.78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0.805 | 0.939 | 0.81  | 0.683 | 0.967 | 1     | 0.872 | 0.847 | 0.856 | 0.487 | 0.553 | 0.931 | 0.938 | 0.801 | 0.651 | 0.814 | 0.759 | 1     | 0.986 | 0.8   | 0.868 | 0.885 | 0.752 | 0.614 | 0.895 |
| 厄瓜多尔        | 0.625 | 0.779 | 0.888 | 0.625 | 0.917 | 0.783 | 0.576 | 0.588 | 0.752 | 0.437 | 0.341 | 0.554 | 1     | 0.735 | 0.373 | 0.531 | 0.559 | 0.758 | 0.824 | 1     | 1     | 0.966 | 0.699 | 0.496 | 0.834 |
| 萨尔瓦多        | 1     | 1     | 1     | 0.968 | 1     | 1     | 1     | 1     | 0.794 | 0.511 | 0.901 | 1     | 0.894 | 0.894 | 0.714 | 0.803 | 1     | 1     | 1     | 1     | 0.902 | 0.818 | 0.686 | 0.659 | 0.78  |
| 危地马拉        | 0.876 | 0.815 | 0.728 | 0.71  | 0.814 | 0.9   | 0.97  | 0.832 | 0.845 | 0.63  | 0.77  | 0.883 | 0.801 | 0.891 | 0.706 | 0.934 | 1     | 1     | 0.969 | 0.851 | 0.844 | 0.784 | 0.599 | 0.646 | 0.768 |
| 洪都拉斯        | 0.753 | 1     | 1     | 1     | 1     | 1     | 1     | 1     | 0.507 | 0.398 | 0.596 | 0.679 | 0.676 | 0.536 | 0.467 | 0.549 | 0.568 | 0.639 | 0.764 | 0.639 | 0.689 | 0.696 | 0.697 | 0.574 | 0.654 |
| 墨西哥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尼加拉瓜        | 1     | 0.744 | 0.669 | 0.375 | 0.43  | 0.457 | 0.549 | 0.722 | 0.53  | 0.304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巴拿马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巴拉圭         | 0.51  | 0.51  | 0.504 | 0.478 | 0.511 | 0.503 | 0.547 | 0.558 | 0.501 | 0.361 | 0.451 | 0.564 | 0.596 | 0.633 | 0.507 | 0.622 | 0.586 | 0.638 | 0.925 | 1     | 1     | 0.794 | 0.861 | 0.767 | 0.709 |
| 秘鲁          | 0.776 | 0.695 | 0.621 | 0.637 | 0.801 | 1     | 0.862 | 0.816 | 0.831 | 0.612 | 0.476 | 0.749 | 0.837 | 0.742 | 0.454 | 0.537 | 0.516 | 0.7   | 0.735 | 0.688 | 0.722 | 0.745 | 0.542 | 0.675 | 0.768 |
| 乌拉圭         | 0.963 | 0.997 | 0.948 | 0.923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平均值         | 0.904 | 0.909 | 0.892 | 0.831 | 0.898 | 0.914 | 0.89  | 0.886 | 0.845 | 0.698 | 0.785 | 0.884 | 0.915 | 0.859 | 0.776 | 0.838 | 0.854 | 0.915 | 0.939 | 0.941 | 0.94  | 0.911 | 0.861 | 0.837 | 0.891 |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的数据基础上编制。

表IV 1980~2004年各国每年环境效率敏感指数估算值：正常指数与环境指数的商数

| 国家          | 1980  | 1981  | 1982  | 1983  | 1984  | 1985  | 1986  | 1987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
| 阿根廷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 1     | 1     | 1     | 1     | 1     | 1.792 | 1     | 1     | 1.441 | 1.350 | 1     | 1.060 | 1.020 | 1.006 | 1     | 1     | 1     | 1.163 | 1.302 | 1.075 | 1.040 | 1     | 1.508 | 1     | 1     |
| 巴西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智利          | 1.082 | 1.059 | 1     | 1     | 1.003 | 1.035 | 1     | 1.012 | 1.070 | 1     | 1.021 | 1.003 | 1.055 | 1     | 1     | 1.086 | 1.122 | 1.122 | 1.115 | 1.143 | 1.205 | 1.130 | 1.043 | 1.058 | 1.120 |
| 哥伦比亚        | 1.085 | 1.106 | 1.264 | 1     | 1.168 | 1.072 | 1.035 | 1.021 | 1.085 | 1     | 1     | 1.002 | 1.075 | 1     | 1     | 1     | 1     | 1.098 | 1.089 | 1     | 1     | 1     | 1.174 | 1.009 | 1.057 |
| 哥斯达黎加       | 1     | 1     | 1     | 1     | 1     | 1     | 1.025 | 1     | 1     | 1     | 1     | 1     | 1     | 1.005 | 1.023 | 1     | 1     | 1.001 | 1.079 | 1     | 1.114 | 1.051 | 1.014 | 1.028 | 1.021 |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1.150 | 1.105 | 1.011 | 1.052 | 1.124 | 1.271 | 1.244 | 1.244 | 1.179 | 1     | 1.080 | 1.189 | 1.003 | 1     | 1     | 1.056 | 1.285 | 1.323 | 1.286 | 1.437 | 1.521 | 1.675 | 1.039 | 1.271 | 1.271 |
| 厄瓜多尔        | 1.417 | 1.620 | 2.220 | 1.796 | 2.204 | 1.847 | 1.280 | 1.342 | 1.504 | 1.383 | 1.046 | 1.055 | 1.672 | 1.359 | 1     | 1.064 | 1.111 | 1.263 | 1.411 | 1.027 | 1.445 | 1.984 | 2.248 | 1.081 | 1.692 |
| 萨尔瓦多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001 | 1     | 1     | 1     | 1     | 1     | 1     | 1.020 | 1.076 | 1.165 | 1.009 | 1.060 |
| 危地马拉        | 1.010 | 1     | 1     | 1     | 1     | 1.030 | 1.022 | 1.037 | 1.006 | 1     | 1     | 1.009 | 1.032 | 1.001 | 1     | 1     | 1     | 1     | 1.059 | 1.001 | 1.083 | 1.089 | 1.163 | 1.008 | 1.099 |
| 洪都拉斯        | 1.116 | 1     | 1     | 1     | 1     | 1     | 1     | 1     | 1.037 | 1     | 1     | 1.024 | 1.029 | 1     | 1     | 1.014 | 1.129 | 1.087 | 1.143 | 1.260 | 1.313 | 1.747 | 1.232 | 1.507 | 1.507 |
| 墨西哥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尼加拉瓜        | 1     | 1.607 | 1.497 | 1.022 | 1.178 | 1.385 | 1.390 | 1.695 | 1.50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巴拿马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巴拉圭         | 1     | 1     | 1     | 1     | 1.002 | 1.044 | 1.036 | 1.053 | 1.016 | 1     | 1     | 1.007 | 1.002 | 1     | 1     | 1.009 | 1.104 | 1.013 | 1     | 1     | 1     | 1     | 1.105 | 1     | 1.038 |
| 秘鲁          | 1.014 | 1.003 | 1     | 1     | 1     | 1     | 1     | 1     | 1.012 | 1     | 1     | 1.001 | 1.027 | 1     | 1     | 1     | 1     | 1.012 | 1.022 | 1     | 1     | 1     | 1.002 | 1.001 | 1.034 |
| 乌拉圭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1     | 1.011 | 1.119 | 1     | 1.021 | 1.103 | 1.054 | 1.060 | 1.107 | 1     | 1     | 1.005 | 1.114 | 1     | 1     | 1     | 1     | 1.294 | 1.312 | 1.387 | 1.504 | 1.433 | 1.420 | 1.055 | 1.397 |
| 平均值         | 1.034 | 1.053 | 1.067 | 1.022 | 1.053 | 1.091 | 1.037 | 1.050 | 1.079 | 1.025 | 1.001 | 1.013 | 1.055 | 1.013 | 1.001 | 1.006 | 1.013 | 1.069 | 1.084 | 1.047 | 1.092 | 1.102 | 1.154 | 1.022 | 1.093 |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发展金融的数据基础上编制。

## 参考文献

- Abramovitz, M. (1986),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6, No.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tkinson, G., S. Dietz and E. Neumayer (eds.) (2007), *Handboo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Edward Elgar.
- Ball, E. and others (2005), "Accounting for externaliti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Malmquist cost productivity measur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 16, No. 3, Amsterdam, Elsevier.
- Barro, R.J. (1991),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6, No. 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Barro, R.J. and X. Sala-i-Martin (1992),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0, No.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umol, W.J. (1986),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5,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Baumol, W.J. and E.N. Wolff (1988),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No. 5,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Birchenal, J.A. and G.E. Murcia (1997), "Convergencia regional: una revisión del caso colombiano", *Archivos de macroeconomía*, No. 69, Bogotá, D.C., National Planning Department.
- Boulding, K.E. (1966), *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 Armonk, M.E. Sharpe.
- Carlson, R. (1962), *Silent Spr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Caves, D.W., L.R. Christensen and W.E. Diewert (1982), "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dex number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put,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 50, No. 6, Washington, D.C.,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 Cole, M. (2007),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Handboo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 Atkinson, S. Dietz and E. Neumayer (eds.), 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Edward Elgar.
- Cole, M., R. Elliot and K. Shimamoto (2005), "A note on the trends in European industrial pollution intensities: a Divisia index approach", *Energy Journal*, vol. 26, No. 3, Clevel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nergy Economics.
- Ching-Cheng, C. and L. Yir-Hueih (1999), "Efficiency change and growth in productivity: the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10, No. 4, Amsterdam, Elsevier.
- De la Fuente, A. (2007), "Modelos de convergencia/divergencia y un breve panorama de la evidencia empírica", *Crecimiento económico, desigualdades y distribución de la renta*, J.F. Tezanos (ed.), Madrid, Editorial Sistema.
- Denison, E.F. (1979), *Accounting for Slower Economic Grow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Dowrick, S. and D. Nguyen (1989), "OECD comparative economic growth 1950-1985: catch up and converg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9, No. 5,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8),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20 Years Later: Old Problems, New Opportunities (LC/G.2367(SES.32/3))*, Santiago, Chile.
- Ekins, P. (1993), "Limits to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appling with ecological realities",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8, No. 3, Amsterdam, Elsevier.
- Eliás, V. (2001), "Convergencia económica en América Latina: 1960-1995", *Convergencia económica e integración: la experiencia en Europa y América Latina*, T. Mancha and D. Sotelsek (eds.), Madrid, Ediciones Pirámide.
- Färe, R. and D. Primont (1995), *Multi-output Production and Duality: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Färe, R. and others (1994),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1,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Färe, R., S. Grosskopf and F. Hernández-Sancho (2004),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 index number approach",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vol. 26, No. 4, Amsterdam, Elsevier.
- Färe, R., S. Grosskopf and P. Roos (1998),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es: a surve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dex Numbers: Essays in Honour of Sten Malmquist*, R. Färe, S. Grosskopf and R.R. Russell (eds.),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Färe, R., S. Grosskopf and C. Pasurka (2007), "Pollution abatement activities and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62, No. 3-4, Amsterdam, Elsevier.
- Fisher, I. (1992), *The Making of Index Numbe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Grossman, G.M. and A.B. Krueger (1995),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0, No. 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Hofman, A. (2001), "Long 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oximate and ultimate causes", *Macroeconomía del desarrollo series*, No. 8 (LC/L.1665-P),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1.II.G.199.



- Kim, J.I. and L.J. Lau (1996), "The sources of Asian Pacific economic growth",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9, Quebec, Canadi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 Krugman, P.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Kumar, S. (2006),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productivity growth: a global analysis using 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56, No. 2, Amsterdam, Elsevier.
- Lanteri, L.N. (2002), "Productividad, desarrollo tecnológico y eficiencia. La propuesta de los índices Malmquist", *Anales de la Asociación Argentina de Economía Política*, XXXVII Annual Meeting, Tucumán, Argentina [online] [www.aaep.org.ar](http://www.aaep.org.ar)
- Lucy, D., R.G. Aykroyd and A.M. Pollard (2002), "Nonparametric calibration for age estimation", *Applied Statistics*, vol. 51, No. 2, London,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 Maddison, A. (1987), "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techniques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5, No. 2, Nashville, Tenness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Mankiw, N.G., D. Romer and D. Weil (1992),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7, No. 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Markandya, A. (199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concept to ac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ramework",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 Maudos, J., L. Serrano and J. Pastor (1999),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and human capital in OECD", *Economics Letters*, vol. 63, No. 1, Amsterdam, Elsevier.
- Meadows, D.H. and others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Universe Books.
- Prieto, A.M. and J.L. Zofio (1996), "Modelización de los efectos de la regulación ambiental con fronteras tecnológicas DEA", *Revista española de economía agraria*, No. 175, Madrid,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 Quah, D. (1997), "Empirics for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stratification, polarization, and convergence club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2, No. 1, New York, Springer.
- \_\_\_\_\_ (1996), "Empiric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0, No. 6, Amsterdam, Elsevier.
- \_\_\_\_\_ (1993), "Galton's fallacy and tests of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5, No. 4, Hoboken, Blackwell Publishing.
- Robinson, J.C. (1995),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on productivity growth in U.S. manufacturing", *The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vol. 12, No. 2,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Law School.
- Romer, P.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No. 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la-i-Martin, X. (1999), *Apuntes de crecimiento económico*, Barcelona, Antoni Bosch Editor.
- Schuschny, A.R. (2007), "El método DEA y su aplicación al estudio del sector energético y las emisiones de CO<sub>2</sub>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studios estadísticos y prospectivos series*, No. 46 (LC/L.2657-P),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S.07.II.G.8.
- Shafik, N. (1994),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4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limano, A. and R. Soto (2005),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Macroeconomía del desarrollo series*, No. 33 (LC/L.2236-P),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4.II.G.156.
- Solow, R.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9, No. 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Stern, D.I. (2002), "Explaining changes in global sulfur emissions: an econometric decomposition approach",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42, No. 1-2, Amsterdam, Elsevier.
- Taskin, F. and O. Zaim (1997), "Catching-up and innovation in high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Economics Letters*, vol. 54, No. 1, Amsterdam, Elsevier.
- WCED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A/42/47)*,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Wessa, P. (2009), "Free Statistics Software, Office fo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version 1.1.23-r3" [online] <http://www.wessa.net/>
- Young, A. (1994),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 a contrarian view",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38, No. 3-4, Amsterdam, Elsevier.



## 关键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期刊

经济历史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

发展模式

拉丁美洲

加勒比

# 《拉美经委会评论》 之编辑历程

*André Hofman和Miguel Torres*

# 拉

《拉美经委会评论》(CEPAL Review)于1976年创刊,创刊人为Raúl Prebisch。目前,该杂志已连续出版100多期,共收录1000多篇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展问题的文章。本文旨在探讨《拉美经委会评论》在传播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观点方面的作用以及与发展问题相关的其他分析动态。为此,本文分析了在《拉美经委会评论》上发表的部分文章,尤其是旨在解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面临之长期问题(增长与技术进步、贫困与社会不平等、可持续发展、民主及公民身份)的文章,并由相关责任编辑对其进行分类。

André Hofman

《拉美经委会评论》主编

⇒ [andre.hofman@cepal.org](mailto:andre.hofman@cepal.org)

Miguel Torres

《拉美经委会评论》技术编辑

⇒ [miguel.torres@cepal.org](mailto:miguel.torres@cepal.org)

## 一、引言

过去60多年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及其最杰出成员通过发表大量期刊或特刊传播思想观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调查》（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是期刊类的典型代表，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成立之时创刊，是该委员会最早的年刊。目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调查》已出版64期<sup>1</sup>，其中以1948年版和1949年版最具特色。1948年版概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长期的经济状况，1949年版则介绍Prebisch（时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关于技术进步、贸易条件以及阻碍该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sup>2</sup>。自创刊以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调查》日趋关注当前宏观经济动态和宏观经济长期状况的分析<sup>3</sup>。在此背景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创办了其他期刊，重点关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其他核心领域的现状和前景。此类期刊包括《拉丁美洲社会概览》（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世界经济中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World Economy）、《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外国投资》（Foreign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除了关于地区表现不同方面的各类机构报告（多数分析当前趋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还在过去36年里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重点关注结构性发展问题，集中刊登在《拉美经委会评论》上。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成员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独立撰稿人或其他机构的代表（得益于严格的编辑独立性政策），文章全面分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这个多元化地区面临的各类问题、地区和国家形势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

鉴于《拉美经委会评论》所载文章包含大量观点和看法。本文旨在梳理创刊以来的大事件，以及介绍其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形成自身理念所做的主要贡献。第二、三、四、五部分全面梳理最能够反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理念的文章（尽管并非详尽无遗），偶尔引用独立撰稿人和其他机构作者的观点。这些作者从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不同的立场出发，全面分析诸多发展议题。

上述四部分分别对应《拉美经委会评论》自创刊以来的四个阶段，编辑合作关系在这四个阶段贯穿始终。各章分析的文章均由两位编辑筛选。第二部分：主编Raúl Prebisch，技术编辑Adolfo Gurrieri。第三部分：主编Aníbal Pinto Santa Cruz，技术编辑Eugenio Lahera。第四部分：主编Oscar Altimir，总编辑Reynaldo Bajraj。第五部分：主编André Hofman，技术编辑Miguel Torres。

□ 本文基于作者在《拉美经委会评论》第96期上发表的文章（参见Hofman和Torres，2008）。

1 关于本刊历史的更详尽回顾，参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08a，第5章）。

2 分别参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49）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51）。

3 每年年中出版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调查》简要介绍经济状况。作为补充，每年12月还出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体初步综述》（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二、Prebisch-Gurrieri时期（1976~1986年）

《拉美经委会评论》创刊于1976年，最初每年出版两次。第一期于1976年上半年出版<sup>4</sup>，从此取代自1956年至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出版的《拉丁美洲经济公报》（Economic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sup>5</sup>。

Bielschowsky（1998）总结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涉及的核心议题是“发展方式”。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重点关注独立、危险的过度借贷以及出口能力不足等问题。对这一时期的分析主要围绕增长战略、此类战略与生产结构的关系、分配方式以及权力结构展开。此外，分析还强调该地区经济体必须走上工业化道路，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寻求扩大出口。就政治含义而言，该观点着重强调必须“保证有助于实现社会同质性的特色切实可行”以及“加强工业出口”（Bielschowsky, 1998, 第23页）。

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在60年代中期形成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完善，该理念着力强调促进社会发展以及在社会发展与经济问题之间建立紧密关系。在此阶段，贫困与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关于发展和环境的理念也在该时期初步形成。

以上是《拉美经委会评论》创刊初期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主要理念。Raúl Prebisch担任《拉美经委会评论》首任主编，阿根廷社会学家Adolfo Gurrieri担任技术秘书，是Raúl Prebisch的得力助手。Prebisch（1984）在其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Five Stages in My Thinking on Development中谈及第五个阶段。他表示，“为国际机构服务多年之后，本人不再履行行政职责，就从进入第五阶段。《拉美经委会评论》邀请我担任主编。我在本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集中阐述我的理论观点。这些文章构成本人所著《外围资本主义》

（Peripheral Capitalism）的基础。这是我关于发展问题之思想的第五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阶段”。<sup>6</sup>

Raúl Prebisch自1976年至1986年4月去世前夕一直担任《拉美经委会评论》主编。在Prebisch担任主编的十年中，《拉美经委会评论》发表了其关于外围资本主义性质之后期思想和发展方式的若干文章。这些文章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争论焦点。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受到债务危机影响，此次危机导致拉美地区进入“失去的十年”。在此背景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日益关注最新趋势，结构调整及其影响、恢复增长以及稳定宏观经济的成本成为该机构在分析和政策领域的主要关切。

《拉美经委会评论》积极参与上述争论。本刊发表了大量关于20世纪80年代金融危机的专题文章，其中部分文章警告此次危机即将爆发。Devlin（1979）在一篇重要论文中罗列了商业银行与发展中国家目标的趋同和趋异之处。在廉价借贷的地区背景下，Devlin对借贷机构和债权国的激励措施持怀疑态度，探究如何协调借贷机构和债权国两者的利益，同时含蓄地强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能因此出现破产的风险。

20世纪80年代金融危机爆发后，《拉美经委会评论》发表了若干观点和分析类文章。就重要性而言，应首推Iglesias（1983）和Massad（1983）所著的文章。Iglesias时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他在其文章中表示：“1982年，拉丁美洲承受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带来的阵痛，此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堪称自大萧条黑暗时代以来历次危机之最。”在分析关键宏观经济变量（增长、失业、通货膨胀和对外部门不平衡）之后，他补充道，“当年拉丁美洲经济体发生的一切对于了解影响该地区之严重经济危机的性质和根源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相关知识对于提议成功应对

4 自1979年起，《拉美经委会评论》每年出版三次，出版时间分别为每年的4月、8月和12月。

5 《拉丁美洲经济公报》每年出版两次，主要更新和补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年度经济调查的结果。本刊亦发表关于本地区经济之各类结构性问题的专业文章，附有背景和研究方法注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1974，版本通知）。

6 Raúl Prebisch在《拉美经委会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陈述其关于“外围资本主义”概念的观点（Prebisch, 1976、1978、1979及1980）。如引文所述，这些文章是其最后一部著作《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Capitalismo Periférico: Crisis y Transformación, Prebisch, 1981）的基础。

危机的措施不可或缺。”

Massad (1983) 表达了与Devlin (1979) 类似的观点。他分析外部债务清偿的真实成本，由此证明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存在成本差异。此外，他也提出衡量债务清偿真实成本的新方法，并且简要分析该成本的决定因素。

虽然《拉美经委会评论》刊登了多篇关于债务危机的文章，但在其首个阶段（以及随后两个阶段）始终致力于发表影响长期发展讨论的观点，其中不少观点是基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理念。

谈到在《拉美经委会评论》上发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观点之主题，值得回忆的是该委员会于1978年（《拉美经委会评论》创刊后的第一阶段）举办了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为此，《拉美经委会评论》在上一年度发表了一篇由Cardoso撰写的经典文章“The originality of a copy: CEPAL and the idea of development”（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1977），介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理念演变过程及其与其他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

Cardoso在文中首先阐述Prebisch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关于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同时分析这些观点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Cardoso, 1977, 第11页）。为此，他总结Prebisch关于中心-外围体系的主要看法。随后，他“分析这些看法与在拉丁美洲地区产生影响的其他教条式和学术观点之间的关系。”此外，该文章还分析这些观点“仿效发展政策以及适应新形势”的途径。随后，文章分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理念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新举措之间的关系，这些举措“关乎发展过程的‘恶性循环’、结构性依赖以及‘其他发展’”（Cardoso, 1977, 第7页）。Cardoso在该文章结论部分指出，在接受全球新变革和利用其他理论贡献的过程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理念有所转变。然而，该机构能够保持并展现其核心理念的相关性：产生不发达现象的结构性因素、技术进步在提高生产力和长期增长率的重要性，以及藉此为改善拉丁美洲外围之福祉而创造更好条件的潜力。

就关于长期发展讨论的特定主题而言，《拉美经委会评论》是名副其实的思想阵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知名学者和经济学家在本刊发表了若干文章，这些

文章为形成影响学术和政治争论之主要专题文章和核心观点奠定了基础。Torres Oliveros (2006) 表示，在这一时期，Fernando Fajnzylber分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外经济体的长期增长经历和工业化战略，以此与拉丁美洲地区的相关情况进行对比。Fajnzylber在《拉美经委会评论》第15期中阐述其关于东南亚地区出口工业化的见解（Fajnzylber, 1981）。该文章，以及其他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现状的文章为其形成两个影响最深的概念奠定了重要基础：“削弱的工业化”（curtailed industrialization）和“空盒子”（empty box）（Fajnzylber, 1983和1990）。

在这一阶段，Celso Furtado试图建立发展的文化维度。他最初采用的分析方法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连贯性。此外，Furtado还提出文化是一个动态体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影响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秩序的各个方面。因此，应当认为发展是文化体系的充实与提高。换言之，发展与文化互相依存，发展的目的在于通过实现文化创新提高民众的创造力。Furtado将创新过程分为两类。第一类创新属于他所谓的“物质文化”范畴，以技术进步和积累为代表。第二类创新属于“非物质”文化范畴，即：社会逐步构建的所有理念和价值观。通过为社会成员创造提供更多选择的额外经济剩余以实现基于“物质文化”的发展。Furtado在其1978年出版的著作《工业文明中的创造力和依赖性》（Criatividade e Dependência na Civilização Industrial）阐述关于物质文化中积累和创新（尤其是剩余的作用）的观点，《拉美经委会评论》第6期（Furtado, 1978）总结了这些观点。

在这一阶段，《拉美经委会评论》还刊登了大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从发展社会学角度撰写的文章。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政治史处于困难和剧变时期的背景下（尤其是南锥体，其中以智利为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和《拉美经委会评论》论述了国际政治局势，深入分析冷战背景下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根据Rodríguez (2006) 的观点，该问题是以下几种思想理论的关注所在：Prebisch的外围资本主义思想，该思想强调外围社会民主巩固的新基础；Cardoso关于社会运动和民主需求的理论；Medina Echavarría关



于民主形式和本质更新的观点。Echavarría在《拉美经委会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阐述其观点。在第一篇文章中，这位西班牙社会学家描述面对该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与紧张局势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可采取的不同政治路径（Medina Echavarría, 1976）。在第二篇文章中，他论述西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地区，民主国家的未来（Medina Echavarría, 1977）。

如本章开头所述，这一阶段的《拉美经委会评论》主要围绕发展方式展开讨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形成关于发展方式的概念）。Aníbal Pinto在其名为Styles of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发表于《拉美经委会评论》创刊号）的文章中分析一个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并且在目前的全球化阶段仍有影响力的问题：形成发展方式的经济特性（Pinto, 1976）。Pinto首先定义方式的概念，这一概念间接反映出通过特定经济体制组织社会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的途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因此，关于发展方式的观点纳入两组关键特性。首先，存在关于结构类型的因素，例如①生产组织，②部门生产和就业结构，③物化技术进步以及④参与国际经济的方式。结构性因素①、②、③可追溯至Pinto早期提出的概念“结构异质性”（structural heterogeneity）（Pinto, 1970），这也是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其次，存在动态因素，此类因素形成发展方式，主要涉及需求特性、水平及构成以及作为这些因素之基础的收入分配。

《拉美经委会评论》创刊号还发表了Graciarena（1976）和Wolfe（1976）撰写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探讨发展方式的社会学问题。第一篇文章批判性分析构成发展方式的各类观念，重点关注旨在统一发展方式的观念。该文章还从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出发强调社会科学对形成发展方式概念的贡献。同时，Wolfe的文章还阐述不同发展途径，分析和探究相关学术争论中经常运用的目标和手段。作者试图“提出关于发展的存在概念，这一概念被视为不断将基于一套特定价值观的合理形式强加于未必适宜的实际情况中。”为此，该文章最后“区分已用于定义发展目的和手段的主要标准（乌托邦-规范、技术专家政治论-理性主义以及社会政治学方法）”，在高潮部分分析并批判“推动发展之个人和机构”的行为。

尽管上述作者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为确定发展及其方式的综合性跨学科概念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讨论范畴也非常重要。Osvaldo Sunkel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在《拉美经委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旨在探究拉丁美洲的发展方式与环境之间的关系（Sunkel, 1980）。该文章描述并系统阐释该地区与环境相关的发展动态和过程。Sunkel在宽泛的概念框架内“分析了最近几十年发生的全球变革，重点关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城市化进程对环境因素产生的各类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作用于发展的可能性和限制因素”（Sunkel, 1980, 第17页）。

### 三、Pinto-Lahera时期（1987~1995年）

1987年12月，《拉美经委会评论》第33期出版，智利经济学家Aníbal Pinto接手本刊，担任主编一职，智利政治学家Eugenio Lahera担任技术编辑兼其助手。<sup>7</sup>Pinto曾编辑经济评论杂志《拉美思想》（Pensamiento Iberoamericano）的前11期。此后，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接手《拉美经委会评论》。拉丁美洲地区当时的主要

政治进展是恢复民主（尤其是南美洲）。从经济角度来看，拉丁美洲国家仍未摆脱危机带来的后遗症，特别是由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和债务重新谈判引发的调整所带来的社会成本（Bielschowsky, 1998）。从更广的国际视角看，冷战终结和以新自由主义愈加重要的角色为特征的国际新秩序成为该地区所有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在此地区和国际背景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内部争论着重于调整过程及其社会影响以及重

7 1986年4月第28期是Prebisch担任主编期间出版的最后一期。Gurrieri担任过渡期间《拉美经委会评论》主编，负责出版第29-33期。

新确定该机构关于区域发展的思路，正如Rosenthal指出，尽可能按照“变革中保持连续性”的逻辑而展开（Rosenthal，1988）。

20世纪80年代末，调整过程和新发展方式的出现诱发了主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理念和行动观点，即变革生产方式、实现社会公平的观念，以及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与拉丁美洲学术界之间争论过程中所谓新结构主义方法的形成。此外，该机构还分析了更为具体的发展问题，例如贫困和收入分配、性别维度、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以上是该机构关于长期经济增长传统思路的补充。此外，该机构越来越多地将分析重点转向微观行业领域。

《拉美经委会评论》发表了关于上述所有主题和学术界众多研究课题的文章。关于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有关危机后果和未来前景的问题，首先应提及González（1988）的论文，其研究主题是调整背景下的宏观经济发展政策。Eyzaguirre（1989）探讨债务危机更为具体的影响和挑战，分析在外部和财政约束条件下的储蓄和投资行为。Mortimore（1989）则从更微观的角度分析该问题，着力研究拉丁美洲地区贷款银行的行为。在同一期《拉美经委会评论》中，Devlin（1989）通过采取更全面的方法描述该地区因外部借贷而面临的两难困境。该地区经济体试图在保持增长的前提下进行调整化解危机。实施的相关计划受制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强加的双重限制条款。Meller（1989）分析这种交叉限制条款，提出应加强协调上述机构支持的计划。与此同时，Ramos（1989）则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出发分析宏观经济理论的新动向，重点关注“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支持者之间的争论。

就微观行业分析而言，该时期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探讨了农业和食品行业存在的问题。多位作者在《拉美经委会评论》上纷纷发表文章，剖析此类行业调整产生的影响、行业政策和宏观经济规划、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开展的行业分析、食品安全以及农村生活的社会维度等问题。<sup>8</sup>

8 参见López Cordovez（1987）、Harker（1987）、Ortega（1988）、Schejtman（1988）和Dirven（1993）。

变革生产方式、实现社会公平的观点部分源于Fajnzylber（1983和1990）的早期分析。该观点的出现意味着工业部门（被视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因素）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争论范畴内恢复了重要地位。在债务危机最困难的时期，随着新自由批评主义的兴起，工业部门曾一度丧失其重要地位。然而，该观点所谓的“新工业化”首先要求认识到实现竞争贸易自由化的需求以及发展与第一产业和服务业的互补性。为此，《拉美经委会评论》刊登了多篇关于上述观点的文章，例如Fajnzylber（1988）将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旨在分析国际竞争力和生产结构调整的演变过程（和从中可学到的经验教训）以及技术进步物化。Lahera（1988）和Willmore（1989）均分析了生产变革和技术革新主题。在这一领域（特别是厄瓜多尔），Hofman和Buitelaar（1994）撰写的文章分析厄瓜多尔的比较优势和长期增长的前景。就部门互补性而言，Kuwayama（1989）则分析主要出口部门的技术潜力。Peres（1993和1994）和Rosales（1994）也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分别涉及竞争力政策和产业政策。从变革生产方式、实现社会公平的理念中产生的另一重要观点由Fuentes（1994）提出，他将“开放的区域主义”概念作为一种贸易一体化的选择。就一体化而言，Rosenthal（1993）试图在众多问题中回答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即：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一体化方案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一体化方案有何不同？推动区域间一体化持续稳定进行的最佳手段有哪些？

该方法的其他关键要素包括制度变革和重视民主，后者是社会和拥有高生产力水平之经济体有效变革的重要前提。关于制度变革，Fajnzylber（1991）提出其在变革生产方式、实现社会公平中的作用。与之类似，Lahera（1990）则探讨国家与这一变革之间的关系。关于重视民主，众多文章均探讨其在变革生产方式、实现社会公平中的重要作用。值得一提是Enzo Faletto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探讨文化与民主意识的关系，另一篇则分析拉丁美洲国家的特性（Faletto，1988和1989）。Graciarena（1988）深入研究民主与发展问题，成果卓著。Wolfe（1990）则分析20世纪90年代初的社会结构和民主巩固问题。公民权是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备受关注。Calderón、

Hopenhayn和Ottone (1994) 针对该问题撰写了一篇出色的文章, 从文化角度整合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关于变革生产方式、实现社会公平的理念。

20世纪90年代,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立场是推动公平, 不仅是促进发展的道义要求, 也是增长的主要变量, 新古典主义在增长与公平之间权衡的观点与该机构相左。变革生产方式、实现社会公正的理念将分配问题明确摆在首位, 因此有可能充实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关于发展之社会层面的观点。这一范围更广的理念不仅更加重视与收入分配有关的问题, 而且更加关注全面解决贫困的问题。此外, 从这两个主题来看(两者与拉丁美洲地区的社会经济历史密切相关), 过去20年, 更加具体的新问题不断出现并得到深入研究, 由此丰富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观点和建议。这些问题包括对社会政策的关注、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缺陷和差异、性别(与不公平和低于标准的生产条件密切相关)以及年轻人作为社会政策的主体。

在第二阶段(我们将在第三阶段看到更多有关文章), 《拉美经委会评论》发表了众多相关文章。其中Altimir (1990和1994)、Feres和León (1990)以及Wolfe (1991)介绍和衡量作为区域不发达结构因素之不公平和贫困程度的文章最为重要。Durston (1988)、Franco (1989)、Sojo (1990)、Rodríguez Noboa (1991)、Cohen和Franco (1992)以及Hopenhayn (1992)则发表关于社会政策常规层面和标准领域的论文。由Krawczyk (1990和1993)、López和Pollack (1989)、Arriagada (1990和1994)、Almeras (1994)以及Durston (1992和1993)撰写的有关性别维度、青年人和种族方面的论文特别值得关注。此外, Tokman (1988)、Guerguil (1988)、Infante和Klein (1991)、Calderón (1993)以及Rosenbluth (1994)撰写关于工作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的论文。Uthoff (1995)发表关于拉丁美洲地区养老制度改革的论文, 探讨社会保障问题。就该文章的主题及其重要性而言, Uthoff的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

通过与环境、自然资源以及可持续发展相联系, 变革生产方式、实现社会公平的理念得到重要扩展。事实上,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 Sunkel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其他成员就已引入相关研究课

题。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研究/论文如下: Jovel (1989): 自然灾害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分析, Bustamante和Torres (1990): 高效环境政策概述, Gligo (1990): 环境会计方法, Durán de la Fuente (1991): 减少城市污染的政策选择, Valenzuela (1991): The polluter must pay, 分析采纳庇古税(Pigovian taxes)作为环境政策工具, Tomic (1992): Particip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Gligo (1995): 拉丁美洲地区可持续发展状况和前景。关于拉丁美洲地区的自然资源问题, Dourojeanni (1994)发表一篇有关水资源的文章, Sánchez Albavera (1993和1995)则发表两篇文章, 第一篇探讨该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的自然资源状况, 第二篇分析全球化与拉丁美洲能源行业重组之间的关系。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争论, 此次争论催生了后人所谓的新结构主义概念。与该概念相关的争论源自Fernando Fajnzylber的论文, 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关于变革生产方式、实现社会公正的理念。这一概念包含的观点激发诸多拥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理念的学者将传统观点和新观点纳入所谓新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中。该框架将过去20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理念和行动影响的新兴问题纳入其中。因此, 所谓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新结构主义以更鲜明的观点、更具针对性的分析思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不公平与贫困、贸易一体化与竞争力以及生产发展等问题。

《拉美经委会评论》已发表大量关于新结构主义的文章。首先应提及的是Ffrench-Davis (1988)的文章, 该文章从理论和在公共政策设计领域的应用角度出发, 对比新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基于类似逻辑, Sunkel (1989)将新结构主义和制度主义进行对比, 旨在探究两个思想流派相互补充的范畴。最后, Sunkel和Zuleta (1990)对比新自由主义和新结构主义, 研究着眼于20世纪90年代即将出现的挑战, 探究由某派学说推荐的政策是否有助于恢复拉丁美洲地区增长和发展。

在《拉美经委会评论》的这一发展阶段, 主编Aníbal Pinto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受到多项嘉奖和广泛推崇。值得一提的是, 他于1989年和1991年分别获得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巴西)和墨西哥

国立自治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95年9月（Pinto去世前数月），Pinto被智利政府授予“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奖”。Pinto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形成自身

理念产生重要影响，对复兴该理念起到领导作用。我们将永远铭记Pinto担任《拉美经委会评论》主编期间做出的杰出贡献。

#### 四、Altimir-Bajraj时期（1996年~2008年8月）

Pinto去世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Gert Rosenthal负责出版1996年4月第58期《拉美经委会评论》，Eugenio Lahera担任技术秘书。此后，阿根廷经济学家Oscar Altimir接任《拉美经委会评论》主编，任期至2008年8月。在此期间，《拉美经委会评论》的出版水平显著提升，表现在发行范围扩大、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以外的学术界联系增多，其编辑队伍也日亦壮大。自2003年起，阿根廷经济学家Reynaldo Bajraj担任总编辑，协助Altimir开展工作。Altimir与Bajraj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期间表现出色，均曾担任过该委员会副执行秘书一职。他们在任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提高《拉美经委会评论》的出版水平做出重大贡献。<sup>9</sup>

在这一阶段发表的许多文章均应用先进的分析工具（数量经济分析、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更加精确的部门分析等）。得益于此，自2007年12月以来，本刊被收录至汤姆逊科学信息研究所（Thomson ISI）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不仅提高了出版文章的质量，也壮大了编辑队伍（前提是保持学术与智力独立性）。就《拉美经委会评论》的研究主题而言，本刊始终寻求在经济问题、长期发展路径以及政治社会主题之间保持平衡。

9 Oscar Altimir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渊源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曾担任该机构数个高层职位：数据统计与定量分析司司长（1976~198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与技术司司长（1984~1988）、经济发展司司长（1989~1993），1994~1996年担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副执行秘书。Reynaldo Bajraj于1976年进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他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和社会规划研究所（ILPES）担任多个职位，包括经济政策专家、研究项目主任及咨询项目主任。1987年，Bajraj被任命为联合国拉丁美洲人口统计中心（CELADE）主任，1997~2003年担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副执行秘书一职。

在探讨上述核心话题的重要文章之前，我们应重点了解《拉美经委会评论》自创刊以来的4个里程碑事件：1998年10月出版庆祝机构成立50周年的特刊、第75期Raúl Prebisch百年诞辰纪念刊、自2002年以来年度Raúl Prebisch纪念讲座上著名学者的演讲论文集以及2005年出版的1995~2004年《拉美经委会评论》文章法文版特刊。

正如前文所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于1998年庆祝其成立50周年，《拉美经委会评论》于当年10月出版了一期特刊以示纪念，特刊共刊登了30多篇著名专家撰写的论文，从圈内人与局外人的角度探讨该机构的理念与行动历史。本期特刊刊登一篇由Bielschowsky（1998）撰写的重量级文章，该文章后来经常被引作上述理念发展的重要来源。Katz（1998）探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传统理念领域背景下的技术学习过程，以及拉丁美洲地区产业发展的教训与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末（José Antonio Ocampo担任执行秘书）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关注重点转向全球化，该趋势可从特刊中的多篇文章中窥见一斑，例如Bouzas与Ffrench-Davis（1998）的“La globalización y la gobernabilidad de los países en desarrollo”、Aldo Ferrer（1998）的“América Latina y la globalización”以及Di Filippo（1998）的一篇专题文章，该文章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中心—外围概念。Assael（1998）发表的文章探讨拉丁美洲地区实现公平方面存在的挑战。此外，该特刊还刊登了两篇关于区域一体化障碍的专题文章，第一篇文章由Sunkel（1998）撰写，该文章提出一体化是否有助于实现发展目标的问题，另一篇文章由Urquidí（1998）撰写，该文章则回顾20世纪50年代中美洲与巴拿马的“一体化事件”。

2001年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与《拉美经



委会评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年是Raúl Prebisch的诞辰100周年，不仅是向Raúl Prebisch表达敬意的适当时机，也是纪念其对发展思想所做贡献的理想机会。因此，《拉美经委会评论》第75期用了100多页的篇幅全面探讨Raúl Prebisch的思想与作品。纪念刊首先刊载此前未发表的Pollock、Kerner及Love（2001）对Prebisch的一篇采访稿。接下来是Ocampo（2001）撰写的文章，文章将Prebisch的部分核心思想与新世纪拉丁美洲发展议程联系起来。纪念刊还刊登了Rodríguez（2001）、O'Connell（2001）以及Gurrieri（2001）的论文，后者探讨了Prebisch的早期思想。Cortés Conde（2001）的文章则回顾Prebisch在阿根廷政府，尤其是在中央银行工作期间担任不同职位的情况。纪念刊还刊登了Dosman（2001）与González（2001）的文章，前者从Prebisch不断变化的“宣言”角度讨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后者聚焦Prebisch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视角下的拉丁美洲工业化进程，对比美国工业化进程（Alexander Hamilton）和德国（Frederick List）工业化进程以及John Stuart Mill新古典主义视角下的一般案例。

作为Prebisch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后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于2001年8月启动了以Prebisch名字命名的系列纪念讲座，第一期由Celso Furtado主讲。2002年，第二期主讲嘉宾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seph Stiglitz教授，演讲主题是拉丁美洲的改革进程与影响。此后，《拉美经委会评论》以文章的形式刊登了几乎所有讲座发言。相关文章如下：Stiglitz（2003，前文已提及），Cardoso（2004）：分析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Ricúpero（2004）：Prebisch思想的持续相关性，Rodrik（2005）：经济多元化，Iglesias（2006）：国家的角色与拉丁美洲经济范式，以及Halperin（200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历史背景下重要论文的核心视角（发表于2007年Raúl Prebisch纪念讲座）。

2005年，《拉美经委会评论》出版了一期特刊，编辑整理了1995~2004年间发表的文章，并将其译成法语。此项工作是本刊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拉美经委会评论》的读者群扩大到法国学术界和政界，同时触及《拉美经委会评论》的渊源与使命。本期特刊收

录大量高水平论文，这些论文以往仅面向母语为英语和伊比利亚美洲地区读者。通过法国外交部和拉丁美洲高级研究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项目得到了法国国际合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支持。

本期法语特刊收录了Revista de la CEPAL与《拉美经委会评论》在上述期间发表的10篇文章，另有法国学者David Dumoulin Kervran与Jean-François Deluchey的两篇论文。一篇讨论国际化与政治风格趋同背景下拉丁美洲地区的环境保护政策（Kervran，2005），另一篇则分析拉丁美洲国家内部安全机制的历史与未来前景（Deluchey，2005）。

另外10篇文章反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与《拉美经委会评论》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关于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原理、技术变革与长期增长、关于发展的社会人口学问题以及公共财政、一体化与贸易等其他话题。

在讨论法语特刊上发表的若干文章，主要参考其西班牙语或英语原文版本。其中Ocampo（1999）的文章值得关注。在该文章中，Ocampo认为至少应从两个层面扩大国际金融改革议程的范围：一方面，改革议程不应仅限于防范和化解危机；另一方面，改革议程不仅应考虑国际机构的作用，还应考虑地区安排的作用并确定应保持民族自治的区域。

此外，Klein与Tokman（2000）撰写的文章亦值得关注，该文章分析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分层的影响。作者承认全球化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收益，但也表达对潜在净收益的质疑，尤其是此类收益的分配问题。

鉴于全球化的现状，Escaith（2001）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分析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小型经济体的情况。Katz（2000）则从部门生产发展的视角出发研究1970~1996年该地区工业部门的结构变化与生产力水平。Pérez（2001）从类似但更加宽泛的视角出发研究不同的生产部门，“提出将发展解释为依赖连续不同机会窗口的技术与社会能力的积累过程”，他认为发展取决于源自发达经济体的技术革命。

结合宏观经济分析与社会发展考量因素，Stallings和Weller（2001）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该文章探讨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情况，同时强调就业作为该地区国家社会政策基石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变革生产方式、实现社会公平的理念扩展到多个研究领域。尽管Fernando Fajnzylber的思想仍发挥主导作用,但教育与知识被视为这一变化的基本支柱(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教育学家Juan Carlos Tedesco与其他多位专家对该作品做出重要贡献。此次机构间合作10年后,Tedesco和López(2002)在《拉美经委会评论》发表的文章中探讨拉丁美洲中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强调该教育阶段的覆盖面与教学质量。

除了法语特刊中的文章,《拉美经委会评论》在第三个历史阶段还发表了关于其他领域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基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理念与该地区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作品。就前者而言,Ocampo和Parra(2003)撰写的论文分析大宗商品和生产商之间贸易条件的演变。基于Prebisch和Singer关于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创新理论(20世纪50年代Prebisch思想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理念的核心内容),同时采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Ocampo和Parra确定了24类商品的发展趋势并得出以下结论:“1920年和1980年前后世界经济经历的两次深远变革导致贸易条件逐渐恶化,长期来看,反映在原材料真实价格综合指数以每年近1%的幅度下降”。

在这一阶段,《拉美经委会评论》还发表了大量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文章,一些文章从财政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其他文章涉及金融、真实周期及长期增长。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介绍其中几篇文章。首先应当提及的是Heymann(2000)的论文,该文章分析宏观经济冲击、预期及政策响应之间的关系。Martner(2000)剖析财政稳定器的作用。Morley(2000)探究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增长与结构改革的分配效应。Moguillansky(2002)分析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的投资与财政波动情况,他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尽管资本流入该地区国家具有正面效应,但这些正面效应被相关波动性的负面效应所抵消。Ibarra(2004)对“引导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同模式”的改革情况做历史调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最近从宏观角度出发分析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指出减少实际波动的必要性,由此强调地区金融机构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事实上,Machinea和Titelman(2007)撰写的

文章即分析这方面的联系。

在该编辑团队在任的最后三年,《拉美经委会评论》重新开始关注财政政策分析。Paunovic(2005)分析拉丁美洲地区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Jiménez和Tromben(2006)的研究主题是2003~2007年间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价格上涨情况、由此带来的公共财政的繁荣以及财政政策的含义;Ocampo(2007)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出发分析经济繁荣现象;Aldunate和Martner(2006)从财政政策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会保障问题。

就发展的政治、社会及人口统计学方面而言,Hopenhayn(2001)讨论公民权的传统与新兴形式;Sojo(2001)分析拉丁美洲地区卫生管理改革状况;Schkolnik和Chackiel(2004)研究该地区涉及生育转型的最弱势部门;Saraví(2004)探讨2001年危机后阿根廷的城市隔离与公共空间,尤其关注结构性贫困地区的青年。Dirven(2004)再次从人口统计学的视角出发探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非农就业(rnfe)动态以及不同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地点和不同的‘距离’是农村非农就业的关键决定性因素”。Rodríguez(2005)关于智利的文章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出发提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后期重新重视的问题: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Villatoro(2005)则讨论另一个社会问题:拉丁美洲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尤其是其公共政策含义。

劳动力问题始终是社会政策研究与分析的主题。作为生产要素与长期增长的源泉,劳动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鉴于劳动力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是生产过程中人类行为的转化能力,另一方面是个人生存与享受福利的权利),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它们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始终是《拉美经委会评论》的热点话题,相关文章通常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角度进行探讨。

Vergara(2005)撰写的文章探讨上述领域的问题。该文章分析智利在工厂层面的职业动态,强调就业岗位创造与破坏过程。文章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尤其是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分析劳动力需求状况。作者采用理论与方法框架证明岗位创造是顺周期性的,岗位破坏则是逆周期性的。此项研究结果也显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岗位循环水平。

Carlson(2002)采用更加倾向供给的方法分析受



教育程度与就业的可能性（可雇性）之间的联系以及拉丁美洲地区某些国家的就业收入情况。通过计算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基于不同教育水平与性别），作者发现，正如预期那样，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是正向的，因此得出如下结论：公共政策应当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培养更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从而确保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劳动力市场缺陷的一个独特方面是青年就业问题。Weller（2007）分析青年人在找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他认为青年失业问题不仅影响该群体的福利，还影响一些主要的长期发展因素。

最后，关于劳动力话题，《拉美经委会评论》在第三个发展阶段广泛宣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在社会保障与养老金制度方面的主要立场与建议。

这里将探讨Mesa-Lago（1996和2004）的两篇重要文章。第一篇分析国际与地区机构的立场以及20世纪90年代多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情况，第二篇在更宽泛的时间框架内评估针对这些制度进行的

结构性改革，对比该地区12个国家实施的三类改革。Jiménez和Cuadros（2003）分析养老金制度的覆盖面，认为应当扩大该覆盖面。此外Uthoff于2002年和2006年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论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关于社会保障的立场。2002年发表的文章探讨劳动力市场与养老金制度之间的重要联系，2006年发表的文章则分析此类制度的改革与福利差距之间的关系。Titelman和Uthoff（2003）探讨保险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Titelman（1999）的文章指出医疗保健体系和政策始终与养老金制度相关。该文章研究智利实施的医疗保健融资改革，认为“目前智利在卫生领域实行的公私结合的融资模式与方案必须改革，从而增强该国整体融资能力，降低反向选择风险，改善融资与提供医疗服务领域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联系”。

总体而言，《拉美经委会评论》在第三个发展阶段已成为一系列发展话题的论坛，从宽泛转到具体的发展话题，采用更加精确的分析工具与方法，将发表的多数文章置于知识前沿，同时达到学界严谨与独立性的最高标准。

## 五、近年概况（2009~2012年）

2008年7月，Alicia Bárcena Ibarra出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同年9月任命《拉美经委会评论》目前的编辑团队，首次将成员数量从两位增至三位：除了原有的主编和技术编辑职位，此次新增的职位负责召集和领导新成立的编辑委员会<sup>10</sup>。

目前，Osvaldo Sunkel担任编委会主席，负责《拉美经委会评论》的领导工作，André Hofman担任主编，Miguel Torres担任技术编辑。新团队采取多项举措，包括数次改变刊物版式（更新印刷版封面和网站设计<sup>11</sup>）以及增加更贴近刊物内容的指引，从而进一步提

高出版水平。

内容方面，《拉美经委会评论》扩大征稿范围，力求体现当今时代变迁，反映众多标志时代变化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环境、文化以及观念更新和转型。

2008年年底，在新成立的编辑团队着手工作期间，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升级为国际金融危机。至2009年年初，就影响范围和程度而言，此次危机已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至今日，这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仍令欧洲疲惫不堪。发生这场危机的背景如下：与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的问题日益增多——例如全球变暖步伐加快以及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步伐加快，二者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此外，社会弱势群体流动、国际国内冲突加剧以及国家和地区面临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引发各界重新深入思考拉丁美洲国家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路径。

10 此前《拉美经委会评论》尚无编委会。新编辑人员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成立一个由社会科学界最著名的学者和专家组成的编委会。这一新机构为发表各学科领域的论文提供支撑。

11 见[www.cepal.org/revista/default.asp?idioma=IN](http://www.cepal.org/revista/default.asp?idioma=IN)。

基于上述国际新背景,《拉美经委会评论》的工作人员扩大了本刊物的征稿范围,力求反映多元化知识,融入更全面、更具经验的观点,采取更复杂的最新分析方法。其理念是捕捉当今变革的复杂性,在可能的范围内,以及不偏离具体学科的前提下制定适合现状的方法、战略及公共政策。《拉美经委会评论》一如既往地从业和制度角度出发,力求揭示这些过程的本质及其对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影响。编辑人员和编委会致力于展示拉丁美洲地区的多样性以及从其他地区学到的相关经验。

2009年4月,新编辑团队推出其出版的第一期《拉美经委会评论》(第97期),主要报道2007年以来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Ocampo(2009)探究该危机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Ffrench-Davis(2009)分析投机性资本流动和旨在促进发展的创新融资。Machinea(2009)则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起源,强调金融体系不稳定是其主因。该作者提出,尽管21世纪初实施的货币政策可能放大了资产泡沫,但这并非决定因素。他撰写的文章指出“控制资产价格过度上涨是监管政策而非利率的职能”。

该期《拉美经委会评论》还收录了关于传统主题的多篇文章。Agosin(2009)阐述新兴经济体增长和多元化问题,Rosales(2009)分析全球化进程和新贸易环境,强调中国等新竞争对手的崛起。Infante和Sunkel(2009)的文章聚焦智利的包容性发展战略,再次提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理念包含的一贯主题:结构异质性。

此后出版的几期《拉美经委会评论》继续刊登关于传统主题的论文,同时为探讨关于新目标的课题提供坚实的平台。关于后者,《拉美经委会评论》开始涉及以往报道较少、关于拉丁美洲地区某些区域(例如安第斯国家、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主题并收录相关研究成果。

涉及安第斯国家的论文及其主题如下:Cortés和Sinisterra(2009):哥伦比亚考卡省的社会资本、社会流动和可持续性发展;Alarco(2011):秘鲁商业部门的利润率、融资和投资;Tello(2012):秘鲁经济一体化、部门专业化和国际GDP周期同步化。

中美洲国家方面,Monterroso-Rivas(2009)剖析危地马拉农村发展制度和公共政策;Díaz(2009)研

究中美洲和墨西哥劳工汇款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Sánchez(2009)着眼于中美洲国家贸易自由化和贫困问题;Díaz de Sarralde等(2010)关注危地马拉的税收累进制问题。

加勒比地区经济体亦成为最近几期《拉美经委会评论》的分析对象,以下作者发表了关于该次区域的论文:Boamah等(2011):提出巴哈马和巴巴多斯利率传导的实证证据;Bolaky(2011)分析加勒比地区的旅游业竞争力;Mounsey和Polius(2011)剖析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行业间工资差异。

为了研究国际事件及其对拉丁美洲地区的影响,《拉美经委会评论》陆续发表了有关经济和金融危机、环境问题以及发展可持续性的文章。关于金融危机,本刊进一步分析了次贷危机,此次聚焦全球和地区复苏进程。Bárcena(2010)反思后危机时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发展面临的结构瓶颈;Rosenthal(2010)探讨2008年金融危机对经济思想产生的影响;Kacef和López-Monti(2010)研究该地区自21世纪初的繁荣到2008年危机的历程,列举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关的挑战。

关于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主题,Galindo和Samaniego(2010)陈述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气候变化经济学相关的主要程式化事实;Sotelsek和Laborda(2010)提出基于环境因素之生产效率和技術变革的衡量标准;López(2010)将全球经济危机、环境资源稀缺性及财富集中度相联系;Altomonte等(2011)探讨拉丁美洲产业能源消耗动态。

最近,《拉美经委会评论》开始关注另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经济新结构(尤其是贸易方面)。新崛起的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推动了全球经济活动复苏,其中中国在全球发展新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Álvarez等(2009)探讨这一主题,旨在探究全球工业制成品对华出口的决定因素。Jenkins(2011)阐释中国如何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和拉丁美洲出口利润。

一如Altimir和Bajraj时期的做法,现任编辑团队继续刊登纪念Raúl Prebisch系列讲座的文章。Ferrer(2010)和Ocampo(2011)的论文整理了最近几期讲座的内容。前者以Prebisch的观点为基础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两难问题,后者分析发展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原理,着重强调反周期政策和生产部门转型的作用。

继2005年成功出版法语特刊后，2010年编辑团队又出版了另一期法语特刊，该特刊汇编了2005~2009年发表的12篇最优秀的论文。与2005年特刊相同的是，本期特刊也是与法国政府以及拉丁美洲高级研究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0a）开展技术和智力合作的成果。本着同一理念，编辑团队同年出版了葡萄牙语特刊，纪念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国家办事处在巴西设立50周年。葡萄牙语特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0b）的序言由Alicia Bárcena撰写，精选了2005~2009年发表的14篇论文，主要由巴西学者撰写。

现任编辑团队已任职近4年，在此期间已出版100多篇文章，对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的影响深远。本章介绍部分最具影响力的文章（当然，此举并非忽视受篇幅限制而未在此提及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贫困、不平等、劳动力和教育等主题，具体分析及介绍不同的国情、国家发展进程和发展战略。

《拉美经委会评论》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增强学术严谨性和编辑独立性，诚邀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学者撰文，清晰勾勒当今世界面临之种种挑战的本质，并设计应对挑战的理想政策。

#### 参考文献

- Agosin, Manuel (2009),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growth in emerging economies", *CEPAL Review*, No 97 (LC/G.2400-P/I), Santiago, Chile, April.
- Alarco, German (2011), "Profit margins,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in the Peruvian business sector (1998-2008)", *CEPAL Review*, No. 105 (LC/G.250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Aldunate, E. and R. Martner (2006), "Fiscal policy and social protection", *cepal Review*, No. 90 (LC/G.2323-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Almeras, D. (1994), "Women's formal education: achievements and obstacles", *cepal Review*, No. 54 (LC/G.1845-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Altimir, O. (1981),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a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ata", *cepal Review*, No. 13 (E/CEPAL/G.1145),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 (1990), "Development, crisis and equity", *cepal Review*, No. 40 (LC/G.1613-P),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 (1994),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through crisis and adjustment", *cepal Review*, No. 52 (LC/G.1824-P), Santiago, Chile, April.
- Altimir, O., L.A. Beccaria and M. González Rosada (2002),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rgentina, 1974-2000", *cepal Review*, No. 78 (LC/G.218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Altomonte, Hugo and others (2011),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PAL Review*, No. 105 (LC/G.250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Álvarez, Roberto and others (2009), "Determinants of world manufacturing exports to China, 1990-2006", *CEPAL Review*, No. 98 (LC/G.2404-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Arriagada, I. (1990), "Unequal participation by women in the working world", *cepal Review*, No. 40 (LC/G.1613-P),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 (1994), "Changes in the urban female labour market", *cepal Review*, No. 53 (LC/G.1832-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Assael, H. (1998), "La búsqueda de la equidad", *cepal Review* (LC/G.2037-P), Santiago, Chile, special issue, October.
- Bárcena, Alicia (2010),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n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post-crisis reflection", *cepal Review*, No. 100 (LC/G.2442-P), Santiago, Chile, April.
- Benzaquen, Jorge and others (2010), "A competitiveness index for the regions of a country", *cepal Review*, No. 102 (LC/G.246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Bielschowsky, R. (1998), "Evolución de las ideas de la cepal", *cepal Review* (LC/G.2037-P), special issue, Santiago, Chile, October.
- Boamah, Daniel O. Mahalia N. Jackman and Nlandu Mamingi (2011), "Bahamas and Barbados: empirical evidence of interest rate pass-through", *cepal Review*, No. 103 (LC/G.2487-P), Santiago, Chile, April.
- Bolaky, B. (2011),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in the Caribbean", *cepal Review*, No. 104 (LC/G.2498-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Bouzas, R. and R. French-Davis (1998), "La globalización y la gobernabilidad de los países en desarrollo", *cepal Review* (LC/G.2037-P), Santiago, Chile, special issue, October.
- Bustamante, M.I. and S. Torres (1990), "Components of an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policy", *cepal Review*, No. 41 (LC/G.1631-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Calderón G., F. (1993), "The trade union system: its background and future prospects", *cepal Review*, No. 49 (LC/G.1757-P), Santiago, Chile, April.
- Calderón G., F., M. Hopenhayn and E. Ottone (1994), "A cultural view of the eclac proposals", *cepal Review*, No. 52 (LC/G.1824-P), Santiago, Chile, April.

- Cardoso, F.H. (1977), "The originality of a copy: cepal and the idea of development", *cepal Review*, No. 4, Santiago, Chile, second semester.
- \_\_\_\_\_ (2004), "Beyond economics: interac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epal Review*, No. 83 (LC/G.2231-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Carlson, B.A. (2002), "Educ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in Latin America: 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 *cepal Review*, No. 77 (LC/G.2180-P), August.
- Cohen, E. and R. Franco (1992), "Rationalizing social policy: evaluation and viability", *cepal Review*, No. 47 (LC/G.1739-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Cortés Conde, R. (2001), "Raúl Prebisch: his years in government", *cepal Review*, No.75 (LC/G.2150-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Cortés, M. and M.M Sinisterra (2009), "Colombia: social capital, social movemen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auca", *cepal Review*, No. 99 (LC/G.241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Deluchey, J.F. (2005), « Architectures de la sécurité intérieure en Amérique latine: entre héritages et nouvelle donne », *cepal Review* (LC/G.2263-P), special issue in French, Santiago, Chile, June.
- Devlin, R. (1979), "Commercial bank finance from the North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congruence and conflict", *cepal Review*, No. 9 (E/CEPAL/G.1096),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1985), "External debt and crisis: the decline of the orthodox procedures", *cepal Review*, No. 27 (LC/G.136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1989), "Options for tackling the external debt problem", *cepal Review*, No. 37 (LC/G.1547-P), Santiago, Chile, April.
- Di Filippo, A. (1998), "La visión centro-periferia hoy", *cepal Review* (LC/G.2037-P), special issue, Santiago, Chile, October.
- Díaz, E. (2009),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the cases of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98 (LC/G. 2404-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Díaz de Sarralde, Santiago, Carlos Garcimartín and Jesús Ruiz-Huerta (2010), "The paradox of progressivity in low-tax countries: income tax in Guatemala", *cepal Review*, No. 102 (LC/G.246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Dirven, M. (1993), "Rural society: its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cepal Review*, No. 51 (LC/G.1792-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2004), "Rural non-farm employment and rural diversity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83 (LC/G.2231-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Dourojeanni, A. (1994), "Water management and river basins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53, LC/G.1832-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Dosman, E. (2001), "Markets and the Stat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rebisch manifesto", *cepal Review*, No. 75 (LC/G.2150-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Durán de la Fuente, H. (1991), "Industrial and urban pollution: policy options", *cepal Review*, No. 44 (LC/G.1667-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Durston, J. (1988), "Rural social policy in a strategy of sustained development", *cepal Review*, No. 36 (LC/G.153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1992), "Erroneous theses on youth in the 1990s", *cepal Review*, No. 46 (LC/G.1717-P),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 (1993), "Indigenous peoples and modernity", *cepal Review*, No. 51 (LC/G.1792-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949),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1948* (E/CN.12/8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_\_\_\_\_ (1951),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1949* (E/CN.12/164/Rev.1),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 \_\_\_\_\_ (1974), *Economic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 vol. 19, No. 1-2, Santiago, Chile.
- \_\_\_\_\_ (2008a),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7-2008*, (LC/G.2386-P), Santiago, Chile, October.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8.II.G.2.
- \_\_\_\_\_ (2008b), *Juventud y cohesión social en Iberoamérica: un modelo para armar* (LC/G.2391), Santiago, Chile, October.
- \_\_\_\_\_ (2010a), *Revista CEPAL - Número Hors-Série*, Santiago, Chile.
- \_\_\_\_\_ (2010b), *Revista CEPAL - Número especial em português*, Santiago, Chile.
- eclac/unesco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92b),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Basic Pillars of 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 *Libros de la cepal series*, No. 33 (LC/G.1702/Rev.2-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2.II.G.6.
- Escaith, H. (2001), "The small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epal Review*, No. 74 (LC/G.2135-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Eyzaguirre, N. (1989), "Saving and investment under external and fiscal constraints", *cepal Review*, No. 38 (LC/G.1570-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Fajnzylber, F. (1981), "Some reflections on South-East Asian export industrialization", *cepal Review*, No. 15 (E/CEPAL/G.1187),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1983), *La industrialización trunca de América Latina*, Mexico City, Editorial Nueva Imagen.
- \_\_\_\_\_ (1988),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greed goal, hard task", *cepal Review*, No. 36 (LC/G.153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1990),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from the "black box" to the "empty box": a comparison of contemporary industrialization patterns", *Cuadernos de la cepal series*, No. 60 (LC/G.1534/Rev.1-P), Santiago, Chile.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89.II.G.5.
- \_\_\_\_\_ (1991), "International inser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newal", *cepal Review*, No. 44 (LC/G.1667-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Faletto, E. (1988),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tic conscience", *cepal Review*, No. 35 (LC/G.1527-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_\_\_\_\_ (1989), "The specificity of the Latin American State", *cepal Review*, No. 38 (LC/G.1570-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Feres, J.C. and A. León (1990), "The magnitude of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41 (LC/G.1631-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Ferrer, A. (1998), "América Latina y la globalización", *cepal Review* (LC/G.2037-P), special issue, Santiago, Chile, October.
- \_\_\_\_\_ (2010), "Raúl Prebisch and the dilemma of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ised world", *cepal Review*, No. 101 (LC/G.2455-P), Santiago, Chile.
- Ffrench-Davis, R. (1988), "An outline of a neo-structuralist approach", *cepal Review*, No. 34 (LC/G.1521-P),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 (2009), "The global crisis, speculative capital and innovative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cepal Review*, No. 97 (LC/G.2400-P/I), Santiago, Chile, April.
- Figuerola, Adolfo (2010), "Is education income-equalizing? Evidence from Peru", *CEPAL Review*, No. 102 (LC/G.246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Franco, C. (1989), "Participation and concertation in social policies", *cepal Review*, No. 37 (LC/G.1547-P), Santiago, Chile, April.
- Fuentes, J.A. (1994), "Open regionalism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cepal Review*, No. 53 (LC/G.1832-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Furtado, C. (1978), "Accumulation and creativity", *cepal Review*, No. 6, Santiago, Chile, second semester.
- Galindo, Luis Miguel and Joseluis Samaniego (2010),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tylized facts", *cepal Review*, No. 100 (LC/G.2442-P), Santiago, Chile, April.
- Gligo, N. (1990), "Natural heritage account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pal Review*, No. 41 (LC/G.1631-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_\_\_\_\_ (1995), "The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environ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epal Review*, No. 55 (LC/G.1858-P), Santiago, Chile, April.
- González, N. (1988), "An economic policy for development", *cepal Review*, No. 34 (LC/G.1521-P),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 (2001), "The motive ideas behind thre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es", *cepal Review*, No. 75 (LC/G.2150-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Guerguil, M. (1988), "Some thoughts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informal sector", *cepal Review*, No. 35 (LC/G.1527-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Graciarena, J. (1976), "Power and development styles", *cepal Review*, No. 1, Santiago, Chile, first semester.
- \_\_\_\_\_ (1988), "A hopeful view of democracy", *cepal Review*, No. 35 (LC/G.1527-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Gurrieri, A. (2001), "The ideas of young Prebisch", *cepal Review*, No. 75 (LC/G.2150-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Halperin, T. (2008), "eclac in its historical setting", *cepal Review*, No. 94 (LC/G.2357-P), Santiago, Chile, April.
- Harker, T. (1987), "Agricultural sector policy and macro-economic planning", *cepal Review*, No. 33 (LC/G.1491-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Heymann, D. (2000), "Major macroeconomic disturbances, expect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cepal Review*, No. 70 (LC/G.2095-P), Santiago, Chile, April.
- Hofman, A.A. and R. Buitelaar (1994), "Extraordina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long-run growth: the case of Ecuador", *cepal Review*, No. 54 (LC/G.1845-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Hopenhayn, M. (1992),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out planning or revolution?", *cepal Review*, No. 48 (LC/G.174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2001), "Old and new forms of citizenship", *cepal Review*, No. 73 (LC/G.2130-P), Santiago, Chile, April.
- Ibarra, D. (2004), "The devious maze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importation of reforms", *cepal Review*, No. 82 (LC/G.2220-P), Santiago, Chile, April.
- Iglesias, E.V. (1983), "Reflections on the Latin American economy in 1982", *cepal Review*, No. 19 (E/CEPAL/G.1229),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 (2006), "Economic paradigms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90 (LC/G.2323-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Infante B., R. and E. Klein (1991), "The Latin American labour market, 1950-1990", *cepal Review*, No. 45 (LC/G.168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Infante, Ricardo and Osvaldo Sunkel (2009), "Chile: towards inclusive development", *CEPAL Review*, No. 97 (LC/G.2400-P), Santiago, Chile, April.
- Jenkins, Rhys (2011), "The 'China effect' on commodity prices and Latin American export earnings", *CEPAL Review*, No. 103 (LC/G.2487-P/I), Santiago, Chile, April.
- Jiménez, J.P. and V. Tromben (2006), "Fiscal policy and the commodities boom: the impact of higher prices for non-renewabl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epal Review*, No. 90 (LC/G.2323-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Jiménez, L.F. and J. Cuadros (2003), "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pension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79 (LC/G.2200-P), Santiago, Chile, April.
- Jiménez, Sergio and Jaime Sanaú (2011), "Colombia: public capital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cepal Review*, No. 104 (LC/G.2498-P/I), Santiago, Chile, August.
- Jovel, J.R. (1989),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cepal Review*, No. 38 (LC/G.1570-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Kacef, Osvaldo and Rafael López-Monti (2010), "Latin America, from boom to crisis: macroeconomic policy challenges", *cepal Review*, No. 100 (LC/G.2442-P), Santiago, Chile, April.
- Katz, J. (1998), "Aprendizaje tecnológico ayer y hoy", *cepal Review* (LC/G.2037-P), special issue, Santiago, Chile, October.
- \_\_\_\_\_ (2000), "Structural changes and productivity in Latin

- American industry, 1970-1996”, *cepal Review*, No. 71 (LC/G.2060-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Kervran, D.D. (2005), « Les politiques de conservation de la nature en Amérique latine: au coeur de l'internationalisation et de la convergence des ordres politiques », *cepal Review, special issue in French* (LC/G.2243-P), Santiago, Chile, June.
- Klein, E. and V.E. Tokman (2000), “Social stratification under tension in a globalized era”, *cepal Review*, No. 72 (LC/G.2120-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Krawczyk, M. (1990), “The growing presence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cepal Review*, No. 40 (LC/G.1613-P),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 (1993), “Women in the region: major changes”, *cepal Review*, No. 49 (LC/G.1757-P), Santiago, Chile, April.
- Kuwayama, M. (1989), “The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of the primary export sector”, *cepal Review*, No. 39 (LC/G.1583-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Lahera, E. (1988), “Technical change and productive restructuring”, *cepal Review*, No. 36 (LC/G.153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1990), “The State and changing production patterns with social equity”, *cepal Review*, No. 42 (LC/G.1642-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López, R. (2010), “Global economic crises, environmental-resource scarcity and wealth concentration”, *cepal Review*, No. 102 (LC/G.246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López Cordovez, L. (1987), “Crisis, adjustment policies and agriculture”, *cepal Review*, No. 33 (LC/G.1491-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López M., C. and E.M. Pollack (1989), “The incorporation of women in development policies”, *cepal Review*, No. 39 (LC/G.1583-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Machinea, José Luis (2009),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ts nature and the economic policy challenges”, *cepal Review*, No. 97 (LC/G.2400-P), Santiago, Chile, April.
- Machinea, J.L. and D. Titelman (2007), “Less volatile growth?: the role of reg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pal Review*, No. 91 (LC/G.2333-P), Santiago, Chile, April.
- Martner Fanta, R. (2000), “Automatic fiscal stabilizers”, *cepal Review*, No. 70 (LC/G.2095-P), Santiago, Chile, April.
- Massad, C. (1983), “The real cost of the external debt for the creditor and for the debtor”, *cepal Review*, No. 19 (E/CEPAL/G.1229), Santiago, Chile, April.
- Medina Echavarría, J. (1976), “Latin America in the possible scenarios of détente”, *cepal Review*, No. 2, Santiago, Chile, second semester.
- \_\_\_\_\_ (1977), “Notes on the future of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cepal Review*, No. 4, Santiago, Chile, second semester.
- Meller, P. (1989), “Criticism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cross-conditionality of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cepal Review*, No. 37 (LC/G.1547-P), Santiago, Chile, April.
- Mesa-Lago, C. (1996), “Pension system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the pos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epal Review*, No. 60 (LC/G.1943-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2004), “An appraisal of a quarter-century of structural pension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84 (LC/G.225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Moguillansky, G. (2002),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volatility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77 (LC/G.2180-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Monterroso-Rivas, O. (2009),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polici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Guatemala”, *CEPAL Review*, No. 97 (LC/G.2400-P), Santiago, Chile, April.
- Morley, S.A. (2000), “The effects of growth and economic reform o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71 (LC/G.2060-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Mortimore, M. (1989), “The conduct of Latin America’s creditor banks”, *cepal Review*, No. 37 (LC/G.1547-P), Santiago, Chile, April.
- Mounsey, A. and T. Polius (2011), “Trinidad and Tobago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tials”, *cepal Review*, No. 105 (LC/G.250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Ocampo, J.A. (1999),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form: the broad agenda”, *cepal Review*, No. 69 (LC/G.206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2001), “Raúl Prebisch and the development agenda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epal Review*, No. 75 (LC/G.2150-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2007), “The macroeconomics of the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boom”, *cepal Review*, No. 93 (LC/G.234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2009),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97 (LC/G.2400-P/I),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 (2011), “Macroeconomy for development: countercyclical policies and production sector transformation”, *cepal Review*, No. 104 (LC/G.2498-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Ocampo, J.A. and M.A. Parra (2003), “The terms of trade for commod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epal Review*, No. 79 (LC/G.2200-P), Santiago, Chile, April.
- O’Connell, A. (2001), “The return of “vulnerability” and Raúl Prebisch’s early thinking on the “Argentine business cycle””, *cepal Review*, No. 75 (LC/G.2150-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Ortega, E. (1988), “Agriculture as viewed by eclac”, *cepal Review*, No. 35 (LC/G.1527-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Paunovic, I. (2005), “Public debt sustainability in the northern countries of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87 (LC/G.228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Peres Núñez, W. (1993),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Latin American industrial firms”, *cepal Review*, No. 49 (LC/G.1757-P),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 (1994), “Policies for competitiveness”, *cepal Review*, No. 53 (LC/G.1832-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Pérez, C. (2001),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as a moving target”, *cepal Review*, No. 75 (LC/G.2150-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Pinto Santa Cruz, A. (1976), “Styles of development in Latin



-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1, Santiago, Chile, first semester.
- \_\_\_\_\_(1970), “Naturaleza e implicaciones de la ‘heterogeneidad estructural’ de la América Latina”, *El trimestre económico*, vol. 37, No. 145,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January-March.
- Pollock, D., D. Kerner and J.L. Love (2001), “Raúl Prebisch on eclac’s achievements and deficiencies: an unpublished interview”, *cepal Review*, No. 75 (LC/G.2150-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Prebisch, R. (1976), “A critique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cepal Review*, No. 1, Santiago, Chile, first semester.
- \_\_\_\_\_(1978),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and crisi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cepal Review*, No. 6, Santiago, Chile, second semester.
- \_\_\_\_\_(1979), “The neoclassical theories of economic liberalism”, *cepal Review*, No. 7 (E/CEPAL/1084),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1980), “Towards a theory of change”, *cepal Review*, No. 10,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1981), *Capitalismo periférico. Crisis y transformación*,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 \_\_\_\_\_(1984), “Five stages in my thinking on development”,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G. Meier and D. Se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mos, J. (1989), “Neo-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as seen from the South”, *cepal Review*, No. 38 (LC/G.1570-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Ricúpero, R. (2004), “The renewed currency of Raúl Prebisch”, *cepal Review*, No. 84 (LC/G.225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Rodrik, D. (2005), “Policies for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cepal Review*, No. 87 (LC/G.228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Rodríguez Vignoli, J. (2005), “Adolescent reproduction: the case of Chil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cepal Review*, No. 86 (LC/G.2282-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Rodríguez, O. (2001), “Prebisch: the continuing validity of his basic ideas”, *cepal Review*, No. 75 (LC/G.2150-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2006), *El estructuralismo latinoamericano*, Mexico City, eclac-Siglo XXI Editores, November.
- Rodríguez Noboa, P. (1991), “Selectivity as the crux of social policies”, *cepal Review*, No. 44, LC/G.1667-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Rosales V., O. (1994), “Industrial policy and promotion of competitiveness”, *cepal Review*, No. 53 (LC/G.1832-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_\_\_\_\_(2009),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de environment”, *cepal Review*, No. 97 (LC/G.2400-P/I), Santiago, Chile, April.
- Rosenbluth, G. (1994),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52 (LC/G.1824-P), Santiago, Chile, April.
- Rosenthal, G. (1988), “eclac: forty years of continuity with change”, *cepal Review*, No. 35 (LC/G.1527-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_\_\_\_\_(2010),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 and its repercussions on economic thought”, *cepal Review*, No. 100 (LC/G.2442-P),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1993),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1990s, *cepal Review*, No. 50, LC/G.1767-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Sánchez Albavera, F. (1993), “Natural resources: the current debate”, *cepal Review*, No. 51 (LC/G.1792-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1995), “Global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the energy sector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56 (LC/G.1874-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Sánchez, M.V. (2009), “Trade policy reform and poverty: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Central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98 (LC/G.2404-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Saraví, G.A. (2004), “Urban segregation and public space: young people in enclaves of structural poverty”, *cepal Review*, No. 83 (LC/G.2231-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Schejtman, A. (1988), “Food security: trends and impact of the crisis”, *cepal Review*, No. 36 (LC/G.153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Schkolnik, S. and J. Chackiel (2004), “Less advanced sectors in the Latin American fertility transition”, *cepal Review*, No. 83 (LC/G.2231-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Sojo, A. (1990), “Nature and selectiveness of social policy”, *cepal Review*, No. 41 (LC/G.1631-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_\_\_\_\_(2001), “Reforming health-care management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74 (LC/G.2135-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Sotelsek, Daniel and Leopoldo Laborda (2010), “Latin America: incorporat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to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technical change”, *CEPAL Review*, No. 101 (LC/G.2455-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Stallings, B. and J. Weller (2001), “Employment in Latin America: cornerstone of social policy”, *cepal Review*, No. 75 (LC/G.2150-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Stiglitz, J.E. (2003), “Whither reform? Towards a new agenda for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80 (LC/G.2204-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Sunkel, O. (1980),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yle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12 (E/CEPAL/G.1130),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1989), “Institutionalism and structuralism”, *cepal Review*, No. 38, (LC/G.1570-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_\_\_\_\_(1998), “Desarrollo e integración regional: ¿otra oportunidad para una promesa incumplida?”, *cepal Review* (LC/G.2037-P), special issue, Santiago, Chile, October.
- Sunkel, O. and G. Zuleta (1990), “Neo-structuralism versus neo-liberalism in the 1990s”, *cepal Review*, No. 42 (LC/G.1642-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Tedesco, J.C. and N. López (2002), “Challenges for secondary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76 (LC/G.2175-P), Santiago, Chile, April.
- Tello (2012), “Perú: Integración, especialización sectorial y sincronización de los ciclos internacionales del producto”, *cepal Review*, No. 106, Santiago, Chile, April, forthcoming.

- Tokman, V.E. (1988), "Urban employment: research and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34 (LC/G.1521-P), Santiago, Chile, April.
- Titelman Kardonsky, D. (1999), "Reform to health system financing in Chile", *cepal Review*, No. 69 (LC/G.206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Titelman Kardonsky, D. and A. Uthoff (2003), "The role of insurance in social protection", *cepal Review*, No. 81 (LC/G.2216-P) Santiago, Chile.
- Tomic, T. (1992), "Particip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cepal Review*, No. 48 (LC/G.1748-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Torres Olivos, M. (comp.) (2006), Fernando Fajnzylber, Una visión renovadora del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Libros de la cepal series*, No. 92 (LC/G.2322-P), Santiago, Chil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epal), November.
- Urquidi, V.L. (1998), "Incidentes de integración en Centroamérica y Panamá, 1952-1958", *cepal Review* (LC/G.2037-P), special issue, Santiago, Chile, October.
- Uthoff, A. (1995), "Pension system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56 (LC/G.1874-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_\_\_\_\_ (2002), "Labour markets and pension systems", *cepal Review* No. 78 (LC/G.218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_\_\_\_\_ (2006), "Gaps in the welfare State and reforms to pension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89 (LC/G.2312-P), Santiago, Chile.
- Valenzuela, R. (1991), "The polluter must pay", *cepal Review*, No. 45 (LC/G.1687-P), Santiago, Chile, December.
- Vergara, S. (2005), "The dynamic of employment in Chilean industry", *cepal Review*, No. 86 (LC/G.2282-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Villatoro, P. (2005),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mes: experiences from Latin America", *cepal Review*, No. 86 (LC/G.2282-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Weller, J. (2007), "Youth employment: characteristics, tensions and challenges", *cepal Review*, No. 92 (LC/G.2339-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Willmore, L. (1989), "Export promotion and import substitution in Central American industry", *cepal Review*, No. 38 (LC/G.1570-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Wolfe, M. (1976),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who is approaching what?", *cepal Review*, No. 1, Santiago, Chile, first semester.
- \_\_\_\_\_ (1990), "Social structures and democracy in the 1990s", *cepal Review*, No. 40 (LC/G.1613-P), Santiago, Chile, April.
- \_\_\_\_\_ (1991), "The prospect for equity", *cepal Review*, No. 44 (LC/G.1667-P), Santiago, Chile, August.

## 《拉美经委会评论》

### 征稿启事

##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to the *CEPAL Review*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submission, consider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rticles,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CEPAL Review* has prepare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nd suggestions to serve as a guide for future contributors.

The submission of an article implies an undertaking by the author not to submit it simultaneously to other publications. The copyright to all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Review* shall be own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Each article will be review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which may decide to submit it to external referees.

Papers should be submitted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English, French, Portuguese or Spanish). They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the appropriate language by the relevant ECLAC services.

Each article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summary, no more than 150 words in length, giving a brief description of its subject matter and main conclusions.

Each article must also carry three JEL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codes. The JEL Classification Codes Guide is available online at [www.aeaweb.org/jel/jel\\_class\\_system.php](http://www.aeaweb.org/jel/jel_class_system.php).

Papers should be no longer than 10,000 words, including the summary, notes and bibliography. Shorter papers will also be considered.

Articles should be sent by e-mail to [revista@cepal.org](mailto:revista@cepal.org) in Word format. Papers in PDF format will not be accepted.

### Style Guide:

*Titles* should not be excessively long.

### Footnotes

-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ootnotes be kept to a minimum.
-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ootnotes not be used to cite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such references should preferably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text.
- Footnotes should be numbered consecutively using superscript Arabic numerals.

### Tables, figures and equations

-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ables and figures be kept to a minimum, avoiding any redundancy with the text.
- Equations should be written using the Office equation editor “MathType”; they should not be inserted as “pictures”.

- Tables, figures and other elements should be inserted at the end of the text in the format in which they were designed; they should not be inserted as “pictures”. Figures in Excel should include the corresponding worksheets.

- The location of tables and figures in the body of the article should be indicated in the appropriate place as follows:

Insert figure 1

Insert table 1

- Tables and figures should include an explicit and complete reference to their sources.

- Tables should indicate the period covered at the end of the title, and should indicate the units in which the data are expressed in a subtitle (in italics and between brackets).

- The symbols referred to in the “Explanatory notes” which appear on the page preceding the table of content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preparation of tables and figures.

- Footnotes to tables and figures should be ordered consecutively using superscript lower-case letters.

- Figures should be prepared bearing in mind that they will be printed in black and white.

### Acronyms and abbreviations

- Acronyms and abbreviations should not be used unless absolutely necessary, in which case the full name should be written out the first time it occurs in the article.

### Bibliography

-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should b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and should not be excessively long.

-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under the title “Bibliography”, all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should be included accurately and in alphabetical order by author: name of author(s), year of publication, full name of article (if any) and publication (including any subtitle), city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 and, in the case of a periodical, month of publicati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Review*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any necessary editorial changes in the articles, including their titles.

Authors will receive a one-year courtesy subscription to the *Review*, plus 30 offprints of their article in Spanish and 30 in English,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in each language.

# C REVIEW

ANDRÉ HOFMAN  
*Editor*

MIGUEL TORRES  
*Technical Editor*

[www.eclac.org/revista](http://www.eclac.org/revista)

## EDITORIAL BOARD

OSVALDO SUNKEL  
*Chairman*

JOSÉ ANTONIO ALONSO

OSCAR ALTIMIR

RENATO BAUMANN

LUIS BECCARIA

LUIS BÉRTOLA

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MARIO CIMOLI

JOHN COATSWORTH

ROBERT DEVLIN

CARLOS DE MIGUEL

RICARDO FRENCH-DAVIS

NORMAN GIRVAN

DANIEL HEYMANN

MARTÍN HOPENHAYN

AKIO HOSONO

GRACIELA MOGUILANSKY

JUAN CARLOS MORENO-BRID

JOSÉ ANTONIO OCAMPO

CARLOTA PÉREZ

GERT ROSENTHAL

PAUL SCHREYER

BARBARA STALLINGS

ANDRAS ÜTHOFF

ROB VOS



UNITED NATIONS

ECLAC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SBN 978-7-80234-857-8



9 787802 348578 >

定价：90.00元